

第十一章 亚洲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斗争

亚洲有广大富饶的土地，有勤劳勇敢的人民，有悠久光辉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它变成西方殖民者的“狩猎场”和冒险家的乐园，造成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

欧洲殖民者入侵亚洲，开始于十五世纪末。首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接踵而来的是英、法等国。十七世纪以来，亚洲成了欧洲殖民者侵略的重要对象。它们在争夺殖民霸权的长期角逐中，英国夺得了海上贸易和殖民地的霸权，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交通运输条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铁路的修筑，轮船的使用，使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日益具有国际性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已经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变本加厉。到十九世纪中期，亚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压榨和控制，有的已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除了继续使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掠夺手段外，更多地是利用廉价的商品和炮舰以冲破闭关自守的亚洲各国的大门。在这方面，英国是一个突出的典型。

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给亚洲各国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经济上瓦解了各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强化了腐朽过时的封建势力，并使它成为殖民统治的支柱。这都从根本上打乱了亚洲各国社会正常发展的历史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停滞和倒退。

但是随着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变本加厉，亚洲人民反殖、反封建的斗争也遍及各国城乡。十九世纪中期，亚洲各国人民同外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同本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个历史时期亚洲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外国殖民主义者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矛盾，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矛盾的激化和发展，形成了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亚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高潮。斗争风起云涌，有阿富汗人民和缅甸人民的反英斗争，越南人民早期抗法斗争和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斗争；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有印度尼西亚人民抗荷斗争，伊朗巴布教徒起义，印度民族大起义和中国太平天国革命。日本的“倒幕”运动也在这次斗争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这次席卷亚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打击之沉重是前所未有的。它反映了各国人民的共同遭遇和苦难，表达了各国人民不畏强暴和反抗殖民侵略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显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一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

第一节 十九世纪早期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斗争

荷兰殖民统治的建立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文明古国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以“千岛之国”著称。十六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入侵，不久，葡萄牙把西班牙的势力排挤出去。荷兰人的远征队也在同世纪末来到这里。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统管对印尼的垄断贸易，从此正式展开了对印尼的武装侵略和殖民掠夺。在十七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荷兰在印尼同葡、西、英的殖民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并镇压了当地封建主及人民的反抗，从而取得了商业独占权。1619年，荷兰占领雅加达城，并以此为据点，玩弄“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狡诈手段，在爪哇岛上的两个伊斯兰教国家——万丹和马塔兰之间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嗾使一个王国去反对另一个王国”，“不让万丹变得太弱，不让马塔兰变得太强”，从中渔利，分而治之。万丹在东印度公司的威逼下沦为“保护国”。荷兰殖民者又通过军事压力和不平等条约，以及利用封建贵族争夺王位的战争，把马塔兰分裂为日惹和梭罗两个小邦，也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荷兰殖民者委任总督统治印度尼西亚。在公司占领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在其他地区利用封建王公实行间接统治。在直接统治区，实行的是“实物定额纳税制”，接收获量向农民征收贡赋；在间接统治区推行“强迫供应制”，与当地土王签订专利条约，规定土产的种类和数量，由公司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并派出殖民官员进行监督。荷兰人用这种手段，搜刮了大量土特产品，如香料和咖啡，在欧洲市场上以垄断价格出售。如果欧洲市场上某种产品出现跌价，就强迫印尼农民毁掉这类作物改种其它作物，使农民劳动成果尽付东流。殖民者为了垄断贸易，还严禁印度尼西亚人民与别国通商，也不准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自由买卖，违抗者就要受到严厉惩罚。班达岛上的居民就是因为把豆蔻卖给了爪哇和欧洲商人，几乎全被杀光。此外，荷兰殖民者为了发财致富，还实行了一种极端残酷的“盗人制度”，他们专门训练一批盗人的匪徒、翻译和人口贩子，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中国沿海一带，捕捉身强力壮的青年，押送到殖民者的直接统治区充当苦力，或运到其它地区转卖为奴隶。荷兰殖民者通过这些血腥手段，从印度尼西亚掠夺了大量财富。东印度公司的利润，从1602年的每年平均利润率的32.5%，增加到1650年的500%。与此相反，印度尼西亚人民则陷入饥饿、贫困和死亡的深渊。这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荷兰殖民者所“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荷兰殖民者的残暴手段，不断激起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强烈反抗，十八世纪初，奴隶苏拉巴蒂领导的农民起义和1740年的华侨与爪哇人民共同抗击荷兰侵略者的英勇斗争，都促进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觉醒。

十九世纪初荷兰殖民统治的加强 十八世纪末，荷兰政府为了适应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于1799年宣布解散东印度公司。从1800年起，印尼由荷兰政府殖民部直接统治。到十九世纪初，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和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都力图控制荷兰，并夺取它的殖民地。1806年，法国占领了荷兰，任命亲法的荷兰人丹德尔斯为印尼总督。当时，英法在欧洲交战。1811年8月，英国占领雅加达，对印度尼西亚进行了短期统治。英国在爪哇推行了以商品输出和掠夺原料产地为主要方式的自由主义竞争政策，如实行货币地租，废除强迫供应制，取消垄断贸易，废止国内关卡税，鼓励外国资

本开辟种植园，等等。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荷兰恢复独立。根据 1814 年英荷条约，英国于 1816 年把印度尼西亚的统治权交还给荷兰。荷兰是个商业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国家，无力与英国竞争，再加上刚从亡国中恢复独立，国力薄弱，国库空虚，没有可能继承英国人的自由主义殖民政策，于是又恢复了旧的剥削方式，只是保留了英国人实行的货币地租。

荷兰殖民者同所有的复辟者一样，他们“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卷土重来之后，对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压榨和掠夺。他们不仅恢复对咖啡、烟草、靛蓝等实行强迫种植制和强迫供应制，而且还强迫印度尼西亚人民缴纳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多达三十余种，如门户税、牲畜税、迁居税、土地贸易税、稻谷收割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一系列敲骨吸髓的反动措施，不仅使爪哇广大劳动人民感到极大的痛苦而愤怒，也引起那些因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受到殖民者侵犯的封建主的不满。印度尼西亚各阶级对殖民者的新仇旧恨，终于导致了 1825—1830 年爪哇大起义的爆发。

蒂博尼哥罗领导的人民大起义 蒂博尼哥罗（1785—1855 年）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日惹王国的王子。他立志要恢复爪哇人光荣的历史文化传统，重建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教封建王国。由于王位继承权被剥夺，加深了他对荷兰殖民者的不满。青年时，他熟读伊斯兰教经典和文学、历史书籍，并对人民疾苦有所体察。他曾在自己的一块领地上主动减免农民的地租，以便借助人民力量抗击荷兰的殖民统治。

爪哇大起义前夕，蒂博尼哥罗已经是一个在各阶层中享有威望和影响的领袖人物。在他的领地集聚了一批不满荷兰殖民者的阿訇和封建王公。1825 年 7 月，荷兰人借口修筑公路，破坏了蒂博尼哥罗领地上的“皇族墓场”，这对崇敬祖先的蒂博尼哥罗来说，简直是莫大的侮辱。他提出抗议，殖民者不仅拒不接受，还围攻和烧毁他的住宅，企图逮捕他，因此筑路事件就成了这次起义的导火线。7 月 20 日，蒂博尼哥罗在日惹附近的斯拉朗建立总部，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领导人中还有著名的阿訇奇阿依·摩佐和和将领申铎。蒂博尼哥罗发布文告，号召进行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消灭荷兰殖民者。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下层人民，带着各种原始武器，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里，一些封建主和阿訇也尾随而来。不少华侨积极参加作战，供应物资军火。几天之内，起义就发展到一支有三万人的队伍。他们向荷军大本营的日惹和马吉冷挺进，沿途严惩殖民官吏，烧毁荷兰人住宅、仓库、关卡和种植园。起义以燎原之势席卷了爪哇大部分地区。荷兰殖民者节节败退，龟缩在日惹、梭罗等几个军事据点里。在起义军取得一连串胜利后，10 月，蒂博尼哥罗在日惹西北部的德克梭宣布建立伊斯兰教王国，自称爪哇素丹。1827 年初，蒂博尼哥罗整顿了起义军，建立几支固定的骨干队伍。起义军运用游击战术，机动灵活地转战于爪哇各地，矛头所向直指荷兰殖民者，同时也惩罚那些甘当荷兰人的走狗的封建主。

1828 年底，荷兰殖民军司令德·科克代理总督。这个在爪哇岛上住了二十二年的殖民军头子深深地知道，单纯依靠军事行动是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而战争拖延太久，又远非荷兰财力所能负担。所以他一方面加强碉堡战术，加紧围剿起义军；另一方面加强和谈及诱降活动，特别是用封官许愿、挑拨离间的手段，在起义军的领导层进行诱降分裂活动。1828 年 11 月，蒂博尼哥罗的主要助手摩佐和一些将领相继叛变投敌，给起义造成了严重危

害。在战争形势极端不利的艰难时刻，蒂博尼哥罗表现了坚强的毅力。他多次拒绝谈判和诱降，即使他的长子在战场上为荷军俘获，并被当作人质时，他也不为所动。1829年10月，当起义军活动地盘大为缩小，蒂博尼哥罗因战马死亡被迫徒步行军而且经常病倒时，他还是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坚持战斗下去。1830年3月，蒂博尼哥罗被骗往马吉冷同德·科克举行谈判。蒂博尼哥罗坚持要在爪哇建立独立的伊斯兰教王国，拒不投降，荷兰殖民者背信弃义地将他扣留，流放苏拉威西的望加锡。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的爪哇人民大起义，终于失败了。

爪哇大起义是印尼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它由封建主领导，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农民。这次起义歼灭了一万五千多名殖民军，使殖民者消耗战费二千万盾，沉重地打击了荷兰的殖民统治，激发了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独立的决心，延缓了荷兰征服整个印度尼西亚的时间表。这次起义是十九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第一次高潮到来的前奏。

第二节 伊朗巴布教徒起义

欧洲列强的侵略和伊朗沦为半殖民地 伊朗古称波斯。十八世纪晚期，伊朗东北部土库曼人恺加部族统一了伊朗，建立了恺加王朝（1794—1925年）。当时，伊朗还是个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国王的权力至高无上。全国分为三十个省和州，各设总督和州长，由王亲国戚充任。总督和州长有很大的财权和兵权，各霸一方，拥有实际的统治权力。封建主之间的战争以及叛乱连年不断。伊斯兰教十叶派的高级阿訇掌握教权，他们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解释《古兰经》，成为封建王权的重要支柱。

十九世纪中期，封建生产关系在伊朗占统治地位，国王、高级阿訇和封建主几乎占有全国的土地。农民对封建主保持着依附关系，必须把收成的五分之四交给地主，生活极端贫困。手工业者除受行会把头和包买商盘剥外，还要向国家缴纳重税。商人和小企业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毫无保障。封建割据、战乱频繁、关卡林立和贸易垄断，都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伊朗国势积弱不振，为欧洲殖民国家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从十九世纪开始，伊朗成为英、法、俄争夺的对象。1800年至1841年间，英国强迫伊朗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伊朗购买土地、建立工厂、商品免征关税等特权。法国拿破仑早就想把伊朗作为远征印度的跳板。1808年法国与伊朗签订通商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沙俄为争夺高加索统治权与伊朗发生两次战争，并于1828年强迫伊朗订约，吞并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土地，勒索了二千万卢布，还得到许多经济政治特权。随后，美、奥等国也胁迫伊朗签订类似的条约，伊朗逐渐走上半殖民地道路。

不平等条约给伊朗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外国商品特别是英国商品的倾销，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几乎占伊朗全部进口总额的90%。这不仅破坏了伊朗的封建自然经济，而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要求以货币代替实物地租，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国王、总督、州长、高级阿訇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公开拍卖官职并把自己的采邑出卖给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些买到官职和采邑的人又拼命掠夺农民，扩大了新地主阶层。外国商品的倾销使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纷纷破产。农民遭受的剥削更加沉重。十九世纪中期，在伊朗的广大地区，饥荒和疫病接踵而至，南阿塞拜疆地区有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愤怒的群众不断发起暴动。下层阿訇的生活也日益恶化，痛恨封建主和高级阿訇的残暴统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把他们推到斗争的第一线，成了革命群众的代言人。他们以巴布教为旗帜，领导了反封建压迫和殖民奴役的人民起义。

1848—1852年巴布教徒的武装起义 巴布教是伊斯兰教在伊朗的新教派。创始人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1820—1850年）出生于布商家庭，是一个下层阿訇。1844年，他自称“巴布”。“巴布”是门的意思，即人们所渴望的“救世主”马赫迪的意志将通此“门”传达给人民。他预言，救世主即将降临伊朗，“正义王国”即将出现，人民应作好准备，去迎接新的生活。1847年，巴布写成《默示录》，成为巴布教的“圣经”。此书宣称：人类社会是依次更迭的，后一时代要超过前一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法律和制度，各时代都有其“先知”和圣经。巴布自称他是“主”委托的“先知”，即真主与人民之间的中介人，《默示录》将取代过时的《古兰经》。巴布的

教义主要反映中小商人的利益和要求，所以提出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身自由，经商光荣，欠债要还，统一货币等主张。

巴布及其教徒，最初只在宫廷宣传教义，幻想统治阶级改恶从善。但在1847年统治阶级迫害他们，把巴布本人逮捕和囚禁起来。以后，巴布教徒中很快出现了接近劳动群众的领袖，如农民出身的穆罕默德·阿里·巴尔福鲁什等人。他们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民主纲领：废除封建特权和私有制，平分公共财产，男女平等。这些要求深受下层群众的欢迎，巴布教徒的队伍迅速扩大。

1848年9月，伊朗国王死后，统治集团内讧。巴布教徒利用时机，首先在马赞德兰省举行起义。起义者击溃了当地封建武装，夺占了伊斯兰教徒认为是圣地的塞克·塔别尔西陵墓。他们在这里修筑城堡，平分财产，实行共餐，以实现自己的理想。起义者多次打败国王的军队，推动了各地巴布教运动，到1849年2月，全伊朗的巴布教徒增至十万余人。这时，国王增派重兵，并用大炮轰击起义据点，也没有得逞。后来，王军采用欺骗手段，假惺惺地许诺，只要余下的二百多战士放下武器，就可保全生命和给予自由，当起义者走出陵墓时，反动派就背信弃义把他们全部杀害。

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马赞德兰省的起义被镇压了，巴布教徒运动仍在继续发展壮大。1850年5月，巴布教徒又在赞兼、尼里兹等城市举行第二次和第三次起义。一万五千名的起义者占领了赞兼城的东半部，英勇抗击王军的进攻。当年12月，王军用大炮几乎轰平了赞兼城，巴布教徒浴血奋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赞兼起义失败后，伊朗南部尼里兹的起义者仍在坚持斗争，进行游击战。在狱中的巴布还同教徒保持着联系，使统治阶级惊恐不安，正如首相弥尔札·塔吉汗在给国王的奏摺中所说：“巴布一日不死，他的教徒的起义就一天不停”，为了铲除心腹之患，1850年7月，国王下令处死巴布。

1851年到1852年，巴布教徒一再掀起起义，但由于脱离群众，很快都被政府镇压下去了。

巴布教徒起义是一次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伟大斗争，它是十九世纪中期亚洲民族解放斗争风暴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义的主要矛头指向外国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恺加封建王朝，因此，在客观上它具有反对外国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这次起义以农民为主力，而起义的领导权掌握在商人和下层阿訇手中，他们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以广泛发动农民，这就是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1857—1859 年印度民族起义

英国的殖民统治。民族矛盾的激化 英国侵略印度，始于十七世纪初。1600 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殖民者侵略和掠夺印度的主要工具。1757 年 6 月普拉西战后，英国占领了孟加拉，这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开端；到 1849 年英国殖民者吞并旁遮普，整个印度都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了。

从普拉西之战到印度民族大起义的一百年间，英国对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殖民掠夺。从剥削方式上看，既有以暴行为基础的赤裸裸的抢劫，也采用倾销廉价商品的办法进行经济剥削。从征服和统治的手段上看，既参与王公的内讧，或进行伪善的结盟，或实行公开的欺诈、贿赂和勒索；又利用当地不同的民族、部落、种姓、宗教信仰和土邦间的矛盾，进行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在征服后，还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进行统治，以继续保持印度各地区的分散性和孤立性。

征收高额土地税是英国殖民者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实行了几种征收土地税的办法。例如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实行农民租佃制，农民成了英国殖民者的佃农，必须向殖民当局交纳全年收成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土地税。在孟加拉实行“柴明达尔制”，柴明达尔（包税者）变成拥有土地的地主，向农民征收地租，向殖民当局交纳土地税。印度广大农民在英国殖民者和本国地主、高利贷者的双重压榨下，挣扎在死亡线上。据统计，普拉西战役后的五十八年间（1757—1815 年）英国就从印度榨取了十亿英镑的财富，其中三分之二是以土地税的形式从农民的身上榨取来的。英国殖民者的残酷掠夺，使印度农业衰落，土地荒芜，饥馑频发，人口锐减。1770 年的大饥荒就夺去了孟加拉地区三分之一的生命。“饥荒是印度著名的产物，是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的普遍现象”。

1813 年，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反对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英国取消了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自此以后，英国工业品向洪水一样地涌入印度，对印度的经济发生了毁灭性的打击。举例说，1824 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布为一百万码（一码等于三呎），1837 年猛增到六千四百万码。印度的纺车和织机迅速为英国蒸气机所摧毁，手工业工场纷纷倒闭。纺织业的著名城市达卡，过去有十五万居民，1840 年就减少到二、三万，城内长满荆棘，疟疾流行，由一个繁华的城市变成了一个贫穷的小镇。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英国殖民者摧残印度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战争带来的恶果。广大手工业者和农民，深受国破家亡之苦，他们很自然地成为反英起义的主力军。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殖民者为了适应本国工业发展的需要，从 1848 年戴贺胥任印度总督以后，颁布了取消王公特权和兼并土地的政策。他制定了“丧失权利制”，不承认封建统治者的立嗣权，剥夺了他们的恤养金，兼并了詹西、奥德等十多个邦，大约使土邦的面积减少三分之一。这激起了王公们的不满，其中有些人后来参加到反英起义队伍中来。

英国殖民者出于“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从当地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中招募了二十万士兵，作为镇压两亿印度人民的力量，同时由四万英籍军官监视和控制这二十万印籍军队。当英国利用士兵征服整个印度以后，对士兵也改变了政策：干涉他们的信仰，触犯他们的种姓，削减他们的薪饷，驱使他们远离家乡到阿富汗、缅甸、伊朗和中国为殖民者卖命。这都引起印度士兵极大的反感。这些受尽英籍军官欺凌和压迫的士兵，是当时印度人民

群众中唯一的有组织、有训练、有武装的力量。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反英民族大起义的先锋。

英国殖民者大大强化殖民统治，使印度人民“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任何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全民族的反抗，印度民族起义日益酝酿成熟了。

起义的爆发和德里起义政权的建立十九世纪中期，印度到处弥漫着对英国殖民者的不满情绪，社会各阶层都在秘密酝酿起义。从1856年起，作为起义的信号的小薄饼在农村传送，红莲花在士兵中传递。在德里和马德拉斯等大城市不断出现公开号召起义的文告，一些揭露殖民罪恶的传单也在各地张贴，这些迹象表明，一场反英大起义的火山即将爆发。

1857年初，殖民当局发下涂有牛脂和猪油的新子弹，使用时必须咬破包装纸。信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士兵认为这是侮辱他们的宗教，拒绝使用。因为按照宗教习俗，印度教徒禁食牛肉，伊斯兰教徒忌食猪肉。3月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一个驻地，一位名叫曼加尔·潘迪的士兵号召同伴不接受涂油子弹，并开枪打死三个英国军官，被判处绞刑。但是，屠杀并不能制止起义，反而加速了起义的爆发。

1857年5月10日，驻在德里附近的米鲁特的士兵首先发难，这可贵的第一枪点燃了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烈火。起义的印度士兵和以后的起义者鉴于大敌当前，放弃了宗教偏见，用他们曾经拒绝使用的涂油子弹来回击英国殖民者。士兵本来是英国殖民者用以统治印度人民的武装队伍，现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米鲁特解放后，起义军向德里挺进，5月11日清晨，进抵德里城下。城内军民纷纷响应，严惩英国军官，烧毁殖民者的住宅，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面对民族敌人并肩战斗。德里的反英斗争进行了六天，5月16日，起义者完全控制了德里。在德里正如在米鲁特一样，城市市民和郊区农民支持了起义。

德里收复后，起义者把莫卧儿王朝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赫二世（1837—1857年在位）推上王位。同时成立了由六名军官和四名文官组成的行政会议，掌握了实权。行政会议发表文告，号召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团结对敌。行政会议还颁布命令，废除“柴明达尔制”，取消贫民捐税，对地主、富商和高利贷者征收特别税。

德里起义政权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它意味着起义者取得了全印的政治中心，增强了起义的全国意义，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起义的烽火很快就燃遍了整个印度，北起尼泊尔边境，南至德干，东起孟加拉，西到西北部的旁遮普，尤其是北印度恒河中上游两岸的城镇，起义更加风起云涌。5月末，阿赫马德·沙领导的奥德人民起义，不到十天时间就彻底清除了英国殖民者的行政机构。6月初，在那那·萨希布和坦提亚·托比领导下，康普尔的军民把殖民军打得落花流水，举起白旗投降。在朱木拿河南岸的詹西土邦，女王拉克西米·巴伊率众起义，并于6月恢复了被英国人吞并的詹西。与此同时，各地农民也展开了反封建的斗争，他们拔掉地主土地上的界标，焚烧地契，废除债务，驱逐地主和种植园主，夺取他们的财产，积极配合、支援士兵，或直接参加武装战斗。

为民族自由的浴血战斗 印度民族起义的风暴震撼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起义爆发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印度这块英殖民帝国侵略亚洲的奠基石，就被起义人民动摇了。当起义群众团结一致向殖民者勇猛冲击的时候，那些平日骑在印度人民头上跃武扬威的殖民分子却表现得惊恐万状，窘态百出。在英国总督府的所在地加尔各答，英国官员犹如惊弓之鸟，坐立不安。总督肯宁，在风暴刚一来临的时候，感到住在加尔各答有危险，于6月的一天夜晚，仓皇地溜到英国军舰上去了。当加尔各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肯宁要求英国政府速派援军，运送武器，并赶忙调回以前派往伊朗的英军，截留派赴中国的侵略军，把他们投放到起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德里、勒克瑙、詹西等几座大城市为中心的主要战场。在这些战场上印度军民英勇杀敌，给予英国“讨伐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斗争更加艰巨而复杂了。

德里起义政权建立后，行政会议采取的一些反封建措施，使封建王公、地主和高利贷者惶恐不安。他们与殖民者秘密勾结，叛变投降，造谣惑众，挑起内讧，并囤积粮食，制造饥馑，从内部瓦解起义政权。1857年6月，英军首先围攻德里。据守德里的四万起义军英勇善战，不断奇袭敌人，致使英军围住德里三个月内不敢攻城。但是起义缺乏统一指挥，没有乘胜追歼敌军。9月，增援部队到达以后，英国殖民军发起猛烈攻势，用重炮轰破德里城。在城内展开了六天的激烈巷战，英军死亡五千多人，两个英军司令官也被击毙。由于以巴哈杜尔·沙赫二世为首的贵族集团屈膝投降，起义军不得不撤出德里。英军入城后，残酷屠杀，血流成河，尸体满城。

德里失陷以后，起义的中心转移到奥德首府勒克瑙。早在1857年7月，起义军就击毙了该地英国行政长官亨利·劳伦斯，控制了勒克瑙和奥德全省。其后又多次打败英军的猖狂进攻。1858年初，英军集中九万重兵猛攻勒克瑙。这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也是印度人民保卫起义中心最富有广泛人民性的一次伟大战斗。当时勒克瑙的保卫者的人数多达二十万，其中士兵只有三、四万人，而绝大多数是农民群众，充分表现了农民主力军的作用。军民浴血奋战，在困难重重、无险可守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二十多天，使英军遭到重大损失。最后，由于缺乏统一领导，掌握领导权的封建贵族屡起内讧，英军趁机攻陷了勒克瑙。殖民军进城后洗劫两星期，抢走价值五、六百万英镑的财产。

勒克瑙陷落以后，英国殖民军又进攻中印度的詹西。民族的荣誉和自由，鼓舞着詹西人民。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詹西土邦女王拉克西米·巴伊挺身而出，率领军民誓与英军决一死战。4月3日，英军突入城内，詹西军民在枪林弹雨中进行巷战和白刃战，杀死大量敌人。巴伊临危不惧，手执武器，骑乘白马，闪电似地驰骋在最危险的第一线。但是，强弱悬殊，寡不敌众，武器也差，詹西城终于陷落。城陷之时，巴伊身穿男装，腰系养子，带领一支队伍突出重围，后来在一次激战中，坠马阵亡，以身殉国，时年二十三岁。她以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权的英雄气概而成为印度历史上一位流芳百世的巾帼英雄。

随着詹西失陷，印度民族大起义由城市保卫战转为游击战（1858年6月—1859年12月）。1858年底，英女王颁布诏书，“保证”不侵犯印度王公地主的特权和地产。结果，绝大多数王公地主表示愿为殖民者效忠。当时在游击战中坚持斗争的只有昆瓦尔·辛格和坦提亚·托比，前者受重伤牺牲，

后者被瓜辽尔封建地主出卖，从容就义。但各地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 1859 年底。

历时两年之久的印度民族起义，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起义，是印度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年来大反抗。它唤起了印度人民的觉醒，显示了印度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坚强意志，也沉重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权掌握在土邦王公和封建主手中。当时，印度社会正处在封建主义解体过程中，参加起义的阶层虽很广泛，但还没有形成一股足以领导起义到胜利的革命力量。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暂时表现不甚明显的时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才结成反英同盟。然而这个同盟是有条件的，暂时的，不巩固的。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殖民者采用拉拢封建主的新政策时，这个同盟就分裂了。接着而来的，就是封建王公的动摇妥协，叛变投敌。至于在起义中与人民有联系的、坚持战斗的、甚至献身的领导者，那只是印度数百个土邦王公中的凤毛麟角。从印度民族起义的教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决不可能把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制度结合起来，更不可能把民族起义进行到底。民族起义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之手，是决定起义成败的关键。

第四节 日本的“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

十九世纪中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十七世纪末,日本封建社会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人口增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就在这个时候,德川幕府的统治(1603—1867年)开始露出破绽。掌握全国大权的幕府将军以及统治各“藩”的大名因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以致财政拮据,不得不拜倒在商人脚下,向他们借贷。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享保年间(1716—1735年)实行改革,暂时解决了幕府的财政困难,但也没有维持多久。十八世纪后半期,歉收、饥馑频繁发生,农村堕胎、杀婴盛行。无以为生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从派代表向幕府控诉,发展到全村村民暴动以至全藩性的大规模起义。城市贫民要求降低米价的米骚动日益增多。反映农民利益的思想家安藤昌益提出了消灭一切剥削,回到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然世”的乌托邦思想。十八世纪末,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再次实行改革,妄图维护幕藩体制。但是封建制度瓦解之势非人力所能挽回。到十九世纪中期,幕府封建统治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这特别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封建自然经济趋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萌芽。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特征的自然经济是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早从十八世纪初以来,日本的商品生产和流通有了一定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渗入农村,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村中阶级分化加速进行。新兴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以提供原料或生产工具以及包收产品的形式,控制农民家庭手工业;有的出资招募农民或手工业者,建立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最初在纺织业中出现,十九世纪前半期扩展到榨油、制蜡、制糖、酿酒、造纸、采矿、铸造、陶瓷等生产部门。到1867年,全国各生产部门的手工工场共有四百多家。虽然由于幕府的抑制政策,手工工场发展缓慢,在生产中还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出现表明,封建生产关系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势须突破它。

其次,地主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封建等级制度发生动摇。富裕农民和商业高利贷资本兼并贫农的土地,或开垦新田,成为新兴地主。十九世纪中期,在他们手中集中了全国约三分之一的土地,但土地所有权并未得到领主的承认。他们大多出租土地,征收地租,同时经商、放高利贷、开办手工工场,他们一身数任,既是地主,又是资产阶级。新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手工工场资本家是介于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中间剥削者。他们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活动没有保障,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与封建领主相勾结,或买得佩刀称姓特权,挤进武士行列。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刺激,一些下级武士冲破禁令,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转化为工商业者。有的收商人为养子,或入嗣商人为养子。另一些人改行当教师、医生。更多的则沦为无固定主人和职业的“浪人”。贫困的下级武士产生了“恨主如恨敌”的现象。幕府赖以维持统治的阶级基础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事实上濒于瓦解。

最后,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各种改革思想抬头。十九世纪前半期是德川时代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次数最多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从1785年到1867年的八十多年间,仅农民起义就爆发了一千四百零九次。其中,1837年2月发生在幕府重镇大阪的起义最有代表性。这次起义领导者大盐平八郎是下级武士,豪农参与策划和提供经费,主力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前散发的檄文揭露了幕府统治的黑暗,提出了恢复“神武天皇政道”即古代理想社会

的口号。大盐起义虽仅数百人参加，一日内被镇压，但它是所有革命势力联合推翻幕府统治的一个尝试和信号。正是在大盐起义的强力推动下，1841年幕府的老中水野邦忠为了维护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改革”。这次改革力图压制资本主义发展，恢复自然经济，压制改革思想，加强封建领主地主，因此具有反动性质，不到两年便宣告失败。在这同时，西南地区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各藩改革派得到地主商人的支持，在“登用人材”、“振兴产业”、“刷新文武”的口号下，进行了藩政改革。虽然它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但为下级武士参与藩政、发展商品经济和学习西方军事科学过术开辟了道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改革的不同结果，开始改变幕府和西南各强藩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表面化。总之，十九世纪中期，幕藩体制矛盾重重，幕府统治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

西方炮舰强制的“开国”从十八世纪末起，西方国家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纷纷将侵略矛头指向日本。早就觊觎日本北方领土的俄国，1792年派遣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1794—1854年六十年间，俄、英、法、美等国与日本接触多达五十次。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求开港通商，但屡遭幕府拒绝。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幕府深感威胁，1842年改变炮击一切外国船的强硬态度，允许外国船在日本港口加煤上水。但是幕府仍然坚持十七世纪中期以来实行的“锁国”政策。

美国急于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殖民扩张据点和捕鲸船队中继站，决定用武力迫使日本“开国”。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率领军舰四艘，强行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要求幕府接受美国总统的国书和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面前，惊慌失措的幕府不得已放弃“锁国”的祖法，于次年3月在神奈川（横滨）签订《日美亲善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根据条约规定，美国船舶可以驶进日本下田和函馆两港，可以在那里装添煤炭、粮食和淡水；日本政府不限制来到日本的美国人的自由，并“予以优待”。1858年7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又强迫幕府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函馆、神奈川、长崎、新泻、兵库等五港通商；输入日本的货物及输出日本的产品实行协定税率；美国在江户派驻外交代表；美国在日本享有建立类似租界的居留地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日美签订条约后，荷、俄、英、法等都一一相继援例，迫使幕府签订类似的条约。这些条约规定欧美列强在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租地权，严重地破坏了日本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协定税率又破坏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日本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强制，和亚洲许多国家一样，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化的危险。

在丧失关税自主权的情况下，开港引起了严重后果，即日本开始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1859—1867年，日本进出口贸易猛增，据统计1859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一百九十五万美元，1867年增到三千五百多万美元，进口大于出口。外国廉价工业品蜂拥而入，充斥日本市场。日本脆弱的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无法竞争，纷纷破产。出口主要是原料和食品，其中主要是生丝，占总出口的50%到80%。生丝大量出口影响丝织业，仅桐生一地就有一千五百名手工业者失业。外国商人还利用日本黄金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用白银套购黄金，攫取暴利。结果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农民、城市贫民和下级武士生活痛苦不堪。

贪得无厌的欧美列强利用幕府软弱无能，不断提出损害日本主权的要

求，粗暴地干涉日本的内政。1861年，沙俄军舰进击对马岛，企图永久占领，只是由于对马人民奋不顾身抵抗，才未得逞。1863年，英、法借口保护侨民，派军进驻横滨，建立兵营和弹药库，横滨港形同英国的军港。1864年，以报复前一年长州藩炮轰外国船为由，英、法、美、荷四国联合舰队炮击下关，并乘机迫使幕府签订改税协定，降低主要商品的进口税。1867年，幕府为了苟延残喘，不惜加紧投靠法国，甘愿充当洋奴买办。欧美列强的侵略和幕府的卖国投降政策，使日本沦为半殖民地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倒幕运动 民族危机促使阶级斗争迅速而急剧地发展。开港后，日本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农民不仅反对幕府的封建统治，而且提出改革社会的口号，并与城市贫民联合，共同斗争。1866—1867年两年间共爆发了一百四十次农民起义和四十二次城市贫民暴动，次数之多、范围之广、斗争之激烈，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斗争严重动摇了幕府的统治。

面对欧美列强，幕府将军感到危急的时候，一面派人请示天皇，一面通令各藩诸侯出谋划策。自此以后，长期处于京都宫廷无所作为的天皇和公卿又厕身于统治核心的行列，被排斥在中央政府之外的旁系大名也获得了政治发言权，这说明幕府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而且各种反对幕府的政治势力日益向京都的天皇朝廷靠拢。这就形成了江户幕府和京都朝廷两大力量中心。下级武士和志士们激烈地批判幕府屈服于列强压力签订不平等条约。幕府采取高压手段，更激起反对派的愤怒。1860年3月，水户藩士在江户樱田门外刺死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这个事件成了倒幕运动迅速发展的信号。

日本的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因此，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早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中下级武士，特别是西南诸藩的中下级武士，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倒幕运动中最活跃的角色，成为倒幕运动的领导者。他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同幕府相对抗。“尊王攘夷”观念本来是幕府巩固封建统治、推行“锁国”政策的理论根据。但倒幕派提出这个口号却具有新的意义，它反映了反对外国侵略、反对幕府投降政策的要求。在封建割据的条件下，这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反幕势力的口号。

樱田门事件后，倒幕派在“尊王攘夷”口号下，云集京都。他们策动天皇发布“诏书”、“敕命”，压迫幕府改革幕政和定期“攘夷”。有的袭击外国人，制造事端，迫使幕府处于困境；或进行恐怖暗杀活动，张揭帖，散传单，攻击和恐吓幕府；甚至公开打出倒幕旗号。1863年，长州的倒幕派组织了武装，后来，许多藩也相继仿效。倒幕派一时左右了政局。1863年8月，幕府发动政变，一举把他们赶出京都。次年7月，长州藩武士重整旗鼓，再度向京都进兵，又被幕府军击溃。1864年，幕府发动内战，讨伐长州藩，掌握藩政权的保守派向幕府投降。倒幕派暂时处于逆境。

倒幕派决定改变斗争策略。1865年初，长州藩倒幕派在高杉晋作领导下发动内战，夺取藩政权，建立了牢固的立足点。同时进行军事改革，创建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采用西式武器和战术的新式军队，积极准备用武力打倒幕府。另一西南强藩萨摩藩也转向武力倒幕。1866年1月，长州藩和萨摩藩结成了倒幕同盟。四国舰队炮击下关后，西南各藩已放弃盲目排外的做法。英国也改变原先支持幕府的政策，转而支持倒幕同盟，并向倒幕军供应军火。形势日益不利于幕府。为了打击倒幕势力，幕府不惜孤注一掷，1866年发动第二次讨伐长州藩的战争。但萨摩藩拒绝出兵，其他大名也不热心。这次征

长战争终于以幕府失败而告终。

在萨、长两藩的影响下，全国的倒幕势力逐步联合起来，并又开始向京都集结。1867年10月，倒幕派搞到了以年幼的明治天皇名义颁发的讨幕密诏。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妄图垂死挣扎，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表面上表示辞去将军职位，将“大政”“奉还”给天皇，实际上则企图保持实权地位。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倒幕派领袖识破了这个阴谋，于1868年1月3日毅然发动宫廷政变，宣布“王政复古”，成立天皇制新政府，并决定罢免德川庆喜的官职，没收幕府的领地。

“王政复古”的政变成功，萨摩、长州等强藩等倒幕势力宣布新组成的政府是日本唯一的合法政府。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首先挑起了内战。1868年1月底，新政府军五千人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战斗中大败幕府军一万五千人。政府军乘胜追击，进逼江户。5月初，德川庆喜被迫投降。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被打倒了。1869年春，新政府迁都东京，6月，消灭了盘踞在北海道的幕府残余势力。历时一年多的内战结束了。人民群众在这个摧毁德川幕府的国内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除直接参加政府军外，还在各地起义配合，或积极支持政府军。正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政府军才打败了三倍于自己的幕府军。

明治维新 1868年4月，日本新政府以天皇宣誓的形式发布施政纲领，强调要“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还说要“万事决于公论”。根据这个纲领，新政府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实行了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改革。因为是在明治年间实行的，所以称“明治维新”。这次改革，归结起来，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封建领主制，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1869年夏实行“奉还版籍”，取消大名对领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大名被命名为藩的藩知事，成为新政府的地方官。1871年8月废藩置县。这就是打破藩界，重划全国行政区。全国行政区划分为三府七十二县（后改为三府一道四十三县），由中央政府任命府县知事管理。通过废藩置县，废除了大名的封建领地和领主权，使封建的分立制受到决定性的打击。

第二，改革封建等级制，宣布“四民平等”。废除大名、公卿称号，改称华族，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及贱民统称平民。废除武士佩刀等特权，取消各等级间在职业、通婚、日常生活方面的各种限制。平民获得称姓的权利。取消武士等级采取赎买办法，以尽量避免或缩小武士的不满和反抗。

第三，改革封建军制，建立近代化军队。1873年1月，颁布征兵令，开始实行征兵制，在“国民皆兵”的口号下，强征大批青年，建立常备军。这支军队称为“皇军”，即天皇的军队，强调效忠于天皇，并贯彻“武士道”精神。同时在内务省统辖下，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央集权的警察制度。

第四，改革土地制度，实行新地税法。1871年秋，取消种植商品作物的各种限制，允许作物栽培自由。1872年2月，解除土地买卖禁令，承认土地私有和买卖自由，并颁发土地执照。1873年7月，改革地税，废除根据土地收获量定税额和交纳实物的旧税制，实行按地价的3%（后改为2.5%）向土地所有者征收货币地税的新税法。这次改革为寄生地主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五，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扶植资本主义经济。1870年秋设立工部省后，聘请大批外国专家和技师，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建立国营为主、

铁路和矿业为重点的近代工矿企业。1871年11月，右大臣岩仓具视率领庞大的考察团访问欧美各国，历时近两年。考察团深感日本与欧美各国发展的差距。回国后立即设立内务省（1873年11月），集中力量抓工业建设。内务省侧重在轻工业部门，保护、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并逐渐从模仿、依赖外国向自力更生、结合本国特点的建设方向转变。

第六，改革旧的风俗习惯，提倡“文明开化”。1872年颁发“学制”令，规定统一的学制，设立西式学校，强制普及初等教育。提倡学习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吃西餐、穿燕尾服、理分发、跳交际舞、盖洋楼，欧化风靡一时。但注意民族传统教育，以克服“文明开化”中出现的崇洋媚外、风俗败坏等不良倾向。

新政府推行各项改革，总目标是建设一个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口号是“脱亚入欧”。它的政策比较正确，重视民族传统，结合本国特点，因此迅速使日本从一个闭关自守的落后的封建社会和濒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转变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亚洲唯一的民族独立国家。在日本历史上，明治维新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等领域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随着日本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资产阶级侵略扩张的贪婪欲望和从前武士阶级的冒险主义结合起来，就把日本推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日益摆脱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恶运，就日益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途径。

第十二章 十九世纪中期的北美和欧洲

第一节 美国内战

领土扩张和西进运动 继华盛顿而任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曾经扬言，美国是“先天注定”要把领土扩张到整个北美的。这说明美国统治阶级在美国独立不久就想扩张。随着美国力量的增长，这种野心实现了一部分。

独立后的美国领土包括密西西比河和大西洋之间的地区，北同英属加拿大接界，南同西班牙领地佛罗里达接界，西面接连路易斯安那。_路易斯安那在富饶的密西西比河流域，美国急切地要求占有它。1803年，美国乘法军镇压海地独立遭到失败和法国忙于欧洲战争的时机，从法国手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把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张了一倍，并且使美国的势力通过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而达到墨西哥湾。

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在欧洲，英法关系又紧张起来，英国一再组织反法同盟，对法作战。美国商人和船主，乐于同交战双方贸易，一时生意兴隆。随着英法双方互相加强封锁，美国商人和船主的利益受到损害。英国掌握着制海权，在海上搜查美国船，查抄“违禁品”，捕捉海员，造成了英美关系的恶化。1812年6月，英美之间爆发了战争。这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图谋破坏美国经济和贸易；另一方面是美国统治阶级企图借战争来扩张领土，包括占有加拿大。这次战争，战场上各有胜负。到1814年底战争结束时，美国虽未获得新领土，但它经过这次战争确信英国对它独立的威胁已经过去了。英国虽未保证不再在海上劫夺美国海员和船只，但它事实上放弃了对美国贸易的压制。在以后几年的协议中，双方确定，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上互不设防；路易斯安那的北界定在北纬四十九度；广大的俄勒冈地区由英美共同占有。

在第二次对英战争前后，美国又觊觎着西属佛罗里达。1810年和1813年，美国肢解了佛罗里达，占有它的西部。1817年，美国又借口印第安人逃入佛罗里达，派兵侵入佛罗里达。两年以后，佛罗里达成了美国的领土，这是一次强取豪夺。

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扩张主义风靡美国。1844年，在新泽西州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有人发言说：

“土地够了，土地够了！？我说，给年轻的美国‘水牛’让开道吧——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土地：他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他的夏季的荫凉场所，他需要更多的土地作为他的美丽的牧场。我告诉你们，我们将给他俄勒冈作为夏季遮荫处；给他得克萨斯作为冬季牧场。如象他所有的同类一样，他也需要盐。好吧，他将有两洋可用——浩瀚的太平洋和汹涌的大西洋都将属于他。他的谋生之道将不会停顿不前，直到他能在冰冻的大洋解渴。”

这里提示了扩张的目标：得克萨斯、俄勒冈和太平洋之滨加利福尼亚。当时的得克萨斯直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都属于新独立的墨西哥。早在1836年，美国就挑动得克萨斯叛乱，脱离墨西哥，建立所谓的“孤星共和国”。1845年，这个共和国作为一个州并入了美国。1846—1848年，美国又通过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并吞了从新墨西哥到加利福尼亚的广袤土地。1846年6月，英美签订协定，北纬四十九度以南的俄勒冈土地归属美国。不到半个世

纪，美国的领土从密西西比河扩张到了太平洋岸。

独立以来，美国疆域不断变化，即不断向西扩张。与此同时，东部各州的人不断西去，先是涓涓细流，后来汇成强劲的激流。第二次对英战争以前，向西移居的人，主要的目的地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即俄亥俄河流域和田纳西河流域。第二次对英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以后的几年间，一股西进的洪流又涌现出来。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人口飞跃增长，1810年只占美国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十年以后增长为四分之一。而且西进的洪峰已经越过密西西比河，继续向西涌进。密西西比河两岸，十年间有六个新州加入了联邦。

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互为影响。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西进的美国人进入得克萨斯，1835年左右，那里的美国移民达到三万人左右。在扩张政策的鼓舞下，得克萨斯脱离了墨西哥。对于俄勒冈，美国的皮货商人和猎户早就在那里活动了，传教士也跟着到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掀起了“俄勒冈热”。牛曳篷车群，自东而西，络绎不绝。1845年约五千美国人迁移到哥伦比亚河以南地区。1847年左右，约八千人跋涉在艰苦的“俄勒冈之路”上。那股“俄勒冈热”终于导致了俄勒冈的并入。至于加利福尼亚，美国商人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就到那里同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做生意。四十年代，许多迁往俄勒冈的美国人拆向西南，翻越内华达山，进入萨克拉门托流域。他们对加利福尼亚的富饶、美丽、良好的气候和优良的港湾赞叹备至。美国扩张主义者越来越要吞并这块地方，对墨西哥的战争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独立以后的美国，对印第安人，继承了英国采用过的种族绝灭政策。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对印第安人说又是一场灾难。印第安人遭到屠杀，土地被侵占，还被赶出家园，迁入不毛之地。以佐治亚境内的彻洛基部落为例，他们为保卫家园进行了几十年的斗争。1838年，联邦政府悍然派出军队，强迫他们背乡离井，向西迁移。他们悲痛欲绝，因此称他们西去的道路为“眼泪之路”。

经济的发展和南北矛盾的加深 美国建立之初，它的工业仍然停留在家庭手工业阶段。欧洲拿破仑战争和英美第二次战争期间，美国的许多小工厂生产的商品补充了本国的种种需要，国家的关税政策也鼓励了工业的发展。1815年以后，美国人抓紧了新时机，除了大批大批地涌入西部土地外，许多人投资兴建道路、开办工厂或进行海外贸易。由于以下的基本条件，十九世纪上半期美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发展起来了。国民生产总值，1799年为十亿零八千七百万元，1859年增长到八十九亿七千万元。同一时期，农业生产增长，但是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从1799年的39.5%降为1859年的30.8%，制造业和商业却分别从1799年的4.8%和5.2%各增长到1859年的12.1%。

首先，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外国移民不断迁来，而且日益增多。从1790年到1830年，约有四十万人移入；1830年以后的三十年，猛增到二百五十万人。他们不仅补充了劳动力，而且许多人还带来了技术。其次，多年来美国进行了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印第安人的剥夺、大规模的走私、独立后的土地投机买卖、海外贸易等等都使资本家手中积累起大量资本，满足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美国继英国之后进行了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皮革制造、羊毛纺织、制铁、制陶和玻璃制造等工业部门中，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业生产制度。四十年代末开始以机器制造机器。工业革命使工业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机器的发明和使用，

在美国不仅提高了工业的生产，而且显著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举例说，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一下子把轧棉的工效提高了五十倍，其结果使棉花种植业在南部种植园里兴旺起来。十九世纪中期，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和割草机的使用，大有助于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发展，使中西部变成了大谷仓。第四，公路、运河、铁路的大规模兴建，促进了国内市场联系的加强，特别是密切了西部农业和东部工业区的经济联系，又有力地促进东北部工业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北方与南方的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北方的资本主义自由劳动制度，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扩大商品市场，扩大原料来源，要求有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度要求扩大奴隶数量，推广种植园经济，阻碍向自由劳动制过渡，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奴隶主把大量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运往英国，从英国输入大量工业品，使得北方几乎丧失了南方的丰富原料和广大销售市场。

南北双方沿着不同的经济道路发展，对立越来越尖锐，关税和土地问题就是双方对立的例证。北部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提高关税税率，以遏制外国竞争性商品的流入；而南部种植园奴隶主反对提高关税，因为他们要自由地向英国销售棉花，从英国购买廉价工业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很多北部人要求联邦政府将公共土地免费分给真正的定居移民耕种，而南部种植园奴隶主认为，免费分给耕地意味着他们大多数将从西部被排挤出去。双方的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黑人奴隶制度的存废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又关系到双方政治力量的消长。举例说，随着疆域的扩张，总碰到那里将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的名义加入联邦的问题。南方的奴隶主看到，由于南方各州人口的增长比北方缓慢，他们在众议院的议员无法超过北方各州。但是不论各州人口多少，在参议院的议员都是两名，而参议院又拥有很大的权力。因此他们力图扩大“蓄奴州”的数目，以扩大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攫取参议院的政治优势。1819年，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密苏里申请建州，加入联邦。当时，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包括二十二州，自由州和蓄奴州各半，在参议院的人数势均力敌。因此，密苏里应建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成为南北双方争执的焦点，成为全国注目的问题。1820年，国会通过了《密苏里妥协案》，确定密苏里为蓄奴州，同时从马萨诸塞州分出缅因州，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还规定在西部土地上以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为分界线，将来那里建州，分界线以北为自由州，以南为蓄奴州。这次斗争尽管以妥协而平息下来，但是矛盾依然存在。四十年代末，在侵占的墨西哥土地上又发生建立新州的性质问题。经过斗争，国会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总称为《1850年妥协案》，规定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至于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的奴隶制存废问题，将由当地居民决定。由于当地白人居民多数是奴隶主，其结果可想而知。法案还规定，联邦政府通过有效的法律，帮助奴隶主追捕逃亡奴隶。因此，这次妥协引起广大人民特别是废奴运动者的愤慨。废除黑人奴隶制度的问题日益尖锐地提到日程上了。

废奴运动的发展 美国建立之初就提到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主张废奴的人认为，奴隶制度违反革命和独立宣言的精神。制宪会议期间，有人提议废除奴隶，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代表威胁说，如果宣布奴隶非法，他们的州将不参加联邦。当时也有人乐观地认为，由于烟草的种植消耗地力很快，烟草的种植势必萎缩，奴隶的使用势必减少以至消灭。没有料到由于轧棉机的发明，棉花成了种植园的主要经济作物。南方各州成了“棉花王国”，奴隶制

度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种植园奴隶主的贪心和政治权欲膨胀起来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美国兴起一股改革热潮，为工人为妇女要求权利，主张禁酒，提倡兴办自由民众教育等等，而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废奴运动。1822年，黑人丹麦·维塞在南卡罗来纳领导的黑人暴动，1831年，黑人奈特·特纳在弗吉尼亚领导的黑人暴动，都说明了问题的紧迫性。奴隶主虽因此加强了防范，但是在北方，废除黑人奴隶制度的呼声更是洋洋盈耳了。废奴运动团体蓬勃成长起来，“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和“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相继成立。北方各州有很多协会组织，把千百万群众吸引到运动中来。

废奴运动本质上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北方资产阶级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而反对奴隶制。有觉悟的工人认识到废除奴隶制关系到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而参加运动。广大的农民为争取西部的自由土地而进行反奴隶制的斗争。黑人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更是废奴运动的天然主力军。领导运动的是北方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广大的工人、农民、黑人和妇女是这个运动的群众基础。

在“新英格兰反奴隶制协会”和“美国反奴隶制协会”成立前后，废奴派在北方各地展开了热烈的宣传鼓动活动，从各方面揭露和抨击奴隶制度的罪恶。著名的废奴运动活动家、贫苦水手家庭出身的散文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831年在波士顿创办《解放者》周报，宣传立即解放奴隶。

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我将象真理那样严厉，象正义那样坚定。”在黑人中，奴隶出身的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在废奴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38年，他从马里兰州逃到北方，以亲身的经历揭发种植园奴隶制的黑暗和残酷。他各处奔走呼号，在废奴派的会议上发言。他用火一般的语言，表达了黑人对奴隶制的深仇大恨；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驳斥了白人优越论，指出它是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1852年3月，在废奴运动的高潮中，出现了脍炙人口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又译为《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夫人在小说中以黑奴汤姆的经历为线索，生动地刻画了黑人在奴隶制度下的悲惨生活，具体反映了奴隶主折磨奴隶的情景、黑人被转卖时家庭被拆散的令人心碎的场面以及逃亡奴隶的勇敢机智。小说一出版就风行全美国。一年之内就在美国印行了一百二十万部，在英帝国范围内也出售了百余万部。后来，它被译成二十三种文字出版，低价出售。这部书深深激动了群众的感情，使读者从感情上痛恨奴隶制度。

废奴派不仅进行宣传鼓动，还组织“地下铁道”帮助南方黑人奴隶逃出种植园，把他们运送到北方自由州或加拿大。参加带送的人称为“乘务员”。他们敢入南方龙潭虎穴，把奴隶带走；他们机警灵活，能够躲过拦阻追捕，往往夜行昼宿，辛苦备尝。他们有的被抓获、被罚款、被监禁，但是仍然前赴后继。参加“地下铁道”工作的有白人、有黑人，他们为黑人奴隶的自由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举例说，马里兰州，有个传教士查理·特纳·托利曾经指导约四百个黑人奴隶获得自由，而他本人最后死在牢房里。最著名的黑人“乘务员”哈里特·塔布曼是一个妇女，1849年逃出奴隶主的火坑。她身为奴隶时，因帮助另一个奴隶逃走而被监工打伤，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她参加“地下铁道”工作后，不顾病痛，不怕奴隶主悬赏四万美元买她的头，十九次深入南方，先后带走三百个黑人奴隶，使他们获得自由。“地下铁道”的运送线，或从南方经特拉华州、马里兰州到达宾夕法尼亚州，或穿田纳西州、

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南部到达印第安纳州，或经圣路易斯城溯密西西比河北上进入衣阿华和堪萨斯。沿途有人接应，又有掩蔽地方供作住宿场所。究竟通过“地下铁道”解救了多少黑人，没有确数可说，据估计可能有五万人之多。这对种植园奴隶制经济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内战爆发 《1850年妥协案》反而使奴隶主的贪欲越来越大。他们强行追捕逃亡奴隶，又企图破坏《密苏里妥协案》的规定，要把奴隶制扩张到北纬三十六度三十分以北的堪萨斯地区，造成了1856年下半年废奴派和奴隶制维护者在那里的武装冲突，即“堪萨斯内战”。斗争日趋尖锐，废奴派中间有人认为，“一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不管它的范围多么大，不管它是多么猛烈或残忍，都是一场神圣的战争。”武装斗争的思想越来越流行，1859年发生了布朗起义。

约翰·布朗是一位彻底的废奴运动者，积极地参加“地下铁道”的活动。他曾率领亲属和战友参与“堪萨斯内战”，1857年开始制订武装起义计划，进行物质准备。1859年10月16日夜，布朗在马里兰州的哈泼斯渡，发动了起义，占领了当地的军火库，控制了几个种植场。消息传出，弗吉尼亚州长立即调动民兵一千五百人围攻起义者。在众寡不成对比的条件下，起义者仍然血战二昼夜。他们终于九人牺牲，七人逃脱，连布朗在内六人被俘。后来，布朗和被俘的战友同以谋叛罪被处绞刑。就义以前，布朗写道：

“我，约翰·布朗，现在坚信这个罪恶的国土的罪恶，只有用鲜血才能洗净。我曾经以为不用流很多的血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我认为这是徒劳无益的”。布朗慷慨就义激起了北方广大群众的悲愤，许多城市在他就义之日举行了悼念。他的死也推动了奴隶起义的发展。布朗起义虽败而影响深远。有人写道，布朗会使“绞刑架同十字架一样放光辉”。这次起义预示着南北之间的内战临近了。在剑拔弩张的形势下，1860年美国举行了总统选举。两个主要竞选的政党是几经变化的民主党__和五十年代形成的共和党。

共和党成立于1854年，以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和自由土地为宗旨。自由党人、自由土壤党人、辉格党内的工业资本家和民主党内反奴隶制的工人、农民都加入了共和党。这个党本质上是一个以反对奴隶主势力为目标的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和黑人的联合组织。工业资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共和派把反对奴隶制的力量联合起来，同民主党形成对垒的局面。

在1860年大选中，南方民主党人坚决要在一切美国领地内扩张奴隶制，同北方民主党人分裂，分别推出两个总统候选人。共和党推出林肯为候选人。由于广大工人、农民、废奴派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林肯取得了胜利。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年)出生在肯塔基一个垦殖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是伐木工，靠双手披荆斩棘，垦殖拓荒。林肯自幼参加劳动，后来当过雇农，船工、店员，担任过农村邮务员和土地测量员，1830年迁居伊利诺斯州。他经过刻苦自学，钻研法律，在春田市当上了律师。他多次当选为州议员，也当选过国会众议院议员。林肯相信一切人生而平等，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度。他出身劳动人民，对黑人抱有同情。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张黑人与白人在政治上平等。林肯拥护雇佣劳动制度，又主张使工人有上升为资本家的机会。他是一位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反对奴隶制度在美国的继续扩张，但是他害怕美国南北分裂，不敢提出立即废除奴隶制的主张。

1860年，共和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不再让给奴隶制度一寸土地；实行

“促进全国工业发展”的关税；提出分给移民耕地的法案。当选的林肯又是一贯反对奴隶制扩张的。因此大选揭晓以后，南方奴隶主就看到他们把奴隶制扩张到西部土地上的梦破灭了。12月，南卡罗来纳州正式宣布脱离联邦。1861年2月，南方又有六个州脱离。这些州的代表开会，宣布组成“南部同盟”，选举密西西比州的大奴隶主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虽然联邦政府还力图和解，但是同盟军队悍然挑起军事行动，于1861年4月12日开始炮击南卡罗来纳境内查尔斯顿附近的联邦军队守卫的炮台，挑起了内战。这次战争有它的必然性，正如马克思分析的：“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的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内战（1861—1865年）美国内战以南方叛乱诸州的挑战而开始。从南部同盟方面说，它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因为它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扩大落后的奴隶制度。从联邦政府方面说，它进行战争为的是保存联邦和维护联邦的统一。内战前期，它表示无意于内战期间美国的政治形势涉南方的奴隶制度，这一则是害怕内战发展为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战争，一则是担心宣布解放奴隶会把南北边界上的几个蓄奴州推到南部同盟怀抱里去。

内战爆发以后，弗吉尼亚等四个蓄奴州加入叛乱行列，南部同盟共包含十一个州。但是表示继续忠于联邦政府的最后达到二十三个州。从南北力量的对比上看，北方占有压倒的优势。它占有四分之三的领土，拥有二千二百万人口，工业生产在1860年占全国的92%。南方只占有四分之一的领土，人口九百万，其中黑人奴隶占三百五十万，工业生产在1860年仅占全国的8%。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北方在内战前期没有能够发挥力量的优势，而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地位。

联邦政府军总司令斯科特，计划从海到密西西比河把南方封锁起来，切断南方同外界的联系，扼杀它的经济命脉。这就是所谓的“长蛇计划”。除了封锁之外，北方的战略还要求尽快攻占南方的首都——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控制密西西比河，把南方叛乱各州分割为二。这样，内战前期就产生了两个战场：以波托马克河流域和弗吉尼亚州为中心的东战场，以密西西比河和田纳西河为中心的西战场。

东战场第一次大战役发生于1861年7月，联邦政府军队进攻华盛顿西南的马纳萨斯，开头进展顺利，但是南方军队得到增援开始反击以后，政府军队就向华盛顿溃逃了。林肯站在白宫窗前可以看到溃退到首都的军队。所幸的是获胜的南方军队同战败的政府军一样疲惫，没有向华盛顿方面追击。直到1862年春，继任联邦政府军队总司令的麦克莱伦却按兵不动。当时北方要求“进军里士满”，林肯也一再催促麦克莱伦行动。3月间，政府军十万人乘汽船沿波托马克河而下，出切萨匹克湾，到达詹姆士河口，向里士满进发。麦克莱伦行军迟缓，又借口等待增援而停滞不前。后来，增援军队被击败于中途。6月底到7月初，双方军队激战七天。南方军队在罗伯特·李的指挥下，集中兵力取得胜利。向里士满进军的政府军再次遭到重大的失败，被迫撤退。9月，罗伯特·李指挥部队渡过波托马克河，穿马里兰，企图侵入宾夕法尼亚，占领哈里斯堡的铁路桥，切断北部的东西联系。麦克莱伦阻敌安提塔姆溪，那一战是内战中的一场大血战。李退却了，但是麦克莱伦却没有乘胜追击，因此而被免除波托马克河方面军司令职务。

联邦政府军在东战场败多胜少。在西战场，他们打退了深入肯塔基的南方军队，在田纳西河流域一再取胜。1862年，陆军结合海军炮艇沿密西西比河而上，占新奥尔良。上游和下游的政府军一下一上，向维克斯堡进发。西战场形势有利于政府军，在那里出现了著名的将领如格兰特将军和谢尔曼将军。

内战前期，联邦政府不仅在东战场一再受挫，而且在内部受到“铜头毒蛇”的捣乱和破坏，在国际上受到英国干涉的威胁。所谓“铜头毒蛇”指的是北方民主党人中的主和派。他们代表那些同南方奴隶主有密切经济来往的金融、商业集团的利益，实质上是南方叛乱分子在北方的代理人。他们进行反战宣传，有的在国会捣乱，甚至暗里组织人马，准备时机一到发动暴乱。他们的破坏行动遭到了广大人民的直接抵制和反击。至于英国，还有法国同南方关系密切，既需要那里的棉花，又要向那里销售工业品，早就想站在南方一边，实行干涉。1861年5月，英国政府承认南部同盟为交战一方。同年年底，英国政府又借口美国海军搜查英国船只，叫嚷要对联邦政府作战。由于英国工人同情美国北方，反对干涉的运动席卷全国，英国政府的武装干涉被阻止了。

林肯政府缺乏果断，反对以解放南方奴隶为作战目标，反对武装黑人，对北方反革命势力抱姑息态度，不敢采取坚决措施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这一切为自己造成了困境。鉴于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鉴于必需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林肯毅然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以顺应民心，争取战争胜利。例如，1862年5月20日，林肯颁布了《宅地法案》，允许耕种西部无主土地连续五年的农民，缴付十美元证件费就可以获得土地一百六十英亩。这是广大劳动者渴望已久和争取已久的。同年7月，林肯签署了《没收法案》，规定没收叛乱分子的全部财产，解放他们的奴隶。但是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更能作为向革命战争过渡标志的，则是他在1862年9月22日发布的《解放黑奴宣言》。这个宣言宣布，自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南部参加叛乱各州种植园主的奴隶，应当被视为自由人；这些黑人都被赋予在陆海军里服役的权利。解放黑人奴隶不仅顺应了世界潮流，而且使联邦政府所进行的战争越出了维护联邦统一的消极范围，而具有废除奴隶制度的进步意义。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林肯来说，这一举为他的历史业绩增添了光辉。

林肯政府的这些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对战局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例如《解放黑人宣言》等于把南方的三百多万黑人奴隶变成了南部同盟后方的反奴隶主同盟军。黑人参军的问题也由此扫平了道路。许多黑人踊跃入伍，到内战结束的时候，参加联邦军队的黑人达到十八万六千余人。1862年，在路易斯安那州方面指挥政府军的巴特勒将军组成了第一支黑人兵团——非洲军。在马萨诸塞州组成的五十四团和五十五团全是黑人。黑人为自己的解放英勇作战，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五十四团在后来的一次攻坚战中，牺牲了半数士兵和三分之二军官，成为著名的英雄团队。

1863年，联邦政府在战场上虽然仍有挫败，但已获得了转机。7月初，在东战场的葛底斯堡，双方共集中了十六万多人的兵力，进行了内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役。北方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使它成为战争的转折点。此后，南方军队放弃进攻北方而转入防御了。在这同时，西战场也传来大捷消息，格兰特将军攻占维克斯堡，打通了密西西比河，把南部同盟彻底分割为二了。经过拉锯，田纳西州的交通枢纽查塔努加也终于由联邦政府军队牢牢占据

了。

1864年3月9日，林肯任命在西战场取得卓著战功的格兰特将军为联邦政府军总司令。他十分信任格兰特，在给格兰特的信里说：“如果有任何需要而它又是我权限范围之内所能给的，务请告诉我。”虽然战局已经改观，但是南方的主力仍在，还坚守着里士满、亚特兰大和华盛顿西面的谢南道河谷。5月，格兰特率领大军南下，搏取里士满，遭到罗伯特·李率领的南方军队的坚决抵抗。同时，谢尔曼率军十万，出查塔努加，进入佐治亚州，几经苦战，9月占领南方的铁路、工业和给养中心亚特兰大，接着向海洋进军，年底占领了滨海的萨凡纳，使联邦政府陆海军取得密切联系。第二年初，谢尔曼率部北上，过南卡罗来纳，入北卡罗来纳，一路扫荡南方军队。4月初，罗伯特·李被迫撤离里士满，4月9日向格兰特投降。南方各地部队相继交枪，美国内战结束。4月10日，华盛顿鸣礼炮五百响，广大人民群众到处欢庆自己以鲜血换得的胜利。

内战期间，联邦政府方面牺牲了三十五万战士，为保持联邦的统一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就在内战结束的一个多月以前，具体说是1865年3月4日，林肯宣誓，第二次就任总统职务。他是在1864年大选中第二次当选为总统的。在连任总统宣誓大会上，林肯发表的简短演说中说：“不对任何人怀恶意，要对一切人仁慈为怀。”林肯的仁慈没有消泯敌人的恶意。4月14日晚上，即内战结束后五天，林肯在华盛顿福特戏院欣赏话剧《我们美国的堂兄堂弟》，被南部的刺客蒲斯枪杀致死。著名诗人惠特曼的诗句表达了美国千百万人哀悼的心声：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我们可怕的航程已经终了，
我们的船渡过了每一个难关，我们追求的锦标已经拿到，
港，临近了，我听到了钟声，听到了人们的欢呼，
同胞眼望着我们的船，它坚定、威严、勇敢；

只是啊，心哟！心哟！心哟！

啊，鲜红的血滴，
就印在我的船长所躺的甲板上，
他已浑身冰凉，停止了呼吸。

马克思代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公开信里高度评价林肯：“他是一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保持自己优良品质的罕有的人物。这位出类拔萃和道德高尚的人竟是那样谦虚，以致只有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去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在他被刺的前几天，林肯又指出，要把脱离联邦的那些南方州重新纳入联邦的轨道，这就是重新提出了南方的重建问题。不幸的是艰巨的任务尚未开始，他就被敌方刺杀了。

内战以后美国的重建 内战结束的时候，总统林肯被刺。继林肯出任总统的安德烈·约翰逊本是南部种植园奴隶主的伙伴，曾任田纳西州的州长，以民主党人的身份当选参议员。内战爆发，他是南部参议员中唯一支持联邦的，因此在1864年的大选中作为林肯竞选的伙伴成为副总统。内战中，他同共和党合作，对南部叛乱诸州进行斗争。但是在作为总统对待重建问题，他却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以掩护从前的南部大种植奴隶主恢复对南部各州的控制权。

内战后的重建，实际上是内战的继续。革命的进程给当权的美国资产阶级提出的任务是：“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领导政治改革和社会复兴的艰巨工作”。约翰逊却反其道而行之，采取了向南部种植园奴隶主投降的政策。例如他于 1865 年 5 月 29 日颁发通告，除一小撮南部同盟的头目外，几乎赦免了所有叛乱分子，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公民权和战时被没收的财产。在约翰逊的支持下，南方的立法、行政大权又落到奴隶主之手。1865 年到 1867 年，美国经历了约翰逊反动时期。在此期间，南部各州制定了《黑人法典》，不准黑人持有土地，禁止黑人携带武器、举行集会，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等等。实际上南部奴隶主的统治复辟了。为了残暴地蹂躏黑人，他们于 1866 年先在田纳西州组织了三 K 党等恐怖团体。这些团体对内战时期赞助过北方的白人，也实行恐怖手段。

约翰逊的反动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激起了共和党激进派的猛烈反对。由于有广大人民作后盾，共和党激进派在国会的势力壮大起来，在两院中占有压倒优势。1865 年 12 月，他们成立了两院重建南方委员会。在 1866 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激进派同约翰逊针锋相对，使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为南方的重建订出了比较进步的方案。1866 年 6 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宪法十四条的修正案，具体承认了黑人的公民权。1867 年 3 月，国会又通过了关于重建南方的方案，从而结束了约翰逊的反动时期。

重建方案宣布，除田纳西州外，南方的十个州“不存在合法的州政府”，规定这十个州划为五个军区，分归联邦军事当局管制。这就否定了约翰逊的重建纲领，不容他草率从事，以掩护奴隶主卷土重来。其次，法案要求军管各州逐步建立黑人与白人共同组成的立宪会议；参加州立宪大会选举的一切人，凡属二十一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不分肤色、种族和过去的地位，都享有选举权；立宪会议根据合众国宪法制定州宪法，交国会批准。这样，黑人的选举权被确定下来了。再次，法案规定，军管各州逐步建立州议会，州议会接受宪法十四条修正案之后才有权派代表参加国会，重新加入联邦。这些规定从政治方面提出了建设民主的南方的具体办法，却没有从保障黑人和劳动人民的经济权利方面提出根本解决办法，以作为实现上述政治措施的保证。

重建南方的过程，充满了尖锐的矛盾和复杂的斗争。从 1868 年 6 月到 1870 年 7 月，军管各州经过改造，重新纳入了联邦的轨道。黑人名义上自由了，享有公民权，但是仍然受到种族歧视，备受 1866 年开始出现的反动的种族主义组织“三 K 党”的迫害，而且土地问题也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到 1877 年南方重建时期结束时，在南方建立民主政权的尝试失败了，种族歧视还是一个严重社会问题。但是经过内战和南方的重建，资产阶级已经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这为今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二节 俄国的资产阶级改革

农奴制度的危机 十八世纪末年，俄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十九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因素继续发展。1804年，全国共有手工工场二千四百多个，工人二十二万五千人；到1825年，手工工场增至五千二百多个，工人三十四万。工场中的雇佣工人也不断增加，例如在加工制造业中，1804年雇佣工人占工人总数的48%，1825年提高到54%。在棉纺织工业中，1825年雇佣工人已达工人总数的94%以上。从三十年代起，俄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手工生产逐渐为机器生产所代替，手工工场逐渐转变为工厂。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比较迅速。运河的开凿，把内河与波罗的海、黑海连接了起来，轮船取代了帆船。1851年，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铁路开始通车。工业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新的生产力与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发展工业需要更多的自由劳动力，可是大部分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已经在工业生产中劳动的雇佣工人，大多数是向地主缴纳代役租的农民。地主有权随时召回他们。所以，他们只是在对企业主的关系上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还不是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工人。因此，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不高。由于他们随时可能被地主召回，使得工业生产很不稳定。发展工业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原料来源，可是农奴制度下的自然经济和农民低微的购买能力很难提供这些条件。很明显，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封建农奴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在农业生产中，封建农奴制关系也已开始瓦解。在俄罗斯中部黑土地带和其他土壤肥沃的省份，地主为了获得更多的收成，不断缩减，甚至全部收回农民的份地，把农奴变成家奴，每月发给他们口粮。在北部非黑土地带，那里土质比较贫瘠，地主主要通过提高代役租来增加收入。这就促使农民进城做工或经商。有的地主还允许农民以重金赎取自由。

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农奴制度的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得到了反映。早在十八世纪末年，著名作家拉吉舍夫（1749—1802年）就写了《从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记》一书，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农奴制度。从十九世纪起，俄国的先进人士进一步看到了农奴制度的腐朽，要求进行变革。最早起来斗争的是一批受过教育的贵族青年军官。他们由于出国作战和通过阅读外国书刊，受到西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821年，一些军官在乌克兰建立了“南方协会”，领导人是佩斯捷尔（1793—1826年），提出了推翻专制，建立共和，解放农民并无偿地给予他们土地等要求。1822年，在彼得堡成立了“北方协会”，领导人是军官穆拉维约夫和诗人雷律耶夫（1795—1826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废除农奴制度，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1825年12月，十二月党人在首都举行的武装起义，由于全国的客观革命条件还不成熟和贵族革命家的脱离群众，没有成功。但是它唤起了更多的人来进行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斗争。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12月死去，继位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农奴制度为己任。为了防止革命运动的再起，他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严密控制。他把神学列入大、中学校的必修课程，还建立了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指使教育大臣提出了一种所谓“正统国民精神”的理论来麻痹人民。这种理论认为，“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国民精神”三者是紧密不可分的，俄国人民从来就是拥护教会和服从沙皇的，这就是俄国的国

民精神。

尽管尼古拉一世加强了反动统治，要求废除农奴制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尼古拉一世在位三十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六百多次农民起义。1830—1831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统治的起义，蔓延到了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革命思想在全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十九世纪上半期反对农奴制度的杰出的革命思想家是赫尔岑和别林斯基。赫尔岑（1812—1870年）出身于贵族地主家庭，青年时代就深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立志要废除农奴制度。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革命学生运动。1847年亡命西欧。1857年在伦敦创办《钟声》杂志，大力宣传反对农奴制度。他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改良的道路来解放农民，但是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下他终于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1811—1848年）出身于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是新的一代革命思想家的先驱。他早年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提倡知识救国，后来转向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他通过撰写文艺批评文章宣传革命思想。他在1847年写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不仅是对果戈理本人的批评，而且有力地揭露和鞭笞了农奴制俄国的黑暗和腐朽，号召人民推翻沙皇专制统治。这封信成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革命派的战斗宣言。它的秘密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反对农奴制度的斗争。

1861年的资产阶级改革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的生产力和封建农奴制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阶级斗争空前加剧。在农奴制度的束缚下，资本主义工商业难以继续发展，农业生产也面临巨大的危机。沙俄在1853—1855年克里木战争中失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同时全面暴露了农奴制度的腐败和落后，使得全国民怨沸腾。广大农民不堪忍受日益增长的剥削，纷纷揭竿而起。1858年全国共发生农民暴动八十六次，1859年增加到九十次，1860年达到了一百零八次。农民不仅拒绝给地主服劳役和缴纳代役租，而且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度的要求。他们的斗争，有力地威胁着沙皇和贵族地主的统治。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北方非黑土地带的一些地主（他们因经营土地收入不多而兼营工商业），也感到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统治。1855年，尼古拉一世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猝然死去，其子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年）继位。1856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对莫斯科贵族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声称：与其等待农民自下而上地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地解放他们为好。从此就开始了农奴制改革的准备工作。

在贵族地主阶级内部，对如何进行改革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大部分地主力图把土地保留在自己手里，因此主张在解放农民时不给土地，或只给一小块园地，以迫使他们在改革以后租佃地主的土地，继续处于对地主的经济依附地位。也有一部分地主主张对农民作较多的让步，甚至主张连同土地解放农民，但农民必须为此而缴付巨额赎金。这后一部分地主就是所谓的自由派。自由派主要反映了北方工业较发达省份地主的利益。尽管有这种分歧，地主阶级各个不同集团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改革来防止农民革命，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

广大农民要求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无条件地获得地主的全部土地。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就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实现农民的要求。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领袖是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

家庭，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是一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和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不屈不挠的革命家。1853年，他参加了革命杂志《同时代人》的编辑工作，不久就成了它的实际领导人。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沙皇政府进行改革的虚伪和不彻底性，宣传革命民主派的改革纲领。他还写了《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等一系列秘密传单，号召农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沙皇政权。

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和《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法令》。法令宣布农民有人身自由，包括有权离开土地，有权拥有财产和有权以自己的名字进行诉讼、立约等活动。法令规定，全国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在得到自由时可以获得一块份地的使用权（份地的数额由各地的法令规定）。为了获得人身自由和份地，农民必须和地主订立契约，并缴付巨额赎金。在订立赎身契约前，农民如需使用原来使用的份地，必须和原来一样服劳役或缴代役租。在赎买份地以前，农民即使已经取得了人身自由，仍要为地主承担各种“临时义务”。农民在改革中获得的份地数额很小。他们原来使用的大量好地被地主夺去，这部分土地称为“割地”。在全国，一。在黑土地带，割地的情况更为严重。此外，地主还霸占了以前与农民共用的水塘、牧场和森林等。

上述法令实施以后，沙皇政府在上层建筑领域也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几项：

一、1864年成立县、省两级自治机构，包括自治会议和它的执行机构自治局。1870年，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自治机构——城市杜马和自治局。这些机构在名义上都由选举产生，实际上则分别由贵族地主和富裕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包办，绝大多数农民和城市居民根本无从表达自己的意志。自治机构的权力很有限。它们只是地方政府的辅助机关，主要是管理地方经济、卫生保健和一部分国民教育方面的事务。

二、1864年进行了司法改革，建立了统一的各级法院。全国所有的人都在统一的法院内按照同一法律和同一审判程序受审。审判公开进行，有陪审员参加，允许律师辩护。

三、1874年进行了军事改革，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年满二十的青年不分等级，都要应征入伍，一部分人服现役，一部分人服预备役。服役期由二十五年缩短至六、七年。革新部队装备，提高军官的训练水平。

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和随后的一系列改革是沙皇和贵族地主阶级的政府进行的，但就性质来说则是资产阶级的。它们是在封建农奴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西欧一些先进国家，这种改革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且还伴随着革命。在俄国，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和资产阶级软弱，就由农奴主阶级自己来进行。因此，改革极不彻底，保留了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国家政权仍然是专制的沙皇统治。这种情况，对于以后俄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61年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改革以后，虽然保留了不少封建农奴制度的残余，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俄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大工业生产急剧增长。从1860—1890年，生铁产量增加了两倍，钢铁产量和棉纺织品产量各增加了三倍，顿涅茨矿区的形成使煤的开采量猛增了十九倍。出现了一

些新的工业部门，如机器制造工业和石油工业。欧俄地区机器制造工厂总数从1860—1890年增加了两倍半。在改革以前，全国石油年产量不足一万六千四百吨，1890年增加至将近四百万吨。巴库是新兴的石油工业中心。八十年代初，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主要的工业部门已普遍使用机器生产。铁路线在1861年仅有一千六百公里，改革后的二十年间增长了大约十四倍。产业工人队伍不断扩大。1890年，在采矿、铁路部门和其他大工业中劳动的工人达一百四十三万余人。

在农村，由于阶级分化，大批贫苦农民沦为农业无产阶级，而一些富裕农民则不断增加自己的财富。富裕农民不仅购买贫苦农民的土地，而且购买和租佃一部分地主的土地。到了八十年代末，占农村人口20%的富裕农民占有了全部耕地的将近一半。他们按照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组织形式，办起了不少大农场。与此同时，有一部分贵族地主，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在自己的领地里开始使用雇佣劳动，同时引进新式农具和农业技术，使地主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不过，这种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到八十年代末，在欧俄四十三个农业省份中，地主经济的资本主义经营占优势的只有十九个省份。由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雇佣农业工人总数在九十年代初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也显著提高。从1876—1891年，国内贸易中六种主要谷物的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较晚，而且是在大量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发展的。因此，在改革后的三十年间，尽管速度较快，但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农劳动群众的状况更为恶化。受苦最深的是贫苦农民。农奴制改革带给他们的不是他们世代所盼望的土地和自由，而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和压迫。于是，他们便起来反抗。七十年代初期，俄国革命运动经过一段短期的沉寂以后又开始活跃。七十年代革命斗争中的主要领导力量是民粹派。他们要求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彻底消灭农奴制残余。他们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一种偶然现象，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而也必须加以阻止和反对。他们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认为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七十年代初，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地建立了第一批民粹派革命组织。在民粹派看来，农民有一种本能的社会主义要求，只要知识分子去加以领导就会爆发革命。因此，他们于1873—1874年发动了“到民间去”的运动。大批知识分子换上了农民的服装，深入各地农村，向农民宣传民粹主义理论，号召他们进行革命斗争。但是，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1876年，民粹派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土地与自由社”，要求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它的创始人是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普列汉诺夫是其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在农村开展了宣传活动。1879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黑土重分社”和“民意党”。前者基本上坚持原来的路线；后者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完全脱离了群众。革命民粹派运动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缺乏正确的斗争方式。他们的失败表明，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俄国农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十九世纪沙俄对外侵略扩张 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由于农奴制度危机日深，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愈益增强，它渴望掠夺更多的土地，开拓更大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以便满足贵族地主的贪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

要，从而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

首先是对高加索的兼并。高加索位于黑海与里海之间，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资源丰富。这里原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部落和封建汗国，其中有些汗国分别处在伊朗和土耳其的统治之下。1801年，沙俄经过多年的军事入侵和政治渗透以后，终于宣布兼并东格鲁吉亚。1810年，西格鲁吉亚也遭沙俄吞并。在这以后的二十年里，沙俄多次进行对伊朗和对土耳其的战争，结果夺得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地区，从而掌握了整个南高加索。对北高加索山民的征服，由于土耳其和英国的阻挠，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沙俄政府在哈萨克草原上修建堡垒，加紧镇压哈萨克人。从三十年代起，沙皇政府进一步向中亚细亚扩张。它主要采取蚕食手段，或通过军事入侵，或以“自愿归顺”为名，逐步占领了中亚北部的草原地区。六十年代初，美国爆发南北战争，向俄国输出的棉花骤减。这就刺激了沙俄急速占领盛产棉花的中亚南部地区。十八世纪以来，那里有三个大的封建王国，即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它们经常彼此打仗，而国内人民又苦于剥削，穷困不堪。1865年，沙俄派兵进入中亚中南部的浩罕汗国，占领了首府塔什干。1876年，沙皇政府宣布把浩罕汗国并入帝国版图，称为费尔干纳省。1868年和1873年，又先后进攻中亚南部的另外两个汗国——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迫使它们臣服俄国，并且割地赔款。1887年和1899年，沙皇政府分别将这两个汗国割让的地区命名为撒马尔罕省和外里海省，使两汗国名存实亡。1877—1885年，沙俄征服了中亚最后一个地区土库曼。

欧洲仍然是沙俄侵略扩张的重点。十九世纪初期，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中，沙俄遇到的劲敌是法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于1805年和1806—1807年连续组织了两次反法联盟与法国作战，均遭失败。据1807年俄法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俄国同意退出反法联盟并参加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同时承认法国对战争中取得的领土的占有；法国则允许俄国在瑞典和土耳其有“行动自由”。这就是沙皇“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根据与法国达成的这一谅解，沙俄于1808—1809年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结果夺得了原属瑞典的芬兰，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在波罗的海的地位。“芬兰大公国”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大公”由沙皇兼任。它在名义上是一个“自治国家”，但实际上和被沙俄吞并的其他地区毫无差别。沙俄还通过1812年和1828—1829年两次对土耳其的战争，强占了普鲁特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罗马尼亚领土——比萨拉比亚；同时取得了对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两公国的“保护权”。

1812年，拿破仑发动了对俄战争，并占领了莫斯科。俄国人民奋起抵抗，把法军赶出了国境。沙俄利用这一时机，又一次与英、普、奥等国组成反法联盟。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帝国覆灭以后，沙俄终于取得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在此后的将近四十年内，沙俄一面镇压欧洲各国的革命运动，充当“欧洲的宪兵”；一面采取各种方式在巴尔干地区大肆扩张，主要目标是夺取黑海海峡，以进一步巩固在黑海的地位。沙俄的这种扩张活动，加剧了它与英、法的矛盾。于是在1853—1856年发生了克里木战争。战争一开始是在俄土之间进行，土耳其海军在黑海被俄国击败。1854年，英、法向俄国宣战。在克里木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一战，俄国被英、法打败，就此决定了整个战局。根据1856年签订的巴黎和约，

俄国被剥夺了在黑海拥有军舰的权利，并把比萨拉比亚的部分土地归还给土耳其和摩尔多瓦。克里木战争是沙俄对外扩张道路上遇到的一个重大挫折，动摇了它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

但是，沙俄的对外扩张并未停止。正是在克里木战争前后，它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50年，沙俄以武力强占了我国黑龙江口的庙街。随后又占领了我国库页岛的部分地区和黑龙江北岸的大片领土。1854—1857年，沙皇政府派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率兵四次闯入我国黑龙江，擅自建立哨所，设置村屯，并强占了包括海兰泡在内的一部分中国领土。1857年，沙皇派普提雅廷出使中国，提出要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两国界线，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58年，沙俄乘英法联军侵华之机，又一次派穆拉维约夫率兵抵达爱琿，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爱琿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从中国夺走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余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归两国共管。接着，沙俄又以“调解”中英、中法关系为名，先后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均沾”列强在华利益，并把《爱琿条约》中规定两国共管的中国领土（约四十万平方公里）攫为己有，而且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1864年，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了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约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871年，沙俄强占中国新疆的伊犁。根据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但是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地区却被沙俄强行割去。条约还申明中俄西北边界如发现“不妥之处”可以随时“勘改”。以此为名，从1882—1884年，沙俄又抢走了七万余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沙俄是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它在克里木战后大约三十年内，共夺取了一百五十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三个法国或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的面积。

第三节 德意志的统一

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德意志 1848 年革命失败以后，整个德意志又恢复了革命前的政治状况，反动派继续保持统治。但是，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进展，“它们在二十年中带来的成就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煤铁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平均每十年增长一倍以上，很快赶上并超过了法国。以生铁的产量为例，从 1850 年到 1870 年，德意志从二十万吨增加到约一百四十万吨，法国从四十万吨增加到约一百二十万吨。规模宏大的工业革命，使德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1848 年革命的失败，在农村也意味着用革命方法解决土地问题的失败。但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不能不影响到农业。1848 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容克地主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在普鲁士，早在十九世纪上半期就采用改革办法，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农奴制的剥削向资本主义的剥削转变。1850 年，普鲁士又颁布赎免法令，进一步允许农民在缴付赎金的条件下，脱离与地主的隶属关系，解除贡赋和劳役等封建义务，有权拥有土地。这样，农民解除了长期以来所受的封建束缚，他们缴付的大量赎金成为容克地主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普鲁士的封建性的和半封建性的农业，逐渐地、痛苦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在德意志的另一个邦萨克森，也象普鲁士一样，有一大批地主以资本主义方式从事农业经营。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德国经济中的发展，普鲁士在德意志各邦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了。在德意志邦联中，它是经济最发达的邦，它的一些省份，象西里西亚、莱茵—威斯特发仑，重工业发达，成了德意志的工业中心。五十年代，普鲁士的重工业已占全德的一半以上。那些资产阶级化的容克，经营资本主义农场以外，还从事酿酒、制糖、面粉、锯木等加工业，把他们的生产同欧洲的市场紧紧联系起来。普鲁士早在 1834 年发起，建立了以它为首的区域经济组织，即“德意志关税和商业同盟”（简称“关税同盟”）。普鲁士克服危难，保持和发展了这个组织，到 1852 年，除奥地利和个别地区外，德意志其他各邦都加入了关税同盟。同盟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关税保护。1850 年到 1866 年，关税同盟地区各国，工业总产量增加一倍。关税同盟促进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把其他各邦的经济纳入自己的市场。普鲁士进一步强大起来了。六十年代，它显然已从一个封建的君主国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君主国。

德意志的统一问题 经济的发展和德意志政治局面的现状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德意志各邦的分立状态越来越成为德国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越来越难以容忍了。经济的发展要求把统一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又为统一提供了客观前提。

1848 年德国革命开始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把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作为革命的重大任务。革命失败了，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但是统一的问题仍然是历史日程上的问题。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方式和由谁来实现德意志的统一。

在当时的情况下，德意志存在着两条统一国家的道路。一条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即由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势力，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的道路，即通过王朝战争把德意志诸邦

统一在普鲁士或者奥地利君主的领导下。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德意志资产阶级才又公开起来主张民族统一。但是他们害怕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而他们手里又没有有组织的暴力，因此只好依附容克地主实现“自上而下”的统一。至于“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由于资产阶级懦怯，害怕民族运动的革命性质，加上无产阶级本身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不成熟，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在德意志各邦中，具有“自上而下”实现统一条件的，要数普鲁士和奥地利。而奥地利并无真心实意实现德意志的统一，从前梅特涅还认为把德意志各邦人民统一在一个德国内的想法是邪恶的。这样，统一的旗帜就落到普鲁士王朝手里了。正如恩格斯早已料及的：“普鲁士是决定德国未来命运的战场”。

1861年，威廉一世登上普鲁士王位。他要求议会同意拨款，实行军事改革：扩大军队人数，延长服役期限。当时，在普鲁士的议会里，资产阶级自由派占优势，拒绝批准政府要求的军事拨款。威廉一世经过一番动摇，决计不理睬议会而进行统治，1862年9月召来俾斯麦担任普鲁士首相，使普鲁士王朝和容克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

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年）出身于普鲁士大容克地主家庭。他早年属于顽固的保守派，1848年革命爆发以后，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容克，我一定要压倒革命。”他曾准备在自己的领地上组织地主武装，开往柏林，镇压革命，还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一种幻想。五十年代初，他出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代表，极力抵制奥地利目空一切的优越感。他的思想转变了，认为德国的统一是无法阻止的，而德国的统一就是普鲁士势力的延伸，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必须由普鲁士容克掌握，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由普鲁士领导统一德国，自此成为俾斯麦的目标和抱负。后来，他先后担任普鲁士驻俄国和法国的大使，仍念念不忘统一问题。出任首相的时候，俾斯麦处境艰难，既面对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反对，又遭到顽固保守的容克的责骂，内阁中许多大臣不同他合作，只有陆军大臣房龙伯爵全力支持他。俾斯麦力排险阻，坚持推行军事改革，因为他坚信建立强大的军队，诉诸武力，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1862年9月29日，俾斯麦在普鲁士邦议会的发言充分地表达了他的意念：“德意志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实力”。“普鲁士必须积聚和巩固它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曾经多次丢失了”。“当代重大的问题不是演说和多数派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是1848年和1849年大错所在——而只能用铁和血来解决。”在德国统一的关键时刻，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的关键职务。他纵横捭阖，坚决实行“铁血政策”，以求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和抱负。统一德国是大势所趋，俾斯麦顺应时势，全力以赴，表现了他的毅力，反映了他的胆识，并且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朝战争和统一进程 长期以来，普鲁士和奥地利互相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而水火不容。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要通过王朝战争实现统一，战略上必须把奥地利从德意志邦联中排斥出去。因此对奥战争，势所难免。据说，1862年俾斯麦曾对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说过：“很快我就要被迫担负普鲁士政府的工作了。我的首要任务是改组军队，不论这项工作是否有议会的支持。”“我将抓住最好的借口对奥宣战，解散德意志议会，压服小邦，实现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统一。”据说，迪斯累里听了俾斯麦的话以后曾对人说：“注意此人！他所说的可能做到。”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以后

就是那样作的。从 1864 年到 1866 年，普鲁士发动了两次王朝战争，第一次联合奥地利进攻丹麦王国，第二次直对奥地利。两年之内，从联奥到攻奥，俾斯麦充分地表现了他是怎样地翻云覆雨，又是怎样地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1864 年对丹麦进行的王朝战争，为的是从丹麦手里夺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这两个地区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它们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早使德意志的容克和资产阶级垂涎三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本是两个公国，长期以来从属于丹麦国王，但是它们自有议会和行政机构。石勒苏益格同丹麦的关系更深，而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大都为德意志人，按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条约规定，它又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1863 年丹麦新王即位，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借口丹麦新王企图把这两个公国直接并于丹麦，对丹麦开战。1864 年 1 月，普奥军队占荷尔斯泰因，2 月占石勒苏益格。短期之内，丹麦被打败了。根据和约，丹麦国王放弃了关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力，听凭普奥支配。后来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归属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归属奥地利。

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分属普奥，成了两国不断摩擦的根源，为普鲁士的挑衅提供了机会。对奥作战本是丹麦战后普鲁士的目标，为此，普鲁士从军事上和外交上都作了准备。以房龙为首的陆军部和以毛奇为首的参谋部积极制订作战计划。俾斯麦在外交上加紧布置。他利用俄奥仇视的形势，早已取得沙俄在未来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可能；用含糊其词的“补偿”作诱饵，换取了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中立默契；以支持意大利从奥地利手中夺回威尼斯，同意大利缔结了同盟。普鲁士的准备就绪了，就在荷尔斯泰因对奥地利进行军事挑衅，导致了 1866 年普奥之间的王朝战争。后来，普军参谋总长毛奇说到普奥战争时指出：“那是一次早已预见的战争，是一场经过精心准备并为政府视为必要的战争，其目的不仅为了领土扩张，而且为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权的建立。”

1866 年 6 月 14 日，普奥战争爆发。站在奥地利一边的还有几个德意志小邦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等。欧洲以惊讶的情绪注视着普奥之间的斗争，普遍认为奥地利有较多的取胜机会，因为奥国军队经过长期的训练。但是战局的发展同普遍的看法恰恰相反。普鲁士军队以典型的普鲁士方式作战：准备周到，行动迅速，采取攻势，速战速决。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了整个北德意志。参与对普作战的几个小邦没有力量对普军进行坚强的抵抗，只有汉诺威作过顽强的战斗，但是它的军队终于在 6 月 28 日决定性地被击败了。

普鲁士军队控制了整个北德意志，主力向南推进，主战场越来越移向波希米亚。7 月 3 日，奥地利军队二十多万人和普鲁士军队二十多万人会战，这就是著名的萨多瓦战役（德国历史家常称之为克尼格雷茨战役）。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开头奥军顽强作战，打得巧妙。普军指挥部里空气紧张，据说在紧急时刻，俾斯麦不时看毛奇的脸色，从而判断战场上的形势变化。胜负关头，普鲁士王储率援军赶到，出奥军右翼。会战结束，普鲁士取得了会战的胜利。由于普鲁士同意大利结盟，奥地利不得不同时在意大利作战。如果奥地利不分散兵力，把用在意大利战场上几万兵力投在萨多瓦，其作用确是难以估量的。

从军事上说，萨多瓦战役是决定性的。但是普鲁士国王、参谋总长毛奇

都要把战争延长下去，准备进占维也纳，事实上普军已经在向维也纳方面推进了。但是俾斯麦却有不同看法，他力挽狂澜，要把他积极策划的这场战争停下来。俾斯麦看到普军对奥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也就是在统一德国的棋局中赢得了决定性的一步，不仅北德意志完全控制在普鲁士手中，而且普奥在德意志争霸的斗争也以普鲁士取胜而结束了。他认为为了最后完成德国的统一，还要留有争取奥地利成为朋友的可能性，因此不能在奥国的自尊心上留下伤痕。他还怕奥地利完全倒入法国怀里，引出法国的干涉。他力迫普鲁士国王放弃向维也纳进军，接受议和。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老谋深算，不仅表现了外交家的才干，而且展示了具有远大眼光的政治风度。

在法国的调解之下，1866年8月23日普奥双方在布拉格签订了和约。普鲁士从奥地利手里取得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美因河的法兰克福市并入普鲁士版图。这样一来，原先普鲁士分作几块的领土都已联成一片了，面积达到三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增长到二千四百万人，成了德意志最大的邦。经过普奥战争，奥地利退出了德意志邦联。经过俾斯麦策划，北德意志同盟成立起来，在完成统一的进程中又迈进了一大步。普鲁士国王兼同盟的首脑，俾斯麦兼同盟的首相，普鲁士的参谋本部实际上成为北德意志同盟的军事领导机构。北德意志同盟包括二十四四个邦和三个自由市，都处在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事实上，同盟的宪法已从法律上肯定了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只有南德的四个邦还没有统一进来，要完成统一的最后一步，还得同法国进行一次战争。俾斯麦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准备这一场新战争。他迫使南德四邦同普鲁士缔结军事协定，把它们纳入普鲁士的战争轨道；他要从外交上孤立法国，又一步步陷法国于挑战境地。他终于继普奥战争之后，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法国一举战败，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1871年，普王威廉一世即德意志帝国皇位，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产生了。俾斯麦推行的铁血政策是完成德国统一的有力手段，他“实行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革命”。

统一期间的德国工人运动 统一期间，德国工业的迅速发展，给工人阶级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工人人数不断增长，但是在1852年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以后，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在一定的时期内，德国工人中的手工业工人多于工厂工人，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影响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工人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团体如工人教育协会、互助储蓄会等。工人们在这些组织中为改善物质条件而斗争，也为政治权利而斗争。德国资产阶级力图利用工人运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因此许多工人团体处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操纵和影响下。他们还关心建立工人教育协会，因为他们要阻止无产阶级的独立政治活动，又企图使工人从属于他们的政策。莱比锡的市长在一次公开演说中曾经说过老实话：工人教育协会的目的是培养工人贵族。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德国工人在欧洲民主运动普遍高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地讨论起政治问题来，越来越尖锐地要求同资产阶级分手。建立独立的、不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1861年2月，莱比锡的先进工人建立了“前进社”，它的宗旨是组织工人群众大会讨论政治问题，主张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德国其他城市——柏林、汉堡、纽伦堡的工人也有类似要求。1862年冬，莱比锡工人为召开全德工人代

代表大会组织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希望召开一个有充分准备的代表大会，并希望有对一切问题都完全清楚的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第二年5月，德国十一个最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在莱比锡举行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当选为联合会主席。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年）出生于普鲁士布勒斯劳城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在莱比锡商业学校学习过，后来在布勒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研究古代文化和黑格尔哲学。年青的拉萨尔曾抱有“幼稚的梦想”：手执武器领导犹太人，使他们独立自主。他勤勉地研究歌德和席勒、伏尔泰和黑格尔以及海涅的作品。他为了准备写哲学著作曾到巴黎搜集材料，当时马克思正流亡在巴黎。他们彼此早就听说过，但是那次没有会见。他在巴黎接近路易·勃朗的社会民主派。当他接触《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社会民主思想还附着在他头脑里。1848年，拉萨尔初次接近马克思。由于他固执己见，马克思的见解没有使他思想的发展走上一条新道路。他参加1848年德国革命，为此而被捕被监禁。五十、六十年代，他写了许多哲学和文学著作，成为有名的作家和政论家。他在著作中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困苦状况，鼓吹工人阶级政治独立，在工人中间得到名声。莱比锡中央委员会为建立全德工人组织征求过拉萨尔的意见，他为此写了《公开的答复》。这个答复对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拉萨尔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活动上，都采取了同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相异的立场。根据他的观点，也就是所谓的拉萨尔主义，工人阶级只能用合法的方式，只能用议会的方式才能进行活动。拉萨尔同蒲鲁东不同，承认工人参加政治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他同蒲鲁东一样，根本不认为革命是解放工人阶级的决定性手段。在拉萨尔看来，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生产合作社是工人解放的两大支点。他认为，成立和推广生产合作社，把工人变为企业主阶层，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要由国家资助，怎样促使国家来资助呢？这只有通过普遍的、平等的和直接的选举权才能办到。他从这里出发，主张工人阶级应当组成独立的政党，在议会中应当有自己的代表。拉萨尔承袭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的“工资铁则”理论，认为工资的平均水平永远等于按照一个国家的习惯所必需的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必要数额。工资可以视劳动力的供求多少，有降有升，但是它象摆动的钟摆一样，绝不会长期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以此为理由，他认为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是徒劳无益的，从而否定了工人阶级经济斗争的意义。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拉萨尔赞成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他同俾斯麦谈判，以支持普鲁士的统一计划为代价，换取普鲁士政府实行普选制度。拉萨尔促使德国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分手，促成“全德工人联合会”建立，这一功绩获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但是拉萨尔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危害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

由于受到拉萨尔主义的束缚，“全德工人联合会”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地区的进步工人都起来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拉萨尔死后，有人建议请马克思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马克思拒绝了，因为他不愿同拉萨尔的运动合流。

那时候，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小邦萨克森，无产阶级正处在蓬勃发展的阶段，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成了工人组织的核心和骨干。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领导下，萨克森工人教育协会组成了一个地方联合会。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是1848年的革命家，同反革命进行过武装斗争。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生活艰苦，但解放工人的伟大目标鼓舞他前进。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教育下，他刻苦学习，成为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和热情的鼓动家。六十年代，他从伦敦回到柏林进行革命工作。他被逐出柏林以后，定居莱比锡，在工人教育协会里十分活跃。由于同情拉萨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决裂，他参加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但是他坚决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策略。后来他想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范围内，以第一国际的组织代替全德工人联合会。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是一个普鲁士士兵的儿子，境遇困苦，年幼丧父丧母。十四岁那一年，他到一个车工师傅那里当学徒。1858年到1860年，他在南德、奥地利和瑞士一些地方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最后，他在莱比锡找到了工作，参加了工人运动和政治斗争。他的才能在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中很快得到发展。他那永无止境的求知欲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对工人的教育工作特别热心。他同李卜克内西一样批判拉萨尔主义。1866年，他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相信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德意志工人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器重他们、支持他们和帮助他们。在他们的积极组织 and 领导下，进步的工人组织联合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确信拉萨尔派危害性的反对派，1869年在爱森纳赫城举行代表大会，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党接受了第一国际的规章并且加入了第一国际。党的纲领在论及改变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没有提到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必要性，这是一个错误。但是它的建立标志着德国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产生，因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第四节 意大利的统一

“复兴运动”的高涨 维也纳会议维持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局面，在人们的眼里，意大利仍为一个“地理名词”。经过拿破仑战争，意大利也象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民族意识蓬勃兴起，意大利人民的伟大过去，罗马帝国的威望，但丁的诗篇，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和科学都足以唤起意大利人的民族自豪感，促使他们要求重新统一。

为了推进统一，意大利人建立了许多秘密会社，烧炭党是它们当中最著名的。早在法国统治意大利时期，烧炭党就在意大利南部产生了。资产阶级、自由派贵族和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忠贞不渝的爱国者，纷纷参加烧炭党。烧炭党在各地建立基层组织，进行地下活动。1820年在那不勒斯、1821年在庇蒙得爆发的革命就是烧炭党人组织领导的。

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又在意大利产生了反响。帕尔马公国、摩地纳公国和教皇国都在1831年初爆发了起义。这一次又是奥地利出兵镇压了起义，但是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高涨，进入了“复兴运动”时期，马志尼领导“青年意大利党”日益起着巨大的作用。

朱泽培·马志尼（1805—1872年）出生于热那亚。他的父亲行医，还是一位解剖学教授。马志尼早年受到民族民主运动的熏陶，立志为统一意大利而献身。他在大学读书时参加烧炭党，进行密谋活动，1830年由于参与反撒丁王国的未遂起义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国外。第二年，他在法国马赛创立了“青年意大利党”，目的是发动革命起义，推翻奥地利统治，把意大利建成独立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青年意大利党依靠中小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和先进的知识分子集团，宣传意大利复兴的崇高理想。到1831年，它拥有六万党员，在意大利各主要城市建立了它的地方组织。意大利的统一、自由、民主、共和是马志尼及其追随者专心致志的目标，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并采用一切手段追求实现它。

马志尼说：“用烈士的鲜血浇灌的理想是会迅速成长的。”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特别是1848年到1849年意大利革命中，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一再洒热血，抛头颅，不断以鲜血浇灌统一理想。意大利的革命者奋斗不息，他们在统一这个主要目标上一致，至于如何达到目的以及统一之后建立一个什么形式的政府却是有分歧的。

当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按政治主张可分为三个派别。运动的右翼包括许多天主教教士，以修道院院长乔伯蒂为代表，主张意大利各国结成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联邦。另一派以著名的政论家达泽利奥侯爵为代表，主张建立一个以撒丁王国国王为首的统一的意大利王国。这两派表达了大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贵族的愿望，希望通过意大利各国统治者达成协议的办法，自上而下解决统一问题。以马志尼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反对前两派的主张。他们是最有影响的共和派，力主采用人民起义的办法，把奥地利的统治力量赶出意大利，废除教皇国的世俗权力，把整个意大利统一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之下。这三派的纲领根本不同，不能妥协，归根到底的抉择将由事情的进程来决定。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意大利的经济显著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工业革命也在进行。经济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又为统一提供了新的推动力。在北部地区，即在撒丁王国的庇蒙得地区和奥地利直接统治的伦巴

底，兴起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撒丁王国据有北意的有利战略位置，是意大利力量最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政府比较开明，1848年到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在意大利各国中，只有它保留了宪法，实行立宪制度。撒丁王国成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归向的中心，他们希望在它的领导下把意大利统一起来。

1859年对奥战争 撒丁王国几乎是意大利各国中唯一不受奥地利控制的国家，五十年代居于意大利统一运动的中心地位。萨伏依王朝的维克多·伊曼纽尔二世统治着撒丁王国。他任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加富尔为首相，长期信任他，使他起了作用。

卡米洛·本佐·加富尔（1810—1861年）出身于庇蒙得一个贵族家庭，自幼深受教育，广为游历，研究过英法的政治生活，特别倾心于英国的议会政治，信服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经济上，他主张兴办工业，用近代科学方法经营农业，曾经在自家的庄园上试验科学种田。他主编过民族主义派的报纸，参加过1848年革命，作过撒丁王国的农业和通商大臣，1852年被任命为首相。此后十年间，他几乎没有间断地担任这个职务。他力主意大利统一和工业化。他希望撒丁王国强大，以便于它能够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导。加富尔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现实政治家。他改组和加强军队，帮助建设银行、工厂和铁路，鼓励造船，为增加贸易而同其他国家谈判缔约，在国内还尽力减少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加富尔同马志尼的政治目标一致，都是为了促成意大利的自由和统一。但是加富尔不相信意大利全凭单干或单靠热情能够达到目的。他环顾四方，寻求盟友，为此而采用狡猾的、无节操的外交手腕，因此招致了马志尼的敌视和不信任。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给加富尔提供了一个施展外交手腕的机会。这场战争本来是英法同俄国为掠夺土耳其而产生的利害冲突导致的，同撒丁王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加富尔决定参战。1855年，一万五千名撒丁王国军队加入英法军队一方对俄国作战。加富尔打算借参战来树立撒丁王国的国际形象，在未来的议和会上争取同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一切又可以同争取意大利的统一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撒丁王国的军人曾经形象地道出了这种关系：“意大利将从塞瓦斯托波尔战壕的泥土中建立。”

在寻求盟友的过程中，加富尔和他的追随者特别希望取得近邻法国的帮助。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意大利又正好有他的打算。1858年，拿破仑通过私人渠道，致函加富尔，说他将到普伦比耶度夏，希望在那里见到他。加富尔深知言外之意，他写信对人说：“戏是临近转折点了。”7月中旬，加富尔同拿破仑三世会晤，经过密谋，达成了协议：两个王室联婚，伊曼纽尔二世的女儿将嫁给拿破仑三世的一个堂兄弟；法国同撒丁王国联合对奥作战；如果取胜，伦巴底和威尼斯并入撒丁王国；作为报偿，撒丁王国把尼斯和萨伏伊割让给法国。同年年底，两国缔结防御同盟，法国答应，一旦战争发生，法国将提供二十万军队；奥地利一定要从意大利赶走。加富尔兴高采烈，他写道：“我们已经把奥地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除非打仗它是跳不出去的。”拿破仑三世以敌视态度对待奥国，1859年元旦，他对奥地利驻法大使说，他很遗憾的是他同奥地利帝国的关系不象从前那么好了。

1859年4月，法国和撒丁王国的对奥战争开始了。

意大利人热情迸发，自发的起义遍及北意。摩地纳发生起义。帕尔马公国赶走了它的统治者。在托斯坎那的首府佛罗伦萨，运动如火如荼，要求同

撒丁王国联合。起义的浪潮向南扩展，逐渐波及教皇国。

法军开进意大利境内，同撒丁王国军队一起对奥作战。在对敌斗争中，“阿尔卑斯山猎手”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是从热情的意大利爱国者中征集的非正规军，由加里波第指挥。奥地利军队不是在伦巴底的布满堡垒的方阵地带进行防御战，而是决定防守米兰的防线。6月4日在米兰西北的马詹塔会战，奥军受重创后退。6月24日在方阵地带的索尔菲利诺会战中，双方损失严重，奥军虽然战败，但还不是决定性的失败。

索尔菲利诺会战以后，拿破仑三世不愿乘胜前进，宁可半途而废，决定战争到此为止。对意大利人说，他背信弃义，而这正是他一贯的特质。他出此一辙，可能怕战争继续下去会引起国际干预，特别是普鲁士参加奥地利一方。但是更主要的在于他被意大利人民掀起的革命热潮吓倒了，他已看出意大利人民不是他想象地那样容易摆弄的。7月初，拿破仑三世同奥皇会晤，决定了议和内容。按照决定，奥地利把伦巴底交由法国转交撒丁王国，但仍留有威尼斯地区。加富尔想依靠拿破仑三世赶走奥地利人。拿破仑的出卖使他万分沮丧，但是他却不得不按前议，把尼斯和萨伏伊割让给法国（1860年）。

意大利王国成立 1859 年对奥战争没有完全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但是意大利人也绝不放弃他的统一目标。帕尔马、摩地纳和托斯坎那几个小国的人民不许从前的统治者卷土重来。教皇国的一个省继续反抗教皇的统治。这些地方终于同撒丁王国合并。意大利半岛的南部以及西西里岛，也就是“两西西里王国”的命运又当如何呢？成了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同加里波第的传奇式的活动联系起来。

朱泽培·加里波第（1807—1882年）出生于尼斯，作过海员。“青年意大利党”一成立，他就参加进去，立志为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事业献身。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加里波第因参与革命被判死刑，逃往拉丁美洲，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回到意大利以后，他又参加了1848年革命，为在罗马建立和保持一个革命的共和国，同马志尼并力战斗。他们的斗争失败了，加里波第号召组织志愿军。他呼吁说：“我不能提供薪饷和营地，也不能提供军需品；我能提供的是饥渴、强行军、战斗和牺牲。让衷心爱国而不是口头爱国的人跟我来吧！”1848年的失败再使他流亡，在纽约住了几年。后来，他作过秘鲁商船船长，务过农，1859年参加对奥战争，领导“阿尔卑斯山猎手”作战，卓著战功。加里波第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意大利爱国者，是一位勇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在意大利统一运动的最后一阶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两西西里王国，人民受到北方形势的激发，反国王的密谋和暴动持续不绝。1860年4月，西西里岛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加里波第带领他募集的志愿军一千余人赶去支援起义者。这支志愿军以身穿红衫而在历史上称为“红衫军”，是由工人、手工业者、渔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组成的。他们在撒丁王国当局的默许下，于5月初从热那亚登船，开始了十九世纪欧洲史上一次最成功的军事冒险。加里波第以他的千人团向力量比他们强百倍的敌人挑战。他的勇毅精神和指挥非正规武装的才能，他对意大利统一的崇高热情，他的纯朴而高尚的性格连同他的政治上的幼稚和对当时欧洲政治力量的无知，都从这次进军中表现出来了。

1860年5月5日，加里波第率领的千人团离开热那亚港口，11日在西西西里岛的西部登陆，直搏两西西里王国防军守卫的中心巴勒摩。这一支小小的

兵力很难想象能够打败强大的守军。但是由于他们的英勇无畏和当地人民的支持，由于加里波第的指挥才能和守将的无能，千人团一举攻克巴勒摩，首战告捷就决定了西西里战役的命运。加里波第决定乘胜前进，率军渡海峡，向意大利半岛南部进军。两西西里王国国王众叛亲离，千人团所向披靡。9月7日，加里波第率部队进入王国首都那不勒斯，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呼，表明了人心的归向。

看到加里波第的胜利进军，加富尔喜忧参半。喜的是那不勒斯的王位已被推倒，忧的是两西西里王国领土的归属没有把握。他同加里波第打交道一向不顺利，他知道加里波第不信任他甚至恨他。加里波第虽然常常宣称以伊曼纽尔二世的名义行事，但是他却拒绝简单地宣布把新得来的领土并入撒丁王国。而且马志尼和他的追随者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共和国。加富尔忧心忡忡，为了扼制加里波第，他认为撒丁国王出场的时间已经到了。恰在这时，在教皇国内有革命骚动，加富尔政府照会教皇，说撒丁国王有义务阻止教皇国的雇佣军镇压人民运动。撒丁王国的军队开进教皇国，打败了它的雇佣军，并且继续南进，抵达那不勒斯。加里波第本来可以依靠人民群众，在那那不勒斯成立马志尼一心向往的共和国，确立民主政权，并在共和国的旗帜下完成意大利的统一。领导、足智多谋的统帅，但是在政治舞台上，在这严重关头，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软弱性就暴露出来了。他不敢发动人民同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对抗，而是交出了自己的全部权力，结果两西西里王国的领土同撒丁王国的领土合并了。

1861年2月，第一届意大利议会在都灵开幕。3月间议会宣布，撒丁王国以及并入的领土成为意大利王国，伊曼纽尔二世为意大利国王，新王国定都佛罗伦萨。1859年以来，人民的斗争基本上导致了意大利的统一。

意大利统一的最后完成 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拥有二千二百万人口，但是威尼斯地区的意大利人仍然呻吟于奥地利统治下，罗马周围地区的人民还受到教皇的压迫。

1861年6月加富尔死去，但是他依赖国外力量的帮助完成意大利统一的外交路线，在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仍在起作用。为了恢复威尼斯地区，意大利注视着普奥间的矛盾发展。1866年，意大利按照同普鲁士的同盟规定，参加了普奥战争。在海陆战场上，意大利都遭到失败。但是奥地利终究由于在普奥战争中失败，不得不把威尼斯地区归还意大利。

关于罗马的归并，是一个更为复杂而又经历曲折的故事，始终牵涉到法国。早在1848年革命中，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在罗马建立的革命共和国，是顺应民意的。但是当时新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他新上台的总统路易·波拿巴（后来的拿破仑三世），为了争取法国广大天主教徒的支持，派出干涉军，颠覆了罗马的共和国，恢复了教皇国的统治。1860年，加里波第的千人团占领了那不勒斯以后，本来准备继续北上，一举收复罗马。这个胜利进军罗马的形势，因撒丁王国军队南下那不勒斯而被断送了。

加里波第不愧为意志坚强的革命民主战士，仇视教皇，不忘解放罗马。1862年，他率领志愿军二千人，自热那亚经撒丁岛，绕西西里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可是意大利王国的军队迎面阻击，加里波第受伤被俘，进军罗马失败。1867年，加里波第再度率领他的拥护者进入教皇领地。教皇的雇佣军在法国干涉军的支持下，又打败了加里波第。二十多年来，罗马的归并始终有法国作梗。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法军从罗马撤退之后，意大利军队

才开进罗马。教皇失去了他的世俗政权，自称“梵蒂冈的囚徒”，幻想教皇国有朝一日恢复。

1871年1月，意大利王国从佛罗伦萨迁都罗马。意大利重新统一的斗争终于大功告成。意大利人民长期斗争的果实被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取得了，但是意大利统一事业的完成终归是顺乎民心的，具有进步意义。

第五节 法兰西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的统治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为了最终攫取政权，在他的异母兄弟莫吕和他的老帮凶波西尼的阴谋策划下，发动政变。第二天和第三天，共和派企图在巴黎发动的反政变的暴动，被路易·波拿巴的将军阿尔诺率领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乘着政变成功的时机，路易·波拿巴设立了特别法庭审判他的反对者，有二万多人被处监禁或流放。他用这种方法威吓政敌，摧毁共和党派的力量。同时他呼吁法国人民参加全国公民投票，裁决他的行动，采用强奸民意的手段，使他的政变合法化。接着，他修改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作为恢复帝制的过渡。1852年，他再一次举行公民投票，批准他恢复帝国。12月2日，路易·波拿巴自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他统治的帝国，历史上称作法兰西第二帝国。

拿破仑三世作为皇帝是篡权的结果。他集国家权力于一人之手，有权宣战、缔约，有权指挥军队、提出法案、选择大臣、任命国家重要官吏，等等。为了掩盖他的篡权活动并使篡夺的权力合法化，他除了乞灵于公民投票之外，还在形式上保存了议会。第二帝国设立立法团和参议院。立法团的议员由选举产生，人数不超过二百六十名，任期六年。他们的候选资格是皇帝确认的，他们作为立法团议员只能投票通过法案。参议院的成员任期终身，由皇帝选任。他们不超过一百五十名，有权审议法案，如果认为法案同宪法抵触，可以否决它。拿破仑三世设立国务会议，它的人选也由皇帝任命。国务会议根据皇帝提出的方案起草法律，是拿破仑三世专制统治的核心。大臣只对皇帝负责，没有一个集体负责的内阁。而议会的权力已削弱到最低限度。

第二帝国政府几乎摧毁了二月革命的一切民主成果，正如著名的作家维克多·雨果所斥责的那样：“他们扼杀了权利，禁止了言论自由，侮辱了旗帜，践踏了人民而感到兴高采烈。”但是这个政权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在它统治的前期，有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认为拿破仑三世能够抵挡社会主义和红色恐怖而支持他；天主教势力也认为他的统治有利于它们而拥护他。至于法国的小私有农民，一向迷信名叫拿破仑的人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归还他们，盲目地相信他。

第二帝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精力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不仅认为它可以保障他们，而且可以通过它的政策有利可图。政府设立一些专门银行，对工业和农业贷款。在许多方面特别在基础工业和铁路上，投资都会取得有利的收入。五十和六十年代，法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完成了工业革命。二十年间，工业生产几乎增长了两倍。从1851年到1869年，进出口商品的总值从二十六亿多法郎增长到八十亿法郎。到1870年，铁路通车线路达到一万一千公里。1867年的巴黎博览会标志着法国在世界上的工业先进地位。在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第二帝国大规模地改造了巴黎市区。在塞纳省省长胡斯曼男爵的精心筹划下，小街小巷拆除了，两万栋房屋夷为平地。在那里，宽敞笔直的林荫大道、巨大的商场、华丽的歌剧院、优美的公园、富人的宅第相继修建起来。对有产阶级说，巴黎更美更舒适了。对无产者说，他们只有迁到外围，仍旧棲居在简陋的小屋里。拿破仑第三改造巴黎，有意让巴黎作广告，显示第二帝国的繁荣。此外，他还有对付革命群众的目的。因为昔日巴黎的小街小巷便于起义群众筑造街垒，对抗政府军队。而拓宽的街道和广场，却便于发挥炮火的作用，有利于政府军在镇压起义时作战了。

第二帝国前期，政府反对派的力量比较薄弱。代议机构是无力的，新闻界如果敢于批评拿破仑的体制很快就要受到制裁。局势表面平静，但是反对势力的暗流却是不可低估的。保皇派有两个集团：正统派支持波旁王朝复辟，奥尔良派企图卷土重来，恢复路易·腓力普家族的统治，他们在法国内外都有许多支持者。对拿破仑三世说，最实在和最危险的反对力量是共和派，他们的支柱是大城市特别是巴黎的人民。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大部分站在拿破仑三世的对立面。他们中间的名作家维克多·雨果，无论是流亡在英国或比利时，都用他那支犀利的笔揭露“小拿破仑”，在欧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对外战争和殖民侵略 拿破仑三世曾经宣称：“帝国就是和平”。实际上这是骗人的口号。为了满足大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贪欲，为了满足军事将领的虚荣心，也是为了保持帝国政府的存在，第二帝国几乎不间断地进行对外战争，不间断地进行殖民地掠夺。

拿破仑三世首先使法国卷入的是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这场战争的根源在于英法同俄国之间侵略土耳其的利害冲突。当时，土耳其帝国继续衰败，被列强看作垂死的“病夫”。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明确向英法表明，他们应尽早瓜分土耳其。英国的传统政策是阻止俄国势力进入地中海，以保障它通达印度的道路，因此支持土耳其帝国的表面存在。在这同时，法俄都争作土耳其境内的基督徒的保护人，利害冲突尖锐。拿破仑三世看出，如果联合英国进行一场对俄战争，胜利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当1853年俄国进攻土耳其的时候，英法都站在俄国的对立面。第二年3月，英法对俄宣战。后来，英法军队在克里木半岛登陆，围攻俄军坚守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这场战争，双方损失惨重，一方面暴露了联军指挥失当，另一方面显示了俄军的拚死抵抗。联军攻占塞瓦斯托波尔，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但是俄国终于战败了。结束这场战争的和会，1856年在巴黎举行，被认为是第二帝国外交的胜利，而拿破仑三世也通过这场战争达到了增加个人威望的目的。

第二帝国同撒丁王国结盟，于1859年进行了对奥战争。从表面上看，拿破仑三世好象同情意大利人民，帮助他们实现统一；实际上他追求的是侵略的目的：一在于攫取意大利的尼斯和萨伏依，一在于借帮助意大利而控制意大利，不使它过于强大。索尔菲利诺之战以后，拿破仑三世突然停战，在意大利爱国者看来，这是背信弃义，而他自己却自以为得计。他从土地上得到了报偿，攫取了尼斯和萨伏依，但是这次战争的结果却不象克里木战争那样是一次明确的胜利。

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和1859年对奥战争之间，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同英国勾结起来，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通过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1858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借口保护天主教教士，进犯越南。从十八世纪晚期起，法国就觊觎越南，由于国内革命频起，总未达到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法国加紧了武力侵犯，先后侵占了越南南部的交趾支那，1863年又迫使柬埔寨接受它的“保护”。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侵略日益加剧，继续向北推进，妄图以印度支那为跳板，侵略中国的西南边疆。

在非洲，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已经侵占了阿尔及利亚。第二帝国政府继承了七月王朝的衣钵，大事扩展以前夺自阿尔及利亚的领土，把撒哈拉大沙漠的很大一部分并入法国领地，还把殖民侵略的矛头指向非洲腹地。

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战争和殖民侵略，对“帝国就是和平”的口号作了自我暴露的嘲讽。

帝国的危机 1860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在欧洲的声势如日中天，许多人相信拿破仑三世有卓越的外交才能，认为他可能象他伯父拿破仑一世那样建立一个大帝。如果他真能带来光荣与繁荣，法国可能饶恕他；如有错失，将会对他造成致命的后果。事实上，第二帝国后期，外交上一再铸成大错，国内反对派的力量日益壮大，工人阶级同第二帝国政府严重对立，势如水火不容。这一切使第二帝国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

1860年，法国同英国签订商约，规定两国大大互减进口税率，例如英国的煤、铁、机器和纺织品输入法国，法国的葡萄酒和烈性酒输入英国都降低关税。法国工业发展远不如英国，由于降低进口税率，法国的一些工业部门将由于英国货的竞争而受到损失。因此，英法商约引起了法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拿破仑三世本来希望借此商约建立英法之间的更为友好的关系，其结果却丧失了法国资产阶级对第二帝国政府的支持。

第二帝国对外政策的失败，更表现在对墨西哥侵略的破产上。

1861年，墨西哥总统、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和卓越的政治家胡亚雷斯在国内实行改革，宣布外债付息暂缓二年。英、法、西班牙借口讨债，派兵侵入墨西哥，英国《泰晤士报》叫嚷：“必须把墨西哥从无政府状态中拯救出来”。墨西哥军民坚决抗拒侵略军。英军和西班牙军撤退了。拿破仑三世妄想把拥有富饶自然资源和种植场的墨西哥变为法国的殖民地，继续军事冒险。他看到美国正在内战，无力坚持门罗主义，以为有机可乘。在墨西哥的法国侵略军，实际的遭遇却是一场灾难，几经苦战才于1863年6月侵占墨西哥首都。第二年，法国侵略者在那里建立了傀儡政府，把奥地利的马克西米连大公捧上墨西哥的“帝位”。胡亚雷斯领导抵抗力量英勇顽强地打击侵略者，第二帝国又增兵又易帅，拿破仑三世把他的忠实鹰犬巴赞将军派到了墨西哥。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美国政府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警告法国，要么放弃对墨西哥的侵犯，要么承担触犯门罗主义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法军近四万人陷在墨西哥，法国为这场侵略每月需付出一千四百万法郎的代价。拿破仑三世走投无路，终于被迫于1867年从墨西哥撤回军队。傀儡“皇帝”马克西米连失去了法国刺刀的保护，受到了墨西哥人民的惩处，经过审判，1867年6月被处决了。侵略墨西哥遭到彻底的失败，这对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是一次无可弥补的重大打击。

对外政策的挫败导致了国内反对力量的加强。第二帝国政府为了谋取支持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采取了政治上小让步的办法。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它允许立法机构对阐明政府政策的御前演说进行辩论，允许立法团和参议院对政府进行批评。它对报刊的管制和检查放松了，可以让报纸全文公布议会的辩论。这样，第二帝国从1860年以后在历史上称为“自由帝国”时期。实际上，那不是什么“自由帝国”，充其量不过是1848年以前的君主立宪政体。

第二帝国政府的政治小让步，并没有赢得更多的支持，反而导致了反对派力量的日益增强。这从议会的选举结果上充分显示出来了。1857年的选举，只有七名反对第二帝国政府的候选人当选；1863年增加到三十五名，1869年激增到九十三名。1869年选举，政府支持派得四百四十三万多选票，反对派得三百三十五万多选票。法国的大城市如巴黎、马赛、里昂、波尔多都是

反对派力量的中心。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有狡诈的老政客阿道夫·梯也尔、顽强的共和派人物莱昂·甘必大。

促成反对力量增长的根本原因，是第二帝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和它遭到的失败，同时也同共和派报刊的宣传密不可分。帝国前期，出版管制严格，但是表面无害的文艺的和哲学的出版物都在不断增加，它们以迂回曲折的方式进行政治批判，对读者很有影响。帝国后期，管制有所放松，共和派活动复苏，他们的报刊增加。温和共和派的报纸、生存力最强的《世纪报》，1866年发行量达到四万四千份。1868年一年之内，巴黎出现了一百四十种新报刊。《号召报》常刊出雨果的文章，强烈攻击第二帝国政府。富有嘲讽机智的政论家昂利·罗什弗尔主编的杂志《路灯》，发行量不少于十二万份。

第二帝国政府力图拉拢工人阶级，它的喉舌还要把拿破仑三世说成是工人利益的“保护人”。早在1853年，拿破仑三世就下令组织劳资调解委员会，调解劳资纠纷，借以阻止罢工；他还进一步希望把它变成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机构。1864年，帝国政府撤销了刑法中关于有计划的工人行动为犯罪的条款，取消了1791年以来实行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列沙白里哀法》。但是法国的工人阶级没有接受第二帝国政府别有用心心的诱惑，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工人运动进入高涨阶段。《列·沙白里哀法》废除以后，法国先进工人在一些地方组织工会，在国际上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先进工人一起，积极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组织活动。1865年起，巴黎和许多其他法国城市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在国内的选举中，法国工人提出了工人候选人的名单，明确表明他们既反对第二帝国政府，也不同资产阶级反对派合流。在法国工人运动内部，法国先进工人开始摆脱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形成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左派，或称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第二帝国政府感到统治危急的时候，干脆拆下了“保护工人”的假面具。1867年和1868年，它指控“国际工人协会”法国各支部的一些领导人组织秘密社团，两次审判他们，最后或被罚款，或被判处监禁三月。但是“国际”的会员仍然继续进行斗争，恢复和扩大“国际”的组织。法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是惊人的，例如1869年矿工大罢工几乎席卷了整个卢瓦尔矿区，1870年1月参加了巴黎二十万人的反对帝国政府的示威游行。

这样，到1870年，第二帝国已经根基动摇。它幻想借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来维护它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一次新的对外战争恰恰为它敲响了丧钟。

第六节 掌握世界工业霸权的英国

英国——“世界工厂” 1851年5月1日，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37—1901年）主持了伦敦博览会的开幕式。这个博览会展出了一万三、四千件展品，包括汽锤、水压机、工作母机、铁路设备、望远镜、照相机、形形色色的纺织品、各种贵金属，除英国产品以外，还展出了外国产品。从5月到10月，参观博览会的人数在六百万人以上。这次博览会显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标志着英国已从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扰攘不宁的局面中摆脱出来，进入了它作为“世界工厂”的时期。当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列颠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冶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

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不仅拥有发达的纺织工业，而且煤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造船工业都发达起来了。这里举几个数字：

185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加工了世界半数的棉花。从1850年到1870年，英国的动力织机从二十九万余台增加到六十一万余台。

从1854年到1870年，英国的煤炭生产从六千四百多万吨增加到一亿一千多万吨；生铁生产从三百余万吨增加到五百九十六万吨，在世界上一马当先。

英国的机器制造业产品越来越占显要地位，它的机器、机床和机车畅销许多国家。从1845年到1870年，英国的机器输出量增加了九倍。

在造船业方面，英国为各国造船。它是第一个由用木材造船改用金属造船的国家，轮船制造业得到了广泛的发展。1850年，英国造成并登记的船舶吨位为十三万四千吨，1870年达三十四万三千吨（都不包括根据外国订货造成的船舶吨位）。

由于工业生产的迅速增长，英国能够大规模地扩大它的对外贸易。从1850年到1870年，英国的输入额和输出额都增长了两倍。英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输入原料、粮食，输出工业产品。以工业产品的收入支付原料和粮食的支出大有盈余，从而增加了资本的总量，造成了资本主义英国的繁荣。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大量向外国倾销工业产品，又向外国输出技术和资本。五十年代，西欧许多铁路由英国人承包建造，一部分筑路资金由英国提供。1857年的经济危机以后，英国进一步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渗透，例如开始在印度大规模地兴建铁路，倾注资本。殖民地既是英国的原料产地，又成为它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十九世纪上半期，英国资本投向全世界，但投入殖民地的甚少。五十到七十年代，投入殖民地的资本集中增长。1850年，英国的国外投资，三分之一在美洲，其余的主要在欧洲。1854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总数约为三亿英镑，1860年约为六亿五千万英镑。1868年左右，仅投入印度铁路的就达到七千五百万英镑。1870年，在总数七亿五千余英镑中，四分之一以上作为借款贷给殖民地政府。

由于英国是“世界工厂”，它成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关键因素。由于英国占有世界工商业的垄断地位，它的财富急剧增长。英国有产阶级是越来越富有了。对他们说，当时的确是一个黄金时代。

政治生活 在革命的1848年，英国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当1848年革命在欧洲大陆爆发以后，英国宪章派受到革命的鼓舞，再一次掀起了运动的高

潮——最后的一次高潮。他们计划在4月10日在伦敦的肯宁顿广场举行群众大会，然后举行示威游行，到英国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政府实现《人民宪章》早已提出的要求。英国政府禁止举行群众大会，号召有产阶级公民组成特别警察。4月10日，肯宁顿广场仍然聚集了大批群众，但是由威灵顿公爵指挥的十七万特别警察封锁了通往议会的道路。当日的示威游行被破坏了，宪章派领导人送交议会的请愿书又被搁置起来没有结果。伦敦以外一些城市发生的零星的革命运动也被镇压下去了。宪章运动由此日趋衰落，逐渐销声匿迹。英国经济的繁荣成了促使群众运动退潮的重要因素。

十九世纪中期，英国处于同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英国地处海岛，又拥有海上优势，不必担心国防安全，用不着在国内布置重兵，因此英国的军事官僚机器比欧洲其他国家弱得多。同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对自己的强盛有坚强的信心，容许英国有较多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工人团体和民主团体可以存在，还有一定的举行公开集会和群众大会的自由。英国为其他国家的政治流亡者提供了避难之地，马克思、恩格斯能在这里居住和工作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当时活动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有两个政党，即由托利党蜕变而来的保守党和由辉格党蜕变而来的自由党。保守党代表大地主的利益，也部分代表大船主和殖民地大商人的利益，它的支柱是农业资本家。自由党代表势力日益强大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上层是同资产阶级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大贵族代表。十九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自由党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二十年间，自由党单独执政或同其他派别联合执政达十五年之久，而保守党执政仅约五年。自由党的帕麦斯顿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亨利·约翰·帕麦斯顿（1784—1865年）本来是托利党人，后来转入辉格党，从1810年起，几乎连续不断地担任内阁阁员职务。从1830年到1851年，他担任外相职务前后共十六年；从1855年到1865年，两次出任首相，前后共九年。帕麦斯顿口头上玩弄自由主义的辞藻，事实上他执行着欺凌弱小国家的政策，使用外交手段和武力为英国商人打开和保证通路。英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赤裸裸地反映在多次殖民扩张和殖民战争上。举例说，1852年，英国把缅甸很大一部分领土并入自己的印度领地；1854年吞并了印度以西的大片土地俾路支；1856年对伊朗发动了侵略战争，接着又镇压了印度的民族起义。对中国，英国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把割地、赔款、开商埠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

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的时候，在英国政治舞台上角逐的有两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人物，那就是保守党的迪斯累里和自由党的格莱斯顿。他们从1852年起交替出任保守党和自由党内阁的财政大臣，从1868年到1880年又两度交替出任首相。

本杰明·迪斯累里（1804—1881年）是一个富有蛊惑力而又自相矛盾的角色。他是一个犹太作家的儿子，本人早年也曾写过以当时英国政治为背景的小说，故事迷人，颇有敏感。1834年，他作为托利党人当选为下议院议员，表面上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心里深深钦佩王权和贵族政治。他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许多英国勋爵也对他表示友好。四十年代，他在党内因反对领导人的在谷物进口上执行的保护关税政策而出名。

1857年大选，保守党因反对帕麦斯顿的侵华政策遭到失败，迪斯累里逐渐改变他对帕麦斯顿外交政策的反对，终于亦步亦趋。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年）早年也是托利党人，1840年站在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帕麦斯顿的发动侵华战争的外交政策。1850年，他同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托利党人脱党加入了辉格党，不久入阁，几次出任财政大臣，以善于理财闻名。格莱斯顿也具有一幅伪善的面孔，他指摘那种“我们自己要求权利却拒绝给别人权利的政策”。帕麦斯顿死后，自由党的领导权落到格莱斯顿手里。

迪斯累里和格莱斯顿开始逐角首相职位的时候，争取改革选举权的斗争又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了。事实告诉工人阶级，议会的议员差不多全是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代表人物，议会多次表明它是和工人相敌对的；工人只有争取得到选举权，才有可能改变议会的成份，使议会民主化，改善工人的处境。马克思也一再向英国工人说明，他们不应仅仅进行经济斗争，还应进行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同时，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阶层以及希望在议会里增强自己地位的工业资产阶级都赞成选举改革。工人阶级组成“改革同盟”。资产阶级激进派也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1866年的经济危机震撼了英国各个工业部门，给工人带来了灾难，加深了社会不安的因素。7月下旬，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预定在海德公园的集会由于警察的干预发生冲突，那里长达半英里的栏杆也被拆毁了。秋天，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城市，都举行过二三十万人的集会，要求选举改革。

由于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高涨，统治阶级越来越感到需要进行选举改革，借以避开革命。1866年在保守党得比内阁中担任财政大臣的迪斯累里看到，改革反正是不可避免的，拖延却有可能使政治局势更加尖锐的危险。他一反前不久对格莱斯顿改革案的反对意见，决定实行改革，借以抬高保守党和他自己的地位。1867年8月，保守党内阁提出的选举改革案在议会通过。这个法案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扩大了选民人数，据统计，英国1866年的选民为一百三十五万九千余人，1868年增到二百四十五万五千余人。城镇选区中的成年居民除寄宿的工人以外都取得了选举权，但农业工人和不住在城镇选区的产业工人，包括矿工的大部分，都没有选举权。到1885年，英国才把选举权普及到城镇选区和各郡的居民。

工人运动和工联主义 宪章运动衰落的时候，英国工人运动一度陷于停滞状态，但是以团结熟练技术工人为主的工会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工会被视作“新模范”，它们的发展壮大，是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的一大特色。

第一个新模范工会是1851年成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它是由许多技术工会合并而成的，这些技术工会最有力量的是蒸汽机业、机器制造业的工会。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拥有一万一千名会员，会员缴纳的会费每周有五百英镑。在以后十年中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为广泛模仿的榜样，以它为模范而相继成立的技术工会有石匠工会、铸铁工会和混合木工协会，等等。

当时，英国虽然早已取消了禁止工人组织工会的结社条例，但是新模范工会的成立和壮大仍然是经过斗争的。以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说，1851年11月，它要求取消加班和论件计酬，遭到资本家的联合停产歇业的报复。斗争持续了四个月，最后由于工会基金用尽，无力接济罢工工人，斗争失败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会员一时有所下降。但是三年以内，它的会员增加到一万二千五百人，工会累积的基金达到三万五千英镑。1859年，伦敦建筑工人要求

九小时工作日，遭到拒绝，实行罢工。企业主宣布停业，解雇了两万八千名建筑工人。出乎企业主意料之外的是，各个不同专业的建筑工人统一行动，其他行业的工人也起来支援。捐款不仅从英国工人并且也从法国工人方面源源而来。这次罢工获胜，建筑工人的工作日从十小时缩短为九个半小时。更为重要的是，伦敦建筑工人在 1860 年建立了混合木工协会。它也成为新模范工会中的一个重要工会。

1860 年前后，从新模范工会的领导成员中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领导机构，通常称作“联合会”。联合会设在伦敦，它的主要成员包括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威廉·阿兰、混合木工协会的罗伯特·阿普耳加思、铸铁工会的丹尼尔·盖尔等人，在联合会居于重要地位的成员是制鞋工会的领导人乔治·奥哲尔。这些人是六十年代英国工联主义的指导力量。

可以看出，新模范工会并不是各业联合工会，而是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组织，却又几乎是全由熟练工人组织成的。新模范工会的领导人勤恳工作，诚实可靠，几乎全是自我教育出来的。他们在这些工会组织范围以内发挥了团结一致的精神，但是他们力图使工人运动局限于为“正直的工作，公平的报酬”而斗争。他们并不把工会看作阶级斗争的工具，只是用它来向资本家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他们背弃任何暴力行为，甚至认为与其罢工，不如同企业主和平协商。奥哲尔曾经说过：“社会领域的罢工同政治领域的战争是相同的。除非证明绝对必要，二者都是犯罪行为。”否定以推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革命的政治斗争，这就是当时风靡英国的工联主义的实质。

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偶然。由于英国据有大量殖民地，又是“世界工厂”，占有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英国资产阶级通过贸易和剥削殖民地榨取了巨额利润。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和技术熟练的少数工人，在工人阶级中培养了“工人贵族”阶层。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当时对英国工联抱有失望情绪，恩格斯也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 尽管如此，这个时期，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都没有英国那样多，这又是为什么第一国际成立时英国的工人组织成了它的支柱。

第十三章 第一国际

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了，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取得了明显的胜利。这一胜利以巴黎无产阶级 1848年“六月起义”的失败开始，以德国革命失败和匈牙利起义被镇压而登峰造极，由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固定下来。欧洲工人运动受到残酷镇压，被迫转入低潮。

1849年8月和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流亡到英国。他们在伦敦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领导成员亨利希·鲍威尔、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一起，恢复了同盟的活动。他们通过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和新成立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加强对伦敦的德国工人进行工作。他们同法国的布朗基主义者、英国的宪章派和匈牙利的流亡者联系和合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党决定政治路线时，一定不能凭主观愿望，而只能依据革命条件；要把现实关系而不是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他们根据当时的客观的政治经济形势，认为共产主义者不应当准备立即进行一次革命，而应当不辞辛苦地为未来的革命积聚力量，首先是总结革命经验、发展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他们写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主要的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他们在这一系列经典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任务就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为止。马克思在总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详细地考察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作用和变化，从中得出了结论，第一次表达这样的思想，即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以后，不应该接过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是必须把它“打碎”。他还指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后，无产阶级必须立即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个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成为其中的基本内容。此外，他们指出，工人和农民必须在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联合起来，论证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恩格斯还论述了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要起义取得胜利，就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采取攻势的战术，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有革命组织的领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刻苦钻研，为革命从事理论工作，对于在伦敦的其他一些积极的共产主义者是一种激励。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埃卡留斯等都利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汲取有用的知识，为革命作准备。他们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迈出了成为无产阶级宣传家的一步，在以后几十年里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作出了贡献。后来，李卜克内西回忆马克思督促他们苦学的时候说：“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无上命令，就在于他以身作则。这位不停的顽强工作的智者哪怕只是看你一眼，你都会觉得他在命令你学习。”

形势的转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辩证地联系起来。1850年夏，他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了清醒的分析，认为从1848年开始，资本主义世界就处于一次世界经济繁荣之中，革命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这次繁荣则是重新抬头的欧洲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他们据客观情况估计形势，既防止了“左”倾盲动，又对未来抱有信心。马克思明确指出：“新的

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年，确是资本主义经济蓬勃高涨的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占有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成了“世界工厂”。在法国和德国，工业革命在加速进行。但是资本主义即使处在这样一个蓬勃高涨的时期，也摆脱不了它的根本矛盾，因此也不能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5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以来预言过的而且期待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首先出现在美国，波及英国，然后蔓延到欧洲大陆。在美国，1857年就有四千家企业破产，工业生产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造船工业几乎下降了一半。在英国，冶铁和造船工业下降得最为显著。在欧洲大陆，生产同样萎缩，企业大批破产。这次危机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在美国，仅纽约一地就有四万工人失业。危机又造成工人状况的急剧恶化，在德国一些地区，纺织工人的工作日竟长达十多小时。

这次经济危机促成了政治上的全面活跃，欧洲的反动时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欧洲许多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过去没有完成的任务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按照资本主义在那里的发展进程，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越来越感到必要。在沙皇俄国，农民起义日益频繁，革命民主主义运动日益强大，农奴制到了非废除不可的时候了。在法国，人民群众对拿破仑三世的反动统治愈来愈不满，工人们又着手建立自己的组织。英国的工会联合会又开始争取普选权的运动。

工人运动冲破了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反动政治局面，重新高涨起来。1859年7月，伦敦建筑工人为了要求缩短工作日举行罢工。企业主宣布停业，解雇了二万八千多名工人。不同专业的建筑工人统一行动，其他行业的工人起来声援。英国各地工人和法国工人都募捐支援罢工工人。他们的支援使这次罢工几乎坚持了一年之久，建筑工人终于赢得了胜利，工作日从十小时减到九小时半。六十年代初，美国北部和南部各蓄奴州之间的内战开始了。为黑人的解放进行斗争是同工人阶级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英国政府本来准备进行干涉，帮助南部种植园奴隶主。英国工人积极反对，阻止了这次干涉。在这同时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加强了。1862年，伦敦举行国际博览会，三百多名法国工人和二十多名德国工人前去参观。他们在那里会见英国工人，讨论了工人阶级状况，表达了国际工人阶级必须联合的思想。1863年初，波兰人民奋起，举行了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热烈支持。英国和法国的进步工人也热情声援波兰人民。欧洲掀起了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声援运动。一系列的事件表明，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 1863年11月，英国工会联合会致书法国工人，呼吁国际团结；邀请法国工人组织派代表到伦敦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会议，声援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压迫的斗争。呼吁书里沉痛指出，每当英国工人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罢工的时候，资本家总是从国外雇来工人，破坏了罢工。因此，“为了工人大众的事业，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法国工人广泛地讨论了英国工人的呼吁书，派出代表前往伦敦。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一所大厅圣马丁堂举行大会。法国的代表宣读他们的答复书，表达了国际工人应该团结一致的感情，并且呼吁：“全世界渴望自由的工人们！该轮到我们自己召开大会了。”出席圣马丁堂大会的不仅有英法的工人，还有德国、

意大利、波兰等国的工人。马克思以德国工人的代表应邀出席了大会。

那天晚上，圣马丁堂挤得满满的，将近两千人在这里集会。大会热烈赞同法国工人的“旨在促进工人的团结”的建议，决定成立国际工人组织；又选出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个组织的规章，并“享有为自己补充新委员的全权”。被选人临时委员会的有英、法、德、意等国的工人代表，马克思作为德国的工人代表当选。这个组织在 10 月间正式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__由于圣马丁堂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选出了领导机构，所以被公认为是第一国际的成立大会。

圣马丁堂选举出来的临时委员会，在 1864 年 10 月初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英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制鞋工人乔治·奥哲尔当选为委员会主席，英国木工和细木工联合协会的创建人之一的威廉·兰德尔·克里默尔当选为书记。马克思名义上只是委员会的委员、德国的通讯书记，实际上“一直被公认为该协会的领袖”，几乎国际所有的纲领性的文件和决议草案，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或是体现了他的思想。但是马克思极其谦逊，从不显示自己在国际中的领导作用。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没有直接参加国际的工作。但是他同马克思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国际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马克思受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11 月 1 日，已被确认为“国际”领导机关的临时委员会__批准了这两个文件。

在成立宣言里，马克思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说明从 1848 年到 1864 年资产阶级的财富空前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却丝毫没有减轻。他指出，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在 1850 年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 50%，这个国家的贫苦现象就消除了。事实是从 1843 年到 1863 年，英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两倍，而那些处境贫困的人们依旧贫困。在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各国，也象在英国一样，财富的增长完全局限于有产阶级。马克思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说：在现行制度下，“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或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宣言进一步指出，占有社会财富的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一定利用政治特权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至死不放，“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宣言又强调说，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组织起来，团结合作。这个宣言也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作为结束语。

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里，__一开头马克思就揭示了这些思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章程阐述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目的时说：“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机构，以代表大会为最高机构；大会闭会期间，职权集中于代表大会选出的总委员会；总委员会负责报导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召开代表大会，向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指导参加国际的各组织的活动。章程还强调了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必要性和建党目的。它说：“工人阶级这样组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__

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国际联合组织，这个要求因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而实现了。国际不仅团结了不同国籍的工人，而且还团结了具有不同思想和政治观点的工人，如工联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拉萨尔派等等。马克思指出：“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因此，国际成立了，而把国际的活动纳于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还须有一个斗争过程。

日内瓦大会 国际工人协会一成立，就积极在各国建立支部。

当时，英国工人具有实力强大的群众组织——英国工会联合会。在国际建立之初，英国工联是它的主要群众基础和支柱，英国人在总委员会中占有多数并不是偶然的。1865年初，成立了巴黎支部，全部会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包括昂利·路易·托伦和欧仁·瓦尔兰。由于普鲁士禁止本国人参加外国团体，德国支部在欧洲革命流亡者的中心瑞士建立起来。比利时、西班牙和美国支部也相继建立。1865—1866年，在法国的里昂、卢昂、马赛、波尔多成立了国际的新支部。到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内瓦大会召开时，已经建立了二十多个支部。

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66年9月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总委员会和各支部的代表共六十人参加。马克思草拟了许多指示，交给总委员会的代表带往日内瓦，他自己忙于著作，没有参加大会。大会议程主要包括：有关劳资斗争的问题，工会问题，合作社问题，缩短工作日问题，女工和童工问题等。大会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有激烈争论。争论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之间展开。

1865年，蒲鲁东死去，但是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比较多的国家里，蒲鲁东主义的信徒较多。当时法国的工人运动基本上被蒲鲁东主义者控制。他们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人，巴黎支部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派出了以托伦为首的庞大的代表团，包括十七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坚持蒲鲁东的观点，相信用建立合作社和互助会等办法就能解放劳动者。在大会的讨论中，他们处处同马克思主义者对立。大会讨论和批准国际章程的时候，他们反对马克思所提的组织国际的目的任务，妄图把国际降低为一个国际性的交换合作机构，为国际的会员在本国和欧洲各国寻找职业。大会驳斥了他们的主张，通过了马克思原来起草的章程。

日内瓦大会讨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劳动反对资本斗争中的国际互助问题。马克思拟订的指示指出，反对资本家利用外国工人来破坏本国工人的罢工，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一项主要任务。蒲鲁东主义者却企图证明，在生产中，资本家和劳动者是同样必要的，不主张强调劳资矛盾。这种否定无产阶级斗争必要性的论点被大会否定了。大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要“保障工人免受资本家在本国工人罢工时吸收外国工人做工、以阻止工人实现自己的要求的阴谋诡计的损害”。

关于工会的性质和作用问题，马克思草拟的指示指出，工会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产生的，并且成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成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一支伟大力量。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斗争，应当支持抱有上述目的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不应当过分地把精力放在工人的日常生活问题上，因而置身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之外。蒲鲁东主义者否认工会有存在的必要，更反对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大会的决议号召各国工人组织工会，肯定了马克思的指示。

在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上，蒲鲁东主义者硬把合作社看作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大会的决议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方面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单凭合作社本身不能使工人阶级得到解放，只有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才能起改造社会的作用。在女工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妇女做工是近代大工业发展的结果，工人的任务不在反对妇女做工，而在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蒲鲁东主义者反对妇女做工。在他们看来，妇女的职责应当是照料家庭，服侍丈夫和子女，应当回到厨房里去。在这些问题上，大会的决议同样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蒲鲁东主义者在日内瓦大会上的失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会后不久，马克思在一封信里肯定日内瓦大会开得好。他说：“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他还批评了蒲鲁东主义者，指出他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

从日内瓦大会到巴塞尔大会 日内瓦大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每年举行一次：1867年在瑞士洛桑，186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1869年在法国和瑞士交界的巴塞尔。

那时候，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又爆发了经济危机。1866—186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上1866年的普奥战争，激起了美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罢工浪潮。第一国际发动各国支部大力支援了各国工人的斗争。1867年，伦敦成衣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罢工。总委员会劝告德国成衣工人不要进入英国，还发动欧美一些国家工人从物质上支援英国罢工工人。这些支援使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同年，巴黎铜匠为组织工会遭到企业主解雇，请求总委员会支援。国际发动各支部声援巴黎铜匠的斗争。企业主慑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声势，被迫让步。1868年，日内瓦建筑工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遭到企业主的断然拒绝，因此罢工。国际日内瓦支部召开群众大会声援这次罢工，捐款从各地源源汇来。企业主终于不得不把工作日缩短一小时，把工资提高十分之一。国际的威望日益增长，并使许多国际的支部得到很大的发展。

1867年和1868年是国际工人协会历史上划时代的两年，它“在平稳的发展时期之后，它的影响大大增强，以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恶毒诽谤和各国政府的迫害。协会进入了斗争阶段”。例如在法国，拿破仑三世的反动政府加紧镇压国际的拥护者，1867年和1868年两次迫害国际的成员，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审判，结果，国际的巴黎支部被查封，它的领导人被处罚金。但是，这种迫害并没有达到法国统治者所期望的结果。

从洛桑大会起，关于所有制问题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蒲鲁东主义者主张土地应归个人所有。托伦说：“我的公式是，土地归农民，贷款给产业工人。”还有瑞士个别代表随声附和。托伦的公式概括了蒲鲁东的观点：保存小私有制，又搞信贷银行。洛桑大会重申了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且决定每届大会都要重申这个主张。但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代表们建议把它放到下次大会上讨论。1868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作出的决议指出，矿山、煤井、森林、铁路等应当属于全社会所有；土地也应当宣布为国家的财产，由国家分给农业合作社使用。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不甘失败，仍然对土地所有制问题纠缠不休，巴塞尔大会又作出了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决议。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蒲鲁东主义的最后胜利。

从布鲁塞尔大会到巴塞尔大会，国际工人协会处在全盛阶段，欧美的会员达到二百万人。在国际内部，蒲鲁东派发生了分化，蒲鲁东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日益缩小。以瓦尔兰为代表的蒲鲁东主义者，逐渐抛弃旧观点，向马克思主义靠拢。他们赞成生产资料公有制，认为工人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左派，通称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1868年9月，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第二时期（1869—1872年）的开始。如果说国际的第一时期（1864—1868年）国际内部的主要斗争是反对蒲鲁东主义，那么第二时期则主要是反巴枯宁主义。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出生于俄国一个贵族家里。他当过沙皇军队的军官，因为反对沙皇被放逐国外。他参加过1848年德国革命，被捕后押回俄国，遭到长期监禁。1861年，他逃往西欧，成了蒲鲁东的信徒。但是他放弃了蒲鲁东的通过合作道路消灭国家的观点，主张以暴力摧毁国家机器。但是他同蒲鲁东一样，不仅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且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巴枯宁口头上大谈人民，实际上完全不理解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反而把流氓无产者看作真正的革命力量。他反对在人民中间进行有组织的革命准备工作，幻想在一夕之间暴动起来，实现他的梦想，即国家为“无政府状态”所代替。他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和瑞士部分地区网罗了一批追随者，组织了宗派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1868年，他申请加入国际。国际要他解散他的宗派组织。他阳奉阴违，混进了国际。

在巴塞尔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主义者在继承权问题的讨论上展开了斗争的序幕。巴枯宁主义者硬说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认为消灭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继承权是私有制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的起因，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继承权。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决议，但是挫败了巴枯宁钻进总委员会以便篡权的活动。

到1870年，第一国际几乎在欧洲各国都建立了支部。它的影响已经遍及广大的工人群众。在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已经战胜蒲鲁东主义，正在同巴枯宁主义斗争。它在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在群众中日益广泛地传播起来。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洛桑大会期间，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布鲁塞尔大会作出了专门决议，指出马克思在经济学家中第一个对资本进行科学的分析，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号召国际工人学习《资本论》。《资本论》的出版，是马克思二十多年辛勤劳动的结果。

早在编辑《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为反对普鲁士当局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第一次遇到要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流亡巴黎期间，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1848—1849年，他须全力以赴进行政治斗争，才中断了这项研究工作。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在研究工作方面实行了某种分工。马克思专攻政治经济学、世界史和欧洲各国的对外政策。恩格斯在军事学、语言学方面，并且后来更加奋发地在自然科学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当时，马克思生活困难，为挣钱维持生活，他得经常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以致如他用于研究工作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

他的研究，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英国博物馆里，埋头钻研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那种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重要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发现了并且证实了凝聚在商品中的物化劳动的二重性。这二重性就是：商品一方面具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具有价值——凝聚在商品中的商品生产者的物化劳动。这一发现，为解答政治经济学的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并且为他后来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学理论所作的内容广泛的经典论述做了准备。

从1842年到1867年，马克思的历时二十五年的经济学研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了写这部《资本论》，马克思读了一千五百多本书，做了摘记，充分利用了这些书。联系到那些年为创立国际工人协会和党的领导工作，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阐述资本与劳动之间，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经济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使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他说明资本是怎样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增长起来的，它又怎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来到世间的。

为什么资本会产生并且增多，而劳动群众仍然处于贫困地位？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能解答的问题。马克思根据他揭示的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这个谜，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明了这个问题。具体说，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劳动力以获取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商品。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力的价值所决定的。一个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问题在于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付给他劳动的全部价值，只是劳动的部分价值，而另一部分价值即剩余价值就落到资本家口袋里了。这就证明了，资本家也同奴隶主和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这就从根本上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给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恩格斯评价《资本论》时说：“自地球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

第十四章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

第一节 普法战争

战争的起因 萨多瓦战役决定性地结束了普奥战争，又标志着另一次战争——普法战争开始酝酿了。

普鲁士国王本来要乘胜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却竭力劝阻。他说：“我们必须先在法国还来不及对奥地利采取外交行动施加影响以前，迅速结束战争。”事实上，他已经在考虑下一步了。奥国战败，普鲁士崛起，意味着法国优势的消逝。这正如法国政客梯也尔在萨多瓦战役之后哀叹的：“已经发生的事对法国说是四百年来所遭受的最大的灾难。”拿破仑三世内心烦恼，表面故作镇定。他幻想普鲁士因其权势的增长而让法国得到补偿。但是论力量，论意志，论手腕，他都敌不过俾斯麦。

还在普奥议和以前，拿破仑三世就命令法国驻柏林大使向普鲁士传递信息，如果普鲁士同意法国的东北部领土扩展到莱茵河西岸，法国就能赞同普鲁士在德意志境内的领土吞并。俾斯麦开头不表示意见，要法国大使就法国的要求写成书面照会。法国一提出正式要求，立即遭到拒绝。俾斯麦还借报纸之口，把法国的要求暴露出去，使法国在外交上遭受一次丢脸的挫折。但是，拿破仑三世心犹不死，相继要求吞并比利时、卢森堡。比利时的独立是得到欧洲许多国家包括法国的保证的；卢森堡当时同北德意志同盟的关系密切。这些要求都一一遭到普鲁士的反对。因此，普法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普鲁士参谋总长毛奇期待战争的到来。他说：“没有什么比战争更受欢迎，它终究是必来的。”为了稳定他那摇摇欲坠的统治，拿破仑三世也把对普战争看作手中的王牌。

1870年夏，欧洲局势似乎特别宁静，突然间，战争风云因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而起来了。

早在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萨伯娜因陆军和海军的反对而流亡国外，王位虚悬。西班牙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到那里去找一个合适的君主呢？一两年间，考虑了七个候选人，终于在1870年6月选择了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族的一个亲王利奥波尔德。这引起了法国的嫉妒、恐惧和不安，抗议发到柏林，形势紧张起来。法国外长格腊蒙在议会发言指出，如不撤销这个候选人，法国将把它看作战争的原因。法国总理奥利维耶接着说：“政府希望和平，衷心希望和平，但必须是体面的和平。”俾斯麦是支持利奥波尔德登上西班牙王位的，始终以对法挑战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利奥波尔德经过一些人劝说，在7月12日放弃作为候选人的资格，一场风暴似乎过去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法国政府犯了致命的错误，命令它的驻柏林大使直接要求普鲁士国王保证今后也不支持霍亨索伦王族的人继承西班牙王位的要求。7月13日，普王在休养地埃姆斯彬彬有礼地接见了法国大使，但是拒绝了法国的无礼要求。当天下午，普王接到利奥波尔德的决定的消息，立即派人告诉法国大使，说他认为事情已经结束了。

俾斯麦对普鲁士国王同法国大使的谈判深感不满，曾想辞职以示抗议。就在这时，他收到国王从埃姆斯发来的电报。国王在电报中说到法国大使提出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说到他得悉利奥波尔德的决定以后，即派随从告诉法国大使，说事已过去，他不再为此事会见他了。电报还允许俾斯麦把事件

原委通知报界。俾斯麦接到电报的时候，正值他同陆军部长房龙和总参谋长毛奇共同进餐。他问他们对法作战能否确保胜利，他们对他作了肯定的回答。俾斯麦提笔修改电报，然后把电报送交报界。消息一发表，在普法双方都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在普鲁士人方面，认为法国提出了无礼的要求；在法国人方面，认为普王无理拒绝接见他们的大使。双方都以为自己一方受了侮辱。法国政府认为，为了维护它的尊严，必须进行战争，作出了开战的决定，并且得到议会的支持。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

普法战争的爆发有它复杂的原因，埃姆斯电报只是一根导火线。而且导致战争爆发的还不是因为埃姆斯发生了什么事，而是因为对此事的歪曲报导。

普法战争 战争开始，欧洲普遍相信法国将赢得胜利，因为法国军队是欧洲当时第一流的军队，训练有素，很有战斗精神。法国当局十分自信，首相奥利维耶说，他是怀着“轻松的心情”宣战的。陆军部长在议会里吹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连士兵绑腿上的最后一颗钮扣都准备好了。法国的主力作战部队莱茵军团以进攻的态势部署在德法边境上。7月28日，拿破仑三世到达洛林的战略要地麦茨，第二天接受了指挥大权。当时，德军__的集中远未完毕，如果法军突袭渡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等地进攻，就可以截断德意志的南北联系，打乱普鲁士的动员工作，各个击破从各地开到战场上的德军。但是，拿破仑三世发现，他面对的敌人不是一个普鲁士，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他现有的兵力不足以发起主动的进攻。同时，法国国家机器的腐朽立刻暴露出来，例如军事准备不足，军需品迟迟供应不上，拖延了军事行动。8月初，到达前线的德军已经取得了兵力上的优势，它的炮兵、侦察、地理知识都胜过法军，民族感情迸发。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权转到了德军手里。

8月4日，德军攻击法军右翼前哨维桑堡，首战告捷，打开了进入法国亚尔萨斯的门户。法国急欲报复，巩固军心，莱茵军团右翼指挥官麦克马洪把所属部队调向维桑堡方面。8月6日，德法两军在维桑堡西南的维尔特会战，法军又被赶出阵地。同一天，德军在洛林的福尔巴赫战役中，__又击败了法军中路主力。三天之内，法军在边境三战中连续失败。莱茵兵团从边境上退却，德军跟踪追击，战争移到了法国境内。

边境三战失败，奥利维耶内阁倒台，八里桥伯爵取而代之。实际大权掌握在皇后欧仁妮手里。麦克马洪率领的右翼法军，急向夏龙退却。中路和左翼法军，向麦茨退却。法军究竟应当退到哪里，成了关键性的战略问题。军事专家普遍赞同把前线法军撤到巴黎附近，准备在巴黎毗邻地区打下一次战役。但是巴黎方面深恐法军退到巴黎会引起革命，危及第二帝国的统治，决定让拿破仑三世和巴赞统率的法军退守麦茨。拿破仑三世把指挥权交给巴赞，自己到了夏龙。当时，德军一、二军团尾随巴赞，迂回到了麦茨的西南；第三军团楔入麦克马洪和巴赞统率的两支法军之间，不容他们会合。巴赞犹豫不决，直到麦茨已经被围，才决定突围而出。8月16日和18日，两支法军分别在马尔斯—拉—土尔和格腊维洛特被德军击败。他们同巴黎的联系被切断了，二十万人被困麦茨。这是战略错误的一个结果。

麦克马洪在夏龙得到增援的人数不少，士气很低。这支军队开到哪里，又是一个战略决策问题。同样出于政治原因，巴黎坚持要麦克马洪带领部队解麦茨之围。楔入巴赞和麦克马洪两部分法军之间的德军第三军团，威胁着麦克马洪部的侧翼，使他不能直接向东行军，只好绕道北路。德军以其优势

兵力，围城打援，双管齐下。8月30日，麦克马洪到达色当一带。从8月底到9月1日，麦茨法军突围，经过三十多小时的苦战而失败。色当城下会战，法军一再受挫，麦克马洪负伤而临时易帅。法军被赶进色当城内，9月2日，色当投降。随麦克马洪而来的法国皇帝以及元帅、将军、官兵总共十万四千人都作了战俘。巴赞的部队没有解救出来，麦克马洪的部队又赔了进去，这是战略错误的另一结果。

色当投降标志着普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此后，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了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

巴黎革命和“国防政府”投降 色当投降的消息传来，最初巴黎不相信是真。9月3日，八里桥伯爵宣布了拿破仑三世打来的电报：“军队已被击败并已成为战俘，我自己也是一个战俘。”议会还希望能控制局面，有些政客幻想在名义上保持皇后的权力。但是巴黎人民已经行动起来，9月4日的革命把第二帝国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组织临时政府，名为“国防政府”，以巴黎总督特罗胥为其首脑，兼任陆军部长；以法夫尔为外交部长，甘必大为内政部长。皇后欧仁妮为了逃避人民的惩处，悄悄逃到英国去了。

德军取得色当战役的巨大胜利，继续深入。它的第三军团和色当战前建立的第四军团，直搏巴黎，9月19日开始围城。巴黎有八万正规军，十一、二万流动自卫军；还有经过扩充最后人数达到三十万以上的国民自卫军，其中由工人组成的各营是十分自觉并坚决作战的。围城期间，资产阶级共和派著名代表人物、内政部长甘必大乘汽球飞出巴黎，到外省组织援军。他以旺盛的精力和爱国热忱到处号召，组织了六十万人的队伍。战争的第二阶段，法国的局面并不是注定无望的。

巴黎的攻守战成为胜负所系的中心环节，麦茨法军的命运又关系到战局的发展。但是，巴赞是第二帝国的鹰犬，他不是全力作战，却一心想恢复第二帝国的统治。麦茨军民都愿继续战斗，当地的供应并未枯竭，而巴赞却于10月27日率领十七万三千法军向德军投降了。听到麦茨投降消息，甘必大惊呼：“巴赞背叛了我们。”此后，围困麦茨的德军第一军团开往巴黎以北地区，第二军团开往巴黎以南地区。他们牵制和打击了法国新组成的、准备开往巴黎解围或同巴黎守军配合作战的军团。“国防政府”首脑特罗胥犹豫不决，害怕巴黎人民甚于外敌，组织巴黎出击软弱无力，甚至有意造成重大伤亡，破坏抗敌情绪，企图让军民相信不可能继续保卫巴黎，为他的投降政策制造一个借口。法国的形势不断恶化，1871年1月，在巴黎西南的勒芒战役、北边的圣昆廷战役和东南的贝尔福战役中连续失败。1月28日，“国防政府”的外交部长法夫尔同俾斯麦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卖国的“国防政府”向德国投降，普法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

第二节 巴黎公社

1871年3月18日革命大敌当前，巴黎人民容忍了“国防政府”存在，事实上既不相信它有实行共和制的诚意，又不相信它有保卫法国的决心。他们除了扩大国民自卫军以外，还在巴黎二十个区建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各区警备委员会，并由各区代表组成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对政府起着监督作用。此外，巴黎还产生了许多俱乐部，反映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随着“国防政府”的卖国行为日益明显，巴黎人民要求建立革命政权——巴黎公社。为此，巴黎人民曾在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2月22日两次发动起义，但是两次都被“国防政府”镇压下去了。巴黎被围期间，巴黎武装人民是巴黎的坚强保卫者。“国防政府”签订投降协定以后，巴黎人民仍然是武装的，掌握着步枪和围城期间由人民捐款筹造的大炮。

按照1月28日投降协定，法国必须选举议会，组织政府，签订和约。2月上旬选举，结果有共和派二百人（都计整数），奥尔良派二百人，正统派二百人，波拿巴派三十人当选。换句话说，保皇派占有议员席位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议会在波尔多开会，推举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政客、法国无产阶级的敌人梯也尔为政府首脑。2月26日，梯也尔政府同德国签订和约草案，答应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给德国，赔款五十亿法郎。

议会开会的那一天，法夫尔装腔作势，宣布“国防政府”结束，同时不打自招地说：“我和我的同僚认为，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打击无政府状态，阻止首都的可耻的暴乱。”梯也尔政府同“国防政府”的本质一样，目的相同，签订和约草案以后，就得到俾斯麦的同意，抽调三万六千军队开到凡尔赛。他磨刀霍霍，首先要解除巴黎人民的武装。

巴黎革命人民警觉地注视形势的发展。2月底到3月初，国民自卫军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并且加强了武装。

3月15日，梯也尔来到巴黎，准备镇压人民。当时，巴黎有一个正规师约一万二千人 and 三千宪兵。梯也尔又取得俾斯麦的同意，向巴黎调进军队。3月18日前，反动政府在巴黎约有三万军队，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国民自卫军约四十个营，实际上是没有战斗力的。3月17日晚，梯也尔主持军事会议，批准了反革命的军事行动计划。

3月18日清晨三点钟，反动政府的军队向巴黎市内许多军事据点出动，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强制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们大部分向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进发，准备以突然的袭击夺取那里的大炮。他们的袭击出乎国民自卫军的意料。拂晓时候，两个高地都被占领了。

军队的行动惊醒了全城的居民。他们抢夺大炮的消息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从一条街传到另一条街。人们出现在街头，国民自卫军急忙拿起武器奔向停炮场，妇女和儿童围着反动政府的军队。警钟到处响起来。蒙马特尔各条小路上的士兵都被人群围着。人们喊道：“你们要把大炮偷运到柏林去！”士兵惶惑起来，军心涣散了。他们拒绝军官发出的向人民开枪的命令，并开始同人民联欢。

中午，国民自卫军重新占领梭蒙高地和蒙马特尔高地，接着在市区各地展开进攻。梯也尔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出巴黎。所有高官显贵、将军、宪兵、警察、部队都跟在他后面，逃往凡尔赛。晚上，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巴黎市政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迁到了那里。其他政府机关的建筑物和交通要道

都由国民自卫军控制了。

3月18日起义是梯也尔反动政府发动的袭击挑起来的。国民自卫军被迫应战。3月19日早晨，当巴黎人醒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已经掌握了首都的统治权。

巴黎公社成立 3月19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发布了几个文告，宣告“巴黎人民终于挣脱了别人一直想强加于他们的桎梏”，希望“让巴黎和法兰西共同来奠定共和国的基石”。它以襟怀坦白的态度指出：“我们无意于谋取刚被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决定“3月22日举行选举，以选出巴黎市政委员会”。

梯也尔窜出巴黎的时候，不但大批官员跟着逃走，而且军队、警察、宪兵也一齐溃退，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两大支柱都垮了。但是，在建立新政权的道路上，巴黎革命人民的道路并不是畅行无阻的。那些留在巴黎尚未逃跑的旧官员，很多还按梯也尔的命令行事，实行总工；梯也尔暗派高级将军到巴黎，妄图集结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国民自卫军营队，对抗工人营队；巴黎二十个区的区长们，奉梯也尔反动政府之命，借着同中央委员会谈判选举问题，拖延时间，阻碍选举；一批反革命分子一再捣乱，在巴黎组织示威游行。就当时形势看，选举并非当务之急。就战略说，中央委员会应该趁3月18日的革命胜利时机，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进军凡尔赛，捣毁反革命巢穴。因此，马克思认为，拒绝进军凡尔赛和主张过早地进行公社选举，是中央委员会的主要错误。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克服了区长们的阻挠，终于在3月26日举行了巴黎公社委员的选举。那一天正好是星期日，选民踊跃参加投票。在工人住区，情况热烈，选民成群结队而来，队前红旗招展。但是也正如所料，在资产阶级住区，许多人拒绝投票，情况冷清。总的看，这次参加选举的人数，都比前前后后的人数多。按照事前安排，巴黎二十个区按人口多少的比例，总共应选出公社委员九十名。结果由于几个候选人同时在几个区当选，实选出八十六人。3月28日，在市政厅广场上，万众沸腾；国民自卫军的好多营队，威武雄壮地排列在那里。“二十万获得自由的人民前来欢庆自己的自由，并在隆隆的炮声中宣布新制度的建立。”

巴黎公社的委员们正式就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成立了。

3月下旬，在里昂、马赛、图卢兹等城市，革命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以巴黎3月18日革命为榜样，在当地起义，虽然只存在了短短几天，也一度建立了公社政权。

巴黎公社的组成 公社当选委员八十六人，不久有二十一人或拒绝参加或退出。经过4月16日补选，实际参加公社的委员最多时共七十九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按政治见解分，公社委员分属于布朗基派、雅各宾派、蒲鲁东派，也有少数无党派人士。一开始，公社成员就隐约分为两个集团：布朗基派和雅各宾派以及大部分无党派委员构成的“多数派”；蒲鲁东派成为“少数派”。无论在“多数派”或“少数派”里，都有许多第一国际的成员。

蒲鲁东派的瓦尔兰是公社的著名人物。他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做过装订工人，在巴黎很有威望。他积极参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工作，

领导巴黎工人运动，曾受到第二帝国政府的迫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委员。巴黎公社选举，他在三个区里同时当选。首饰工人出身的弗兰格尔、染色工人出身的马隆、机械工人出身的亚西、冲压工人出身的泰斯、教员出身的勒弗朗赛、银行职员出身的茹尔德都是蒲鲁东派的代表人物。在布朗基派中间，爱德华·瓦扬对科学社会主义很有研究，学识丰富。新闻记者出身的爱德和费烈、参加过激进报刊工作的里果、铸工出身的杜瓦尔、锅炉工人出身的沙尔东、铁路职员出身安·阿尔诺、布景工人出身的兰维埃都是布朗基派的代表人物。雅尔宾派的代表人物有老革命家德勒克吕兹、 当过律师和新闻记者的加姆邦和艺术家比约勒等。

公社成立以后，立即以建设新政权为中心任务。3月29日的公社会议，决定设立相当于政府各部的十个委员会，即执行、财政、军事、司法、公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联络、社会服务和教育委员会。其中的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一切法令和其它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它是一个常设机构，设在巴黎公社的所在地市政厅，具体代表公社，但并不是高于其它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公社的一些委员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对权威怀有偏见，拒绝建立一个领导中心，更反对实行一长制。

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出现了“人人都发命令，你也发，我也发”的情况，出现了“各机关存在无政府状态”，加上对敌斗争的紧迫性，许多公社委员要求改进领导体制。在4月20日和21日的公社会议上，决定由公社根据多数票选出九名代表，分别负责指导财政、军事等九个委员会的工作，并由他们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行政权暂时托付给联合起来的、由九个委员会各产生一名的代表们”；九个委员会实行改组，各由新选出的五名委员组成。经过这次改进，权力略有集中，执行委员会与一切部门保持了直接联系。

巴黎公社的业绩 巴黎公社在建设新政权的同时，作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尝试，以革命实践证明了“打碎”它的必要性。公社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公告：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政权”，“除国民自卫军以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接着公社取消了旧警察，封闭了旧法院，实行教会同国家分离。

在社会经济方面，巴黎公社也实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它下令免除从1870年10月到1871年4月的房租，已付的房租算作未来的房租；禁止拍卖典当在当铺里的物件；规定公社职员的薪金最高不得超过工人的最高工资即六千法郎。公社命令登记一切逃亡厂主的工厂，把它们交给本厂的工人管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它向社会主义革命迈进了一大步。为了保护工人的健康，公社废除了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主对工人课罚金，取消了盘削工人的借贷处，关闭了旧日警察机关控制的工作介绍所。公社宣布了免费义务教育的原则，开办了一些学校，给劳动人民的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这些措施都表明了无产阶级政权怎样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特别有意义的是它们有的已经触及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巴黎当时象个孤岛。它的东部和东北部由普鲁士占领军所盘踞，西部和南部由反动政府军队所包围。公社不能同广大农民直接联系，但是仍然关心农民的解放，希望农民“帮助巴黎打胜仗”。它发布的告农民书上说：“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正是你所希望的；我所争取的解放，也是你的解放。”告农民书还宣布了公社的斗争目标：“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由于巴黎受围困，告农民书是用汽球携带散发

出去的。

在实现无产阶级民主方面，巴黎公社也采取了重大的措施。公社委员会是由民主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的人员组成的。公社又把全体公职人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作为自己的一条原则。除了公社委员以外，国民自卫军从排长到营长等基层军官由选举产生；而且准备在环境许可时，选举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这就保证了人民可以把大家信赖的人选出来担任公职。其次是公职人员必须接受选民的监督，须向自己选区的居民汇报工作，听取批评和建议。对于失职和不称职的公职人员，公社还实行了随时撤换的原则。为了保障人民行使监督权利，公社又郑重宣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联系到公社人员最高工资的限额，反映了公社委员的高尚革命精神：担任公职是作人民的公仆，而不是做官当老爷；要为人民服务，而不追求任何特权。

在短短的时间里，在对敌斗争的紧迫的环境下，巴黎公社作出了不平凡的、带有开创性的业绩，其秘诀在于与革命群众声息相通，甘苦与共，能听取群众意见，接受合理要求，及时作出决定，采取措施，付之实行。举例说，把逃亡厂主的工厂交给本厂工人管理，有关房租和当铺抵押品的处理，都是根据工人的需要提出来的，有关法令又是直接采取工人的意见拟订的。

巴黎公社进行的是翻天覆地的事业，缺乏经验，不免有些错失。除了前面说到的过早举行选举、没有及时捣毁反动巢穴以外，又对法兰西银行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当时法兰西银行拥有各种资财达三十亿法郎，又是反动势力在巴黎的集中点。公社存在期间，公社从它那里提取的款项不过一千五百万法郎；而它供给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却达二亿五千七百万法郎。公社不对法兰西银行实行“剥夺剥夺者”的原则，恩格斯指出这是重大的政治错误。

保卫公社的战斗 4月2日，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军队从巴黎西面对公社发动了进攻。革命同反革命的武装斗争揭幕了。从那时起到5月20日，战斗在巴黎西城和南城外进行。双方时而炮战，时而短兵相接。巴黎人民万众一心，奋起保卫自己的政权。在街头和前线，处处可以看到这样壮烈的情景：

“指挥官满身尘土，……士兵中有白发老人，有金发青年，有六月起义的老战士，有理想的新拥护者。往往有父子并肩走在队伍中。”

“妇女们鼓励自己的丈夫去参加战斗，给丈夫送衬衣和饮食，完全象他往常在工厂做工时一样。有些妇女不肯回家，甚至拿起了武器。”

“在围城期间，有数千儿童担负了各种工作。他们跟随各营队，一直到壕堑和炮台里，他们以最大的热情坚守着大炮。”

4月6日，梯也尔任命麦克马洪元帅为总司令。麦克马洪曾在色当城下作过普军的俘虏。当时他只有几万军队，无力大规模进犯巴黎。为了增强反革命力量，梯也尔乞求普鲁士放还法国俘虏。到4月底，反动政府军队增加到十一万人，5月中旬又增加到十三万人。

随着反革命武装的加强，梯也尔加强了对巴黎的进攻，并且不顾城内居民的生命安全，炮击巴黎市区。公社社员奋勇反击，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加上公社委员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为建立“民众救亡委员会”而形成的对立局面，军事上日益不利。

一些炮台陷落了，在巴黎西南，反革命武装日益接近城区。5月10日，梯也尔反动政府同普鲁士签订了屈辱的和约，换得了普鲁士的暗中支持，全力来镇压革命的巴黎。5月21日，通过奸细的指引，反动政府的军队从西南方的圣克鲁门窜入了巴黎城。

巴黎的巷战开始了。公社战士在城内交通要道修建街垒，工作日夜进行，妇女儿童同成年男子并肩劳作。反动政府的军队挟其优势力量向前推进，公社战士处处浴血苦战。5月23日，一路反动军队得到普鲁士军队的允许，通过普军防线，突然从城北进攻蒙马特尔高地。同时反动政府的军队又加紧了在西城和西南城的进攻。中午，蒙马特尔高地陷落，波兰革命志士、投效巴黎公社的并牺牲。蒙马特尔是巴黎的战略据点。它的陷落是公社的严重损失。第二天，反动军队占领了巴黎市中心的市政厅。接着，公社的军事首脑德勒克吕兹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战线逐渐移向城东北。5月27日，反动政府的军队五千人围攻贝尔·拉雪兹公墓，守卫在那里的公社战士不到二百人。傍晚时分，敌军轰开公墓大门，进入墓地。公社战士步步以坟墓为掩护，在墓道之间进行白刃战，寸土不让，惨烈的战斗一直进行到深夜。他们都为公社事业流出了最后一滴血。

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梯也尔反动政府淹没在血泊中了。这一天，瓦尔兰也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

早在巴黎巷战开始的时候，梯也尔反动政府就开始大批屠杀被俘的公社战士。普鲁士军队阻止公社战士退出巴黎，更造成公社战士大批被俘。牺牲在梯也尔屠刀下的公社战士多达三万余人。被判徒刑和流放海外的又是数以万计。

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革命人民的灵活性、历史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充分估计了巴黎公社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巴黎革命人民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以自己的创造性作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公社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就是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它所提供的原则却是永存的。

从巴黎公社的社会经济措施中，可以看出，它们不仅反映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而且敢于开始触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实行无产阶级民主方面，巴黎公社也作了切实的尝试。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

当然，公社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这正好说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多么需要无产阶级政党和它的正确领导。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国际工人协会是国际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联合了各国工人对资本主义进行共同的斗争。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作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这就是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之间的血肉相关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同命运、共呼吸。3月18日革命发生以后，国际法国支部的许多成员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在公社委员会里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总委员会不断开会研究巴黎的形势，支持巴黎公社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使总委员会的成员和各国的国际的会员了解事件的进程；马克思写了几百封信给各国的国际支部，号召支援巴黎人民的革命事业。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3月底返回巴黎，后当选为公社委员，在公社期间积极同总委员会保持联系。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反动报刊的虚构：巴黎的革命是伦敦第一国际挑起的，是马克思策划的。“事实并不是象一些蠢才所想象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国际支

部从一个中心接受命令。”——“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

巴黎公社存在期间，马克思为维护和支持公社的革命事业竭尽全力。他先从赛拉叶夫人那里得到赛拉叶关于巴黎情况和公社各项措施的报告，后来主要通过经常在巴黎和伦敦之间做买卖的一位德国商人同巴黎公社成员保持联系。马克思或是写信给弗兰格尔和瓦尔兰，或是通过口头传达，要他们注意加强内部的团结，不要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浪费时间，要他们提防梯也尔同德国人勾结起来镇压巴黎革命。5月11日，马克思把普法签订正式和约的事通知公社，建议公社加强巴黎北部的防务，以免梯也尔反动政府的军队通过普军防线发动进攻而措手不及；要求把那些足以供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以便揭露他们。当巴黎陷于反革命屠杀时，马克思又设法取得许多护照，带往巴黎，帮助许多公社成员逃出法国。他不顾处境的险恶，于5月30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一八七一年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宣言揭露了法国的反动派，维护了公社的革命事业，总结了公社的经验。仇恨巴黎公社的各国资产阶级极为仇恨第一国际和马克思。在伦敦，甚至有人要控告马克思，企图使他遭受政治迫害。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反动势力猖狂一时。第一国际的法国各支部被破坏了。西班牙支部被官方禁止。在德国和奥国，国际的许多会员被捕。各国政府还进行谈判，企图宣布第一国际非法。国际的处境非常困难，而巴枯宁分子又在内部破坏，妄图篡夺领导权。1872年，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大会，马克思亲往参加，恩格斯同时出席。大会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作出决议，强调指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保证实现这一革命的终极目的——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大会多数代表肯定认为，巴枯宁企图在国际内部建立以彻头彻尾反对国际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决定把巴枯宁和他的死党吉约姆开除出去。鉴于国际在欧洲已经无法活动，大会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往美国费城。1876年，国际在费城举行会议，宣布国际解散。

第十五章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

第一节 十九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新突破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密切相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西方各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这都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十九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新突破提供了条件。

电能的应用 电能的应用开始于电磁学的发展。电和磁是两千多年前人类就已发现了的自然现象。十九世纪以前，人们还不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电和磁的理论上的重大成就要到电磁现象的实际应用时才有可能得到突破。在电的实验上，早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德意志人冯·葛利克制出了一件闻名一时的仪器——在托架上旋转着的硫磺球，当用手摩擦它时则产生静电斥力和静电引力现象。十八世纪中期，人们创制了改进的静电起电机，不久又设计出来了一种电容器——莱顿瓶。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意大利物理学家亚历山德罗·伏特制造了电池，这种电池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唯一的电源。1820年，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发现了电流可以使罗盘指针偏转，一劳永逸地把电学和磁学结合起来了。自此，电和磁的研究迅速开展。1831年英国工人出身的科学家法拉第（1791—1867年）进行了精心的实验，记述了电磁感应现象。他证明，电和磁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磁铁在电导体附近移动就能产生电流。他的发现意味着可以靠机械作用来发电，提供了发电机的理论基础。这就打开了电力时代的大门，为人类开辟了一种新的能源。但从法拉第的实验到生产上应用电力，中间还经历了五十年。1864年，另一个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麦克斯韦（1831—1879年）接受了法拉第的思想，把全部电磁现象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把它归结为一组数学方程。由这些方程可以推论出，自然界存在着电磁波，其传播速度同光速一样，而光不过是波长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电磁波。其后德国物理学家赫兹（1857—1894年）通过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

电磁学的发展促进了电能的利用，引起了第二次技术革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的发明，发电机创制出来，得到广泛的使用。八十年代初，法国学者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送电的方法；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把输电线结成网络，供电就象供应煤气和水一样。于是大功率的电站应运而生。发电站通过导线输送电能，再由电动机推动车床转动。使用电能后车床转速增大了，生产效率提高了，从此，人类进入了电力取代蒸汽力为主要能源的时代。

电能不仅应用于生产，而且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1876年美国贝尔发明电话，这是近代通讯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爱迪生1877年发明了记录和再现声音的录音器，由此而出现了留声机和各种结构的录音器械；1879年发明电灯；1882年发明电车；1893年发明电影放映机。1896年，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这些电气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生活和文明的进步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随着电能的广泛应用，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电力工业部门，它的发展非常迅速，成为“最能代表最新的技术成就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工业部门。”

内燃机的创制 化学工业的产生 电力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蒸汽机的改进

和内燃机的创制。因为如果要增加发电量，必须增加推动发电机的原始发动机的功率。蒸汽机经过改进，功率提高到几千马力，不过装置还存在有笨重和速度低的弱点。这又推动了内燃机的创制和应用。内燃机是六十年代发明的，但性能还存在问题。到了八十、九十年代，德国发明家卡·本茨提出了内燃机的设计，这种发动机使用轻液体燃料。后来，德国工程师狄塞尔作了改进，设计出一种效率较高的内燃发动机，使用重液体燃料。内燃机不需要锅炉，比蒸汽机方便得多。它在工业和运输业的各部门得到推广使用，也为汽车和飞机的发明解决了发动机装置问题。

内燃机使用液体燃料，需要大量石油，这就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美国内战前夕就发现和生产石油，但最初只用于照明，随着内燃机的应用，才大量开采石油。1870年，全世界生产石油八十万吨，到1900年增加至二千万吨。从这时起，列强开始了争夺世界石油资源的斗争。

化学工业的建立也是十九世纪晚期技术的一项重大成就。化学工业不仅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原料加工，而且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物质。八十年代起，人们就开始从煤炭中提炼氨、苯、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1884年，法国人圣·夏尔车发明人造纤维。后来人们开始用粘胶丝生产人造丝。1867年，诺贝尔发明炸药，八十年代又改良了制造无烟火药的技术，并在军事上得到广泛应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人发明了从煤炭中提取轻液体燃料的方法，制出合成汽油。这又具有很大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意义。

交通工具的进步 十九世纪晚期，交通运输方面又有新的革新。首先，由于铁路网的迅速增长（1870年为二十万九千多公里，1913年增为一百一十万四千多公里），运输量的迅速增加，列车数量和行车速度的不断提高，铁路技术因此受到推动而有不断改进。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间，铁轨完全改成了钢轨。1880年，在阿尔卑斯山建成十五公里长的圣哥大隧道。1885年，英国开凿了七公里长的塞汶河隧道，这是当时最大的水下隧道。与此同时，机车的功率、牵引力、行驶速度、重量和体积等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九十年代，许多国家都试图用电气牵引机车，在城郊和一些城市间出现了电气铁路线。

十九世纪末，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汽车出现了。1885—1886年，德国工程师卡·本茨和格·戴姆勒设计了第一批汽车模型。同年，本茨设计的由内燃机推进的世界第一辆汽车，首次在慕尼黑街道上行驶。美国人吸取了欧洲人制造汽车的技术，1892年首次制成第一辆汽车。第二年，美国人福特试制成功的汽车，每小时能走二十五英里。九十年代起，汽车工业在许多国家逐步发展起来。1895年，爱尔兰发明家约·邓禄普采用橡胶充气轮胎，改善了行车的条件，使汽车更加广为流行。自从汽车问世之后三十年间，全世界已拥有汽车二百万辆了。

轮船制造技术也有了惊人发展。六十年代末开始采用活塞蒸汽机，1894—1895年又第一次试用蒸汽涡轮机代替活塞发动机。蒸汽涡轮机具有巨大的推动力，以它作为轮船的动力机器，就使轮船的功率和速度大为增加。大型轮船以前横渡大西洋需要七天，现在已缩至五天。

多少年来，人们梦想能够象鸟那样飞翔，能够平步登天，凌空漫游。人们曾制成滑翔机，使它们飞翔天际，但是空中的交通运输要到飞艇和飞机发明以后才得以实现。1896年，德国设计师G·捷尔费尔特解决了飞艇上采用以液体燃料发动的内燃机后，促进了飞艇的生产。飞艇比空气轻，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制成比空气重的飞机，试飞成功，开辟了航空的新纪元。 —

军事技术的革新 十九世纪末，欧美许多国家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引进军事部门，使军事技术发展起来，枪械的自动化得到极大的进展。1883年，美国工程师海·马克西姆发明重机枪，轻机枪也相继出现。机枪是一种杀伤性强的重要武器，日俄战争以后，欧洲军队广泛使用。大炮的性能也有很大提高，射程从三公里提高到七公里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大炮射程达十六——十八公里。大战期间，德国还制造了射程达一百二十公里的远程大炮，用以轰击巴黎。在发动机改进的基础上，英国发明了坦克和装甲车，英国人称坦克为陆地巡洋舰，是进攻中具有很大威慑力量的重要武器。海军舰艇也有很大革新。二十世纪初英国造成巨型军舰——无畏舰。它的排水量达一万八千吨至二万七千五百吨，甲板装甲厚达四十四至六十九毫米，炮塔装甲更厚。德国等一些国家造成了潜水艇，它携带鱼雷，时而在海面游弋，时而于海洋深处航行，伺机袭击敌舰，把海面的战斗引向了海洋深处。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军用飞艇和飞机，使人类开辟了空中战场。此外，人们还把毒气引进军事部门，产生了化学武器。

第二节 德国

经济的发展和垄断组织的产生 1871 年完成统一后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迅速。七十年代初，德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经过二十年，经济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871 年，在德国的主要工业中，生铁的产量为一百五十六万四千吨，钢为二十五万一千吨，煤为三千七百九十万吨（包括褐煤）；到 1891 年，分别增长为四百六十四万一千吨，二百四十五万二千吨和九千四百二十万吨。九十年代，德国工业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其它国家，成为资本主义的先进工业国。

德国经济发展迅速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国家的统一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第二，从法国掠夺了五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和阿尔萨斯、洛林两个重要矿区，大大增加了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和矿产资源；第三，德国的工业发展较晚，没有过时的成套旧设备，迎头赶上不受拖累，便于利用科学和技术上的最新成就，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如电气、光学和化学工业等等，使生产大幅度增长。

德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工业资本与农业大地产的紧密结合。1850 年普鲁士农业改革以后，容克地主获得了农奴的大量赎金和土地，改变经营方法，办起了资本主义化的农场，采用先进生产工具和优质肥料从事生产，同时经营农产品加工业，如甜菜工业和酿酒工业。容克经营的农场遍布东普鲁士。全国大农场控制了德国总耕地面积的 54%。这种农场掌握在容克手里，仍旧保留着不少封建残余。在易北河以西地区，中小农户居多数。1882 年德国共有三百万小农户，占农户总数的五分之三，但仅占有总耕地的二十分之一。小农户的地位很不稳定，七十和八十年代在农业危机的打击下，不少农户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加入工人阶级的行列。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形成垄断，这种垄断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在欧洲各国，德国的垄断组织建立得最早，发展得最快，而且组织得更为严密。容克资产阶级为了争夺国际和国内市场，实行保护关税和倾销政策，国家直接支持建立和发展垄断组织。德国垄断组织最普遍的形式是卡特尔。1875 年有八个，1890 年达一百三十七个，1900 年达三百个，1911 年达五百五十至六百个。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1909 年柏林九家银行集中了全德银行资本的 83%。银行控制着企业，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结合，形成金融寡头，著名的如基尔道夫、克虏伯、施梯纳、蒂森、汉泽曼和西门子等。他们操纵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对德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施加重大影响。

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实际是普鲁士的扩大。在帝国里，普鲁士的容克握有实权，专制横暴，资产阶级从属他们。但在德国垄断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容克与资产阶级互相渗透，紧密结合。有的容克投资工业和银行，成了企业家；有的资本家购买地产或获得爵位，成了容克地主。这就加强了容克贵族和垄断资本家的联合基础。同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精神和侵略传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军人由于先后战胜丹麦、奥地利和法国而气焰嚣张，崇拜暴力、颂扬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渗透到政治领域，并同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扩张欲望结合起来，使德国帝国主义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因此列宁指出，德国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国家”。

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

了德国。

统一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促成了工人队伍的团结。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围绕着德意志统一道路问题，工人队伍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个派别，一个是爱森纳赫派，另一个是拉萨尔派。德意志实现统一以后，关于统一道路问题的争论已失去了现实意义，两派开始相互靠拢，并于 1875 年哥达大会上实行联合，建立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是，哥达大会讨论党纲的时候，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爱森纳赫派，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向拉萨尔派作了重大让步，基本上接受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对此，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一书，逐条逐句地批判了党纲中的拉萨尔主义的错误，并且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特别精辟地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统一，使党的影响迅速扩大。1877 年举行国会选举，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五十万票和十二个议席，成了德国有影响的大党之一。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俾斯麦政权的专横，争取民主与自由，争取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给予德国从上面完成的统一以“必要的补充和改进”。同时，它将斗争矛头直指俾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提出了“不给政府一个兵、一文钱”的口号，反对俾斯麦政权提出的扩军计划和七年预算。工人阶级的斗争引起了容克资产阶级政府的无比恐惧。俾斯麦反动当局为了镇压工人运动，于 1878 年 10 月颁布了《反社会主义非常法》。这个反动法令原定有效期限为二年半，后来几度延长，直到 1890 年才宣布停止。“非常法”实施期间，整个德国弥漫着一片白色恐怖气氛。当时有一千三百种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刊被查禁，三百三十二个工会和工人文化团体被取缔，工人阶级活动家被驱逐的有九百人，被判刑的有一千五百人，总计刑期长达一千年。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面对俾斯麦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迫害，党内出现了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右的倾向以赫希伯格、施拉姆和伯恩斯坦等人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为代表。他们被反动派嚣张气焰吓破了胆，在 1879 年抛出一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专文，公开声明拥护非常法，反对党进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党内又出现莫斯特等人代表的“左”倾盲动思想，主张立即起义，采取恐怖行动。1879 年 9 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德国党的领导人发出《通告信》，严厉批判了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并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把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对抗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开头表现张惶失措的党的领导人，不久就放弃了被动的策略，顶住了逆流。党的力量得到了保存和发展，工会组织的会员也有增加。1889 年，全国各地罢工事件达一千起，参加罢工的产业工人达三十万以上。特别是这年 5 月，鲁尔十万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给予“非常法”以沉重打击。德国党经受了反非常法斗争的锻炼，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威望，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九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恢复公开活动以后，在 1897 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二百多万张选票、五十七个议席。但是，这些胜利却使党的某些领导人产生了对议会斗争的幻想，机会主义滋长起来。

俾斯麦去职 1888 年，威廉二世即皇帝位。他不愿受首相的控制，而要

亲自掌握实权。更重要的是，他和俾斯麦之间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在内政方面，俾斯麦拼命坚持用高压政策对付工人运动；但是威廉二世鉴于压迫愈重，工人运动愈加强大，认为继续推行这种政策是危险的，他主张用小恩小惠来麻痹工人阶级的反抗意志，其中包括颁布两项敕令，一是答应修改劳工立法，对工人的劳动时间加以限制，二是答应召开一次国际劳工保护问题的会议。在外交方面，俾斯麦一贯主张实行所谓“大陆政策”，即以欧洲为主要的扩张对象，争夺欧洲霸权；威廉二世则主张实行所谓“世界政策”，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德国扩张的范围，争夺世界霸权。俾斯麦的政策代表德国统一初期的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野心勃勃的威廉二世更多地倾向重工业界垄断资本家的意见。俾斯麦由于在国内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遭到失败，在国外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落在其他欧洲强国的后面，失去了容克资产阶级的欢心。威廉二世最后决定抛弃俾斯麦。

1890年，德国议会拒绝延长“非常法”的有效期限。在新的议会的选举中，俾斯麦控制的政党集团又遭到严重的失败。1890年3月，俾斯麦走投无路，只好辞职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 九十年代，威廉二世鉴于非常法的破产，对工人阶级作出了某些让步的姿态，1890年2月，政府颁布“二月法令”，答应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规定工作日时间，发给工人补助金，限制童工和女工，等等。其目的都是为了缓和工人的不满情绪，争取工人阶级拥护政府而孤立社会民主党。但是，工人阶级并没有理会这些让步，继续坚持罢工斗争，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权益。1894年，政府丢开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制定了“防止图谋推翻现行制度”的法律，以迫害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随后，德皇又背弃诺言，废除了保护工人的法律，垄断资本家任意延长工时，对工人实行专横统治。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以及粮食和其它食品价格暴涨，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灾难。

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德国帝国主义疯狂掠夺殖民地，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亚非地区。1897年，德国首先强占中国的胶州湾，并攫取建筑胶济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利。1899年，德国又利用美西战争和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马里亚纳群岛、加洛林群岛，以及萨摩亚群岛。1900年，德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派兵最多，并担任联军统帅。但是德国对于当时殖民地的占有状况感到不满。它感到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已经超过英法两国，可是拥有殖民地的数量却远远落后于它们，而世界已被瓜分完毕了。因此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要求占有“阳光下的地盘”。德国帝国主义同英、法、俄等帝国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它们的矛盾十分尖锐。尤其是英德矛盾逐步上升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主要矛盾。德国加紧“向东方推进”。1899年开始修建著名的巴格达铁路，起自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经小亚细亚、巴格达直抵伊朗波斯湾，再同柏林—伊斯坦布尔铁路联成一气。这个以“三B计划”著称（因柏林—拜占廷—巴格达三城以英文字母B开头而得名）的筑路计划，严重威胁英国在中东的殖民利益。为了压倒英国，称霸世界，德国又拼命发展海军。威廉二世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发誓要把“三叉戟”——即海上霸权夺到德国手里。1898年，德国议会通过庞大的海军法案，以后又几度补充海军扩军预算，追加造舰数字，到大战之前，拥有军舰共达三百一十九艘，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海军强国。1905年，在总参谋长施里芬的主持下，德国拟订了在东西两线对俄对法作战的“施里芬

计划”。为了加速扩军，军事开支年年增加，1914年达二十亿马克以上，占国家预算的一半。

第三节 法国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 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敲响了丧钟。1870 年 9 月 2 日，法军在色当战败。9 月 4 日，巴黎爆发革命，人民群众起来一举推翻第二帝国，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法国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非常激烈，其中主要是保皇派和共和派的斗争。当时，法国的复辟势力又猖獗起来。在 1871 年 2 月选出的国民议会中，保皇党分子占了三分之二的议席。他们分成三派：正统派二百席，他们是波旁王朝的拥护者，支持尚博伯爵为王；奥尔良派二百席，他们拥护路易·菲力浦的继承人巴黎伯爵登上法国王位；另一派是波拿巴派，他们占有三十个议席。保皇派同床异梦，但是都极力图谋推翻共和，恢复帝制。他们与天主教教士（即所谓“教权派”）勾结一起，狼狈为奸，在农村广泛进行复辟宣传，加以法国自从普法战争惨败以后，国力衰竭，国际地位下降，共和政体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临随时被推翻的危险。

1871 年 8 月 31 日，扼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梯也尔取得了共和国总统的称号。梯也尔自称是个“老保皇派”，是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但他慑于法国人民拥护共和，反对专制，不敢遽然宣布复辟君主政体，而准备建立一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或“保守的共和国”。他大量任用保皇党人，推行保守主义的政策。但是，极端的保皇分子仍然对梯也尔感到不满。1873 年 5 月 24 日，国民议会的保皇党集团迫使梯也尔辞职，改选色当决战惨败的元帅麦克马洪继任总统。麦克马洪上任后积极活动，图谋改制。但保皇党内部矛盾重重，究竟哪一派当国王，复辟后采用什么国旗等均未能达成协议。同时，保皇党分子对复辟是否能够成功也缺乏信心。人心倾向共和，军队不支持复辟，以致他们未敢轻举妄动。共和制虽然岌岌可危，却终能度过危机。

这一时期，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势力逐渐增强。1875 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国 1875 年宪法。这部宪法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国家制度的形式，只在规定总统选举程序的条文中提到“共和国”一词。在讨论过程中，这一条仅以一票多数获得通过。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七年，由两院联席会议选举，连选得连任。总统拥有统率军队、签订军事条约、任免高级文武官员、实施大赦的权力。此外，总统经众议院同意，还有权任命内阁；经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众议院。总之，法国总统的权力比英国国王的权力要大。

议会采取两院制，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六百人，四年改选一次，由普选产生；参议院三百人，由地方自治机关选出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出参议员。参议员中一部分是终身委员。参议院权力很大，有复议和批准众议院法律之权，并有权会同总统解散众议院。

宪法的颁布，虽然使共和政体得以确立，但并未使共和派和保皇派的斗争马上停止下来。保皇派分子麦克马洪仍盘踞着总统职位；众议院中共和派虽占多数，而在参议院里，保皇分子仍占多数。因此共和政体尚未巩固。1877 年夏，麦克马洪解散众议院，企图发动政变。但是 1877 年的选举给共和派带来了新胜利。麦克马洪的处境日益不利，于 1879 年 1 月被迫辞职，两院共同推选温和派共和党人茹尔·格雷维任总统，这时，法国才真正有一个共和派的政府。共和制的巩固，对于法国历史的发展，包括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提供了有利条件。恩格斯指出：“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

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

高利贷帝国主义 十九世纪晚期，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有一定增长。1871至1891年间，法国的生铁，钢和煤的产量，分别从八十六万吨、八万吨和一千三百二十五万九千吨，增长为一百八十九万七千吨、七十四万吨和二千六百另二万五千吨。但是，法国工业发展速度是缓慢的，不但比不上美国，而且也不如德国和英国。法国重工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轻工业，在轻工业中，纺织业和奢侈品制造业十分迅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法国工业生产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二。到了九十年代，便先后被美国和德国超过，下降到世界第四位。

法国工业发展缓慢，首先由于普法战争的失败对其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这次战争消耗了法国一百亿法郎的军费；战后，法国又向德国付出五十亿法郎的巨额战争赔款，使法国减少了工业资金。其次，煤铁储量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州又被德国割占，使法国资源更形贫乏。

法国城市中保留了大量小企业，农村中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十九世纪末，法国一至十人的小企业还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94%，由于小企业规模不大，资金不足，无力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革新，使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大为减慢。同一时间，法国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0%以上，其中，只有一公顷以下的小块土地的小农户约占40%。小农户抵抗不住危机的打击，处境日益困难。农民的贫困和购买力低下，使国内市场缩小，这也造成经济发展的缓慢。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二十世纪初，法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时期，法国的资本输出大大超过投在国内的资本，主要以贷款形式输往俄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土耳其，拉丁美洲各国和非洲各个殖民地。1880年输出资本达一百五十亿法郎。1890年达二百亿法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六百亿法郎。其中投在俄国的约为一百二十亿到一百三十亿法郎。法国资本输出大都具有非生产性的高利贷性质，据统计，法国在1909—1913年，高利贷利息收入每年就有十七亿零五百万法郎至十八亿零五百万法郎之多。这种高利贷资本输出，使法国国内工商业萎缩，并使法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利者阶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个阶层人数达二百万，充分反映了法国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因此法国以“高利贷帝国主义”著称。

工人政党的建立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法国工人运动遭受沉重打击，但七十年代后期又复苏过来，工会组织和工人文化团体纷纷成立，罢工也有了开展。工人阶级的活动家茹尔·盖德（1845—1922）和保尔·拉法格（1842—1911）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展开建党活动。1879年9月在马赛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了拥护社会主义，开展政治斗争的决议，并决定建立法国“工人党”。1880年11月，在勒阿弗尔举行了“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选出了以盖德，拉法格为首的党的领导机构。党的建立标志着法国工人运动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成为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开端。

但是工人党的成员参差不齐，涌进了一些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的斗争。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布鲁斯和马隆为首的“可能派”，主张工人阶级的活动应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

范围之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幻想和平过渡。盖德派与可能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82年圣亚田代表大会上，两派终于分裂。以盖德、拉法格为首的少数派毅然退出大会，在卢昂召开工人党代表大会，可能派则在圣亚田另组“革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恩格斯指出，“这个所谓的圣亚田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党。”

十九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法国工人党领导了一系列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86年的德卡斯维尔矿区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顶住了反动军警的镇压，坚持斗争达六个月之久。工人运动的高涨使盖德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了一定的胜利。1893年，工人党有十二人当选众议员，盖德也是其中之一。但这些进展却使工人党某些领导人冲昏了头脑，认为议会选举可以夺取政权，暴力革命没有必要。盖德等人为了争取选举胜利，不惜以让步和妥协同“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之流组成议会党团。同时，为了争取农民的选票，盖德等人在1894年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投合小农私有观念的土地纲领，宣称“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小块土地”。恩格斯在1894年发表了《法德农民问题》一书，对这个违背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土地纲领，给予了严正的批评。

九十年代以后，在国际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倾向日趋严重。这时，法国出现了一个以亚历山大·米勒兰为首领的“独立社会主义同盟”，公开宣称自己是改良主义者，鼓吹通过国家进行改革，反对暴力革命。1899年，米勒兰应邀参加了资产阶级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内阁。这一事件引起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分裂。1901年，批判入阁事件的盖德派和布朗基派联合建立法国社会党，为入阁事件辩护的饶勒斯派和“可能派”也于1902年联合组成法兰西社会党。1905年，两党又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社会党”。饶勒斯掌握了党的领导权。统一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很有进展。1914年选举，它获得一百四十万张选票，取得了议会的一百零三个席位。

动荡的政治局面 1879年共和党人执政以后，他们分裂为两派。一派是温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甘必大和茹尔·费里为首。甘必大以前在小资产阶级中颇孚众望，八十年代初，他越来越右倾。他领导的“共和派联盟”大许改革的诺言，但多是徒托空言。另一派是激进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后来也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以若尔·克雷蒙梭为首。1881年，激进派初次独立参加选举，获得四十六个议席。后来激进派的阵地越来越巩固，他们组成的社会激进党，到二十世纪初成了法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

1879年至1902年以前，是共和党温和派执政。他们只实行了某些小改革，如把政治中心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市区，重申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规定《马赛曲》为法国国歌，封闭耶稣教教士所办的学校，普及小学教育。1884年，废除了《列·沙白里哀法》，允许工人按行业组织联合会；废止了终身制参议员，参议员任期九年，等等。但执政的温和的共和党人为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日益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加之，统治阶级上层分子贪污腐化，人民群众日趋贫困，因此，法国政局动荡不定，斗争极其激烈。

1889年发生了布朗热事件。布朗热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886年1月到1887年3月曾在法国政府任陆军部长。他利用人民对温和派共和党的不

满，企图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在 1889 年巴黎补选中，这个阴谋家哗众取宠，获得极大成功，获得了二十五万张选票。当时盛传他要向总统府进军，发动政变。但是到头来，他举棋不定。共和党人得到喘息时机，便在政治上发动攻势，揭露了布朗热同保皇党集团的联系，使他在人民群众中迅速孤立。接着，布朗热害怕被捕，仓皇出逃比利时。法国政府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处以无期徒刑。这样一来，布朗热即使在他的追随者中也威信扫地了。1891 年 9 月，布朗热日暮途穷，在布鲁塞尔自杀身亡。布朗热事件过去了，但是它反映了法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

1892 年底至 1893 年初，法国又揭露出一桩震惊全国的大丑闻，即巴拿马公司丑闻。这也是法国内政中的重大事件。早在 1879 年，巴黎成立了准备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巴拿马公司，由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师黎塞普主持。由于黎塞普的号召力，公司很快集资十五亿法郎。运河未开成，公司在 1889 年宣告破产了。在清理破产了的巴拿马公司的财产时查出了公司曾对政党领袖、达官贵人行贿的证据。案情牵连甚广，甚至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克雷蒙梭也在受贿之列。然而，由于资产阶级法庭的包庇，尽管受贿问题铁证如山，受贿者仍然逍遥法外，几乎所有被告均宣布无罪。但是，通过这一事件，资产阶级的信誉扫地以尽，工人群众纷纷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1894 年发生的德雷福斯案件，进一步暴露了共和党温和派对内政策的反动本质。这一年，在巴黎德国使馆内发现一张笔录，说明有一名法国军官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不久，法国政府便毫无根据地逮捕了总参谋部一名犹太籍炮兵尉官德雷福斯，以莫须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押送南美法属圭亚那附近的魔鬼岛服终身劳役。

1897 年，发现这份出卖军事机密的笔录，象是另一名军官艾斯特加齐的笔迹。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于是这一案件与国内政治斗争交织一起，明显分成两派，一派保护德雷福斯，大部分是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德雷福斯无罪，著名作家爱米尔·左拉在 1898 年 1 月发表了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信的开头句子是“我控诉”。左拉控诉法军最高当局蓄意诬陷无辜者，有意开脱罪犯。左拉在信里特别指出，他所控告的那些人是“社会不平的体现者和代表者”。左拉因此被交付法庭，被判处一年徒刑。另一派是反德雷福斯派，主要是保皇党、教权派等。他们进行反犹太主义的宣传，反对为德雷福斯辩护。1899 年，该案真正的罪犯艾斯特加齐逃往英国，公开承认笔录出自他的手笔。于是，在人民压力之下，法国统治阶级改变手法，改组政府。6 月，瓦尔德·卢梭出任内阁总理。新内阁收买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出任工商部长，9 月间，法国总统下令赦免德雷福斯。温和派共和党人在人民中声誉扫地，政权逐渐转入激进派手中。1902 年，激进共和党人开始组阁。激进共和党人的著名领导人物克雷蒙梭 1906 年组阁以后，更成为法国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殖民扩张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温和派共和党人大力推行殖民掠夺政策。茹尔·费里总理叫嚷：“对于富强的国家来说，殖民地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之一，……法国是一个资本充足并向国外大量输出资本的国家，所以热衷于研究殖民地问题的这个方面。”1881 年，费里政府未经议会同意就出兵强占突尼斯。接着，法国殖民者又在非洲侵入尼日尔河流域、刚果河流域，并派兵侵入马达加斯加。二十世纪初，法国又达到了侵占摩洛哥的目的。

在亚洲，法国殖民者加紧在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进行侵略。十九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它侵占越南南部，接着又企图占领中部和北部。1883年法国的侵犯遭到当地居民顽强反抗。中国支援越南，抗击法国。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于1885年3月大败法军于谅山。战争的失利引起法国严重的政治危机，费里内阁因此而倒台。但是，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在前线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居然仍和法国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从此，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接着，法国又以越南为跳板向我南方地区扩张。1895年，法国借口三国还辽“有功”，从中国夺取了许多特权。1897年，它迫使清朝声明海南岛不割让他国；1899年强租广州湾；1900年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在列强瓜分中国狂潮中，法国把广东，广西和云南划为它的“势力范围”。

法国的殖民扩张政策加剧了它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为了控制它占有的广大殖民地，为了对付要求重新瓜分世界的德国，并对德国复仇，1913年彭加勒出任总统以后，法国加紧备战。1914年，法国预算中的军费开支高达十五亿法郎，占全部预算开支的38%。

第四节 英国

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英国工业发展滞缓。1850年至1870年，每年增长率为3.2%，1870年至1913年，下降为1.9%。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从1870年的32%，下降为1913年的14%。八十年代，英国工业产值已被美国超过。二十世纪初又被德国超过，退居世界第三位。1913年，英国钢产量七百七十万吨，只及美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德国的一半。这种情况说明，英国工业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英国享有了将近一百年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失去了。”

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大量采用最新的科学和技术设备，许多部门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电气的基础上，从而出现了跳跃式的发展。而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留下了大量陈旧落后的设备，资本家不愿放弃这些旧设备，另行耗费巨资，采用新的技术设施，这就阻碍了技术改革和设备更新。英国国外投资的高额利润又远远超过了国内投资，造成资金的大量外流。英国工业增长速度缓慢下来，英国货由于质差价昂，在国际市场上又竞争不过美国和德国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且，尽管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用关税壁垒排斥英国商品的进口，但英国一向依赖从外国进口粮食和原料，因此不能在本国相应的实行关税政策，结果造成英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大。再加上1878—1879年经济危机以后，英国一直市场萧条，农业衰落。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它的工业发展速度，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它的工业垄断地位。

英国工业发展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但是它的个别工业部门如造船业和纺织业仍然领先；它在外贸和银行资本方面仍有优势。英国还是世界的债主，伦敦依旧是世界的经济中心。它从对国外的巨额投资中仍可榨取巨额的利润。

资产阶级政党的斗争 英国两大资产阶级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交替执政。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日益接近。两党实质上都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充当垄断资产阶级调节政策交替使用的工具。当时，两党争论的焦点，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如何保持英国的霸权，以及如何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等问题，事实上只不过是细节上和步骤上不同罢了。

1868—1874年，自由党的格莱斯顿担任首相。格莱斯顿从英国拥有世界霸权这一信念出发，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应当奉行所谓“光荣的孤立”政策，实行自由贸易竞争，不和其它强国结盟。在对待工人运动方面，格莱斯顿作出一些表面上的微小让步。1871年颁布新工会法，承认工会有合法地位，但禁止工人罢工时成立纠察队。

但是，当时英国已开始失去工业霸权。因此，继续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越来越使资产阶级感到不满；新工会法中禁止成立工人纠察队的规定也遭到工人阶级的反对。格莱斯顿政府面临危机。于是，保守党人利用这一形势，击败自由党，上台执政。

迪斯累利于1874—1880年领导保守党内阁。他深知工人问题关系到政府的稳定，用蛊惑性的宣传去讨好工人，取消禁止工人成立纠察队的法令，承

认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的地位，颁布法令，不许雇用十岁以下童工，以及改进城市卫生设施等等。在对外政策上，迪斯累里代表扩张主义势力。1875年，他未经国会同意，就以四百万英镑从埃及统治者手里购得苏伊士运河的44%的股票，即十七万六千股。从此，英国逐步控制了这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运河。1876年，英国女王被宣布为印度女皇，反映了英国牢牢掌握印度的野心。1878年，英国从俄土战争中浑水摸鱼，从土耳其手里攫取了塞浦路斯岛。但是迪斯累里由于侵略阿富汗和南非战争中的失败，以及财政赤字增加，引起国内公众不满。在1880年议会选举中，自由党趁机提出“和平与财政紧缩”的口号争取选票，重新执政。

格莱斯顿第二届内阁（1880—1885）期间，对外因袭保守党的扩张政策，武装侵略阿富汗、南非、埃及和苏丹；对内，为了缓和农村人民要求政治权利的斗争，并为了争夺农村选票，于1884年进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宣布1867年城市人民选举条例，同样适用于农村居民，从而使选民人数从1883年的三百一十五万多人增加到1886年的五百七十余万人。当然，这次改革仍局限于小农和一部分高工资的农业工人获得选举权，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尤其是妇女的选举权仍被剥夺。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英国丧失工业垄断地位和国外竞争的加剧，传统的自由主义日渐衰微，保守主义日益加强。1886年，自由党发生分裂，党内出现了反对派，自称“自由联合派”，其代表人物是代表伯明翰工业界的约瑟夫·张伯伦。他主张强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反对格莱斯顿允许爱尔兰自治，对外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对内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镇压；要求建立一个排他性的英帝国经济体系，用高关税保护英国市场，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保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张伯伦和他领导的“自由联合派”宣布脱离自由党，转向保守党。这一事件导致了格莱斯顿第三届内阁组阁半年便告倒台。从1886年至1905年二十年间，除了短短三年（1892—1895）之外，政权都掌握在保守党索尔斯伯里等内阁手里。英国军事官僚制度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职能扩大，议会的职能缩小，警察和军队有了惊人的增加。

从十九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随着英德矛盾的尖锐化，无论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执政都大力推行殖民政策。保守党内阁终于放弃了“光荣孤立”政策。为了巩固英国在亚洲东部的地位，英国同日本结盟；为了协调英法关系，1904年同法国缔结协约。1905年继起执政的自由党于1907年调整了英国同俄国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同俄国签订了协约。它也推行了扩军备战的政策。

殖民帝国的扩大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初，英国统治集团拼命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财源和市场。到1914年，英国占领的殖民地面积达三千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面积的四分之一，占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殖民地总数的一半，相当于英国本土（三十万平方公里）的一百多倍；其殖民地人口共三亿九千三百五十万，相当于英国人口（四千六百五十万）的九倍。

殖民地是英国资产阶级的生命线，它为英国提供了倾销商品的市场，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来源，以及资本输出的新场所。1900年英国国外投资增至二十亿英镑，居世界首位，每年得自国外投资的收入为一亿英镑。到了1914年，投资和收入都增加了将近一倍。其中有半数以上的投资输出到英国的殖民地。在英帝国以外，英国投资最多的地方是南美洲，特别是阿根廷。

英国保持了一支吨数占世界第一位的商船队，海上运输量占世界总运输量的一半以上。同时，英国也有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占据了从英国通往东方航道上的一系列重要战略据点：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岛，塞浦路斯岛，埃及，苏伊士运河，亚丁，锡兰，马来亚，香港，好望角等。它还控制了从欧洲通往美洲航道上的一些岛屿，如巴巴多斯，牙买加，巴哈马和百慕大等。

保持殖民地对保持英国的国际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虽然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但由于拥有大量殖民地，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世界贸易上仍占首位，它的海运业遥遥领先，金融业也保持着垄断，英镑是世界的结算单位。由于殖民地对于英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所以列宁把英帝国主义称为“殖民帝国主义”。

殖民地使英国由典型的工业国变成典型的食利国。对广大殖民地的大量投资和残酷剥削，加深了英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从海外掠夺来的高额利润和利息收入，养肥了英国的食利者阶层。到二十世纪初，英国食利者阶层估计有一百万人之多。英国贵族和资本家们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把大量耕地变为猎场，每年赛马、猎狐的耗费高达一千四百万英镑。对外投资的收入大大超过对外贸易的收入。1899年，英国对外投资收入达九千万至一亿英镑，而外贸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万英镑。“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费边社和独立工党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英国工联是唯一的工人组织，垄断了英国的工人运动，而参加工联的主要是熟练工人，广大贫困的无产者被摒弃于工联大门之外，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是，随着英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工业垄断地位，国内物价高涨，工人实际工资降低，失业工人数量增加，工人阶级生活条件恶化，英国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激烈起来。大批工资低、生活困苦的非熟练工人参加工会，组成“新工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工人运动的新发展促进了工人中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产生了建立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政党的要求。

1884年，费边社宣告成立。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成员全是知识分子，领导人是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韦伯夫妇等人。费边社宣称马克思主义不合英国的国情，否认阶级斗争，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以和平的方式和点滴的改良，逐步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曾指出费边社的观点是“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

社会民主同盟也成立于1884年，它也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组织。他们宣布接受马克思主义，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执行宗派主义的政策，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斗争。因此同盟分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她的丈夫艾威林，以及威廉·莫里斯等退出社会民主同盟，另行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积极在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吸引工人参加有组织的斗争。

在新工联和社会主义者同盟等的组织领导下，英国工人阶级罢工浪潮高涨。1889年，在全国工人群众中影响较大的煤气工人大罢工，伦敦六万码头工人大罢工，都取得了胜利。煤气工人工作日从十二小时缩为八小时，每日工资增加八便士；码头工人每小时工资增加六便士。

1893年1月，英国又成立了一个工人政党——独立工党，矿工凯尔·哈第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人。哈第是个费边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英国国情，反对进行阶级斗争。在哈第领导下起草的独立工党党纲规定，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实现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独立工党的力量在于它同工会建立了密切联系。1893年工联代表大会决定向独立工党捐助竞选资金，同时让独立工党参加罢工的领导。独立工党成立几年内，党员人数就发展到两万人。

1900年，英国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实行大联合。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以及费边社等共同成立一个“工人代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从事筹备工人代表在国会竞选中的活动。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名为工党。工党的纲领是通过议会选举的合法手段来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竞选活动上，从而走上了机会主义的道路。

第五节 俄国

俄国工人运动的兴起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俄国的工业无产阶级逐步形成。在沙皇专制制度统治下，工人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残酷的剥削，而且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也没有。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工人就开始进行自发的斗争。据不完全的统计，在 1870—1879 年间，全国共发生了三百二十多次工人罢工和骚动。它们的起因大都与工资问题有关。1875 年在敖德萨建立了“南俄工人协会”，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组织，会员约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协会的宗旨是“宣传工人要从资本和特权阶级的压迫下取得解放的思想”，把工人联合起来，以便“将来同已经确立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斗争”。协会存在了不到一年就被当局破坏。1878 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会员二百人左右。它在纲领上和组织上都比“南俄工人协会”前进了一步。它的领导人之一钳工奥布诺尔斯基曾三次逃亡国外，受到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推翻国内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是极不公平的制度”。协会不仅要求改善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要求各种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等。协会创办了互助储金会和图书馆，还建立了秘密印刷所，出版小型刊物。1880 年协会被破坏。当时，工人运动总的来说还处在自发的阶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参加斗争的人数也还比较少。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人阶级进一步成长壮大，不仅人数增多了，而且逐渐集中。1881 年全国工人总数已有六十六万余人，其中有半数是在大工厂中劳动。从 1881—1890 年间，各种形式的工人斗争达四百五十多次。1885 年，在莫斯科附近奥列霍伏—祖耶伏的莫罗佐夫纺织厂发生了大罢工，参加者有八千人，斗争持续了八天。罢工者要求国家通过立法来限制资本家对工人任意罚款、解雇和降低工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下令逮捕了工人领袖莫伊先科和其他罢工参加者，但是由于工人群众团结一致、坚持斗争，法庭不得不宣告被捕者无罪。这次罢工终于迫使沙皇政府于次年公布了限制资本家向工人征收罚金的法令。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厂法。莫罗佐夫纺织厂的罢工标志着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开始。

俄国近代工人阶级大致在八十年代中期最终形成。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客观条件。1883 年，普列汉诺夫等在日内瓦建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1856—1918 年）早年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是“土地与自由社”和后来的“黑土重分社”的积极活动家，1880 年因受沙皇政府的迫害而逃亡国外。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下，他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写的一些著作，如《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 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 年）和《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1895 年）等，对批判民粹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大财富。但是，普列汉诺夫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的作用又估计过高。这些错误后来得到了发展，终于使他掉入了机会主义的泥坑。“劳动解放社”用俄文翻译、出版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在俄国秘密传播。当“劳动解放社”在国外展开活动时，在俄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组织，如 1883 年和 1885 年先后在彼得堡建立的“布拉戈耶夫小组”和“圣彼得堡工人协会”。它们在工人和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还出版秘密

的报纸，散发革命传单。八十年代的工人运动虽然比七十年代前进了一大步，而且出现了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但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个任务是后来由俄国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列宁完成的。

列宁革命事业的开始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1870—1924年)诞生在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家庭里，自幼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1887年进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参加革命学生运动而被捕流放。第二年，他从流放地回到喀山后，立即加入了一个秘密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阅读并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1889年，列宁全家迁居萨马拉(今古比雪夫)。他在萨马拉建立了当地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且进行农村调查，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在萨马拉期间，列宁刻苦自学，读完了大学法律系的全部课程，并于1891年以校外生的身份参加了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国家考试，获得了优等毕业文凭。他利用在首都逗留的机会，和当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893年，列宁移居彼得堡，很快就成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人物。他深入工厂，以通俗的形式，向工人讲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同时积极参加工人的革命斗争。

为了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必须肃清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派的理论是极端错误的，但是在七十年代他们曾坚决反对沙皇专制统治，因而有革命性。从八十年代起他们逐渐放弃革命斗争，终于蜕化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富农利益的代表。1894年，列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书，揭露了民粹派冒充“人民之友”，而实际是人民之敌的真面目，对民粹派的经济理论、政治纲领、斗争策略和世界观作了全面的批判。列宁指出，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俄国人民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它在斗争中必须与农民建立同盟。对民粹派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是普列汉诺夫开始的，而彻底肃清民粹主义影响这一任务则是由列宁完成的。

在批判民粹派的同时，列宁还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斗争。所谓“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伙资产阶级自由派，其代表人物是司徒卢威。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在合法的刊物上宣传自己的观点。他们也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也“批判”民粹派，但是他们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列宁在1895年写了《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书，揭露和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资产阶级本质。

列宁的这些理论活动，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扩大并锻炼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1895年，在列宁的倡议下，彼得堡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列宁是协会的领导人，同时负责编辑协会的各种刊物。协会组织了罢工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896年彼得堡纺织工人总罢工，参加者有三万人。列宁领导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俄国第一次把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了起来，把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把这个组织称作是俄国工人阶级政党最初的萌芽。

“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成立后不久，列宁和协会的一些领导人被沙皇政府逮捕。列宁虽然身陷囹圄，但并未停止革命活动。他在狱中写了大量小册子和传单，领导并鼓舞工人群众继续斗争。他还为未来的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草拟了纲领。1897年，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俄国帝国主义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从1889—1899年，全国工业企业增加了26.3%，工人人数增加了59.2%，工业生产总值增加了112.8%。重工业的发展尤为迅速。在九十年代后半期，生铁、煤炭、石油的产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在乌克兰建立了新的冶金工业中心，其规模超过了乌拉尔。巴库的石油工业继续发展，使俄国成了重要的石油输出国。在各个主要工业部门都已普遍使用新的技术。九十年代出现了铁路建设的新高潮。1890年全国铁路总长度为三万零六百公里，1900年增至五万三千多公里，平均每年增加二千公里以上。1891年开始修筑长达七千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道，至1901年已基本竣工。铁路的铺设和经营，促进了冶金、建材、燃料、机车和车厢制造以及其他有关工业部门的发展，并且扩大了国内外市场。

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俄国经济中逐渐出现了一般帝国主义所共有的特征。首先是资本和生产的集中。1900年，南俄七个大企业生产的生铁占了全国生铁总产量的37.6%，巴库五个大公司生产的石油占了全国石油总产量的42.6%。就工人集中的程度来说已超过了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1902年在千人以上的大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占全国工人数的47.8%，而在德国只占15%（1907年），在美国只占17%（1909年）。资本和生产的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垄断组织。俄国的垄断组织以辛迪加为主，它比西欧的托拉斯的垄断程度要低些。1902年成立的金属销售辛迪加，掌握了全国冶金工业的18%；1904年成立的车厢制造厂辛迪加，几乎控制了全国火车车厢的销售。到1909年，在绝大多数工业部门都出现了垄断组织。银行资本也不断集中和加强，它与工业资本合而为一，形成了财政资本。1899年，八家大银行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银行资本。一小撮金融寡头在二十世纪初控制了全国冶金工业资本的一半、采煤工业资本的60%和电气工业资本的80%。俄国一方面依赖外国的资本输入，另一方面自己也向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伊朗、土耳其等）输出资本，以获取高额利润。俄国还积极地和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总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俄国已经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它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俄国帝国主义是在国内存在着严重的农奴制残余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农奴制残余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十九世纪末，全俄的三万个地主占有着七千万俄亩土地；而一千零五十万农民只占七千五百万俄亩土地。农民不得不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向地主租佃土地。佃农必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对分制”），或者用自己的工具为地主耕种土地（“工役制”）。这些实际上都是农奴制剥削的新形式。农奴制残余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沙皇专制统治。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改变。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象西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那样独掌政权，甚至连分享政权的条件也得不到。沙皇政府虽然也关心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其政策的基本方针来说，始终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

封建农奴制残余的存在使俄国帝国主义显得比较软弱。这种软弱性首先表现在它需要沙皇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沙皇政府推行的保护关税政策，使俄国垄断资产阶级得以避免与外国商品的竞争。沙皇政府的国家定货（特别是在铁路建设和军需工业方面）和贷款，保证了垄断资产阶级获得巨额利润。

此外，垄断资产阶级还依靠沙皇的警察和军队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革命运动，同时不断掠夺新的殖民地，以扩大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俄国帝国主义的软弱性还表现在它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外国资本就开始输入俄国。九十年代，外资输入进一步加强。从1895—1901年投入俄国工业和银行的外资比以前的三十年间投入的总额多四倍。俄国的一些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如冶金、燃料等大都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顿巴斯的煤矿有70%以上是外国资本的股份公司开采的。向俄国输出资本最多的国家是法国和比利时。沙皇政府为了建筑铁路和发展军事工业借了不少外债。1900年外债总额已达四十亿卢布，每年利息需要支出一亿卢布。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使俄国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中不得不屈居次等的地位。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和列宁主义的诞生 1898年，俄国一些城市的工人组织的九名代表在明斯克集会，宣布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次会议被称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大会既没有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也没有把各地的工人组织真正联合起来。会上选出的三名中央委员，有两名在会后不久就被沙皇政府逮捕。因此，党实际上并没有建立。

当时的俄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工人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列宁认为，要建党，必须先克服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存在的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涣散；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应当从创办一份全国性的政治报纸着手。1900年列宁从流放地出来，经过多方努力，这样的报纸——《火星报》于1900年12月在国外创刊。参加编辑部工作的除列宁外，还有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等人。在列宁的领导下，《火星报》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的建党原则，拟定了党纲草案，还为党培养了一支骨干力量。

在俄国工人运动内部，当时存在着一个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他们是建党的重大障碍。经济派认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经济斗争，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政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事。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能产生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经济派的观点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反映。1899年，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时就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批判了经济派的一个文件——《信条》中包含的种种谬论。1902年，列宁发表了《怎么办？》一书，对经济派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列宁指出：第一，工人运动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是要进行社会革命，工人阶级不仅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较好条件，而且要消灭迫使穷人出卖劳动力的社会制度。第二，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在工人运动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由理论家根据阶级斗争的实践通过深入的科学研究创造出来，然后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第三，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因此必须强调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党不能是工人运动的尾巴，而是先锋队。列宁对经济派的批判，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03年7—8月，在布鲁塞尔（后来在伦敦）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选举的中央机构。大会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和参加下进行的。在讨论《火星报》编辑部提交大会的党纲草案时，有一些代表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的纲领。他们的一个理由是国外许多工人党的纲领都没有这样写。还有的人认为，在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遥远的事，只有当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时，才有

可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严正地批驳了这些机会主义观点。由于列宁及其拥护者的坚持，大会通过了《火星报》的党纲草案。这个纲领指出，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此党必须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最近任务是推翻沙皇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废除农奴制残余，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以及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等。这是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纲。

在讨论党章第一条关于什么人可以入党的条文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主张建立一个战斗的、集中的、有严格纪律的党，因此他提出的条文强调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而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则认为党员不必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就等于说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自行宣布为党员。这样就必然使党成为一个成分庞杂、组织涣散的团体。由于列宁派内部有人动摇，大会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这是这次大会的一个缺陷。最后在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时，列宁派占了优势。当选的中央委员都是拥护列宁路线的。大会还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为党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列宁派在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编辑部都占多数，所以后来就称这一派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而称反对列宁的一派为孟什维克（少数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成立。

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主张进行社会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党。它与当时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主张社会改良的党是根本不同的。列宁在建党过程中继承、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针对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要求，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诞生。

1905—1907年革命 1905—1907年，俄国发生了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起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沙皇专制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的空前尖锐和劳动人民状况的严重恶化。1901—1903年的经济危机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1905年1月16日（俄历1月3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规定最低工资额。到1月21日（俄历1月8日），罢工扩大为全市性的总罢工，参加者达十五万人。沙皇政府决定对罢工进行大规模的武装镇压。为了诱使工人走上街头，警察局指使混进工人中的加邦牧师提出聚众列队到冬宫向沙皇请愿的建议。当时还有不少工人对沙皇的面目认识不清，因此建议被采纳了。布尔什维克曾经企图阻止这一行动，但是未获成功。在请愿书中，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写进了社会民主工党最低纲领中的一些内容。但是总的来说，请愿书充满了对沙皇的天真的信仰和幻想。1月22日（俄历1月9日）（星期日）早晨，十多万工人和家属，高举沙皇的象片和教会的旗帜，和平列队向冬宫进发。在冬宫前的广场上，他们遭到了沙皇军警排枪的射击和马刀的砍杀。死伤达两千人，其中有不少布尔什维克。鲜血染红了广场和街头的积雪。后来，人们称这一天为“流血星期日”。这次野蛮的屠杀擦亮了工人的眼睛。他们说：“我们再也不不要沙皇了”。他们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筑起街垒，拿起武器，继续斗争。彼得堡的流血事件，激起了各地工人的同情和声援。他们纷纷罢工示威，抗议政府的暴行，并且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仅仅一月份，全国罢工人数达

四十四万，超过了以往十年罢工人数的总和。

为了制定党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905年4月在伦敦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三大，而单独在日内瓦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两个大会制定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策略路线。布尔什维克认为：虽然这次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对无产阶级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次革命取得胜利，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次革命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同时孤立资产阶级；必须把群众性的政治罢工引向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以后成立的临时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正是依靠这个专政，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孟什维克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由资产阶级去领导。他们反对工农联盟和武装起义。他们还认为，如果革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应参加政府，而应在政府外面继续进行合法斗争。1905年7月，列宁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一书，全面论述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路线，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1905年春夏两季，革命不断扩大和深入。5月1日，全国约有二十二万人参加了罢工和示威。工人们不仅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且提出了“打倒专制制度”、“民主共和国万岁”等口号。5月中开始，伊凡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工业区的七万工人，举行了延续七十二天的总罢工。在这次罢工中，出现了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6月，在波兰的罗兹也举行了总罢工，后来发展为武装起义。农民运动也日益高涨，但与工人运动相比，规模较小，而且以自发斗争为主。1905年1至9月，全国各地农民举事达一千六百余次。被当作沙皇统治支柱的军队也开始了行动。1905年6月，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的水兵起义。飘扬着红旗的战舰驶进了正在举行总罢工的敖德萨港。由于孟什维克的破坏，起义者得不到岸上的支援。他们在海上坚持了一周，粮食和燃料消耗殆尽，起义遂告失败。

1905年10至12月，革命达到了高潮。10月初，莫斯科铁路工人罢工，至10月中旬，发展为全国政治总罢工，参加者除七十万铁路职工外，还有一百万产业工人，十五万职员，五万公务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罢工者公开提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口号。政府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与工人发生了流血冲突。在罢工期间，各地都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11月，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2月22日（俄历12月8日），莫斯科开始武装起义。工人们修筑了大批街垒，组织了几千人的战斗队。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直接领导了起义，并且成了起义期间最有权威的机关。它完全无视厂主和政府当局的意志，自行宣布八小时工作日，自行出版报纸，并且积极组织经济，保证居民的物质供应，还负责市内的治安，严防坏人破坏捣乱。列宁把苏维埃看作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萌芽。政府调来好几个团镇压起义，甚至动用了大炮。最后，战斗队员都集中到普列斯尼区，与政府军警进行了浴血战斗。工人们英勇抵抗了十天之久，终于失败。

十二月武装起义失败以后，革命逐渐进入低潮。1906年和1907年上半年，斗争还继续不断，其规模虽比1905年为小，但仍超过1905年以前。

沙皇政府在对革命进行残酷镇压的同时，还通过召开国家杜马来麻痹群众的斗志，并且笼络资产阶级。1905年8月，政府宣布要召开国家杜马，但是它只是一个咨询机构，而且大部分居民都被剥夺了选举权。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抵制，这次杜马流产了。10月间，正当总罢工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

沙皇决定召开所谓立法杜马，在选举办法上也作了一些让步。资产阶级欢呼雀跃。大资产阶级组织了“十月十七日同盟”，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资产阶级化了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织了“立宪民主党”，准备参政。孟什维克也感到满意。布尔什维克则仍然采取抵制的态度。选举结果，在四百七十八个席位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了一百七十九席，劳动者代表（主要是农民）占九十七席。1906年4月，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农民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分配给农民使用。这使政府大为不安，便在7月间解散了本届杜马。不久，进行了第二届杜马的选举。布尔什维克考虑到革命业已进入低潮，为了利用杜马的讲坛宣传革命思想，决定参加选举。在这届杜马中，立宪民主党的席位大为减少，劳动者和社会民主党的席位则有所增加。1907年1月，第二届杜马开幕。农民代表仍要求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沙皇政府决定再次驱散杜马。它无中生有地指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企图策动政变，并且非法逮捕了全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6月3日，政府宣布解散第二届杜马，史称“六三政变”。这次政变标志了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失败告终。

这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没有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工农联盟还不巩固和军队未曾完全倒向革命。这次革命的意义很深远，列宁称它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总演习”。

第六节 美国

经济的发展和垄断组织的出现 美国内战摧毁了南部的种植园奴隶制，资产阶级取得了全国的政权，为资本主义工农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美国获得幅员广大的新领土和广大移民到西部定居，是内战前美国经济生活两个重要的因素。内战结束以后，移民继续向西部迁徙，占据和开发了西部的农业用地，扩大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国外移民源源而来，1861—1910年间，大约有二千三百万移民迁入美国境内，其中大多数来自欧洲。他们既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又带来了技术和经验。当时科学技术上的巨大进展也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内战后的美国，不仅仍然是世界上生产农业品的主要国家，而且到1894年工业上已经打破了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驾凌英国、德国之上，跃居世界首位。1860—1916年间，农场土地总面积从四亿零七百万英亩增加到八亿七千九百万英亩。1860—1910年间，农场财产（包括土地、建筑物和农机具）从七十亿美元增加到三百六十多亿美元。主要农产品中，小麦1859年的产量为一亿七千三百万蒲式耳，1909年为六亿八千三百万蒲式耳；棉花1859年的产量为五百三十八万余包，1909年为一千零六十余万包。工业方面，美国以较高的速度把自然资源转化为流动财富。美国工业化是从发展轻工业即发展生活资料生产部门开始的。当时有四大工业部门在工厂数目、产值和职工人数上都远远超过其它工业部门。这四大工业按其规模排列是：食品和有关产品，纺织，钢铁，木材和木材制品。到1914年，食品制造和加工工业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部门。当年食品工业的生产总值约为四十八亿美元，超过第二大工业——纺织业十多亿美元。对工业力量的增长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钢铁及其制品的生产。1860年，美国生铁产量还不到一百万吨，1915年超过了三千三百万吨。生铁的生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超过了英国而居世界首位，到1899年已占世界生铁总产量的三分之一。1867年，美国钢产量约二万吨，1915年已超过三千二百万吨。早在1899年，美国的钢产量已占世界钢的总产量的43%。从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对比上看，189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初次超过农业产值；1900年，工业产值已是农业产值的二倍了。

美国十九世纪晚期经过1873年、1882年、1893年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竞争，中小企业纷纷破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集中与银行资本的积聚。垄断组织日益发展起来（在美国最为典型的垄断组织是托拉斯），出现了钢铁大王摩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财团。七十年代石油部门成立了托拉斯组织。八十年代纺织、酿酒、制糖、制革、烟草等部门也都建立了托拉斯。九十年代煤、铁、瓦斯等的开采也托拉斯化了。1899年美国产品总值的三分之二是托拉斯制造的。1901年美国有大的工业、公用事业和运输业托拉斯四百四十家，资本为二百零三亿七千九百一十六万一千五百一十一美元。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和银行资本的积聚，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溶合成长为金融资本。1903年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不仅控制了钢铁生产、石油生产，而且还控制了一百二十家银行、铁路、保险公司等。1909年占美国企业总数1%的三千个大型企业，掌握了国家全部总产值的差不多一半。美国成了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一小撮金融寡头是美国的真正统治者。他们控制着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左右着国家的内外政策。

美国垄断资本家都是残酷无情、用以大吞小等方式起家的，例如约翰·D·洛克菲勒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工业巨头之一。他1865年进入石油界，发现这是一个大有前途的工业部门。1870年，他成立美孚石油公司，陆续收买其它炼油厂，到1872年春就控制了克利夫兰二十六家炼油厂中的二十一家。1873年，他趁着经济危机，低价买进竞争对手的财产。七十年代，美孚石油公司把它的营业扩大到匹兹堡、费城、纽约和其他地方。到1885年，美孚石油托拉斯在克利夫兰等地经营了四十家炼油厂，在此后十年控制了美国炼油设备的90%以上。美孚石油托拉斯从汽油以及炼油的副产品赚取大量利润。它还敷设输油管，在国内外组织庞大的销售系统，自办运销业务，控制了石油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过程。据估计，约翰·D·洛克菲勒的财产1901年约为二亿美元，1913年已增加到九亿美元左右。

工人运动 美国工业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工人却遭受日甚一日的剥削。大量财富都集中到垄断资本家的手里了。1889年，有人在报刊上估计，约二十五万人占有了美国财富的大部分，其中有几十个人是百万富翁，至少有十个人的财产超过一亿美元。象洛克菲勒、摩根等那样的垄断资本家，只占美国家庭总数的1%，而1913年的收入竟高达全国总收入的15%左右。因此，在这个贫富悬殊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日俱增。

十九世纪晚期，特别在频繁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的阶级斗争往往具有尖锐的形式。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生产缩减、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美国四千万居民中有三百万人失业，连同家属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无产阶级的处境大大地恶化了。宾夕法尼亚1874—1875年纺织工人和矿工进行了广泛艰苦的斗争。1875年宾夕法尼亚无烟煤矿区工人举行大罢工，十名工人被处绞刑，二十四名工人被诬告组织秘密会社关进监狱。1873—1877年铁路工人工资被降低百分之二十五，但资产阶级并不以此为满足，1877年夏再度宣布减低工资百分之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了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罢工，从东海岸一直扩展到西海岸，主要铁路中心都发生了武装冲突，至少有五十名工人和其他的人在战斗中牺牲了。

美国一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没有关于劳动时间的立法，更没有关于工伤、疾病、失业、年老等社会保险制度的任何立法。因此，工人罢工斗争层出不穷。美国无产阶级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建立的美国全国劳工联合会，在工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八十年代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要内容。

1883年经济危机笼罩下的美国，资本家解雇工人，降低工资，工人生活极端困苦。日益加重的剥削造成了工人运动的基础。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全国举行声势浩大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总罢工，参加的工人有三十五万。这次罢工就全国来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建筑业等许多部门确立了八小时工作制。但在芝加哥罢工遭到了血腥的镇压。5月3日芝加哥工人集会时，警察向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六名工人。这一暴行激起了工人极大的义愤。5月4日三千名工人在秣市广场举行抗议大会。傍晚，当会议结束时，有二百名荷枪实弹的警察跑来镇压。警察雇用的破坏分子投掷了一枚炸弹。警察以此为借口，立刻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打伤二百多人，并逮捕了数百名工人。1887年夏，七名被捕工人被芝加哥法庭判以绞刑。

法庭的横蛮判决引起了美国和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抗议浪潮，但伊利诺

斯州当局一意孤行，仍将四名工人处死。其他三人一人死于狱中，二人改判无期徒刑，一直到1893年才被赦免。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罢工斗争有重大的国际意义。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决议，把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恩格斯说：“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

当1866年美国工人为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的时候，美国另一个工人组织“劳工骑士团”正处在它的极盛期。劳工骑士团产生于1869年，最初是秘密组织，七十年代末转入公开活动，会员迅速增加。它一方面声称要把工人从资本家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但是它的领导人却反对政治斗争包括罢工在内。劳工骑士团拥有非熟练和半熟练的广大工人群众，他们不顾领导人的反对，积极参加了罢工斗争。由于骑士团领导人拒绝支持工人的要求，这个工人组织开始衰落了。八十年代建立的工联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也促进了劳工骑士团的衰落。美国劳工联合会有时在罢工的帮助下，使工会会员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是在塞·龚帕斯的帮助下，美国劳工联合会很快就成为维护高度熟练的、工资优厚的工人的狭隘行会利益的工具，逐渐同企业主合作。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社会主义者、美国工党的领导人尤·德布斯指出，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成了“资本家阶级的工人伙计”。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无产阶级同正在兴起的垄断组织发生冲突，又不断卷起罢工运动的新浪潮。1894年，罢工者人数达到七十五万。二十世纪初，罢工具具有更广泛的规模，1912—1913年约有二百万名工人参加罢工。由于劳联领导人的阻挠，垄断资本家的收买破坏，政府的镇压，加上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的错误，罢工运动屡起而又屡遭失败。

两党政治和对外政策 内战结束以后的最初二十年，共和党人连续执政，但是它没有下决心把黑人的解放进行到底，而且逐渐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排挤出去。共和党变成了大工业家和银行家的政党。民主党牢牢地保持着自己在南部的影响，它的靠山是大种植场主、富农、南部的大资产阶级和北部资产阶级中对自由输入国外商品有利害关系的那一部分人。随着向帝国主义的过渡，两党之间的差别开始消失。1885年，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就任总统，又开始了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

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候，美国国家政权日益集中到垄断资本家手里。两党政治是他们控制政权和粉饰政治局面的方式。而且两党上台执政都不会稍损垄断组织的利益。举例说，托拉斯的勃兴和它的种种做法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和恐惧，遭到了坚决的反对。在1888年大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都主张制定反托拉斯法，但在大选以后，这两个政党都不特别急于推动国会解决这个问题。1890年国会通过反托拉斯法以后，联邦政府并不急于采取强有力的实际行动。据统计，1904年有四百四十五家托拉斯，它们合并了近八千七百家公司。而四百四十五家托拉斯中，有三百六十六家是在国会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以后（具体说是1891年到1903年）组成的。有时候，联邦政府表面上好象在进行“反托拉斯战”，实际上不过是不同的垄断组织之间的斗争。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并不以剥削本国劳动人民为满足，积极开辟向世界扩张的道路。扩张主义分子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在1898年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

西班牙在战争中失败。根据美西和约，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得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西班牙承认古巴“独立”，实际上古巴成为美国控制下的

保护国。美西战争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美西战争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抱着称霸世界的野心，加紧向外展开重新瓜分世界斗争的开始。列宁说：“古巴、菲律宾和夏威夷，这不过是盛餐之前激起食欲的‘小吃’。”——美国加紧对拉丁美洲侵略的同时，也积极向亚洲扩张。

美国觊觎和侵略中国由来已久。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照会英、德、俄、法、日、意，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这就是要求和其他帝国主义共享侵略中国的权利，然后凭借自己经济的优势，排挤其他帝国主义，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1900年美国又参加了八国联军，残暴地镇压义和团运动。

二十世纪初，美国又以“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作为对外侵略的手段。1901年就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即老罗斯福）早就厚颜无耻地说：“应付国际关系的正当办法在于嘴里说话要温和，手里要提根大棒”。“大棒政策”首先成了美国公开干涉拉丁美洲各国内政的通用名词。老罗斯福毫不掩饰地宣称：“在西半球，美国对于门罗主义的信念可能迫使美国履行国际警察力量的义务。”

老罗斯福最露骨地推行“大棒政策”的强盗行为，要算夺取巴拿马运河区了。巴拿马运河早已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由法国公司破土开工，美国利用该公司破产的机会，1902年购买公司股票，排挤了法国。1903年老罗斯福竟在哥伦比亚组织叛乱，策划成立了巴拿马共和国。美国不仅立即承认它的“独立”，而且派去海军陆战队“保护”这个共和国。1903年11月18日，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签订了美巴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国攫取了运河的开凿权，并获得穿过巴拿马地峡沿运河地带的永久租借权。1914年巴拿马运河凿通后，美国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程缩短了一万多公里，两大洋的舰队可迅速相互调遣，这就大大地便利了美国向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进一步扩张。

1905年因多米尼加共和国拖欠债务，美国直接派人收税，引起农民的骚动，结果美国派海军陆战队占领了这个共和国。1906年美国对古巴的起义进行了武装干涉。美国就是以如此使用武力，挥舞大棒，建立了对加勒比海的控制。

继老罗斯福后担任美国总统的是塔虎脱，他不仅继续奉行“大棒政策”，而且为了适应金融资产阶级的需要，推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拉丁美洲的政策，提出了所谓“金元外交”。塔虎脱解释“金元外交”时说：“这是以金元代替枪弹的政策”。

美帝国主义的“金元外交”和“大棒政策”相互配合交替使用，并无原则的区别。塔虎脱在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等国利用贷款控制它们的财政，夺取英、德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一旦美国的经济侵略遭到抵制，它又不惜采用武装干涉，实行军事占领。如，1909年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和占领就是一个例子。1913年，民主党人威尔逊就任总统，假惺惺地宣布推行睦邻政策，但是不久他就出兵干涉墨西哥，自己扯下了睦邻政策的伪装。

第七节 日本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状况 日本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后，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

明治政府主要利用从农民手中掠夺来的大量地税，由国家带头大力发展军事、运输、电信、矿山、纺织、缫丝等官营工厂，并从外国输入机器、聘请技师。

日本的工业发展是和军事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治政府以德川幕府时代建立的军工企业为基础，不断充实、扩大，一直到1877年前后，大致调整完毕，结果形成东京、大阪两大陆军工厂及其所属工厂，筑地、横须贺两大海军工厂及其所属工厂。

为了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建立了一批采用西方先进设备的“模范工厂”，借以传授和推广新技术。同时，又拨给私人企业主以补助金、贷款，免除他们的捐税。1880年开始，政府把除军事工业以外的大部分官办企业转让给私人经营。如，三井家族取得三池煤矿、新町纺织厂、富冈缫丝厂等。三菱公司得到高岛煤矿和长崎造船厂等。其余还有古河、浅野、川崎、久原等人也获得很多工矿企业。明治政府“处理”国营工矿企业，条件优，价格低，几乎等于无偿转让。这不仅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力量，而且是运用国家权力促使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的重要措施，还起了促进工业革命的作用。1868年时全国只有四百零五个工业企业，并且主要是手工工场，1877—1886年发展到七百六十个。1893年拥有十个工人以上的工业企业有三千零十九家，其中使用机械动力的只有六百七十五家，1903年增长到八千二百七十四家，其中使用机械动力的为三千七百四十一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纺织业中，工厂制品已占绝对优势，军事工业、机器制造、钢铁、煤炭等近代重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

日本几乎没有经历“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是封建时期就享有特权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在政府的保护和培植下，依靠压榨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对邻国进行掠夺性的战争和勒索大量赔款来实现工业化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不仅确立了资本主义，而且走上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八十年代制造和销售纸张、纺织业、运输业等部门中出现了垄断组织。1909年三井改变了原来的组织，成立了有资本五千万日元的三井合名公司，统辖分立的商业、矿业、银行、仓库等企业。三菱在三菱合资公司下，统辖矿山、造船、运输、银行、地产等企业。1913年各部门的垄断企业，已控制了日本工商业资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与金融资本相适应，形成了少数金融寡头。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这些财阀通过巨大的经济力量，操纵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国家机器。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将由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来治理了！”

在日本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无产阶级也诞生并成长起来了。1882年国营工厂工人总数为四千七百五十八人，民营工厂总数为五千一千一百八十九人。1895年到1899年国营工厂工人总数为二万二千四百六十五人，民营工厂总数为四十二万五千六百零二人，其中妇女几乎占百分之六十。

明治改革后，农业中仍残存着以半封建地主制为核心的各种封建关系，

农民生活极端困苦。由于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处于半失业状态的农民，因实行长子继承权，长子不出去做工，不得不把长子以下子女忍受低工资送去当工人。日本工业中又实行多种具有封建性质的剥削制度，厂主、监工、老工头有绝对的专横权。其中矿山、纺织、水产等部门工作条件最为恶劣。如高岛煤矿，1884年发生霍乱，公司派人将患者放在铁板上活活烧死。这样被害和死掉的工人达该矿矿工总数的一半，一千五百人。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整年裸体赤足，即使隆冬季节也没有一条被。工人终年劳动得不到分文，反而负债累累。如果触犯了规则便遭受鞭打，常有矿工被活活打死，其惨状目不忍睹。因不堪虐待而上吊、剖腹身亡者比比皆是，仅1885年高岛矿工死亡总数就有八百七十五人。日本工人比欧洲工人生活更为悲惨，日本女工的最高工资也仅相当于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但平均每个纱锭每年消费的棉花，英国是三十五磅，而日本竟达二百二十磅。1890年国营工厂熟练工人的工资平均每天为两角四分。纺织业的工资男女平均为一角七分，女工平均为八分二厘。每天十二小时一班。每天只得四分钱工资的女童工也不在少数。

日本工人阶级处在惊人的贫困和政治压迫之下。

民权运动 明治政府的改革使人民大失所望，在普遍不满西南萨摩、长州一小撮“藩阀”专政的情况下，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掀起了争取自由和人民权利的运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运动达到巨大的规模，曾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1882—1884年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性质，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是由被排挤下野的政府前任参议板垣退助等人发起的。板垣周围的知识分子片冈健吉等也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

由于实行加强对农民压榨的地税改革，1875—1878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1876年12月爆发了由三重县开始，波及邻近四县的大规模的起义。1877年片冈等向天皇提出弹劾政府的建议，谴责政府的地税制度和以人民的税款资助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些要求主要代表中小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也说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和农民、工商业者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了。

1880年3月，民权运动的团体在大阪成立了“国会开设期成同盟”，11月该同盟的人数已有十三万。在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的压力下，1881年10月公布了天皇诏书，允诺1890年开设国会。

1881年民权运动的团体，在东京以板垣为首组成自由党。自由党内自由主义的中小地主起主要作用，它也得到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相当多的农民的支持。自由党在运动中比较激进，提倡“主权在民”，争取“民定宪法”。它的地方组织常与农民结合在一起，领导人民进行反专制政府的斗争。如1882年福岛县自由党人的反迫害斗争和农民反地方政府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展成大规模的起义。1884年5月群馬县自由党人领导三千余人发动起义。同年9月一批自由党人在茨城县也发动了武装起义。

1882年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大隈重信组成了立宪改进党，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他们是运动中的温和派。

政府对民权运动除了镇压外，还施展挑拨离间之能事。大资产阶级又对各个党派首领进行收买。自由党党魁得到三井商会的支持。立宪改进党和三菱商会有密切的关系。为此，它们之间反唇相讥，但使反对党削弱的重要原因还是党魁和普通党员之间阶级利益的不同。自由党更为明显，板垣等主要代

表“新地主”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利益。他们主张合法斗争，而普通党员则往往采取直接暴动。这不仅使政府感到恐惧，而且连自由党首领们也感到惊慌。因此，1884年自由党宣布解散。自由党解散后，人民斗争并未停止，起义仍不断发生。

在农民的起义、工人的罢工斗争和民权运动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被迫让步，做一些改革。1885年12月开始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制；1889年用天皇名义公布了日本宪法，它以最反动的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是国家元首。他有权召集和解散议会、任免高级官吏、统率陆海军。宪法虽然规定，臣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日本宪法于1890年开始实施，同年7月为开议会进行了众议员的选举。11月，“帝国议会”正式成立。这样，日本拥有内阁、宪法和议会，形式上具备了君主立宪制的条件，实际上天皇仍保有极大的统治权力。

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 明治维新后，在国家政权中，封建贵族和武士出身的军阀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直接统帅军队，并掌握着军事工业。由于农业中还保持着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穷困不堪，国内市场狭小；而且依靠不平等条约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外商和日本商品进行剧烈的竞争。因此，在国家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便和军阀们勾结在一起，积极推行军国主义化的政策，用直接向邻国的军事扩张来力图获得高额利润并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

1872年日本把琉球国王绑架到东京，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属地，1879年改为冲绳县。1874年日本借口1871年琉球渔船在台湾海岸附近遇难事件，从中国清朝政府敲诈勒索了五十万两白银的赔款。1876年、1882年日本先后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仁川条约》，反映了它攫取朝鲜的野心。

1894年，日本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利用国际形势的有利时机，7月25日对中国不宣而战。日本侵略军不仅大举入侵朝鲜，并且渡过鸭绿江占领了中国东北部分领土。在1895年4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屈辱的《马关条约》中，有中国承认朝鲜“独立”，朝鲜实际上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二亿两白银等条款。日本的劫夺使沙俄鲸吞我国东北的计划受到威胁。因此，沙俄联合德、法要求日本退还辽东半岛。日本被迫同意还辽，但要中国增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沙俄自恃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给它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1898年又强行租借了旅顺、大连。

中日战争加速了日本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

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变本加厉地推行吞并朝鲜、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政策，这和沙俄加紧在亚洲扩张以争霸世界的政策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终于酿成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日俄战争是日本在英美支持下，两个帝国主义强盗之间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肮脏战争，最后腐朽的沙俄政府被打败。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根据条约，沙俄承认日本在朝鲜的统治权，将旅顺、大连、中东铁南线等从中国夺得的权力转让给日本，并把库页岛南半部割让给日本。

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的这场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境内。它粗暴地践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使我国人民又遭受了一次野蛮的浩劫。通过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日益走上了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道

路。

中日战争前夕，日本利用英国企图使日本阻止沙俄南下的打算，于 1894 年 7 月中签订了日英修正条约。条约规定废除英国在日本享有的治外法权，日本关税也基本上得到自主。同年 11 月起至 1897 年年底，日本同欧美有关国家签订了同英日修正条约相似的新条约。新约 1899 年生效以后，日本开始摆脱了外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幸的是，日本已从被压迫的国家向压迫别国的国家转化了。

工人运动 处在资本主义和封建双重压迫之下的日本工人阶级，长久以来始终不渝地进行着英勇顽强的斗争。1870—1883 年高岛煤矿工人发动了五次暴动。1883 年三池工人举行暴动。1884 年甲府市雨宫缫丝厂女工举行罢工，并取得胜利，这是日本近代产业工人的第一次罢工。1889 年东京冶金工人组织了第一个工会“同盟进工组”，这一切已经开始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成长。

中日战争后，由于工业的发展，1894 年到 1898 年注册的工人，从三十八万一千三百九十人增至四十一万二千三百零五人。仅 1897 年，工人罢工就有九十二次之多，为促进适应工人运动的发展，日本杰出的工人阶级领袖片山潜于 1897 年建立了“劳动组合期成会”。期成会促进了日本无产阶级的团结，对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97—1899 年东京成立了铁工工会、铁路工会、印刷工会。期成会和铁工工会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劳动世界》，片山潜任总编辑。

1898 年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 年发展为“社会主义协会”。1901 年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它虽然没有提出革命的斗争方法，却提出了正确的纲领，要求重要生产资料国有化、国家民主化，反对军国主义。它成立不久，就被当局禁止了。1903 年幸德等组织了“平民社”，出版了《平民新闻》。这个刊物成为日本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和反战宣传的中心，还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译文等重要著作。1905 年 1 月政府勒令《平民新闻》停刊。不久平民社也被迫解散。然而，反战运动并没有停止。1905 年 9 月在东京发生了反战、反政府的大暴动。在这次斗争中，群众伤亡达六百余人，被捕者达一千五百六十五人。

1906 年社会民主党以日本社会党的名称重新建立，1907 年初《平民新闻》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复刊。但社会党恢复不久，党内发生了严重分歧。主张工人“直接行动”的幸德和主张合法斗争的片山潜、田添铁二相对立，不过片山潜以后纠正了自己改良主义的错误。1907 年 2 月政府下令解散社会党，4 月《平民新闻》被迫再度停刊。

1910 年反动当局利用幸德等人的无政府主义错误，以准备谋杀天皇的罪名逮捕了幸德和他周围的一些同志。第二年政府下了毒手把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幸德等十二人处以绞刑。

日本反动政府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倒工人阶级，1911 年 12 月在片山潜领导下，六千名电车司机和售票员罢工取得胜利。事后片山潜因此被捕，出狱后不得不流亡国外，1921 年到了苏联。1922 年领导了日本共产党的创立工作，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 年在莫斯科逝世。

第八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

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 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对本国劳动人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与掠夺，同时利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1870 年到 1900 年的三十年中，世界工业生产增长了二点二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变化，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这些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时期。

帝国主义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垄断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在国家生活中具有支配作用。垄断组织有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主要形式。在德国，1907 年不到 1% 的大企业，雇有工人五百七十万，拥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和电力。在美国，1904 年产值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大企业有一千九百个，占企业总数的 0.9%，它们的产值为五十六亿美元，占总产值的 38%。英、法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七十年代以后，由于技术装备陈旧和资本的大量输出，垄断组织发展较美国和德国缓慢，但生产集中也有显著的加强。

随着工业生产的集中和垄断，二十世纪初，银行的集中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1909 年柏林九家大银行及其附属银行，支配着一百一十三亿马克，约占德国银行资本总数的 83%。美国亿万富翁摩根和洛克菲勒为首的两家最大的银行集团，控制着美国的银行界。英国 1900 年股份银行的数目有九十八家，到 1913 年减少到六十一家，其中五家最大的银行占全国存款的 40%。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等三家最大的银行分行总数达一千二百二十九家，遍布全国，在法国经济政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银行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大银行利用信贷和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方式，对工业进行控制；同时，在银行向工业渗透的过程中，工业垄断组织也通过购买大银行股票，自己开办银行等方式把自己的势力打入银行业，二者日益溶合在一起，形成金融资本。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柏林六家最大的银行由经理、董事作代表，一共参加了七百五十一个各种性质的企业；另一方面 1910 年在这六家银行的董事会中，有克虏伯公司的经理等五十一个最大的工业家参加。

商品输出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特征。资本输出到帝国主义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金融寡头为了取得垄断利润，除对本国广大劳动人民加强剥削和奴役外，并把“过剩资本”大量地输出到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去。由于这些国家工资低、原料便宜等原因，输出资本可以取得高额利润。

垄断资本家之间不仅在国内分割市场，而且他们也成立了国际卡特尔，以便在各国垄断组织之间分割世界市场。如二十世纪初，美国和德国两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电气工业最为发达。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不依赖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和德国电气总公司这两个托拉斯的电力公司。它们一直为瓜分世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1907 年这两个公司为了防止竞争造成损失，暂时妥协，

订立了瓜分世界的条约，形成了国际垄断同盟。根据条约，通用电气公司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电气总公司分得德国、奥地利、俄国、荷兰、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干各国市场。1897年德国参加的国际卡特尔有将近四十个，到1910年已有将近一百个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领土已分割“完毕”。1876年以后英、俄、法、德、日的殖民地领土有了极大的扩张，到1914年这六个强国的殖民地增加到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比宗主国的面积差不多大四倍。1914年英国殖民地的人口近四亿、俄国三千三百多万、法国五千五百万、德国一千二百多万、美国九百多万、日本一千九百多万。但是各国经济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如下：

地位	1860年	1880年	1900年
第一	英国	美国	美国
第二	法国	英国	德国
第三	美国	德国	英国
第四	德国	法国	法国

由于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殖民地最多，后起的暴发户美、德等国向前迅速跃进，要求按照新的力量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和夺取势力范围的斗争日益尖锐。德国首相毕洛夫1897年在议会的讲话中说：“让其他民族瓜分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欣赏蔚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要求自己也取得阳光下的一席之地”。因此，战争已成为帝国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侣。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 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各自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在形成帝国主义时也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英国通过疯狂的掠夺别国领土，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它的殖民地面积达本国领土的一百多倍。列宁称它为“殖民帝国主义”。__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特点是通过借贷方式把资本大量输出国外。1914年对外投资总额为六百亿法郎，按最低利率五厘计算，每年可获三十亿法郎。它是一个“高利贷帝国主义。”__美国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和资本急剧集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托拉斯已成为美国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力量。列宁说：“美国托拉斯是帝国主义经济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__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托拉斯帝国主义。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成为除美国外最大的工业强国，但它还保存着许多封建残余，是一个“军阀的、容克的、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的国家”。__日本统治阶级除残酷的压榨劳动人民外，是靠掠夺战争起家的，它的垄断资本和国内封建残余交织在一起，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__

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各有一些不同特点，但垄断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__但是列宁同时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__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家为了使他的产品低于社会劳动的必要时间，就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在竞争过程中得到较多的利润。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组织通过对生产和市场的垄断，保证了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因此，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所以垄断必然束缚社会生产力，阻碍技术的进步。

在帝国主义时期少数富强的国家集中了大量资本，形成了庞大的食利阶

层，他们完全脱离生产，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特别是随着资本输出的增长，少数富裕的国家成为专靠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食利国。列宁举英国为例说：“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列宁把资本输出称为“加倍的寄生性的表现。”——

帝国主义的腐朽性还表现在政治上的全面反动。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为了适应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是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但是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连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也抛弃了。国内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镇压，对外加强实行强权政治，血腥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列宁说：“自由竞争要求民主制。垄断则要求政治反动。”——

帝国主义的腐朽，也表现在资产阶级从垄断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来收买工人上层，培植工人贵族，使他们背叛无产阶级事业，以便从内部破坏和瓦解工人运动。工人贵族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几种矛盾的加剧 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以后，得出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为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固有的一切矛盾都空前尖锐起来。

第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加重了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与政治上的反动统治，迫使无产阶级团结并带领各阶层人民，走上了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第二，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广大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野蛮的掠夺，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这种情况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由帝国主义的后备力量，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力量。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帝国主义矛盾的实质是几个大国相互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霸权是以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依据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它的绝对规律。列强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世界殖民地已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要求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不可避免要导致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者彼此削弱，给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所以列宁说：“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第十六章 第二国际

第一节 第二国际建立的历史背景

国际工人运动的广阔发展 巴黎公社以后到日俄战争以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它们内部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__资本主义在一种较为“和平”的条件下发展着，发展的趋向是自由竞争向垄断统治过渡。

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__当时英国工业革命早已完成，法国已经完成，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迅速趋于完成。经济在发展，从 1870 年到 1900 年，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二十三上升到七十三（以 1901—1913 年为一百）；从 1881—1900 年，世界三十三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增加了 50%，商品流通总额从一百二十亿九千万美元增加到一百八十亿九千万美元；从 1870—1900 年，世界铁路的总长度从二十万九千余公里增加到七十九万余公里。

由于工业的发展，工人人数也在迅速增加，例如在德国，1894 年到 1902 年间的工人人数，比 1868 年到 1878 年间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一倍。更为重要的是，十九世纪晚期国际工人运动得到了广阔发展。

巴黎公社遭到镇压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但是为时不久，所有工业发展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都以新的战斗姿态投入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他们掀起了罢工浪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俄国，七十年代就发生了三百多起罢工和风潮。在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顶住了俾斯麦政府《反社会主义非常法》的镇压，利用一切工人组织如互助储金会、教育俱乐部秘密运送《社会民主党人报》，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国会提出保护工人的法令草案。1889 年，鲁尔九万矿工罢工，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提高工资。他们抵抗前来镇压罢工的警察。声援鲁尔罢工的运动遍及德国。俾斯麦的反动统治受到致命的打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经受了严峻考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 1890 年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将近一百万张选票和三十五个议席。在法国，1886 年发生了德卡斯维尔矿区大罢工。罢工工人抵抗了军警的镇压。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德和拉法格保卫德卡斯维尔的罢工斗争，揭露了资本家的谎言和政府的暴行，遭到非法审判，但是在工人强大斗争的威力下，法庭只得宣布他们无罪。在英国，工人逐渐从宪章运动以来的沉寂状态中觉醒过来，特别是广大的非熟练工人积极起来斗争。1889 年，煤气工人举行罢工，争得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胜利。不久，伦敦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达到了提高工资的目的。在这次罢工中，煤气工人组织了英国工运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工会——“煤气工厂工人联合会”，此后几年间，英国成立了许多非熟练工人组成的新工人联合会。罢工运动的浪潮也席卷了美国。1884 年，美国发生了近五百起罢工和关厂事件。1886 年，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更成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

国际工人运动的广阔发展，还表现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在许多国家的建立上。早在 1871 年 9 月第一国际伦敦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言，论述了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组织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那次会

在一项决议中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组织成为政党，是为了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实现社会革命的最终目的——消灭阶级。”^①

欧美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物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导，积极从事建党活动。当时，德国工人阶级已于1869年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党——社会民主工党。但是德国工人运动仍然分为爱森纳赫派（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1875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两派才统一起来。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工人组织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法国工人党。七十、八十年代，美国产生了社会主义工党（1877年），俄国成立了劳动解放社（1883年），英国出现了社会民主同盟（1884年），意大利（1882年）、比利时（1885年）和挪威（1887年）都组织了工人党，奥地利（1888年）、瑞士和瑞典（均1889年）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党。

当时的工人党和社会党都还不成熟，例如其中最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里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1882年以前法国工人党内部既有盖德和拉法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包括机会主义分子布鲁斯和马隆一派，即“可能派”。在一些党内，还有许多人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甚至还附有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连同“工人贵族”在各国工人阶级内部的破坏作用，都对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成长和巩固起了妨碍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积极指导各国年轻的工人党和社会党，帮助各国党的马克思主义者纠正错失，另一方面积极进行理论著述，继续向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1875年，马克思鉴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充满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认为那是一个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因此写了《哥达纲领批判》，逐章逐句批判了纲领中的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同时，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国家学说，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必然性。他写道：“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在一封信里，马克思告诫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决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③

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里，混进了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柏林大学哲学和经济学讲师欧根·杜林（1833—1921年）就是其中的一个。1871—1875年间，杜林相继抛出了《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等三本书，到处招摇，说他构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恩格斯同马克思经过商讨之后，决定停止其他写作，全力反击杜林的挑战。从1876年5月到1878年7月，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后来集印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反杜林论》。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唯心论的先验论，阐明了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人们的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原理；针对杜林把对真理的认识说成是“到顶”的谬论，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论证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关系、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关系。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方面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穿了那是假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驳杜林的同时，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捍卫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1880年，恩格斯应法国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即《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章改写成一篇

独立的通俗著作。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首先在法国出版，以后又被译成多种文本在许多国家印行。它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了巨大作用。

在这同时，马克思继续撰写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1870年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初稿以后，马克思为第二卷、第三卷搜集新资料。为了写地租一章，他特别注意研究美国的尤其是俄国的土地关系。为了查阅俄国的资料，五、六十岁的马克思还学习俄文，终日孜孜不倦，坚持一贯治学的严谨态度。由于过度劳累，马克思在晚年健康状况很差。1883年3月14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他的工作椅上与世长辞。3月17日，马克思被安葬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在墓前讲话中，恩格斯高度综括了马克思的伟大业绩，特别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
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因此，“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例如《共产党宣言》用各种文字一再重版，广泛发行，它的基本思想指导了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创办各种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法国的盖德和拉法格，美国的左尔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都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自己还出版了许多捍卫和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中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教育了俄国整整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都是文献中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国际工人运动的加强，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第二国际的建立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二节 第二国际成立和它的初期活动

第二国际成立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法国工人运动暂时陷于瘫痪状态，英国工联的领袖们借口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袒护巴黎公社声明退出国际；在一些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里，由于巴枯宁一伙无政府主义者的扰乱，工人运动分崩离析。他们因此认为第一国际没有活动余地而主张“暂时退出舞台”，但并不是要放弃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原则。他们的斗争实践表明，他们不仅期待而且积极创造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有利条件。

第一国际解散以后，各国工人没有自己的国际组织了，但是举行过多次国际性的工人代表大会。由于1881年以前在代表大会上起作用的是无政府主义者，以后是工联主义者，1883年以后是法国机会主义者——可能派，这些代表大会不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不愿参加。马克思以及马克思逝世以后的恩格斯都认为，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派别划清界限以前，不急于成立新的国际组织。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对各国工人的影响日益加强，各国工人对巩固国际联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1887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近期内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如法国的可能派和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利用各国工人要求团结的愿望，企图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88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人代表大会”上，法国的可能派得到英国工联主义者的支持，取得了在1889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利，其目的是成立新的“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让可能派占有成立新“国际”的主动权。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出面召集，1889年2月在海牙举行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决定于同年7月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邀请所有工人党和社会党、包括改良主义政党在内派代表参加大会。可能派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也邀请各国党派代表参加7月间在巴黎由他们召开的另一个大会。

壁垒分明，情况紧张，为了保证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成功，恩格斯暂时放下其他工作，“象一个青年人一样投入战斗”，无微不至地为开好大会进行准备。

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纪念日，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由巴黎公社的老战士瓦扬和“革命的士兵”威廉·李卜克内西主持开幕。会议大厅悬挂的标语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巴贝夫、布朗基、瓦尔兰的法兰西的名义向两半球的社会主义工人们致敬！”“政治上、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这些标语反映了大会的精神：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坚持法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坚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三百九十三名，代表欧美二十二个国家的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如英国的卡尔·哈第，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蔡特金和伯恩施坦，法国的盖德和拉法格，荷兰的纽文胡斯，奥地利的阿德勒，比利时的王得威尔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

大会听取了各国代表的报告，那些报告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有的代表发言，号召“消灭资产阶级的巴士底狱”。列入大会议程的

重要议题，有关于组织工人举行“五一”示威游行问题，关于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问题。

大会根据法国代表团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五一节的决议。决议规定，每年的5月1日，即美国芝加哥工人在1886年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罢工的日子，组织国际性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以便各国工人都在同一天里要求执政当局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实现国际代表大会的其他决议。从此，每年5月1日就成为各国劳动者的国际节日，成为检阅工人阶级战斗力量的日子。这次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正确指出，工人阶级只进行经济斗争是不够的，必须参加政治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说各国工人应该“利用自己的投票权竭力在现存政权的条件下夺取政权”。这就过高地估计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忽视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的同时，可能派召集的代表大会也在巴黎举行。在前一个大会上，有人（如哈第、纽文胡斯）采取调合态度，主张同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合并。法国、瑞典、挪威和部分英国代表反对合并。一位法国代表指出：“社会主义者不会欢迎可能派，因为后者仅仅是资产阶级政客，……尽管如此，无疑地在可能派当中还是有可以信任的社会主义者。愿这种人到我们这一边来”。李卜克内西发言，反对“不惜任何代价”的合并，并且提出了合并的条件。大会的大多数代表赞成李卜克内西的提议。由于可能派拒绝，合并没有实现。恩格斯在伦敦，密切注视大会的进展。他认为在合理条件下，合并是件好事情；如果无条件合并，就是欺骗。

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新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了。它当时没有建立起来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的中央领导机构，但是它规定了定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制度。

第二国际的成立促进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1890年的“五一”节，首次唤醒了千百万从来没有参加过政治斗争的工人行动起来。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和美国许多城市里，5月1日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游行。这一年英国工人的示威游行延期到5月4日，仅在伦敦就有二十万工人参加。恩格斯记述1890年“五一”节时写道：“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知道：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他更带着激情写道：“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第二国际的初期活动 第二国际初期，相继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1891年8月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93年8月的苏黎世代表大会，1896年7月至8月的伦敦代表大会。各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代表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因此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巨大力量，连资产阶级也不能否认。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是统一的国际代表大会。可能派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大会议程，也不得不放弃进一步分裂国际的意图。这样，在大会上，主动权就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

从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到伦敦代表大会，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大批破产的小资产阶级涌入无产阶级队伍，带来了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第一国际时期被击溃的无政府主义，重新滋长起来。无政府主义者在1890年到1891年靠着无产阶级的不稳定分子，得以在许多国家的工人中加强影响。他们的代表有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德国的“青

年派”和荷兰的纽文胡斯分子等。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切权力都是罪恶，因此否定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思想，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他们主张工人采取“直接行动”，认为最后举行国际性的经济总罢工就能使工人获得解放。无政府工团主义还认为，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工会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只靠工会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里，无政府主义者还策划恐怖活动。

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的实际措施问题。李卜克内西发言指出：“只有建立起消灭人剥削人现象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结束军国主义，奠定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因此他建议“各国工人坚决地反对一切好战企图和一切支持这种企图的同盟，不倦地致力于成立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事业，以此来促进社会主义的胜利”。纽文胡斯发言，要求不论发生任何战争都应号召各国人民举行总罢工。他笼统地主张以总罢工反对任何战争，这就抹煞了战争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建议，通过了李卜克内西提出的决议，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1893年8月，无政府主义者企图混进苏黎世代表大会，以古斯塔夫·兰道尔为代表的德国“青年派”特别起劲。倍倍尔坚决反对他们，号召社会主义者不要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大会通过决议，只允许“承认建立工人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必要性的一切工会、社会党和社会团体”参加代表大会。这样，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被排除出去。伦敦代表大会又就参加下次代表大会的条件作出决议，明确规定“无政府主义者在排除之列”。在国际组织中，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胜利。

1893年，七十三岁高龄的恩格斯前往瑞士参加第二国际的苏黎世代表大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他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指着马克思的象谦逊地说，他认为大会的热烈欢迎不是对他个人的，他只是以一个伟人的战友身份来承受这份感情的。恩格斯说，自从他和马克思参加革命运动、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第一批社会主义论文以来，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了。这期间，社会主义者已经从很小的派别成长为使官方战栗的强大政党了。他说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应该成为第二国际的基础。为了不蜕化为小宗派，应该允许争论，但是一般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不变的。

自从马克思与世长辞以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在理论工作上，他毅然担当了整理马克思手稿的任务，使《资本论》第二、三卷得以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出版。他继续撰写了许多著作，如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1886年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前者论证了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实质，后者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革命活动上恩格斯指导了第二国际的创立工作，指导了反对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法国工人党的领导人盖德都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估计过高，对机会主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恩格斯帮助他们纠正了许多错误，坚决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逝世。按照他的遗嘱，遗体火化，骨灰葬入大海。列宁引用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写道：“怎样一盏理智的明灯熄灭了，怎样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恩格斯逝世是国际工人运动的无

比损失。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战线因此削弱了。

第三节 修正主义的泛滥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修正主义的泛滥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已经战胜了其他一切思想体系，取得了领导地位，各国社会党也壮大起来。德国社会党当时力量最大，站在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前列。1893年德国选举，它获得将近一百八十万张选票，在议会里取得了四十四议席。1897年，在一些国家的选举中，社会党的候选人获得了二百八十万张选票，在议会里取得了一百多个议席。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物成了“议会迷”，迷信资产阶级民主，陷入改良主义泥坑。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妄图从内部来篡改马克思主义。当时，资本主义正在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国资产阶级利用超额利润的一小部分，收买工人中的上层分子，培植了一个工人贵族阶层。这些工人贵族摆脱了一般工人的灾难和痛苦，却也丧失了一般工人的革命意志。工人贵族的出现给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主要社会基础。修正主义因此泛滥起来，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当推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832年）出生于德国一个铁路工程师家庭，作过银行职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德国政府颁布“反社会主义非常法”，镇压社会主义运动。那期间，伯恩施坦离开德国，到了瑞士的苏黎世。在那里，他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赫希别格和施拉姆组成小宗派集团，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1879年，他们合写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公开鼓吹放弃阶级斗争。他们硬说工人阶级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争取解放，应当服从有教养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他们还妄说工人阶级只需关心最近的实际任务，只需“一站一站地”进行改良，而不必谈什么最终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批评他们的错误，指出他们参加了工人运动，却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以后，伯恩施坦收敛了一些。后来，他到伦敦，在恩格斯的指导下，编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改正他的错误观点。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又嚣张起来。他写了许多文章，攻击马克思主义。1899年，他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这本书集当时修正主义“理论”的大成，列宁说它是“叛变变节的作品”。

伯恩施坦说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还没有完成，而历史的发展又暴露了它的“缺点”和“矛盾”，马克思主义在许多方面已经“陈旧”和“过时”了，需要“修正”。他以马克思、恩格斯改正个别具体论点为口实，夸大其辞，说他们“已将他们的意见作了显著的修正”。他又说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成，必须以它的批判为第一步”。他在“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幌子下，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学说。

当时，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过渡。修正主义者以帝国主义初期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攻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解释。他们否认农业中有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他们硬说经济危机已经更少见、更微弱了，硬说卡特尔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还可以完全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他们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从工人、特别是熟练工人工资的稍许增加上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显著的改善。总起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消除它的内部矛盾，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越来越接近。他们的目的是妄图以资产阶级

的社会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

修正主义者否认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暴力机器。社会党在各国获得选票日益增加的现象，成了他们颂扬资产阶级民主和议会制的根据。他们认为普选权的实现已经意味着阶级统治的消灭，议会制民主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垄断的消除。他们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幻想用改良方法即经过和平道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说什么“在所有先进国家，资产阶级的特权在政治上正在不断地向民主让步。”“实则百年以前想来是需要流血革命的改革，在今天只需要用投票、示威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威压手段就能贯彻了。”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采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反对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千方百计地以资产阶级民主来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否认党的领导作用，歪曲党的性质。早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里，伯恩斯坦就攻击所谓“片面的”无产阶级政党，鼓吹什么可以容纳“一切富有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他认为党是工人阶级为了改进自身的处境而成立的组织，只应从事经济斗争，不应从事政治斗争。这就是要把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降低为改良主义的党、和平主义的党。

列宁后来概括地揭示了修正主义的实质。他说：“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反修正主义的斗争 1900年，第二国际在巴黎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决定设立社会主义国际局。国际局和它的秘书处负责公布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汇集各国党的报告，拟定关于“国际”活动的综合报告，筹备代表大会，就各项重要问题发表宣言。社会主义国际局由每个国家的代表团各推两名代表组成。比利时社会党的创始人王得威尔德被选为社会局主席。社会主义国际局设在布鲁塞尔。以前，第二国际没有一个中心组织，现在这个中心组织建立起来了。在巴黎代表大会上，“米勒兰事件”成为争论的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1899年，在法国，温和的共和主义分子瓦尔第克·卢梭出任总理。他邀请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加里福将军出任陆军部长，又邀请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首脑人物米勒兰担任工商部长。米勒兰出任资产阶级的内阁部长，在第二国际各国党里引起广泛的反响和讨论。这就是“米勒兰事件”。

在巴黎大会上，公开的机会主义者如德国的伯恩斯坦、福尔马尔和法国的饶勒斯认为，米勒兰入阁证明社会主义影响的增长，更说明社会主义者有和平取得政权的可能，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在一个政府里合作是毫不奇怪的现象。法国的盖德和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坚决反对这种“合作”。盖德指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不能同时做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的部长，又做社会主义者。无产阶级除了革命斗争之外别无出路。另外一些代表以德国的考茨基为首采取折衷路线，企图调和这场斗争。他们一方面宣称，个别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视为夺取政权的正当道路，另一方面又说什么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原则问题，而是策略问题，应当由各国党自己解决。大会通过了考茨基的决议草案。这就开辟了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堕落到同资产阶级合作的立场上的途径。

在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在各国党内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成了严

重的任务。反修正主义的，在德国倍倍尔、卢森堡和蔡特金等，在法国盖德和拉法格等。在俄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更是高举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对修正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卢森堡发表了《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卢森堡指出，指望通过资产阶级议会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空想，同伯恩施坦的争论已变成两种世界观和两个阶级的争论。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起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以后几年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谴责伯恩施坦主义，却没有在组织上同修正主义分子决裂。

马克思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即左派同右派之间，界限分明。以考茨基和王得威尔德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形成了中派。他们自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作盾牌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第二国际就逐渐分化为左中右三派。

列宁高举国际反修大旗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泛滥的时候，列宁还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当时，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中，普列汉诺夫写了《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批判了伯恩施坦以唯心主义偷换唯物主义的企图。后来，列宁称道这一点说：“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 当伯恩施坦的谬论传来的时候，列宁以及团结在列宁周围的、被流放的俄国社会主义者，坚决反击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机会主义者中间得到响应。在俄国，以马尔丁诺夫为代表的经济派就是伯恩施坦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同伯恩施坦持一个腔调。他们美化修正主义，说什么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给马克思主义造成了危机，说什么工人运动从《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起到伯恩施坦主义出现时止的发展是一种最合逻辑的过程。经济派迷恋单纯的经济罢工斗争，主张工人阶级的任务只是同厂主和资产阶级政府作经济斗争。1899年，经济派分子发表了称为《信条》的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独立的政治作用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必要性，公开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1899年8月，列宁在流放地召集流放在附近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他们反对经济派修正主义者。列宁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对经济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反击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抗议书》指出：“臭名远扬的伯恩施坦主义，……就是企图缩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革命的工人党变为改良党”。它还指出经济派“力图抹煞无产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削弱这个斗争，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一种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潮”。

 在《我们的纲领》一文里，列宁同修正主义者严格划清界限，是非分明。他严正宣告：“我们完全站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 修正主义者诡称他们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揭露说：“他们并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他们并没有教导无产阶级任何新的斗争方法；他们只是向后退，抓住一些零零碎碎的落后理论，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的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的理论，宣传对无产阶级的死敌、对不倦地寻找新花招来迫害社会主义者的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让步的理论。” 同时，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者应当继续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自此以往，列宁不仅从理论上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同修正主义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他在国际上高高举起反修大旗，把国际里的左派结集在这面大旗之下。

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 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激化，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日益迫近。各国工人阶级怎样对待战争，成了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和巴塞尔大会的中心议题。

1907年8月，第二国际在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城举行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八百多名代表来自五大洲的二十多个国家。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第一次出席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向大会提出的关于战争问题的决议草案共有四个，其中一个是倍倍尔以德国代表团的名义提出的。后来，大会的讨论集中在倍倍尔的决议草案上。这个草案说，近代战争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战争才能绝迹。它明确地指明了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它的缺点是，只提利用议会防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发生，没有指出无产阶级的迫切任务，特别没有指出利用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危机推翻资本主义。为了纠正倍倍尔决议草案的缺点，列宁和卢森堡对倍倍尔的草案提出了修正案。修正案从当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将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前提出发，明确要求，在战争威胁的情况下，各国工人应当运用最合适的手段去阻止战争的爆发。如果战争终于爆发，工人阶级有责任尽速结束战争，同时尽一切力量来利用因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唤起人民群众，去加速推翻资本家的阶级统治。大会通过了倍倍尔的决议草案和列宁、卢森堡的修正案。

帝国主义国家变本加厉地策划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1912年，巴尔干各国间发生了战争。俄国和奥地利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在交战国双方背后操纵。国际形势异常紧张。那年11月，第二国际在巴塞尔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讨论制止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问题。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各国人民利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就利用战争时机加速社会革命。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以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来反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宣言指出，让各国政府永久记住普法战争引起了巴黎公社革命，日俄战争推动了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认为，为了资本家的利润，为了各国王朝的野心，为了秘密履行外交条约而互相残杀是一种罪恶。宣言最后号召全世界工人，勇敢地反对一切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

斯图加特的决议和巴塞尔的宣言，给各国工人指出了正确的斗争途径。但是，第二国际和各国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没有认真地去实行。帝国主义战争一爆发，他们更公开地去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在1914年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

第十七章 亚洲的觉醒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处都掀起了民族民主运动。

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帝国主义各国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更加剧烈，亚洲成为它们争相吞蚀的重要对象。在西亚，英、法、俄、德控制了土耳其，瓜分了它的属地。在中亚，英国独占了阿富汗，并与俄国在伊朗划分了势力范围。在东南亚，英国以印度为基地兼并了缅甸，征服了马来亚半岛的大部分，法国侵占了印度支那的越、柬、老三国，英法还在泰国划分了势力范围，美国取代西班牙侵占了菲律宾。在东亚，日本吞并了朝鲜，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也划分了势力范围。亚洲各国相继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成为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主要场所和争夺霸权的战略基地。

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廉价商品的倾销，特别是资本输出的增强，亚洲各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体系陷于解体状态，民族资本主义的幼芽也破土顶砾而出。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阶层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意识产生了。

新的历史条件使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整个亚洲不仅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广阔战场，而且斗争的性质也出现了根本转变。在十九世纪末，亚洲各国除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起义外，又出现了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改良主义运动；到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与下层人民起义两股潮流相汇合，形成了汹涌澎湃的资产阶级革命洪流，从此，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便由旧式的农民战争时期跨进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即列宁所称誉的“亚洲觉醒”的时期。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亚洲的革命风暴

汹涌的农民战争 帝国主义侵占和控制亚洲之后，在政治上对亚洲各国或者进行直接的殖民统治，或者扶植封建势力进行间接的统治；在经济上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各种特权，对亚洲国家勒索赔款，强制借款，征发劳役，抢占土地，征收苛捐杂税，实行专卖垄断，发放高利贷，榨取封建地租等等，同时，还倾销商品，开办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经营工厂农场，垄断运输贸易，控制经济命脉，掠夺矿产资源和粮食原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掠夺，使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民大量破产，民族资本主义遭到摧残，亚洲人民处于极为悲惨的境地。1893年朝鲜发生全国性大灾荒，成百万农民饿死；越南的米仓湄公河三角洲也哀鸿遍野；1870-1871年伊朗农业歉收，饿死的农民达一百五十万人；十九世纪下半期，印度发生二十四次大灾荒，饿死人口达二千八百多万。

帝国主义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发展，激起了各国下层人民群众的起义。1887年在越南北圻安世地区黄花探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据险设寨，机动灵活，一再粉碎法国殖民者的军事围剿，迫使他们两次签订停战协定，承认游击根据地的存在。直到1913年，黄花探被殖民者派遣的内奸杀害，安世游击战争才告失败。但它前后坚持了三十年之久，打乱了法国殖民者吞并越南的步伐。

1894—1895年爆发了朝鲜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甲午农民战争。这次战争在全琫准（1854—1895年）领导下，以东学道为旗帜，提出“辅国安民”，“尽灭权贵”，“逐灭倭夷”的口号，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城市贫民、贱民、没落官吏和爱国儒生踊跃参加起义军，很快形成一支十万人的革命大军。1894年1月南方古阜郡发难后，势如破竹，4月28日就攻占了南方重镇全州，直逼汉城，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区，在五十三郡建立了农民政权。农民军提出了平分土地，解放奴婢，严惩朝奸走狗和贪官污吏等要求。李氏王朝的封建统治者为了获得喘息时间，与农民军签订和约，被迫同意农民军的要求。日本侵略者为了独占朝鲜，侵略中国，乘机派重兵攻占汉城，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派走狗政府，向农民军发动进攻，农民军连遭失败。1894年12月全琫准被俘，次年3月英勇就义。威震全国的甲午农民战争在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

1900—1901年爆发的中国义和团运动更是震撼中外。起义农民提出“驱逐洋寇”，“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口号，矛头直指帝国主义。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最后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但它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企图。

英国殖民政府和印度封建地主、高利贷者的残酷剥削和掠夺也激发印度农民一再地进行武装反抗。1872年旁遮普发生了锡克教起义，1872—1873年东孟加拉的农民举行反对柴明达尔的起义，1872—1882年南印度的马拉特族连续三次起义，袭击地主庄园和殖民税收机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反抗荷兰殖民者抢占土地的暴行，印尼爪哇岛上的农民在萨敏领导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土地、抗缴捐税的运动，历史上又称“萨敏运动”。

这次亚洲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因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而失败，但就农民战争本身来说还未跳出旧式农民战争的框子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思想上，他们虽具有炽烈朴素的爱国感情和民主要求，但却带有盲目排外

和平均主义色彩，而中、朝两国农民战争还披着宗教的外衣。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引导农民摧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在政治上，他们还认识不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奴关系，在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往往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者存有幻想，朝鲜甲午农民战争提出了“尽灭权贵”的口号，那也只是反贪官污吏，不反李氏王朝，因而受骗议和，坐失战机。在组织上，各国的农民起义往往表现出分散性，地域性，甚至在紧要关头发生分裂，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但是，广泛的农民战争的风暴以其英勇的战斗精神，体现了亚洲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气概，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促进了亚洲人民的觉醒，推动了资产阶级从改良走向革命，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灿烂光辉的篇章。

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 十九世纪晚期的亚洲，在农民进行喋血奋战的同时，也出现了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改良主义运动。

帝国主义剥削手段的改变，资本输出的增强，在客观上刺激了各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单一种植制的推行加速了农业的专门化、商品化，办厂开矿，修筑铁路客观上便利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亚洲国家的一些买办商人、地主、官僚和高利贷者开始投资于如碾米、面粉、榨油、造纸、纺织等轻工业及机器修理装配业等。印度的纺织业发展最快。1851年孟买出现了第一家纺织厂，1900年增至一百九十一家，纱锭四百九十四万枚，其中印度资本占三分之二。1894年中国民族资本已开办了一百多家近代化企业，1895-1904年又增加了一百六十八家，其中以纺织、缫丝、面粉、火柴业发展最快。土耳其、伊朗和菲律宾等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小型轻工业工厂，如地毯、呢绒、制帽、糖厂、五金加工厂和农产加工厂等。

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客观上不自觉地促成亚洲各国封建经济体系的解体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在主观上却极力维护和利用当地的封建势力，阻挠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必然激起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迫使他们加入民族解放斗争的行列。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争取民主改革的斗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印度出现了国民大会运动，1885年成立了国民大会党，宣传民权和自治，要求增加民选议员，实行关税保护。1898年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出现了“百日维新”，主张废科举，办新学，实行君主立宪。1876年土耳其米德哈特领导的新奥斯曼党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政变，废黜了阿卜杜尔·阿西兹，改立阿卜杜尔·哈密德为素丹，颁布了宪法，成立了两院制国会，实现了君主立宪制。1890—1891年伊朗马尔考汗领导的立宪运动要求限制王权，保障所有权，实行君主立宪。1896—1898年菲律宾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和美国侵略的资产阶级革命。

这些改良主义运动反映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独立和实行民主的愿望，同时也暴露了他们所具有的软弱性、两面性，没有提出通过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纲领。他们对工农群众运动抱着冷漠或敌视态度，幻想通过上书请愿或宫廷政变的方式，迫使或依靠封建统治集团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亚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血腥镇压下遭到了

惨败。“百日维新”被清朝封建顽固派淹没在维新志士的血泊之中，米德哈特惨死在“流血的素丹”的屠刀之下。英国殖民统治者对国大党参政和改革要求的回答是要它“寿终正寝”。血的史实证明，改良主义运动改变不了亚洲各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

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了，但在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仍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它表明一个新的先进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登上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它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开端的标志。改良派进行的启蒙思想的宣传唤醒了民族的觉醒，他们失败的教训激励着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实现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

第二节 伊朗和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

二十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进一步壮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日益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强，民族危机的加深，改良主义运动失败的教训，各国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只有走领导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的道路。当时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以及沙俄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更加鼓舞了他们夺取胜利的信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二十世纪初的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次高潮。伊朗、土耳其、中国等半殖民地国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殖民地的印度、印度尼西亚出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越南，潘佩珠领导的“国民革命党”进行反法的武装发动，在朝鲜形成了全民性的抗日起义——义兵运动。尤为可贵的是亚洲各国革命者在组织上进行了联合斗争的尝试，1907年夏，中、印、缅、朝、越、菲等国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宣布各国革命应竭尽全力，相互援助。

在这次革命高潮中，土、伊、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影响最大。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等激进纲领，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在东方的一个大国宣判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死刑，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

1905—1911年的伊朗资产阶级革命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伊朗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愈来愈成为帝国主义各国，特别是英俄两国竞相争夺的对象。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架设电报线，修筑公路，开发森林，开办银行等特权，垄断了伊朗三分之二的石油。1889年开设的波斯帝国银行控制了伊朗的财政。沙俄则在北部取得了各种同类的特权。由于沙俄毗邻伊朗，多次发动侵伊战争，割去了大片伊朗领土。沙俄还为伊朗国王建立了一支哥萨克式的近卫军，作为控制伊朗政府的工具。到二十世纪初，伊朗南部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部则受俄国的控制，甚至王位继承权也决定于彼得堡。腐朽反动的恺加王朝对内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屈辱投降，出卖主权，完全成了俄英帝国主义的走狗。

外国资本家与本国封建主占据了全国大部分土地。恺加王朝的一个王子占有二千个村庄，阿塞拜疆一个俄国地主占有一百九十二个村庄。苛捐杂税和封建地租夺去农民收成的九成，致使农业破产，成百万农民死于饥饿。沙俄大使也不得不承认，“外国人在波斯把一切都控制到手，而波斯本地人不得不求乞为生”。伊朗工人处境也十分恶劣，工作日长达十五—十六小时，工资相当于欧洲工人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二十世纪初，北部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离乡背井，到俄国巴库、梯比利斯等地做工，每年达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之多。他们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参加当地俄国工人的斗争，回国后传播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伊朗资产阶级也产生了，但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外国商品的倾销和封建王朝的苛捐杂税迫使他们走上反帝反封建的道路。

伊斯兰教在伊朗影响很大，高级阿訇本身就是大封建主，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支柱。但是国王夺取寺田，取消阿訇审判职务以及西方基督教的传播都

威胁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因此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他们也可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甚至有时被革命浪潮推到革命领导者的地位上。

二十世纪初，由于连续的农业歉收，全国群众性反抗浪潮愈来愈高涨。1903—1904年在德黑兰、大不里士等全国主要城市都发生了“饥饿暴动”，暴动的群众捣毁米店、肉铺和仓库，反对提高食品税和出卖民族利益的关税协定，要求罢免贪污卖国的首相阿扎姆。一位鼓动家赛义德·扎马尔说：“在波斯自古相传一条法律，就是犯了盗窃罪要砍掉他的手，但是这条法律只用在穷人身上。凭良心讲，如果公平合理地实施这条法律的话，难道不是上至国王、下至小吏的手都该砍掉吗？然而大家不这样作，这就是波斯所以不幸的缘故。法律对一切都应该是平等的”。国王慑于群众运动的压力，撤销了阿扎姆的职务，但政策依然如故。革命形势还在继续发展。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终于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1905年12月克尔曼和德黑兰的官员和军队毒打僧侣和商人的事件成了革命的导火线。全国各城市群情激愤，罢工罢市，游行集会，抗议官员的暴行。12月14日德黑兰的阿訇率领神学院的学生、市民五千多人去近郊的清真寺“藏难”，发表宣言，谴责国王政府是各族人民一切灾难和不幸的祸首，要求召开议会，实行改革。军队也拒绝执行镇压群众的命令。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了。

面对群众运动的怒潮，国王被迫让步，1906年1月宣布召开议会，进行改革，接着又任命自由主义者纳斯罗拉汗为首相。10月召开了第一届议会，二百名议员中多是阿訇、贵族、自由主义地主、商人、官吏，也有少数手工业者。议会相继通过《基本法》和《基本法补充条款》。这是伊朗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性的宪法。它规定伊朗为君主立宪国家，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有权批准法律和预算，不经议会批准，政府不得向外国借款和缔结条约，不得将专利租让给外国人。它还规定了公民的人身、住宅、财产不受侵犯，人民有受教育、集会、结社、出版、言论自由等权利。它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设立由高级阿訇为主的常设委员会，根据伊斯兰教义审查和否决议会的一切议案，这实际上确立了阿訇的特权地位。颁布宪法是这次革命的重要成果，但这部宪法有很大的妥协性。它虽然限制了王权，但未根本触动封建势力；虽然规定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但广大工农仍然无权，农民的土地问题更未涉及。真正得利的是由高级阿訇、自由派地主和商业资产阶级等立宪派。

立宪派参加政权，取得有限权利之后，认为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不愿革命继续向前发展。他们由革命力量变成了保守力量。而广大的工人、农民、贫民和小资产阶级却带着自己的要求力图把革命推向前进。1906年以后，从北部阿塞拜疆、吉兰到南部的克尔曼、俾路支等省农民运动方兴未艾，抗租抗税，拒服劳役，袭击庄园、开仓分粮，夺取土地。城市的群众运动更为猛烈。1906年德黑兰工人举行总罢工，印刷、电报、渔业、搬运工人都进行了罢工，要求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德黑兰出现了伊朗第一个工会组织。北部各城市还相继成立了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革命组织“穆扎希德”（意为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提出更激进的纲领，要求实现民主的选举制度和言论、出版、集会、罢工自由，主张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累进税。另外还建立了群众性的革命武装“费达伊”（即敢死队），参加者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低级僧侣、商人。这个组织成了这一时期北部各省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使立宪派惊恐万状，他们竭力压制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为了镇压革命，英俄帝国主义也勾结起来，1907年8月，签订了瓜分伊朗的协定，分别在伊朗南北部划分了势力范围。在俄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新即位的穆罕默德·阿里国王以哥萨克人为核心，调集军队于12月发动政变。首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和各省费达伊进行了坚决反击，反革命政变遭到了失败。1908年6月23日阿里发动第二次政变，是日晨沙俄军官利亚霍夫指挥哥萨克近卫军，炮轰议会大厦，逮捕议员和群众组织领导人，解散议会，屠杀革命群众。政权落入封建贵族之手。列宁痛斥哥萨克“在波斯建立镇压革命的功勋”，俄国又一次“充当国际刽子手的角色了”。

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攻的严重形势下，立宪派已不能领导革命，革命的领导权转移到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革命中心转移到北部的大不里士和吉兰。那里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号召保卫宪法，召开议会，驱逐外国干涉者。1909年7月，吉兰的费达伊和南部部落反国王的部队共同向首都进军，推翻了穆罕默德·阿里的统治，国王逃往俄国。伊朗革命获得了第二个回合的胜利。

护宪运动胜利后，阿萨德汗为首的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建立了临时政府，宣布恢复宪法，召开议会，废黜阿里，立十四岁的王子为国王。但是，新议会比前届议会更保守，它公然宣布取缔群众政治组织，解散费达伊，封闭进步报刊。尤其严重的是幻想依靠美国抵制英俄，聘请美国的摩根·舒斯特为财政总监。1910年底，伊朗政府向美国聘请财政顾问，改组伊朗财政制度，美国于次年1月派出摩根·舒斯特等五人作为顾问到达伊朗。伊朗拱手奉送了财政大权。

新议会的反革命政策分裂了革命力量，给封建王朝以可乘之机。1911年7月废王阿里在沙皇支持下，率领三万反动武装在里海沿岸登陆向德黑兰进犯。1911年11月，英俄军队也分别从南北两路进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又一次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潮，他们提出了“不是独立，就是死亡”的口号，奋勇抵抗。当人民群众浴血奋战时，阿萨德汗叛变革命，在沙俄筹划下，于12月在德黑兰发动政变，包围国会大厦，解散议会，恺加封建王朝又一次复辟，延续六年之久的伊朗革命被帝国主义绞杀了。

1905—1911年伊朗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英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其次是革命领导者阿訇、自由派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他们依靠人民的力量进行斗争，稍获胜利就调转枪口镇压工农，给敌人以可乘之机。革命的失败还由于未能充分发动广大农民，而城市斗争又很分散，都被各个击破。但是，这次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群众政治组织和费达伊的出现显示了伊朗人民的革命创造性，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经验。伊朗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引起了反响。1910年2月1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高度赞扬伊朗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精神，驳斥康梁保皇派害怕革命、反对革命的谬论，还表示了要效法伊朗人民进行革命的决心。

1908-190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土耳其曾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多民族的军事封建帝国——奥斯曼帝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十七、八世纪以来，帝国内部危机四伏，衰弱破败，它的广大领地早为西方国家所觊觎。十九世纪晚期，瓜分“奥斯曼的遗产”更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斗争的焦点。1878年的俄土战争和柏林会议是第一次国际大分赃，英、法、俄、奥等瓜分了它

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大片属地。1881 和 1882 年，英法先后占领了突尼斯和埃及，帝国面临被彻底瓜分的厄运。帝国主义还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在土耳其攫取了各种经济政治特权，控制了交通运输、贸易信贷和矿产资源。1881 年英、法、奥、意等国组成的“奥斯曼帝国债务管理局”掌握了全国的烟、酒、盐、印花税等重要税源和财政命脉，俨然成了国中之国。1903 年德国取得了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到巴格达铁路（即所谓三 B 铁路）的建筑权。土耳其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土耳其各族人民不仅外受帝国主义宰割凌辱，而且还受国内“血腥素丹”哈米德二世封建专制主义的残暴统治。1876 年，哈米德借“新奥斯曼党”立宪运动登上王位，但两年以后他就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流放并杀害了首相——新奥斯曼党的领袖米德哈特，把立宪运动淹没在血泊之中。他为了维护反动统治，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暴无比。“特种骑兵队”血腥镇压各族人民，特务网密布全国，人民稍有不满，就有杀身之祸，书报审查极苛，“自由”、“革命”、“弑逆”等词一概禁用。

哈米德还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挑动基督教民族与伊斯兰教民族互相残杀，对属地各民族的反抗则实行民族大屠杀。1894 年亚美尼亚人起义时，竟被杀害六万余人，毁掉村庄三千余座。土耳其成了一座暗无天日的“民族牢狱”。“血腥素丹”统治下的土耳其，一片恐怖破败景象。民族危机深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

在帝国主义加紧分割土耳其和哈米德二世进行血腥统治时期，在土耳其国内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政党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又称青年土耳其党。这个党成立于 1894 年，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新闻记者阿麦德·李萨。它的纲领是保持奥斯曼帝国领土的完整，恢复 1876 年宪法，其主要成员是军事院校的学生、下级军官、新闻记者和流亡国外的新奥斯曼党人。1897 年该党在首都发动了第一次政治示威运动，遭到哈米德的血腥镇压之后，实际上陷于分裂瓦解状态。

1905 年俄国革命和伊朗革命鼓舞了土耳其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亚美尼亚、阿尔巴尼亚、阿拉伯地区的民族起义如燎原大火，马其顿、安那托利亚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军队骚动也连连发生。波浪滚滚的革命高潮鼓舞了青年土耳其党人，为了领导革命，1906 年该党总部由巴黎迁到马其顿的重镇萨罗尼加，次年又召开了各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提出了比较激进的纲领：废黜哈米德二世，恢复 1876 年宪法，实行各民族的平等。大会之后，他们联合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游击队，积极策动马其顿的驻军进行武装起义。

为了扑灭革命运动，哈米德加紧勾结外国势力，1908 年 6 月英俄协议共谋出兵马其顿，奥匈帝国也企图占领萨罗尼加。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加速了革命的爆发。1908 年 3 月，马其顿驻军第三军团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尼雅吉中尉率部起义，二军团起而响应。各族游击队和农民也加入起义队伍，哈米德派去镇压的军队纷纷倒戈。7 月 23 日起义军在萨罗尼加发出最后通牒，要素丹在二十四小时内恢复宪法，并准备进军伊斯坦布尔。哈米德目睹众叛亲离，被迫于次日宣布恢复宪法，召开国会，解散特务组织，承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革命的初步胜利使青年土耳其党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同年底的国会选举中，他们获得了多数议席，李萨当选为国会议长。

青年土耳其党人刚刚取得初步成就就认为大功告成，不再前进了。但是

各族人民群众的要求犹未实现，因此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铁路、码头、煤炭工人进行罢工，要求实现工人立法；农民集会，要求分配土地，取消什一税；属地各族人民要求民族平权。青年土耳其党不加支持，反而是背弃诺言，镇压工农运动。它迫令马其顿的游击队交出武器，声称土耳其只有一个民族，根本否认其它民族的存在。这种背叛革命的行径分裂了革命力量，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哈密德在英国支持下，依靠近卫军和特务网的余孽，于 1909 年 4 月 13 日发动政变，解散了国会，逮捕青年土耳其党人。

封建买办势力的复辟不得人心。青年土耳其党依靠第二、三军团，重新联合马其顿游击队，从革命的大本营萨罗尼加向首都进军，4 月 24 日攻占伊斯坦布尔，逮捕并废黜了哈密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五世为素丹，重新组织政府，恢复国会。这次革命以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而结束。

土耳其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政的青年土耳其党幻想依靠更富于侵略性的德帝国主义对抗俄英等老牌帝国主义，以致把土耳其变成了德国的附庸。在国内民族压迫依旧。但这次革命毕竟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激励了境内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也为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同盟会《民报》指出哈密德反革命政变是土耳其革命“除恶未尽，死灰复燃”的结果，以此痛斥保皇派鼓吹君主立宪是“姑息养奸”。他们还以土耳其军队参加革命为榜样号召清廷军队弃暗投明，倒戈起义。

第三节 1905—1908 年印度的民族运动

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加强 二十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争霸的加剧，把印度视作大英帝国生命线的英国，在印度加紧强化它的殖民统治。1899 年，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寇松勋爵就是适应英帝国主义这一愿望而就任印度总督的。

寇松就任后第一年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最终完成十九世纪末就已开始的币制改革，宣布取消银本位制，禁止银币的铸造和流通，规定并提高了英镑与卢比的比价，使卢比完全依附于英镑，从而更有利于英国商品与资本的输入。这一措施割断了印度与其它国家，主要是实行银本位制的亚洲国家的直接货币联系，导致印资厂商的大量倒闭，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垄断地位，加速了印度社会经济的殖民化。由于废止银币，银价暴跌了 30% 以上。殖民者以此剥夺了以银饰为储备手段的广大人民的大量财富，也严重损害了存有大量白银的封建王公和资产者的利益。这是英国殖民者对拥有世界白银总量四分之一（约 20 亿盎司）的印度进行的一次大抢劫。卢比的相对增值又引起了物价的上涨，加剧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灾难，使千百人死于饥饿。

正是在这种殖民化政策的推动下，英国商品和资本向印度输入剧增。1896—1910 年英商的投资由四至五亿卢比增至六至七亿卢比，增加了 50% 左右。投资的主要门类是殖民政府的公债、铁路、矿产、造船、航运、种植园等。为了便于掠夺和统治，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大力鼓励建筑铁路。1890 年全印铁路线有一万五千八百多英里，1905 年为二万六千八里英里，1913 年达三万四千六百多英里。从印度运出的粮食原料也大大增加。1901—1906 年和 1892—1897 年比较，输往英国的小麦增加了 176%，棉花增加了 43%，黄麻增加了 27%。此外，殖民政府的赋税也愈加繁重。这一时期英国在亚非各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军事费用庞大，都尽量转嫁于印度人民身上，1905 年殖民政府预算的 3/4 用于军费和官员薪金，但赤字仍然不断上升，1913 年高达二亿七千四百万英镑。

殖民者强盗式的掠夺给印度人民带来可怕的灾难，灾荒严重，疾疫肆虐。1905—1906 年灾区人口是三百三十万，1906—1907 年为一千三百万，1907—1908 年达四千九百万。1896—1908 年死于饥荒鼠疫者达 1000 多万人。悲惨的遭遇迫使印度人民起而反抗。农民骚动抢粮事件连绵不断，工人罢工浪潮汹涌高涨。

工农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分化、发展。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形成了以提拉克（1856—1920 年）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他们反对党内大资产阶级“温和派”领导集团的改良主义路线，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包括暴力来推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建立独立的印度联邦共和国。他们还在工农群众中进行了发动和组织工作。激进派的出现及其领导人民的斗争是印度人民新觉醒的重要表现，是 1905—1908 年民族运动的先声。

群众性反英运动的爆发 面对群众运动的高涨和人民的新觉醒，英国殖民者采取了各种高压政策。寇松诬蔑印度人是“下等”民族，没有自治能力，拒绝国大党参加政权的温和要求。他蛮横地把加尔各答市政府印籍职员裁减一半，以保证英籍职员的优势地位；还限制出版自由，压制民族主义报刊，提高大学学费，限制印籍学生。1905 年他又玩弄“分而治之”的阴谋，宣布

把孟加拉省分为东西两省。孟加拉省人口众多（约八千万人），工商业发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强大，是当时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基地。但是该省的宗教关系和阶级关系比较复杂。东部的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多系印度教徒，工农群众则多系穆斯林，西部的情况相反。寇松实行孟加拉分治的目的就在于制造教派冲突，破坏民族团结，瓦解反英运动。寇松分割孟加拉的提议，由英国议会通过，1905年10月付诸实行。殖民政府的蛮横行径激起了印度人民抗议的怒潮。在国大党领导下，孟加拉省各城市罢工罢市；加尔各答几万人涌向恒河岸边，举行神圣洗礼以表示孟加拉人民的团结；全国开展抵制英货运动，群众性的反英运动风起云涌。1905年到1908年的印度民族运动爆发了。

刚刚爆发的俄国的1905年革命以及中国和伊朗的反帝运动鼓舞了印度人民的斗争。国大党主席达·纳奥罗哲说：“既然俄国的农民准备着而且也能够从世界上最强大专制制度那里夺取自由，既然东亚的中国西亚的波斯已经觉醒，我们这些所谓印度—不列颠帝国的自由公民还能再作专制主义下毫无权利的顺民吗？”。1906年12月，国大党年会通过了“自产”、“自治”、抵制英货、民族教育四点纲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进入了争取民族自治的新阶段。什么是“自治”？“温和派”认为自治只是在英帝国范围内的自治；激进派认为就是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建立印度共和国。随着反英运动的深入发展，两派的分歧导致了国大党的分裂。

工农运动的发展，国大党的分裂 1907年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出现了工农联合斗争、全国东西呼应的大好局面。4月东孟加拉农民起义，反对地主高利贷者，支持“自治”和“自产”，接着西北旁遮普的农民由激进派拉·罗易等人领导举行起义，攻入拉瓦尔品第市，强迫企业主答应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拉合尔、阿姆利则的工农运动也随之兴起。殖民当局惊慌万状，一方面撤退官员家属，另一方面又派军北上镇压。铁路工人罢工，拒绝运送军队。与此同时，工人的罢工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1907年11月孟加拉铁路工人的两周大罢工影响最大，加尔各答通往各地的火车停驶，东部地区经济生活陷于瘫痪。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震动了英国殖民者，也吓坏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大党温和派，他们深恐群众运动越出合法的范围，导致真正的革命，便走上了投靠殖民者、反对革命的道路。在1907年12月国大党的年会上，他们公开要求放弃四点纲领，停止一切反英斗争，拼命攻击激进派的“狂热”。激进派被迫退出大会，另组“民族主义者党”继续坚持四点纲领，坚持斗争。

孟买工人政治总罢工 国大党领导集团妥协投降之后，孟加拉的群众运动暂时低沉。但在激进派领导下的西部和南部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的罢工斗争把反英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908年春，孟买等地的铁路、建筑、黄麻、纺织工人的罢工一浪高一浪，马德拉斯省一些地方的工人和市民在激进派领导下罢工罢市，占领法院，捣毁了警察局。

殖民政府在极力拉拢温和派的同时，又残酷迫害激进派，野蛮镇压群众运动，命令禁止集会，取缔“民族主义者党”，查禁革命报刊，逮捕激进派活动家，6月24日悍然逮捕了提拉克，7月23日又蛮横地判他六年苦役，企图置他于死地。殖民统治者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孟买十万人宣布政治总罢工，举行示威游行，修筑街垒，英勇抗击殖民军警的血腥镇压，几百人血洒街头。总罢工一直坚持了六天，同警察的冲突仍持续了两周。

孟买工人政治总罢工是三年来反英运动的最高潮，它表明印度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新兴的阶级力量登上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舞台。列宁以极大的欢欣赞誉说：“欧洲的觉悟的工人已经有了亚洲的同志，而且人数将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

印度人民历时三年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其自觉性和组织性远远超过印度人民历次的斗争，沉重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英国政府不得不修改分割孟加拉的法案，1911年东西孟加拉省重新合并。印度人民的这次斗争也受到亚洲革命者的支持。《民报》多次载文痛斥英国殖民者的罪行，称赞印度人民的斗争，呼吁中印两国人民携手共进，屏蔽亚洲，抗击殖民者的侵略。

第十八章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和非洲人民的反抗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狂潮 从十五世纪末年以来，非洲是殖民者大量掠夺黄金、象牙和贩卖“人类血肉”（黑奴）的场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贩卖“人类血肉”的可耻勾当才急剧收缩。在这几百年中，欧美殖民者也占领了一些沿海国家的领土，如葡占莫桑比克和安哥拉；荷、英先后占领南非好望角殖民地；英、美以遣返黑奴为名，在西非侵占了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法国从1830年起开始大规模侵入阿尔及利亚。但是，同世界上其他各个大陆相比，殖民主义在非洲占领的土地面积的比例是较小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狂潮，90%以上的土地未被瓜分的非洲，成了列强你抢我夺的对象。非洲的油棕、橡胶、象牙、贵重木材早就成为资本家掠夺的产品，随着棉花、可可、咖啡、甘蔗、剑麻等经济作物种植成功，金矿和金刚石矿的发现，非洲成了垄断资本家追逐的重要原料产地。欧洲垄断资本家还想使用强制的低廉的劳动力，扩大非洲的投资，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尽管非洲有辽阔的沙漠，但在争夺世界上尚未分割的最后几块土地时，垄断资本家唯恐落后于他人，总想夺取更多的土地，也不管这是一些什么土地，也不管这些土地在什么地方。

从十九世纪初年开始的对非洲内陆的考察，也为列强瓜分非洲提供了必要的地理人文资料。在此之前，欧洲人对非洲腹地的情况，并不比古代欧洲人知道得更多。尼罗河河源在那里？尼日尔河流向何处？赤道附近有没有山岳？什么人居住在非洲内陆？依然是些困惑不解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欧洲资本家追逐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激励下，考察队一个接一个地派往非洲内地，考察的次数不断增多。十九世纪上半期仅仅进行了二十一次考察，而1851—1860年为二十七次，1861—1870年为二十九次，1871—1880年为四十七次，1881—1890年增至八十四次。神秘的帷幕被揭开了。早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苏格兰医生芒戈·帕尔克到尼日尔河探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另一个英国人理查德·兰德继续在这一带探险。前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证明尼日尔河是注入贝宁湾的。1863—1864年间，斯皮克、格兰特和贝克相继考察了维多利亚湖和阿伯特湖。1862年，斯皮克基本查清了尼罗河源于维多利亚湖。1851—1873年大卫·李文斯顿长期在非洲探险。他从大西洋到印度洋，横穿非洲大陆，勘察了赞比西河、卡拉哈里沙漠，他向世人报道了维多利亚瀑布、姆韦鲁湖、班韦乌卢湖、尼亚萨湖和坦噶尼喀湖。

尽管许多探险家抱着科学研究的目的，尽管李文斯顿为研究非洲大陆献出了生命，但是，象非洲人长期以来所忧虑的那样，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军队，是踏着探险家的足迹接踵而来的。不少探险家就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例如斯坦利考察了刚果河，同时代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同扎伊尔的酋长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帝国主义列强奉行“抢先占领”的原则，各自制定了自己的鲸吞计划。英国妄图建立一个北起开罗南至开普敦的纵贯非洲大陆的殖民帝国，法国梦想建立一个从佛得角穿过东、西苏丹直达索马里的法属非洲；德国则妄想夺占赤道非洲两侧。这些互相矛盾的殖民计划，导致列强之间摩擦频生，冲突迭起，战争危机不断。

对刚果河流域的争夺，几乎使欧洲列强都卷进了冲突。1879—1884年

间，斯坦利受利奥波德二世之托，以“国际刚果协会”的名义，欺骗和强迫土著酋长签订了近四百五十个保护条约，建立了二十二个据点，从而使利奥波德二世攫取了刚果河流域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布拉柴从加蓬向刚果河流域推进，建立据点，强迫当地酋长签订保护条约，夺取了刚果河北岸和出海口大片土地，在1880年9月建立了布拉柴维尔城（今刚果共和国首都）。当斯坦利晚九个月到达布拉柴维尔对面的金沙萨时，法比对刚果河下游的领有权便发生了冲突。在法比争执不下时，侵占安哥拉的葡萄牙于1882年宣布刚果河口两岸归它所有。一场国际冲突开始了。英、德、美乘机插手其间，英国宣布承认葡萄牙对刚果河口两岸的领有权，葡萄牙则同意英国在此享有同等权利；美、德声明支持比利时，反对英、葡。1884年列强召开了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才达成协议，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自由邦”（今扎伊尔）；并规定在非洲进行新的占领时，必须通知有关各方，占领方为有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有效占领”原则。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98年为争夺尼罗河上游，英、法两军在苏丹的法绍达村，拔刀相向。后因法国担心英、法战争一旦爆发，会在欧洲遭到德国的进攻，因而被迫让步，撤出了法绍达。1899年英、法签订协定，划分了双方在苏丹地区的殖民地分界线。

帝国主义是按“实力”、按“资本”来瓜分非洲的。到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把非洲瓜分“完毕”时，英、法、德、比、葡、西按照各自的实力分得了相应的一分。但是，随着列强实力对比的消长，重新瓜分非洲的斗争便接踵而来。1899—1902年的英布战争和1911年的“摩洛哥危机”，就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非洲的斗争。

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非洲各民族被帝国主义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买进卖出的对象。他们不顾历史的、自然的和经济的条件，对非洲大陆进行任意的强制分割。他们发动侵略战争，霸占土地，掠夺矿产资源，推行强制劳动制度，给非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过程，也是非洲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过程。他们为保卫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同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

埃及人民的抗英斗争 古老的埃及，曾是东西文化荟萃之地，欧亚非三洲的交通枢纽。十六世纪早期，它已沦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成了欧洲列强激烈争夺的对象。拿破仑曾企图经过埃及去摘取大英帝国王冠上的珠宝——印度，但他失败了。继战胜拿破仑远征军之后，埃及人民又消灭了长期把持统治的马木路克封建贵族，建立了代表新兴地主和商人利益的穆罕默德·阿里家族的统治。

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统治下的埃及，虽然依旧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土耳其的宗主权已徒具虚名。穆罕默德·阿里曾致力于改革内政，学习资产阶级文化和科学技术，建立新式企业，扩充军队，向外扩张，先后占领了苏丹和叙利亚，并打败了宗主国土耳其。唯恐埃及强大的列强，约定用武力“援助”土耳其。1840年9月，英国出兵贝鲁特进行武装干涉，11月迫使埃及签订《英埃协定》，规定埃及陆军缩减为一万八千人，实行协定关税，埃及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外国商品倾销埃及市场，新式企业纷纷倒闭，自然经济开始遭到破坏。1851年英国获得了修建亚历山大至开罗铁路的特许权；1856年法国取得了开凿苏伊士运河的特许权。苏伊士运河于1859

年开工，1869年完成，全长一百八十二点五公里，有二万埃及人丧生。为了开凿运河，建筑铁路和供宫廷享乐，伊斯迈尔（1830—1895）大量而又轻率地向欧洲国家借债。1876年外债高达二十五亿法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的边缘。西方列强要求立即清偿债务，支付高额利息，伊斯迈尔不得不把苏伊士运河44%的股票卖给英国，售价才一亿法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876年埃及政府宣布停止偿付债务。英法乘机接管了埃及财政大权，实行“双重监督”制度，由英国人担任财政收入和预算的总监督，由法国人担任财政支出的总监督。1878年8月，英法强迫伊斯迈尔成立了有欧洲资本家代理人参加的政府，由英国人威尔逊任财政部长，法国人德·布里尼叶任公共工程部长，意大利人和奥地利人分任副部长。这个“欧洲人内阁”，掌握了埃及的国家大权。

为了清偿欧洲资本家的债款，“欧洲人内阁”强迫农民交纳两年后的地租，并派军队强征捐税，抢劫农民，以致农村地区灾荒连年，饿遍野。埃及的铁路、港口、海关都被外国资本家把持，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都落入了欧洲资本家的腰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外国雇员充斥政府机构，埃及中下级军官和官员处处受到歧视和排挤，薪俸微薄，大量被裁减。

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了。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张立宪的地主集团，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加了反对外国资本和阿里家族专制统治的斗争。他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这个运动的代表者是以阿拉比（1839—1911年）为首的祖国党。它提出了“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的口号，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实施宪政。

1881年9月，埃及赫迪夫（执政）杜菲克（1852—1892）企图把具有爱国情绪的驻军调离开罗，阿拉比率军包围王宫，要求撤换内阁，召开国会。12月26日众议院开会，许多祖国党的拥护者被选进了众院。1882年2月27日公布“1882年宪法”，规定政府对国会负责，议员有权对政府的活动实行监督。接着成立了祖国党内阁，由巴鲁迪任首相，阿拉比任陆军部长。新政府扩大议会的权力，把国家预算提交议会讨论，开始解雇外国雇员，废除“双重监督制度”。全国城乡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农民拒绝交租付债，要求分配地主土地。吓得地主和高利贷者纷纷外逃。

1882年5月，英、法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舰队驶抵亚历山大港示威，向杜菲克提出最后通牒，蛮横地要求解散巴鲁迪内阁，驱逐阿拉比。6月杜菲克以避暑为名，带领一批贵族官僚，逃到亚历山大港，公开投向帝国主义怀抱。

7月11日，英国军舰炮轰亚历山大港。埃及军队仓猝应战，奋勇抵抗，成千上万的居民，在枪林弹雨中运送弹药，抢救伤员。12日埃及军队主动撤出了亚历山大城，在北部战线多次击退英军的进攻。但是，阿拉比轻信帝国主义不在苏伊士运河区作战的诺言，仅在从运河通往开罗的要道上，部署了少数游牧部落的新兵。英军背信，于8月占领苏伊士运河，沃尔斯利率领二万五千名英军急速进攻开罗。9月13日埃军在开罗城郊的特勒卡比尔附近被击溃。9月15日，开罗失陷，阿拉比及其战友被俘，流放到锡兰，轰轰烈烈的抗英战争失败了。

英国占领军把杜菲克弄回开罗，在“间接”控制的形式下，建立了残暴的殖民统治。名义上是赫迪夫和他的内阁统治埃及，实际上克罗默（贝林勋

爵)以“总领事”的身份握有无限的权力。贝林公开宣布：“埃及政府必须采纳英国顾问的意见，否则只有辞职。”在贝林独裁统治时期(1883—1907)，许多埃及爱国者被判处死刑和流放。他恢复了“双重监督制度”，改组了军队和警察，在政府各部和各省设置英国顾问。1914年英国正式宣布埃及为英国保护国。

苏丹马赫迪起义 当阿拉比领导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时，苏丹爆发了震撼非洲大陆的马赫迪起义。

英国侵入埃及后，也把魔爪伸进了埃及封建主统治的苏丹。苏丹正如统治它的埃及一样，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组成部分。英国殖民者与埃及封建主互相勾结，掠夺土地，向苏丹人民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输出大量的黄金、象牙、橡胶、骆驼和牛。仅1873年一年，就从苏丹搜括了一百万英镑的财富。英国派遣各种代理人担任苏丹行政机构的要职。镇压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戈登，从1874年起任赤道省省长，1877—1879年间任全苏丹总督，他残酷地镇压了达尔富尔省和加扎勒河省的起义。

苏丹人民对英埃统治者的愤恨，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了。七十年代末，一个伊斯兰教苦行派教长穆罕默德·艾哈迈德(1843—1885)主张同异教徒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宣传“废除不堪负担的苛捐杂税，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1881年5月，他在阿巴岛(在喀土穆南方，位于白尼罗河中)宣布自己为马赫迪(救世主)，公开号召进行圣战，驱逐外国侵略者。1881年8月12日，苏丹总督派遣一支部队偷袭阿巴岛，企图把马赫迪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凌晨三点，马赫迪闻讯后，当机立断，决定举行起义。起义者拿起棍棒，奔出村子，迎击敌人。共击毙敌士兵一百二十人，军官六人，残敌狼狈逃走。阿巴岛战斗的胜利，揭开了马赫迪反帝大起义的序幕。

阿巴岛起义的第二天，马赫迪率领起义队伍，渡过尼罗河，在山岭起伏的卡迪尔山区建立了根据地。以贫苦农民为主力的起义军队，作战非常勇敢，多次打败英、埃军队。1882年6月，起义军歼灭了埃及军队三千余人。1883年初，攻克乌伊拜德城，完全解放了科尔多凡省。

在绞杀了阿拉比领导的抗英斗争以后，英国决心扑灭马赫迪起义。由老牌殖民者希克斯率领一万远征军，向乌伊拜德反扑。11月初，起义军将希克斯远征军包围在乌伊拜德附近。4日，起义军整夜发动佯攻，疲惫敌人。5日，远征军排列成三个方阵，左右两翼配备骑兵，企图突围。起义士兵奋勇杀敌，把敌人的三个方阵变成了三堆死尸，希克斯被击毙，一万远征军得以生还者仅二百五十人。

英国政府在损兵折将、连遭失败的情况下，重新起用已经辞职的戈登，任命他为苏丹总督。戈登大言不惭，声称“击溃马赫迪是一桩比较容易的事”。1884年2月，戈登走马上任。为博得苏丹人民的好感和瓦解起义军，他假惺惺地许诺租税减半，欠税豁免，声称苏丹将由苏丹人治理，妄图建立一个脱离埃及而由英国直接控制的“独立”的苏丹国，并把赤道省和加扎勒河省并入英属东非领地。但是，这些阴谋都破产了。1884年3月起义军绕过喀土穆，切断了它通往埃及的道路。1885年1月，起义军对喀土穆发动总攻，击毙戈登，全歼敌军。起义军乘胜挥师北上，解放了除港口城市萨瓦金以外的整个苏丹。

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赫迪起义，认为它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起义的胜利，恢复了苏丹的民族独立，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者，鼓舞了非洲各国

人民的反帝斗争。

1885年6月，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逝世，他的战友阿卜杜拉（约1846—1899）继任，称哈里发，定都恩图曼。年轻的共和国按地区特征把全国划分为二十个省。为了保卫民族独立，建立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为了供应军需，建立了军火工场以及专门生产服装、军鞋的工场和作坊。为了发展民族文化和教育，开办了宗教和非宗教的学校。

起义胜利之后，起义军内部的原始军事民主制遭到破坏。阿卜杜拉和军事长官占据了逃亡的英埃官员的花园和田庄，一些省的统治者也占有了大片土地。起义军上层的蜕化，严重削弱了反帝力量。

1896年，英国调集一万五千大军，派基钦纳为侵略军总司令，大举进犯苏丹。1898年4月，在阿特巴拉战役中，马赫迪军失利，退守恩图曼。9月，在首都附近的决战中，马赫迪军损失过半，首都陷落。阿卜杜拉率军在科尔多凡坚持游击战，于1899年11月英勇牺牲。同年，苏丹被宣布为英埃共管，实权操在英国人手中。苏丹沦为英国殖民地了。

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的胜利 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扼地中海——红海——印度洋航线咽喉的非洲之角，其战略地位更形重要。位于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吉布提，成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竞相争夺的对象。

1862年法国“购买”了奥博克港，1884年派兵进驻。法国1888年侵占吉布提港，1896年把它侵占的所有地区合并成一个殖民地，称“法属索马里”（即今吉布提）。

沙俄也企图在非洲之角沿岸建立一个“新莫斯科港”，以便在印度洋为沙俄舰队找到一个落脚点。1889年，冒险家阿西诺夫率远征队在塔朱腊湾的萨迦诺港登陆，引起了与法国殖民者的冲突。结果，俄国人七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余全部被俘。在吉布提的冒险失败以后，沙俄改变策略，从与法国争夺转而与法国合作，共同对付英意。它在法国的协助下，打着“友好”的旗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所谓“宗教使团”，“地理考察团”，进行和平渗透。

英国除了1884年确立了对柏培拉、泽拉和布勒哈尔的保护权而外，还挑起了埃塞俄比亚与苏丹之间的战争。在1885和1889年之间，埃苏两国多次激战，在梅特马战役中，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四世中弹身亡。

意大利利用埃塞俄比亚在埃苏战争中受到削弱的机会，于1885年侵占了马萨瓦和贝卢尔之间的沿海地区。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接着，它向埃塞俄比亚北部内地推进，先后占领了萨蒂、祖拉、瓦阿等地。1887年1月，在多加利被埃军打败，退回马萨瓦。约翰四世死后，孟尼利克二世继位。意大利转而支持孟尼利克，企图利用他地位未稳之际，确立对埃塞俄比亚的保护权；而孟尼利克则企图利用意大利的支持来消灭封建割据势力。1889年5月2日双方签订了乌西阿利条约，麦纳里克同意埃塞俄比亚北部若干地区归属意大利，意大利则以两万枝枪、二十八门大炮和二百万里拉作为补偿。第十七条还规定，埃塞俄比亚皇帝与其他列强交涉时，“可以”请求意大利协助。但是，在意大利文本上，“可以”被故意改为“必须”。1890年，意大利根据对本条的单方面解释，宣布埃塞俄比亚为保护国。孟尼利克忍无可忍，于1891年写信给欧洲列强，抗议意大利的无耻行为，庄严宣告：“我无意袖手等待海外列强来瓜分非洲。”1893年，埃塞俄比亚宣布废除乌西阿利条约。

意大利帝国主义凶相毕露，1895 年对埃塞俄比亚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侵占了阿迪乌格里、阿迪格腊特等地。埃塞俄比亚人民万众一心，猛烈抗击侵略者。1895 年 9 月，孟尼利克二世发表告人民书，表示要“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以反击”。各族人民掀起了爱国主义热潮，在几天之内就捐献了两百万银元和大量粮食、衣服，参战的勇士从全国各地奔向首都，迅速组成了一支十多万人的大军。12 月，埃塞俄比亚军队首次打败侵略军，收复了马卡累要塞。孟尼利克一面提议双方和谈，一面下令埃军向阿杜瓦撤退，以便占领有利地形，准备决战。

意大利侵略者无意谈判。1896 年 2 月，意军司令巴拉蒂埃率领一万多人，分三路纵队向阿杜瓦进犯。3 月 1 日，意军的一个纵队，在离主力四英里的地方，首先与埃军遭遇，被分割歼灭。埃军利用有利地形和优势兵力，在阿杜瓦附近迅速利落地消灭了另外两个纵队。在阿杜瓦会战中，意大利侵略军伤亡一万一千人，四千人被俘。埃塞俄比亚军民的巨大胜利，迫使意大利于 10 月 26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缔结和约，承认埃塞俄比亚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并给予赔偿。

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的胜利，是非洲军队第一次彻底击败占优势的帝国主义军队，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保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使埃塞俄比亚成了非洲大陆屈指可数的保持政治独立的国家之一。

黑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黑非洲，戴枷锁铐的奴隶行列已不多见，来往穿梭于美非之间的贩奴船已经稀少。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在到处燃烧，黑非洲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此起彼伏。

在西非，加纳的阿散蒂王国从 1806 年起，一直有效地抗击着英国的侵略，从 1807 年到 1901 年同英国作战大约十次，阻止了英国向非洲内陆的扩张。英国把它视为眼中钉，非将它拔除不可。1873 年，英国发动第七次侵阿散蒂的战争，打败阿军。1874 年 2 月，英军进占库马西时，发现它已是一座空城。侵略军害怕被围歼，在炸毁皇宫，烧毁全城之后也退走了。1895 年英国向阿散蒂国王提出了接受英国保护的无理要求，遭到断然拒绝。1896 年 1 月，英国调集大军，猝不及防地攻占了阿散蒂人的首都库马西，俘虏了阿散蒂国王，宣布阿散蒂为英国保护国。但是，阿散蒂人民没有屈服，为反抗殖民者征集民夫，搜罗黄金，夺取阿散蒂民族的象征——金凳子，他们在雅·阿散蒂娃领导下发动起义。4 月，起义者包围库马西，7 月，英军增援反攻。10 月，起义军撤出首都附近，以游击战反抗殖民者。后来，雅·阿散蒂娃等起义领袖被俘，起义被镇压。1902 年 1 月 1 日，阿散蒂正式并入英属黄金海岸殖民地。

英国在灭亡阿散蒂以后，于 1897—1900 年间征服了尼日尔河下游各族，先后占领了伊巴丹、伊洛林、努摆和贝宁。

法国在西非的扩张，同样也遭到了激烈的抵抗。萨摩利·杜尔（约 1840—1890）领导下的乌阿苏鲁国（位于今几内亚），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屡败法军，阻挡着法国向内陆的推进。1891 年法军集中强大兵力，直逼首都比桑杜古，萨摩利不断用游击战困扰法军。1892 年 1 月 11 日，在比桑杜古附近，两军激战，萨摩利在狠狠打击敌军后，主动撤出首都，退往东部。1898 年，法军偷袭萨摩利营地，他本人被俘，抗战亦随之失败。

差不多同时，在达荷美有贝汉津（格比达西）领导的抗法战争，在乍得湖周围有腊巴赫领导的抗法战争。达荷美抗战开始于 1889 年。1890 年双方

签订协议，达荷美承认法国占领波多诺伏和科托努，法国每年付两万法郎作为补偿。1892年战争再起，达荷美军战败。1894年贝汉津被俘，达荷美被宣布为法国保护国。

腊巴赫领导的抗法战争一直坚持到二十世纪初年。1900年的库塞里战役，双方激烈搏战，腊巴赫壮烈牺牲。其子法德尔—阿拉继续领导战斗，直至1902年。

在东非，乌干达和肯尼亚人民曾以各种形式反抗英国的侵略，而规模最大的反帝斗争则发生在坦噶尼喀。1884年卡尔·彼得斯代表“德国殖民协会”，同当地酋长签订了十二个保护条约，攫取了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德国人一到坦噶尼喀，非洲人民就群起而攻之。1888年，阿布希里和伯瓦纳·赫里组织抗德斗争，控制了整个坦噶尼喀沿海地带。1889年，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德军进攻抵抗基地，先后占领了萨达尼、庞加尼和姆普瓦普瓦。年底，阿布希里被人出卖，惨遭杀害。1894年，伯瓦纳·赫里再次起义，但被德国人打败。在南部，姆克瓦瓦领导赫赫族进行抗德斗争。1891年8月，姆克瓦瓦组织一次伏击，全歼了泽柳斯基率领的德军，阻止住了德军的南进。1894年，德军攻占赫赫人首府卡伦加。姆克瓦瓦坚持了四年游击战争，1898年6月，他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自戕身亡。1905年，坦桑尼亚人民揭竿而起，爆发了著名的马及马及起义。在大约六个星期之内，起义的烈火燃遍了从达累斯萨拉姆到基洛萨以南，从基洛萨至马拉维湖以东的整个地区。他们赶走地方长官，袭击教会，打死德国棉花种植园主，攻打欧洲人居住的中心。德国殖民者风声鹤唳，赶忙调兵弹压，直到1907年这场群众性的起义才被镇压下去。马及马及起义是坦桑尼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起点。

1904—1908年间，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德起义。赫勒罗人和霍屯督人并肩战斗，共同打击德国殖民者，与马及马及起义遥相呼应。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黑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前仆后继，给了英、法、德等帝国以沉重打击，奠定了非洲各族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光荣传统。

第十九章 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拉丁美洲也象亚洲和非洲，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民族民主运动，其矛盾既针对本国的统治阶级，也针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高度评价这一时期说：“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的生活，要求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①亚洲人民如此，拉丁美洲人民也如此。

古巴独立战争（1895—1898）、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1910—1917）以及当时在拉丁美洲广泛开展的民族民主运动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独立战争后的拉丁美洲 独立战争以后，拉美各国长期政局动荡、经济停滞，和美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恰成鲜明对比。在格兰德河以南出现这样的情况决非偶然。

取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各国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各项任务，各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残余。到处盛行大庄园制，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而广大农民则贫无立锥之地。这种现象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还很普遍。例如阿根廷，五千个大地主就占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在巴西拥有一万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仅占全部农户数的 0.3%，但却占有全国耕地面积的 25%；即使在比较发达的智利，五百九十九户大地主就占有全国耕地的 56%。大庄园主一般都在大城市，甚或在欧洲豪华的都会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根本不关心庄园内生产的发展，这样就造成了土地大片荒芜、无人耕种的局面，如在委内瑞拉，可耕地的使用率不过百分之一左右。正是大庄园制使拉丁美洲长期贫困落后。

除世俗地主外，教会也占有大量土地。在独立战争以后，教会依然是剥削阶级的精神支柱，同时又拥有大量的财富，不少主教和修道院长都是大地主、大财主。教会往往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反对任何改革和进步，是拉丁美洲前进的巨大障碍。

和这种大庄园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是政治上的暴力和独裁。大庄园主无法借选举和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就只有诉诸刺刀和武力。这就是为什么在拉丁美洲“考迪罗主义”盛行。所谓“考迪罗”，西班牙文原义是首领或领袖，这里意为军事独裁者。考迪罗主义是一种反动独裁者的统治制度。考迪罗通过政变上台和下台，国家不断更换政府和宪法，出现了内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局面。如玻利维亚在七十四年中爆发过六十次所谓“革命”，委内瑞拉在七十年中有五十次“起义”，秘鲁在独立后的头一百年中换过五十多个总统，巴拉圭则几乎每年就有一次“革命”。考迪罗或在全国建立独裁政权，或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他们中间有人往往血腥统治达数十年之久，如墨西哥的圣他·安纳（1834—1855年），阿根廷的罗萨斯（1835—1852年），巴拉圭的佛兰西亚（1814—1840年）、罗贝兹父子（1845—1870年）等。考迪罗上上下下，内战层出不穷，动乱频繁，要想取得经济上的迅速发展，显然是不可能的。

拉丁美洲经济落后的一大标志是它的单一产品经济，即不少国家主要只生产某种单一的农产品或矿产品，如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

全靠咖啡维持；糖的生产则在古巴和多米尼加占绝对优势；巴拿马和洪都拉斯的唯一出口是香蕉；铜和锡分别构成了智利和玻利维亚的经济命脉。这种单一产品的经济结构极端脆弱，经不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任何波动，带有极大的依赖性。

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落后、政治动乱频繁都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干涉和控制密切相关。英国势力早在独立战争期间就打进了拉丁美洲市场。从 1807 到 1814 年，英国对拉丁美洲输出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为四百万英镑，1825—1827 年增加到每年平均六千六百万英镑。除商品输出外，英国还通过贷款来进行经济渗透，从 1822 年到 1826 年，英国向除巴西外的拉美国家前后贷款十次，共达二千一百万英镑；1870 年投资增加到八千五百万英镑，1890 年激增到四亿二千余万英镑，第一次大战前高达十亿英镑。

美国一向觊觎拉丁美洲，内战以后，在拉丁美洲大肆进行经济扩张。1899 年，美国在拉美的投资为三亿美元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激增到十五亿美元，足以和英国分庭抗礼。当时，美国在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势力已经远远超过英国，但在南美英国依然执牛耳。

英美诸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侵略，伴随的是政治上、军事上的干涉和控制。整个十九世纪，美国和欧洲各殖民大国都视拉美为自己的领地，或在那里扶植傀儡政权，或直接派军入侵，进行长期占领。从 1856—1903 年，美国曾对拉美进行五十次武装干涉，一次美墨战争（1846—1848 年）就鲸吞了二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墨西哥领土。妄图卷土重来的西班牙曾在 1861—1865 年悍然入侵多米尼加。而法国则对墨西哥进行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殖民战争（1861—1867 年）。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美国更在门罗主义的幌子下，交替使用金元和大棒，在拉丁美洲推行霸权政策。1909、1912 年，美国两次出兵尼加拉瓜，进行长期占领。到 1915 年，美国军舰就曾打着“维持秩序”的旗号，二十多次侵入海地。1905 年，美国用武力胁迫多米尼加签订不平等条约，接着又从 1916 年起实行长达八年之久的军事占领。美帝国主义在拉美实行扩张的赤裸裸的例子就是它一手泡制的“巴拿马革命”。

早在十九世纪中期，美国就企图在中美洲开凿运河，开始垂涎巴拿马地峡了（当时，巴拿马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美国实力还不够强大，再加英国的抵制，英美两国 1850 年签订了克莱顿——布尔瓦条约，两国共享在巴拿马开凿运河的权利。但是 1850—1855 年，美国还是在巴拿马修筑了铁路，1852 年未经哥伦比亚政府同意又在巴拿马地区擅自调动军队，1856 年更借口所谓“西瓜事件”一度出兵占领巴拿马。美国一再践踏哥伦比亚的主权，早把巴拿马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到了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在巴拿马地区开凿沟通两洋运河的呼声在美国甚嚣尘上。开通了这条运河就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辟出了捷径，可使从纽约到旧金山的海路减少九千海里。这不仅对美国垄断资本家有利，而且对美国有战略价值。美国政界和财团因此加快了掠夺巴拿马的步伐。

美国政府首先向英国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它同意修改 1850 年的英美条约。经过多次谈判，忙于欧洲事务的英国终于让步，根据 1901 年 11 月 18 日两国签订的新约，英国被迫放弃了它对巴拿马地区的要求，承认美国可在那里独家经营。接着美国又通过 1899 年成立的新巴拿马运河公司与法国巴拿

马公司开始谈判，企图将后者吞并，以清除开凿巴拿马运河的竞争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不惜放出空气，制造准备在尼加拉瓜修筑运河的假象。经过长期敲诈，法国巴拿马公司终于在1902年1月4日同意以四千万美金的低价出售该公司的全部权利和财产。

在这以后，美帝国主义就把它的侵略的矛头直指着哥伦比亚。1902年，美国和哥伦比亚进行紧张的谈判。最初哥伦比亚公使孔查顶住了美国的压力，但却被冠以“精神病”的帽子驱逐回国。继任的埃兰不惜卖国求荣，于1903年1月22日和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签订了“埃兰——海约翰条约”。根据这个条约，美国取得了在巴拿马地区为期百年的独占租借权，还可不经哥伦比亚政府允许即向该地派遣军队。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一千万美元的补偿金和每年二十五万美元的租金。

“埃兰——海约翰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哥伦比亚朝野震动。全国舆论大哗，纷纷指责埃兰出卖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美国方面则向哥伦比亚施加粗暴压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海约翰都亲自出面进行威胁，企图迫使哥伦比亚国会批准“埃兰——海约翰条约”。

哥伦比亚参议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于8月12日以二十四票的压倒优势（共二十七人出席）否决了“埃兰——海约翰条约”。恼羞成怒的美国政府转而采取颠覆手段，用武力分割哥伦比亚的领土。罗斯福总统早在3月就命令陆军部长鲁特派遣干练军官潜入巴拿马地区收集情报，同时在地面上层人物和大地主中纠合一小撮反动分子在巴拿巴地区“起义”。美国为他们制定计划，提供大量经费。

在得悉一小撮叛乱分子发动“起义”的确定日期以后，几艘美国军舰分别驶入科隆港和巴拿马城海滨。11月3日晚，巴拿马果然爆发了“革命”，并于次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大批美国军舰驶入科隆港，切断了巴拿马和外界的联系，致使哥伦比亚政府只能坐视那里事态的发展。美国政府则急忙承认了巴拿马共和国。11月18日美巴签订条约，美国对巴拿马地区的要求全部得到满足。

面对内外反动势力，拉丁美洲人民仍然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奋起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废除奴隶制度就是拉丁美洲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还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不少拉丁美洲国家就宣布废除了奴隶制。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也在十九世纪中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拉美最大的国家巴西所取得的成就更引人注目，它在1888年废除奴隶制，接着又在1889年宣布推翻君主制，成立共和国。

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的经济也克服种种障碍，逐步向前发展。到十九世纪末，铁路普遍铺设，而且增长很快。1910年墨西哥铁路线长达二万四千公里；1914年，阿根廷铁路线长达二万二千八百公里；1916年巴西铁路线长达二万七千公里。此外，纺织、制革、肉类、乳品等轻工业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成长，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一些工会组织，在墨西哥和阿根廷还成立了第一国际的支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组织和政党陆续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形成。

古巴独立战争（1895—1898年）在十九世纪早期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高潮中，古巴没有取得独立。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反抗殖民统治的爱国组织如“玻利瓦尔的阳光和闪电”、“黑鹰大军”等陆续在古巴出现。古巴人民的斗争从一开始便得到了玻利瓦尔和许多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的支

持。

但是邻近的美国政府野心毕露，企图一口吞下这颗“加勒比海上的明珠”。杰弗逊还在1820年就认为古巴是美国的“一个最有趣的补充物”，应冒最大的风险，一有机会就加以攫取。1823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公开声称古巴是“北美大陆的天然延续”，古巴势必归并美国，就象成熟的苹果一定要落在地上一样，古巴也总有一天要落在美国的手里。然而十九世纪早期的美国羽毛尚未丰满，无法侵占古巴，力图维持原状。1840年，美国国务卿福西斯通过驻马德里代办向西班牙政府声称，美国准备用武力支持后者继续占领古巴。1853年，美国又改换手法，试图用一亿三千万美元从西班牙手中购买古巴，但遭到了拒绝。尽管如此，美国却始终没有放弃吞并古巴的野心。

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古巴和西班牙的矛盾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日趋尖锐。古巴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土生白人、混血种人和黑人都迫切要求摆脱殖民统治。1868年10月10日，地主出身的律师塞斯佩德斯在东方省首举义旗，发表了要求独立的宣言，开始了古巴历史上著名的十年战争。最初形势发展很快，起义席卷了几个省，队伍扩展到两万多人，接着又在1869年4月10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由塞斯佩德斯出任总统。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废除奴隶制，在整个战争期间却没有提出鲜明的社会改革的纲领。西班牙政府为了保住它在美洲仅存的最重要的殖民地，先后几次调派大量军队来对付起义军，并严密封锁整个岛屿。不屈的古巴人民顽强斗争了十年之久，1873年塞斯佩德斯被俘就义。最后由于领导人的动摇和叛卖，1878年签订了妥协的和约，“十年战争”（1868—1878年）遭到失败。

十年战争是古巴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尽管古巴人民并没有赢得独立，但他们的血却没有白流。1886年，慑于十年战争的余威，殖民政府宣布在全岛废除奴隶制。更重要的是，这次战争锻炼了一批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他们在未来的独立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中著名的有马塞奥和戈麦斯。

安东尼奥·马塞奥（1845—1896年）出生在一个穆拉托人的农民家庭，外号“青铜巨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革命家，曾参加过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独立战争，他的母亲也是一位献身革命的女英雄。在父母的教育和熏陶下，马塞奥和他的六位兄弟都投身于古巴的解放事业。还在十年战争期间，他们全家都发出了庄严的誓言：“我们，马塞奥一家愿为祖国而捐躯。”十年战争失败以后，马塞奥为反对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继续斗争。

马克西莫·戈麦斯（1836—1905年）出生于海地岛的地主家庭。他参加古巴的十年战争，因战功卓著而擢任为共和国的陆军部长。戈麦斯不满1878年的和约，继续斗争，是古巴独立战争中的一位杰出战士。

在古巴独立斗争史上，另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和爱国者是何塞·马蒂（1853—1895年）。他出身贫寒，还在学生时代就从事反殖民统治的革命活动，用充满激情的诗歌和戏剧唤起古巴人民起来进行斗争。1869年十七岁的马蒂因参加起义被捕，判处六年苦役，随后又流放西班牙。马蒂热烈支持十年战争，反对1878年和约。1879年9月，他回到古巴准备新的起义，但随即被捕，流亡到了美国。他在那里收集经费，购买武器，又在古巴流亡组织中做了大量工作，号召所有爱国者不分肤色、信仰，团结一致为祖国的解放而斗争。1892年4月10日，在马蒂的领导下成立了古巴革命党，为独立战争的开展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马蒂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识不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改造古巴社会的纲领；但他坚决反对殖民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就使他能站在时代的前列，起着古巴人民旗手的作用。

十年战争并没有消除古巴和西班牙之间的矛盾。西班牙在战后强化了它的殖民统治，加紧对古巴进行剥削和控制。尽管古巴每年都生产大量财富，但它的债务却直线上升，1880年为一亿七千万比索，1898年就上升到五亿比索。1895年，古巴的总收入为一亿二千三百万比索，但均被殖民当局搜括一空。

当时古巴的西部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单哈瓦那省就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东部一向贫穷落后，历来是矛盾的焦点。和在十年战争期间一样，古巴的东部又成了独立战争的策源地。1895年2月24日，蒙卡达将军率部首先在东方省发难。4月，马蒂和戈麦斯率领一批爱国志士回国响应，壮大了起义的声势。

广大的人民包括黑人、混血种人、土生白人、当地华侨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战斗，革命势力不久席卷全岛。起义部队打败了西班牙殖民军，取得初步胜利。1895年5月19日，马蒂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给起义的古巴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殖民当局也迅速调集重兵前来镇压。但起义的队伍却越战越勇，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初只有一万二千人，1895年底就增加到三万人，1896年初又猛增到四万五千人。

1895年9月，古巴爱国志士在卡马圭省召开制宪大会，通过宪法，庄严宣布古巴独立和成立共和国。10月，革命军正副司令戈麦斯和马塞奥领导了“突进战役”，从东到西，直插敌后，先后行军一千七百公里。1896年1月，起义军已进逼哈瓦那，后又分兵两路，直抵岛的极西端，彻底打乱了殖民者的防御体系。

起义军的胜利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极大恐慌。1896年初上任的新总督魏勒将军只得用遍设集中营的手段来对付起义的古巴人民。它给无辜的居民带来了难以描述的牺牲和痛苦。据估计，单在哈瓦那省集中营内的十五万人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被折磨而死，在全国集中营内共死亡四十多万人，几占古巴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896年12月，马塞奥也不幸阵亡。但古巴独立战争的胜利行进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到1897年底，二十万西班牙殖民军在古巴人民铁拳打击下只残剩下六万多人能继续作战，而起义军的人数却增加到了五万三千多人。西班牙政府不得不承认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办法已经失灵，并于1897年11月被迫同意古巴自治。

古巴人民历来坚信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祖国。早在1896年4月，马塞奥就对纽约《世界报》记者宣称，古巴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西班牙的腐朽统治。他还认为，只要获得三万支步枪和一百万发子弹就可大大缩短斗争的期限，根本无需任何外来的干涉。到1897年底，事实已雄辩地证实了马塞奥的预见。起义者差不多解放了三分之二的古巴土地，整个农村实际在起义军的控制之下。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陷于崩溃边缘。

但窥伺已久的美帝国主义却在此时乘机而入，强占古巴人民的胜利果实。还在1896年底，克利夫兰总统就在国情咨文中声称对古巴要承担起一种所谓“更加崇高的责任”。1897年底，美陆军副部长布利克西申便扬言要用

同时削弱西班牙和古巴的办法“来把大安的列斯群岛的珍珠”拿到美国的手中。1898年共和党的麦金莱上台后，奉行更加露骨的帝国主义政策。他一面大造舆论，一面又积极扩军备战。

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哈瓦那港的美舰“缅因号”突然发生爆炸，原因至今不明。当事件还处于调查阶段时，美国就迫不及待地在4月25日向西班牙宣战。在古巴起义军的配合下，美军才得以顺利地登陆，并轻易取胜。久已遭受古巴起义军沉重打击的西班牙殖民军无力再战，被迫在1898年8月签订了停战协定。根据同年12月美西签订的巴黎和约，西班牙放弃对古巴的殖民统治，承认古巴独立。而给自己戴上“解放者”桂冠的美国却取得了控制古巴的权利，并从西班牙手中夺得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美帝国主义表面上承认古巴独立，可是美国国会于1901年通过的普拉特修正案规定，古巴不经美国同意，不能订立国际条约，不能借外债；为了“维护”古巴的“独立”和政治稳定，美国可随时向古巴出兵。1902年5月，古巴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但它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墨西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0—1917年）长达二十一年之久的圣他·安纳专政和美墨战争使独立以后的墨西哥长期陷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家贫困不堪。通过1854年到1860年的改革和内战，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才争得了一线生机。但为时不久，法国又对墨西哥进行蛮横的武装干涉（1861—1867年）。饱经战祸的墨西哥人民在胡阿雷斯的领导下奋起反击，打败了法国侵略军，保卫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1876年上台的狄亚士重新把墨西哥推向了崩溃的深渊。

在狄亚士专政时期（1876—1911年），墨西哥人民经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狄亚士随心所欲地将大片土地分授给自己的亲信。在下加利福尼亚州，有四个大地主得到了四千万英亩土地的赏赐；而在奇瓦瓦州，某个大地主一人就独得一千七百万英亩的土地；另外十七个大地主总共得到九千七百万英亩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墨西哥土地集中和贫富悬殊达到了惊人的程度，1910年，墨西哥三分之二的土地都集中在一万一千个大地主的手中，而同时农村中却有一千五百万人完全丧失了土地。

狄亚士在国内依靠一小撮大庄园主，对外又卖身投靠帝国主义，把墨西哥丰富的资源拱手奉送给外国资本家。到他统治临近结束的时候，墨西哥87%的矿业、85%的石油产地、58%的炼油厂都落入美国资本家的手中。美国大资本家又是墨西哥土地的掠夺者，仅在奇瓦瓦州，七个美国富翁就巧取豪夺，占地达三千五百万英亩。墨西哥三分之二的铁路都由美国资本家建造，整个铁路的管理权也操纵在美国人手中。美国的总投资高达十亿美元，43%的墨西哥财富都属于美国人。狄亚士这样慷慨地为外国资本家大开方便之门，难怪有人要辛酸地说：“墨西哥已成了外国人的母亲和她自己儿女的后母”。

在狄亚士统治下，墨西哥人民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从1890到1910年，每种食品的价格都上涨了一倍以上，而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却在减少。有人统计说，就实际工资而言，1910年一个农业工人的收入只相当于1800年一个债奴的四分之一。所以在殖民时期，一个债奴还能活着；但到二十世纪初，一个农业工人却只能慢慢地饿死。

随着矿业、石油开采而迅速成长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首先挺身而出反对

狄亚士独裁政权。1906年12月在普韦布拉、奥里萨巴等地的纺织工人群起罢工。次年1月7日，政府在威胁、利诱都失败的情况下，出动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屠杀工人达数百人。1907—1908年，工人斗争席卷了好几州。这是墨西哥革命的前奏。

比工人反抗规模更大、影响也更广泛的是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南方领导农民起义的是贫农出身的查巴塔，活跃在北方的是以神话式英雄薇拉为首的游击队。政府竭尽全力，但无论如何也扑灭不了农民反抗的怒火。这两支南北呼应的农民队伍严重地动摇了狄亚士统治的基础。

1905年成立的自由党和它在次年所颁布的要求改革的纲领表明，小资产阶级开始卷入反对狄亚士统治的斗争。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以马德罗为首的反对派。马德罗先后出版反狄亚士的刊物《民主主义者》、《新墨西哥》，组织各种从事政治活动的俱乐部。马德罗最初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要求选举民主化和反对狄亚士再次当选。

全国政治气氛极端紧张，反对派掀起了反对狄亚士再当选的运动，马德罗并于1910年4月被推为总统候选人。运动起初带有非常温和的色彩，但政府却采取种种限制和迫害的措施，并于该年秋天将马德罗逮捕入狱。这样反对派和政府之间的冲突便转向更激烈的阶段。狄亚士不择手段，控制选举，最后宣布自己得选票一百万张而“正式当选”。这种无耻的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选举以后，马德罗释放出狱，逃往美国。他公布新的政治纲领，决定用革命手段推翻狄亚士政府，并允诺进行土地改革。11月18日，在普韦布拉（在墨西哥城的东南），马德罗的拥护者和政府军发生武装冲突，揭开了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1911年春，全国范围内反狄亚士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军队都行动起来，反对狄亚士。查巴塔领导的农民队伍，1911年2月开始向首都墨西哥城进军。5月24日在首都墨西哥城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数万群众包围了总统府，并高呼：“打倒狄亚士”、“绞死狄亚士”。事态的迅速发展使反动派惊慌失措，处于四面楚歌中的狄亚士不得不宣告下台，仓皇逃亡国外。同年11月11日，马德罗通过选举，正式组成自己的政府。

墨西哥人民推翻狄亚士专政的胜利仅仅是这场伟大革命的开始。在反政府阵营中很快开始了分裂。马德罗政府最初曾采取一些措施来稳定国内的局势，并限制外国资本的势力，但在土地问题上却迟滞不前，不敢触动大庄园主的利益。于是农民和资产阶级政府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在多次呼吁马德罗实行土地改革未遂后，查巴塔便于1911年11月28日提出纲领，决心没收地主土地，并在农民中进行分配。广大农民拒绝向政府交出武器，并在好几个州开展了夺取土地的活动。马德罗政府逐渐丧失了农民的支持，变得十分脆弱。

同时，马德罗政府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冲突。尽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马德罗只对美国资本采取了十分温和的限制措施，但一向把墨西哥视为自己属地的华盛顿政府却暴跳如雷，不断向马德罗施加粗暴压力。美国政府一面把大批武器运送给墨西哥境内的美国居民，试图制造混乱；另一方面又在美墨边境陈兵十万，公开进行战争挑衅。

1913年2月在美国大使一手策划下，墨西哥城爆发了反革命叛乱。2月18日，反动军官和政客在美国大使馆聚会，并从那里出发去逮捕马德罗。不

久，马德罗惨遭杀害，反动军官韦尔塔粉墨登场。事后，粗暴干涉墨西哥内政的美国大使对此直认不讳，并公开声称：“为了墨西哥的幸福，那就一定要搞掉马德罗”。

韦尔塔的政变意味着代表帝国主义、反动地主和高级军官势力的复辟。它导致了内战的爆发，同时也标志着墨西哥革命新阶段的来到。微拉和查巴塔都坚决反对这次反革命政变，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前马德罗的助手卡兰沙也组成立宪军，开始反政府的军事行动。微拉率领的农民军很快控制了墨西哥的北部，到处没收地主的土地，在农民中加以分配。查巴塔的队伍在南方痛击韦尔塔的军队。

美帝国主义乘机出来干扰。1914年4月，借口所谓美国几个水兵被扣事件，美军竟悍然入侵韦腊克鲁斯港。美国的公开侵略加速了墨西哥国内事态的发展。墨西哥人民一面坚决反对美国入侵者，同时也掀起了反对韦尔塔斗争的高潮。在微拉和查巴塔率领的农民军以及卡兰沙所率领的立宪军的夹击下，韦尔塔节节败退，并不得不于1914年7月15日宣告下野。

1910年到1917年的墨西哥革命就进入了它最后的阶段。在推翻韦尔塔以后，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斗争再度激化。以卡兰沙为首的资产阶级无意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而微拉和查巴塔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则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双方的意见分歧导致激烈的武装冲突。微拉和沙巴达的队伍在人民的支持下，曾于1914年12月占领过墨西哥城。但是墨西哥农民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都还没有成熟到夺取政权的地步。微拉认为他受教育不够，无法胜任国家的领导。查巴塔则主张停止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因而他们都无法发展当时有利的局势。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卡兰沙在1915年初提出土地法，允诺将狄亚士时期所掠夺的土地归还给农民，又采取了某些维护民族利益的措施。卡兰沙还使用挑起工农相互残杀的办法来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经过三年多残酷的内战，微拉和查巴塔的力量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而卡兰沙则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

1917年2月，墨西哥立法会议通过的宪法宣告了长达六年之久的革命的结束。尽管劳动人民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在宪法中却反映出他们长期斗争的成果。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墨西哥的资源均属本国公民，外国人不得占有，还规定了土地改革的原则。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包含了比较进步的劳动法，使墨西哥工人享有八小时工作制、组织工会和罢工的权利。1917年墨西哥宪法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比较明确地解决了工农的一些切身问题，是一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宪法。

1910—1917年革命在墨西哥历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尽管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但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构成了它的动力，使它带有鲜明的民主革命的色彩。此后，墨西哥人民便在1917年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争取民主、争取进步和争取土地的斗争。

第二十章 英帝国的自治领

加拿大“七年战争”的结束和巴黎条约的缔结，结束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北美占有广大的殖民地：从东面的纽芬兰到西南的密西西比河以及“无主”的西北地区，从佛罗里达到北极圈，都在英国的旗帜之下。其中的新斯科舍和魁北克，__构成后来加拿大的核心，不过是英属广大地区的一部分。

圣劳伦斯河流域对当时的加拿大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那里是移民最多的居住地区，占绝对多数的是法国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自蒙特利尔以下以至河口约有六万五千人。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后，那些英国的忠实臣民约四万人，先后从美国越界进入加拿大。他们或移居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__等沿海地方，或移居到大湖区以北的安大略。至于广大的中部和西部还是印第安人的游牧地区。加拿大的大部分居民从事农业和皮毛贸易。魁北克和蒙特利尔都是农业区的中心，那里有少量的工商业，另外就是皮毛贸易。这种贸易以城市为中心而分布到极西地区。沿海和内陆河流和湖泊里，鱼产非常丰富，因此许多居民从事渔业。在大湖和大西洋之间还有大片大片森林，它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建筑材料和车船的制造材料，因此又有许多居民从事伐木业、木材加工业。另外还有些小型工业如面粉业、制革业，为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英国对加拿大法国移民的统治不是过份苛刻，1774年颁布的“魁北克法案”承认法国移民沿用法国民法，使用本民族语言，信仰天主教。但是由于英国人源源而来，当地的法国移民日益相对地成为少数，并为此深感不安。而新来的英国人也不希望在当地法国移民的习俗下生活。这样，在英语居民和法语居民之间就产生了摩擦、不和。为了消除这些矛盾，伦敦英国当局于1791年颁布“宪法法案”，把原来的魁北克省划分为二省：以英国移民为主的上加拿大省（即安大略省），以法国移民为主的下加拿大省（后仍称魁北克省）。两个新省各设一个总督、一个委派的参议院和一个民选的众议院，各享有有限的地方自治权利。

以后三十年，英国移民源源而来，加拿大人口增加起来了。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加拿大仍然给人这样的印象：“在英属地界以内，除了少数位置适中的地点显出几分接近于美国的繁荣以外，所有的地方似乎仍是不毛的和荒芜的。”“古老的蒙特利尔天然地是加拿大的商业都市，但是它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美国新建的布法罗城。”

加拿大需要发展，有发展的条件，但是加拿大仍然面对着困扰。困扰之一是境内的英语居民和法语居民之间的不和仍然存在。下加拿大，法语居民多，但是他们对那些只占少数而又在政治上、商业上占优势的英语居民持怀疑态度。在上加拿大，英国移民区不断扩大，新来的移民抱怨当地的老权贵控制了政治和经济事务。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之间也有互相抱怨的情绪，例如上加拿大认为它的出海通道被下加拿大封锁住了。困扰之二是加拿大人都处在伦敦的官僚主义机构——殖民部的管理之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他们要求自治的呼声日益增高。三十年代经济的衰退更增加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就是在这种条件下，1837年在下加拿大和上加拿大爆发了小规模起义。两次起义完全是独立发生的，但都是伦敦英国当局统治不当的结果。领导下加拿大起义的是路易·帕皮诺，起义者试图建立独立的法国人的共和国。

领导上加拿大起义的是威廉·麦肯齐，他们要求从英国官方取得更大的自由。由于起义组织不好，目标不明确，缺乏支持，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英国政府受到起义的震动，感到惊慌，深恐加拿大将沿着美国独立的道路发展下去。1838年，它派辉格党人德拉姆伯爵组织调查团，考察加拿大的情况，探索政治上不满的根源。第二年，德拉姆向英国议会提出报告。他的报告以允许殖民地建立自治政府为基本原则，提出了几项具体建议：合并上下两个加拿大省；各省建立责任政府（即由各省民选众议院的多数派组织各省的政府）；英国派往各省的总督只在紧急时期行使权力；英国政府帮助向加拿大移民，帮助修建铁路以促进加拿大的联合和发展。在加拿大的历史上，德拉姆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他的具体建议，英国政府相继实行了：1841年，上下两个加拿大省合并；1846年到1848年间，英国同意扩大加拿大各省的议会权力并且同意各省的加拿大人建立自治政府。德拉姆看到加拿大的法语居民和英语居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认识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从英帝国的立场出发，不采取调和的办法，而是企图以多压少。合并上下两个加拿大省的主张这是从这个企图出发的，其结果是一次失败。

十九世纪中期，加拿大的法语居民和英语居民之间的不和问题仍然存在，并且日益增加着危险性。加拿大的强邻美国对加拿大虎视眈眈，美国向西部涌入的人流对加拿大的西部土地又构成一定的威胁。加拿大是一块庞大而分散的土地，各省互不联合。加拿大人日益意识到这些问题：这块庞大而分散的英属殖民地的前途将会怎样？新斯科舍的渔民和农民、圣约翰河上的困苦居民和伐木者、圣劳伦斯河的法裔居民、安大略湖畔开辟森林的拓荒者、散布在西部的皮毛商之间应当构成一种什么关系呢？有人早就有这种主张：把整个加拿大放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各省联合起来的思想酝酿日益成熟。1864年10月，加拿大东部和中部几个省的代表在魁北克的集会上达成了联合的协议，草拟了联合宪法。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最后接受了联合的拟议。这个法案在那年的7月1日生效，这个新联合起来的国家称为“加拿大自治领”，实际上是一个允许各省继续存在的联邦。

按照协议，以前合并的上下两个加拿大省重新分为两省，即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它们同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是自治领所辖的最初四省。各省设自治政府，管理地方事务。在渥太华，加拿大建立了中央政权机构。总督代表英王行使象征性的权力。立法机构分为参众两院，参议员由总理推荐，总督任命，任期终身；众议员由各选区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政府为责任制内阁，由众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出任总理组成内阁。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掌加拿大政权。保守党的约翰·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自由党的亚历山大·麦肯齐先后出任加拿大的第一、二任总理。但是在十九世纪晚期，保守党在政治上占优势，1878年以后的十八年一直执政。

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初只有内政权，外交权力操在英国政府手里。自治领所辖的领土也远远不到后来的范围，东部沿海的纽芬兰和爱德华太子岛、西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还是直辖英国的殖民地，中西部和北部的广袤地带仍属哈得孙湾公司。1869年，加拿大政府从公司手里购买了这一广袤地带，第二年就在这一地带邻近安大略省的地区建立了马尼托巴省。以后二、三年里，不列颠哥伦比亚和爱德华太子岛都作为省，加入了自治领。到1873年，联合的加拿大已经包括了除纽芬兰外的整个英属北美洲。

随着十九世纪的进展，小麦日益成为加拿大的重要农产品。小麦产区在

加拿大中部。要发展小麦的生产就得筑一条从东到西的铁路，把加拿大的中部地区和大西洋的沿岸地区连接起来。1871年，英属哥伦比亚省同意加入加拿大自治领，唯一的条件是十年之内要修筑横贯东西的铁路线。兴建横贯东西的铁路不仅关系加拿大经济的发展，而且关系到防务以及在传统上和距离上都相距遥远的各省的巩固问题。建筑铁路的热潮起来了。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全线通车，比预定时间提早了五年。第一列火车从蒙特利尔驶出，行驶五天到达太平洋海岸。当时，加拿大的重要产品除小麦以外，还有鱼类、皮货、木材和纸浆。随着新闻和印刷事业的发展，纸浆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商品了。

铁路对加拿大西部的发展关系重大。西部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克隆迪克地区发展了金矿。十九世纪末成千上万的寻金者不断涌入，形成一股淘金狂。由于那里的人口增长，1898年建立了育空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加拿大人口已经增长到五六百万，制造业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1910年小麦开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出口品。1914年出口总值已大大超过十亿元。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一个巨岛，本身就是一个大陆，由于同外界隔绝，长期不为外界所知。当地土著居民稀少，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估计约有三十万人，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十六世纪，欧洲探险家在太平洋探险，都不曾发现澳大利亚。十七世纪早期，荷兰人发现了它，但是认为那里过于贫瘠，不宜殖民，更无利于商业交往。1769年，英国海军军官、著名的探险家詹姆斯·柯克在他的第一次远航期间（1768—1771年），曾沿澳大利亚东海岸航行。他以为那一地带很象英格兰的南威尔士，因此命名为新南威尔士，并宣称它是英国的领土。

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独立以前，英国常把所谓的“罪犯”流放到北美。美国独立以后，英国政府决定利用澳大利亚作为“罪犯”的流放地。1788年，第一船流放者抵达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很快就在东南海岸建立了悉尼城。新到的流放者，一般并不是什么通常的罪犯，而多是政治犯。他们经过几年的苦役之后，获得自由，成为当地的公民；如果希望继续留在澳大利亚，可以获得土地。

十九世纪初，许多自由移民开始向澳大利亚移殖。他们也可以获得土地。随着自由移民的增加，他们中间反对英国政府把流放者运送到澳大利亚的声浪高涨起来了。1840年开始，英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采取限运步骤。

经过不断的探索，英国移民知道新南威尔士不过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澳大利亚的许多地区是沙漠地带，但是又有许多地区土地肥沃，足可发展。十九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的经济有缓慢的发展。那里有广大的地区适于发展养羊业，而当时英国的毛纺织业正需要大量羊毛，养羊业繁盛起来，成了澳大利亚经济兴旺的主要基础。牧羊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放牧，还可以利用流放者的劳动力。他们成为有钱有势的人，在十九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澳大利亚简直是他们的天下。

当时，法国人也在澳大利亚沿海探索，英国为此警觉起来，于1829年宣布把整个澳大利亚置于它的统治下。十九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英国在澳大利亚先后建立了塔斯马尼亚、西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三个殖民地；五十年代相继建立了维多利亚和昆士兰两个殖民地。

1851年，在维多利亚发现了金矿，移民象洪流一样涌入澳大利亚。当地

政府一再发布法令，限制非白人入境，要实行把澳大利亚白人化的政策。这引起了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方国家的敌对情绪。但是当地政府严格推行这一政策，以致英国人以外，只有其他国家的极少数人得以在澳大利亚永久定居。此外，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遭到压迫以至于追捕和消灭。

英国政府于 1852 年准许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有权建立责任政府，享有自治权利。它们立即改变当地政治组织，使它民主一些。那里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实行了秘密投票；各地建立了议会，由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由于发现金矿、移民涌入，1851 年以后的十年之内，澳大利亚的移民人口从四十万人上升到百万人以上。由于当地居民的抗议，从 1867 年起，英国不再向澳大利亚运送流放者。由于淘金者的大量到来，牧羊主在政治上的优势到五十年代末也消失了。十九世纪下半期，澳大利亚继续在发展变化。铁路和电报线路建设起来了，淘金狂潮低落以后，许多新到的移民转向农业和牧羊业。到二十世纪初，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世界上小麦、羊毛和肉类的一个主要出口国。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各享有自治权，但是各自为政，互不关联。那里不象加拿大，没有强大的压力迫使它们急欲联合起来；它们也没有强邻具有扩张野心，对它们造成威胁。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国家到处抢夺殖民地，德国和法国都在向南太平洋扩张，澳大利亚各殖民地感到为了安全有必要联合起来。当时，澳大利亚又遭遇到经济上的困难，羊毛和其他产品的价格急剧下跌，失业情况严重，各殖民地看到为了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也有必要联合。经过讨论，澳大利亚六个分散的殖民地决定联合起来，并以美国和加拿大的联邦组织为样板，组成澳大利亚联邦。经过英国同意，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并且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原来的各殖民地分别作为一个州加入联邦。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在联邦掌权的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工党，在几个州里，工党也占政治优势。工党采纳了许多社会立法，其中包括养老金法、劳资纠纷调解法等等。在 1907 年的著名的《收获人判决书》里，法庭认为，对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说，基本工资应当决定于“普通被雇人的正常需要，而且是作为生活在文明国家的人看待的”。

新西兰 新西兰远在澳大利亚东南海岸的一千六七百公里以外，包括两个主要的岛屿北岛和南岛。1642 年，荷兰人塔斯曼首先发现它。英国人柯克第一次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也到过新西兰。那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植物繁茂。那里的土著居民是毛利人。

毛利人象夏威夷的土著居民一样，原是玻利尼西亚人，千百年间，他们驾独木舟深入南太平洋。十八世纪晚期欧洲人到达的时候，新西兰北岛有相当稠密的由毛利人组成的农业人口，而南岛的人口比较稀少。同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相比，毛利人有较高的文化，对殖民者有较强的抵御能力。

英国在新西兰殖民的过程是很缓慢的，因为它当初对新西兰的兴趣不大。十九世纪早期，新南威尔士的商人和美国的捕鲸船不时来到新西兰，但是新西兰的土著居民毛利人依旧保持了独立。1840 年，英国资本家组织新西兰公司，第一次运送移民到达新西兰。这批移民在北岛建立了奥克兰城和惠灵顿城。英国政府宣布新西兰属于英国，它同毛利人的族长签订协定，答应毛利人可以保有他们不愿出卖的任何土地。此后，英国移民大量移入，很快就从人数上超过了毛利人，1867 年前后，总数超过十七万人。他们以农业、

畜牧为主要职业，羊毛、肉类和牛奶制品成了主要出口产品。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西兰获得自治权利，建立了责任政府。白人移民掌握了权力，控制了局面，就违反同毛利人达成的协议，经常侵犯毛利人的权利。毛利人勤劳、坚强、有自尊心，特别留恋他们的土地。由于受到损害，他们不断反抗，六十年代，毛利人和白人移民之间的战争达到高潮。战争结束的时候，北岛一片荒凉景象，毛利人最好的土地也被当地政府没收了。但是毛利人很快恢复过来，治好创伤，人口又增长起来。经过顽强的斗争，他们争得了政治权利，取得了选举权，还能选举毛利人代表，参加议会；北岛的一半以上的地区保持在他们手里。

新西兰的白人移民绝大多数都是英国人。它是最典型的英国化的领地。新西兰政府采取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1893年准许成年妇女有选举权。十九世纪末，它通过了一些社会立法，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仲裁劳资纠纷，发放养老金等等。此外，政府还发放农贷，加强工会组织，从大地主手里买回一部分土地，分成小块卖给个别小农。这一切，目的都在于使社会安定，尽可能使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是公平合理的。

1907年，新西兰成为英帝国的自治领。

第二十一章 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关系

第一节 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而霸权的基础又是实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国的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和德国都先后赶上和超过了英法等国，成为世界上工业产值位居前列的国家，而英法则退居第三、四位。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与它们的殖民地霸权情况不相适应。二十世纪初，世界已被瓜分完毕；英国占有的殖民地最多，其次是俄国，法国为第三，德国居第四位。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之后，后来居上的国家对这种殖民地分配十分不满，尤其是德国强烈要求按照新的实力对比重新瓜分世界。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压倒对手，建立霸权，都在积极争取英国，缔结盟约，于是，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

德法矛盾和三国同盟的形成 1871年5月缔结的法兰克福和约结束了普法战争，但是德法两国之间的矛盾却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德国迫使法国割让洛林、阿尔萨斯二省，赔款五十亿法郎。这种苛刻和屈辱的条款使法国感到难以忍受，两国在旧恨之外，又添上了新仇。法国复仇主义思想从法兰克福条约签订之日起就不断增长着。国内各阶层和党派一致仇恨德国。因此，战后法国政府积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力，重整军备，争取盟国，准备有朝一日再同德国决一死战。

德国最怕法国的复起和结盟。它不断炫耀武力，企图迫使战败的法国屈从于它。1872年4月、5月间，德法举行谈判，德国既要求法国提前偿付三十亿法郎赔款，又不愿法国趁德军撤离国境而恢复武装力量。在外交方面，德国极力拉拢法国可能的盟友俄奥二国。1872年9月，德、俄、奥三国皇帝在柏林会晤。1873年6月沙皇访奥，10月德皇访奥。他们在维也纳附近签订的协定规定，一旦发生战争或革命危险，缔约各方应共同协商行动方针。这就是“三皇同盟”。俾斯麦企图通过它在外交上把法国孤立起来。

但是，“三皇同盟”各国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三皇当中，除了德奥关系比较牢固之外，俄奥在巴尔干地区存在尖锐冲突，俄德对法国的政策也有分歧。1875年德国借口法国增加军事编制，掀起战争叫嚣。俾斯麦制造战争就要爆发的气氛。参谋总长毛奇说：“德国将不得不阻止法国军事法案的实现。”俄国没有支持德国乘机慑服法国，而在1878年柏林会议中，德奥又迫使俄国吐出在俄土战争中获得的很大一部分战利品，并使沙俄占领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化成泡影。“三皇同盟”事实上已经瓦解了。1879年10月7日，德奥两国缔结秘密军事同盟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受到俄国的进攻，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全部武装力量互相支援；缔约国一方受另一大国进攻，只要俄国未参加侵略国一方，缔约国双方互守善意的中立；如有俄国参加，缔约国的每一方都必须竭力在自己的盟国一方作战。在这个军事同盟建立之后不久，德国又利用法意之间为争夺突尼斯而出现的矛盾，把意大利拉入同盟。1882年5月，意大利在维也纳同奥德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条约规定，法国如进攻意大利，德奥给予意大利以军事援助；法国如进

犯德国，意大利也负有同样义务；缔约国的一方受两大国同时进攻，缔约国各方应给予军事援助。这样，三国同盟形成了。

三国同盟以德国为首，但在同盟中，奥国是依附德国的伙伴，意大利则是一个暂时的和动摇的同盟者。同盟的建立宣告欧洲走上组成军事集团的开端。三国同盟使法俄产生不安全感，促使两国迅速接近，缔结同盟。从而为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基础。

法俄接近和法俄军事同盟 法国急需寻找一个强大的同盟者，以摆脱自身的孤立处境。“三皇同盟”的瓦解和德俄关系的恶化，给法国提供了一个亲近俄国的机会。1887年，法国向俄国提议结盟。1888年和1889年，法国先后向俄国提供五亿法郎和十九亿法郎贷款，帮助俄国解决财政窘境。此后法国资本源源不断输入俄国，使资金不足的俄国愈益加深了对法国财政的依赖性。1888年，法国又同意卖给俄国五十万支步枪，法俄的亲善关系又进了一步。1890年俾斯麦去职以后，德国改变了俾斯麦力图防止对法俄同时作战的政策。这也造成了德俄关系的恶化。1891年，法国舰队访问俄国的喀琅施塔得要塞，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亲自前往港口迎接，并在乐队演奏法国《马赛曲》时，破例地脱帽致敬。接着，两国缔结《谘商协定》。1892年，两国又缔结了法俄军事条约草案，规定了双方承担的义务：一旦法国遭到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意大利攻击，俄国应用其所拥有的全部兵力进攻德国；一旦俄国遭到德国或受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攻击；法国应用其所拥有的全部兵力进攻德国。同时对德战争发生后，法国应提供一百三十万兵力，俄国应提供七十一八十万兵力，并在战争中迫使德国立即在东西两线作战。1893年，《法俄协定》生效，法俄同盟正式形成。

法俄同盟的建立，使欧洲出现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加深了帝国主义争霸的矛盾。从此，欧洲沿着战争的斜坡越来越迅速地向下滑去。

英德矛盾和三国协约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作为世界上头号殖民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各个地区都和其它列强发生冲突。其中，英俄在亚洲，英法在非洲，争夺尤其激烈。由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后起的、野心勃勃的德国又成了它的主要竞争者，英德矛盾终于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主要矛盾。英德矛盾的发展大体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从普法战争至九十年代以前，德国打败了法国，建立德意志帝国之后，开始成为国际贸易中一个新的竞争者；1883至1885年间，德国夺得第一批殖民地之后，又开始成为国际殖民地舞台的一个新的竞争者。英国清楚地认识到德国已作为一个新兴强国在欧洲兴起，并且怀有问鼎欧洲的野心。但是英国对于德国的挑战并不感到特别担心。因为当时这种竞争尚未严重威胁英国。在英国某些政治家看来，德国的勃兴还有助于抑制法俄两国的霸权，使英国在亚洲对俄国和在非洲对法国的斗争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因此，这时英德之间一般没有发生严重冲突，甚至有时在一些重大的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

第二，九十年代以后，德国从争取称霸欧洲的“大陆政策”转向夺取全球霸权的“世界政策”，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德国无论在贸易问题上，还是在殖民地问题上，都开始成为英国强有力的竞争者。

英德矛盾在经济上的表现主要是贸易竞争。德国依靠采用新的技术和压低工人的工资，生产出价廉物美的商品，冲破其它国家的关税壁垒进行倾销。1880年至1890年间，德国输出额由三十亿零九千万马克增至三十四亿马克，

即大约增加 10%；而在以后的十年内，出口额增至四十六亿一千一百万马克，即增加了百分之 36%。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工业产品中，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向国外市场销售的。德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也迅速增加，1870 年只占 9.7%，到 1913 年，则上升为 12.6%，仅次于英国，居第二位。德国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日益排挤英国商品。1913 年，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贸易占德国出口的 75%，进口的 54%。英国对于德国强大的竞争能力，不仅感到惊讶，而且简直是惊惶失措了。

在殖民地方面，德国也成为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因为发展较迟，八十年代才开始夺取殖民地，至 1914 年，总共夺取了二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还不及英国的十一分之一。对此，德国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的，十九世纪末就公开叫嚷：“德国人已经看够了别人在分食那个甜包子。”德国也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可是，世界已经瓜分完毕了，德国到那里去夺取“地盘”呢？当然，只能是从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手里去抢，其矛头又首先对准英国。于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虽然这时英俄和英法的矛盾仍很尖锐，可是英国同德国的斗争也同时开展了。

德国同英国争霸的一个重要行动是决定修筑“三 B 铁路”，这条铁路线从德国首都柏林开始，通过奥匈帝国及其控制下的巴尔干地区抵达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然后渡过海峡，取道安卡拉直达巴格达。1888 年，由奥匈帝国至伊斯坦布尔的铁路干线竣工。同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修建至安卡拉的铁路租让权。1892 年安卡拉铁路竣工。接着，德国又与土耳其谈妥修建至巴格达的铁路租让权。这个以“三 B”计划驰名于世的铁路干线建成之后，德国的侵略势力将伸向亚洲，直达波斯湾畔，威胁着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的势力圈。英国极力破坏巴格达铁路计划的实现，加深了两国的矛盾。

在非洲殖民地政策上，德国也和英国发生冲突。在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当中，德国想沿赤道两旁向外扩张，从西南非和东非斜断非洲，建立一个殖民帝国；英国则想从埃及南下，以及由好望角北上，纵贯非洲，建立一个殖民帝国。并且计划修建由开普敦至开罗，再连通至加尔各答的铁路，把英属的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连成一片。这就是英国的所谓“三 C 计划”。但是，德国抢先于 1890 年占领坦噶尼喀，挡住了英国的去路；当英国企图经过比属刚果修筑铁路时，德国又压迫比利时拒绝让英国铁路过境，破坏了英国修建纵贯非洲铁路线的计划。德国还极力破坏英国在非洲南部的扩张，最明显的表现是支持布尔人抵抗英国。1896 年，布尔人粉碎了英国南非公司经理詹森所组织的偷袭，德皇威廉二世特地发出示威性的贺电，并给布尔人以军事物资的援助。以后英国提出了瓜分葡萄牙殖民地的诱饵，于 1898 年 9 月 26 日与德国签订条约，德国才没有卷入英布战争。

第三，德国加紧扩充海军，准备与英国争夺海洋霸权，1898 年，德国帝国议会通过海军法案。威廉二世野心勃勃地说：“德国的未来在海上”，“三叉戟（海洋霸权的标志）一定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1899 年 10 月，威廉二世写给首相毕洛夫的信上说：“（现在）英国舰队可以不怕任何联盟，因为现在德国实际上还没有舰队……，等到二十年以后，当舰队已建造完毕，那时我将用另一种语言讲话。”

英国非常了解德国建立强大的海军意味着什么。因为，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德国只能通过外交手段对抗英国，海军建成以后便能直接对英伦三岛

和海外殖民地使用武力了。而且既然德国已在经济方面赶上和超过了英国，那么，在海军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政治家们都在惶惶不安地谈到德国是英国未来的主要敌人，要保持霸权，必须打垮德国。1897年出版的英国《星期六评论》指出，“假使德国明天从地面上被消灭掉，那末，后天在世界上就找不到不因此而更富的英国人。过去，各国为争夺某一城市或某种遗产而厮杀若干年，难道现在它们不应该为每年五十亿英镑的商业收入而从事战争吗？”

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德矛盾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英德之间战争的阴影已经出现了。于是，英国被迫放弃长期奉行的“光荣孤立”政策，开始在欧洲寻找同盟者。当时，由于法俄集团与德奥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而英法、英俄争夺的高潮又逐渐过去，双方便产生了调整关系，联合对抗德国的想法。1904年，英法缔结协约，调整了两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法国放弃二十多年来反对英国占领埃及的态度，正式承认埃及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则同意法国夺取摩洛哥。从此，两国事实上建立了同盟关系。1907年，英俄两国又在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上达成妥协，缔结英俄协约。协约规定，波斯分为三个部分，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是英国势力范围，中部是中立地带，两国均可自由进入。协约还确定阿富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关于我国西藏，协约规定：英俄互相承认对方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同意维持西藏现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等等。英俄协约和英法协约一样，是背着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签订的，是地地道道的强盗分赃的协约。

1904年和1907年两个协约的签定，意味着英法俄三国联盟的成立。这样，两大军事集团终于最后形成了。

军备竞赛 十九世纪晚期，欧洲掀起一股扩军狂潮，其来势迅猛，竞争激烈。恩格斯曾在1893年这样写过：“整个欧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进行武装，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每一个大国都力求在军事威力和战争准备方面超过另一个大国。”

军备竞赛首先表现在军费增长上面。自1874年至1896年，欧洲大国的军费大约平均增长50%以上。其中，德国增长为79%；俄国为75%；英国为47%；法国为43%；奥匈为21%。到了二十世纪初，军费又持续上升。1900年至1913年间，英、法、俄和德、奥、意六大强国海军军费从三亿九千万美元增至七亿二千万美元。陆军军费由七亿四千五百万美元，增长至十一亿九千万美元。

俄、法、德、奥四国的陆军竞争非常激烈。俄国陆军1871年为七十六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为拥有一百零七个师，一百四十四万人。法国1871年常备军为四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拥有五十四师，七十六万七千人。德国1870年军队为三十一万人，到1914年，已拥有五十一个师，七十五万人。奥匈1912年，军队扩充到二十万人。

在大战爆发后，各国进行总动员，军队又迅速扩充。俄国共一百四十三个师，四百八十八万人；法国共九十三个师，三百五十八万人；德国共一百零七个师，三百八十二万人；奥匈共六十三个师，二百五十万人。

海军的竞争主要在英德两国间进行。英国素以举世无匹的海军称霸世界，在军备竞赛中，它按照“海军两强标准”原则，加紧扩充海军。德国觊觎英国的海外殖民地，企图从英国手中夺取海军优势，英德海军竞争非常激烈。1883年至1908年，德国海军军费从四千六百万法郎上升为四亿三千六

百万法郎，增加了九倍之多；而英国从二亿七千万法郎上升为八亿一千一百万法郎，也增加了三倍多。__1905年，英国开始制造一种巨型的新战列舰——无畏舰。德国知道这一消息后，就在1906年修改海军法案，对原计划修造的大军舰一律改造无畏舰。而英国则决定，德国每造一艘军舰，它就添造二艘。1908年，英国造出无畏舰十二艘，德国造好九艘，另有三艘在制造中。1914年大战爆发时，英国有大小军舰六百八十八艘，海军人员二十万零一千人；德国共三百九十一艘，七万九千人；俄国三百零六艘，五万零九百人；法国三百十五艘，五万零九百人；奥匈二百零二艘，一万八千人。德国虽然尚未赶上英国，但已一跃而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个海军强国。

海牙和平会议 两大军事集团各自加紧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活动，却又耍弄假和平的伎俩来掩盖它。1898年8月24日和1899年1月11日，沙皇政府连续二次向各国发出通知，倡导举行和平会议。并且大吹大擂说：“这次会议可能成为即将来临的世纪的美好预兆。”作出响应的两大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心怀鬼胎，各打算盘。

1899年5月18日至7月29日，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参加的有二十七个国家。与会各国代表清谈空论，假惺惺地大谈裁军，但是，却没有就裁军问题作出任何实质性决议，仅仅在一个公约中表示“希望限制陆海军军力及军事预算”。此外，会议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陆战法规等三项公约，以及禁止从汽球上投掷炸弹和爆炸物等三项宣言。还决定成立“常设仲裁法庭”。第一次海牙和会，就在这种空洞虚伪的喧嚣声中结束。会后，帝国主义各国加紧扩军，力求在未来大战中一决雌雄。

1907年6月15日至10月18日，又举行了第二次海牙会议，有五大洲的四十四个国家参加。会议承认，1899年以来，各国非但没有实行裁军，相反，“环球各国整饬武器，耗费之款，较诸当年，几乎无不增加倍蓰。”__但是，会议却把限制军备的问题丢到一边，而专门讨论制定陆、海战争的种种法规，通过了陆战和海战的法规达十项之多，充分说明这不是什么和平会，而是战争的预备会，是帝国主义战争即将来临的征兆。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后，国际气氛愈来愈紧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开完不久，老沙皇就和英王爱德华在勒佛尔（今爱沙尼亚的塔林）举行会谈，决定扩充俄国的海陆军以对付德国。1907年，俄国的军费为四亿九千三百万卢布。1908年陡增为六亿一千二百万卢布，1913年又增为九亿四千四百万卢布。__事实证明，“海牙和会”完全是一个骗局。它除了使日益成熟的冲突更加尖锐以外，并没有什么良好的结果。

第二节 巴尔干问题

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和“东方问题”早在十四到十六世纪，土耳其形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军事封建帝国——奥斯曼帝国。当资本主义开始在欧洲确立和发展的时候，奥斯曼帝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它竭力以扩大军事力量和推行侵略战争来拯救帝国的瓦解；但事与愿违，反而造成军事失利、国库空虚。土耳其素丹为了保持他风雨飘摇的腐朽统治，对农民不断增加地租和捐税，这严重地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业濒于破产。在素丹横征暴敛和外国商品竞争的打击下，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纷纷破产。安卡拉的三百家呢绒手工工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只剩下四家了。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又是一个“民族的监狱”。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以及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例如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官吏和地主大部分是土耳其人，大都信仰伊斯兰教，而被剥削阶级的农民是斯拉夫人，大都信仰基督教。十九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由于内忧外患，已处于气息奄奄即将崩溃的前夕。

伴随着帝国的日益衰败，欧洲列强相竞争夺这个“欧洲病夫”的遗产。由于奥斯曼帝国处于欧亚非之交的枢纽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例如谁将掌握黑海的门户——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谁就成为黑海的主人，并控制通往东方的重要道路，称霸于欧洲，列强对土耳其的争夺极其尖锐复杂，以致十八世纪末年以来“东方问题”成为国际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所谓东方问题：第一就是欧洲列强围绕瓜分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他们相互牵制不使某一方单独吞噬这块肥肉；第二就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各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由于列强的插手和干预，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坎坷的道路。这两方面的问题又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巴尔干问题久经纠缠，成为国际冲突的症结，巴尔干也就成了欧洲的“火药桶”。

巴尔干各族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 十九世纪以来，巴尔干半岛的各族人民仍然前赴后继，争取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取得独立。希腊人民经过独立战争得到了独立。塞尔维亚人民经过两次起义，在 1829 年取得了自治地位。罗马尼亚人民经过长期斗争，于 1859 年实现了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的真正联合，奠定了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基础。门的内哥罗早已独立，只是还没有取得国际上的承认。但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奥斯曼帝国仍统治着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包括保加利亚、东鲁米利亚，这两个地区的居民属保加利亚族；波斯尼亚、里塞哥维那，居民属塞尔维亚族；马其顿，居民属塞尔维亚族、保加利亚族、希腊族；阿尔巴尼亚，居民属阿尔巴尼亚族。保加利亚族和塞尔维亚族均属斯拉夫人血统。

七十年代，巴尔干各民族的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875 年 7 月爆发了黑塞哥维那反抗土耳其的起义，随后扩展到波斯尼亚。1875 年到 1876 年保加利亚人民两次起义。嗜杀成性的土耳其素丹，对起义者进行大规模的残杀。土耳其的武装仅在几天内，就屠杀了一万五千保加利亚人，毁掉七十九个村镇。巴尔干人民并没有被血腥的镇压所吓倒，不断起义，而且起义规模愈来愈大。门的内哥罗和塞尔维亚要求土耳其不要把军队派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它们的要求遭到拒绝，两国于 1876 年 6 月都对土耳其宣战。

一向都企图从“东方问题”浑水摸鱼的欧洲列强又插手了。俄国、英国、奥匈帝国都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危机，以各自持有的野心积极干预，趁火打劫，企图一箭双雕，达到它们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分赃的恶罪目的。

沙皇俄国为了实现它梦寐以求、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长期以来，一直觊觎土耳其。早在彼得一世时，为了控制黑海，1695和1696年，曾两次南下远征，占领了亚速夫，但并未夺得黑海的出海口。十八世纪以后沙俄频繁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攫取了黑海北岸直到多瑙河口的广大领土。十九世纪，“俄国熊认为病人已奄奄一息了，应当吃掉他。”沙皇为了骗得巴尔干人民的信任，把自己打扮成“解放者”，引诱巴尔干半岛斯拉夫人，陷入他的圈套。马克思说：“每当他看到土耳其政府似乎加强，或者看到一个更大的危险，即斯拉夫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谋求解放，从而威胁到他对土耳其的计划时，他就会侵入这个国家。”

英国是沙皇在巴尔干半岛的重要竞争者，力图阻止俄国成为黑海和地中海之间两个海峡的主人。特别从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从欧洲到印度的航程缩短了八千到一万公里。印度是“不列颠王冠上的宝珠”，因此这条路线被英国视作英帝国的生命线。英国不愿俄国海军出现在地中海，对这条航线造成威胁。英国还想使土耳其素丹成为它的傀儡，变土耳其为自己的殖民地。所以，英国政府要维持土耳其的“现状”，维持素丹的统治。

巴尔干的另一个主要竞争者是奥匈帝国，它力图占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奥匈帝国境内也有几百万斯拉夫人，因此它担心汹涌澎湃的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会成为奥匈帝国境内斯拉夫人效法的榜样。它一方面支持奥斯曼帝国，以便阻止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沙俄南下；另一方面又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欧洲领土。

俄土战争和柏林会议 沙皇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遭到失败。它一时削弱了，但是它决未放弃在巴尔干和中东的侵略政策。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以后，俄国就积极着手进行武装干涉。俄国为了使奥匈帝国在俄土战争中保持中立，1876年7月8日沙皇和奥皇在波希米亚的莱西斯塔特城堡会谈，并取得协议。一旦俄土战争爆发，奥匈帝国保持中立；作为奥匈保持中立的条件，俄国同意它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大部分地区。

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以后，俄国派出四千志愿军，其中包括许多军官到塞尔维亚。沙皇俄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加紧活动，于1877年4月24日向土耳其宣战。5月间宣布独立的罗马尼亚也对土耳其宣战。俄国投入十八万五千陆军，进攻土耳其，6月底渡过多瑙河。战争暴露了沙皇政府的低能，俄国的军事进展迟缓。1878年1月，俄军攻占亚德里亚堡，并继续向伊斯坦布尔推进，引起了英奥的惊惶。2月英国把军舰开入马尔马拉海，实行海军的部分动员。英国威胁说，俄军进入伊斯坦布尔，将与俄国断绝外交关系。奥匈也声明，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它就召回自己的大使。已经精疲力竭的沙俄，不敢冒与英奥冲突的危险。1878年3月3日在距离伊斯坦布尔十二公里的地方，俄土签订了圣斯特法诺和约。根据这个条约，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它的领土东达多瑙河，南抵爱琴海，东鲁米利亚和色雷斯均属于它；土耳其承认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完全独立，保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自治；土耳其对俄赔款，并割巴统等地给俄国；俄国此外还取得比萨拉比亚的西南部分，等等。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得到了巨大的扩张。这无疑影响到英国和奥匈的利益。因此，英奥对圣斯特法诺和约非常不满，

要求召开国际会议修改这个条约。德国也表示赞成。沙皇俄国看到自己完全陷于孤立的地位，被迫同意召开国际会议。

1878年6月13日修改圣斯特法诺和约的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参加的国家有俄、英、德、奥匈、意、土等国的代表。这次会议是欧洲列强瓜分土耳其领土和任意处置土耳其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命运的会议。英国、奥匈在德国的支持下，对圣斯特法诺和约作了较大的修改。7月13日签订了柏林条约。柏林条约把原来圣斯特法诺和约拟定的“大保加利亚”，分为三部分：一，建立臣属于土耳其素丹、享有自治的保加利亚公国。二，在巴尔干山脉以南成立一个取名为“东鲁米利亚”的半自治省，行政自治，但仍受土耳其政治和军事的直接管辖。三，马其顿依旧归土耳其素丹统治。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正式承认为独立的国家。沙皇俄国得到比萨拉比亚，并兼并了亚洲的巴统、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奥国取得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政管理权。英国占领了塞浦路斯。

柏林条约的实质就是部分地瓜分土耳其。柏林会议因此是欧洲列强的一次分赃会议。它远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巴尔干民族解放的任务。在巴尔干，仍有大量非土耳其人处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取得独立的巴尔干国家仍然是列强的角逐场所。它们的内政、外交都受到列强的干涉和影响。因此，在巴尔干，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又形成了新的矛盾。

巴尔干——战争的火药桶 柏林会议造成的巴尔干局势不可能是持久的。巴尔干各族人民相信，土耳其统治者被赶出巴尔干半岛为期也不会太远了。但是，巴尔干各国对外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各族人民的利益，而是列强图谋私利的干涉。巴尔干各国统治者之间也因利害不同而发生冲突。

二十世纪初，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的加剧，国际上不断出现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1905—1906年和1911年法德为侵占摩洛哥而产生的两次摩洛哥危机；1908年由于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产生的波斯尼亚危机；1911—1912年因意大利要占有利比亚而发生的意土战争；接着发生了两次巴尔干战争。

意土战争的开始，加速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早已进行的谈判。俄国的外交人员也介入了谈判。1912年3月13日签订了保塞同盟条约。协约国，首先是沙皇俄国，积极表示赞同和支持这个同盟。他们想把这个同盟作为反对德奥的工具，为日益逼近的世界大战做准备。巴尔干各国把这个同盟主要看作是从奥斯曼帝国夺回欧洲领土的一种手段。条约附件的第一条中规定，俄国的意见对缔约国双方是有强制性的。附件的第四条规定，本条约、秘密附件、军事协定某些条文的解释上、执行上所发生的一切争论，应提交俄国，作最后决定。条约确认了沙皇俄国是保塞同盟之间的仲裁者。保塞条约的内容通知了英法，英法两国都表示赞同。同年5月，保塞两国签订了军事协定，保加利亚又和希腊缔结了同盟条约。9月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缔结了共同对土作战的口头协定。列宁说：“尽管在巴尔干建立的是君主国的联盟，而不是共和国的联盟，尽管这个联盟的形成是由于战争，而不是由于革命，——尽管如此，在摧毁整个东欧的中世纪残余方面，还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巴尔干国家趁意土战争尚未结束的时机，1912年10月9日门的内哥罗首先对土耳其宣战。接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相继对土耳其宣战。这

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了。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开始后，同盟国获得一系列胜利，土军惨遭失败，迅速向掩护首都伊斯坦布尔的防线退却。土耳其几乎丧失了巴尔干的全部领土。10月底保加利亚的军队逼近伊斯坦布尔。1912年11月，土耳其政府被迫请求大国调停。

土耳其的请求马上得到俄奥等国的响应。帝国主义国家插手，助长了局势的复杂性。俄国担心保加利亚军队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将会引起国际干涉，使它朝思暮想的海峡问题更难解决。所以竭力阻止保加利亚继续进军，要求停战。奥匈也要求结束战争，以便阻止塞尔维亚的势力扩张到亚得里亚海。奥匈并以局部动员，陈兵塞尔维亚边境来威胁，要求塞尔维亚立即从阿尔巴尼亚撤军。奥匈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德国的支持。德国向奥匈表示，对它们之间的同盟义务信守不渝。俄国支持塞尔维亚的要求。同时，法国也保证它对俄国的支持。如果德国参战，法国一定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沙皇对战争尚无充分的准备，力求避免和同盟国集团发生军事冲突。俄国不得不作某些让步，劝告塞尔维亚不要占领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并将争论的问题提交各大国仲裁解决。德国对沙皇的退让，采取了进攻的态度。1912年12月2日德国宰相柏特曼公开声明，一旦奥匈受到“攻击”时，德国一定要履行同盟的义务。但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向德国表示，如果俄法与德奥双方发生战争，英国不会中立。德奥对面临的严重现实，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奥让步同意召开会议。1912年12月17日各大国的大使级和交战国两个会议，同时在伦敦举行。大使级会议起着决定作用。会上协约国支持巴尔干各国，德奥支持土耳其。

会议讨论了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和土耳其欧洲的边界与爱琴海诸岛屿的归属。当时，阿尔巴尼亚人民经过1911年到1912年的起义，已在1912年11月宣布独立。由于土耳其国内得到德国支持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政变。政变后的新内阁，拒绝接受战胜国提出要土耳其让出亚德里亚堡和爱琴海中诸岛屿的条件而破裂。1913年2月巴尔干同盟国又恢复了军事行动。土耳其很快又遭到了新的失败。1913年5月30日土耳其与巴尔干同盟国签订了伦敦和约。根据和约土耳其几乎丧失了全部欧洲的领土，仅保存了伊斯坦布尔及海峡北面的小块欧洲领土，其他欧洲部分的领土割让给巴尔干同盟国。关于阿尔巴尼亚和爱琴海诸岛的问题，留待列强解决。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结果，标志着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终于摆脱了土耳其的封建统治。但是，由于巴尔干各君主国政府的掠夺政策和站在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又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因土耳其的失败，奥匈和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它们原希望在与俄国交战时能够得到土耳其的帮助，而现在一旦同俄国交战，巴尔干同盟严重地威胁着奥匈的后方。因此，德奥两国极力挑拨离间，唆使巴尔干同盟之间相互火并，以达到瓦解同盟的目的。

塞尔维亚，因没有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要求从保加利亚所占领的马其顿领土中得到补偿，也就是要求修改保塞同盟条约。在瓜分马其顿的基础上，塞尔维亚和希腊于1913年6月1日签订了反对保加利亚的希塞同盟，罗马尼亚也参加了这个同盟。保加利亚方面，奥匈答应给予贷款，并保证它的领土完整。在德奥的煽动下，自恃强大的保加利亚，先发制人。1913年6月29日向塞希两国发起进攻，挑起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从双方来说，这次战

争都是非正义的王朝战争。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参加到塞希一边，对保加利亚作战。土耳其趁保加利亚孤军作战，四面楚歌的处境，也参加了反保战争。不久保加利亚被打败了。

奥匈帝国曾准备进攻塞尔维亚，来援助保加利亚。但德国考虑到发动一场世界大战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拒绝支持奥匈的军事行动。这样，保加利亚就完全被孤立了，别无他途，只好求和。1913年8月10日交战双方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根据和约，保加利亚被迫同意马其顿由塞尔维亚、希腊瓜分。保加利亚仅保留了马其顿的一小部分。南多布鲁甲归罗马尼亚。9月29日签订了保土和约，亚德里亚堡地区划归土耳其。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不但没有解决巴尔干半岛的矛盾，反而促使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在布加勒斯特和约的基础上，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希腊站到了协约国一方。而抱着复仇计划的保加利亚和德奥集团接近起来，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土耳其加入到同盟国一方。巴尔干战争推动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两地人民要求摆脱奥匈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这就必然引起奥塞之间的冲突。奥塞冲突又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所以，帝国主义在巴尔干半岛的争夺和巴尔干半岛各国之间的纠纷，使这个地区笼罩着浓厚的战争气息。巴尔干成了欧洲的“火药桶”。只要一有火星，火药桶就要爆炸的。

第二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大战的开始和 1914—1916 年的战争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矛盾的发展以及它们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终于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奥国皇储在萨拉热窝被刺，点燃了这次大战的导火线。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妇访问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并且准备到接连塞尔维亚的边境地区视察军事演习。斐迪南是奥国军人党首领，一向主张侵犯塞尔维亚。他这次访问的波斯尼亚，1908 年被奥国吞并，居民大都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认为，斐迪南的波斯尼亚之行是挑衅行为，引起了具有民族情绪的塞尔维亚青年的强烈愤慨。塞尔维亚秘密爱国军人组织“黑腕”积极活动起来，准备暗杀活动。6 月 28 日，斐迪南的车队驶过萨拉热窝狭窄街道的时候，“黑腕”成员青年学生加·普林西普开枪打死了斐迪南夫妇。

萨拉热窝的枪声引起了强烈反响，世界面临爆炸性的局势，其关键在于奥国决定借此事件作为摧毁塞尔维亚的口实，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塞尔维亚政府直接参与了刺杀事件的策划。奥国在行动之前要取得它的盟国德国的支持。德国政府认为要尽一切可能使它唯一可靠的盟国不致削弱，因此在 7 月初的波茨坦双方代表的谈判中，保证支持奥匈帝国采取的行动。7 月 23 日，奥匈帝国政府向塞尔维亚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正式谴责一切反奥宣传，查禁一切反奥的出版物和社团，开除学校的反奥教师，撤销曾经支持反奥宣传的任何官员。此外，奥国还无理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允许奥国官员帮助查禁反奥宣传，允许奥国法官参加审判萨拉热窝事件的被告。这些要求统限于四十八小时之内答复。7 月 25 日，塞尔维亚政府把复文交给奥国使节，答复很温和，语气很和解，除最后两点严重损害塞尔维亚主权的要求以外，其余要求都接受了。而且塞尔维亚还表示，愿意把争端提交国际法庭解决。奥国借口塞尔维亚没有满足它的要求，于 28 日悍然对塞尔维亚宣战。

塞尔维亚当时是个小国，但是沙皇俄国站在它的背后。俄国在巴尔干一向怀有扩张野心。它看到，如果听任奥国压服塞尔维亚，它在巴尔干的地位就会削弱，而这是它决不能接受的。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以后，俄国政府发布了军事动员令，俄国的盟国法国保证全力以赴支持俄国。7 月 31 日，德国政府向俄、法两国同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停止动员，要求法国在未来冲突中保持中立。它的要求遭到拒绝，德国分别于 8 月 1 日、3 日，先后对俄、法宣战。

在一个多月的过程中，英国政府表面上致力于调和冲突，想使冲突各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实际上是在窥测时机，寻求人民可以接受的参战借口。8 月 2 日，德国政府无理要求比利时政府假道，让德军过境进攻法国。这就破坏了比利时永久中立的国际地位，而这是 1839 年得到列强保证的。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同时呼吁英、法、俄诸国保护它的中立地位。英国要求德国尊重比利时的中立，遭到拒绝，它就在 8 月 4 日对德宣战了。交战双方阵营分明，一方为同盟国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另一方为协约国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就这样开始了。

三国同盟的另一成员国意大利望风转舵，待价而沽。战争开始的时候，

它借口德奥进行的不是防御性的战争，拒绝承担条约义务，在一段时间内宣布中立。1915年4月，英、法、俄在伦敦同意大利签订秘密条约，保证战后议和时满足意大利的许多领土要求。5月间，意大利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

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土耳其加入同盟国方面作战，战争越出了欧洲范围。1915年和1916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分别参加到同盟国一方和协约国一方。后来还有许多国家权衡利害关系，相继参加协约国一方。

就交战国家说，双方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打算借战争达到自己的掠夺目的：夺取新领土，扩大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举例说，德国作战为的是夺取英、法的殖民地，并吞法国的铁矿区，攫取东欧的粮食、原料产地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的属地。英、法、俄、意先后缔结协定，规定它们要怎样分割奥匈和土耳其的领地。日本参战，目的在于夺取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属地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诸群岛；攫取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进一步侵略中国。从战争目的上看，这次大战对交战双方的大国说，都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对塞尔维亚等一些国家说，它们作战具有民族解放或反抗侵略的意义，但是这改变不了这次大战的整个性质。

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德国的战略计划 交战双方的帝国主义集团对于战争准备已久，战争一爆发，双方都集中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在进行最初的大战役以前，协约国动员了六百一十多万军队，同盟国动员了三百五十多万军队，双方拥有的大炮都在一万三千门以上。厮杀不仅会是血腥的，而且会是空前规模的。

在力量对比上，交战双方各有自己的有利条件。就同盟国集团说，德国久有作战准备，军队组织好，装备优良，指挥系统也好。同盟国还在战略地位上占优势，参战诸国地理上连成一片，处于内线作战地位，调动兵力比较方便灵活。协约国集团在人力上占优势；工业力量较强；海军力量占绝对优势，战争开始时拥有二十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形势艘主力舰，比同盟国多六艘，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更具优势。因此，协约国不仅能控制海洋，便于取得粮食和作战物资的补给，而且有力量封锁对方，使它们困乏。

从战略上讲，德国处于两线作战的地位，这对它是极为不利的。俾斯麦任德意志帝国首相的时候，力图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也就是避免腹背受敌。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法俄结盟以后，德国在东西两方都面对强敌，一旦发生战争，它既得在东线对俄作战，又得在西线对法作战。要想取胜，只能靠军事行动迅速，在俄国充分动员起来发挥力量以前，集中力量击败法国，回头对付俄国。就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德国总参谋部拟订了作战计划，那就是早在1905年由德国参谋总长史里芬制订的“史里芬计划”。

“史里芬计划”规定，德国在两线作战，设想在极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战争一开始，德军用七十八个师攻击法国，用九个师对付俄国。进攻法国的军队，左翼八个师，固守法、德之间设防巩固的国界；右翼七十个师组成一支包抄作战的庞大部队，侵入比利时，越过未设防的法国北部，沿着海岸推进，强渡塞纳河，从西面然后从南面越过巴黎，把法国主力部队压缩到巴黎以东地区加以歼灭。迫使法国投降以后，德军主力东进，会同奥军，闪击俄军，战而胜之。计划预定战争将在三、四个月里以德奥取得全线胜利而结束。这个计划建立在这样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即比利时无力抵抗，法军不堪一击，俄军动员迟缓，英国不会立即参战。集中庞大兵力，迅速从右翼战胜法

军是计划的关键。因此史里芬在临死前再三叮嘱：“切莫削弱我的右纵队。”

1914—1916年的战争进程 战争一开始，欧洲形成了几条战线。比利时、法国北部和德法边境构成了西线，那里主要是英法军队对抗德国军队。从波罗的海南岸直到罗马尼亚构成东线，那里是俄国军队对抗德奥军队。沿多瑙河和萨瓦河组成巴尔干战线，那里是奥匈军队对抗塞尔维亚军队。此外，在亚洲的南高加索，有俄土军队交战。在两河流域和巴勒斯坦，有英土军队交战。欧洲的西线和东线对这次战争起了决定作用，西线尤其是关键。

1914年8月4日，德国军队侵入比利时，一开始就在比利时的边境要塞列日遭到顽强的抵抗。比利时人对德军的抵抗，出乎德国的意料，而且起了阻滞德军挺进的作用。英法联军初败于比利时境内。8月下旬，毛奇将军——总指挥下的德军深入法国北部，向巴黎推进。9月3日夜间，法国政府从巴黎撤往波尔多。当时，法军总司令霞飞已在马恩河和塞纳河之间重新配备了力量，其中包括英军。9月5日，英法军队转入反攻，展开了“马恩河战役”。参加这一战役的双方军队计有一百五十万多人。9月9日，德军被迫撤过马恩河，向安讷河一线退却。第二天，法军总司令霞飞的战报向世界公告：“马恩河之战以确定无疑的胜利而结束”。以后几个月，德军和英法军队都力图控制法比边境地区，德军特别想占领从敦刻尔克到布伦的滨海地带，以切断英法来往的捷径，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到年底，西线呈胶着状态。双方的战线上都构筑了深壕固垒，在战史上出现了借助于工事的阵地战。“史里芬计划”打算速战速决，但是由于主观设想破产，加上毛奇被迫抽调兵力，增援东线，计划破产了。战争显然要拖下去，而德国的资源是不足以应付持久战的。

在东线，8月中下旬之交，两路俄军先后越过俄国边境进入东普鲁士。德国不得不从西线抽调一些军队去对付俄军的进攻。8月底到9月中，兴登堡指挥的德国军队，利用两路俄军没有密切配合作战的弱点，先在马祖尔湖地区歼灭了—路俄军，这就是著名的坦能堡战役。然后德军进攻另一路俄军，迫使他们败退。德军进入俄境。在这同时，俄军挫败奥国军队，深入奥国东北地区。到年底，东线沉寂了，交战双方的军队也在阵地里对峙着。

1915年，德国打算占领俄国的大片领土，迫使它退出战争。德国想控制巴尔干，打开直接通往土耳其的道路。根据这种战略目的，德军在东线发动了强大的进攻，占领了俄国的大片领土，把战线推到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线，但是没有达到迫使俄国同它议和的目的。

这一年，英、法、俄把意大利拉入协约国集团，意奥边境上又形成了一条战线。在那里，意军同奥匈军队作战，没有进展。同年10月，在巴尔干战线，在德、奥、保三国军队的夹击下，塞尔维亚的军队溃败了。许多塞尔维亚军队假道阿尔巴尼亚，退到亚得里亚海的科孚岛重新编制起来。

对空射击

德国5.9吋口径榴弹炮德军在东线的进攻没有达到消灭俄国战斗力量的目的，1916年它在西线以法国凡尔登要塞为目标，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凡尔登在法国的东北边境，是巴黎的前卫，又是法军整个战线的支撑点。1916年2月下旬，德军以强大的火力，猛击凡尔登。他们预计2月底德皇能在凡尔登的广场上阅兵。但是凡尔登的攻守战一月一月地拖下去。为了牵制西线德军的进攻，俄军在东线发动了攻势。7月初，英法军队又在法国北部索姆河

发动了一次大战役。在那里，英军首次使用坦克。凡尔登和索姆河的会战，都持续到年底。在这两个战役中，伤亡近两百万人，结果双方都没有突破对方的阵地。

凡尔登和索姆河的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德、奥、保三国军队联合进攻罗马尼亚。12月，罗马尼亚的首都陷落。

战争的前两年，交战双方都把海军的主力舰队留在基地：英国海军大多集中在不列颠的北部港口，主要是在斯卡帕湾；法国海军大多集中在地中海港口；德国海军集中在赫尔戈兰、基尔港和威廉港。它们都不敢冒险开出主力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只有双方的分遣小舰队在大洋上和北海水域有过小的战斗。协约国以它们的海军优势力量加紧封锁对方。德国看到潜艇在海战中的巨大作用，1915年2月开始用“无情”潜艇战对付协约国，以破坏协约国特别是英国的物资和粮食运输。由于海上封锁，德国处境日益恶化。1916年，德国指挥部为了突破封锁，决定海军出击，这就在北海发生了这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海战——日德兰海战。这次海战于5月31日到6月1日在丹麦以西的海上进行。英国舰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取得了这次战役的胜利。德国海军上将提尔匹茨讲到日德兰海战的后果时写道：“仍然保持中立的国家已对我们的最后的胜利丧失了信心。”此后，德国主力舰队就停在军港里，不敢到海上去进行较大的海战了。

第二节 政治危机和大战结束

交战国家的政治危机 到 1916 年冬，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两年多，但是还看不到胜负终将属谁，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交战各国深感物资和人力消耗过甚，在不同程度上感到难以支持。广大劳动人民困苦不堪，对帝国主义战争日益愤慨不满。交战国的统治阶级都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当时，协约国各国在前线和后方的军队人数约为二千五百万人，同盟国各国约为一千五百万人。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的伤亡很大，到 1916 年底，阵亡约六百万人，伤残约一千万人。大量精壮人员直接参战而外，还有许多要在后方从事军事工业生产或为战争服务。这就造成了人力的紧张，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普遍感到劳力不足。例如法国，战前有五百六十多万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农业生产，这时只有三百万人，而且是妇女、老人、儿童和残废人。交战各国都有大量耕地荒芜，农畜产品普遍下降。粮食、饲料、燃料都感不足，同盟国家尤其严重。由于粮食产量剧减，粮价高涨，例如法国的小麦价格，每一公担（二百公斤）1914 年值二十四法郎，1917 年国家定价为七十五法郎。1916 年底，交战各国都实行了凭证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制度，面包、燃料、肉、糖、衣、鞋、饮料定量供应。劳动人民生活日益恶化，有产者的生活却不受凭证供应的影响。德、奥的劳动人民特别困苦。1916 年到 1917 年的那个冬天，这两国的城市居民几乎只能靠有限的蔓菁维生。

战争对于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结果。垄断资本家迫使劳动人民在前线流血，在后方受饥寒之苦，自己却从战争中赚得了巨额利润。举例说，德国军火大王克虏伯的公司 1913 年的利润是三千三百多万马克，1914 年就增加到八千六百多万马克。英国“白星轮船公司”的总收入，1914 年为八十八万八千英镑，1916 年增加到二百四十余万英镑。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大多数交战国里都在酝酿着革命，统治阶级忧心忡忡。1916 年 11 月 6 日，法国总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巴黎居民中，在议会里，到处都显出惊惶不安的情绪。……11 月，巴黎电车工人开始罢工。我每天都要碰到类似的焦虑，空气里弥漫着可疑的气氛。”

俄国沙皇政府遭遇的危机特别严重。在前线，军需品十分缺乏，甚至士兵的步枪也不足。在后方，由于燃料不足，工厂减少了生产。1916 年有三十多座高炉熄火。铁路车辆不足，不能应付需要，成亿普特的粮食堆在车站上霉烂，运不到急需粮食的地方。1917 年初，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运动在俄国首都彼得格勒发生，接着扩展到莫斯科、巴库和其他一些大城市。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号召下，彼得格勒的工人运动发展成了反对沙皇统治的政治总示威。沙皇统治濒于崩溃边缘。

强化战争机器，施放“和平”烟幕 在 1916 年的作战中，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的优势。两个敌对集团都面临政治危机，都意识到尽快结束战争的必要性，因为战争的延长会给帝国主义带来更大的危机。因此，交战双方的主要国家一方面强化战争机器，另一方面试探“和平”。

在德国，1916 年 8 月下旬，参谋总长法金汉免职，由兴登堡继任。法金汉不相信德帝国主义会获得最后胜利。兴登堡和他的副手鲁登道夫都是军国主义的极端代表。他们总掌兵权意味着德国更加坚决想取得最后胜利。不久，“德奥最高军事司令部”组成。实际上，同盟各国的军事领导权力都掌握在德国手里了。

1916年12月，罗马尼亚首都陷落以后不久，法军总司令霞飞去职，由尼维尔继任。法国统治阶级期望尼维尔能在战场上获得更多的战果。在这同时，英国政治舞台发生变动，劳合·乔治出任“战时内阁”首相，这意味坚决作战的集团胜过犹豫不决的集团。早在那年9月，劳合·乔治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时就说：“英国曾用二十年的时间战胜拿破仑，而且最初十五年是英国失败的不幸年份。要在这次战争中赢得胜利并不需要二十年，但是需要多久，战争就会进行多久。”

同盟国集团首先发动“和平”攻势。12月12日，德国政府代表同盟国集团，呼吁美国转告协约国各国政府，表示愿意举行和平谈判。德国主张和谈，却不打算放弃已经吞并和占领的任何领土，因此矢口不提关于比利时、塞尔维亚以及俄、法被占地区的前途问题。德国倡议举行和谈还另有打算，就是企图分化协约国集团，只要能同其中任何一国单独媾和，就可保证德国战胜其余国家。12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以维护和平的姿态提出建议，要求交战国家宣布它们的和平条件，并作出安排以保证世界不再发生战争。随后瑞士、瑞典和挪威政府相继提出类似建议，或表示支持威尔逊的建议。

12月26日，同盟国集团以赞赏的姿态回答威尔逊的建议，但是重申它们的意见，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召开会议，交换意见。12月30日，协约国集团拒绝了德国的倡议。1917年1月10日，它们在给威尔逊的照会中，具体提出了它们的“和平”条件：恢复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从法国、俄国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上撤退，并作公平的赔偿；在民族原则的基础上重建欧洲；从外国统治下解放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让土耳其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获得自由，等等。

交战双方各有打算，“和平”攻势只是烟幕。烟幕迅速消散了，局面还是战争。

俄国二月革命和美国参战 大战爆发，第二国际破产。在国际上，列宁和他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问题上坚持正确的路线，始终如一地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为推翻沙皇的统治、为俄国的社会主义而斗争。列宁还团结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他们引导本国人民用革命的行动，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

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1917年初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示威运动和政治总罢工，终于导致了二月革命。

1917年3月10日（俄历2月25日），布尔什维克党彼得格勒委员会发出传单，号召起义，打倒沙皇专制政权。第一天，彼得格勒的工人起义。沙皇尼古拉二世赶忙从前线调回军队，军队也参加了起义者的行列。3月12日（俄历2月27日）彼得格勒起义胜利了。当天晚间，起义者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这是反对沙皇政权的工农联盟机关，也是工农专政机关。彼得格勒起义的消息传出，全俄各地都发生了革命，沙皇的专制统治崩溃了。

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了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的正确性，又显示了它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美国“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样做到不偏不倚”。美国开头采取了名义上的“中立”，主要原因有这几点：第一，美国统治集团要利用“中立”同交战国家做生意，以便获得暴利，同时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的时机，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第二，等到交战双方精疲力尽的时候再参战，用最小的代价实现自己

的扩张计划，称霸世界。第三，美国工人、农民甚至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都反对这次战争。正如威尔逊的亲密助手豪斯所说的：“我国人民有百分之九十是不愿总统把我们牵连在大战之内的。”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需要一定的时间。

美帝国主义利用“中立”地位同交战各国做生意，供给它们军用物资和粮食，大大扩大了自己的生产能力。美国工农业的生产总值急剧增长起来，从1914年的二百四十三亿美元，增加到1916年的六百四十五亿美元。欧洲各国为了购买美国货物，把自己的有价证券卖给美国，或是以黄金交换，或是向美国借款。美国本是债务国，现在一变而为债权国了。美国大资本家赚得了惊人的利润。据美国国会的统计材料，在阿巴拉契亚矿山中的三百多家煤业公司，有一百家获利高达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五百、甚至有少数高达百分之一千以上的。

美帝国主义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它的利益日益同英、法、俄联在一起。它输出的物资主要是运往这些国家，其总值从1914年的八亿多美元，增加到1916年的三十二亿多美元。同期内，对德奥的输出却急剧下降。到美国参战的时候，它贷给协约国的债款达二十三亿美元，贷给德国的仅二千多万美元。

1916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威尔逊再次当选。美国统治集团看到参战的时机成熟了，威尔逊为美国参战积极准备，宣传机器狂热叫嚷对德作战。德国统帅部看到单靠陆军不可能取胜，1917年初再次实行无限制的潜水艇战争。它在英国本土四周和地中海上加紧用潜艇攻击对方船舰，连中立国船只也包括在攻击范围以内，企图借此困死靠海外粮食过活的英国。美国统治集团找到了参战的借口。那时候，由于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美国又担心协约国的作战能力会因此削弱而损害自己的利益。1917年4月6日，它借口维护公海自由，特别借口德国潜艇攻击了美国商船，对德宣战。同年12月，它又对奥匈帝国宣战。为了实现它称霸世界的野心，美帝国主义终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中国、希腊、巴西、古巴、利比里亚、暹罗（泰国）和其他一些中南美国家也站到协约国集团方面参战了。

美国参战壮大了协约国集团的声势，但是这对战场上的意义一时还显不出来。就在美国对德宣战后十天，在欧洲西线战场，法军总司令尼维尔在兰斯和苏瓦松之间发动了强大的进攻。由于德军早有准备，这次进攻一开始就遭到挫折。战斗若断若续地继续到5月初，法国付出伤亡十余万人的代价却一无所得。7月初，俄军在东线出击，进攻开始于里沃夫一线，最初得手，俘获奥匈军队数万人。当德军增援部队到达以后，形势逆转，在某些地区，德军推进了一百三十公里。9、10月间，德军占据里加，控制了里加湾。在意大利战线上，10月间，意军败于卡波里多，德奥军队向前推进，迫进皮亚韦河，威胁威尼斯。直到英、法增援军队赶到，形势才稳定下来。卡波里多的败北震惊了协约国。它们决定在巴黎凡尔赛举行协约国最高军事会议，这是协约国走向军事统一的第一步。

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俄国人民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窃取了政权，组织了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人和农民把革命进行到底，在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通过武装起义，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

苏维埃政权。

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向交战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进行正义的民主的和平谈判，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协约国拒绝了 this 建议，苏维埃共和国只好同德奥谈判。虽然德国提出了苛刻的掠夺性的条款，苏维埃共和国还是在1918年3月3日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

俄国人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摧毁资产阶级政权，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在各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交战各国的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德奥的许多工商业中心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停泊在卡泰罗的四十艘奥国军舰上的水兵举行了起义。这些罢工和起义都要求停止帝国主义战争。

革命形势在高涨，交战各国的统治阶级除了实行镇压，也企图尽早击败对方结束战争。法国统治阶级为了准备更有力的进行战争和在国内进行镇压，改组了政府。1917年11月16日，克里蒙梭出任内阁总理。他对法国议会说：“我的对内政策是战争，我的对外政策是战争，我要到处进行战争。”1918年4月中，协约国统一了军事指挥，法国的福煦将军出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英国远征军司令海格，美军司令潘兴都受他的指挥。

1918年3月到7月，德国孤注一掷，在西线投入了二百个左右的步兵师，一万六千门大炮和三千架飞机，发动了四次进攻。到7月中，它的进攻力量枯竭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已转到协约国手里。8月8日，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福煦将军下令进攻，西线展开了决战。意奥边境、巴尔干和土耳其领土上的战争也临近结束时刻。同盟国已经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那时候，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一触即发。10月下旬，奥匈帝国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宣布独立，前线的军队拒绝继续作战。10月和11月初，德国基尔军港的水兵举行起义。到11月4日水兵起义遍及整个德国舰队，许多地区产生了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了政权。11月9日，柏林军队也转到起义的工人阶级方面来。第二天，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在这以前，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国已经同协约国签订了投降协定。第一次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结束了。

这次战争经历了四年多的时间，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一小撮垄断资本家的利益，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战中死亡的人数约一千万人，受伤的达二千多万人。所有参战国家的直接战费和战争造成的损失达三千四百多亿美元。这次战争产生的一大后果，是俄国工人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附表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大约数）

a. 主要参战国家的伤亡和战俘人数

国家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被俘人数
英国	947 , 000	2 , 122 , 000	192 , 000
法国	1 , 385 , 000	3 , 044 , 000	446 , 000
俄国	1 , 700 , 000	4 , 950 , 000	2 , 500 , 000
意大利	460 , 000	947 , 000	530 , 000
美国	115 , 000	206 , 000	4 , 500
德国	1 , 808 , 000	4 , 247 , 000	618 , 000
奥匈帝国	1 , 200 , 000	3 , 620 , 000	2 , 200 , 000
土耳其	325 , 000	400 , 000	——

b. 战争费用

1. 直接费用：180 , 500 , 000 , 000 美元

2. 间接费用：151 , 612 , 500 , 000 美元

附表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家和宣战日期

同盟国阵营		协约国阵营	
国家	宣战日期	国家	宣战日期
德国	1914 , 8 , 1 — 对俄 8 , 3 —对法 8 , 4 —对比利时 1916,3,9 —对葡萄牙 8 , 28 —对罗马尼亚	法国	1914 , 8 , 12—对 奥匈 11 , 5 —对土耳其 1915 , 10 , 16 — 对保加利亚
		俄国	1914 , 11 , 4—对 土耳其 1915 , 10 , 9—对 保加利亚
土耳其	1914 , 10 , 29 —宣布站在同盟方面作战 1916 , 8 , 30— 对罗马尼亚	葡萄牙	1914 , 11 , 23 — 对德
		意大利	1915 , 5 , 23—对 奥匈 8 , 21 —对土耳其
保加利亚	1915 , 10 , 14 —对塞尔维亚 1916 , 9 , 1 — 对罗马尼亚		10 , 19 —对保加利亚 1916 , 8 , 28—对 德
		门的内哥罗	1914 , 8 , 5—对 奥匈 8 , 8—对德 1915 , 10 , 15 — 对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1914 , 8 , 6—对 德 11 , 4 —对土耳其
		罗马尼亚	1916 , 8 , 27—对 奥匈
		日本	1914 , 8 , 23—对 德 8 , 25 —对奥匈
		圣马力诺	1915 , 6 , 3—对 奥匈
		汉志	1916 , 10 , 29— 对土
		美国	1917 , 4 , 6—对 德 12 , 7 —对奥匈
		巴拿马	1917 , 4 , 7—对德 12 , 10 —对奥匈

第二十三章 近代欧洲的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

第一节 自然科学

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起，在欧洲，伴随着政治、宗教和学术斗争的过程，有一场科学革命。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在政治诸方面的胜利，近代实验科学破土而出。越来越多的学者面对客观世界，用科学的方法观察世界。他们进行实验，寻求真理，寻求自然规律。他们通过毁灭性的批判和建设性的综合，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他们披荆斩棘，历尽艰险，取得了和保证了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的永久地位。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需要科学和技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欧洲的自然科学冲决了基督教神学的桎梏，飞快地发展起来。继哥白尼、布鲁诺、刻卜勒和伽利略开创、证实和巩固太阳系新学说之后，科学界巨人不断出现，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十七世纪的成就 近代自然科学成长的根基在于新的科学方法的发展，也有赖于新的科学工具和新技术的发展。新的科学方法要求人们通过系统的逻辑的方法寻求真理，要求人们在查究事实的时候，信赖推理、求知欲和正常的怀疑。这种新的科学方法是在十七世纪上半期由英国的法兰西斯·培根（1561—1621年）和法国的笛卡尔（1596—1650年）奠定的。

法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都注意方法，不过他们对科学方法的观念很不相同。培根的观念是蒐集材料，进行大规模实验，从大量数据中探求结果，本质上是归纳法。笛卡尔相信单刀直入的纯粹直观。他主张，只要思想清晰，就应该可能发现一切凭理性可以认识的东西，参用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推理的辅助。培根是实验的信徒，但他不是实验家。他是自然科学的热心倡导者和组织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摇响铃声来把有才能的人召唤到一起。”笛卡尔是演绎法的护卫者。他善于使用这种方法，用严格的定量和几何的方式来论证物质世界的基础。

数学是科学的语言。许多科学要进行计算，积累数据；许多科学原理要用数学归纳或概括为方程。十六、七世纪，数学家的研究同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的研究齐头并进，数学有了很大的进步，适应了科学研究的需要。1585年，法兰德斯人西蒙·史蒂文（1548—1620年）始用十进位制，为计算提供了很大的方便。1614年，苏格兰人约翰·内庇创立了对数表。对数表的出现，大大缩短了乘除和开方的运算过程，节约了时间，因此人们说内庇的发明倍增了他的数学同行的寿命。笛卡尔打破了几何学和代数学的旧区别，把它们结合为统一的学科，即创立了解析几何学。解析几何运用坐标，把空间关系转变为代数方程式，例如一条曲线就可以由一个方程式完全表示出来，这个方程式把曲线上各点按几条固定轴定出的坐标值的关系表达出来。十七世纪数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发明了微积分。笛卡尔研究过积分问题，但是确立微分学和积分学的则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和英国科学家牛顿（1642—1727年）。他们分别地、独立地进行了微积分的研究，殊途同归，确立了微分学和积分学。现在国际上通用的微分和积分的符号，就是莱布尼茨发明的。微积分是计算变量和变率的特殊数学方法。由变量计算变率的，称为微分；由变率计算变量的，称为积分。微分和积分，是一对逆运算，就象加法和减法、乘法和除法互为逆运算一样。有了微积分，科学家就能从数

量上思考这样的问题，如热力的运动、星球的移动；就能迅速地计算圆形空间的容量和各种压力。牛顿自己就是使用微积分得出和证明万有引力定律的。

科学研究不仅需要数学运算，而且由于着重实验，需要仪器设备。十七世纪，许多精确的衡量和观测仪器相继发明出来。促进了研究，特别使研究工作更为严密、更加精确了。1608年，荷兰出现了望远镜。最初的望远镜是折射望远镜，在一根管子里安装透镜而成。第二年，伽利略装制的就是这种望远镜。望远镜的出现为进行远距的观测提供了工具，但更重要的是，从此引起了人们对光学的兴趣。由于人们企图了解望远镜所依据的光的折射的性质，并要改进望远镜本身存在的缺点，光学得以成长起来。1650年以后，由于显微镜的使用，昆虫、植物各部分、水生小动物甚至细菌，都经过显微镜观察，提供了新知识。用显微镜观察动物的肺和躯体的其他组织，可以得到有关它们的结构和功能的至关重要的知识。英国医生哈维（1578—1657年）的血液循环论，也经由显微镜得以证实。1643年，伽利略的学生托里析利（1608—1647年）发明了水银气压计，为测量大气的压力提供了手段。1654年，德国物理学家奥托·冯·葛利克（1602—1686年）用他制出的抽气机，当着王公贵族的面作了著名的实验表演。抽气机把两个合在一起的金属半球内的空气抽尽。真空的金属球体受到外面大气的压力，需要在两侧用十六匹马，才能把两个半球形的容器拉开。气压计、抽气机的发明和真空的出现导致了气体力学的发展，使物理学迈进了一大步。当时，还有其它许多重要发明，例如1656年荷兰的大科学家惠更斯（1629—1695年）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架带摆的钟，使科学家们能精确的计算时间。

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里程碑——牛顿的贡献 从哥白尼以后，许多科学家研究天体，研究行星的运行。他们打破旧观念，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但是，还需要有人来综合那些见解，反映出自然界确有某些基本的和不变的规律，导致天体的运行。这一任务终于由牛顿完成了。

依萨克·牛顿出生在英国东南部林肯郡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生前三个月丧父，两岁时母亲改嫁。牛顿在外祖母的抚养下生活成长，读小学时，成绩一般，但是爱好观察周围事物，喜欢手工，酷爱装置简单的机械。到了中学，牛顿逐渐认识到学好功课的重要性，特别认识到学好数学对于装置机械的好处，学习大有长进，终于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十九岁时，牛顿由于中学校长的推荐和资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那里，他潜心研究数学、光学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在那里，他得到博学的、主持数学讲座的巴罗教授的赏识。牛顿在剑桥大学毕业，又在那里工作到1696年。1669年，二十七岁的牛顿经巴罗教授的推荐，接替巴罗主持数学讲座。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是牛顿在科学研究上最有成就的年代，除了数学上的成就，还有光学上的成就和力学上的著名定律。

在光学方面，牛顿在前人实验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实验。他让阳光透过三棱镜映出虹一样的颜色，呈现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带，再把一个三棱镜放在这彩色光谱里，虹的色彩立即还原为一道白光。经过反复实验，牛顿终于认识到，太阳光透过三棱镜形成彩虹，由于它本身就是由折射率不同的各种彩色光线组成的。太阳光透过蒙蒙雨雾，产生彩虹，也是同样的道理。牛顿的这一实验和结论，为光谱学的创立开辟了道路。为了便于观测天象，牛顿还造出了第一台反射望远镜。

牛顿最大的科学成就在天体力学方面。早从 1665 年起，他很可能已经考虑引力问题了，传说他看到苹果落地引起思考的故事也许是真的。当时，牛顿经常思考这些问题：什么使行星绕太阳运行？为什么它们不离开太阳或同太阳撞击？为什么苹果落地而不是飞入天空？用同一自然规律来解释行星运动和苹果落地是不是可能？等等。经过研究，牛顿证明，行星绕太阳运行和苹果落地而不是上升，理由完全相同，它们都同受引力作用的支配。牛顿表明，整个宇宙象一架机器。机器的所有部分——太阳、月亮、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服从万有引力定律。

牛顿用数学方法把物理原则转变为可凭观察证实的、可用数量来计算的结果，确立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定律说明，任何两个物体之间，包括行星与太阳之间，行星与行星之间、地球与月亮之间、地球与地上物体之间，都有引力存在。这个引力与彼此吸引的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而与两物体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结合牛顿运动定律，这一原理说明了太阳系中天体的运动和位置，特别说明了地球有规则地环绕太阳的运行。万有引力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物体会落地，什么力量把行星保持在它们的轨道上，为什么海水会产生潮汐。总之，这个定律不仅对地球是确切的，而且对太阳系的任何星体都是确切的。可以说，万有引力定律总结了前此一个半世纪的科学发明并且用精确的数学术语把它们连结起来了。此外，牛顿还确立了著名的运动三定律，即惯性定律，比例定律（即加速度与力成正比），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定律。运动三定律可以解释人们日常见到的许多事情，是经典物理学的基础。

牛顿的上述成就概括在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这本书出版于 1687 年，标志着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化学的成就 化学是关于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变化的科学，长期受中世纪炼金术士的影响，直到十七世纪中期以前还未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中世纪炼金术士沿袭古代说法，认为所有物质不外是由四大元素构成的，这四大元素就是土、火、水、气。此外还有人认为，所有的可燃物都含有一种燃素。燃素使燃烧成为可能并且在燃烧中消失。

第一个把科学方法运用于化学的是罗伯特·波义耳（1627—1691 年），他力主把归纳方法运用于化学上。波义耳在他的著作《怀疑的哲学家》一书中，批判炼金术士，攻击四大元素论。他企图创立各部分互相协调的严整化学观念体系，特别注意研究化学元素问题。波义耳证明空气不是一种基本元素，因为它是几种气体的混合物。他认为化学元素是用化学方法不能再分解为更简单的物质的物质。他把当时习用的定性试验归纳为一个系统，开始了分析化学的研究。在气体性质方面，他发现了气体体积与压力的关系，即通常称作的“波义耳定律”。波义耳以其对化学的贡献而被认为是近代化学的创始人。

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气体化学得到迅速的发展。有人发现了二氧化碳，有人发现了氢，有人发现了氯。约瑟夫·普利斯特列（1733—1804 年）发现了氨，这种气体对于冷却过程起着重要作用；1774 年，他发现了后来定名为氧的气体。普利斯特列证明，植物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后来别人补充了这个发现，指出植物的呼吸作用是在阳光的影响下进行的。普利斯特列最后的一个重要实验是制造一氧化碳。许多用于烹饪和取暖气体的生产方法最初是普利斯特列设计的。

随着精密仪器日益广泛地用于化学上的量的测定，由于氧的发现，

安·罗·拉瓦锡(1743—1794年)才有可能彻底证明燃素说的无稽,揭示了燃烧和氧化过程的真相。燃素说的支持者认为,燃素在燃烧过程中排除出去。拉瓦锡在他的实验中使用化学天平证明,燃烧没有什么东西放出,正相反,倒是有东西增加进去。1777年,拉瓦锡在他的《概述燃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1)可燃体在燃烧时并不丧失它的任何组成部分,相反地大气中的氧与它化合增加了它们的重量;(2)没有氧,燃烧是不可能发生的;(3)二氧化碳乃是氧与碳的化合物;(4)金属的鳞皮不是一种简单的物质,而是氧与金属的化合物。燃素说的成立在整个化学中引起了彻底的革命。对于燃烧如此重要的“氧”是普里斯特利发现的,却是由拉瓦锡定名的。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成立了由拉瓦锡等组成的委员会,任务是制定化学的新术语。法国科学家们拟定了化合物的第一个合理命名法。这个命名法中最先使用了“氧”、“氢”这些名称。这种命名法以元素的名称为起点。各种化合物的名称则由元素名称结合构成。这种命名原则简明准确,能反映所指物质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十九世纪,科学的化学由于物质的原子——分子结构学说的确立而得到长足的进展。英国科学家约翰·道尔顿(1766—1844年)对于物质的原子学说的确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道尔顿像古代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一样,相信所有的物质都是由不可再分割的原子组成的。他进而指出,各种化学元素的原子重量(即通称的“原子量”)是彼此不同的,并且说化合物是由以一定数量关系结合的原子组成的。道尔顿是第一个科学家,获得了有关原子的令人信服的实验知识。他还设计测定原子相对重量的方法。尽管道尔顿测定几种原子量的试验不大成功,但是他的设想对化学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例如瑞典化学家雅·雅·柏采留斯(1799—1848年)后来发表了四十六种元素的比较精确的原子量。

1869年,俄国化学家德·伊·门捷列夫(1834—1907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拟制了化学元素周期表。他把当时已知的六十二种化学元素按原子量递增的次序排列起来,发现性能和所产生的化合物类型相同的元素都是按有规律的间距分布的,形成周期重复的序列。这样把化学元素分组,于是便构成了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根据周期系预言当时还未发现的一些元素的性能,并且在周期表给它们留出了确切的位置。科学家们在十九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发现的镓、铟、锗三个元素的性能,就同门捷列夫的预言一致。

当时,不仅理论化学而且实用化学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电解法、电铸术和电镀术都在十九世纪早期开始应用。1828年,德国科学家使用无机物质合成尿素。这是有机化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突破。从此有机化学在理论和实践中获得迅速发展。

磁学和电学 十七到十八世纪是现在叫做电现象的学说发展特别迅速的时期。电学的发展同磁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早在1600年,英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御医威廉·吉尔伯特发表了《论磁学》一书。它不只论到磁石,还包括对吸引原理的概括。吉尔伯特说地球本身就具有大磁体的性质,以此来解释罗盘针的活动。他也探索静电问题。很久以来,人们知道琥珀经过摩擦,能够吸起羽毛或纸片,对此情况迷惑不解。吉尔伯特发现另外几种物质包括硫和玻璃也有同琥珀相似的作用。他沿用希腊文“琥珀”一字创制了“电”字。

随后,科学家们发明了一些器械,使之产生出吉尔伯特曾经研究过的那

种电。德国的葛利克制造了闻名一时的仪器——在托架上旋转的硫磺球，当用手摩擦它时则发生静电斥力和静电引力的现象；用布摩擦它时可以发声发光。十八世纪早期，英国科学家用玻璃球代替硫磺球，摩擦起来获得了较大的电花。随后，人们创造了一种改进的静电起电机，它最初装玻璃圆筒，后来改装玻璃圆盘。英国科学家斯蒂芬·格雷（约1666—1736年）有许多重大的发现。他发现了感应现象，即物体接近带电物体时生电的现象。当电由一个物体传导到另一个物体时，发现电荷不灭。他所作出的基本发现是，电是一种能够从一处流到另一处的东西。在玻璃和丝绸中产生的电可以保持在这类物体之中，他称这类物质为电体，即现在所说的非导体，电流不能通过它们；另一方面，电流可以通过金属和湿线，这类物质为非电体，即现在所说的导体。十八世纪中期，法国的杜费（1698—1739年）制定了同名电相斥异名电相吸的定律。当时，人们企图把电储存在瓶里，终于导致了“莱顿瓶”的产生。“莱顿瓶”作为唯一的电容器使用了半个世纪。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意大利，亚历山德罗·伏特（1745—1827年）受到加伐尼（1737—1798年）试验的启发，用化学方法创制了电池。在此后一个长时期内，电池一直是唯一的电源。

电的研究风靡一时，北美的富兰克林进行了放电研究，认为实验室的电火花同天上的闪电实质一样。1752年，他在雷雨中试放风筝。为了进行有目的试验，他在风筝顶上装有金属线头，在手持线绳的这一端置有一把铁钥匙。实验证明，雷雨中的闪电，可以通过风筝的湿线传播到铁钥匙上，从而证明了他的设想。经过这次实验，他在第二年发明了避雷针。

电和磁之间一定有某种关联，但是科学家很长时间没有发现它。1820年，丹麦科学家奥斯特（1777—1851年）发现，当电流通过导线时，附近的同导线平行的罗盘针会发生偏转，这就是电流对磁针的效应。这样一来，他就把电和磁两门科学结合起来了。发现电流使罗盘针偏转这一现象，在理论上极为重要，它导致了安培（1775—1836年）、高斯（1777—1855年）和欧姆（1787—1854年）对电流产生磁场和电流怎样经过导体的了解。

研究已经证明，电流能够产生磁。那么，磁能否产生电呢？这一问题，终于由英国杰出的科学家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年）作出了明确的回答。1831年，法拉第进行了精心安排的实验。他证明要产生电流，磁铁须在电导体附近移动。这说明，非但磁等于运动中的电，而且反过来电就是运动中的磁。因此这两组现象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构成了电磁学这门新的科学。法拉第的发现意味着可以靠机械作用来发生电流，反过来又有可能用电流来操作机器。这为日后制造发电机和电动机提供了根据。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另一个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1831—1879年）总结了各国许多物理学家在电磁学、热力学和光学方面的试验和理论。他是奥斯特和法拉第的后继者，制定了电磁场的理论。他以简明的精确的数学方程式总括了全部电磁理论，即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根据麦克斯韦方程，得出了关于存在以光速传播的电磁波的结论，并且确定了光与电磁的关系。进一步，科学家们又指出，不仅可见的光，而且辐射热和某些看不见的辐射都是波长不同的电磁波。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德国的亨利希·赫兹（1857—1894年）用实验方法证明了电磁波的存在，而且能量出波的长度和速度。这为无线电技术提供了基础。

电学的发展自始就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它的实践方面。它是和理论方

面的进展互起作用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电学开始直接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先在通讯方面，然后在电镀、照明和动力方面。到十九世纪晚期，它对经济生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致人们说历史从蒸气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

生物学的新突破 探索生物奥秘的生物学，从1650年以后由于应用显微镜进行观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意大利科学家马尔比基（1628—1694年）是显微镜解剖学的一位奠基者。他利用显微镜研究动植物的各种微小构造，注意到了植物各别器官的功能。他研究动物和人体，阐明了肺、肾和皮肤的构造，发现了它们内部发生的一些基本生理过程。英国自然科学家罗·虎克（1635—1703年）在显微镜下观察各种各样的东西：某些植物的纤维、某些动物的小器官以及某些无机物，他详尽而又美妙地描绘了他的观察。虎克在连续观察植物的各部分时，发现了它们的细胞构造。荷兰科学家安·列文虎克（1632—1723年）利用显微镜完成了许多重大的发现，其中包括细菌。另一位荷兰人扬·斯瓦美尔丹（1637—1680年）是显微镜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由于实验方法精确，他能看见生物机体的解剖细部，从而大大扩充了生物学的知识。

科学家们研究和观察的材料迅速增多，于是进行科学分类十分必要。瑞典的卡尔·封·林奈（1707—1778年）在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对植物、动物和矿物进行了分类。他创立了“双名命名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二名法”，把过去紊乱的植物名称归于统一，对于植物分类研究的进展，影响很大。林奈的分类法后来几经修正，直到现在仍然是植物学和动物学上所采用的分类制的基础。

细胞学说的成立是十九世纪上半期生物学的伟大成就。俄国和捷克的学者都在这方面作过研究。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研究植物细胞，看到每个细胞内的流质中有一个黑点，那就是细胞核。细胞学说的有力论证则是德国科学家泰·施旺（1810—1882年）和阿·雅·施莱登（1804—1881年）。他们指出，所有的生物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核对于细胞的生命至为重要。另一个德国学者鲁道夫·微耳和（1821—1902年）指出，每个新细胞必须出自旧细胞，只有生命物质可以产生生命物质。按照细胞学说，细胞是生物体最基本的单位，是动物体和植物体构造和发育的基础。细胞学说的意义在于它确定了一切多细胞生物构造和发育原则的一致性。约在同时，胚胎学也发展起来。这门科学事实上是由卡尔·封·贝尔（1792—1876年）建立起来的。细胞学和胚胎学的建立为创立进化论奠定了基石。

但是，在生物学界，形而上学的观念还待清除，神创论的谬说还待彻底打破。而这有待于科学进化论的确立。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的有这样重大的问题：为什么地球上有着如此丰富多样的动物和植物？如此众多而又不同的生命形态又是怎样形成的？一些科学家论证说，现在的数以千计的动物和植物都是从很久很久以前的共同的祖先那里发展过来的。他们探索着动物和植物是怎样进化的，这些科学家被称为进化论者。在早期的进化论者中间，法国的拉马克（1744—1829年）是很有创见的。他是王室御苑的植物学者，1809年大胆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生物为适应其生活环境而改变它们的形态，而这种变异又可经由遗传传给后代。科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导致了科学进化论的确立，毕其功的是英国的达尔文。

伟大的科学家查理·达尔文（1809—1882年）小时候就喜欢搜集植物和昆虫标本。他十九岁进剑桥大学，屈从父亲的意志攻读神学，但是他对自然

科学更加爱好，经常采集动植物标本，参加其他学院的野外调查。1831年，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毕业以后，不去当牧师，又不顾自己身体多病，坚决以博物学者的身份参加了“贝格尔”号舰的海上探险。这艘军舰由英国政府派出，作环球航行，重点在南美洲东西海岸考察。从1831年底到1836年10月，将近五年的考察使达尔文获得大量生物资料，观察到了许多新奇的自然现象。举例说，太平洋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是一个天然的自然实验室，达尔文在那里发现了许多生物物种比如巨龟、类似南美大陆产的攀树大蜥蜴的海生钝齿鬣蜥，等等。经过长期考察，见多识广，他开始想到，人类经济生活的竞争条件或许也适用于动物世界，如果动物界也发生适者生存的情况，那些更能适应环境的动物就能把这优点传给它的后代，这样就会逐渐演化为现在的物种。达尔文的考察所得给他的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进化理论以支持，但是达尔文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没有很快地发表他的观点，相反地，他又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各方面收集论据，包括以前各个世纪中形式逐渐变繁的岩石记录、世界上动植物的分布状况，还包括十九世纪中期进行的一些大规模繁殖实验的结果。这些论据显示了进化的历程，提供了变异的例证。达尔文以合乎逻辑的形式得出了这样的认识：许多动物繁殖的趋势都比可以获得的食物增长得快，因此而有经常的生存竞争。那些得以生存下来的一定比那些消灭的有许多优点，能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生存的环境；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下来并繁衍特质相同的后代。这就是自然选择的基本观点，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原理。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自然选择这三点成为达尔文科学进化论的基础。1859年，达尔文终于发表了他的科学名著《物种起源》，阐明了他的进化论原理。进化论指出，一切生物都在自然界中经历了长期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生物不是不变的，它可以随生存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生物经常发生的细微的不定变异，通过累代的选择作用，比较适合于当时外界环境条件的个体得以生存，并且逐渐积累有利的变异，发展成为新种。比较不适合的就不能生存或不能传种。在达尔文同时，一位比他年轻得多的学者和旅行家阿·罗·华莱士(1823—1913年)，通过他对马来群岛动物分布的研究，也独立地得到物种进化的结论。

科学的进化论彻底揭穿了基督教宣扬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因此遭到了教会的反对，引起了一场大论战。但是进化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此它是不可战胜的。

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越出了生物学的范畴，播及到社会和经济思想领域，因此产生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适者生存”来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他们鼓吹优秀者统治、低劣者被统治的谬论。种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都利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他们的统治、侵略、扩张服务。

自然科学的革命发展 近代许多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同他们的时代环境，同他们的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都密不可分。他们的成就又是在前人积累的知识基础上取得的，这正如牛顿所说的：“如果我要看的要比笛卡尔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肩上的缘故。”

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同时对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起了巨大的影响。科学家发现了电子是比原子更小的“基本粒子”，发现了放射性物质，创立了相对论，奠定了量子论的基础，等等。

这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物质结构的概念，改变了关于空间、时间和运动的概念。

在门捷列夫创制的元素周期表上，科学家们不断以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列进周期表的行列，放射性元素镭就是其中的一种。发现镭元素的是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即出生于波兰的玛丽·斯克罗夫斯卡，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居里夫人（1867—1934年）。玛丽早年在巴黎大学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先后取得物理学和数学的硕士学位。在一个实验室里，她结识了物理学家彼埃尔·居里（1859—1906年）。献身于科学的共同宏愿，终于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了。就在他们结婚的那一年即1895年，德国科学家伦琴发现了一种能够透过固体物质的X射线。第二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盐矿物能放射出一种与X射线相似的奇妙的射线。为什么铀盐矿物能放射出这种射线，当时还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自然之谜。居里夫人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借助于简陋的设备，开始了科学史上的一次伟大探索。经过广泛的实验，居里夫人先肯定，凡是含有铀和钍的矿物，都有放射性；进而又发现，沥青铀矿的放射性更大。她由此作出大胆的设想：也许这些矿物里含有一种未知元素。这个问题实在重大，因此彼埃尔·居里放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同玛丽齐心合作。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日复一日地从一吨沥青铀矿的残渣中进行提炼。经过四十五个月的辛勤劳动，终于在1902年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的镭，接着又测定了镭的原子量。镭的发现不仅是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而且开辟了科学世界的新领域，由此诞生了一门新兴的放射学，推进了原子物理学的发展。后来，镭又用在医学上，大大造福于人类。

也就在这个时候，爱因斯坦取得了自然科学史上的划时代的成就。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879—1955年）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大学期间，他在瑞士求学，以数学和物理为专业，把大量时间用在物理实验室的工作中。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特别思考物理学上面临的许多疑难问题。1905年，二十六岁的爱因斯坦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的《物理学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向当时物理学领域的传统观念冲击，创造了科学史上的新奇迹。

在1905年发表的三篇重要论文中，爱因斯坦讨论了“布朗运动”， 用最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分子的存在；并指出，利用观察布朗运动，可以计算出分子的实际大小。其次，爱因斯坦提出了量子假设，解释了光电效应。他指出，在现有的物理学理论中，物体是由一个一个原子组成的，是不连续的，而光是电磁波，是连续的。这里原子的不连续性和光波的连续性之间有深刻的矛盾。爱因斯坦作了这样大胆的假设：光和原子、电子一样，也是一个个粒子，他把这种粒子叫做光子。他说，每个光子的能量也可由这个公式—— $E=h\nu$ 决定。这里 E 代表光子的能量， h 是一个常数， ν 是光的频率。举例说，紫光的频率比红光高一倍，按上述公式计算，每个紫光的光子比红光光子的能量大一倍。

在1905年发表的三篇重要论文中，《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一文更加光芒四射。它阐明了狭义相对论，而全文只有九千字。狭义相对论否定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时间流逝的快慢和空间距离的大小都不再是绝对的，因为它们是和运动有关的，相对的。在论文中，爱因斯坦论证了质量和速度的关系，指出质量随着运动的速度而增加。他又论证了质量和能量的关系，结论是一切质量都有能量，一切能量都有质量，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就是著名的爱因斯坦方程—— $E=mc^2$ 。这里 E 是能量， m 是质量， c 是光速，是一个很大的数。

这一理论揭示了原子内部所蕴藏的巨大能量的秘密，成为现代高能物理学的理论基础。爱因斯坦以他的这些成就确立了他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在科学道路上仍在不断前进，1916年又发表了广义相对论。

第二节 近代欧洲和美国文学

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学 十七世纪的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文化发展同样极不平衡。意大利逐渐丧失了它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德国、西班牙等国由于受到强大的封建教会势力的摧残，都没有产生具有全欧意义的作家和作品。只有英、法两国的文学得到了发展和繁荣。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了诗人弥尔顿（1608—1674年），他的作品表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恩格斯认为弥尔顿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他启迪了后来的革命者，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先辈”。弥尔顿的最主要的作品为长诗《失乐园》（1667年）。它取材于《圣经》，写亚当和夏娃违犯上帝禁令偷吃禁果而被赶出乐园的故事。长诗的革命内容表现在叛神撒旦对上帝反抗的描写上。诗人创造了一个生龙活虎、坚强有力的资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形象。

法国文学在十七世纪达到全欧的最高水平，其标志是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古典主义是法国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当时的专制王权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给了适当的照顾，以便拉拢资产阶级，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抑制地方贵族的封建割据。资产阶级由于力量不够强大，需要在王权保护下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拥护专制政体。古典主义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统一，拥护中央王权。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将王权表现为国家、民族利益的最高体现者，要求臣民忠于君主。高乃依（1606—1684年）的《熙德》（1636年）是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古典主义悲剧。剧情通过个人感情与家族荣誉的冲突、家族荣誉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而展开，最后由于贤明君主的干预，矛盾冲突得以解决，因而主题又发展到对王权的歌颂。后起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拉辛（1639—1699年）是在专制政体趋于衰落的年代开始创作的。他的代表作《昂朵马格》（1667年），通过宫廷中的情杀事件反映了贵族社会的腐化堕落、国王的暴戾专横和荒淫无度。作者把造成这些人物丑行的原因归之于感情战胜了理智，个人欲望战胜了国家利益，体现了古典主义崇尚理性的特征。莫里哀（1622—1673年）是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喜剧大师。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他的名作有《伪君子》（1664—1669年）、《唐·璜》（1665年）、《悭吝人》（1668年）等。《唐·璜》剧中的主人公唐·璜是一个道德败坏、荒淫无耻的封建贵族的典型，他最后遭到毁灭，预示了贵族阶级灭亡的前途。《悭吝人》塑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高利贷资产者的形象，讽刺了资产者贪婪吝啬的本质。《伪君子》是一部猛烈抨击封建宗教伪善的讽刺喜剧。这部作品体现了莫里哀喜剧的独创风格，达到了古典主义喜剧艺术的高峰。古典主义文学，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一样，把古希腊、罗马文学奉为典范（因而有“古典主义”的名称），但又不是古代文化简单的复现。古典主义作品虽然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和历史，却明显地表现出古典主义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反对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个人主义极端发展的倾向，提出以理性来跟个人主义倾向相对抗，要求作品主人公克制个人情欲，履行公民义务，拥护中央王权，以达到加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目的。古典主义曲折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情绪和愿望，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文学 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高涨，资产阶级文学也迅速成长起来。十八世纪各国的启蒙运动文学

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舆论，为清除封建势力而斗争。启蒙文学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学。启蒙作家不仅从理论上否定古典主义以王公贵族为正面人物的原则，而且在创作中把资产阶级和平民作为描写、歌颂的主要对象。他们创造的人物往往是他们思想的体现者或代言人。欧洲各国的启蒙文学，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各有特点。

英国的启蒙文学是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出现的，因此，英国启蒙文学的任务是反对封建势力的残余，把革命推进一步。著名小说家笛福（1660—1731年）是这时期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所提倡的敢于冒险，追求财富的进取精神。作者在主人公鲁滨逊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鲁滨逊出身于中产阶级平民，但不满足于庸庸碌碌的生活，向往通过个人冒险去开辟一个新天地。当他独自一人漂流到杳无人烟的荒岛上时，他并不因绝望而坐以待毙。他用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无数的困难，开拓了这块处女地。然而鲁滨逊又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一个殖民主义者。他在荒岛上的奋斗不仅是为了个人生存，更是为了作岛上的主宰。当他在孤岛上偶尔救下了土人星期五以后，他用火枪的威胁和宗教的“感化”迫使星期五甘心当奴隶。斯威夫特（1667—1745年）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他的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年）是一部讽刺小说，对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甚至指名道姓地批判英国王朝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

十八世纪初期，在法国，古典主义仍占统治地位。从二十年代起，启蒙文学成为主流。启蒙文学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最著名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他们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一样，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启蒙文学的主要艺术形式是哲理小说，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年）、伏尔泰的《老实人》（1759年）、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开始写作于1762年，作者生前仅以手抄本流传，1823年出版）、卢梭的《新爱洛绮丝》（1761年）、《爱弥尔》（1762年）等。《波斯人信札》是启蒙运动文学的先声；作者假托两个波斯贵族人士到法国游历，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法国社会。他们发现法国人熟视无睹的许多荒唐腐败的现象，用波斯人口吻，写成冷嘲热讽、嘻笑怒骂的绝妙文章。伏尔泰在法国启蒙运动中是一个领袖和导师，被视为思想界的泰斗。他的最出色的哲理小说是《老实人》。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老实人，他的老师信奉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一切皆善”的观点，但老实人及其爱人和老师本人却遭遇一系列无妄之灾，颠沛流离，死里逃生，终于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完善，唯有“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烦闷、纵欲和饥寒三大害处”，因此还是“种我们的园地要紧”。这种思想在当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拉摩的侄儿》被恩格斯誉之为“辩证法的杰作”。这部小说采用对话体。有名的音乐家拉摩的侄儿与狄德罗交谈，一面自嘲，一面发表他对人生和社会的透彻见解，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揭示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的心理特征。《新爱洛绮丝》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写一对青年的恋爱悲剧。卢梭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了以门当户对的阶级偏见为基础的封建婚姻，提出了以真实自然的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理想。《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书中描写一个人从出生到结婚、进入社会受教育的全过程。他认为教育能使人的本性避免社会偏见和恶习的影响而得到自然的发展。启蒙文学家的这些哲理小说的艺术性不

在于情节结构的完整、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而在于作者把深刻的哲理通过某种适当的形象巧妙地表现出来的方式和高度的语言艺术。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年），于1767年创作了第一部剧本《欧也妮》，揭露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十八世纪引起广泛注意的剧本是他的三部曲的前两部《塞维勒的理发师》（1775年）和《费加罗的婚姻》（1784年）。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1792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费加罗的婚姻》描写了小人物费加罗对企图秘密恢复初夜权的伯爵的胜利，反映了法国大革命前夕人民群众的乐观情绪。

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的任务是促进民族统一的实现，反对封建制度的压迫。但是，德国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没有革命的勇气。所以在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德国启蒙文学的革命精神，根本不能和法国的启蒙文学相提并论。到了七十年代，德国的启蒙运动有了很大发展，这时德国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狂飙突进运动。这是一次德国资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年）是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代表者，他的最杰出的市民悲剧是《爱米丽雅·迦绿蒂》（1772年）。剧本描写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一个公国的统治者，在爱米丽雅举行婚礼的那天派人杀死她的未婚夫，企图霸占她。爱米丽雅的父亲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亲手将她杀死，挽救了被威胁的“道德”，临死前，爱米丽雅说道：“在暴风雨摧残之前，一朵玫瑰折下来了。”这个剧本充分揭露了十八世纪德国封建宫廷的罪恶，反映了对于暴君专政的反抗。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歌德和席勒。歌德（1749—1832年）是十八世纪下半期到十九世纪初期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年）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颂扬自然，热爱纯朴的农民和儿童，反对封建习俗，憎恶官僚贵族。他对于人世的热情希望与鄙陋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处处遭受打击和失败。在这样的处境中又遇到不幸的爱情，最后自杀。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作者个人的感受，反映了一代青年的心声，所以它一出现立即在青年中引起共鸣，欧洲社会卷起了一阵“维特热”。《浮士德》悲剧是歌德最主要的代表作，它的创作延续了将近六十年之久。《浮士德》以德国十六世纪关于浮士德博士的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浮士德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全剧对封建朝廷的腐朽、对宗教势力的罪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浮士德身上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全剧的结构庞大而复杂，虽然没有首尾连贯的故事情节，但是以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贯串始终，可以称为哲理性的诗剧。它与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列为欧洲文学的四大名著。席勒（1759—1805年）的著名剧作是《强盗》（1780年）和《阴谋与爱情》（1783年）。作者在《强盗》第二版的扉页上写道：“打倒暴虐者！”并引用古希腊名医的话：“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之。”这充分说明了剧本反专制暴政的主题思想。

《阴谋与爱情》把德国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直接对抗当作戏剧冲突，谴责了德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缺点。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流行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是浪漫主义。浪漫主义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法国革命胜利后所确立

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像启蒙学者描绘的那样美妙，社会各阶层普遍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理性王国”感到失望。反映这种社会情绪的作家，偏重于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反映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形成了浪漫主义文学。一部分作家站在没落贵族阶级的立场上，美化封建社会，攻击资本主义，企图开历史倒车，这是消极浪漫主义一派。另一部分作家崇尚自由解放精神，既否定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实，寄希望于未来，这是积极浪漫主义一派。

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在英国有拜伦和雪莱，在德国有海涅，在法国有雨果，在俄国有普希金，在东欧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等。

拜伦（1788—1824年）是英国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最卓越的代表作是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和诗体长篇小说《唐璜》等。《游记》动人之处在于它结合了游记和抒情两者之长，它纪录了拜伦游历欧洲许多国家及土耳其的印象，充满异国风光。《游记》不仅反映了十九世纪初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生活，而且描述了当时欧洲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憎恨侵略和奴役，歌颂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自由的斗争，构成了长诗的主导思想。《唐璜》以西班牙传说中的贵族青年唐璜为主人公，通过他在希腊、土耳其、俄国和英国等地的恋爱、冒险等经历，广泛反映了当时的欧洲社会现实生活，对欧洲各国的社会弊端予以辛辣的讽刺和揭露。长诗还谴责了侵略战争，表达了诗人热爱自由的革命理想。全诗以整个欧洲为广阔画面，气势宏伟，意境开阔，洗炼的口语在诗人笔下运用自如，得心应手。这部作品被歌德誉为“绝顶天才之作”。雪莱（1792—1822年）是与拜伦齐名的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抒情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取材于古希腊神话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但雪莱一反悲剧作家安排的“和解”结局。在雪莱笔下，为人类“窃火”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坚持不屈，最后依靠大自然的力量获得了解放。诗剧歌唱了真理的胜利，展现了未来世界的美好前景。雪莱的许多抒情诗，充满着革命的战斗激情，如诗人的《西风颂》的最后几行，体现了乐观精神：

……请你吹起预言的号角，
唤醒睡着了的人类！
西风啊，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海涅（1797—1856年）是德国十九世纪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和政论家。他的早期抒情诗歌创作汇编在《歌集》里，这些诗作主要是歌唱自然与爱情。诗人在对玫瑰、夜莺、森林、海洋和爱情的歌唱中，把大自然的美和个人的真挚感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其中虽然不免流露出孤独、忧伤的情调，但从整体来说，洋溢着诗人对生活的热爱。《歌集》里不少诗歌被作曲家谱上乐曲，在德国广为流传。政治抒情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年）是海涅的代表作。诗人通过叙述他在祖国土地上的一次旅行，反映了德国的现实。长诗对1848年革命前封建统治下的德国种种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抨击，对于美好的未来也满怀信心，但是，他所歌唱的没有剥削的新社会是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范畴。

雨果（1802—1885年）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著名的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人道主义是雨果创作的突出特点。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巴

黎圣母院》（1831年）是一部具有巨大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的浪漫主义杰作。小说通过善良无辜的吉卜赛少女爱斯梅哈尔达受到教会和专制制度的迫害、摧残直至悲惨死去的故事，深刻揭露并无情鞭挞了中世纪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野蛮与残暴。

小说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思想倾向。小说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特征，情节是离奇的，充满着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巧合与怪诞；人物的性格是夸张的；对照手法的运用非常突出。美与丑，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所形成的强烈对照，使作品产生了极好的艺术效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年）是雨果的代表作，也是杰出的世界文学名著。整部小说是以工人冉阿让一生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史为主要线索，反映了劳动人民悲惨的命运和处境，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不公平的法律制度以及虚伪的道德观念提出了愤怒的控诉。小说真实地描绘了拿破仑帝国后期到七月王朝初期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广阔画面，在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方面达到了更高的成就。《悲惨世界》是一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人类进步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

十九世纪初，废除农奴制成为俄国社会的注意中心。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在俄国文坛占主导地位。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战争的胜利，1825年爆发的反农奴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促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是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1795—1826年）和二十年代末之前的普希金（1799—1837年）。他们的作品讴歌反对专制暴政的斗争，表达争取自由的理想，对人民的苦难也有一定的同情。雷列耶夫是十二月党激进派领导人之一，主张解放农奴，反对专制。他的卓越诗篇是《公民》和《伊凡·苏萨宁》。在《公民》里，他抨击了封建贵族庸俗的享乐生活。在《伊凡·苏萨宁》中，他热情歌颂了关心祖国命运、英勇不屈的爱国者。普希金虽然不是十二月党人，但他的思想却和他们息息相通，他早期创作的诗篇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17—1820年）表现了诗人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自由颂》（1817年）、《致恰达耶夫》（1818年）等“自由诗歌”，猛烈攻击了沙皇的专制政体和反动的农奴制。在被沙皇政府流放南俄期间，普希金更加激发了革命激情，浪漫主义创作达到了高峰，写出了《高加索俘虏》（1822年）和《茨冈》（1826年）等著名诗篇。

在东欧，反对异族奴役和封建专制，争取自由和独立，成了文学的主题。十九世纪前半期，波兰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年）是波兰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热情歌手和战士。他的长诗《塔杜施先生》（1834年）通过立陶宛地区两大仇家的年轻一代塔杜施和佐霞的恋爱以及这两个家族的争斗与和解，描绘了波兰贵族的生活和矛盾，叙述了波兰爱国志士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长诗出版后受到波兰人民的热烈欢迎。匈牙利的裴多菲（1823—1849年）是东欧文学中成就较高的一位民族诗人。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民主思想倾向和强烈的政治鼓动性。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是叙事诗《勇敢的约翰》（1844年）。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描写了主人公的曲折经历，表现了匈牙利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自由，爱情》是人人传诵的名篇：“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对爱情的忠贞，更表现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反映出诗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情操。裴多菲的创作活动只有短短的六、七年，但给匈牙利文学以极大的

影响，在世界文学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美国，到十九世纪中期，浪漫主义文学主宰文坛。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夫人（1811—1896年）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年），揭露了黑人奴隶的非人生活和蓄奴制的残暴。小说对当时蓬勃发展的废奴运动有巨大影响。林肯总统后来在接见斯托夫人时戏谑地称她为“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在惠特曼（1819—1892年）的诗歌中达到了高峰。惠特曼一生的诗歌创作汇编在《草叶集》里。《草叶集》里充满了对新时代、新事物的乐观憧憬和热情歌颂。诗人讴歌大海、高山、新兴的城市，歌颂和平劳动和人与人之间更美好的关系，表达了对人类光辉未来的无限向往。《草叶集》描绘了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蓬勃发展的美国社会，反映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关于民主和自由理想。南北战争以后，在惠特曼的创作里减弱了浪漫主义情调，增强了现实主义的战斗气息。

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潮流——批判现实主义，并渐渐成为文学的主要潮流。从三、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欧洲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深，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社会各阶层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这样，浪漫主义文学对社会的抽象抗议和对未来的空洞理想已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于是代之而起的是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典型地再现社会风貌，深入解剖和努力揭示种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这股文学潮流，因它对现存秩序的强烈批判而被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大约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这是产生和发展的时期；后期从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是日趋低落的时期。这后期正是欧洲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资产阶级由上升的阶级变得日益没落与反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逐渐消失，因而批判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也随之减弱，作品中改良主义和悲观情绪更加严重，所以后期的欧洲批判主义文学较前期逊色。总的来说，在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使浪漫主义作品相形见绌。斯丹达尔（1783—1842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的《红与黑》（1830年）是欧洲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红与黑》描写于连·索黑尔野心勃勃的短促一生。斯丹达尔以同情态度写了于连的奋斗、追求和悲剧，从资产阶级个性自由发展的思想观点出发，肯定了拿破仑时代，否定了复辟，特别是批判了封建复辟势力以门第和出身压制平民阶层的青年，使他们得不到自由发展。封建贵族政治上的反动，生活上的糜烂，精神上的空虚，在《红与黑》中暴露无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也得到了深刻的揭露。巴尔扎克（1799—1850年）是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影响遍及全世界。他勤奋而又多产；他的主要作品《人间喜剧》共包括九十六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称赞巴尔扎克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高老头》是《人间喜剧》的中心作品，它集中反映了《人间喜剧》所揭示的内容。

全书的故事情节就是通过高老头如何被女儿遗弃，一个破落贵族青年如何往上爬这两条线索来展开的。高老头原是面粉商人，在大革命时以抬高面粉价格发了财，成了富商。他为了两个女儿进入上流社会并尽情享受，拿出了最后一分钱，而他的下场却是被她们象挤干了的柠檬那样抛弃在阁楼上，最后贫病交加而死。一个破落贵族青年，从外省乡村来到巴黎上大学，本想通过刻苦攻读而出人头地。但一接触巴黎荒淫无耻、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就逐渐堕落下去了。高老头的遭遇和这个青年的堕落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罪恶。福楼拜（1821—1880年）的代表作《包法利夫人》（1856年）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主人公是外科医生包法利的妻子，婚后发觉丈夫庸俗，环境丑恶，因而慢慢放荡起来，在高利贷压榨与人情世故的冷落下，她终于自尽，成了法国腐朽社会的牺牲品。作品揭露了教会的虚伪、贵族的无耻和资产阶级的自私，反映了十九世纪中期法国外省社会的面貌。左拉（1840—1902年）是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作家，是公认的自然主义理论的创建者。但他的创作实践是属于批判现实主义范畴的。他从1871年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陆续发表了二十部长篇小说。左拉像巴尔扎克一样，为他的作品定了总题：《卢贡·马加路家族》，副题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部结构宏大的巨著，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第二帝国时代（1852—1870年的法国）的罪恶现实。莫泊桑（1850—1893年）是法国最负盛名的中短篇小说作家。他的《羊脂球》、《项链》（1884年）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堕落的批判和对中小资产阶级卑下的精神世界的嘲讽。他的长篇小说《俊友》（1885年），写一个退职的下级军官杜洛阿在报馆就业，依靠招摇撞骗，特别是勾引上流社会女子，走上飞黄腾达的道路，最后娶了报馆老板的女儿为妻。小说对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腐败、黑暗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法国重要作家有罗曼·罗兰（1866—1944年）。他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1912年完成了最后一卷。这部被高尔基称为“长篇叙事诗”的十卷巨著，描写了一个音乐家一生的故事。克利斯朵夫是个有才能的钢琴家和作曲家，但是他不愿意以音乐来逢迎时好，猎取功名利禄。他为人爽直，富于正义感，认为艺术家为了表现生活的美好理想，应当向社会上的消极势力展开不妥协的斗争。《约翰·克利斯朵夫》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它描绘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提出了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的问题，表现出作家反对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立场。这部小说曾获得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英国兴起。在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开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劳动人民贫困化以及种种社会罪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自由竞争使小资产阶级破产，许多小资产者被投入无产阶级阵营。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大多是孤儿、小职员、小商贩、小店员、破落的贵族子弟、贫苦的家庭女教师、破产的小农等。通过描写这些被社会压扁了的小人物的遭遇，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揭示了英国社会的广阔画面。狄更斯（1812—1870年）是英国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家，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大卫·科波菲尔》（1850年）是一部自传性质的小说。主人公大卫·科波菲尔自幼失去父母，后来抚养他的姨婆也破了产，他靠自己的奋斗寻找生活的道路，终于成为著名的作家。作品广泛地描写了英国社

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但中心是通过大卫·科波菲尔反映出处在风雨飘摇位置的小资产阶级生活的艰辛、痛苦以及他们的精神面貌、生活理想。狄更斯在《艰难时世》（1854年）中以工业市镇焦煤镇的工人斗争为背景，描写劳资之间的尖锐对立，强烈谴责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肉体上和心灵上的摧残。反映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小说《双城记》（1859年）是狄更斯后期创作的杰出作品之一。小说通过一个因揭发贵族罪行被监禁十八年的医生梅尼特的经历和一个农民的小孩死在贵族的马车之下的情节，反映了封建贵族对人民的迫害，揭示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小说以严正的现实主义的态度，正面描写了革命的准备、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突出表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巨大威势。狄更斯是暴力革命的反对者，描写革命场面是为了说明暴力的可怕，谴责现实黑暗是为了防止革命的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双城记》的现实意义。夏洛蒂·勃朗台（1816—1855年）在她的代表作《简·爱》（1847年）中，通过女主人公简·爱在寄宿学校的经历，揭露了慈善事业的虚伪性，但小说的主体是写家庭女教师简·爱和宅邸主人罗契斯特之间的爱情故事。简·爱心地纯正，善于思考，始终捍卫独立的人格，敢于表达自己强烈的爱憎。作者把她与罗契斯特的爱情描写为思想、才能、品质与精神上的完全默契。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感情色彩丰富而强烈。萨克雷（1811—1863年）与狄更斯并列，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主要作品《名利场》（1848年），叙述了两个女子的命运。一个是纯洁而天真的，靠着幻想过日子；另一个是漂亮而聪明的，但虚荣心重而自私自利，力图在社会上夺取一席之地。两人的生活，都是空虚而没有内容的。她们的命运着重说明了萨克雷关于资产阶级世界生活奔忙而徒劳无功这一思想。在萨克雷的笔下，生活空虚的原因，普遍的道德堕落的根源，都在社会制度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人的真正的价值为自私、个人名利以及贪财心所排斥。在批判现实主义的后期，揭露和批判垄断资产阶级的英国作家有哈代、高尔斯华绥、威尔斯和肖伯纳等人。哈代（1840—1928年）的小说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侵入农村后小农破产的悲惨命运。哈代的作品与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早期的作品相比，缺乏包括全部社会人生的广阔画面，但却更深入地洞察人们精神生活的深处。《德伯家的苔丝》（一译《苔丝》，1891年）是哈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女主角苔丝短促的一生中无时不向往人生的真和善，也无时不遭到伪和恶的打击。她少时即负起贫苦家庭生活的重担，刚一踏上社会，就遭到恶少的侮辱。后在一个牛奶场当女工时，与青年克莱相爱，并答应了克莱的求婚。成婚之夕，她出于对克莱的忠诚与热爱，自白了往事。克莱貌似开明，但也不能脱去习俗的偏见，虽然他过去也有同样所谓不贞的生活，而对苔丝的遭遇不但不表同情，反而将她遗弃。几经曲折，苔丝出于激情，杀死恶少，因而被处绞刑。虽然哈代把女主人公的不幸解释成命运的拨弄，但从小说描写里可以看出造成苔丝的悲惨命运的完全是社会原因。哈代在副标题里称苔丝为“一个纯洁的女人”，从而公开向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道德发出挑战。高尔斯华绥（1867—1933年）创作了一系列连续性长篇小说，反映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社会状况。他的名著是《福尔赛世家》三部曲的第一部《有产者》（1906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福尔赛家族的第四代，他的性格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特征：唯利是图，坚信财产是生活的基石，是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杠杆，他把他的妻子也当作一宗私有财产来占有。英国的科学幻想小说作

家威尔斯（1866—1946年）曾加入过改良主义组织“费边社”。他否定阶级斗争，同时承认消灭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存在的无政府状态是必要的。他通常挑选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社会关系方面的缺陷为题材，借助于幻想的形象、离奇的人物以及夸张的手法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面。萧伯纳（1856—1950年）是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联系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曾是“费边社”的组织者之一。萧伯纳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指出必须改变社会制度。他的剧本《巴巴拉少校》（1905年）揭露了社会惊人的不平等，指出资产阶级慈善事业没有消灭贫穷，相反地倒帮助了它的保存。

在俄国，正当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文学盛行的时候，现实主义文学也开始出现，而且迅速走向繁荣，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趋于没落。将近一百年的俄国文坛，描写人民苦难的作家辈出，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不断涌现。他们批判的锋芒主要针对封建农奴制度，后来也触及资本主义制度。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早期以浪漫主义著称的作家，到三十年代都倾向于现实主义。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33年）和短篇《别尔金小说集》（1830年）以俄国社会现实为题材，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贵族“多余人”奥涅金和第一个“小人物”形象驿站长。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1842年）的主人公皮却林又发展了奥涅金的形象。果戈理（1809—1852年）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加强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力量。他的优秀剧作《钦差大臣》（1836年），描写一个彼得堡的小官，被外省一个小城市误认为是彼得堡派来的钦差大臣而受到那里的贪官污吏的诚惶诚恐的接待，一场丑剧揭示了沙皇俄国社会政治制度腐朽的本质。

他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1842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对整个俄国的黑暗、腐朽和反动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果戈理创立了俄国文学中的“自然学派”（即现实主义流派）。在果戈理的影响和带动下，四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一大批揭露社会现实黑暗的作品，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穷人》（1846年）、赫尔岑的长篇小说《谁之罪？》（1846年）等，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那些禀赋非凡、充满理想、向往自由的贵族知识分子却总是成为意志薄弱、无所事事的“多余人”？为什么农奴的天才得不到发挥，而总是被扼杀？造成这一切的究竟是谁的罪过？作品的共同回答是：农奴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到了五、六十年代，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进入了繁荣时期。当时，废除农奴制势在必行，但是由谁领导、采取什么道路，众说纷纭，各种类型的作家分道扬镳了。革命民主主义者、贵族自由主义者以及其他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文艺理论、文学创作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革命民主主义者，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以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等人为中心，积极为文学中的新内容、新主题而斗争，反对粉饰农奴制的现实，反对不关心当代重大问题，只写作狭隘的、个人的主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艺术对现实的美学关系》（1855年）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公式，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民主传统在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仍占主要地位。戏剧家阿·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年）忠于果戈理的传统，他的戏剧《大雷雨》（1860年）一方面描绘了俄国商人社会的专横和愚昧，另一方面塑造了叶卡杰林娜热爱自由，富于幻想、勇于斗争的女性形象，她因忍受不了这种窒息人的俄

国商人社会而投河自杀，这一行动体现了“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冈察洛夫（1812—1897年）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1859年）塑造了一个剥削阶级寄生虫的典型，对农奴制进行了有力批判，敲响了贵族“多余人”的丧钟。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年）这时进入了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期，从1856年发表《罗亭》到1876年完成《处女地》的二十年中，共写了六部长篇小说，每部新作都反映了时代的新问题。1862年写的《父与子》是他的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的典型形象，表现了他和贵族自由主义者的“父辈”之间的思想冲突。作者虽然也承认平民知识分子在智慧和毅力方面超过贵族知识分子，但不相信他们的事业必胜，因此给巴扎洛夫安排了一个失败的结局。1862—186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身陷囹圄，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长篇小说《怎么办？》。小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回答了对沙皇专制制度应该怎么办等重大社会问题，号召人们推翻沙皇的反动统治。小说《怎么办？》里描写了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和薇拉等一批“新人”，其中的领袖人物拉赫美托夫是“新人”的最高典型，也是世界文学中第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曾在四十年代闻名俄国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时期发表了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年）、《罪与罚》（1866年）等作品，使作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前者揭露了资产阶级对下层人民的欺凌；后者描写人们为了生活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沦丧。

七、八十年代后，俄国文坛上著名的作家有涅克拉索夫、谢德林、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世界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战争与和平》描写1805年到1812年间俄国同拿破仑的几次战争，以及直至1820年的俄国社会生活。在这部规模宏伟、人物众多（共计五百五十九人）的巨著里，作者以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如椽之笔，抨击了宫廷显贵，肯定了庄园贵族青年一代；歌颂了人民，写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安娜·卡列尼娜》交织着安娜追求爱情自由和列文探索社会出路这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安娜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妇女，不满于封建婚姻，追求真挚自由的爱情。但是，她在其中生活的那个虚伪的上流社会却不允许她这样做，于是她以自杀对这个社会表示抗议。列文是一个力图保持宗法经济关系的庄园地主，对资本主义侵袭下俄国“旧基础”的迅速崩溃感到十分不安，于是力图通过政策来调和阶级矛盾，抵制社会灾难，结果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复活》（1899年）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是他几十年来对社会、政治、经济、哲学、宗教、道德、美学等方面辛勤探索的总结。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杰出的短篇小说家和戏剧家，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变色龙》、《第六病室》、《套中人》等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作品揭露社会的丑恶，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

东欧、北欧也有许多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家。显克微支是波兰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1900年），描写了十五世纪波兰人民反抗条顿骑士团的侵略，歌颂了波兰人民保卫祖国、反对侵略的正义斗争。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1805—1875年），把他的天才与生命献给“未来的一代”，一生共写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他的作品被译成八十多种语言。他的许多童话，到今天还为世人所传诵。《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等真实地描绘了穷苦人的悲惨生活；《皇帝的新装》辛辣

地讽刺了皇帝的昏庸无能和朝臣们阿谀逢迎的丑态；《夜莺》和《豌豆上的公主》嘲笑了贵族的无知和脆弱；有些故事如《白雪公主》则表现了作者对人类理想的看法，即坚信“真善美终将取得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北欧文学中成就最大的是挪威文学，代表作家为易卜生（1828—1906年）。他写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剧”，其中《玩偶之家》（1879年）一剧，流行于世界许多国家，产生广泛的影响。剧本形象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法律、教育和妇女解放等问题。

由于美国的历史条件，它的现实主义文学比欧洲的晚了半个世纪。南北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在美国飞速发展，美国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严酷的现实，促使美国的文学从浪漫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马克·吐温（1835—1910年）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他早期的优秀作品有讽刺资产阶级假民主的《竞选州长》（1870年）。正当资产阶级报纸企图把美国社会描写成“黄金时代”时，马克·吐温发表了他的小说《镀金时代》（与查理·华纳合著，1873年），给美国生活中的金元独裁一个辛辣的讽刺。他于1876年发表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批判了美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谴责了教会的伪善和对儿童心灵的毒害。《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6年）是马克·吐温最重要的作品，它广泛描写了美国城镇和农村的穷困和衰落，深刻地揭露了美国社会的腐朽和假民主，尤其对美国严重的种族歧视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的《百万英镑》（1900年）揭露了拜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抨击了资本主义的道德沦丧。杰克·伦敦（1876—1916年）的作品题材广泛，主题深刻。他的长篇小说《铁蹄》（1908年）和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1909年），描写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描写了资产阶级圈子里的势利的市侩，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尖锐批判。德莱塞（1871—1945年）的创作道路表明了现实主义在美国的胜利。他的长篇小说《嘉丽妹妹》（1900年）和《珍妮姑娘》（1911年）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金钱社会中普通人的命运；他的巨著《欲望三部曲》揭露了金融寡头的罪恶；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1925年）暴露了美国生活方式对青年一代的腐蚀，这部作品使德莱塞获得了世界声誉。

第三节 近代伟大的作曲家和画家

伟大的作曲家 十七世纪以前，音乐以祈祷式的为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所显示的奢华，宫廷王公贵族的纵乐，逐渐产生了对世俗音乐的要求。作为表演艺术的音乐，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伟大的作曲家。

在十八世纪的德意志艺术中，巴赫和韩德尔的充满深刻感情的音乐占着突出的地位。世俗音乐的创作者约翰·谢巴斯切扬·巴赫（1685—1750年）是德国伟大的音乐天才。他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又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毕生刻苦钻研，创作异常勤奋。作品反映出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市民阶级在封建割据下的思想矛盾：力图挣脱桎梏，但由于本身极度软弱，只能向宗教寻求解脱。他一生写了五百多部音乐作品，形式多种多样，有古钢琴曲、风琴曲、小提琴曲、大提琴曲、长笛曲以及大量的合唱、独唱乐曲等。德国的贵族、教士欣赏巴赫创作的一些消遣性的乐曲，但是并不赞赏一些庄严的、鼓舞人心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听起来好象在号召人们起来斗争。巴赫是近代奏鸣曲式奠基者。他的创作在德国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十六世纪以来尼德兰、意大利、法国等国的音乐成就，对西洋近代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巴赫的名字被列在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的行列。

巴赫的同时代人韩德尔（1685—1759年）靠自修取得音乐知识。世俗音乐的印象对他起了决定性影响。他写了四十多部歌剧，音乐富戏剧性，内容多取材于古代神话或历史。可是奠定他的声誉的是他所作的二十余部清唱剧，内容大多取材于当时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这些作品符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1726年韩德尔入英国籍），因而大受欢迎。

十八世纪，奥地利在音乐文化方面占着主导地位。奥地利作曲家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的艺术，渗透着民主精神，反映了启蒙运动时代的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

格鲁克（1714—1787年）从事歌剧改革事业。他主张歌剧必须有深刻的内容，音乐与戏剧必须统一，表现应该力求自然、纯朴，恢复群舞场面与合唱在歌剧中的重要地位。

海顿（1732—1809年）的音乐与民间创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作品中广泛利用了奥地利王国各民族的民间歌曲和舞蹈的旋律、音调和韵律。海顿的音乐乐天、自然、生动而幽默，接近人民生活。他的清唱剧《四季》是对农民劳动的赞美和对自然的颂扬。

莫扎特（1756—1791年）是万能的音乐人物，是十八世纪最出色的交响乐的首创者，近代型钢琴协奏曲的奠基人。莫扎特还是一位伟大的歌剧作家，他创作了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歌剧，如具有鲜明反贵族倾向的《费加罗的婚姻》，反映贵族荒淫生活的《唐璜》。由于意大利歌剧当时占统治地位，使他在上述歌剧中使用意大利语的歌词。但是莫扎特要确立祖国语言的歌剧，最后他创作了憧憬超阶级理想世界的德国民族歌剧《魔笛》。这一作品对于德国歌剧艺术的建立具有巨大的贡献。莫扎特的作品尚有交响曲四十九部、各种独奏乐器的协奏曲、钢琴奏鸣曲等。他的作品清丽流畅、结构工致，对音乐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路德维希·封·贝多芬（1770—1827年）是德国作曲家，大半生生活在维也纳。他是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音乐家。早年深受启蒙运动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毕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不少作品反映当时资

产阶级反封建、争民主的革命热情。在贝多芬作品中占最重地位的是交响乐。在他的九部交响曲中有三部交响曲（第三、第五、第九）鲜明地体现了解放斗争的英勇精神。贝多芬为了表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运用广阔发展的对比主题，富于动力的和声等。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或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悲痛哀惋，鲜明地衬托出交响曲最后乐章的狂欢乐。宏伟的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在最后的乐章中以席勒的《欢乐颂》为歌词的合唱作结尾，号召“亿万人民，拥抱起来！”贝多芬还创作了抒情性的第四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贝多芬创作的钢琴奏鸣曲，如《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黎明奏鸣曲》等塑造了鲜明的音乐形象，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列宁在听到贝多芬的奏鸣曲之后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贝多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五年，在几乎全聋的情况下，还创作了大量优美的音乐作品。他的创作成就，对近代西方音乐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与贝多芬同时代的著名音乐家有韦伯和舒伯特。德国作曲家韦伯（1786—1826年）致力于民族歌剧的创作。他作的《自由射手》，题材取之于一个德国故事，被认为是德国第一部浪漫主义歌剧。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1797—1828年）的作品反映出梅特涅执政时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苦闷压抑和渴望摆脱压迫的心情。他的作品以歌曲为最著名，共六百余首，采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诗作歌词。代表作有《魔王》、《野玫瑰》，以及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等，他最后的歌曲集叫《天鹅之歌》，包括《小夜曲》、《春》等。

在十九世纪意大利的乐坛上占首要地位的是歌剧，出现了两名著名的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和威尔第。罗西尼（1792—1868年）以写喜歌剧而名闻天下。他的作品《塞维尔的理发师》，取材于博马舍的同名喜剧，具有反封建的倾向；音乐生动幽默，丰富的旋律使观众倾倒，为十九世纪意大利喜歌剧的代表。在法国1830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罗西尼在革命气氛的感染下，根据席勒同名诗剧写成歌剧《威廉·退尔》，反映了意大利人民要求摆脱外族压迫的愿望。这件作品不仅对意大利的歌剧，而且对法国的歌剧都发生巨大的影响。威尔第（1813—1901年）的创作是意大利歌剧的顶峰。他亲身参加过民族解放运动。作于四十年代的早期歌剧《纳布科》、《伦巴第人》、《欧那尼》等，表现了爱国思想和反抗异族压迫的精神。到五十年代，这位作曲家已经完全成熟，创作了《利哥莱托》（即《弄臣》）、《行吟诗人》、《茶花女》等，生动地刻划了一系列人物的性格，内容触及一定的社会问题，流露出对被损害者的同情。威尔第在七十至九十年代的后期歌剧，以《阿依达》和《奥赛罗》为代表，具有较丰富的管弦乐效果，把音乐的心理沉思同广泛的装饰效果结合起来。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欧洲出现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艺术家在作品中特别注重主观抒情。在音乐上也产生了这种倾向。属于浪漫主义思潮的音乐家有法国的柏辽兹，德国的门德尔松和舒曼，波兰的肖邦，匈牙利的李斯特等人。

柏辽兹（1803—1869年）是法国标题交响乐的创始人。他的名作《幻想交响曲》（1830年作，副标题为《一个艺术家生涯中的插曲》）体现了一个

有强烈激情、热烈希望和痛苦失望情绪的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形象，作品里展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画面，从恬静的“田园景色”到阴惨离奇的“向刑场行进”。他的其他的交响曲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哈罗尔德在意大利》等，均以新颖的配器效果见称。1840年他创作了反映法国1830年革命的《葬礼与凯旋交响曲》。法国轻歌剧的创始人是奥芬巴赫（1819—1880年），他所写的轻歌剧《美女海伦》、《奥菲士入地狱》等，轻松、优美、旋律丰富，节奏多样，成为公众喜爱的作品。

门德尔松（1809—1847年）不仅是天才的作曲家，而且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1843年他创办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于莱比锡。他在戏剧音乐（《仲夏夜之梦》）和标题交响乐（《苏格兰交响曲》、《意大利交响曲》等）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作品结构工致，旋律流畅。他的钢琴抒情曲《无词歌》也非常受人欢迎。浪漫主义作曲家舒曼（1810—1856年）的早期创作均为钢琴曲，如《蝴蝶》、《狂欢节》、《童年情景》等。1840年前后创作了歌曲二百多首，包括颂扬拿破仑的叙事歌曲《两个近卫兵》。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舒曼又写过《拿起武器》、《黑、红、金》、《自由之歌》等同情革命的歌曲。舒曼的代表作为声乐套曲《诗人之恋》（海涅作诗），它描绘了细致的感情色彩，从明朗的抒情直到慷慨悲歌，是声乐作品中的杰作。

肖邦（1810—1849年）是波兰天才的作曲家、钢琴家。从小就接触波兰民间音乐，后来在华沙音乐学院学习。二十岁以后离开祖国，定居巴黎。毕生憎恨沙俄对波兰的民族压迫和奴役，不少作品反映了他对被侵占的故家园的怀念，对民族独立的期望。肖邦所作的乐曲几乎全是钢琴曲，作品中有几部钢琴协奏曲、奏鸣曲，其中包含着著名的《葬礼进行曲》，还有玛祖卡舞曲、波洛涅兹舞曲、圆舞曲、前奏曲、叙事曲等大量钢琴独奏曲和歌曲。他的作品具有美丽、丰富的旋律，反映了人民生活的生动情景、波兰历史的图画、民间传说的幻想形象。肖邦的创作在发挥钢琴性能及和声表现力等方面有创造，对以后的西方音乐，特别是钢琴创作有深远的影响。

匈牙利人民的音乐文化有悠久的传统，在十九世纪，专业音乐获得了艺术上的发展。匈牙利的著名音乐家李斯特（1811—1886年）的创作和演奏获得了世界的声誉。李斯特少年时代就离开祖国，但是毕生始终同祖国保持着联系，1875年还创办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并任院长。1848年前，他热烈向往资产阶级革命，渴望民族独立。1834年所作的钢琴曲《里昂》，即以里昂起义织工的口号：“工作不能生活，勿宁战斗而死”为主题思想。李斯特丰富和革新了钢琴的演奏技术，首创“交响诗”体裁，创作了大量标题乐曲，从而扩大了钢琴和管弦乐的表现领域，促进了欧洲标题音乐的发展。主要作品有交响诗《塔索》、《匈牙利》、《前奏曲》等，交响曲《但丁神曲》和《浮士德》，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等。

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在西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继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音乐家。

德国作曲家瓦格纳（1813—1883年）创作了大型歌剧《尼伯龙根指环》（包括《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特》、《众神的黄昏》四联剧），这部作品的创作从1848年延续到1874年。瓦格纳取材于民间传说，把不知恐惧为何物的齐格弗里特当作革命英雄人物，但是作品还是表述了生灵必遭灭亡的悲观思想。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年）作圆舞曲四百余首，以具有旋转舞步的快速律动为特征，世称“维也纳圆舞

曲”。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享乐主义人生观。《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流传甚广。

法国作曲家古诺(1818—1893年)从1850年起致力于抒情歌剧的创作,作品以《浮士德》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为最著名。法国作曲家比才(1838—1875年)的名作为歌剧《卡门》,取材于梅里美的同名小说,写出身农家的龙骑兵下级军官唐·霍赛,在吉卜赛烟草女工卡门的诱惑下,堕入情网,成为走私贩,最后在情场角逐中刺死卡门的故事。剧中刻画了卡门热情泼辣、酷爱自由的性格特点;音乐多用舞蹈歌曲,具有西班牙色彩。这时期在法国乐坛上还出现了著名的工人作曲家狄盖特(1848—1932年)。他是家具制作工人,青年时即投身工人运动。1888年他采用了鲍狄埃的诗篇,谱成不朽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歌《国际歌》,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音乐庄严雄伟、气势磅礴。他的作品还有《前进,工人阶级》、《起义者》等歌曲。法国作曲家德彪西(1862—1918年)在印象画派的影响下,开创了音乐上的印象派。作品多以诗、画、自然景物为题材而着重于表现其感觉世界中的主观印象。他发挥声音“色彩”的表现力,造成朦胧、飘忽、空幻、幽静的意境。

在这时期,捷克在世界乐坛中占有光荣的位置。斯美塔那(1824—1884年)是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从大型的歌剧和交响乐到小巧的钢琴舞曲,都是同民间艺术血肉相连的。他的创作和活动,对捷克民族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他作的歌剧有表现十三世纪捷克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布兰登堡人在捷克》、取材于反封建历史故事的《达里波》等。他的喜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以风趣横生的民间幽默和对人民日常生活生动真实的描写而招人喜爱。他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讴歌祖国的山川、历史和人民的不朽与伟大。继斯美塔那之后出现的是伟大交响曲作家德沃夏克(1841—1904年),他以民间歌舞乐曲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如《斯拉夫舞曲》。他还写过许多歌剧,其中的《水仙女》在本国风行一时。

这时期罗马尼亚的音乐也蓬勃发展起来。作曲家契普里安·波隆贝斯库(1853—1883年)于1871年以《斯特凡大公颂歌》开始音乐创作。曾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活动。作有《联合之歌》、《罗马尼亚人的心》、《三色旗》等爱国歌曲。《三色旗》旋律雄壮、感情炽烈,长期在群众中广泛流传,1977年经填写新词后,被定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歌。

在音乐史上,十九世纪的俄国占有突出的地位。俄国音乐几乎是突然开花,而且在乐坛上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在俄国,跳舞一向是一种占优势的艺术,民间歌谣几乎是跳舞化了的。俄罗斯人酷爱民歌。民歌和舞曲可以说是俄国音乐的精髓。在十九世纪以前,俄国没有重要的音乐家,十九世纪却是群星灿烂。俄国乐派的始祖格林卡(1804—1857年)成功地把俄国音乐引进世界乐坛。他是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奠基者。他的歌剧《伊凡·苏萨宁》,取材于1612年波兰入侵俄国时,农民苏萨宁被迫为敌军带路而将敌军引入冰雪丛林,与敌同归于尽的历史故事。这是第一部俄罗斯民族歌剧,它的结尾合唱《光荣》,是一首庄严而喜悦的赞美歌,充分表达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他的神话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取材于普希金叙事诗的情节;歌剧的晶莹清彻、光芒四射的乐曲,渗透着生之欢乐的激情。格林卡的其他作品有管弦乐幻想曲《卡玛林斯卡亚》、抒情乐曲《幻想圆舞曲》等。继格林

卡之后的俄国大作曲家为达尔戈梅斯基（1813—1869年）。他的作品反映了在四、五十年代趋于成熟的批判现实主义。他的代表作《水仙女》，同情被公爵诱骗、遗弃的村女的不幸遭遇。他晚年以普希金诗剧为脚本，创作歌剧《石客》，全部采用灵活而富于表现力的宣叙调，使歌剧音乐丰富起来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之交，俄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强力集团”的进步作曲家团体，成员有巴拉基列夫、居伊、博罗金、穆索尔斯基和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强力集团”在歌剧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大大提高了交响乐的水平。巴拉基列夫（1837—1910年）主办音乐义务学校，推动音乐教育。主要作品有富于东方色彩的交响诗《塔玛拉》、钢琴幻想曲《伊斯拉美》等，并收集民歌、出版了《俄罗斯民歌集》。居伊（1835—1918年）作有歌剧《威廉·拉特克里夫》（以海涅同名长诗为题材）、《安哲罗》（取材雨果同名剧本）等和大量歌曲、钢琴小品。博罗金（1833—1887年）的主要作品有取材于俄罗斯古代史诗的歌剧《伊戈尔王子》、抒情史诗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勇士》）等。穆索尔斯基（1839—1881年）创作了优秀的历史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和《霍宛斯基党人之叛乱》，还有钢琴组曲《展览会中的图画》等。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年）的作品有表现反封建思想的歌剧《沙皇的未婚妻》、讽刺沙皇昏庸腐朽的歌剧《金鸡》、交响诗《萨特阔》、交响组曲《安塔尔》、《舍赫拉查达》（旧译《天方夜谭》）等。

俄国伟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1840—1893年）的创作，在十九世纪下半期硕果累累。他给交响乐、歌剧和舞剧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他的不少作品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沙皇统治下渴求个人幸福的意愿和惶惑苦闷的心情。其音乐着重内心刻画，旋律、配器富于表现力。他的作品丰富、多样。管弦乐作品有交响曲六部及标题交响曲《曼弗雷德》、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曲《弗兰切斯卡·达·里米尼》等。十部歌剧中，以根据普希金同名文学作品为题材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最为著名。前者刻画地主小姐塔吉雅娜和贵族青年奥涅金的爱情冲突及他们的内心矛盾；后者写平民出身的军官盖尔曼因与贵族少女相爱，感到贫富悬殊而谋求钱财，终于毁灭的过程。三部舞曲《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以爱和善能战胜一切为主题思想。他的作品尚有第一钢琴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以及室内乐、歌曲等。无与伦比的音乐才能、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使这位作曲家在生前就名震遐迩。柴可夫斯基给俄国音乐带来了世界的声誉。

伟大的画家 在十七至十九世纪，绘画越来越从宗教影响下解放出来。生产的发展、城市的成长、阶级斗争的激化、社会制度的变化都反映到绘画艺术上来。不但出现了新的题材，而且也采用了新的绘画手法，产生了新的艺术流派，涌现了一些大画家。

委拉斯开兹（1599—1660年）是西班牙的大画家。他虽然成了西班牙国王的宫廷画师，但由于受到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他的作品表现了帝王贵族们的腐败、空虚，流露出他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画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把教皇刻画得那样机敏，可又显出诡诈和暴戾。他的《纺纱女》（作于1657年）是西南欧艺术史上第一幅直接描绘劳动的大型油画，他把纺纱女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完美，表现出他对劳动姑娘的美丽和灵巧的赞叹。

伦勃朗（1606—1669年）是荷兰的大画家。他多才多艺，擅长作人像画和风景画，善于用光线的明暗效果突出主题，表达画的内容。《基督传道》是其代表作之一。他画的耶稣和圣徒们全都是些穿着东方服装的普通犹太人，甚至是穷苦的劳动者。马克思说过：“伦勃朗是依照荷兰农妇来画圣母的。”他的画还记录下阶级分化造成的社会不平，《流浪之家》（素描）画着背井离乡的农民背着婴儿牵着小狗到处流浪。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古典主义一方面强调社会生活的“合理化”，认为创作的主题应表现理性胜于个人的倾向；另一方面极力模仿古代希腊、罗马文学艺术，采用古代传说题材，趋向复古主义。古典主义的文艺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教条的斗争精神。大卫的名作《荷拉斯兄弟之誓》、《处决亲子的布鲁斯特》、《网球场誓言》和《马拉之死》* ，呼吸着时代的气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这是因为大卫直接参加了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法国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斗争给予他强烈的影响所形成的结果。《荷拉斯兄弟之誓》这幅画，借用历史题材，启发群众学习古代英雄为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的英雄伟绩。画家在《处决亲子的布鲁斯特》中，借用历史题材歌颂了大义灭亲的共和国英雄。大卫在《网球场誓言》和《马拉之死》中直接描绘了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前一幅画中歌颂了革命的根本动力——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后一幅画中塑造了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马拉的形象，表现出他那不顾疾病缠身的痛苦而紧张忘我工作的坚强意志。在绘画技巧方面，他的画风严谨，技法精工，形成了独具的古典主义画风。他把绘画作为教育群众的有力手段，对当时的法国画坛发生着深远的影响，也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德拉克瓦（1798—1863年）为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重要代表。浪漫主义提倡发挥艺术家自己的想象和创造，注重于在反映现实生活时表现热烈奔放的感情。古典主义偏重理性，因此重视线条的清晰和严整；浪漫主义偏重感情，因此重视色彩和笔法的热烈奔放。德拉克瓦曾提出“色彩是绘画的主角”。他的重要创作《开奥斯岛屠杀》*，表现1821年希腊反抗土耳其侵略的独立斗争。作品以鲜明有力的构思和雄劲奔放的艺术风格揭示了土耳其兵的残虐和希腊民族的悲惨情形。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激发了德拉克瓦的巨大热情，他创作了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又名《1830年7月28日》）。画里举着三色旗的妇女既是起义战斗者的真实写照，又是“自由女神”的象征。全画虽然人物不多，但由于光彩错杂、烟尘滚滚，加以鲜明热烈的色彩，而产生了千军万马的印象。这幅画以浪漫主义手法热烈歌颂了法国人民反对王权复辟、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

戈雅（1746—1828年）是西班牙的著名画家。在拿破仑侵略西班牙战争时期，戈雅是拿破仑军队残酷镇压和平居民的见证人，所以他创作了《1808年5月3日夜杀起义者》*（即“法军枪杀马德里市民”）控诉侵略者的残酷罪行，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他还创作了一些普通劳动人民的人物形象，如《拿水罐的姑娘》，那姿态高傲、体格结实的姑娘，显示出力量、健康和活力。他描绘人物事态都十分逼真自然，所以被称为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对欧洲十九世纪绘画有深刻的影响。

法国进步的现实主义画家杜米埃（1808—1879年）的艺术是辛辣而幽默的。他曾因讽刺国王路易·菲力普的漫画而被捕入狱。他在石版画《水仙》

中画了一个爬在水边“顾影自怜”的人，按照希腊神话，本来是个美少年，但杜米埃偏把他画成个“自我欣赏”的丑八怪。人们不是常常这样地缺乏自知之明吗？他的《1848年革命》*反映了画家对革命人民的同情。

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1814—1875年）生于农家，自学绘画。因长期从事耕作，熟悉农民，所以创作了大量反映农村生活的画。他的画是纯朴而温厚的，如《牧羊女》中那个专心打毛线的姑娘，在低头吃草的羊群跟随下，更显得善良、诚实、恬静而尊严。无边的大地上矗立着少女的身形，水平和垂直的两条线的对比，更增强了画面单纯的美。在米勒的画中，处处显示出对劳动的美的赞赏，他的名画《拾穗者》、《播种》、《晚钟》、《扶锄的人》等都描绘和歌颂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淳朴性格，揭露了剥削制度的残酷。

法国画家库尔贝（1819—1877年）明确地举起了“现实主义”的旗帜。他宣称只画自己眼见的现实，而不去画古典派、浪漫派喜欢的传说中的“英雄和神仙”。他的画是坚实而有力的，如《筛谷》、《石匠》等热情描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法国评论家说：“他稳重而有力的笔触使人联想到工人们的艰巨劳动。”

列宾（1844—1930年）是俄国著名画家。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创作了许多风俗画和历史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沙皇统治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代表作品有《伏尔加河纤夫》、《临刑前拒绝忏悔》等。他对艺术要求严格，刻画人物性格具有特色。他的作品标志着十九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绘画艺术的新发展。

继现实主义而起的印象画派，是由于法国画家莫奈（1840—1926年）所画的《日出·印象》而得名。印象画派的艺术大师常把发现美、揭示似乎缺乏然而却存在的诗意为己任。莫奈曾到伦敦画威斯敏斯特教堂，把雾画成紫红色。当这幅画展出的时候，伦敦人惊愕不已，因为他们向来感到雾是灰色的。愤懑的人为此争论，走到大街上不免抬头望望。这时他们才第一次发现，伦敦的雾的确是紫红色的。于是莫奈被称为“伦敦雾的创造者”。长期在大自然中写生的感受，加上现代光学和色彩科学成果的影响，使印象派画家们的技巧革新，获得了灿烂的成果。光和空气成了印象派绘画的主角。莫奈是印象派中具有代表性的风景画家，他善于捕捉闪烁的阳光、流动的大气和荡漾的水波所产生的生动的自然美。法国印象派风景画家西斯莱（1839—1899年）着重光与色的表现，喜作阳光中的河流和树林。德加（1834—1917年）是法国印象派中杰出的人物画家，善于把握转瞬即逝的运动着的姿态。他的粉笔画《出场前》描绘了芭蕾舞演员们等待上场的一个片断——少女们正俯身按摩着酸痛脚踝。在这些辛劳疲惫的形象里，使人感到画家对于强颜欢笑的舞女们，禁不住怀有哀怜和同情。印象派绘画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呈现出取消形体的倾向（见莫奈的《伦敦议会大厦》）。

法国画家修拉（1859—1891年）为新印象画派（点彩派）的创始人。他认为印象派的用色方法，不够严格，不免出现不透明的灰色。为了充分发挥色调分割的效果，他用不同的色点并列地构成画面，画法机械呆板，单纯追求形式。他的作品《大碗岛的夏日星期天》是新印象派的代表作。这幅画给人的印象是：生活象悬在空中似的，运动已凝结，时间也已消失，人物成了塑像。新印象派由于过分强调形式，许多作品变得味同嚼蜡，但它们在解放色彩方面曾发挥过作用。

现代篇

第一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月革命后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1917年，俄国工人和士兵举行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制度。

在二月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工人和士兵统一的战斗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彼得格勒首先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莫斯科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接着俄国大小城市都成立了苏维埃。据统计，一月之内，在近四百个城镇中建立了五百多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有六十多个工人代表苏维埃和士兵代表苏维埃联合成工兵代表苏维埃。随着革命的胜利进展，苏维埃成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

俄国的议会——国家杜马在首都革命胜利的时候，就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来“建立”市内“秩序”。它立即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举行谈判。当时，在苏维埃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优势，他们控制了苏维埃的领导权，但是苏维埃的实际力量还在武装人民手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俄历3月2日成立了由李沃夫（1861—1925年）领导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大多数部长是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1881—1970年）出任司法部长，立宪民主党人米留可夫（1859—1943年）出任外交部长，十月党人古契柯夫出任陆海军部长。

这样，俄国国内就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掌握着旧的国家机构；另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是直接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政权机构。

二月革命后，劳动人民希望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但临时政府对人民的这些切身要求置若罔闻。临时政府认可了沙皇签订的使俄国依附协约国的各种条约，根本不想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资产阶级的口号是“战到最后胜利”。临时政府也不愿把土地交给农民，但又不敢公开表示，于是欺骗说，土地问题要到召开立宪会议时解决。临时政府也不可能给劳动者以面包，因为要做到这点，就得千方百计征收地主和富农的粮食，触犯粮商的利益。

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认为，既然沙皇制度已被推翻，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因此目的已经达到，革命已经成功。他们要人民相信，战争的性质起了变化，它已不再是帝国主义战争了。他们自称是“革命护国派”，号召人民保卫资产阶级祖国。他们也劝说人民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土地和面包问题，可是他们又不急于召开立宪会议。

二月革命后，代表觉悟的雇佣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布尔什维克党脱离了秘密状态，开始进行公开的活动。党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如斯大林（1879—1953年）、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年）、捷尔任斯基（1873—1926年）等，都从流放地、监狱和国外回来了。3月5日，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重新出版。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展开了巨大的工作，组织全国各地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建立工人赤卫队，成立工人、妇女和青年的群众组织等。

《四月提纲》沙皇制度的被推翻，开辟了俄国革命的新时期；两个政

权的并存，又使新时期的形势复杂化。布尔什维克党对于新时期的革命任务，没有立刻就认识清楚。有的人主张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和护国派的政策；有的人主张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向外国提出签订和约的建议；也有人号召对临时政府建立“群众监督”，反对它拖延解决革命问题的企图。这些错误的立场等于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掌握政权，并使群众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临时政府会采取有利于革命的行动。布尔什维克党迫切需要制订新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全党、全体劳动人民热切盼望着流亡在国外的领袖列宁的归来。

1917年俄历4月3日（公历4月16日）夜晚，列宁经过长期流亡之后，回到了彼得格勒。成千上万的工人、士兵和水兵汇集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热烈欢迎，列宁走到群众当中，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演说。演说结束时，列宁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号召群众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第二天，列宁在两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宣读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提纲，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在提纲里，列宁指出，目前俄国正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前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觉悟不高和组织不够，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后一阶段的革命必须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里。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继续的战争仍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要摆脱这场战争，必须推翻资产阶级。但由于临时政府得到苏维埃的支持，所以列宁没有号召立即推翻临时政府，而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在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平发展的方针。列宁认为，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是历史上极罕见和极可贵的。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阶级斗争的普遍规律，但是在国际或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个别国家在一段短时间内会出现和平过渡的实际可能，二月革命后的俄国就是一例，这是因为当时俄国“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列宁又认为，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并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机器，在四月提纲中他提出了进一步摧毁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的任务，即废除旧警察、军队和官吏，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

在经济方面的过渡办法，列宁主张在没收地主土地的情况下把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合并全国银行为一个国家银行；由苏维埃监督社会生产和产品分配。

四月提纲是一个争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计划。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都赞同列宁的提纲，并为它的实现而积极斗争。

5月1日（俄历4月18日），正当俄国劳动人民庆祝国际劳动节的时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向各盟国发出了照会，声称临时政府保证遵守沙皇政府的一切条约，并将继续战争直到胜利。米留可夫的照会使广大群众进一步看清，只有无产阶级掌权才能结束战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士兵和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高呼“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打倒战争”等口号。古契柯夫和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科尔尼洛夫企图以恢复“秩序”为名实行镇压，但是他们得不到军队的支持。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被迫先后下台。临时政府为了平息民愤，维持自己的统治，于5月18日（俄历5月5日）同

彼得格勒苏维埃达成协议，吸收社会革命党的切尔诺夫和孟什维克党的策烈铁里等人加入政府，克伦斯基改任陆海军部长。这样，公开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挽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

6月16日(俄历6月3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一千多名代表中，布尔什维克代表只有一百多名，绝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他们主张同资产阶级保持联盟。为了证明同资产阶级结盟的正确性，孟什维克策烈铁里硬说，俄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单独掌握全部政权。列宁在代表大会上说：“有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党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列宁指出，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必然给国家带来灾难，只有把政权交给苏维埃才能救俄国。但是被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控制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认定临时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赞成同资产阶级的联合。

七月危机 得到了苏维埃代表大会支持后，临时政府陆军部长克伦斯基下令，在西南前线的三十余万俄军于7月1日(俄国6月18日)向奥匈阵地发动进攻。7月中，前线失败的消息传到彼得格勒，工人士兵群情激昂，纷纷议论武装发动和推翻临时政府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支持群众的革命情绪，但反对立即举行武装发动，因为当时国内大多数人民还跟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走。布尔什维克党把群众发动变成一次有组织的和平示威。7月16日(俄历7月4日)，彼得格勒五十万工人和士兵举行了示威游行，派代表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要求苏维埃把全部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在和政府密谋镇压游行的办法。临时政府调来了军队，血腥镇压了游行示威。鲜血染红了彼得格勒街道，死伤群众竟达四百多人。

镇压了七月示威后，临时政府加紧对布尔什维克党进攻。《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许多布尔什维克遭逮捕。临时政府还发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彼得格勒高等法院检察官发出布告，说列宁犯了“叛国罪”，应受审判。

布尔什维克党转入地下，把自己的领袖隐藏起来。列宁头几天秘密地留在彼得格勒，然后转移到离彼得格勒不远的拉兹里夫湖畔的一个草棚里。在那里，列宁继续指导革命，同时进行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开始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9月列宁又转移到了芬兰。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 七月事变以后，俄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政权已集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7月20日，李沃夫去职，克伦斯基接替了临时政府首脑职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以自己的叛变行为破坏了革命和平发展的道路。现在，无产阶级只能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了。

8月8日至16日(俄历7月26日至8月3日)，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秘密地举行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列宁未能出席代表大会，但他通过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同志，秘密地领导了大会。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和著述，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的相应的决议指出：现在，使政权和平地转归苏维埃已经不可能，目前的任务是，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革命无产阶级，去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专政，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在代表大会上，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议在夺取政权的决议上指明：只有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时，才有可能把俄国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根据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胜的理论驳斥了这一谬论。大会否决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的修正案。大会决定暂时取消“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这不是说布尔什维克放弃在苏维埃内的工作，因为苏维埃虽然不再是政权机构，但仍是团结群众的机关。布尔什维克应当继续利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坛来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妥协派的面貌。大会发表了党的宣言，号召工人、士兵和农民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通过起义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

资产阶级夺得全部政权之后，企图建立赤裸裸的反革命军事专政。从7月21日起，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充任了临时政府的内阁总理，兼陆海军部长。他完全接受了立宪民主党关于加紧镇压革命、彻底消灭苏维埃的要求。为了实现反革命计划，资产阶级需要武装力量，因此，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以科尔尼洛夫（1870—1918年）为首的“最高司令部”。科尔尼洛夫还得到了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英国驻俄大使宣称：“科尔尼洛夫是比克伦斯基更强大有力的人。”

为了组织和动员反革命力量，临时政府于8月25日（俄历8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所谓国务会议，出席者有军队高级指挥人员、立宪民主党人、前国家杜马议员、工商界巨头、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党莫斯科委员会于国务会议开幕的一天组织了有四十万人参加的大罢工以示抗议。在国务会议上，科尔尼洛夫等反革命将军公然要求“取消苏维埃”，取缔军队中选出的士兵委员会，不仅在前方而且在后方恢复死刑。

国务会议后，科尔尼洛夫积极准备反革命叛乱。9月上旬，科尔尼洛夫打着“拯救祖国”的旗号，命令克雷莫夫的骑兵团从前线开回彼得格勒，企图一举摧毁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党立刻成立了战斗司令部，号召工人和士兵进行武装抵抗。工人迅速地武装起来，赤卫队成倍增长。革命士兵监视着通往彼得格勒的铁路枢纽站，不让反革命军队通过。瓦解叛军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叛乱被粉碎，克雷莫夫自杀，科尔尼洛夫被擒，克伦斯基不久就把他释放了。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被粉碎，改变了俄国国内的形势。工人、农民和士兵看清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些妥协派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帮凶，确信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是正确的。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许多地方苏维埃的领导权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手里。在很多部队里士兵赶走反动军官；工人不断举行罢工，有些企业的工人逮捕了资本家代理人，自己管理企业；农民纷纷夺取土地，烧毁地主庄园。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布尔什维克党重新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对工人、农民和士兵发出的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号召。那些时候，列宁一再指出，起义的时机成熟了。

10月20日（俄历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领导起义的准备工作。23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举行了重要会议，通过了由列宁起草的在几天内开始武装起义的决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1883—1936年）发言反对起义，会议拒绝了他们的意见。

会议以后，党派遣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1881—1969年）、基洛夫（1886—1934年）、古比雪夫（1888—1935年）、伏龙芝（1885—1925年）等人到各地去组织起义。根据党中央的提议，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下面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为领导首都武装起义的公开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核心是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五人组成的党总部。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准备起义的最重要、最紧张的日子里，10月31日（俄历10月18日），加米涅夫用自己和季诺维也夫的名义在非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新生活报》上登载谈话录，声明他们不同意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这就等于向敌人泄露了党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

临时政府接到关于起义的预告，10月31日当天就举行秘密会议，制订了镇压革命的紧急措施。它准备占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它从前线调来了军队，并以彼得格勒两个士官学校的士官生来加强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的防卫力量；冬宫广场上架起了大炮和机枪。为了切断各工人区和市中心区的联系，涅瓦河上的吊桥全被拉开。军队在市里巡逻，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但是反革命势力已经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进军了。这时，布尔什维克党在彼得格勒拥有工人赤卫队二万三千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十五万名革命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八万名革命水兵；在全国有二十万名工人赤卫队员和几百万士兵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列宁估计，敌人会猜测到布尔什维克将在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11月7日那天发动起义，所以他坚持必须抢先一步，提前发动起义。列宁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拖延发动就等于死亡。

根据列宁的提议，起义在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开始了。当天夜晚，列宁来到起义司令部斯莫尔尼宫，直接领导起义。通向首都的一切要道全由革命军队把守，不让从前线调回来支援临时政府的部队通过。从波罗的海舰队调来的水兵协同工人赤卫队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迅速占领了电话总局、中央邮局、国家银行、库房、市发电站、主要桥梁、各火车站等。政府各部的机关很快被占领，临时政府藏身的冬宫被包围，起义非常迅速、顺利地完成了。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早晨，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告俄国公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即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手中。

已被推翻的临时政府仅仅占据一个冬宫，由士官生和一个妇女突击营担任警卫。克伦斯基于11月7日上午乘坐美国使馆的汽车逃出首都，企图在市郊集合一支反动军队进行反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1月7日下午两次促令临时政府投降，但没有得到回答。于是列宁下令攻取资产阶级政府的最后堡垒。晚上九点多钟，从涅瓦河传来了“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这是冲锋的信号，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高呼着“乌拉”冲向冬宫。深夜，冬宫被攻下，临时政府的部长全被逮捕。

彼得格勒的武装起义胜利了。1917年11月7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日子，成为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11月7日按俄历是10月25日，所以这次革命叫作十月革命。

紧接着彼得格勒起义的胜利，莫斯科也举行了起义。经过六天的激战，11月16日拂晓起义者攻下了克里姆林宫，控制了全莫斯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全国各地发动了起义，顿河、库班、高加索、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政权都迅速地转到苏维埃手里。前线的士兵也都发动起义，转到革命方面来。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广阔的土地上展开。这是苏维埃政权胜利进军的时期。

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 在攻打冬宫战事激烈进行的时候，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了。代表大会代

表全国四百多个苏维埃。六百多名代表中近四百名代表是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几乎一致地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它意味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从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接过了国家政权，并宣布了各地的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8日晚，列宁对代表大会作了关于和平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宣读了他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人民和政府提议缔结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约，终止帝国主义战争。土地法令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不付任何赎金。这个土地法令的基础是社会革命党人根据二百四十二份各地农民的委托书拟定的农民委托书，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在执政时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实现它。布尔什维克却在掌握政权的第二天，就把农民委托书变成了法律。根据这份委托书，土地私有制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民的、国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皇族和寺院的土地，一律无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两个法令。

最后，大会选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来管理苏维埃国家，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约·维·斯大林、列·达·托洛茨基（1879—1940年）和阿·伊·李可夫（1881—1938年）等。人民把国家的领导权托付给了布尔什维克党。

苏维埃政权诞生了。中央和地方苏维埃体制成了新政权的基础。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休会期间，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它的权力。人民委员会对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加米涅夫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不久他被撤销职务，由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出任执委会主席。

苏维埃政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拥护，但是遭到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猛烈反抗。从彼得格勒逃出来的克伦斯基纠集反动部队和士官生向首都猛扑；莫斯科也发生了叛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持的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凭借掌握铁路运输的权力，要挟布尔什维克党成立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以取代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在几天之内就击溃了反动军队的进攻，镇压了叛乱，粉碎了全俄铁总执委会的阴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但还有许多困难有待于苏维埃政权去解决。

在俄国反革命党派和英、法、美帝国主义纵容下，旧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吏和职员实行反革命总工，擅离职守，盗窃文件，搅乱事情，这给新掌权的无产阶级造成极大困难。资产阶级洋洋得意地狂叫：苏维埃政权的日子长不了。它说布尔什维克尽可用大炮射杀士官生，但是最好的大炮也代替不了最坏的打字机，最勇敢的水兵也代替不了政府机关中的普通职员。苏维埃政权的对策是：一方面从工农群众中提拔人才，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管理国家；另一方面团结进步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号召他们参加革命事业。

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还妄图制造饥荒饿死工人，扼杀革命。当时，给彼得格勒每个居民每日配给半饥半饱的口粮，即每人半磅（不到半市斤）面包就需要四万八千普特粮食，可是在11月9日政府掌握的粮食只有三万普特。孟什维克挑拨地说：布尔什维克曾答应给面包，而事实上带来了饥荒。革命后粮食采办工作情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首都和各省粮务委员会的总工。苏维埃政府决定直接依靠工人赤卫队员，征发私人存粮。赤卫队员在仓库里、车

站上就搜查出并没收了三十万普特粮食。政府还采取措施，加紧从各地运粮来供应革命的首都。政府宣布粮食投机商为人民公敌，进行无情镇压。粮食供应工作迅速改善了。

苏维埃政权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斗争中日益巩固，反对总工的斗争加速了新机关的建设和旧机关的破坏。列宁亲自领导了建立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工作，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是他的重要助手。1918年1月解散了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里指出：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由捷尔任斯基主持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总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它的任务是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总工；还建立了人民法院和工人民警以代替旧法院和旧警察。军队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旧军队的士兵已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但因长年战争而疲惫不堪，因渴望回家而丧失战斗力。1918年1月，旧军队开始复员，以劳动者中最有觉悟的分子组成的工农红军开始建立。

苏维埃政权把一切银行收归国有，合并为统一的国家银行；废除了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一切内外债务；垄断了对外贸易；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由工人监督生产；后来又实行了大工业国有化；废除了等级制度；实行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宣布俄国各民族人民一律平等。

苏维埃国家退出帝国主义战争 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苏俄不止一次地向一切交战国建议结束战争，缔结和约。协约国拒绝和平建议，因此不可能缔结普遍的和约。但是德国希望减轻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难，同意和谈。

1917年12月3日（俄历11月20日），苏俄与德奥在布列斯特开始了缔结和约的谈判。苏俄建议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德国却提出了掠夺性的条件，要求占有被德军占领的俄国西部的大片领土。接受德国和约的苛刻条件，还是继续同它进行战争？整个俄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列宁考虑到旧军队已经瓦解，新军队刚刚开始建立，苏维埃国家需要和平暂息时间来加强国防，主张忍痛签订和约。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活跃起来了，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声嘶力竭地叫嚷什么布尔什维克“出卖”俄罗斯。他们鼓吹要同德国交战，好借德国的炮火来轰毁工农政权。协约国同样打算借德国之手扼杀苏维埃政权。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以布哈林（1888—1938年）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也反对和约，他们宣称同帝国主义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不能容忍的，号召向整个帝国主义宣布“革命战争”。

党中央委员会多次讨论和约问题。列宁经过与“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斗争，终于使中央通过了一项如下的决议：尽量拖延谈判，而一旦德国提出最后通牒，就必须签订和约。1918年2月9日（俄历1月27日）德国提出最后通牒。10日，列宁在给苏俄和谈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的专电中指示立即签订和约。但托洛茨基违背了中央的决议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指示，对德方代表声称：“苏维埃俄国拒绝签订和约，准备停止战争，复员自己的军队。”

托洛茨基的这种行为助长了德国侵略者的气焰。2月18日，德国对苏俄发动了全线进攻。旧军队的残部抵挡不住大批敌军的猛烈攻击。几天之内德军占领大片领土，逼近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国家遭到致命的危险。德国的武装干涉激起了劳动群众的革命义愤，成千上万的先进工人和复员士兵

响应党和政府发出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召唤，纷纷自愿地加入红军。年轻的新军队击退了德军的攻击，阻止了德军向首都彼得格勒的推进。2月23日是苏维埃俄国人民大规模动员起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日子，后来成了红军诞生纪念日。

23日，德国向苏俄提出了新的最后通牒，要求占领更多的领土，并索取六十亿卢布的赔款，作为和平条件。列宁建议立即接受条件，“左派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对，党中央的大多数委员赞同列宁的提议，立即签订和约。3月3日，对德和约在布列斯特签了字。3月6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确认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路线正确。3月16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和约。

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向德国割让了大片领土，并缴付了巨额赔款，但是它使苏维埃国家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避免了遭受夭折的危险，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

由于德军进驻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对彼得格勒造成的威胁，也是为了使首都和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区域离得更近，3月中旬苏维埃国家将首都从彼得格勒移到了莫斯科。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过去的一切革命，它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从根本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剥削阶级。所以，十月社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这就鼓舞了世界各国无产者的革命斗争，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打破了民族殖民地压迫的锁链，动摇了帝国主义的后方，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他们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实践证明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一国胜利的理论是正确的；证明了只有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才会取得胜利。

第二节 苏维埃国家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

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开始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反动政党不甘心失败,到处组织叛乱,密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外国垄断资本家害怕丧失贷给旧俄政府的几十亿卢布和巨额利润,更加害怕本国劳动人民学习俄国劳动人民的榜样推翻自己的统治,千方百计要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1918年上半年,出现了以反革命叛乱为内应的外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

1918年1月,日本和英国的军舰开进了俄国东方的海参崴港。3月英法美三国军队占领俄国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8月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成立了白卫军的“俄国北方政府”。4月日本军队在海参崴登陆,同时有英军,不久又有美军也在该地登陆。8月英军从伊朗侵入土尔克斯坦(今土库曼地区)和外高加索。

5月25日,当运送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军用列车分散在从奔萨到海参崴一线时,该军团发动了叛乱。这个军团是十月革命前由俄国的奥匈战俘组成的。他们都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些战俘为参加协约国军队,反对统治他们的奥地利帝国,与苏维埃政府达成协议,准备经过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乘船去法国。但是中途他们受协约国的收买,举行了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由于大批白卫军的加入,叛军增至六万名装备精良的士兵和军官。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哗变使俄国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活跃起来,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开始了富农的暴动。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协同反革命势力迅速占领了萨马拉(今古比雪夫)、喀山、辛比尔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等许多城市,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以及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的西部地区。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了,在萨马拉成立了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反革命政权;在鄂木斯克和叶卡特琳堡(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也建立了反革命政府。

在外高加索,英军会同白卫军夺取了巴库,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被逮捕,以邵武勉为首的二十六名成员被英帝国主义者下令枪杀。在北高加索,以科尔尼洛夫、邓尼金(1872—1947年)和阿列克谢也夫为首的沙皇军官组成“志愿军”,在协约国协助下,宣布讨伐苏维埃政权。

德国依然是苏维埃国家的凶恶敌人。它违背布列斯特和约,派兵进驻乌克兰,残暴地掠夺和压迫乌克兰人民。顿河流域的统治者、哥萨克军首领克拉斯诺夫(1869—1947年)在德国支持下,纠集大量兵力,开始进攻察里津(1925年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现为伏尔加格勒)和沃罗涅什。

国内外敌人侵占了苏维埃国家四分之三的土地,包围了它的中心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也拼命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1918年7月6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首都莫斯科发动叛乱,刺杀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阴谋挑起德国对苏俄的军事行动。但叛乱在几小时内就被镇压下去了。7月份,社会革命党人还在雅罗斯拉夫尔、雷宾斯克等俄国中部的二十三座城市相继发动了反革命叛乱。这些叛乱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局势仍然十分紧张。8月30日,社会革命党女党徒卡普兰暗杀列宁,列宁中了两颗毒头子弹,身受重伤。同时,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刺杀了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洛达斯基和乌里茨基。

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时期,帝国主义战争造成了工

农业生产的破坏和国民经济的凋敝。巴库和顿巴斯等燃料产地，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和西伯利亚西部等产粮基地都落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极端缺乏粮食、原料和燃料，许多工厂被迫停工，广大人民忍饥挨饿。

形势万分危急，人民岿然挺立。他们在俄国共产党（布） 的领导下巴起投入保卫祖国的战争。工人农民响应党的“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大批加入红军。1918年初夏，红军志愿兵达三十多万人。5月底，红军由志愿兵制改为义务兵制，这为建立一支人数众多的正规红军创造了条件。秋天，红军人数增至八十万，到年底已近一百万人。党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军事的领导，如加速培养工农指挥员；强调政治委员对军队建设的作用；注意吸收旧军队的军官和军事专家来为红军服务，1918年底，红军任用的旧军官计有二万二千多名，而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约有十万多名。

外国武装干涉、国内战争、经济破坏迫使苏维埃国家把经济转上战时轨道，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除大工业外，中型工业也收归国有，在内战快结束时，连小工业也国有化了；从1919年1月起实行余粮收集制，把农民的一切余粮都收集到国家手中，后来又把收集余粮的办法扩展到其他农产品，国家付给农民的，一部分是工业品，一部分是日益贬值的纸币；取消自由贸易，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由国家统一配给；劳动报酬大体上是平均主义的，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所得相差无几；劳动居民根据卡片免费或按规定的低价获得粮食和工业品；资产阶级被吸收来参加强制性的体力劳动，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上述非常措施反映的经济政策，从表面看来，似乎体现了共产主义原则，因此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不能激起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劳动农民接受了余粮收集制，因为他们懂得，为了保全从苏维埃政权得来的土地，必须全力支持苏维埃政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俄共（布）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应付困难的政策，它使苏维埃政权在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战胜敌人方面发挥了作用。

1918年下半年，红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初步胜利。9月在东方战线上解放了喀山、辛比尔斯克。10月解放萨马拉，肃清了伏尔加河地区的白军，把敌人赶向乌拉尔。在南方战线，8月和10月，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指挥下的红军击退了克拉斯诺夫的顿河哥萨克白军向察里津的两次进攻，保住了英雄城市，粉碎了南部和东部白卫军实行汇合的企图。在北高加索，红军对邓尼金的志愿军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战。

1918年11月，帝国主义大战结束，德国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德皇政权。11月13日，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德国占领下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等地，都举行了武装起义，赶走了德国压迫者，分别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

苏维埃国家粉碎三次反革命进攻 协约国打败德国后，得以集中力量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1918年年底，协约国在俄国南部地区集结了十三万兵力，法国部队在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登陆，英国陆战队又在巴统和诺沃罗西斯克登陆。他们以自己的部队为主力，联合当地白卫军力量，妄图在俄国南部倾覆苏维埃政权。

由于布尔什维克在外国武装干涉军中的积极活动，越来越多的士兵接受了国际主义思想。1919年4月，入侵塞瓦斯托波尔的法国水兵发生起义，法国政府被迫从乌克兰南部和克里木半岛撤回自己的部队。4月底，这些地区

的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分子全被肃清。在北方的协约国士兵中也发生了革命骚动，拒绝同苏俄红军作战。1919年夏，协约国开始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撤军。正像列宁所说，布尔什维克夺走了协约国的士兵，夺走了协约国在军事上和技术上的优势。

但是，1919年春，苏维埃国家的处境是极其困难的，帝国主义者正策划白卫军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协约国组织的第一次进攻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他们在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的傀儡高尔察克（1873—1920年）身上。高尔察克原是沙皇的海军上将，在1918年的11月，他推翻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鄂木斯克的政府，夺取了政权，自称为“俄国最高执政”。1918年的12月，他占领了彼尔姆，向维亚特卡（今基洛夫）和科特拉斯挺进，妄图与俄国北方的干涉军、白卫军汇合，然后再向莫斯科进军。红军粉碎了他的企图，把他的军队从维亚特卡打退。高尔察克得到了协约国金钱和武器的援助，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征兵扩军。1919年3月初，四十万装备精良的高尔察克军队在长达二千公里的苏俄东方战线发动了全面攻势。配合他进攻的，南部有邓尼金，西部有波兰白军，彼得格勒附近有尤登尼奇（1862—1933年），北部尚有英美法干涉军和白卫军。不久，红军东方战线的中段被高尔察克军突破。4月，高尔察克占领乌法，逼近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直扑伏尔加河，准备同邓尼金部队会合，直取莫斯科。西方报刊作出预言，说经过几个星期，“俄国的救星”将骑着白马进入克里姆林宫。

共产党发出了“一切为了东线”的号召，要求工人、农民奋起保卫祖国，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普遍动员。短期内，一万五千多名共产党员，三千多名共青团员和六万多名工人补充了东线的红军。在后方，劳动人民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莫斯科——喀山铁路的一个机车库的十五名工人，放弃夜间的休息，彻夜不懈地义务劳动，修理好机车三台。他们还决定在战胜高尔察克之前，每星期六晚上都进行义务劳动。他们这种以忘我的精神支援国家克服困难的行动，被列宁誉之为“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伟大的创举”，迅速地得到全国工人的响应与效法。

4月28日，在伏龙芝、古比雪夫指挥下的东方战线南路兵团向高尔察克发动了反攻，很快突破阵线，向高尔察克分子盘踞的腹地挺进。从5月下旬起到6月中旬进行了乌法战役。高尔察克分子将白河上的所有桥梁全部烧毁，红军的东线部队不得不在长达七十五公里的战线上，在没有专门渡江器材的情况下，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白河。在战斗中，恰巴耶夫（1887—1919年）指挥的第二十五师（政治委员为富尔曼诺夫（1891—1926年）建立了卓著的功勋。恰巴耶夫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渡河途中，头部受伤，还继续指挥战斗。恰巴耶夫师重创了高尔察克的军官突击大队，解放了乌法。东线部队乘胜前进，7月解放乌拉尔。高尔察克军队节节溃退，又遭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工人、农民游击队的有力打击。11月14日，红军进入高尔察克的“首都”鄂木斯克。1920年1月，红军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消灭了高尔察克的残余部队，俘虏了六万名官兵。“俄国最高执政”带着他的部长和将军们向东溃逃。在伊尔库茨克高尔察克被地方游击队逮捕，经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判决处死。

1919年5月，正当高尔察克向乌拉尔溃退的时候，尤登尼奇的白卫军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企图把红军从东线引开。5月中旬，他们突破了红军第

七集团军防线，扑向彼得格勒。一支由十二艘巡洋舰、二十艘驱逐舰和十二艘潜水艇组成的英国舰队从海上支援尤登尼奇。正当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由于协约国间谍的策动，彼得格勒附近的红丘、灰马和奥勃鲁切夫三个炮台发动了叛乱。在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居住区，地主、资本家和白卫军官在等待武装暴动的信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说，“无论如何要保住彼得格勒”。斯大林被派到彼得格勒领导防御工作。6月中旬，工人和水兵搜查资产阶级居住区，查获了无数武器和弹药。同时，红军部队攻下了三个叛乱的炮台。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英勇地从海上保卫彼得格勒，击退了试图攻取喀琅施塔得的英国舰队。6月下旬，第七集团军全线反击。9月初，尤登尼奇军队退往爱沙尼亚。

协约国的第一次进攻被粉碎了。

1919年下半年，协约国组织了反苏维埃国家的第二次进攻。实际上，第一次与第二次进攻之间并没有任何间歇。第二次也象第一次一样是联合进攻，不同之处主要在于第一次的重点在东线，第二次的重点在南线。这次进攻的主力是盘踞在南方的邓尼金的三个集团军，它们基本上由沙皇军官及库班、顿河流域的富裕哥萨克组成，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帝国主义者照例供应邓尼金白卫军大量的大炮、坦克、步枪、子弹、炮弹和其他军需物资。配合邓尼金进攻的，有尚未被完全歼灭的高尔察克军队，有彼得格勒附近的尤登尼奇军队，还有在西方同苏俄红军作战的波兰白军。

1919年7月初，邓尼金的部队占领了顿巴斯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发布了“向莫斯科进军”的命令，其精锐部队“志愿军”沿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莫斯科一线进攻。至10月中旬，邓尼金已占领沃罗涅什、库尔斯克和奥廖尔，逼近供应红军枪炮弹药的图拉，离莫斯科只有二百公里路，首都遭到严重威胁。在邓尼金部队直逼苏维埃共和国心脏地区的时候，顿涅茨矿区的资本家们许下诺言，将以百万巨奖赏给第一支冲进莫斯科的白卫军。

党中央和列宁向全国发出了“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党再度动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入伍，给前线补充了三万名党员和一万名团员。在这些日子里，许多共青团区委会的门上写着：“全体团员上了战场，区委停止工作。”为了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工人常常连续十二小时不出车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运动开展得更加广泛了。1919年秋，党中央决定举行征收党员周。在国家困难和危险的时期，有二十多万人入党，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信赖和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等被调往南方方面军加强领导。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从1919年10月起，红军作战的重心从邓尼金的老巢顿河和库班河地区转移到奥廖尔、沃罗涅什地区。

10月中旬，红军在从奥廖尔到沃罗涅什长达三百公里的战线上转入反攻。布琼尼（1883—1973年）指挥的第一骑兵集团军在进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10月24日解放沃罗涅什。10月11月间，红军还解放了奥廖尔和库尔斯克。11月12月间，红军解放了哈尔科夫、基辅、顿巴斯。1920年1月，红军进抵亚速海滨，占领罗斯托夫，进入北高加索。3月27日，红军和游击队解放了诺沃罗西斯克。邓尼金军队被彻底击溃，邓尼金本人逃出俄国，其残部逃窜到克里木半岛。

正当南线进行决战的时候，1919年9月，尤登尼奇白卫军窜抵彼得格勒郊区，离城只有几公里。尤登尼奇在对外国记者谈话时声称，他认为占领彼

得格勒的任务已经完成。当有人建议一位俄国将军用望远镜看看这座城市时，他得意地说：“为什么？我明天要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呢！”但是白卫分子高兴的太早了，就在10月下旬，红军开始了反攻，11月尤登尼奇军队被彻底打垮，残部溃不成军，逃往爱沙尼亚去了。

1919年秋天，在俄国北方的协约国干涉军开始瓦解，被迫撤退，白卫军也大批倒向红军。1920年2月3月间，红军解放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

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溃败后，苏维埃国家得到了三个月的和平喘息时机，从事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

1920年春，协约国组织了第三次进攻。这次进攻的主力，一是当时在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统治下的波兰，二是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搜罗了邓尼金残部的弗兰格尔（1878—1928年）白卫军。

在十八世纪末丧失独立的波兰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但是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波兰的统治者企图占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大波兰”，波兰国家首脑毕尔苏茨基拒绝了莫斯科关于缔结和约的建议。协约国帮助波兰武装了七十四万人的军队。1920年4月25日，波兰白军侵入乌克兰，5月6日，攻陷基辅。以图哈切夫斯基为司令的红军西方方面军牵制了大量敌军，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骑兵第一集团军突破了敌人防线。6月2日红军收复基辅，继续西进。7月收复明斯克和维尔纽斯。8月，红军逼近华沙，引起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惊慌。不久，波军在协约国大力支持下站稳了脚跟，苏维埃军队受到挫折，被迫后退。但是，波军的反攻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红军挡住。10月，苏波在里加签订了停战协定。1921年3月18日，双方签订了和约。根据和约，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被划入波兰版图。

1920年6月，弗兰格尔也发动了攻势，从克里木向北窜犯。他的军队约有十五万人。7月，弗兰格尔占领了乌克兰南部，秋天，逼近顿巴斯。8月7日，红军强渡到第聂伯河左岸，占领了卡霍夫卡，在这儿建立桥头堡牵制敌人的行动。从8月到10月，弗兰格尔投入精锐部队，配有坦克和大炮进行掩护，多次猛攻卡霍夫卡桥头堡，但都被红军击退。卡霍夫卡成了红军战士英雄主义的象征。为了与弗兰格尔作战，苏维埃政府建立了由伏龙芝指挥的南方战线。由于对波兰的战争的结束，红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弗兰格尔。10月底，红军转入反攻。弗兰格尔退守克里木，凭借彼列科普地峡的坚固要塞，负隅顽抗。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付出重大伤亡，攻占要塞，通过地峡，歼灭了弗兰格尔军队。11月16日，克里木半岛解放。

协约国的第三次进攻又破产了。1920年底，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俄国远东地区仍被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所占领。远东的劳动人民为争取解放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20年1月海参崴的工人在游击队协助下举行了起义，推翻了白卫政权，建立了以拉佐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临时政府。4月4日夜晚，日军及白卫军袭击海参崴，逮捕了拉佐等领导人，白匪把他们放进机车车厢里活活烧死了。

在西伯利亚的红军粉碎了高尔察克以后，进抵滨海地区，与日本军队接触。那时红军主力正忙于同波兰的战争，因此，根据列宁的指示，在西伯利亚东部的解放区成立了远东共和国。日本在保持滨海地区驻军的条件下承认

了远东共和国。远东共和国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日本占领者把高尔察克残部组织成“白卫起义军”，由它在 1921 年年底进攻远东共和国，占领了伯力，并向共和国首都赤塔推进。人民革命军给“白卫起义军”一系列沉重的打击，1922 年 2 月进行了激烈的沃洛恰耶夫卡战役，打退了敌人，解放了伯力，接着肃清了滨海地区的白军。1922 年 10 月 25 日，人民革命军攻占了海参崴，日本武装干涉者最后被赶出苏维埃领土。1922 年 11 月，远东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合并。

苏维埃国家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联合进攻，保卫住了自己的国家独立和自由生存。

第二章 世界革命运动（1919—1923年）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把各国劳动人民推入苦难的深渊。经济遭摧残，人民挨冻饿，战场上的伤亡数字惊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各国人民日益觉醒。他们要求结束战争，摆脱困苦，革命情绪不断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激荡澎湃，形成了1918—1923年的革命高潮。芬兰、匈牙利、德国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西欧、美国、日本等国的无产阶级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和“不准干涉俄国”运动。意大利无产阶级发动了夺取工厂的运动，农民展开了夺取土地的运动。在亚洲，中国于1919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朝鲜人民于1919年举行“三·一”反日大起义。印度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涨，土耳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汇成洪流，引起了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巨大变动。工人运动组织性的增强和革命力量的团结，促使许多国家共产党诞生、巩固和发展。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几年之内，几十国的共产党团结在它的旗帜之下，这面旗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

第一节 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高潮

德国十一月革命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它拥有集中的工业和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但是也存在着容克地主经济和半专制君主制度这种形式的封建残余。容克地主同垄断资产阶级共掌政权，使德国的内外政策尤其具有反动性和侵略性。

德国人民因帝国主义战争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近二百万人葬身战场，连同被俘和受伤的大约共达七百万人。国内经济凋敝，饿殍载道。1918年秋，德国败局已定。10月底，德国海军司令部命令舰队出海同英国人决战。这种让八万水兵白白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人们极大愤慨。11月3日，基尔的水兵起义成了十一月革命的信号。几天之内，革命浪潮席卷全德。汉堡、不来梅、卢卑克、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都爆发了起义，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成了真正的政权机构，它们赶走了反动官吏，解除了反革命军队的武装，对一些企业实行了生产监督。德国垄断资本的政权动摇了。

11月8日，斯巴达克团和11月初成立的柏林工人苏维埃号召首都工人总罢工，要求废除帝制，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9日，柏林数十万工人和卫戍部队士兵在斯巴达克团的号召下举行起义，粉碎了反动近卫军的反抗，推翻了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德皇威廉二世逃亡荷兰。

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右派社会民主党头子艾伯特（1871—1925年）、谢德曼（1865—1939年）等人攫取了政权。他们勾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首领组成了所谓“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它以“纯粹社会主义政府”的招牌骗取了许多工人、士兵的信任，11月10日召开的柏林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把权力移交给艾伯特的“人民全权代表委员会”。

艾伯特政府保留了全部旧国家机构，留任了德意志帝国的全部官员和将军。艾伯特和德皇军队的总司令、陆军元帅兴登堡签订了秘密合作协定，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他们计划调集十个师，全副武装开进柏林，以消灭工人士兵苏维埃。艾伯特政府甚至还纵容反动军官，搜罗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游民和堕落分子，组织了所谓“志愿部队”的反革命武装，以对付革命的工人和士兵。

12月6日，“志愿部队”聚集在帝国宰相官邸面前宣布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并以“反对艾伯特和谢德曼”为借口试图逮捕柏林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暴徒们还对和平游行的队伍开枪射击，打死十六人，打伤三十人。可是，由于陆军司令部用于包围柏林的“可靠部队”的耽搁，反革命叛乱被驻在柏林的倾向于革命的人民海军师和柏林工人粉碎了。

12月16日，举行全德苏维埃代表大会。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和平和秩序”、“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的口号；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其右派首领操纵下，采取了实际上支持立宪会议的立场；斯巴达克派正确地把立宪会议看作资产阶级政权，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它对抗。但是，代表的构成状况决定了大会的结果。到会的四百八十五名代表中，社会民主党人有二百八十八名之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有八十七名，其中斯巴达克派只有十名。代表大会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操纵下通过了关于召开立宪的国民会议的决议，还通过了在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把全部立法权、行政权交给艾伯特政府的决议。

代表大会闭幕后，艾伯特政府加紧剥夺工人的武装。它下令将具有革命倾向的人民海军师调离柏林。当革命水兵拒不服从时，政府便停发军饷。12月23日到24日，政府派部队袭击水兵和前往援救的工人，酿成流血事件。

政府公然执行反革命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独立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让自己的代表退出政府。革命的进程使越来越多的斯巴达克派成员认清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作用，认识到在组织上同它决裂的必要性。1918年12月底，斯巴达克同盟召开了自已的代表大会，宣布在组织上脱离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

艾伯特政府为了扑灭革命力量，蓄意挑起工人采取反政府行动。它宣布解除在群众中颇有威望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埃赫戈伦的警察总监职务。1919年1月5日，愤怒的柏林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游行，6日柏林爆发总罢工，走上街头的工人达五十万。11日，调兵遣将完毕的政府开始进行疯狂镇压。政府宣布共产党员不受法律保护，许多革命工人被就地枪杀。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1870—1919年）和罗莎·卢森堡（1871—1919年）被捕后遭到反动军官的杀害。

柏林无产阶级的二月战斗引起德国许多地区的广泛响应。4月13日，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以欧根·莱威奈为首的共产党人领导下，击败了反革命势力，宣告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人监督企业的制度，将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存粮分配给工人，成立肃反委员会，建立赤卫队和红军。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5月1日，慕尼黑被反革命军队攻占。红军逐街防守，英勇抗击敌人好几天。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被淹没在血泊中。德国十一月革命就此结束了。

1919年1月19日，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进行了国民会议的选举。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在三千万选票中只得了近一千四百万票，占百分之四十五点五的席位；资产阶级政党得了一千六百多万票，取得百分之五十四点五的席位。2月6日，立宪的国民会议在图林根的一个小城市魏玛开幕。2月11日，国民会议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2月13日，谢德曼组织政府，右派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政府开始执政。

1919年7月底，国民会议完成了制宪工作。8月11日，魏玛宪法生效。德国被宣布为共和国。宪法宣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意味着垄断资本受到国家保护。宪法规定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言论自由、通讯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规定实行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制度，宣布妇女与男子在公民资格上处于平等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但是，宪法中的许多条款严格限制了人民表达意志的机会。宪法规定，政府总理由总统任命，政府对国会负责。共和国总统由普选产生，任期七年，他有权任命总理和部长，担任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特别是宪法第四十八条赋予德国总统独裁大权。根据这一条，“如果在德国境内公共治安和秩序遭到严重的破坏或威胁时”，总统有权动用武力，并宣告宪法规定的民主自由的权利“暂行失效”。德国仍划分为十八个自治邦。宪法规定“国家权利打破地方权利”，规定只有国会及中央政府有对外建交、建立军队、管理财政等权，但各邦权力之大仍足以影响德国之统一。魏玛宪法虽然给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更多的条件，但它再次确认了垄断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的联盟对德国的统治。不同的是：在德皇专制制度时期容克地主居支配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垄断资产阶级居支配地位。

德国 1923 年的革命形势和汉堡工人起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从 1921 年起向战胜国支付赔款。在 1921 年伦敦会议上，战胜国确定德国赔偿总额为二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德国财政破产，要求缓期偿付各种赔款。英国同意，因为它力图利用德国牵制法国，反对苏俄；但法国力图削弱德国，称霸欧洲，坚持要求德国按期如数支付赔偿。在 1923 年初的巴黎会议上，英国建议把德国赔偿数减少到五百亿金马克，并准许德国缓期四年偿付，法国坚决反对，会议不欢而散。德国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拒绝支付赔款。1923 年 1 月 11 日，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十万人占领德国的鲁尔地区。占领区的人口占全德的 10%，但煤产量占全德的 88%，生铁产量占 70%。德国古诺政府宣布“消极抵抗”政策，命令鲁尔的企业一律停工。鲁尔被占和煤铁矿藏停采严重地破坏了德国的经济。全国各地工厂纷纷倒闭，失业工人猛增到五百万。为了把灾难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德国政府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造成了马克暴跌。1923 年 1 月 3 日，一美元值七千二百六十马克，到同年 12 月，已值四万二千亿马克。中产阶级存在银行的储蓄因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人民都储藏货物，“马克如潮水似地变成货物了”。到 1923 年的秋天，德国人民实际上废弃了马克。农民拒绝把农产品运往城市，商人关闭商店，工资的增加远远追不上物价的飞涨。饥饿和贫困笼罩着全国，到处发生反饥饿的暴动，德国出现了革命形势。

人民运动风起云涌。5 月，鲁尔四十万采矿业和冶金业工人举行罢工。6 月，西里西亚十万工人罢工。7 月 29 日，在共产党倡议下，全国举行反法西斯运动日，数百万人参加示威游行。农业工人也投入斗争，西里西亚有十二万农业工人坚持了四星期的斗争。8 月 12 日至 14 日，全国三百万工人举行为期三天的总罢工。总罢工的第一天，古诺政府垮台。新上台的斯特莱斯曼（1878—1929 年）政府于 9 月 27 日撤销“消极抵抗”政策，并下令禁止罢工，实行戒严，让军队进入备战状态。

反动派的进攻使萨克森和图林根这两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地区政治局势十分紧张。1923 年 10 月中旬，在这里建立了由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的两个工人政府。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人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把无产阶级进一步武装起来，并改善劳动者的物质状况。然而，他们却执行了把持党中央领导的布兰德勒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议会制的范围内，窒息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

斯特莱斯曼政府迅速调遣军队开进萨克森和图林根。为了支援工人政府，德共中央决定号召无产阶级举行总罢工，然后使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并要求汉堡工人在 10 月 23 日率先发动。10 月 23 日拂晓，汉堡工人在以台尔曼（1886—1944 年）为首的汉堡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下，投入斗争，袭击警察所，夺取了武器，开始构筑街垒。汉堡工人与政府军英勇激战三天。由于布兰德勒临时取消了各地区武装起义的计划，汉堡无产阶级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寡不敌众，起义遭到失败。

汉堡无产阶级的失败成了反动派在全国各地发动进攻的信号。萨克森和图林根工人政府先后被解散。11 月 23 日，德国共产党遭到禁止，被迫转入地下。

奥匈帝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世界大战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加剧了奥匈帝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1918 年，帝国境内的社会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达到高潮。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所有民族都享

有自决权，对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们知道，如果德、奥在大战中获胜，他们将继续受奥地利人的统治；他们的唯一出路，是指望德、奥在战争中失败，从而摆脱奥地利的统治。

1918年1月14日，当奥匈帝国政府宣布进一步缩减粮食配给量时，全国展开了抗议性的示威游行，然后发展为总罢工。罢工中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一月总罢工影响了军队：兵工厂工人举行罢工，舰队水兵爆发起义。6月份，全国再度爆发总罢工。当时，奥军在特兰托以南发动的攻势又遭惨败，伤亡和被俘士兵共达十万人，这更加激发了革命运动的开展。9月中旬，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巴尔干战线。10月，意大利军队突破防线，以致奥匈帝国的西南面门户洞开。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涨，除工人罢工外，士兵拒绝执行任务，扔下武器，逃散回家。8月，已有十万名士兵逃亡，到10月增至二十五万名。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起来夺取土地，掌握政权。奥匈帝国统治集团陷于绝境。

1918年10月14日，捷克爆发了政治总罢工。10月28日，捷克资产阶级与地主政党领导的布拉格民族委员会宣布建立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两天之后，斯洛伐克民族会议通过宣言，宣布斯洛伐克加入统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已经破产的奥匈帝国，再也无力镇压。布拉格民族委员会没有经过武装斗争就接收了全部政权。1918年11月14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宣布哈布斯堡王朝已被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马萨里克(1850—1937年)当选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新国家的领导职务都落到了资产阶级和地主手中。

在奥匈帝国的南方斯拉夫人地区，工农革命运动同时兴起。武装的农民队伍夺取了地主的田地，试图用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于1918年10月初在萨格勒布召开了人民议会，并着手组织自己的武装部队。但人民议会的军队不能镇压住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于是，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就求助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请它出兵来安定国内的“秩序”。为了防止劳动者夺取政权，萨格勒布的人民议会于10月29日宣布所有南方斯拉夫人地区脱离奥匈帝国。同年12月，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两个独立国家——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联合起来，组成独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10月3日，王国正式改名为“南斯拉夫”。

1918年10月，匈牙利人民革命风起云涌。10月29日，布达佩斯发生大罢工。30日，游行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起义者占领了许多战略据点。11月16日，哈布斯堡王朝政权正式被推翻，匈牙利宣布为共和国，卡罗利当选为总统。

革命运动席卷奥地利本土。10月30日，维也纳工人举行总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建立共和国。实质上是奥地利议会的临时国民会议，为了缓和工人的情绪，急忙让资产阶级及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组成了联合政府。奥地利统治集团原以为由新政府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便可以保持哈布斯堡王朝，但是实际上等于彻底投降条件的停战协定使其处境更糟。在革命运动的压力下，国民会议不得不于11月12日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

在战争失败和革命运动打击下，腐朽的奥匈帝国瓦解了。在原奥匈帝国的范围内产生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独立国家。奥匈帝国统治

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同塞尔维亚联合，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 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卡罗利资产阶级政府没有能力消除经济破坏现象和改善粮食供应情况。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投机猖獗，劳动群众苦难重重，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1918年11月，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其核心是匈牙利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人贝拉·库恩（1866—1939年）、萨穆埃利·蒂波尔（1890—1919年）等人。贝拉·库恩在大战期间被俘到俄国，与布尔什维克党一起战斗，会见过列宁，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他领导下的匈牙利共产党采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日益高涨，军队也受到了革命的影响。卡罗利政府采取镇压共产党的手段，于1919年2月21日，逮捕了共产党的四十名领导人。但是党的领导作用没有被中断。3月中旬，匈牙利的革命形势成熟了，匈牙利十一个州的政府官员被驱逐。劳动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要求释放共产党人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政府原来指望得到协约国列强的支持，但国际帝国主义不仅未满足匈牙利政府的欲望，反而向它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1919年3月20日，协约国向匈牙利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割让三分之二的领土给它的一些邻国。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卡罗利政府被迫辞职。它把政权交给社会民主党人，指望由他们来扑灭革命。鉴于共产党在匈牙利国内的崇高威望，迫于社会民主党内普通党员要求同共产党人联合行动的强烈愿望，社会民主党不敢一党组阁，被迫向共产党提出组成联合政府的建议。共产党提出参加政府的条件是：宣告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红军和人民警察；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业国有化；同苏维埃俄国建立联盟等。社会民主党当时在群众中的威信很低，并且也不掌握能够镇压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因此表示接受上述条件。1919年3月21日，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了。同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合并。匈牙利革命是无产阶级在暴力基础上的和平夺权。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工矿、银行和交通企业收归国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将它交给当地组织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国家企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同工同酬，提高工人工资，改善人民居住条件；消灭文盲，建立八年制的普通教育学校；公民拥有自由选举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代表的权利等。

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引起了帝国主义世界的惊慌和不安。4月中旬，按照协约国的指令，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向匈牙利发动武装干涉，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及法国军队相继发起进攻。5月初，罗马尼亚军队进抵离布达佩斯八十公里的地区，情况危急。匈牙利共产党号召工农群众奋起保卫苏维埃共和国，几天之内就组成了一支十万名武装工人的队伍，挡住了敌人的进攻。匈牙利红军向北挺进，短期内解放了匈牙利的北部和斯洛伐克的许多地区。6月16日，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协约国因红军的胜利而惊慌失措，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代表巴黎和会向匈牙利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匈牙利红军退出斯洛伐克，否则各国认为有权派兵干涉。克里孟梭许诺说，如果匈牙利接受最后通牒，罗马尼亚军队将撤出匈牙利，并邀请匈牙利苏维埃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匈牙利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了

此项最后通牒。拥有多数席位的社会民主党人迫使大会在没有任何保证的条件下接受了协约国的通牒。6月末，匈牙利红军开始撤兵。协约国根本无意履行诺言，既不撤退罗军，又不邀请匈牙利出席和会，相反，加紧了对匈牙利的外部干涉和内部颠覆活动。从斯洛伐克的撤退，使红军士气沮丧；一些地方爆发的反革命叛乱，使苏维埃政权处境更加困难；匈牙利红军决定先发制人的作战计划又由于总参谋长的叛变而泄露。7月下旬，红军进攻失利。8月1日，当罗马尼亚军队逼近布达佩斯的时候，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利用多数迫使苏维埃政府辞职，而代之以纯粹由他们组成的所谓“工会政府”。这样，生存了一百三十三天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了。

不久，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走狗霍尔蒂（1868—1957年）在匈牙利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

意大利的革命和反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意大利带来了经济危机和革命危机。意大利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三年半的战争中它动员了五百二十三万人，伤亡和被俘人数近二百万，欠英、美两国的战债达四十亿美元。意大利是原料匮乏的国家，战后由于购买原料、燃料的外汇不足，工业生产急剧下降。战后归来的工人，陷于失业的境地。战后归来的农民，也没有得到曾被允诺的土地。通货膨胀和物价腾贵，使劳动群众痛苦不堪。

1919年，罢工运动席卷了意大利，罢工人数达一百五十五万。6月中旬，罗马、米兰、都灵、热那亚及波伦亚等城市在“反对物价高涨”的口号下举行了总罢工。在许多城市还发生了群众捣毁粮店、同军警冲突的事件。农村劳动人民也卷进了革命斗争。他们要求政府履行战时对他们许下的分配土地的诺言。1919年6—7月南意大利各地农民展开了夺取荒地的斗争。政府派来的军队往往拒绝向农民开枪。农民运动的压力迫使政府于1919年9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把荒地交给农民合作社暂时使用。

这一时期的运动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意大利社会党未能对运动实行革命领导。当时党内有两个主要派别，即改良主义派和最高纲领派。改良主义派虽是少数派，但把持着议会党团和一些工人群众组织，因此往往左右着社会党的政策。最高纲领派得到大多数党员的支持。它主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谴责改良主义派的机会主义，但借口维护“党的统一”，而不肯与他们决裂。社会党内还有左派，主张同改良主义派一刀两断，但是力量薄弱，而且领导岗位被具有宗派主义的极左情绪的人把持，在群众运动中没有大的影响。

1919年，意大利统治机构风雨飘摇，政府更换频繁。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于1919年1月建立了人民党。为了诱使农民脱离革命运动，人民党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纲领，其中包括通过赎买地主领地的方法把土地分给农民。统治集团中的另一部分人主张使用暴力镇压革命运动，他们决心依靠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组织。

本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年）本是意大利社会党人，作过社会党报纸《前进报》的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他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鼓吹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他被社会党开除党籍以后，接受法国资助，办报纸宣传他的参战主张，还纠合徒众，组织“参战同盟”。1919年3月，墨索里尼由大企业主资助经费，纠集游民和退伍官兵，组织了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党徒经常进行欺骗宣传，如在法西斯运动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但法西斯势力在1919年没有赢得多少支持者，因而在这一年的竞选

活动中遭到惨败，法西斯的候选人一个也没有当选。

1920年革命运动进一步高涨。4月，都灵爆发了总罢工。8月，五金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企业主宣布同盟歇业，这激起了意大利无产阶级声势浩大的占领工厂运动。在北意大利的工业地区运动规模很大，都灵、米兰成了运动的中心。不久，占领工厂运动扩展到意大利中部和南部。数百个工厂处在工人管理之下达三、四周之久。工人们还建立赤卫队、制造武器，以防止政府和企业主的袭击。工人阶级的战斗行动使农村也活跃起来，西西里的农民开始夺取地主的庄园。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由于缺乏革命政党的领导，运动趋于失败。面对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1920年6月上台的乔里蒂政府不敢动用武力，答应实行工人监督企业的法律，并提高工资10—20%。社会党的改良主义派把这些诺言说成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最高纲领派也不去揭露乔里蒂的欺骗活动。受骗上当的工人放弃了工厂。从1920年9月起，革命的工人运动进入低潮。

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使意大利的先进工人认识到：必须建立真正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1921年1月，社会党在里窝那举行代表大会，左派提出的加入共产国际及把改良主义派开除出党的决议案被否决后，他们当即退出会场，宣布脱离社会党。同一天，他们举行了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大会。

占领工厂运动结束后，法西斯势力有了大发展。意大利垄断资产阶级怯于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决定把资产阶级极右的政治势力——法西斯分子推上政治舞台，实行极权政治以巩固统治。法西斯党取得了大资本家的钱财资助，又吸收了大批地富及资产阶级子弟、失业退伍军人和反动大学生等人，开始了所谓“集团行动”的恐怖运动。法西斯党徒身穿黑衫，用蓖麻油、大头棒和手枪屠杀革命人士，袭击工人集会和示威队伍。工人进行反击，意大利处于内战状态。政府对此表面上不加干涉地一旁观看，实际上纵容法西斯党徒对付社会党、共产党。

在1921年5月的选举中，法西斯党徒赢得三十五个席位，于是墨索里尼进入议会。同年11月，他组成全国法西斯党，党徒达十五万之多。法西斯党积极进行夺取政权的准备。

1922年8月，由社会党、总工会等组成的“劳动联盟”宣布政治总罢工，要求建立能对法西斯武装匪徒加以制裁的政府。但是意大利统治阶级扶植法西斯势力反对革命运动的政策根本不想改变。法西斯分子在政府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罢工工人。趾高气扬的法西斯党徒在米兰开会作出决议：要求解散国会。成立了法西斯的最高军事司令部，准备用武力确立极权统治。9月至10月间，法西斯分子一个省接一个省地解散按法律选举产生的政府，确立了自己的统治。

10月24日在那不勒斯举行了法西斯代表大会，除了代表以外，从各地还来了四万名法西斯分子。当天下午，墨索里尼在检阅队伍时，对其喽啰说：“我郑重宣告，目前的形势要求是：或是把政权交给我们，或是我们向罗马进军，夺取它。”法西斯分子以“向罗马进军！向罗马进军！”的狂叫回答他。这时，政府如欲制止法西斯分子夺取政权，是完全有能力的，当时的意军总司令声称：“如果法西斯分子越轨，我保证立即恢复秩序。五分钟的炮火，一切将平安无事。”但是统治阶级不想这样做。10月29日，国王邀请墨索里尼到罗马，请他组织内阁。极端反动的法西斯专制在意大利建立起来了。

第二节 民族解放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亚、非、拉美地区兴起了一个规模空前巨大的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朝鲜“三·一”运动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实行宪兵警察的“武断政治”，剥夺了朝鲜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权力。日本在朝鲜设立的总督府，独揽立法、司法、行政一切大权。在经济上，日本殖民者推行以掠夺土地为中心的政策，通过所谓“土地调查”，强制夺取了大量肥沃土地；同时，增收地租和捐税，致使农民相继破产。微弱的朝鲜工业也受到日本资本的压抑，银行、大中型的企业几乎全都操在日本垄断组织手中。日本帝国主义者还竭力摧残朝鲜文化，毁坏朝鲜古迹，焚烧朝文书籍，强迫朝鲜人接受日语为“国语”。

十月革命的胜利，欧亚革命运动的高涨，鼓舞了朝鲜人民反对日本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1919年1月，被日本废黜的朝鲜国王李熙突然身死，传说是被日本殖民当局毒死的。这一件事成了起义的导火线。人民大批涌到汉城，哀悼朝鲜亡国前的末代皇帝。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孙秉熙等人，于1919年2月决定向日本国会、总督府和巴黎和会请愿，要求允许朝鲜独立。他们选出代表三十三人，作为“朝鲜民族的代表”，起草《独立宣言书》。他们同具有强烈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的代表商妥：3月1日下午，在汉城塔洞公园召开群众大会，由孙秉熙等三十三名“民族代表”登台，在群众面前宣读《独立宣言书》。但是，2月28日他们忽然改变计划，决定不在塔洞公园公开宣读独立宣言。3月1日下午，这群所谓“民族代表”，躲在一家饭馆的二楼上，举杯祝贺朝鲜独立，而且当时就将此事打电话报告日本警察当局，自愿束手就逮。

但是，青年学生仍按原定计划坚决斗争。3月1日下午，在汉城的塔洞公园，几千名青年学生和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群众举行集会。一个大学生登台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宣布朝鲜独立。朝鲜国旗，扬空升起，独立万岁之声，震动天地。大会后，首都街头约有三十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平壤等城市也在同一天举行了示威游行。日本殖民当局不仅动用警察和宪兵，而且调动了正规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于是发生了流血斗争。从3月5日起，示威游行发展为武装起义。起义者捣毁了警察所、日本政府机关和日本显要官员和富翁的邸宅。从3月下半月起，起义几乎扩展到全国。从1919年3月至5月三个月内，在全国二百一十八个府、郡中，有二百零三个府、郡发生了示威和暴动，参加斗争的群众达二百万以上。日本帝国主义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把这次起义血腥地镇压下去。

“三·一”运动充分显示了朝鲜人民的爱国的革命传统和坚强的斗争精神。“三·一”运动以后，朝鲜进入了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阶段的新时期。

1919—1922年印度民族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从印度征调了约一百五十多万士兵和价值二亿多英镑的粮食和物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的重担首先落在劳动人民身上。对农产品的强制征购，赋税的不断提高，使大量农户遭到破产。1918—1919年，印度发生了大饥荒和流行性

感冒，夺去了一千二百多万印度人的生命。印度人民和英帝国主义的矛盾趋于激化。

1918年7月，英国为了缓和印度人民的反抗，抛出了一个由英国印度事务大臣孟塔古和英国驻印度总督柴姆斯福德联合署名的关于印度政府组织法的“改革方案”，其主要内容有：（1）在总督下设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由于总督有权否决它的任何决议，立法机构形同虚设。（2）在各省的政府里，一些次要的部门如卫生、国民教育等交给由英国省督（省长）任命的印度厅长去管理，而警察、财政等重要部门及中央政府的各部门仍然留在英国人手里。孟塔古——柴姆斯福德方案虽然得到印度上层分子中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平息不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

1919年3月，在总督授权之下，法官罗拉特颁布了一项法案，规定英国殖民当局有权逮捕任何一个有反英活动嫌疑的人，不经审讯就可判处监禁或服劳役。罗拉特法案引起了印度广大人民的愤怒，全国纷纷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伊斯兰教徒同印度教徒联合起来，进行斗争。

事态的发展促使印度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大会党采取较为坚决的策略。当时国大党的领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莫汉达斯·卡尔姆昌德·甘地（1869—1948年）。他提倡一种叫“萨提亚格拉哈”（意思是坚持真理）的学说，主要内容是坚持非暴力原则。甘地认为，这是印度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甘地不忌讳人民群众，他懂得不把人民群众吸引到民族解放斗争中来，是不能取得对英帝国主义的胜利的。在短时期内，甘地获得很高的声誉。人民称他为“圣雄”。国大党根据甘地的提议，号召人们于4月6日举行全国性的罢业，全日斋戒祷告，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抗议罗拉特法案。人民群众响应了号召，4月6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业和示威游行。有的地方，群众同警察发生冲突。英国殖民当局决定用武力镇压印度人的反抗。

4月10日，英国当局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城逮捕了两名民族运动活动家，企图把他们驱逐出城。居民要求释放被捕者，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起义人民控制了城市，英国将军戴尔率领殖民军进城，实行戒严。4月13日，约有二万名印度人在一个广场上举行集会，抗议把两名民族运动活动家驱逐出旁遮普。英国殖民军未作任何警告就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约一千人，打伤二千多人。

英国殖民者本来企图借阿姆利则大屠杀吓倒印度人民，结果却激起旁遮普全省的反英怒潮，城乡人民纷纷起义。在某些地方，起义者破坏了铁路，颠覆了军用列车，炸毁了桥梁，捣毁了警察所、监狱和官署。全国也以大规模的罢工和起义回答英国人在旁遮普的暴行。在纺织中心阿默达巴德，罢工工人不顾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号召，展开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占领城市两天，号召赶走英国统治者。1920年上半年，工人罢工达二百次，参加人数达一百五十万。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印度孟买二十万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罢工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1920年初，印度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

在反英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国大党提出了领导斗争的主张，企图把斗争控制在非暴力的范围里。1920年秋，国大党通过了甘地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计划，企求以此达到印度自主的目的。这个计划规定了一系列有步骤的措施：第一，所有印度人拒绝英国政府颁发的官爵封号；第二，拒绝在法院和政府机关工作，不进英国人办的学校，抵制英国商品；第三，普遍拒绝纳税。国

大党关于开展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受到了印度居民的热烈响应。国大党和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甘地的声誉益隆。国大党改组成为群众性的大党。除中央领导机构以外，在各地设立了支部。

不合作运动开展起来了。到处举行群众大会，国大党的活动家们在会上发表演说。许多人抛弃政府机关的工作，抵制法院，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在广场上焚毁英国货。许多地方人民拒纳租税。

在这个阶段，除工人继续举行罢工斗争外，农民运动特别迅猛地发展起来。1921年3月，在旁遮普省信奉锡克教的“阿卡利”派（阿卡利是“永生”的意思）教徒，起来反对神庙方丈加在他们身上的封建剥削。“阿卡利”运动很快具有反帝性质。直到1923年初，英国殖民者使用了逮捕和屠杀手段，才把这次运动镇压下去。1921年8月，南印度马德拉斯省马拉巴尔海岸地区的伊斯兰教农民（称为“摩普拉”）发动了起义，反对英国当局支持的印度教徒地主。起义者在占领的地区建立“哈里发王国”，坚持了半年多的武装斗争。在北方的联合省，农民的斗争在1921年发展成为起义。农民袭击地主庄园，夺取粮食，拒绝交纳地租。在奥德成立了“农民反对地主协会”取名“爱卡”（意为团结）。1922年2—3月，“爱卡”领导的运动发展成为农民战争。英国殖民者出动了正规军，才把“爱卡”运动镇压下去。

正当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英帝国主义恐慌万分的时候，国大党及其领导人甘地对运动超出自己控制的非暴力范围惶惶不安。1922年2月，联合省的曹里曹拉村农民举行游行，遭到警察射击。愤怒的农民袭击并烧毁了警察所，烧死了二十二名警察。这件事本身不是罕见的现象。当时在印度许多地方也发生过这样的、甚至规模更大的冲突。但这件事成了甘地停止运动的借口。1922年2月12日，国大党通过了决议，对曹里曹拉群众“惨无人道”的行为表示遗憾，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停止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并要求农民恢复交租纳税。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就这样结束了，人民的反帝斗争走向低潮。

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土耳其是一个日益衰落的封建帝国——奥斯曼帝国。大战爆发后，土耳其站在同盟国方面参战，实际上沦为帝国主义的“保护国”。战败的土耳其，面临着被协约国列强瓜分的危险。1919年5月，希腊军队在英国指使下占领了伊兹密尔后，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土耳其兴起。

在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中，贫苦农民是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人数少，约六、七万人，既无工会，又无政党，所以未能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中部称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商业资产阶级，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毅然与投靠英帝国主义的素丹（即土耳其君主）政府决裂。民族资产阶级成了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运动的核心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军官组成的。安纳托利亚成了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1919年7月和9月，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的组织“护权协会”，在埃尔祖鲁姆和锡瓦斯两次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以穆斯塔法·基马尔（1881—1938年）为主席的代表委员会，负责领导反帝斗争。

在代表委员会的要求下，素丹于1920年1月初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土耳其议会。素丹及其靠山英帝国主义者指望通过议会的召开取消“非法”的代表委员会。但是基马尔派在议会上取得了多数，使议会于1920年1月28日

通过了一项纲领性文件——《国民公约》。《公约》要求实现土耳其的统一、独立和自由，因此，它成了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

协约国帝国主义决定采取镇压手段对付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1920年3月16日，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伊斯坦布尔。议会被解散，几十个议员遭逮捕，并被流放到马耳他岛，只有部分议员逃到了安纳托利亚。首都的政权操在英军司令部之手。军事法庭缺席判决基马尔死刑。基马尔于1920年4月在安卡拉自行召开了新的议会，取名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员都是代表各地护权协会的。大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权，选举了基马尔为主席。议员们组成了对议会负责的政府，也是以基马尔为首。议员们宣誓忠于国民公约，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斗争。

1920年6月，由英国提供给养和装备的希腊军队，充当干涉军的角色，从伊兹密尔地区进攻安纳托利亚腹地。协约国列强以为基马尔派的抵抗很快就会被击溃，所以逼迫素丹政府于这一年8月签署了色佛尔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土耳其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领土，只保有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隅之地。但是土耳其人民拒绝接受色佛尔条约，对外国干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苏维埃俄国宣布承认基马尔政府，并于1921年签订了苏土友好条约，给予土耳其人民可贵的援助。

基马尔政府依靠人民的支持和苏俄的援助，并利用了英、法、意等国之间的矛盾，屡屡击败素丹政府军和外国干涉军。意大利和法国先后同基马尔政府签订协定，同意从土耳其领土上撤军。1922年8月，土耳其国民军发动总反攻，9月，击溃了希腊干涉军，解放了伊兹密尔和安纳托利亚全境。接着，基马尔接管了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素丹穆罕默德六世逃上英国军舰请求“保护”。11月1日，基马尔宣布废除素丹制。

土耳其人民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粉碎了协约国瓜分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1923年7月，协约国和土耳其在瑞士洛桑签订的和约，废除了色佛尔条约中的一些不平等条款。土耳其本部的疆土得以保持完整，协约国占领军撤出伊斯坦布尔和两海峡地带，外国的财政监督和领事裁判权都被废除。土耳其的独立终于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1923年10月，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基马尔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1924年3月3日，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了。

埃及独立运动 埃及自从1882年被占领后，实际上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在法律上仍属奥斯曼帝国版图。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英国借口土耳其为交战国，趁机取消奥斯曼帝国对埃及的宗主权，正式宣布埃及为它的“保护国”，把埃及变为英国部队的军事基地。英国不仅从埃及掠走大量物资，而且不顾它承认埃及守中立的事实，仍然强行征召埃及人入伍充当炮灰。苛捐杂税，物价腾涨，殖民者的压迫和侮辱，使群众受尽折磨，埃及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

1918年11月13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两天，埃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运动活动家柴鲁尔（1860—1927年）等三人在同英国高级专员谈话中，提出准许埃及完全独立的要求。同一天他们组成一个代表团（阿拉伯语叫“华夫脱”），其任务是到伦敦去同英国政府进行关于取消保护制度的谈判，然后到巴黎参加和会。他们为了获得全民族代表的资格，在国内发起一

个签名运动，要求各界代表在他们拟订的一份委任书上签字。该委任书说：“大家委派我们……尽可能地用合法的和平方式争取独立”。华夫脱派的要求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埃及全国展开了抗议运动。1919年3月，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柴鲁尔等四名华夫脱派领导人，并把他们流放到马耳他岛。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爆发了声势更大的抗议运动。大学生罢课，工人和职员相继罢工，到处举行示威游行，运动很快演变成武装起义。农民卷入起义，夺取地主和外国公司的土地，袭击运载英军的列车，破坏铁路和电线。几乎整整一个月，殖民统治陷于瘫痪。4月，英国军警血腥地镇压了起义。为了缓和埃及人民的反英情绪，英国当局不得不释放华夫脱派的领导人，并允许他们前往巴黎。但是，华夫脱派在巴黎和会上也一无所获。

1919年3月起义后，学生上街游行、公务员和律师罢业等活动仍然时有发生。1919年底，英国政府派遣米尔纳勋爵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埃及，名义上是“调查埃及最近骚乱的原因”，实际上是试探与埃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的基础。1920年8月，米尔纳向当时在伦敦的柴鲁尔提出了一项条约草案。他提议在保留英国在埃及享有特权的条件下给予埃及“自治”，这就是所谓“米尔纳方案”。这“方案”在埃及一公布，华夫脱派大部分人表示乐于接受，但人民群众却掀起了愤怒的反对风暴。柴鲁尔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代表华夫脱派拒绝了“米尔纳方案”。

1921年12月，当示威风潮再起的时候，英国当局又逮捕了柴鲁尔等人。这又一次使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成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激战场所。起义虽然又被镇压下去了，但英国被迫考虑改变殖民统治的方法。1922年2月，英国发表宣言，取消对埃及的保护制度，并宣布埃及为“独立王国”。但是同时声明，英国保留一些重要权利，如继续在埃及驻兵，控制苏伊士运河，保障外国资本家在埃及享有的特权等。这样，埃及实质上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阿根廷的革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各国因对交战双方供应战略原料和粮食，民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中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等国尤为显著。但是这些国家还是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它们的经济命脉仍操纵在帝国主义国家手里。

世界大战一结束，世界市场对阿根廷的主要出口货——农业原料和粮食的需求急剧下降，加上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肉类、棉花在国际市场上同阿根廷竞争，阿根廷的经济状况恶化了。资产阶级、地主和外国垄断组织用降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办法，即削减工资、增加赋税的办法来补偿利润的损失，引起了工人罢工斗争的高涨。

从1918至1921年的短短三年间，阿根廷工人就发动了八百六十次大罢工，参加罢工的人数达七百多万人次。1919年更达到了罢工的高潮。1919年1月7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工厂工人举行集会时，遭到警察开枪射击。这次屠杀引起了普遍的愤怒。1月9日，爆发了全市总罢工，二十万罢工工人为死难战友举行葬礼，送葬行列又遭到军警的射击，愤怒的工人立刻夺取军火库的武器，筑起街垒，同军警展开巷战，工人控制城市好几天。最后，军队开炮轰毁街垒。几千工人的鲜血染红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起义于1月15日被伊里戈延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这次惨案在阿根廷的历史上被称为“流血周”。

1919—1921年间，在阿根廷中部潘帕斯大平原和南部巴塔哥尼亚高原的一些省份，农业工人展开了罢工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有的

地方还举行了起义。

战后，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如巴西、智利、秘鲁、墨西哥等国家的劳动人民，都掀起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

第三节 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初期活动

共产国际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各党内存在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分歧更加明显。右派的路线是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和平并全力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中派追求资产阶级和平；而左派根据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巴塞尔会议的决议，要使群众的反战情绪转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战争。被右派、中派机会主义领导人控制的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站到资产阶级方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为了推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各国左派，为建立一个新的革命的国际而斗争。

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列宁在这次会上把左派国际主义者组成了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与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了斗争。1916年4月，在瑞士的昆塔尔举行了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促进了各国左派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新的国际奠定了组织基础。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把“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列为党的任务之一。布尔什维克党的四月会议也作了相应的决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战后各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以及共产党在一些国家的建立都为加速建立共产国际提供了前提条件。

1919年1月，在列宁的主持下，苏俄、波兰、匈牙利、奥地利等八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各个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号召书，请它们参加建立新国际的代表会议。

为了抵制国际主义者力量的增强，社会沙文主义者决定恢复第二国际。他们于1919年2月在瑞士伯尔尼召开了和解会。代表二十六个国家的一百零二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像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凡尔赛和会上一样，“社会主义的政治家”在伯尔尼激烈地争辩着战争责任问题。应该被责难的叛变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没有受到斥责，战败的德国人被大骂了一顿。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为自己辩解，却又含羞地在认罪。他们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既然推翻了德皇政权，就表明他们“决心以实际行动全力去建设被战争破坏了的世界”。最后，他们被“饶恕”了。伯尔尼会议慑于群众对俄国革命的同情，不敢作出公然否定它的决议，但在有关“民主与专政”问题上，会议原则上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赞成资产阶级民主。第二国际复活了，机会主义者为了使群众脱离革命斗争而重新携起手来。

八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号召书，得到了许多工人政党肯定的答复。1919年3月2日到6日，来自欧洲、美洲、亚洲三十个国家的五十二名代表，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成立大会。列宁主持开幕，在开幕词中表达了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信念：“尽管资产阶级还在横行霸道，还在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但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3月4日，列宁就代表大会议程上的主要问题即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提出了提纲并做了报告。当时机会主义分子为剥削者的统治作辩护的主要论据是斥责专政和维护民主，因此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所以列宁的提纲和报告具有重大的意义。列宁首先指出，谈论“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不提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似乎是站在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实际上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他说，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

“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即少数剥削者的民主，对广大劳动者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却是多数劳动者的民主，是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列宁作出结论：借谈论“一般民主”来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借斥责“一般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公然背叛社会主义，实际投降资产阶级，否认无产阶级有革命的权利。列宁的提纲被大会一致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路线成了共产国际各国党共同的革命路线。大会还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告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大会还通过决议，取消齐美尔瓦尔得联盟；建立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大会决定由下届代表大会制定章程。大会建立了两个领导机构：由每个党选举一名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然后再产生一个五人的执行局。季诺维也夫被选为主席。第三国际就这样诞生了，它在世界的革命风暴中担任了重要的任务。

共产国际建立的时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处在汹涌澎湃的高涨时期，共产主义思想更加深入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心坎，各国纷纷建立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申请加入共产国际。据统计，到1920年为止，全世界已建立了二十七七个共产党。由于工人群众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向往，第二国际最有势力的政党，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都声称退出第二国际，申请加入第三国际，加入共产国际已成为时髦的事情了。另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不久前才在组织上脱离社会民主党，因此尚未完全摆脱机会主义的影响，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自右倾改良主义的危险。同时，一些国家共产党中的所谓“左派”人物，反对共产党员参加议会活动和参加改良主义工会工作，使党有脱离工人群众，走上宗派主义道路的危险，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存在着“左”倾的危险。

为了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倾危险和“左”倾偏向，列宁于1920年春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列宁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列宁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1917—1920年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它无情地揭露了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卑鄙龌龊和恬不知耻。这种露骨的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另一个敌人乃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缺乏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时而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表现为极“左”，时而转向消沉颓丧，醉心于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接着列宁指明并分析了“左”倾错误的种种表现，得出结论说，不克服“左”倾错误，就不能引导群众跟着党去争取革命的胜利。列宁号召共产党员，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去工作；要善于把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以妥协，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列宁还提醒各兄弟共产党不要忽视各国的特点和具体历史条件，在实践活动中要排除僵死的公式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的这一著作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武装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开幕。从7月23日到8月7日，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四十一个国家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在第一次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列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粉碎机会主义，就不能夺取政权。他说：“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

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实际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运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工人要不是由他们来领导，资产阶级就无法支持下去。”__列宁揭示了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从剥削被压迫人民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拨出一小部分对工人领袖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使这批人对共产主义运动进行顽固的抵抗，这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报告中列宁还谈到了要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渗入各国年轻的共产党，保持共产国际组织的纯洁性，代表大会批准了列宁起草的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条件规定：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每一个党必须很好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撤消机会主义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职务；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决裂；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订党纲；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确定党的名称为：某某国家的共产党（第三共产国际支部）。“二十一项条件”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有力地阻止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混入共产国际，从而保证了共产国际的纯洁性。

在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土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就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了报告。列宁认为，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在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彼此接近起来。在第二国际时代帝国主义列强把世界作为殖民地分割完毕，可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不但不关心广大被压迫人民和民族，反而支持他们国内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当时列宁多次劝导第二国际采取支持民族自决权的政策，遭到拒绝。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指明：各国共产党必须直接帮助附属国或不平等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承认他们有国家分离权。列宁在报告里还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__为了帮助殖民地人民培训干部，1921年在莫斯科设立了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在土地问题上，列宁草拟的提纲着重指出，无产阶级应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各类农民：全力援助农业无产阶级（农业工人）、半无产者和小农，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专政方面来；中立中农；坚决打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反抗，并要把劳动农民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影响下解放出来。应该立刻无条件地没收地主和大土地占有者的一切土地。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村劳动群众只有结成联盟进行斗争，才能摆脱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制的压迫。

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各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工人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共产国际“二大”以后，世界形势有了一些变化。苏维埃俄国已经巩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持续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先后遭到了失败，资产阶级的统治暂时得到巩固。当时，新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还未能把工人阶级大多数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工人的基本群众仍然处在右派和中派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1921年2月在维也纳召开了十一个社会党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叫“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在政治上，它是一个中派的组织，一般被称为“第二

半国际”。在口头上，它不惜用革命词藻反对第二国际领袖的、粗暴的反革命活动，但在实际上反对共产国际的革命行动；它企图树立一道围墙，阻碍工人群众转向共产国际的领导。第二半国际貌似保持中间路线，而在一切问题上显然还是接近第二国际的。无怪乎两年以后第二半国际合并于第二国际了。

在新的复杂的情势下，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具有巨大意义。共产国际向各个支部提出了争取群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

1921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世界大战并没有以世界革命的必然胜利而告终，帝国主义时期变成了一个漫长的社会革命时代。世界革命进程趋于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强大的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即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本来是无产阶级为了与资产阶级作斗争而建立起来的，但在大战期间及战后时期却变成了散布反革命影响、陷害无产阶级的机关。工人阶级大多数还处在它们的影响之下。因此，大会认为，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争取群众。大会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大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要求各国党在职工会、青年、妇女的各种组织中进行具体工作，把群众引向革命道路。

接着，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提纲。建立工人统一战线就是把所有准备同共同敌人——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行动统一起来。提纲指出，共产党可以同社会党签订统一战线协定，但在说明自己观点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方面，必须保持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因为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希望通过统一战线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义策略是正确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要通过统一战线，把工人团结的愿望引导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轨道上来。

1922年11—12月间，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后移到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讨论了统一战线策略的问题，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1年12月制订的统一战线策略提纲，作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口号，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的主要口号。

1919年至1923年期间，列宁亲自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前期活动，反对了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培育了各国年轻的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章 帝国主义的新秩序

第一节 巴黎和会

巴黎和会的召开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出席的有战胜国阵营的二十多个国家。苏维埃俄国被剥夺了参加和会的权利。由英、法、美、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的政府首脑和外长组成的领导机构即“十人会议”主持会议。实际上英、法、美三国操纵和会，英国首相劳合·乔治（1863—1945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1841—1929年）和美国总统威尔逊（1856—1924年），于严守秘密之中举行会议，决定和会的一切重大问题。克里孟梭被选为和会的主席。

战胜国在战胜德国及其盟国以后，着手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计划。德国被公认为使世界惨遭浩劫的元凶，现在只得听凭征服者的摆布；德国的盟国也听候发落。英、法、美、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关心的是如何在有利自己的条件下瓜分战后世界。它们之间矛盾重重，既互相利用，又互相争夺。英国外相贝尔福因此忧心忡忡地说：“看来，和会将变为一个动荡不安的场所。”

帝国主义和平只是帝国主义各国实际力量对比的记录。大战结束后，法国成了欧洲军事上最强的国家。法国统治集团凭借这种威势，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重分世界的庞大计划，其目的是要肢解德国，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它要求在莱茵河西岸建立由法国控制的莱茵共和国，在德国南部建立巴伐利亚国，占有德国的萨尔煤矿，收回被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夺去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夺取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还要求德国付出巨额战争赔款。但是法国不可能实现其全部计划，因为它在战后通货膨胀，对美、英负有巨额战债，加上战时人口锐减，处境相当困难。这一切削弱了法国的地位，迫使它不得不向它的盟国让步。

英国的计划是要求取得德国的殖民地和土耳其的属地，摧毁德国舰队，保持自己的海上霸权。英国反对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力求在中欧保留强大的德国，维持法德均势，使它们互相牵制。英国所依靠的首先是它的海军优势。尽管其海军在战时损失很大，但实力仍然甲天下。不过英国经济上困难很大，在世界市场上敌不过美国和日本，在财政上沦为美国的债务国。这种情况使英国政府也难以实现其全部计划。

美国在战后成了欧洲的债权国。大战期间，欧洲各国都靠美国供应武器、装备、原料和粮食，价格听凭美国垄断组织规定，并且是用黄金支付的。因此，到战争结束时，美国集中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左右。美国的计划包含在1918年1月8日威尔逊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十四项和平条款”中。这是一个披着和平外衣的称霸世界的计划，其中心条款是建立国际联盟，美国打算通过它来加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美国不直接要求瓜分殖民地，却提议建立国际联盟委任制度，即以国联的名义把殖民地委托给战胜国统治。美国政府还要求海上航行自由、“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以便取得最有利的经济扩张条件。在德国问题上，美国也不想过分削弱德国实力，力图使德国变成反对法国、削弱英国的工具。美国也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它的武装力量同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其海军论吨位及战斗力远逊于英国，其开赴欧洲的远征军的实力远逊于法国。

意大利没有多大的军事或经济实力，它只关心根据与协约国签订秘密军

事条约时所许诺给它的领土并入自己的版图。

日本在大战期间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和太平洋北部的殖民地，并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经济阵地。日本对欧洲事务还不很关心，其主要目的是要求独占中国。

巴黎和会是一个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列强因分赃不均而激烈争吵，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举例说，讨论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殖民地和土耳其属地问题时，各大国都提出了自己盘算已久的要求，引起了争执。克里孟梭要求把法国边界推进到莱茵河，美国和英国同声反对。法国要并吞鲁尔矿区，克里孟梭强硬宣称，任何一个法国总理都不会签署一项不把萨尔归还法国的条约。威尔逊说：“这样看来，您是希望我回家啦？”在一次讨论土耳其属地的归属问题以后，威尔逊对人说：“我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各持己见。”

凡尔赛体系 帝国主义列强经过了五个 见图版（34）多月的争吵，于1919年6月28日，同德国代表在凡尔赛宫签署了和约，巴黎和会才告结束。凡尔赛和约洋洋大观，包含十五部，许多部下面设编、章，总共四百四十条。

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规定：禁止德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德国只能拥有十万名官兵的军队和三十六艘军舰，不得拥有军用飞机、坦克和潜水艇；德国要拆除西部边境线上的防御工事，但是保留东部边境线上的防御工事。

和约的领土条款规定：德国放弃一切殖民地；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交给法国开采十五年，萨尔区由国联代管十五年，期满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归于法国还是德国。莱茵河西岸由协约国军队占领十五年，东岸五十公里以内区域划为非武装区。和会确定的德波边界，把历来属于波兰的一些地区仍留给德国。波兰取得一条狭窄的通海地带。格但斯克没有划入波兰版图，成了国联统治下的“自由市”。此外，比利时、丹麦、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都得到一些地方。总起来说，德国失去了原有领土的八分之一，但却留下了十万平方公里原属波兰的领土。

根据和约规定，德国所有的殖民地由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以“委任统治”的形式加以瓜分。德属东非洲的大部（坦噶尼喀）为英国所得。多哥和喀麦隆被英法瓜分。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得到德属西南非，澳大利亚得到新几内亚岛的德属部分，新西兰得到西萨摩亚。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

中国的山东省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争论了好几个月。世界大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侵占的权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理所当然应该收回，但日本却要求在和约中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交给日本。美国起初反对日本觊觎山东，它打算用“门户开放”这个口号抵制日本，同时把自己的势力渗入中国。在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刻，日本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不参加国联而与德国联合为威胁。日本的要求得到英法等国支持，美国也背弃了它多次说过的“援助”中国的诺言。和约的规定满足了日本的要求。由于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战胜国在赔款数额问题上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和约的经济条款只规定德国应于1921年5月1日以前清付第一期赔款二百亿金马克。关于各战胜国如何分配德国赔款问题，连同确定赔款数额问题，均交给由美、英、法、意等国组成的赔偿委员会解决。

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战胜国又和德国的盟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和约。1919

年9月10日在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和约确认奥匈帝国解体；承认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的独立和这些国家的疆界；并禁止在种族上或语言上有密切关系的德、奥两国合并。1919年11月27日，在巴黎城郊纳伊与保加利亚签订了和约。规定把西色雷斯割让给希腊，从而使保加利亚失去了爱琴海上的出海口；规定保加利亚必须偿付相当于它战前国民财富总数四分之一的巨额赔款。1920年6月4日，在凡尔赛的大特里阿农宫与匈牙利签订了和约，和约重述了圣日耳曼和约的主要条款。1920年8月10日，在巴黎近郊色佛尔与土耳其素丹政府签订了和约，使土耳其丧失了四分之三的领土；在安纳托里亚还划定了法、意的“势力范围”；规定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无论平时或战时，都应对各国商船和军舰开放。但当时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粉碎了这个掠夺性的和约。后来在1923年，战胜国与基马尔政府重新签订了洛桑和约。

战胜国对德国及其盟国所签订的这一系列和约，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凡尔赛体系。把第一次大战中形成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固定了下来，但是协约国之间仍然矛盾重重，而且又招致了战败国的仇恨，因此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又在新条件下尖锐起来。而且凡尔赛体系违背了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侵犯了许多弱国的权益，因此它是脆弱的、不稳固的。

国际联盟 1914年4月28日，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盟约，被列为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后来又列入对奥、保、匈各和约内，作为各和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国际联盟正式宣告成立。国际联盟声称，其目的在于“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和平与安全”。国联盟约规定，凡对国联一成员国从事战争的任何一国即被认为对国联所有成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成员国应给它“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的制裁，甚至“各出陆、海、空之实力组成军队，以维护联盟盟约之实行。”（见第十六条、十七条。）盟约确立了国联委任统治制度（见第二十二条），把战败国的殖民地委托给一些战胜国统治。国联的行政权由全体会员国代表组成的大会和行政院行使，行政院由美、英、法、意、日五个常任理事国和由大会按期选出的四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另外成立常设秘书处经办一切事宜。当时在国联盟约上签字的有四十五个国家，战败的同盟国家不许加入。

国联盟约虽然虚伪地写上了对侵略国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的条文，但又规定大会或行政院的决议需要得到出席会议的会员国全体同意才能成立（见第五条），所以制裁侵略成了一句空话。统观国联存在期间（1921—1946年）的活动可以知道，国联在牵涉小国的事件上颇能施展其权力，但在牵涉大国的事件上，只能听凭列强的意志。

建立国际联盟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极力鼓吹的。美国企图借此欺骗世界舆论，以取得巴黎和会和国联的领导地位，实现自己称霸世界的野心。在英、法、日等国的强烈反对下，美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因此，美国国会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拒绝参加国联。这样，国际联盟就为英、法所操纵。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

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 凡尔赛体系诸条约肯定了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但是美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的外交斗争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它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又大大缩小了凡尔赛体系的作用范围。巴黎和会未能对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作出安排。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又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问题如不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就不能认为已经结束。战后的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且是英、法、意诸国的大债主。它为了夺取这一地区的霸权，首先为取得掠夺中国的霸主地位，开展了斗争。

美、英两国的矛盾由于争夺销售市场、投资范围和原料产地而日益尖锐。美国竭力渗入英国人所控制的我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在东南亚各国也与英国发生利害冲突。美、英两国加强了海军军备竞赛。191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1916年制定的海军建设计划，决心使美国舰队到1924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这是对英国海上优势的直接挑战。美国凭借其在战争中增强的经济实力，利用英国的财政困难，对英国施加压力。美国人要求英国政府偿付八亿五千万英镑的战债，从而动摇了英国在世界信贷市场上的地位。美国还反对英日同盟。这个同盟缔结于1902年，最初以反俄为目标，以后以反德和部分反美为目标。这项同盟条约为期十年，于1911年延长十年，1921年期满。美国战后的一项外交任务就是要拆散这个同盟。因此，英美斗争尖锐，它们的竞争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关键。

战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和日本的矛盾。大战期间，英法忙于应付欧洲和近东战事，美国忙于占领拉丁美洲市场，日本却乘机加强对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侵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争得了很多利益。日本经济、政治力量的显著增长，使美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美国为了削弱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于1918年6月提出了建立国际银行团以垄断对中国的信贷的方案。显然，美国人将在银行团中占主导地位。受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中国段其瑞政府拒绝了美国的计划。战后，远东市场对美国资产阶级的意义越来越大。在1920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该运河大大缩短了美国重要港口同远东之间的航程。此后，争夺远东特别是争夺中国的斗争，在美国对外政策中被提到了首要地位。

美国和日本的侵略集团都开始公开谈论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两国都疯狂地扩建海军。美国把海军主力从大西洋调到了太平洋。海军基地问题对于争霸太平洋是极端重要的，在这方面日本比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日本拥有一连串的海军基地，南自我国的台湾起，经琉球群岛和日本本土，至北方的南库页岛止。此外，日本尚有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作为其前哨线。这一切就为日本在太平洋西部造成了相当稳固的战略地位。1921年，美国情报局侦知，日本和英国正在建造的某些军舰，其吨位超过美国所建造的军舰。美国拥有比英、日两国大得多的财政能力来继续进行海军竞争，但这需要时间。此外，美国还受巴拿马运河通过能力最高额的限制，三万五千吨以上的船只不能通过该运河。美国的有识之士知道，美国对战争还没有准备好。

这些情况就是促使美国政府发起召开国际会议来讨论远东和太平洋问题的主要原因。

华盛顿会议 1921年7月，美国国务卿休斯宣布即将在华盛顿召开国际会议，讨论限制海军军备及太平洋和远东问题，邀请有关国家参加。美国的提议被英、法、意、日等国接受。8月，美国向有关与会国家发出正式邀请书。1921年11月12日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法、意、比、荷、葡和中国的代表。美国在会议中居于主导地位。列入会议的正式议事日程的问题有：（一）海军军备的限制，以及使用新式战争武器的规则；（二）太平洋问题及远东问题。

华盛顿会议的议事日程上没有正式提出英日同盟问题，然而它却是基本问题之一，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达成“限制”海军军备的协议。美国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废除英日同盟。英国与日本虽有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矛盾，却不愿意过份损害日本的利益，所以英国主张用英美日三边协定来代替英日同盟，以保障三国在远东的相互利益。美国拒绝了英国这种变相保留英日同盟的企图，坚持邀请法国参加协定。法国在对德问题上以及在争夺远东的斗争中，与英国矛盾尖锐，而法国对美国又负债累累。因此，美国认为，把法国拉进协定，可以增强美国同英日角逐的势力。1921年12月13日签署了美英日法四国条约。条约规定，各缔约国尊重彼此在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权利，一旦这种权利遭受“任何国家侵略行为”的威胁时，缔约各国应进行协商，就应该采取的措施达成协议。条约中有一条款规定，本条约批准生效后，英日同盟即告失效。四国条约的签订是美国的一个胜利，因为该条约用体面的形式埋葬了英日同盟。

在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提出了关于裁减海军军备的建议。英国受制于财政困难，只得同意美国的建议。日本在讨论具体方案时，反对美国提出的美、英、日主力舰 $10:10:6$ 的比例，而坚持 $10:10:7$ 的比例。美国人威胁说，要是日本坚持下去，那么日本造一艘军舰，美国就造四艘军舰。日本人被迫让步，但附有一条件，即美国人不得在太平洋上建筑海军基地。美国在英国支持下提出裁减陆军的问题。美国人想削弱日本在中国的阵地，而英国人则想动摇法国在欧洲和远东的阵地。由于遭到法国、日本、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反对，这个问题成了悬案。关于限制潜水艇和空军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然后迫于英美的压力，法国不得不接受了给它规定的海军吨位限额。

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激烈争执，美、英、日、法、意五国代表于1922年2月6日签署了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所谓五国条约。条约规定各该国主力舰的吨位比例如下： $5:5:3:1.75:1.75$ 。经过美国力争，各国终于同意禁止建造排水量超出三万五千吨的主力舰（巴拿马运河最大通航能力）。

五国条约的通过意味着英国被迫放弃所谓“双强标准”的政策，即放弃建造相当于世界上其他两支最强大的舰队总和的舰队。但英国坚决拒绝了对巡洋舰的裁减，相对地保持了海军的优势。日本也受到了打击和限制，但它争得了一项补偿规定：禁止在距离日本五千至六千公里以内建筑海军基地。这项规定剥夺了美国在菲律宾、关岛和阿留申建筑海军基地的权利，有利于日本舰队称霸亚洲海洋。

中国军阀政府慑于人民反帝斗争的压力，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正当要求：取消凡尔赛条约上关于山东的条款，要日本放弃“二十一条”，中国享有财政和关税自主权，撤销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势力范围”，废止外国在华的“租借地”，撤出外国军警等。但是日本早就提出了参加华盛顿会议的条件：会议不得讨论既成的事实或纯属个别国家的问题。日本企

图把中日之间的各种问题一笔勾销，使它们不能在会上提出。所以华盛顿会议对中国问题只限于一般原则的讨论，具体问题由中日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而英美代表则以“调解”的身份参加。由于美日矛盾，中国政府的一些反日要求，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1922年2月4日，日中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日军撤出山东，归还胶济铁路，但中国要以铁路产值偿还日本。日本在形式上放弃了“二十一条”。

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会议上由美、英、法、日、比、意、荷、葡、中签订了《九国公约》。公约声称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遵守“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一原则列入公约，就是粗暴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九国公约》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列强策划掠夺中国的阴谋提供了保证。

凡尔赛条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的修改和九国公约的签订，意味着日本外交的失败和美国外交的胜利。所谓“门户开放”，只是帝国主义列强共管中国的代名词，又是美国企图凭借其经济优势独霸中国的烟幕。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日本独霸中国的机会，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九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华盛顿会议是巴黎和会的继续和发展，它在承认美国占优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战后帝国主义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华盛顿会议期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和巴黎和会期间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确立了战后资本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新体系，即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第三节 战后初期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

英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自由党、保守党和工党组成了联合政府。大战结束后，这种联合已不能维持。1918年12月举行议会选举。自由党内以劳合·乔治为首的一派和保守党结成联盟。为了蛊惑选民，拉拢选票，联盟的竞选纲领许下的诺言有：保证退伍军人有工作，按优惠条件给他们提供土地；扩大住宅建设，不降低工资；还提出沙文主义口号：“要德意志人赔偿一切！”还要惩办德国的战争罪犯。工党的竞选纲领保证：从俄国撤回武装干涉军，实行土地、铁路和矿山的国有化等。

选举结果，两党联盟获得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席位，即七百零七席中的四百八十四席。其中自由党劳合·乔治派获得一百三十六席，保守党获得三百三十八席，另有其他党派的议员十名。这就是说，保守党在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工党获得五十九席，反对同保守党结盟自由党阿斯奎斯派只获得二十七席。这次选举表明，从1830年以来在英国政治舞台执政时间较多的自由党，大势已去。自由党所奉行的自由主义原则，即“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私人资本家的事务，在垄断组织统治的条件下，已失去了往日的意义。自由党不再是英国两大政党之一的政党了，这个地位由工党取代了。两党联盟拥立劳合·乔治为首相，组成联合政府。保守党人奥斯丁·张伯伦出任财政大臣，温斯顿·邱吉尔出任陆军大臣。

英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击败了竞争对手德国，获得了许多新的殖民地。大战结束的时候，英国统治阶级对英国的世界作用很有自信情绪。停战之日的晚上，战时内阁成员寇松代表政府在上院发言说：“目前，不列颠的旗帜，已飘在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领土之上！我们的意见，对于各国人民的意志，或是对于决定人民的命运，有着极大的影响，这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战场上伤亡了二百万以上的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国力愈益下降了。战后初期，由于日用品需求增加和企业的恢复，英国出现了短暂的经济繁荣（1919年春到1920年夏），就业人员迅速增加。但是总的说来，由于多种原因，英国战后经济困难重重。当英国努力恢复金本位并使英镑重新达到大战前的价值时，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取通货膨胀的手段，从而使英国货物在世界市场上价格昂贵，减弱了竞争能力。英国的机器与工厂在大战期内未遭损伤，这是幸事，但英国减慢了旧机器更新的速度，与美、德等国应用较新设备相竞争，更为困难。大战期间，英国的许多市场被美、日抢去，加上一些国家设置很高的关税壁垒，英国的出口商业因此大为削弱。1919年，英国的出口额比战前低45%，1920年比战前低30%。从1920年下半年起，英国发生经济危机，失业工人数字激剧增加。战争时期，英国实际上是没有失业，1920年秋季，虽有四百万人复员，但失业工人仍然为数不多。到1921年7月，失业工人达二百万人，约占工人总数的12%。劳合·乔治政府被迫拨款，救济失业工人，并鼓励失业工人移民海外，但是这两项措施收效都很低微。

战争期间，英国工会发展迅速。1914年，工会会员为四百十四万人，到1920年底增加到八百三十二万人，约占工人总数的50%左右。劳合·乔治政府刚一组成，就面临着广泛的工人运动。1919年1月，拥有百万会员的矿工工会开会决定，要求增加工资30%，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实行矿山和地下资源国有化，由工人参加矿山管理等。在政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之后，矿工预

定从3月15日起进行罢工。矿工工会曾同铁路工人工会和运输工人工会结成“三角同盟”，按照协定，一旦矿工举行罢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也应相率罢工。面对着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力量，英国政府急忙成立一个委员会，责令它调查矿业情况，于3月20日前提出报告书。3月20日这一天，政府被迫同意报告书的两项建议，即增加工资20%，把每日工时缩短到七小时。几个月后，政府拒绝了报告书中提出的关于矿山国有化的建议。英国政府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从而阻止了一场准备中的矿业——铁路——运输工人的总罢工。

但是，英国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斗争还在继续发展。1919年9月27日，百万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政府立即组织汽车、货车和飞机服务队。工人斗争进行了一个星期，政府不得不同铁路工人签订协议，满足工人的部分要求。

1919年，工人的罢工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作了一些让步。有六百万工人增加了工资，六百五十万工人缩短了每周的工作时间。

英国经济危机一发生，资产阶级就对工人阶级开始了进攻。1920年下半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紧急权力法。根据这一法案，政府有权宣布戒严，使用军队镇压工人运动。1921年3月，政府提前取消在战时实行的国家对煤炭工业的监督。4月1日，矿主举行同盟歇业，胁迫工人降低工资标准。矿工再一次向运输工人和铁路工人求援。三角同盟声称于4月15日举行支援矿工的总罢工。正当斗争处于紧要关头，在4月15日星期五那天，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的领导人，突然宣布停止同情罢工。这一天被叫作“黑色的星期五”。陷于孤立的矿工，坚持了两个半月的斗争之后，遭到了失败。继矿工之后，造船工人、机械工人、建筑工人、海员、纺织工人和铁路工人的斗争也遭到失败，所有这些行业的工人都被迫降低了工资。战后初期，英国工人的斗争从“黑色的星期五”以后屡遭失败，但是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革命倾向的力量。1920年7月底到8月初，英国共产党成立。第二年，许多共产主义派别参加进来，壮大了党的队伍。

爱尔兰问题是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大问题。爱尔兰人争取独立，斗争屡仆屡起。1916年，爱尔兰人举行起义，又遭英国镇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再度高涨。当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是由爱尔兰资产阶级领导的。在大战期间，他们分成两派，一派只求爱尔兰在英帝国范围内获得自治，称为自治派；另一派要求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称为共和派，共和派团结在“新芬”（意思是“我们自己”）党的周围。1918年12月，爱尔兰共和派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共和派从分配给爱尔兰的一百零五席中取得七十三席，而自治派只获得七席。当选议员的共和派分子拒绝出席英国议会，他们于1919年1月21日在都柏林集会，宣称自己是爱尔兰的全权议会，宣布成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新芬党领袖德·瓦勒拉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英国政府采用武力来消灭爱尔兰共和国，增派辅助部队进驻爱尔兰，使驻在爱尔兰的英国军队和警察共达二十万人。1920年底宣布戒严，整个爱尔兰处在英国军事当局控制之下，遭受白色恐怖之苦。爱尔兰人民以游击战争回击英国殖民者的暴行。爱尔兰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英国本土和旅美爱尔兰侨民中都得到了声援。1921年夏天，英国政府被迫同德·瓦勒拉总统进行谈判。于是爱尔兰代表团到了伦敦，谈判旷日持久，波折重重。1921年12月6日，双方签订英国——爱尔兰条约。条约规定建立名为“爱

尔兰自由邦”，但它成为英帝国自治领；爱尔兰东北部工业最发达的六个郡，即乌尔斯特从爱尔兰割出，划归英国版图。条约在爱尔兰议会引起了激烈的辩论，结局是以勉强的多数（六十四票对五十七票）获得批准。德·瓦勒拉反对接受条约，爱尔兰议会表决之后，他立即辞职。于是成立了以格里菲思（总统）和柯林斯（总理）为首的政府。英军随之撤出爱尔兰。以德·瓦勒拉为首的共和党人不承认格里菲思政府，仍保持自己的军队。1922年6月，政府军炮轰共和军驻守的都柏林要塞。内战爆发了，战火燃遍全国。1923年春，共和军筋疲力尽，兵员和武器均感不足，疲惫不堪的人民渴望和平。1923年4月，德·瓦勒拉的共和派宣布停止作战，并解散了自己的军队。战后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赢得了在爱尔兰南部二十六郡成立“自由邦”，享有自治的权利。1937年，爱尔兰“自由邦”才宣布为独立共和国，但仍留在英联邦内。

1922年，劳合·乔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处境困难，使保守党内反对同自由党联盟的势力抬头了。它们不满意政府于1921年12月签订的英埃条约，不满意政府对工人的微小“让步”，主张实行“高压”政策。1922年10月，保守党开会决定退出联合政府。因此，劳合·乔治政府辞职，由保守党组阁。保守党在议会所占的议席仅仅是多数，但不是大多数，所以决定在11月15日举行新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各党派都单独出来竞选。保守派大获全胜，获得三百四十七席；自由党阿斯奎斯派得六十席；自由党劳合·乔治派得五十七席；工党取得很大成功，得一百四十二席，第一次成为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拉姆赛·麦克唐纳成为工党议会党团领袖。

从1922年10月到1924年1月，保守党人邦纳·罗和斯坦利·鲍尔温先后出任首相。保守党政府实行保护关税和帝国优先权（英帝国内部几部分之间的优先关税率）的政策，又试图恢复干涉苏维埃国家的政策。鲍尔温政府的政策不得人心。1923年12月大选中，保守党的议席从三百四十七席降到二百五十九席；工党的议席升到一百九十一席。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第一次组成工党政府。

法国 法国是一个多政党的国家，不像英国那样只有两个主要的轮流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法国政治舞台上常常风云变幻剧烈，政局经常动荡。每一政党要在下议院中操纵大多数的票数都很困难，政府只有应用政党联盟制度来行使职权。一个政党联盟的组成，常以对少数重要问题的一致意见为基础，一旦有新的问题发生，政党的阵线又会重行排列。因此，法国内阁的平均寿命异常短促。大战期间直到1919年11月为止，法国由一个称为“神圣同盟”的政党联盟所统治，但是历届内阁继续发生不和与分裂。到1917年11月，克里孟梭组织内阁时，三年多的时间已经更换了五届内阁。1917年，由于战争拖延而筋疲力尽，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法国国内的失败主义情绪、厌战求和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广为传播。克里孟梭上台后，立即着手压制煽动不满情绪分子，组织全国力量争取胜利。他借高压手段进行统治，人们称他为“老虎”总理。

大战结束后，法国作为战胜国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获得了萨尔煤矿区的十五年开采权，得到非洲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地，并得到德国的巨额赔款和煤炭供应。这些都加速了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法国在大战期间损失惨重。这场战争主要在法国国土上进行，死于战场的壮年男子达一百四十万人，加上被俘和失踪的人数，使法国在人力上的损失按比例计算超过了

任何交战国，主要工业区的法国北部和东部成了一片废墟。三十万住房被摧毁，一万家企业被毁坏，约有二百万公顷土地被破坏得无法耕种。法国资产阶级利用这种情况，进行狂热的复仇主义宣传，企图借机索取德国巨额赔款，并极度削弱德国，以达到其称霸欧洲大陆的目的。克里孟梭即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为了保持法国在巴黎和会上争夺战利品的实力地位，它把军队复员工作拖了整整一年。为了保持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在俄国的投资和掠夺俄国的财富，它积极策划反苏战争，1918年11月，英、法远征军的舰队闯入黑海，在南俄的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登陆。在对内政策方面，克里孟梭政府采用通货膨胀、增加赋税的办法，把战争损失和复兴经济的重负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法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在法国士兵中展开了支持十月革命，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运动。1918年12月，法国远征军在敖德萨等地登陆不久，便拒绝对革命的俄国士兵作战。有一个长期侨居俄国的法国女教师，共产党员让娜·拉布勃，在敖德萨创办法文报纸《法国革命的儿子》，向法国士兵进行革命宣传，呼吁1871年公社的儿女们不要扼杀伟大的俄国革命。1919年3月1日，这位国际主义战士被干涉军杀害。让娜·拉布勃的牺牲，在法国人民中激起了巨大的愤慨，她的名字成为反对武装干涉斗争的号召。1919年4月，停泊在黑海的法国军舰爆发了水兵起义。4月20日，驻塞瓦斯托波尔的主力舰“法兰西”号和战斗舰“约翰·巴尔”号升起了红旗，水兵要求把军舰开回法国，其他军舰纷起响应，法国政府被迫让步，决定于5月1日前把法国舰队全部撤离黑海。

战后初期，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在发展。工人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承认工会的权利，停止武装干涉苏俄。1919年春，当法国反动法庭宣告杀害饶勒斯的凶手，沙文主义者维连无罪的时候，巴黎三十万工人于4月6日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高呼“处死维连！”“打倒克里孟梭政府！”等口号。工人们还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时。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迫使法国议会于4月23日通过了实行八小时工作日不减工资的法律。但是，示威游行和罢工的浪潮并没有低落。1919年五一节，巴黎五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在一切大工业中心普遍举行二十四小时的罢工。巴黎工人同反动警察发生了武装冲突。6月以后，罢工浪潮席卷全国。据官方统计，1919年发生了二千二百次罢工，参加者有一百十六万工人。革命高潮十分明显地表明，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20年12月，左派社会党人坚决同右派和中派分子分裂，主张加入共产国际，成立了法国共产党。

1919年11月，法国举行大选。选举前，在克里孟梭领导下执政的联合阵线（即“神圣同盟”）分裂为右翼的“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前者的代表人物有克里孟梭、米勒兰、普恩加来、白里安；后者在赫里欧领导之下。选举的结果是“国民联盟”获得大多数议席。1920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克里孟梭被击败，这反映法国资产阶级舆论认为凡尔赛和约过于宽大。“国民联盟”的领袖之一，前社会党人米勒兰（1859—1943年）于1920年1月担任政府首脑，9月接任总统。1921年至1924年间，白里安（1862—1932年）和普恩加来（1860—1934年）先后组阁执政。

“国民联盟”执政期间，法国政府加紧压迫德国支付赔款，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它在内政方面的方针是“管束”工人阶级，取消八小时工作制，给工厂主以恢复企业的补助金。

法国工人阶级坚持同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1920年2月，巴黎——里昂——地中海铁路线的铁路工人开始罢工，参加者达二十五万人之多。罢工者要求贯彻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权利，实行铁路国有化。铁路公司的资本家以解雇工人进行反攻。政府含含糊糊答应调停以后，铁路工会竟使铁路工人复了工。4月，铁路工会撤换了妥协分子的领导，新领导宣布再度举行罢工，法国总工会决定发出支持性总罢工的号召。5月1日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不久，矿工、海员、码头工人、五金工人、运输工人、电气工人等先后都参加了罢工，参加者达一百五十万人之多。政府采取镇压和以军队代替罢工工人的手段对付罢工运动。5月20日至22日，法国总工会开会，主张结束罢工的一派占了上风，于是总工会号召复工。陷于孤立境地的十九万铁路工人坚持罢工，由于工会里的革命领导人被捕，才于5月29日结束罢工。资本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反攻，二万多铁路工人被解雇。从此以后，工人的斗争一般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防御性斗争。

美国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幸运者。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向各交战国供应武器，从中获得了大量利润。美国没有经历过欧洲国家所受到的战争惨祸，它的领土上没有掉下过一枚炸弹。美国在前线的死亡（死十万五千人，伤约二十万人），仅占大战期间生命损失总数的1%左右。对军火的大量需求，使美国的工业迅速发展起来。1914—1916年，美国工业品总产值从二百四十亿美元左右增至六百二十亿美元左右。此后两年，美国工业生产大抵保持在1916年的水平上。经过大战，美国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战前，美国欠欧洲各国约五十五亿美元；战后，欧洲各国倒欠美国一百亿美元的战债了。美国用于战争的直接经费约三百五十亿美元，而大战期间美国垄断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比此数还多一些。世界黄金储备的40%左右集中到了美国手里。美国的国际地位已大大改变了。十九世纪末以前，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跃居资本主义各国的首位。

战争给垄断资产阶级带来了巨额利润，给人民群众却带来了苦难。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一小撮家族之手，占全国人口2%的最富有阶级拥有国民财富的60%，而占全国人口65%的最贫困的阶级只拥有国民财富的5%。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估计，1919年底，美国一个工人家庭，维持普通生活水平，一年需要二千二百六十二美元，而当时大多数工人的一年的工资为一千三百六十七美元，即差额约为九百美元。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四百万军队复员后失业人数的增加，战后企业主对工人权利的侵犯，增强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战斗意志。

1919年美国全国发生了三千多次罢工，参加者达四百多万工人。1919年9月到1920年1月，爆发了十个州的五十个城市包括三十六万多名钢铁工人的大罢工，卷入罢工浪潮的人数约占钢铁工业总人数的95%。罢工领导人是当时担任钢铁工人工会书记的威廉·福斯特（1881—1961年）。罢工提出的具体要求包括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八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等。威尔逊政府宣布“开放工厂制”为合法，并调集大批军队、打手到钢铁业中心城市进行镇压，工人们进行了英勇的反抗。结果有二十二名工人被杀害，成百名工人被打伤，数千名工人遭逮捕。这次罢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声势最浩大的一次。1919年9月，二十万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提出了保障工人最低限度工资标准的要求。铁路工人工会的法律代表普莱勃，

根据全国铁路在美国参战后由政府统一管理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一个计划(即“普莱勃计划”),向国会建议实行。计划要求国家用赎买的办法实行铁路国有化,由铁路工人工会的代表参加铁路管理工作。威尔逊政府不但没有采纳计划,而且竟于1920年初,通过了一项运输法,宣布从3月1日起,将铁路归还各私人公司经营,并禁止铁路工人进行罢工。1919年10—11月,五十万煤矿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威尔逊政府以派兵镇压进行威胁,矿工联合会主席约翰·刘易士向政府投降,出卖工人利益,公开宣布煤矿工人应停止罢工。但是罢工工人仍英勇地坚持斗争,获得胜利,工资提高了27%。美国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同时,对苏维埃俄国表示了国际主义的同情。他们反对干涉苏维埃俄国。1921年苏俄发生饥荒时他们纷纷成立援俄委员会,捐款救济。在国内工人运动发展和工人团体中左派力量增强的条件下,1919年秋,美国建立了两个共产党,第二年成立了统一的共产党。

威尔逊政府鉴于美国国内局势不稳,就利用美国参战后颁布的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来镇压革命工人和进步人士,将他们予以监禁或驱逐出境。对黑人的迫害也加强了。种族主义者的恐怖组织“三K党”十分猖獗。1919年7月,华盛顿发生了血腥迫害黑人的事件。同月,芝加哥黑人同白人种族主义暴徒进行搏斗,政府当局虽然派了六千名警察进行镇压,但黑人的抗暴斗争仍持续了十三天。

1920年11月,美国举行战后第一次总统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间的竞选、决斗造成一种幻觉,似乎它们维护不同利益的两派,实际上都是维护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威尔逊在战时用来欺骗群众的自由派姿态,被垄断资本家认为不需要了;再则,巴黎和会表明,威尔逊不能保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最高仲裁者的地位,因此威尔逊在参议院遭到失败:美国既没有批准凡尔赛和约(因此形式上美国对德国仍处于战争状态),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选举前不久,该年8月,国会通过了关于妇女享有选举权的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大大扩大了选民的人数,但是并没有改变总统选举的结果:民主党遭到失败。共和党人哈定(1865—1923年)当选总统。他获得了一千六百万票,民主党候选人柯克斯获得九百万票,社会党候选人尤金·德布斯获得九十二万票。

共和党人政府是在美国进入经济危机的时期上台的。1921年,美国工业生产部门的开工率还不到60%,失业工人达五百五十万人之多。由于农产品跌价,农民大批破产和丧失土地。5月间,美国总统签署了紧急关税法,提高农产品、羊毛和食糖的进口税;禁止德国的颜料进口。同年9月,美国在这个关税法的基础上,颁布法案,把关税税率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保护关税法的实施,有助于国内的工业生产。但是由于它限制了欧洲工业品进入美国,欧洲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量大为削减。美国农产品生产过剩,价格继续下降。

在经济危机期间,人民的物质状况恶化了。1922年4月至9月,六十万矿工大罢工,抗议降低工资;同年7月至9月,四十万铁路工人为同样目的而举行罢工。这些罢工都遭失败。

1921年5月,美国颁布了移民法,规定外国每年移居美国的人数不得超过该国于1910年在美国移民总数的3%。战前,美国资产阶级是欢迎移民的,因为移民提供了廉价而驯良的劳动力;在战争时期,有数百万欧洲人想离开他们疮痍满目的国家。现在,已经表明美国不再欢迎来自旧大陆遭蹂躏、受

侮辱的难民了，从一个大陆向另一个大陆殖民的大规模冒险行动就此告终了。

哈定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反对苏维埃俄国的立场，阻挠美国私人公司同苏维埃国家做买卖。在对德问题上，美国企图恢复德帝国主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牵制英法和防御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哈定政府任期内，美国正式结束了对德国的战争状态。1921年8月，美国分别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签订了和约。在远东，美国与日本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争夺中国的矛盾特别尖锐，导致1921年至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召开。

日本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日本先后对中国和俄国开战获胜，攫取了中国的领土，吞并了朝鲜，一跃成了主宰东亚和太平洋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同西方列强重订条约，废除了许多从前订的条约中加在日本身上的不平等条款，但是日本的关税自主权等还没有完全恢复，修改条约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1910年7月，日本政府通知有关国家，将于一年之后废除到期的通商航海条约。1911年2月开始，日本先后同各国签订新的通商航路条约，完全实现了关税的独立自主和法权上的独立平等。但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相比，资本力量比较薄弱。由于重税、高额佃租和低工资，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和工人极端贫困，国内市场也特别狭小。还由于过多的军费和殖民地的统治费用，国家的财政几乎破产。1914年的外债将近二十亿日元，超过同年税收的六倍，连支付利息也有困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使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侵占了许多领土，而且为日本在经济上开辟了空前繁荣的道路。从1915年下半年起，输出急剧增加，大战期间出口总额达到十四亿日元。黄金储备1914年为三亿五千万日元，到1919年底已超过二十亿日元。日本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借给英、法、俄（十月革命前）的债款总额为五亿日元。世界大战推动了日本工农业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工业生产增加五倍以上，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由44%增加到56%；农业产量从绝对金额来讲，增加近三倍，但所占比例由45%下降到35%。

在经济繁荣之中，由于大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大产业资本和大金融资本的结合，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四大财阀为首的金融垄断资本逐渐左右了日本的国民经济。日本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随着经济势力的发展而更加巩固。

1918年，与日本垄断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原敬政府执政。原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争得了原德国在太平洋的殖民地和在中国山东的各种权利，并且积极向中国扩张，派出武装干涉军入侵苏维埃俄国。它用加重赋税和加强剥削城乡劳动者的办法来筹措战争和武装干涉的费用。

日本经济虽然有了迅猛发展，但是，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物价暴涨，实际工资下降。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带来了非农业人口的激增，大米的需要量也随之激增。但政府为保护地主利益，却不允许免收关税、自由输入外国大米；对于地主和米商的囤积居奇，也未采取统制政策。从1918年春天起，米价扶摇直上。工人于1918年的实际工资，跌到1914年的61%。生活急剧陷于困境的劳动人民，因大米问题掀起了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这就是日本史上的“米骚动”。

1918年7月，富山县一个小渔村的渔民妻女，因米价暴涨，阻止本县所

产大米装船运往外地。这一消息传开后，在富山县的其他地方引起了反对官吏和商人的示威游行，要求降低米价及政府救济。从8月3日起，一些地方的群众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一些地方报纸，对此作了同情民众的报导。从8月9日起，运动扩展到全国大、中城市。9日，京都和名古屋两大城市，发生了市民动荡，京都市郊的大骚动历时四天，遭到军队的暴力镇压。17日，山口县的宇部镇和北九州的几个煤矿矿工举行罢工，有的煤矿矿工坚持了约一个月的斗争。米骚动持续了一个多月，约有一千万人参加了这些事件，发生起义的地方有一道（北海道）、三府（东京府、大阪府和京都府）、三十七县，共计三百六十八个市町村，主要是日本西部生产大米的地区。米骚动是突然爆发的，事前并无计划和组织，它反映了战后日本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米骚动对日本社会各阶层震动很大。民众开始觉悟到自己的力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当生活极端穷困的时候，人们有超越一切法律而获得生存的权利。生存权优先于财产权的思想，在日本开始树立起来。同情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日本迅速传布开来。原敬政府为摆脱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进行了一些微小改革，1919年2、3月间，通过了一项改革法，将选民财产资格由年缴所得税十日元降低为三日元，因此将选民人数由一百五十万增加到三百万。

1920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1921年，生产大幅度下降。同1919年比较，造船业生产减少88%，机器制造业生产减少56%，进出口额减少30—40%。1922年的失业者达一百二十八万之多。经济危机期间，工人阶级开展了一些斗争，但由于组织不健全，没有革命政党领导，多半以失败告终。1921年，日本劳动总同盟成立了，它对日本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很好的作用。同年，日本产生了几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团体。1922年7月15日，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日本共产党，在非法的情况下成立起来了。主要领导人片山潜（1859—1933年）、渡边政之辅（1899—1928年）、德田球一（1894—1953年）、市川正一（1892—1945年）。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据估计，四百多万人受灾，死二十万人，损失十亿美元。政府利用当时的严重局势，加紧迫害革命组织。1923年，几乎全部共产党员遭到逮捕。

经过1920年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日本经济遭到严重的打击。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把中国看作它的重要市场。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进口贸易中占有很高的比例。1919年还在上升，高达36%多。由于中国民族资本轻工业的发展，由于英美竞争力量卷土重来，1923年日本在中国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22.25%。但是，日本统治阶级念念不忘侵略中国。他们所要抉择的仅仅是使用武力扩张，还是侧重经济侵略。以后几年，日本加藤、若槻内阁，选择了尽量避免使用武力而谋求经济侵略的道路，引起了统治集团中最富于侵略性集团的反对。

第四节 和平和安全幻想

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1924 年到 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稳定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各国因渡过革命危机而处于稳固状态。资产阶级利用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间的影响，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工人革命处于低潮。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重新分配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缓和。在经济方面，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了战后混乱的局面，工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在法国是 1924 年，在德国是 1927 年，在英国是 1929 年。在财政金融方面，它们先后克服了财政危机，稳定了货币。这在德国是 1924 年，英国是 1925 年，法国和意大利是 1927 年。

工业生产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对企业实行了技术改造，广泛采用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合理化”，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资本家采用各种“有科学根据的”血汗方法组织劳动，如实行工时测定，使用传送装置，增加每个工人看管机床台数等，急剧地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由于采用操作极度紧张的传送装置，工人的体力便过早地衰竭了，工伤事故层出不穷。除了加强剥削本国劳动者以外，一些国家的稳定还建立在加强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基础上。

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是相对的、局部的。各国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工业设备能力只利用了 60—70%。资本主义合理化加强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使数以百万计的工人遭到失业。例如，到 1929 年，美国有三百万到四百万工人失业；英国有一百五十万到二百万工人失业；德国有一百万到二百万工人失业。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合理化抛出生产部门的失业工人，总数达一千万人。

资本主义稳定的局部性还表现在：一些工业部门突飞猛进地发展，而另一些部门却停滞不前。如汽车制造业、化学工业和电器工业一日千里，石油和煤气产量迅速上升，而煤炭产量则增加缓慢。

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严重了。德国巧妙地利用了各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及它们对苏联的敌意，从美、英、瑞士、荷兰等国取得贷款，来实行工业设备的现代化和恢复经济。到相对稳定时期结束时，德国的一些重要生产部门在资本主义世界重新占居第二位。美国的发展特别迅速。早在 1925 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就等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美国稳坐原属英国的世界重要债权人的宝座，并且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中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重新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矛盾。

德国赔款问题 德国赔款问题是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二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赔款问题急剧尖锐化。1921 年，英、法、意、日等国在伦敦召开会议，决定德国的赔款总额为二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每年偿付二十亿。

德国政府对待赔偿问题的策略是“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在政府的默许下，德国工业和财政寡头拒绝缴税，让资本“逃亡”国外，使政府不能再从私人银行得到贷款，从而给国家预算造成经常性赤字。政府则通过帝国银行发行没有任何担保的纸币进行弥补。马克币值急剧下跌。德国统治集团利用通货膨胀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加重掠夺人民群众；另

一方面借口没有支付能力和财政破产以抵制赔偿。1922年7月，德国政府通知赔偿委员会，它无力继续缴付赔款，请求将缴付期限延至1924年底。

德国的请求遭到法国拒绝，但是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与法国情况不同，英国的工业没有受到战争的毁灭性的破坏。英国政府所关心的，主要是欧洲经济关系正常化，以便大幅度增加英国商品的销售量。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真正减轻德国的赔偿义务。由于赔款的52%是缴给法国，英国便乐于顺水推舟，同意德国延缓并削减赔偿的要求。美国为了扩大商品销路，往德国输出资本，也认为必须减轻德国的赔偿义务。原协约国各方为协调彼此的立场，于1922年8月在伦敦召开赔偿问题会议，但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922年11月，库诺政府在德国上台，它走上了公开抵制赔偿义务的道路。

1923年1月11日，法国五个师、比利时两个师共约十万人进驻德国，占领鲁尔地区。法国企图在占领鲁尔以后，把那里的煤和洛林的矿石联成一体，使自己成为世界最大的钢产国。12日，德国政府向法国和比利时提出了正式抗议，并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

法、比对鲁尔的占领和德国政府的“消极抵抗”，使德国工人的处境急剧恶化，工人阶级奋起反对法、比的占领，反对库诺政府的反人民政策。1923年8月12日，库诺政府被斯特莱斯曼政府所取代，新政府宣布停止“消极抵抗”。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继续发展。

德国统治集团害怕革命，急忙同法国帝国主义达成妥协。而法国占领鲁尔一举，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招受损失不小。德国的赔偿费完全没有了。法国占领鲁尔的九个月里用自己的力量仅仅开采了二百三十七万吨煤炭，而在1922年同一时期，法国从德国得到的赔偿煤炭为一千一百四十六万吨。由于鲁尔焦炭进口量减少，法国的生铁产量下降了35%。法国政府的占领费用急剧增加。法郎贬值25%。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不得不向英美的压力屈服，同意美国提出的召开国际专家委员会会议研究德国支付赔偿问题。

1924年1月，根据赔偿委员会决议建立的、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领导的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始工作。4月9日，专家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是一本厚约二百页的大部头文件，人们称之为“道威斯计划”。7月16日至8月16日，接受德国赔款的国家英、法、意、日、比等盟国在伦敦举行会议。美国没有正式参加会议，它的驻英大使凯洛格作为“受权有限”的代表出席会议，美国国务卿休斯也在这时到欧洲进行频繁的活动。美国在会议上实际起着重大作用。伦敦会议最后批准了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很重视稳定德国的通货问题，因为这是美英对德投资的先决条件。为了稳定德国马克，计划要向德国提供八亿金马克的国际贷款，其中大部分由美国提供。在赔偿来源问题上，计划遵循的原则是：只有复兴德国经济方可切实保证赔偿。国家预算收入（规定对糖、烟草、啤酒、纺织品、鞋类等消费品征收高额间接税）被认为是缴付赔偿的主要来源。这样，赔偿的主要负担便落在德国劳动人民的肩上了。一小部分赔偿由德国铁路和工业企业的利润支付。为了防止德国新的通货膨胀，计划规定对德国向国外的汇款、国家预算、货币流通等建立相应的监督。道威斯计划既没有规定赔偿总额，也没有明确缴付赔款的最后期限，仅仅确定了德国每年缴付赔偿的数额。在计划生效的第一年，德国应付赔款十亿金马克，以后逐年增加，从第五年起每年付二十五亿金马克。这个计划被德国接受，在1924年8月生效。

道威斯计划的通过说明法国谋求欧洲霸权的企图遭到了破产。这项计划反映了美国为确立美元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竭力干预欧洲事务的政策。道威斯计划使外国资本、首先是美国资本大量涌进德国经济。在执行道威斯计划的六年期间，即从1924年到1929年，德国共支付赔款一百十亿金马克，但得到的外国的借款（主要是美国的）为二百亿到二百五十亿金马克。德国用借款中的大部分恢复军事工业的实力，增强军事潜力。道威斯计划为德国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准备了经济力量。

1928年，当德国即将开始每年偿付二十五亿金马克赔款时，德国提出了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要求。这一要求得到了美国的支持。1928年底，有关国家商定建立了以美国银行家杨格为首的新的专家委员会。1929年6月，该专家委员会提出了新的赔款计划。杨格计划被原协约国在1930年1月的海牙会议上讨论通过。

杨格计划确定德国仍须赔款的总额为一千一百三十九亿金马克；赔款年限为五十九年；前三十七年每年支付二十亿，后二十二年每年支付约十六亿；取消对德国的财政经济的监督。

杨格计划减少了德国赔款总额的20%。杨格计划不仅大大削减了德国每年的赔偿额，而且还把赔偿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赔偿是无条件的，德国不得拖延，每年约为六亿六千万金马克；另一部分是有条件的，即其余的十三亿四千万金马克，德国遇到经济困难时，可以延期支付赔偿。杨格计划是在经济危机的1930年付诸实施的，所以实际上它只要求德国每年赔偿六亿六千万金马克。杨格计划取消了工业利润作为赔款来源这一条，这样，赔款的全付重担比过去更多地转嫁到德国工人阶级的肩上。根据杨格计划，对德国的一切监督已经取消，德国帝国主义者可以更大规模地发展他们的军事工业。

1931年，德国请求美国准予延期支付赔偿和其他债务，理由是德国由于世界经济危机而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英法两国同意德国的请求，但以盟国之间的战债也须延期支付为条件。美国总统胡佛征得协约国的同意，宣布从1931年7月起，赔偿和政府之间的债务延期一年支付，以资救济。缓付之期即将过去，德国仍表示无力偿付赔款。1932年，协约各国在洛桑举行会议，决定推翻杨格计划，将赔款总数削减到三十亿金马克。同时，英、法、意等国缔结君子协定，相约在对美战债未得到满意解决以前，洛桑协定暂不提交国会批准。美国本以巨额战债作为对欧洲列强要挟的工具，故极力反对把赔款和战债混为一谈，可是德国付不出赔款，各国也无意偿还战债。赔款和战债问题不了了之。

洛迦诺公约 道威斯计划加强了德国军国主义力量，使法国深感不安。法国一向寻求解决它的东部边界安全“保证”问题，提出了法国、比利时和英国三国缔结保证不受德国侵犯的联盟的建议。当时，英国正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德国参加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苏联盟，不愿受到反德协定的约束。同时英国也清楚，没有法国参加也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就在这时，德国建议“同莱茵地区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相互保证遵守莱茵地区的现状”。英国在事前策动德国提出这一建议，然后又劝告法国接受德国的建议。英国的立场得到美国的支持，因此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商讨所谓“巩固欧洲和平”问题的时机成熟了。

1925年10月5日至16日在瑞士的一个小城洛迦诺举行了国际会议。参加者有英、法、德、比、意、波、捷七国代表。会议草签了德、比、法、英

和意相互保证条约（即莱茵保安公约）和德法、德比、德波和德捷四个仲裁条约。莱茵保安公约规定，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承允保持凡尔赛和约所确定的德、比之间和德、法之间的边界不受侵犯，并遵守关于莱茵非武装地区的规定。英意两国担任莱茵公约的保证国，一旦其规定遭到破坏，它们必须立即援助受侵犯国。公约还规定，德国将被准许加入国际联盟。四个仲裁条约都规定缔约双方通过谈判和诉诸仲裁的办法来解决争端。洛迦诺诸条约于1925年12月1日在伦敦正式签字。

资产阶级政治家大肆吹嘘，硬说洛迦诺给欧洲带来了平静局面。英国外长张伯伦（1869—1940年）说，洛迦诺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真正的分界线”。但是在实际上，洛迦诺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孕育着未来战争的因素。洛迦诺公约保证德国西部边界不变，而不提其东部边界的不变，这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改变其东部边界，即侵略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并且通过那里向苏联进攻。洛迦诺公约削弱了法国，迫使它放弃指望夺取德国西部领土以削弱德国的想法。继法军于1925年7月全部撤离鲁尔之后，协约国军队（主要为法军）开始全部撤离德国。1926年9月，德国被接纳加入国联，并在行政院获得常任席位。法国不得不把德国看作是一个政治上平等的国家。法国的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没有得到安全保证。法国不得不与波、捷分别签订相互保证条约，以防备德国的进攻。英国外交当局认为，洛迦诺公约抑制了法国，把德国引向东方去反对苏联，这是英国的巨大胜利。但洛迦诺的真正胜利者不是英国，而是德国。德国军国主义动摇了在凡尔赛建立的有利于英法的战后秩序。它为自己的东进扫清了道路，又没有承担直接义务。何时进攻，向东方还是西方进攻，主动权操纵在它手里。

非战公约 战后各国人民对于巩固和平的要求，苏联为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和和平共处的斗争，促使某些资产阶级活动家提出了和平主义的倡议。

1927年4月是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纪念，有很多美国老兵来到巴黎庆祝。法国外长白里安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法国人对美国的友好感情，建议美国同法国签订一项公约，规定两国彼此永不作战。法国指望这项公约巩固自己在欧洲事务中的地位。1927年底，美国国务卿凯洛格表示同意白里安的建议，但不主张缔结双边条约，而主张缔结多边条约。美国企图以参加公约的欧洲国家的新联盟，同英法起主导作用的国际联盟分庭抗礼。

在法国同意缔结多边条约以后，美国就这一问题照会其他许多国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表示赞同，但附有许多保留条件。例如法国声称可以进行“防御战争”，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把任何战争说成是防御战争的；英国提出，可以对各国所不承认的国家作战，也可以对无力整顿内部秩序的国家作战，这为它反对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保留借口。经过一系列谈判以后，1928年8月27日，十五个国家代表在巴黎签署了非战公约。这项公约习称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它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承认必须通过和平方法解决各种争端和冲突。

美法两国原来不想邀请苏联参加，苏联揭露了本公约的反苏性质，使美法两国不得不邀请苏联。苏联考虑到，非战公约在客观上使各国对社会舆论承担一定的义务，加入了公约，但它也作了一项保留，即不承认对该公约所作的任何保留条件。截至1933年，加入非战公约的国家共达六十三国。1929年2月9日，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在莫斯科签署了一项议定书，同意非战公约提前生效，在相互关系中遵守公约的原则。

裁军会议及其失败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备竞赛使广大人民日益感到不安，他们对战前年代武装外交的不幸结果记忆犹新，一个规模巨大的拥护裁军运动在展开。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为了安抚世界舆论，在国际联盟中就裁军问题进行旷日持久的讨论。

国际联盟成立不久，就先后建立了两个委员会来讨论裁军问题。国际机构无休止地草拟所谓的全部裁军计划，对裁军标准问题进行一般的和烦琐的讨论。1925年9月，国际联盟通过了关于筹备裁军和限制军备会议的决议，并于年底成立了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由包括苏联在内的二十一国代表组成。筹备工作在瑞士进行。这一时期，筹备委员会中英法两国为坚持自己的方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英国方案建议限制对它威胁最大的飞机和潜水艇的生产和裁减大量陆军，以削弱法国的陆军和空军力量。法国的方案是同英美的利益针锋相对的，它要求裁减海军军备，还把裁军问题同安全保证问题联系起来，要求不仅对军备，而且对军事潜力确立国际监督制度。德国代表在会上力争德国在军备问题上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也就是要取消凡尔赛和约对它所作的各种军备限制。这正如当时《真理报》所指出的：“会议每个参加国所考虑的都不是裁减自己的军备，而是裁减别人的军备，从而使自己在军备方面更强大一些。”通过激烈的争吵，法国的方案，经过许多修正，于1927年4月被采纳作为蓝本。这个文件对各种军备没有规定出限制数字。

1927年11月起，苏联参加了裁军会议筹备委员会工作，提出了普遍裁军的建议。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迅速裁军公约草案”规定：解散海陆军武装力量的一切人员，销毁掌握在军队手里和贮存在仓库里的一切武器，销毁军舰和军用飞机，禁止征兵，拆除要塞、军事基地和军火工厂，停止国家预算的军事拨款，解散一切军事机构。草案建议在四年时间内实现所有这些措施。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不愿裁军，苏联草案遭到否决。接着苏联提出了第二个裁军公约草案。此草案规定，按照各国武装力量组成状况，对各种军备实行累进裁减。但是苏联的这项公约草案，也遭到帝国主义国家代表的否决。

从1925年底到1930年底的五年时间内，筹备委员会召开了一百十八次会议，结果只是通过了一项毫无内容的裁军公约草案，并附有各国提出的四十九项保留意见。国联组织者宣告筹备工作结束，并着手准备第二轮谈判，也就是在世界裁军大会上进行谈判。

1932年2月2日，国际裁军会议在日内瓦开幕，包括美、苏在内的六十个国家出席会议。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备战活动一直未停，它们不愿意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所以会议一无结果。法国建议确立国际治安体制，并坚持必须首先确保安全，然后裁军。德国则要求军备平等。6月，美国总统胡佛建议，把各国军队分成“治安部队”和“国防部队”，后者应裁减三分之一，并销毁坦克、重炮和轰炸机。按照此项提议，法、英、日等国的实力将比美国的实力所受到的触动大得多。这个方案也被否决。7月23日，裁军会议第一次会议结束了。

1933年2月2日至10月14日，举行裁军会议第二次会议。会议讨论了法国的所谓“赫里欧——波尔·邦库尔建设性计划”。该计划丝毫不触动法国所保留的一支庞大的殖民军，却针对意大利的海军装备和德国的航空工业提出了限制性条款。法国计划被否决。3月6日，英国提出了所谓“麦克唐纳计划”，建议欧洲各国的军队裁减近五十万人，并使法、德两国在军备上处于平等地位。这个计划虽然得到美国的强烈支持，但由于德国坚持它的冲

锋队不应算作正式军队，因而也告失败。鉴于法西斯侵略威胁的增长，苏联于2月6日提出了“侵略定义”草案，建议把这个定义纳入裁军公约草案。苏联的草案提出了任何国家（无论大国和小国）的国界不可侵犯、不干涉别国事务的原则。它在裁军会议上虽然得到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是由于英国的反对而没有结果。

1934年5月29日至6月11日举行了最后一次裁军会议，这时德国已经退出。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未能妥协，会议没有结果。苏联提议把裁军会议变为“常设的定期召开的和平会议”，以促进和平事业的发展。但此时英国正在谋求同希特勒德国勾结，因此公然反对苏联的建议。国际裁军会议实际已宣告结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第四章 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

第一节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 1920 年底红军歼灭了弗兰格尔军队之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主力全都被粉碎了。日本支持的白卫军，到 1922 年 10 月也被击溃了。1921 年开始，苏维埃俄国进入恢复经济的新时期。

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中夺得了举世瞩目的胜利，但是在转向和平建设后，又遇到了新的困难和危机。四年的帝国主义大战和三年的国内战争使国家满目疮痍，经济濒于破产。1921 年初，大工业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燃料、冶金、机器制造等重要工业部门完全遭到破坏，棉织品的产量降到二十分之一。农业的收获量仅及战前的五分之三。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连面包、衣服、肥皂这样最起码的物品都极感缺乏。

政治情况同样严重。由于经济破坏、工厂停工和饥荒流行，许多工人被迫改行，或是转而从从事手工业、作小买卖，或是流向农村。产业工人人数大量减少。1913 年，大工业中有二百五十五万名工人，而到 1921 年只剩下一百四十万人。在部分工人中还出现了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

在革命的风暴时期，俄国农村发生很大变化。苏维埃社会人数最多的阶级还是农民，他们约占全国人口的 80%。但是农民的结构和农村的阶级状况同革命前大不一样了。地主阶级已被消灭，富农的力量削弱很多，户数减少了三分之二。革命前贫农是大多数，现在占优势的是中农。广大农民为了保护分得的土地，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曾接受了余粮收集制。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外国干涉军入侵威胁的消失，农民就不肯再接受这一政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相互抵触的。部分中农甚至卷入反苏维埃的活动。1921 年在坦波夫省、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在乌克兰、顿河和西伯利亚的富农叛乱中，就有不少中农参加。农民的不满在军队中也有反映。1921 年 2 月，喀琅施塔得水兵发动叛乱。他们公开反对党的政策，提出“拥护苏维埃，但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口号。这都说明，广大农民和部分工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不满情绪相当强烈。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在不断削弱。苏维埃国家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列宁深刻理解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农民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让我们改善工人同农民的关系吧。”

为了克服这一危机，首先要恢复经济。这一点，党内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恢复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恢复经济主要应该依靠工人群众。因此，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将是关于工会的作用及其工作方法的问题”。1920 年 11 月，托洛茨基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他要求“把工会整刷一下”，实行“工会国家化”，使工会和行政干部互相结合。他还主张把内战时期的军事命令和行政强制的办法搬到工会里来，要“拧紧螺丝钉”，实行“劳动军事化”，每个工人应象士兵一样，命令作什么就作什么，否则就被认为是逃兵，就要受到惩罚。托洛茨基认为，只有采取这些办法，才能恢复经济。“工人反对派”（施略普尼可夫、柯仑泰）则持另一种态度。他们提议“把国民经济交给工会去管理，实行“国家工会化”。

列宁认为，上面两种看法都不正确。托洛茨基的军事强制办法会破坏党

同工人群众的密切关系，他在对待群众的问题上犯有原则错误。而“工人反对派”则否定了党和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布哈林企图调和分歧，他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列宁批驳了布哈林的折衷主义论调，指出，只有正确处理了阶级关系，才能解决生产任务。

按照列宁的意见，恢复经济必须调动工农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人口多数的国家，没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非常重视农民的不满情绪，他提议重新修订对农民的政策。列宁多次接见农民代表团，与各地来的农民交谈，探讨改善同农民关系的途径。

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建议，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此，开始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1921年4月，政府正式宣布，1921—1922经济年度__的粮食税额为二亿四千万普特__。这个数字比1920—1921年度收集的四亿二千万普特低了很多。超过税额的余粮归农民所有。1921年5月，苏维埃政权通过了“关于交换”的法令，宣布实行产品交换，农民应通过合作社把手里的农产品换成工业品。但是，当时国家手里既没有足够的工业品，又缺乏有效的办事机构。几个月后，政府就不得不放弃产品交换的作法，允许私人买卖、自由贸易。这是新经济政策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政府还决定实行租让制，把一些中小企业和商店租给私人或合作社开业，并允许外国承租者开办大企业，开采北部的森林和东部的矿藏。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管理体制也作了改变，经济核算制成为管理的基础。改革了工资制度，废除了配给制和劳动义务制。

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就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它受到农民的欢迎，使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1921年，苏俄遭遇大干旱，受灾地区达三十四个省，三千万人口。但是，政府在农民的积极支持下，比较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到第二年就消除了它的后果。

实行新经济政策也带来另一方面的后果。由于自由贸易，出现了一批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他们同社会主义力量展开激烈的斗争。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提出“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同时要找出国家对资本主义成份进行监督和控制的方法。

新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恢复。1925年，谷物的总产量几乎与战前水平相等，达到四十六亿普特。畜牧业还低于革命前的最高水平。工业总产量为战前的73%，其中社会主义成份占81%。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国内商品流转总额约为战前的70%，其中一半左右掌握在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手中。到1925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基本完成了。

苏联的建立 沙皇俄国是有名的民族监狱，内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或自治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巴什基尔、鞑靼等民族成立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在中亚，则出现了布哈拉和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至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经过反复较量，最后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国内战争期间，各苏维埃共和国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于1919年6月建立了军事政治同盟，成立了统一的军事指挥部，合并了各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运

输管理机构、财政人民委员部和劳动人民委员部。1920年秋到1921年初，俄罗斯联邦先后同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签订条约，又将对外贸易、邮电等部合并，从而进一步密切了彼此之间的联系。

国内战争结束后，为了顺利恢复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把各苏维埃共和国合成为统一的经济整体，以便充分利用各国的经济财政资源。1922年，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先后提出联合的问题。为了具体研究这一问题，俄共（布）中央在1922年8月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专门委员会。不久，斯大林提出“自治化”方案，规定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联盟的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方案得到一些民族共和国党中央的支持，但遭到格鲁吉亚党中央的激烈反对。列宁因为生病没有直接参加这项工作。当他了解到双方争执的内容后，写信给党中央政治局，明确表示反对自治化计划，认为它缩小了各共和国的权利，威胁着各族人民的友谊。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在1922年10月通过决议，规定各苏维埃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成立联盟。随后，各共和国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拥护俄共（布）中央的意见，赞成建立共和国联盟。同时，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国决定统一为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共和国。

1922年12月30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斯大林作了关于成立苏联的报告。大会通过了苏联成立宣言和联盟条约。当时加入苏联的有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四个共和国。中亚的布哈拉和花刺子模人民共和国由于国家制度不同，没有加入苏联，但它们同俄罗斯联邦订有联盟条约。1924年以后，中亚的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分别组成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为苏联的一员。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则分别以自治共和国身份加入俄罗斯共和国。

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计划 1918年的遇刺受伤和长期的过度劳累，严重地损害了列宁的健康。1922年3月底到4月初，列宁带病主持了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总书记，主持党务工作。

1922年12月，列宁的病情恶化。1923年初，在病情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列宁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以及各种信件。列宁在这最后的几篇文章和几封信件中，阐述了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

列宁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提出革命的前途问题。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原来坚信很快会爆发世界革命。但是，这个预计没能变成现实。因此，列宁说：“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列宁从根本战略前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非常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列宁的这段论述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胜利信心，而且天才地预见到东方革命的兴起。

列宁接着又论述了党在世界革命到来之前应采取的政策。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

列宁特别重视同农民的关系问题，认为坚持工农联盟，保证农民跟工人走，不跟资产阶级走，是关系苏维埃政权命运的大事。如何作到这点呢？列宁提出合作化计划。他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里，合作社可以把“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此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合作化又是农民能够理解和容易接受的办法。因此，合作化计划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好办法。为了发展合作社，党不仅要大力支持这个事业，而且要“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列宁还提出要改造国家机关，建设大工业。他认为，当时除外交人民委员部外，其他机关只是在外表上作了些粉饰，实际仍是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列宁提议改组工农检查院，把它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有权威的模范机构，并依靠它改造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只有机关真正是新型的，是精简的，有效率的，它才能赢得人民信任，才能节约资金，实现工业化。

列宁最后提到防止党的分裂问题。他认为造成党分裂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工农之间出现严重阶级分歧；一个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发生冲突。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着重分析了党的领导人的品质。列宁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要求补选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以提高中央的威望，加强党的团结。

列宁的这些思想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惜，列宁没能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些观点。1923年3月，列宁的病情再度恶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1924年1月21日，列宁因患脑溢血引起呼吸器官的麻痹而与世长辞了。列宁的逝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安葬列宁的那一天，各国劳动者同苏联人民一起，用各种形式沉痛地哀悼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导师。

列宁逝世后，苏联人民更加紧密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艰苦奋斗，发展生产，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1922年，苏俄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建立了外交关系。1924—1925年，英、意、法、日、中等国也先后承认了苏联。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

反对托洛茨基集团的斗争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逐步完成，在苏联党和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苏联今后发展的道路问题。当时，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世界革命转入低潮。苏联国内不仅生产水平低下，而且存在着大量的个体小生产，资本主义因素还有一定势力。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苏联能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重大问题在共产党内部引起激烈的辩论和斗争。

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早在1923年列宁病重的时候已经开始。当时国内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工业品价格比战前上涨了一倍，而农业品价格仍停留在战前的水平上面。工农业产品价格上剪刀差的存在使许多工业品卖不出去。一些工厂发不出工资，有些地方发生罢工事件。党内民主生活也存在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于1923年10月4日和8日两次写信给党中央，说党内缺乏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脱离群众”。10月15日，他又纠集同伙向党递交了《四十六人声明》，说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会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着“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声明还说“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要求消灭“派别统治”。为了讨论“信件”和“声明”，党中央和中央监委于10月25—27日举行联席会议，并邀请“声明”的十三名作者参加。会议以压倒的多数肯定了政治局的路线，谴责了托派分子的活动。会议决定不公布反对派的文件，以避免党内斗争的尖锐化。12月5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提出要扩大党内民主，要同官僚主义作斗争。托洛茨基认为这是他个人的胜利，决心扩大事态向政治局进一步施加压力。12月8日，他写了一封《给党的会议的信》，并在莫斯科一个区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了。接着，托洛茨基又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后来，他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标题是《新方针》。托洛茨基在信件和文章中，说“党的官僚主义几乎到处横行，有使党陷入绝境的危险”；说中央执行的旧方针是错的，它“把重心放在机关上”，用党的机关“代替党考虑和决定问题”，而这种作法“最终会使党遭到蜕化的危险”。托洛茨基提出要实行新方针，要发扬党内民主，并说“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反应最敏感”，而“老近卫军的蜕化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托洛茨基的言论，特别是关于老近卫军蜕化的说法引起多数干部的反。在全党争论中，托派虽然在高等院校得到不少人支持，但是，在全国他们并没能争取到多少支持者。争论的结果，98.7%的党员都表示支持中央的路线。1924年1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严厉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观点，指出它“具有十分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论列宁》、《十月的教训》等文章。他篡改历史，把自己描绘成十月革命的最主要的领导者，说他领导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10月22日决定拒绝把卫戍部队调往前线，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四分之三”的结局，而列宁领导的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性质”。托洛茨基说，二月革命后，列宁立即反对“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口号。言外之意，列宁放弃了自己的理论，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俄国民主革命应直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托洛茨基还点名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他们在十月革命的前夜，“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采取了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同

时，美国托派分子伊斯特曼把列宁批评斯大林的信件__公布于世以打击斯大林的威信。

斯大林奋起捍卫列宁。1924年11月，他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团会议上发表演说，揭穿托洛茨基关于他在十月革命中起过特殊作用的自我吹嘘，并且指出：“托洛茨基最近发表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斯大林著作的实质”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__1925年1月，党中央召开全会。托洛茨基因病没有出席会议。他在给中央的信件中，否认要修正列宁主义和贬低列宁的作用，但没有另作辩解。全会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论，并决定解除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同年4月，俄共（布）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会议。会议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指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__这一决议指明了苏维埃国家的光明前景，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批判托洛茨基之后不久，又出现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1924—25年，党中央为解决销售危机问题，降低了工业品价格，减少了农业税，并确定了农业雇工租地政策。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发展，也使农村富余阶层势力有所增强。季诺维也夫等人不相信苏联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他们极力夸大富农危险，说中央政策有“富农倾向”。他们建议增加对富农的赋税，另外还征收十亿卢布农业税以发展工业。这个建议显然是错误的，它将使刚有好转的农业问题重新严重起来。

1925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新反对派反对这一报告。他们控制出席大会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并拉拢其他一些代表共同推出季诺维也夫在大会作副报告。加米涅夫则提出对斯大林的信任问题，建议撤销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新反对派的进攻遭到回击。大会肯定了中央的路线，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决定把苏联“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__大会之后，列宁格勒各基层党组织纷纷集会，97%的党员表示拥护大会的决议。1926年初，列宁格勒省代表会议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职务，选举基洛夫（1886—1934年）担任省委书记。

新反对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1926年夏，他们同托派分子勾结一起，组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托—季联盟）。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过去曾激烈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现在却彼此“大赦”，相互吹捧，共同把攻击矛头指向斯大林。托洛茨基在一次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公然宣称，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臭名远扬的理论。我们拒绝相信斯大林的这种理论”。同时，托洛茨基极力宣扬他的“不断革命”论。按托洛茨基本人的说法，这是由“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的”。第一是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由于农民不能起独立作用，根本谈不上什么工农革命民主专政，“落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任务可以直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无产阶级掌权后，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所有制，而且将不得不甚至更为深刻地侵犯整个私有制”，因此，执政的无产阶级必然会同个体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和“战争”。第三是国际革命的“不断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积累只能来自农民。这样作必然要引起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反抗。因此，“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唯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才能保障俄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斯大林等中央领导人

发表文章和演说批评这一理论，指责它低估农民的革命性，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团结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社会主义可以在苏联一国首先取得胜利。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的理论是用“左”的词句掩盖的机会主义。

托—季联盟根据“不断革命”论提出自己的政纲。他们指责中央对富农等资本主义势力斗争不力，要求成倍地增加富裕农民和私营企业主的捐税，要求向富农和富裕农民征借一亿五千万亿普特的粮食，以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增加建设投资。托—季联盟的这一纲领实际是要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实现工业化。它将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危害，因而被否决。托—季联盟还说，资本主义势力已影响到党和国家，使“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化发展”，提出要“批判斯大林派制度”。这一要求受到更严厉的指责。

托—季联盟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各种派别活动。1926年6月，他们在莫斯科郊外林中秘密召开会议，煽动到会人员组织起来反对中央领导。他们到处发表演说，把自己的政纲拿到党员大会上讨论，企图迫使全党进行新的争论。他们的活动受到广大党员的抵制，托、季等人被迫在10月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派别活动。1926年下半年，联共（布）先后召开了中央全会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决定把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开除出政治局。随后，共产国际召开了执委会，解除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

1927年4月，中国革命遇到挫折。5月，英国宣布同苏联断交。托洛茨基等八十三人于5月底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攻击中央的内外政策。他们把这份政纲秘密印刷几千份，在党内外散发，要求中央宣布新的全党争论。1927年10月，党中央公布了将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的各项问题的提纲，并宣布全党进行讨论。《真理报》出版了辩论专页，把反对派的文章也刊登出来，供大家鉴别。经过全党辩论，最后投票赞成中央路线的有七十二万四千党员，而追随托—季联盟的只有四千多人，占党员总数的0.5%。

反对派并没有从这次惨败中觉悟过来。1927年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几百名反对派分子走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高呼“打倒机会主义”，“公布列宁遗嘱”等派别口号，向站在阳台上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欢呼。但是，反对派的队伍很快就被上百万的游行队伍所淹没，广大群众都站在党中央的一边。联共中央认为托—季联盟不仅越出了党章的范围，而且越出了苏维埃的法律范围，因此立即决定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将其他骨干分子清除出党。托—季联盟的组织被全部粉碎。否定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可以建成的思想也最终被埋葬了。

同布哈林的争论 1928年初，苏联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全国上一年的播种面积超过了革命前，粮食的产量同战前不相上下，但是，市场上的商品粮却减少了一半，国家收购上来的粮食只及城市需要的60%。政府在1928年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解决农业问题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但是，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个危机，在联共（布）领导内部却发生重大的原则分歧。

斯大林认为，粮食收不上来是富农反抗造成的。国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富农囤积余粮不肯卖。他们想以此来哄抬粮价，想用粮食来同苏维埃政权较量。因此，解决危机首先必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1928年初，政府决定凡是囤粮超过一定数量又拒绝按固定价格出卖粮食给国家的，一律按法律规定没收其粮食，并判以刑事罪。斯大林认为，造成粮食危机的更深刻的原因是小农的个体生产。革命前，地主和富农提供70%的商品粮，他们的粮食商

品率达到 47%和 34%。现在，74%的商品粮要靠中小农提供。但是，小农生产率低，提供不了大量的商品粮，商品率只有 11%。因此，解决粮食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扩大社会化大生产，加速实行农业集体化。

布哈林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危机是“生产和需求的比例失调”造成的，是“谷物业的停滞，甚至退化”的结果。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五年计划要求过高，工业发展速度过快，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太少。另一方面是国家为了更多地积累资金发展工业，规定的粮食价格太低，农民不愿在粮食生产上投很多力量所造成的。布哈林认为，造成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主张减慢工业化速度，把更多资金投到农业上去，以利工农业的均衡发展。他主张继续执行限制富农的政策，说对富农的非常措施“加剧了经济状况的恶化”。他认为当时实行集体化的条件不成熟，匆忙进行会导致饥荒。他要求尊重农民的个人利益，调整农产品的价格，发展个体农民经济。农业改造问题“必须在个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布哈林的意见得到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和政治局委员、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托姆斯基等人的支持。1928年5—6月，布哈林两次上书联共（布）中央，申诉自己的观点。7月，中央召开全会，批驳了布哈林的意见，但也承认在执行非常措施时发生过非法搜索等偏差。会后，对富农的态度有所缓和。到了秋天，由于乌克兰等地受灾，国家收购再度遇到困难，对富农的进攻又重新恢复了。布哈林坚决反对这种作法。9月，他在《真理报》发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公开阐明自己的看法，但受到不点名的批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联名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说中央多数派所奉行的政策是极其有害的，说鉴于中央机关篡夺了他们的权力，故意造成无法工作的条件，所以提出辞职。党中央驳回了这一要求。1929年4月，中央召开全会，斯大林作《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全面批判布哈林，指出布哈林的公式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和资本家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消灭阶级”。布哈林否定这个指责，他说“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但这种“过渡的基本路线是矛盾缩小和最后消亡的路线”。至于“和平长入”问题，布哈林主张用经济手段改造富农，他说贫农合作社可以长入社会主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也同样经过银行等等长入这个体系中去”。布哈林并不认为富农可以保留其资本主义本质长入社会主义，但他反对“经过无产阶级的残酷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的公式。

四月全会谴责了布哈林集团，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错误的，同党的路线不相容。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中的领导职务，撤销托姆斯基的工会领导职务。年底，布哈林被开除出政治局。1930年12月，李可夫也被开除出政治局，莫洛托夫接替他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以后，布哈林等人多次作过检讨，承认错误，并降任次要岗位的工作。

批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集团之后，联共（布）党最终确立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并决心运用政权的力量高速度发展工业和迅速实现农业集体化，即选定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节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就

农业集体化的实现 联共（布）批判了布哈林之后，决心加快农业集体化的进程。1929年6月—9月，全国有九十多万户加入集体农庄。这个数字等于革命后十二年中加入农庄的总户数。斯大林指出，这个新现象说明“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它是农业发展中的“大转变”。

1930年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规定了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决议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把全国分为三类地区，分别要求在1931年春，1932年春和1933年完成。决议指出，当时占多数的共耕社形式，只把土地使用权和少数农具、牲畜公有化，它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农业集体化的基本形式应当是，实行土地使用权和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决议还要求在集体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

在全盘集体化的基础上，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1928年，全国有富农一百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5%，他们的粮食播种面积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提供了全国商品粮的五分之一。政府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后，他们就缩小耕地面积，变卖生产资料，隐藏资金。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后，他们的反抗愈加激烈。为了保证集体化运动的顺利开展，苏联政府于1930年2月通过决议，废除以前颁布的关于土地租佃和雇佣劳动的法律，并决定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它转交给集体农庄。对富农本身分为三类处置：对进行反苏维埃活动的富农，采取逮捕镇压政策；对大富农，把他们迁徙到国家北部和东部地区，从事伐木、采矿、开荒等劳动；对其他富农则迁出农庄地界，安置在本区的边缘，专门拨给他们土地耕种。从1930年初到1932年秋，一共有二十四万户富农被迁徙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

在党的号召下，农业集体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30年1月20日，加入农庄的农户为全国农户总数的21.6%，一个月后就达到52.7%。运动无疑取得了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不少领导人为了追求集体化速度，公然违背自愿原则，用“剥夺选举权”、“清算”等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农庄。有时被清算者竟达15%，而被剥夺选举权者达15—20%。有的地方越过劳动组合，直接组织公社，把住宅、小牲畜、家禽等都收为公有。这些过火行为违反了党的政策，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引起农民的极大不满。富农乘机破坏捣乱，唆使农民在加入农庄前杀掉牲畜，个别地方甚至煽起反苏维埃的叛乱。所有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运动的正常开展。1930年3月2日，发表了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3月14日公布了党中央《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再次阐明了党的政策，帮助党的干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农民纷纷申请加入集体农庄随着党的路线的贯彻，集体化运动经过一段曲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高潮。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全国60%以上的农户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建立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同时国家建立了二千五百零二个机器拖拉机站，提供近十五万台拖拉机来为农庄服务。这一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80%。因此，联共中央在1933年1月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集体化运动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把亿万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是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改造农业没有经验，而且尊重农民利益不够，经常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因此，苏联集体化运动的进程曲折，农牧业的产量明显下降。1931年和1932年，连续发生大饥荒，有二千五百万人受灾。1932年的粮食产量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万吨，比1913年的八千零十万吨减少很多。牲畜的头数更是大幅度地下降。羊、猪、马的头数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

五年计划的实施 为了尽快地把苏联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27年联共(布)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发出关于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从1928年10月起，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2年底，提前完成了这一计划。1933年-1937年又实行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从1938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被迫中断。

五年计划首先是一个向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在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曾指出，苏维埃国家有五种社会经济结构。第一种是宗法式经济，即差不多完全不从事贸易的自然经济。第二种是小商品经济，这种经济结构当时包括了大多数居民。第三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它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初期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国内商品流通中占据了40—50%。富农在农村中也有一定的力量。第四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主要是租让企业，它没有获得重大发展。第五种是社会主义经济。经过两个五年计划，资本主义经济被排挤出工业和商业领域。小商品经济得到改造。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有93%的农户参加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达到总播种面积的99%。社会主义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一切经济部门都确立起来了。

五年计划规定，要高速度发展工业，要提高生产率，用新技术改造各经济部门。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掀起轰轰烈烈的劳动热潮，到处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35年8月31日，顿巴斯矿区的汽钻掘煤手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掘了一百零二吨煤，超过普通定额的十三倍多。此后，在全国兴起了学习斯达汉诺夫，掌握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各个行业中都涌现出一批斯达汉诺夫式的先进工作者。斯达汉诺夫(右)像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建成了八千九百个大企业，其中许多是过去从没有过的新型工厂。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在东部地区兴建了乌拉尔-库兹涅茨克钢铁煤炭基地，新库兹涅茨克钢铁基地，伏尔加-乌拉尔石油基地等。1940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加六倍多，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到战争前夕的1940年，苏联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一亿六千万吨煤，三千一百万吨石油，四百八十三亿度电。同时，苏联工业每年给农村提供了几万台拖拉机，使机耕地在全部耕地中的比例由1932年的20%增加到1940年的70%，初步实现了耕种的机械化。五年计划的实施使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总之，十几年的经济建设使苏联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为后来粉碎法西斯侵略奠定了物质基础。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十分巨大，但也有重大缺陷。首先是过分重视发展重工业，甚至不恰当地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标志。结果，农业和轻工业落后。1937—1940年的粮食年平均产量只有七千七百九十万吨，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五年的年平均产量七千二百五十万吨增长不多。牲畜的存栏头数还不如大战以前的多。轻工业的产值虽然比1913年增加了四点六倍，但品种少，质量差。只有重工业增长最快，达到1913

年的十三点四倍。这种增长比例既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也影响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的关系上处理欠妥善。斯大林想尽量积累资金发展工业，从农民身上取走的东西太多。1933年初，苏联实行义务交售制。农民根据播种面积交一定谷物牲畜，但国家付的价格只相当于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此外，国家还有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利用剪刀差又从农民身上取走一部分。结果，农民从集体劳动中收入很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农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经济管理中的另一问题是权力过份集中。苏联长期忽视，甚至排斥商品生产，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的调节作用。片面强调生产应按计划进行，而计划多由上面制定，往往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经济统得过死，妨碍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此外，还存在着经营管理不善，经济效益差的问题。

新宪法的制定和清洗运动的开展 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了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从法律上固定下来，1936年11月召开了第八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了新宪法。会上，斯大林作了报告，宣布“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指出，在苏联“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铲除和消灭”，“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国内只存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据这些变化，新宪法规定，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政治基础是各级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在民族国家体制上也有变化。原来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由于经济、政治的发展，改为加盟共和国。高加索联邦宣布解散，分别成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这样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便由七个增加为十一个。

根据新宪法的规定，1937年全国举行了新的苏维埃代表选举。1938年1月，召开了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选举加里宁（1875—1946年）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新宪法通过的前后，苏联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

1934年12月，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身亡。

政府毫无根据地指控前反对派领袖是暗杀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并于1936—1938年，对他们进行了三次公开审判，错误地说他们是间谍杀人犯，说他们企图依靠德、日法西斯颠覆苏维埃政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被处死，托洛茨基这时已流亡国外，也被缺席宣判死刑。斯大林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论点。他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在这一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运动。由于这时存在着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法制经常被个人指示所代替，公安机关也不受党和政府的监督。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等人乘机大搞刑讯逼供，制造假案，使肃反规模达到惊人地步。许多党和国家的著名领导人，党中央和政治局的成员，大多数的元帅、军区司令、军长师长以及难以数计的无辜群众遭到逮捕、流放、处死。大清洗的错误使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不良后果。斯大林在1939年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在进行清洗时”“犯过严重的错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并宣布以后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清洗运动。

第五章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第一节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美国的“新政”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1924—1928 年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各国资本家追逐利润，扩大投资，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有了不少增长。以美国为例，1920—1921 年，工业总产值几乎增长了 50%；按全国人口平均的年收入从六百三十五美元增加到六百九十三美元，约提高 9%。但是，全国收入集中在有产者手里，占总人口 1% 的人口平均的年收入，同时期里从七千四百九十二美元增加到一万三千一百十四美元，约提高 75%。广大人民群众购买力没有很多提高，产品的数量越来越超过了市场的需要，生产相对过剩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经济危机的阴影逼近了。

对于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各国资产阶级十分陶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告终，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着明朗繁荣的前景。社会民主党改良派首领如考茨基、鲍威尔、勃鲁姆等也跟着叫喊，认定那种稳定是巩固的、持久的。美国即将离职的总统柯立芝在 1928 年 12 月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全国可以满意地看看现在，乐观地展望未来。”危机前夕，纽约一个大银行家还说：“美国工业的形势绝对良好”。

1929 年 10 月，美国纽约突然爆发了股票价格猛跌的风潮。10 月 23 日，股票市价开始急转直下，第二天出现了空前强烈的抛售风，迫使价格惨跌。10 月 29 日，最糟的时刻到来了，大户不计行市高低，猛抛股票，一天内抛售了一千六百四十万股，创了股票买卖记录。到 11 月，五十种热门股票的平均市价比 9 月份最高市价约降 50%。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是一个征兆，宣告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危机从纽约证券交易所发源，迅速蔓延到美国全国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然后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世界经济危机从 1929 年到 1933 年持续了四年之久，1932 年为危机的顶点。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44%。1932 年的工业生产与 1929 年相比，美国为 53%，德国为 59%，日本（1931 年）为 66%，意大利为 66%，法国为 69%，英国为 82%。危机使资本主义各国的生产倒退了几十年。

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工业不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出口货——原料和食品的价格惨跌。1932 年，世界市场的橡胶价格比 1925 年到 1929 年的平均价格下降 93%，糖下降 74%，丝下降 75%，黄麻下降 62%。

危机严重地破坏了世界经济联系。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下降了 66%，倒退到 1913 年的水平以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展开了激烈的商战。从 1931 年 6 月到 1932 年 4 月，七十六个国家提高了关税税率，限制使用外汇购买外国货，实行限额进口和直接禁止进口的制度。随着世界贸易联系的破坏，资本主义各国的金融也陷入混乱状态。1931 年秋，英国放弃金本位，英联邦诸自治领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货币都跟着英镑贬值。1933 年春，美国放弃金本位，引起了新的通货膨胀浪潮。五十六个国家货币贬值。

这次经济危机破坏力之大，是资本主义世界前所未有的。危机造成的物质损失之大，不亚于 1914—1918 年的世界大战。

危机大大恶化了劳动人民的状况。在危机年代，资本主义各法国失业群众在领取救济食品国共有四、五千万工人失业和数千万农民破产。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他们没有钱购买物品，可是垄断资本家为

了维持高价，销毁大批商品。美国资本家把玉米和小麦当柴烧，把棉花毁在地里，把牛奶倒进河里；英国资本家将整船桔子扔入海中；巴西销毁了二千二百万袋咖啡。严酷的现实迫使广大群众投入斗争。危机年代充满了阶级搏斗。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如临深渊，寻找出路。德国、日本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疯狂扩军备战；美国实行“新政”，由国家干预经济。但是，无论哪种办法，都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经济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

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勉强渡过了这次危机，但仍然处在经济萧条境地，待到稍见复苏，在1937年又爆发了新的危机。

美国的“新政”1929—1933年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大风暴，严重地打击了美国的国民经济。美国的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减少了46%。煤产量减少41%，生铁产量减少79%，钢产量减少76%。成千上万的工厂停工了。到1933年3月，失业大军到达一千七百万人。失业者被剥夺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失业者由于无住房，在许多工业中心周围，搭起了临时住房。那些幸而有工作

美国城市里用废物堆成的贫民窟，被称为“胡佛村”。可做的人中，许多人往往每周只能工作几小时。他们的工资同1929年相比，下降了30—35%，即使在物价暴跌的条件下，他们的购买力也下降了15%以上。工商界头面人物一般都反对联邦政府救济失业工人。

在危机年代，农产品生产也相对过剩，市场价格急剧下跌。工农业品之间的“剪刀差”更加扩大。1929—1933年间，工业品价格平均下跌25%，而农产品价格则下跌了50%多。约有一百万个小农场破产。

美国的国民收入，1929年为八百多亿美元，到1933年下降到四百多亿美元。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广大劳动人民陷于半饥饿状态。各地群众纷纷骚动。1932年3月，底特律市有三千失业工人在福特汽车厂前举行示威，警察驱散游行队伍，开枪射击，打死四人。同年夏季，大批退伍军人为要发放退役金而去华盛顿请愿。他们在郊外扎营，遭到军警的驱赶。工人罢工人数不断增长，1930年为十五万，到1933年已超过了一百万。

1929年，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1874—1964年）就任总统。危机已经到来，他还说“任何破坏经济生活正常进程的原因并不存在”。面对危机，他又试图散布官方的乐观气氛，消除恐惧心理。胡佛一向认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应保持在最低限度。作为总统，他因没有尽力运用联邦政府的权力来改善经济状况而遭到公众的严厉批评。胡佛政府采取的一些反危机措施，没有取得显著的效果。例如他设立的一个重要机构——复兴金融公司给了银行和铁路公司很大的帮助，却没有解决主要经济问题。他先后设立的失业救济机构也收效很小。在1932年美国应届总统选举运动中，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许下诺言，要用实行计划经济的方法克服危机和确立“阶级和平”，美国资产阶级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因此，罗斯福在选举中以极大的优势击败了共和党再次提出的胡佛候选人。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1882—1945年)早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后又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1910年,他当选为纽约州的参议员,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1913年由总统威尔逊任命为海军部次长。1921年,罗斯福因患重病而双足麻痹。1928年和1930年,他两次当选为纽约州州长。罗斯福是目光远大、讲求实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有良好的组织才能。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宣布实行反危机的政策,即所谓“新政”,其目的是要在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经济危机,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斗争。

罗斯福首先着手金融方面的整顿工作:为避免尚在开业的银行遭到破产,下令所有银行暂时休业。他让国会制订紧急银行条例,把对银行的监督权和整顿权授予总统。几天以后,他命令有偿付能力的大银行首先开业。接着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由政府出面保障存款,以恢复存户对银行的信任,防止新的挤兑风潮。由国家拨款几十亿美元资助各银行及私人信贷机构。到1934年7月1日,几乎国内所有银行均全部复业。银行的信用开始得到恢复,银行的活动逐渐展开,并受到政府机构的一定的监督。

罗斯福的另一重要财政措施是宣布禁运黄金出口,停止美钞兑换黄金,放弃金本位制,发行以国家有价证券作保证的纸币三十亿美元,使美元大幅度贬值。黄金的价格由二十点六七美元一盎司提高到三十五美元一盎司,即把美元贬值41%左右,以利于向国外倾销产品,刺激生产的发展。为了防止黄金投机和外流,私人的黄金储备和金币的使用一律被禁止。

“新政”的中心措施是国家对工业的调整。1933年6月国会通过了国家产业复兴法。该法有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涉及由国家调节各企业主之间的关系。工业企业被分为十七类,每类企业都应订出“公平竞争规章”,其中规定生产规模、工资水平、工作日长度、企业产品销售范围(即市场分配)和价格水平。罗斯福公开宣布:国家产业复兴法的宗旨,是恢复工业企业的“公平”竞争,不公平的竞争,是“应该取缔的邪恶”。当时,国家产业复兴法的标记是蓝鹰,企业执行了该法的各项规定,悬挂蓝鹰标记,就被认为是爱国主义和良好公民;否则,即是叛卖行为。“公平竞争规章”的基本要求是,禁止以低于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希望借以控制竞争。

产业复兴法的第二部分涉及由国家调节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该法第七条规定:工人有权组织起来,可选派代表与雇主进行谈判,签订“集体合同”;雇主不得以工人参加何种工会作为雇用条件;雇主必须遵守最高工作小时数和最低工资限额,不得雇用童工。当时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每周为十二点五美元。这些规定,是美国工人通过长期斗争所取得的胜利。

产业复兴法的第三部分是关于以工代赈,举办“公共工程”和成立“劳动营”的问题,目的是缩减千百万失业大军。公共工程计划确定修筑公路,在田纳西河兴建巨大的水利工程、开发矿藏等大型工程。从1933年起至1939年为止,国家为实现公共工程计划开支一百八十多亿美元左右。计划的实施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就业人数在1934年为三百多万人,1935年为二百五十多万人,1936年为三百六十多万人,1937年为二百一十多万人。失业工人的劳动营是以“民间水土保持工作队”的名义建立起来的,由青年工人组成。他们参加市政建设,如种树、修路、浚沟等工作,在工余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各劳动营最初容纳二十五万青年工人,后来增加到六十万人。这些措施缓和了失业现象,但未能彻底解决问题。“新政”实施期间,尚有九

百万至一千万人失业，找不到工作。

为了把“新政”推行到农业，1933年5月，国会通过了农业调整法。该法的基本用意在于缩减农业生产，消除农产品的“过剩”现象，从而把农产品的价格恢复到1909—1914年的水平。为此目的，政府得与农民签订合同，国家给农民适当的补贴，让农民缩减耕地和屠宰牲畜。在农业调整法生效的头一年，屠宰了二千三百万头牛，六百四十万头猪，减少了三百万公顷小麦播种面积和四百万公顷棉花播种面积。尽管千百万人民感到食品不足，可是被屠宰的牲畜的肉却当做肥料使用。限制播种面积首先使小农受了损失，约有六十万个小农场因经不起压缩生产而破产。法案实施后，农产品价格虽略有提高，但受惠者只是大农业垄断组织和富裕农民。

“新政”是罗斯福利用国家权力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改革，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发展施加一定的影响，加进一些计划性、组织性的成分，如缩减工农业的生产、调整一些比例关系，从而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不改变经济基础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人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新政”实施的结果，经济从萧条中复苏，虽然回升是缓慢的，但到了二次大战前，已经接近1929年的水平。

随着经济危机的消逝，垄断资本家开始对罗斯福的“新政”不满。他们不满“新政”对他们的约束和对工人作的微小让步。因此，美国最高法院于1935年5月宣布国家产业复兴法为违宪而被废止。1936年1月农业调整法也被取消。但是罗斯福政府还是采取了改良主义政策。1935年7月，它颁布了议员华格纳提出的国家劳工关系法，继续确认了工人有组织工会、与雇主签订集体合同的权利。

罗斯福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也有某些改变。1933年11月，美国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了“睦邻”政策。罗斯福政府撤退了驻在海地和尼加拉瓜的美国占领军，取消了有权武装干涉墨西哥内政的条约，同拉丁美洲各国签订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美国对外政策的这种转变，为美国资本渗入拉丁美洲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第二节 两个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经济危机对德国的影响 世界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在危机达到高峰时的 1932 年一年中，工业产量比 1929 年下降了将近一半。钢产量从 1929 年的一千六百一十万吨降到 1932 年的五百六十万吨；煤产量从 1929 年的三亿三千八百万吨降到 1932 年的二亿二千七百万吨。生产潜力利用率降到 35%。

德国的经济危机由于有大量外债和巨额赔款负担而更加严重。1930 年德国的外债约为二百五十五亿马克，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仅仅在 1931 年就必须归还四十九亿马克，再加上十五亿马克的利息。金融负担过重，导致了德国最大的银行之一达姆斯塔得国民银行的破产。过去德国一直是用实物偿付赔款的，现在则主要用外币交付了。这对德国来说，意味着要增大出口贸易，赚取外汇。但是经济危机以来，德国的对外贸易下降了 40%。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由 1930 年的三十一亿马克减少到 1929 年的十一亿马克。

德国的农业也遭到了危机的严重打击。农产品出卖后所得的利润由 1929 年的一百零二亿马克下降到 1933 年的六十五亿马克。

工农业的危机引起了财政危机，通货贬值。许多银行破产。德

德国失业者用废旧物品搭成的住房国统治阶级实行征收新税、削减工资、削减救济金和养老金等政策，力图把危机的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肩上。工农生活严重恶化。失业人数由 1929 年的二百多万增到 1932 年的八百万；在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大降低。大批农民破产，被迫拍卖土地。德国中等阶层的境遇也十分悲惨。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是失业，便是被减薪。

德国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方面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大大增长，另一方面法西斯运动也有了重大的发展。

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取得政权 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袭击下，德国资产阶级已不能以一般的议会的办法进行统治了。1930 年 3 月，还能对失业工人扩大一些补助金的右派社会民主党人穆勒政府被推翻，天主教中央党首领布鲁宁组织了政府。布鲁宁执政时，由于经常得不到国会多数的支持，就利用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予总统的权力，进行“非常法令”的统治。布鲁宁政府减少了职工工资的 10%，减少了失业者的补助金，提高税收二十亿马克。布鲁宁的政策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不满，全国出现了群众性的抗议浪潮。

在经济危机袭击和政治动荡的局势下，法西斯党在德国的影响迅速增长。德国的法西斯党成立于 1919 年，为了欺骗群众，它先称“德国工人党”，1920 年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许多退伍军人、狂热冒险分子和野心政客被吸收进去。1919 年 9 月，一个奥地利的前下士阿道夫·希特勒参加了这个党的政治委员会。1923 年，纳粹分子在慕尼黑一个啤酒馆举行暴动失败，希特勒被判处五年徒刑。他在狱中，向同狱的鲁道夫·赫斯口述了他的自传第一卷《我的奋斗》。《我的奋斗》和纳粹党制订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理论硬说德国是“没有空间的民族”，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必须把东欧各国变成殖民地，消灭俄国，建立世界霸权；宣称德意志人是高等种族，其余种族都是劣等的，

应为德意志人服务；宣传犹太人是劣等种族中最危险有害的，必须灭绝；胡说马克思主义是犹太人的理论，要彻底消灭，等等。法西斯党徒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蛊惑宣传，许下诺言说，纳粹党上台后马上废止凡尔赛条约，取消军备限制，收复失土，夺取“德意志种族”的“生存空间”。他们许诺失业者说，给予工作和增加补助金；许诺工人说，将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许诺小农说，将取消地租，废除债务和提供补助；许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说，将降低捐税，发放低息贷款。这些蛊惑人心的宣传，骗得了一些群众的支持。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也把纳粹党德国

不同集团间的街头打斗

看作是制止国内革命，进行对外扩张的有用工具，因此用巨额金钱资助它，帮助它扩大党的机构，收买报纸，加强它所控制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等恐怖组织，为法西斯政党的上台铺平道路。

德国共产党为反对国家法西斯化进行了艰苦的斗争。1930年8月，德共中央公布了《德国人民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纲领》，揭露了法西斯分子骗人的谎言和沙文主义宣传，指出布鲁宁和希特勒的道路必然导向战争和灾难。

1931年5月，德共公布了《扶助农民纲领》，要求没收地主土地，把土地转交给无地和缺地的农民；要求减轻农民的捐税负担。德共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但是德共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不顾条件地提出了立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策略上没有集中主要力量打击法西斯主义，而是同等地既反对法西斯分子，又反对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对社会民主党人又不区别其领导人和普通党员。鉴于法西斯危险的增长，德共渐渐纠正了策略错误，向社会民主党人建议，统一工人阶级的行动，用总罢工来抗击法西斯，但这些建议都被拒绝了。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散布“较小祸害论”的理论，说为了不让较大的祸害——希特勒上台，就要支持较小的祸害——布鲁宁。这种“小害”理论实际上是帮助法西斯的理论，因为布鲁宁不是反希特勒的基地，而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开路先锋。“小害”理论阻挠了德国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

1930年9月，德国举行国会选举。德共得到四百六十万张选票，比1928年的选举增加了一百三十万张。社会民主党比前次选举丧失了六十万张。纳粹党取得了巨大胜利，从1928年选举中的八十万张增加到六百四十万张选票。希特勒分子在选举中的胜利更加巩固了他们在资产阶级右翼中的地位。

1932年3月至4月，德国举行总统选举。垄断资本家提出纳粹党首脑希特勒和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作为候选人。共产党向社会民主党建议联合提出候选人参加竞选，但遭拒绝。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又抬出“较小祸害论”，即避大害（希特勒）而选小害（兴登堡）。德共旗帜鲜明地指出：谁选举兴登堡，就是选举希特勒；谁选举希特勒，就是选举了战争！选举结果，兴登堡获得近一千九百万张选票，当选新任总统。希特勒得到一千一百三十万张选票，表明法西斯势力的增长。共产党的候选人台耳曼得到了五百万张选票。由于没有取得绝对多数，进行了第二轮选举，最后兴登堡当选。

1932年6月，兴登堡总统任命冯·巴本组织内阁。巴本上台后第一个行动便是解散国会，决定在7月31日举行新选举。其次，他于7月20日解散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鲁士政府，从而摧毁了民主共和国的支柱之一。这件事情的顺利实现，使希特勒分子看到，现在再也不必担心有什么社会势力会对

推翻民主制度进行认真的抵抗了。

在7月31日的选举中，纳粹党取得大胜，获得一千三百七十四万多张选票，在国会中占二百三十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希特勒只赢得全部选票的37%，在六百零八席的国会中，还不足构成多数。大多数德国人仍旧反对希特勒，他还没有取得政权所必需的多数。纳粹党如能同中央党合作，就能在国会中取得多数。但是希特勒要求控制国家的全部权力，遭到兴登堡总统的拒绝。德国的统治阶级在让哪个政党执政的问题上尚举棋不定。

新选出的国会还没有着手工作，就被巴本政府解散。新的国会选举于11月6日举行。纳粹党丧失了二百万张选票，三十四议席。共产党增加了七十五万张选票，议席从八十八席增加到一百席。支持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增加了一百万张选票。纳粹党虽然仍是国会第一大党，但丧失二百万张选票却是很大的挫折。巴本建议纳粹党与政府合作，但被企求一党专政的希特勒所拒绝。巴本政府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再次利用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宣布紧急状态。但是德国陆军发言人说，德国现有的军队力量不能胜任守卫边境和维持治安的任务，因此建议政府避免进行“非常法令”的统治。12月2日，兴登堡总统任命了声称能团结多数的施莱彻尔将军担任总理。

施莱彻尔着手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进行分裂纳粹党的活动，企图把主张支持政府、组织联合政府的那部分纳粹分子拉拢过去，但是这一努力也遭到了失败。1933年1月23日，施莱彻尔去见兴登堡，承认他不能在国会争取到多数的支持，要求解散国会，按照宪法第四十八条，授与他紧急权力，根据总统命令行使政府职权。

在政治危机深重、共产党的威信迅速高涨的形势下，工业和金

德国总统兴登堡（前）和总理希特勒（后）（1934年）融巨头寄希望于希特勒的纳粹党。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于是，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最反动政党的公开的恐怖专政在德国建立起来了。

德国法西斯的恐怖政策和重整军备 希特勒一上台就着手建立法西斯恐怖专政。他首先迫害共产党，封闭共产党机关报和印刷厂。1933年2月27日夜里，在希特勒的助手戈林（1893—1946年）的直接指使下，纳粹党徒烧毁了国会大厦，诬陷共产党人纵火，借此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德共领袖台耳曼也遭逮捕。2月28日，根据希特勒政府的建议，兴登堡颁布紧急法令，废除了魏玛宪法中有关保证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一切条款。流亡在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1882—1949年）被诬控为国会纵火犯。9月，法西斯分子在莱比锡公开审讯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在法庭上揭露了法西斯分子制造纵火案件的阴谋，严厉谴责了法西斯血腥制度的反人民罪行。在世界各国人民声势浩大的抗议声中，法庭最后不得不宣告季米特洛夫无罪。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名称叫作《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的授权法，它把立法权、国家预算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改权都从国会手中转给内阁，为期四年。这意味着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

纳粹党剥夺了人民所有的民主自由权利。5月2日，工会被摧垮，工会

财产被没收。7月14日，希特勒凭借授权法宣布：在德国唯一的政党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其他政党的活动都将受到苦役徒刑的惩罚。全国各地设立了集中营，几十万人被关进去，惨遭拷打和杀害。犹太人更是大批地被监禁和屠杀。纳粹党把成千上万的青年训练成法西斯暴徒，使他们盲目服从希特勒。1933年5月10日，青年学生被骗去焚烧书籍。在柏林国家剧院门前，洪堡大学对面的广场上焚烧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梅林的著作也被焚烧，甚至海涅、高尔基、爱因斯坦、托马斯·曼等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也不能幸免。在柏林发生的毁灭文化的焚书蠢事，被其他的大学城如法炮制。许多著名的学者、教授被迫停止了在德国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许多著名的演员、艺术家被赶下了舞台，被逐出了德国。青年不再被引导去进行思考与学习；学校变成了法西斯战争的军事训练所。缺少生存空间的谎言、沙文主义、纳粹的种族狂和军事训练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课。

为了发动侵略战争，建立德国资产阶级的世界统治，纳粹党把国家变成军营。工业生产完全纳入备战轨道，财政、邮电、交通运输各经济部门完全服从备战的要求。提出了“以大炮代替黄油”的口号。美国成百亿马克的贷款和投资，使德国军火工业迅速发展。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长，希特勒加紧摆脱凡尔赛条约的约束。1933年10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德国公开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把正规军扩充到六十万人。同时，宣布重建空军；根据与英国鉴订的海军协定，公开建造军舰和潜艇。1936年3月，希特勒政府废除了洛迦诺公约，公然派遣军队进驻莱茵非武装区。

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争策源地终于在法西斯德国形成了。

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 1927年，日本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是一次金融危机。2月，许多地方小银行破产；3月，东京的大银行渡边银行倒闭；4月，大企业铃木商店破产。若厩内阁被迫辞职，危机还在扩大。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1863—1929年）为首的政友会内阁上台。田中代表日本垄断资本和地主反动集团的利益，是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以推行侵华政策的首领闻名。1927年6月，日本政府召集了“东方会议”，以图统一统治集团内部对华政策的意见。田中首相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作为会议的总结。《纲领》声称，“满蒙并非中国本土”；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利益，等等。日本为了把中国东北地区置于它自己的统治之下，不惜进行武装干涉。田中内阁为了保护垄断资本在中国山东的利益，先后三次出兵入侵山东，1928年5月11日占领了济南。这一行动不仅点燃了中华民族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熊熊烈火，而且导致英、美、法等国的极力反对，美国对日本还提出了强硬抗议。中国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日本的野心也有所戒备，不如从前言听计从，于是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人于1928年6月在沈阳附近派人炸毁列车，炸死了张作霖。田中内阁对国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也进行了残酷的镇压。

田中义一内阁的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热潮，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对华贸易一蹶不振。田中内阁的强硬外交也遭到了美、英的强烈反对。在炸死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天皇明确表示了对田中的不信任。1929年7月，田中内阁总辞职。继任内阁是由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成。外相是币原喜重郎。

1929年秋在美国开始的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日本经济也陷入最大的危机中。日本的工业生产从危机前的最高点到危机时的最低点，降低了30—70%；出口贸易急剧下降37%，进口急剧下降40%，物价综合指数从174.5%降至120.4%；蚕丝和大米价格下降程度更为急剧。弱小的企业一个接一个地破产，大企业也被卷入解雇和降低工资的风暴中，1931年的失业者约有三百万人。同年，由于东北地方及北海道遭到冻灾和大歉收，农民的遭遇惨不可言。外出逃荒、倒毙路旁、全家自杀、卖儿卖女的事情层出不穷。

滨口内阁实行压缩财政、产业合理化和撤销黄金出口的禁令三大政策。依靠整顿中小企业、解雇工人、降低工资、提高劳动强度，来降低物价、增加出口能力。黄金解禁会进一步引起通货紧缩和物价下跌，但可以稳住汇兑行市，开辟引进外资的道路，求得垄断资本的稳定。因此，垄断资本在经济危机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国家与垄断资本互相联合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资产阶级把危机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激起了工农运动的发展。1931年罢工次数比1928年增加了一倍半。1929年底和1930年4月，东京的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人大罢工，以及与此相呼应的大阪与横滨的电车、公共汽车的劳资纠纷震动了全国。1930年4月，东京和大阪的纺织女工，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掀起了长期的罢工。许多工人还同宪兵、资本家的打手展开了“宛如巷战”的大武斗。租佃纠纷也经常引起流血事件。劳动农民要求减轻地租，要求“土地归农民”，还广泛采取象集体抗税、不向地主还债这些斗争形式。进步知识分子也积极投入反对垄断资本家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处于兴盛时期。

军部势力的猖獗 日本财阀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强力政权”。要实现这个目的，势必要以军阀作为工具。法西斯势力便乘机抬头的。其主力是军部，尤其是陆军。军部是指1945年投降前日本庞大的法西斯军事官僚机构，包括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军令部（海军最高指挥部）、教育总监部。根据日本旧宪法（1889年制订）规定，日本天皇集立法、行政、司法权和统帅权于一身，因此军部直属天皇，政府无权过问。法西斯势力抨击资产阶级的议会政党——民政党和政友会，指责它们不能保证“巩固的秩序”，要求在天皇的名义下建立军部独裁政权。

军部法西斯分子迅速抬头的直接起因是，在1930年的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日本向英美妥协，把原先主张的拥有大型巡洋舰与美国的比例数字10:7降为10:6。这遭到海军军令部的强烈反对。但是滨口首相不顾这种反对，指示日本全权代表在妥协方案上签字。在签字以后，军令部反对批准它，弹劾政府说：未征得统帅部同意，政府就任意决定兵力，这是侵犯了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但是得到财界有力支持的政府仍然说服了枢密院批准了条约（1930年10月）。此外，由于滨口内阁实行压缩财政的政策，陆、海军的经费略有减少，这也引起了军部的不满。

法西斯军人对政党和财界的憎恶激化了。1930年11月，滨口首相遭到受军部煽动的一名右翼青年的袭击，受了重伤，终于死亡。这次事件是军部对政党内阁总反攻的第一步，是法西斯恐怖时代的序幕。

这个时期，出身于中小地主的所谓少壮派军人特别活跃，他们以荒木贞夫为首结成集团，称“皇道派”，进行蛊惑宣传，指责垄断组织，说什么“少

壮军人将援助人民反对投机集团、政客和追求暴利者。” 皇道派主张推翻现有的议会政党统治而建立法西斯专政。

1931年3月，法西斯分子酝酿过建立军部独裁政权的军事政变计划，但因没有成功希望，未付诸实行。1931年10月，又发生一次尚未发动而告终的政变阴谋。政府虽然得悉政变酝酿情况，但法西斯分子没有受到政府的任何惩罚。1931年12月，继滨口内阁之后的若槻内阁又倒台，政友会犬养毅（1855—1932年）建立了新内阁，荒木贞夫任陆相，军部势力显著增强。犬养毅内阁对外采取了积极推进战争的姿态。但法西斯分子对这个内阁还不满意。1932年5月15日，一群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把犬养毅首相杀死在官邸。继犬养毅内阁之后，预备役海军大将斋藤实当了首相，他组成了所谓“举国一致”的半法西斯内阁。此后，一直到1945年战败，日本再也没人提起政党内阁。

法西斯活动猖獗起来，工农群众运动遭到残酷镇压。日本的工会分属于不同的政党，因互相对立而软弱无力。1932年10月，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家在全国同时被捕，到1934年中期，日共中央被彻底破坏，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已不复存在。连自由主义者也开始遭到了迫害，各大学教授和学生维护学术思想自由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了。

在法西斯为所欲为的同时，法西斯军人之间的对立也在发展。在日本陆军内部争取合法地掌握国家政治实权的统制派势力大增，主张通过政变实现军部独裁的皇道派更加偏激。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的青年军官以东京第一师连级军官为中心，率领一千四百余名士兵发动了叛乱，占据了许多政府大厦，杀死了前首相斋藤及几名大臣。首相冈田启介从官邸及时逃走。经过四天，叛军被镇压下去了。而叛乱军官所要求的军部独裁政权由统制派来实现了。受天皇之命组成的广田弘毅（1878—1948年）内阁更加屈从于陆军的意志。

二·二六事件以后，日本国内反军、反法西斯的情绪在发展，甚至在众议院中也出现了批判军部的人。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冲突的形势下，1937年6月，成立了近卫文麿（1891—1945年）的内阁。近卫同军部、政党关系都好，还以四大老财阀之一住友财阀为靠山。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实现“大战”计划，这便是近卫内阁的使命。

对中国侵略的扩大 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美国和英国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日趋激烈，日本的对华贸易受到美国垄断资本的排挤而降第二位。日本一向企图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决不甘心受美国资本的排挤。经济危机年代，日本加速了对外侵略的步伐。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侵入中国东北。不到半年，完全控制了整个东北。1932年3月，日本为了掩盖它赤裸裸地占领中国领土的面目，抬出傀儡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1932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又试图占领上海。但由于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这个企图未能得逞。

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以武力侵略中国，欧美帝国主义采取了纵容侵略的政策。英法控制的国际联盟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电报，建议制止事件的扩大，美国政府呼吁不要扩大“满洲”的冲突，这都是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混为一谈，不分是非，实际是偏袒日本。日本继续扩大侵占地区，而国联行政院一再开会讨论，却连援引国联盟约十六条的规定对侵略者实行经济制裁的决议也没有通过。1931年12月10日，国联通过决议，组织由英、

美、法、德、意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到中国东北对局势进行实地考察。这个委员会以英国驻印度的前总督李顿为首，因此通称李顿调查团。这个调查团行动迟缓，1932年4月才到达中国东北。10月，国联才公布“李顿报告”。报告表面上认定日本的侵略行为，承认中国东北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应维护中国在该地的主权。但是它又建议组织一支配有外国教官的特别宪兵队，并任命“顾问”以监督当地的财政、经济和政治。这实际上是要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侵略军仍在扩大侵占地区，1933年1月初占领了山海关。2月下旬，国联大会为了挽救国联威信，通过决议，承认日本占领“满洲”是非法的，要求日本从“满洲”撤出军队；确认中国对东北各省的主权；要求国联成员国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得承认“满洲国”。

1933年3月，日本以国际联盟拒绝承认“满洲国”为借口，退出了国际联盟。日本国民在国际社会中感到孤立，对前途尤觉不安，但日本政府对这种不安加以巧妙的诱导，使绝大多数人变成了战争的热烈支持者。反战和平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彻底的镇压。

1936年8月，日本在首相、陆相、海相、财相、外相五相会议上，决定了“国策大纲”，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的同时，期望向南方海洋发展”作为根本国策。五相会议基本上构划了以后的太平洋战争的设想。随着对中国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深感铁、煤、石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的不足，因此企图向战略物资极为丰富的南洋谋求发展。要侵略南洋，就不得不和这一地区的殖民主义者英、法、荷、美相对立。深感孤立的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6年11月，同纳粹德国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第六章 世界人民制止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第一节 为制止法西斯侵略的斗争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在全世界受到法西斯奴役和战争威胁的情况下,1935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六十五个共产党的五百一十名代表,这是共产国际最大的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如何对待法西斯主义和对法西斯侵略作斗争的问题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针对法西斯分子的欺骗宣传及社会上流行的对法西斯主义的混乱看法,季米特洛夫着重阐明了法西斯主义的实质,指出法西斯主义决不是什么“站在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上面”的超阶级的政权,“乃是最反动、最主张民族侵略主义、最抱帝国主义野心的财政资本家的公开的恐怖专政”。它对内用恐怖手段摧残工人阶级、革命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对外进行最野蛮的侵略,野兽般地仇视其他民族。季米特洛夫指出,垄断资产阶级实行法西斯主义专政,是它被经济危机逼得走投无路、进行垂死挣扎的反映,是资本主义制度虚弱的表现。所以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虽然是极端残暴的,但它同时又是不稳固的,是完全可以被击败的。

为了反对和战胜法西斯,季米特洛夫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实行行动统一,反对法西斯。在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包括工人、劳动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内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大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制订人民阵线纲领,支持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合理要求,反对苛重赋税和高利贷,解除法西斯匪徒的武装,恢复民主自由,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在建立人民阵线以后,有条件的国家可以建立人民阵线政府。这种政府将不是工人阶级专政的政府。这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建立民主政府。

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对于胜利地实现人民阵线的纲领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消除工人阶级的分裂,代表大会决定要与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及工人运动中的其他非共产党分子建立新的团结。为此,代表大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既明确指出了实行新的政策之后可能出现的右倾危险,又尖锐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

大会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是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

大会以后,各国共产党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努力,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西方,法国和西班牙人民的斗争表现较为突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一些国家人民的反帝武装斗争,如中国、朝鲜的抗日战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人民阵线 世界经济危机于1930年秋波及法国,直到1936年,法国经济才呈现出某些复苏景象,可是从1937年年中起又重新衰退。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经济。和1929年相比,1935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下降到67.4%(即下降了三分之一),其中钢产量下降到60%。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都大幅度下降。危机的重担全部压在劳动人民身上。1935年,全国失业工人达三

百万；在业工人的工资急剧下降。1934—1935年有四十万农民破产，他们的土地落到大地主手中。

危机加深了法国的阶级矛盾，工人的罢工斗争此伏彼起。垄断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妄图建立法西斯专政。得到垄断资本家资助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如“火十字团”、“法兰西行动同盟”、“青年爱国团”、“法兰西团结联盟”等活动十分猖獗，企图武装夺取政权。

1934年2月6日，二万多名法西斯匪徒在反对贪污腐化的政府的口号下，向国会大厦波旁宫进发，妄图解散国会，武装夺取政权。在法国共产党号召下，巴黎二万五千多名工人涌上街头，英勇地打败了法西斯匪徒。为了进一步摧毁法西斯势力，共产党与社会党于2月12日共同发动了工人总罢工，罢工人数达四百五十万。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劳动人民举行了示威游行。二月战斗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在工人群众的要求下，社会党与共产党于1934年7月27日签订了两党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公约。

法国共产党进一步为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而努力。1935年5月，由共产党发起，在巴黎召开了全国左派反法西斯会议，应邀参加的有激进党、激进社会党、共和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和其他左派组织。会议通过决议，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人民阵线。同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时攻下巴士底狱纪念日）全国举行了人民阵线拥护者的示威游行，共有二百多万人参加，在巴黎一地参加者就达五十万人。这次示威游行表明了人民阵线广泛的群众基础。1936年1月，人民阵线公布了纲领，要求实行政治大赦，解散法西斯组织及其武装，实施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扩大失业救济，保卫和平，实现军事工业国有化等等。在法国全国各地召开的许多群众大会上，这个纲领被讨论和通过。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工人队伍更趋团结。1936年3月，法国的两大工会——法国总工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举行统一代表大会，实现了总工会的统一。统一之前，两大工会拥有的会员共约一百万人，到1936年年底，统一后的总工会会员增至五百万人。法国共产党的威信也有了很大增长，党员人数从1936年1月的八万六千人增至1936年12月的二十九万人。

1936年4月末至5月初，法国举行国会选举。人民阵线各党取得了胜利。在国会六百一十个议席中，人民阵线获得了三百八十一席，其中共产党的议席从上届国会中的十席增到这届的七十二席，社会党获得一百四十六席。社会党人里昂·勃鲁姆（1872—1950年）担任法国总理，组织人民阵线政府。

人民阵线在选举中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工人阶级为实现人民阵线的纲领而英勇斗争。从1936年5月中起，在全国各地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参加者达一百六十万人。企业主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实现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工资平均提高15%；工人得到了照发工资的两周假期；企业主承认工人选出的全权代表机构。在共产党人的要求下，勃鲁姆政府颁布了许多法案以巩固工人斗争的成果，并实现了人民阵线纲领的某些要求，如实行军事工业的部分国有化，禁止法西斯的联盟等。

人民阵线纲领的实施引起了大资产阶级的激烈反对，他们总想，把黄金运出国外，破坏法郎币值，从而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剥夺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勃鲁姆政府对此没有任何回击。社会党和激进党是在群众的压力下参加人民阵线的，它们没有想为巩固人民阵线和实现其纲领而努力。只有共产党人为在企业 and 农村建立人民阵线委员会，并为召开人民阵线代表大会而努

力，但是法共提出了“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口号，放弃了共产党在人民阵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不敢与社会党和激进党的破坏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带来了严重后果。

1937年3月，勃鲁姆宣布“暂缓”实现人民阵线纲领。人民阵线政府竟于1936年9月和1937年7月两次宣布法郎贬值，把工人因提高工资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1938年4月，右派激进党人达拉第（1884—1970年）上台执政，公开执行反人民、亲法西斯的政策。1938年11月，达拉第政府公然取消了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和工人斗争得来的其他成果。11月30日，全国四百万人举行二十四小时的抗议大罢工，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实行运输业及许多企业的军事化，大批共产党员工人被解雇。社会党与激进党的领导人破坏了人民阵线，公开转到了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终于把法国导入灾难的深渊。

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 埃塞俄比亚是十九世纪末通过武装斗争维持独立的唯一非洲国家。直到二十世纪初，埃塞俄比亚还是一个封建国家，保留着奴隶制甚至部落制的残余，资本主义因素刚开始萌芽。在统治集团内部有一派自称为青年埃塞俄比亚派，以塔法里·马康南为首。他们主张建立中央集权政府，以利于市场商品生产和国内外贸易的发展。1930年塔法里·马康南成了埃塞俄比亚皇帝，称海尔·塞拉西一世。塞拉西开始实行一些改革：1931年初次颁行宪法，建立统一的行政制度，消除各种封建分裂的倾向；还进行了货币改革，整顿税收制度，继续执行限制奴隶制度的政策。

但是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受到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而中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塞俄比亚就是英、法、意三国激烈争夺的目标。法国特别是在修建了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以后，曾占有优势。1925年，英、意就划分在埃塞俄比亚的势力范围缔结了一项协定。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坚决反对和法国的抵制，这项协定归于失败。埃塞俄比亚的原料资源和它的战略地位，都使法西斯意大利垂涎三尺，意大利决心以战争攫取它。从1934年起，意大利向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运送军用品、飞机和坦克。同时还制造边境纠纷事件。1934年12月5日，在埃塞俄比亚与意属索马里接壤的奥加登省瓦尔瓦尔绿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意大利人使用了坦克和飞机，意、埃双方伤亡数十人。

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国联加以干与，但是国联采取“不干涉政策”，建议双方达成仲裁协议。国际联盟的态度是由法、英等国的立场决定的。1935年1月7日，即埃塞俄比亚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后的第四天，法国外长赖伐尔同墨索里尼在罗马签署了一个条约，约定在法、德两国矛盾进一步尖锐时，法国可以得到意大利的支持；意大利还同意放弃向法国在非洲占有优势的地区扩张。为此，法国不仅给意大利在东非的领土补偿和经济补偿，而且实质上允许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英国政府也向意大利提出愿意做一笔牺牲埃塞俄比亚的交易。

法、英的立场纵容了法西斯意大利的侵略气焰。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军队不宣而战，侵入埃塞俄比亚境内。他们在北面的主要突击方向是从厄立特里亚向阿迪格腊特、阿杜瓦和阿克苏姆三个城市，然后沿马卡累、德西埃、亚的斯亚贝巴一线南进。这是主攻方向，集中了三分之二的意大利军队。从东北及东南两个方向的进攻是次要的，意军在那里的任务只是牵制住埃塞俄比亚的兵力。

海尔·塞拉西皇帝颁布了总动员令。埃塞俄比亚人民奋起参加正义的防御战。但是埃军由公爵们指挥，他们不很听从最高司令部的指挥，只关心保卫自己的领地。组织松懈、装备落后的埃军面临的任务是要挡住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的法西斯军队的袭击。尽管意军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但是他们并未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胜利。战争延续下去了。

意大利军队侵入埃塞俄比亚后，海尔·塞拉西一世政府立即向国际联盟请求援助（埃塞俄比亚从1923年起即为国联成员国）。1935年10月7日，国联不得不承认意大利是侵略者，对它的经济和财政实行制裁：国联成员国必须禁止向意大利输出武器和某些原料（橡胶、铅、锡、铬），停止输入意大利货物，不向意大利提供贷款等。这些制裁措施对事态的进程不起决定性影响，但是英、法等国仍然迟迟不执行对意大利的制裁。意大利如果不进口石油就会难以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国际联盟却没有在这方面采取制裁措施。全世界劳动人民起来声援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的共产党人发表了一项保卫埃塞俄比亚的声明。意大利共产党人在全国各地展开了积极的反战活动，揭露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法西斯分子的沙文主义宣传。许多国家举行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示威游行和抗议罢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致埃塞俄比亚人民书中强调指出了“在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利益是一致的。

保卫独立的战争在埃塞俄比亚激起了巨大的爱国热潮，军队和游击队无不英勇作战。但由于意、埃军备优劣悬殊，加上意大利法西斯军队使用了包括施放毒气在内的惨无人道的作战方法，意军还是向前推进了。1936年5月，意军攻入亚的斯亚贝巴，海尔·塞拉西一世流亡海外。墨索里尼政府把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属东非帝国。

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进犯，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另一策源地。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站稳脚跟之后，就凯觭邻近的法属殖民地，威胁英属非洲殖民地。英帝国在红海上的航线也处于受攻击的地位。英、法与意大利的关系大大地恶化了。

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埃塞俄比亚确立了殖民主义恐怖统治。他们想掠取那儿的矿业资源、肥沃的土地，把五十万户意大利人家庭移居到那里去，把埃塞俄比亚变为他们的战略基地。意大利的占领使埃塞俄比亚人民遭到巨大痛苦，但人民没有被压服，武装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游击队活跃在全国各地。所谓移居五十万户意大利人根本办不到。第一批移民不得不一手拿铲一手拿枪才能从事劳动。不久，一部分移民只好返回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农民不把粮食卖给入侵者。意大利人非但不能从埃塞俄比亚进口粮食，反而要把粮食输送到埃塞俄比亚去供给他们的庞大驻军。意大利殖民主义者掌握着大居民点和道路，但是未能完全控制广大的边远地区。

西班牙内战 1931年西班牙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12月9日通过的新宪法巩固了人民斗争的成果。宪法宣布政教分离、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封建劳役被取消。政府还采取一些措施，实行极有限的土地改革，提高工人工资和缩短工时。但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重大问题基本上没有得到解决；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等法规也遭到企业主的抵制和破坏，因此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工人罢工席卷全国，往往具有政治性质；农民不断夺取地主土地，并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

与此同时，西班牙反动派利用资产阶级政府的软弱，采取了攻势。1933

年，各右翼党派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叫“西班牙右翼自治派联盟”¹，这是地主、金融巨头、教权派和军阀的反动联盟。1933年11月议会选举时，该联盟获得多数议席，建立了以勒鲁斯为总理的亲法西斯的反动政府，“黑暗的两年”（1934—1935年）时期开始了，劳动者在共和国头几年所争得的成果被取消了。

法西斯的进攻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击。1934年10月，西班牙右翼自治派联盟的代表公然参加勒鲁斯政府。这件事激起了劳动者的愤怒，当天宣布的总罢工几乎扩展到全国。阿斯图里亚劳动者的斗争尤为激烈，在那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并肩战斗，矿工武装队伍占领了兵工厂，击溃了政府军，甚至夺得了当地政权。政府调集部队进行镇压，工人们英勇抵抗了二十天。起义遭到镇压，矿工牺牲三千人，被捕三万人。

十月事件有力地推动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建立。1936年1月，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翼、共和同盟及其他一些左派政党达成协议，建立了人民阵线。在2月的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击败了反动势力，取得了胜利。人民阵线的两个政党——共和党左翼和共和同盟组成政府执政。

政府实现了人民阵线纲领的部分内容，释放了政治犯，逮捕了将近六千名法西斯分子，解散了一些反动组织。一些失业工人得到工作，十万农民得到土地。但是，地主的经济实力没有被摧毁，法西斯组织还继续在军队中活动，法西斯的威胁没有被消除。

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以圣胡尔霍和佛朗哥（1892—1975年）为首的西班牙法西斯分子，伙同金融巨头、土地贵族、高级教士和一些拥护旧制度的高级将领，阴谋叛乱，要以武力推翻人民阵线政府。1936年7月18日，法西斯分子在西属摩洛哥休达电台播送了一条暗语：“整个西班牙晴空万里。”这是约定的开始叛乱的信号。当天，法西斯分子和反对共和国的军队在西属摩洛哥、地中海的巴利阿里等岛和西班牙北部同时发动叛乱。叛乱原定由圣胡尔霍领导，他因飞机失事身亡，佛朗哥将军成了叛军首领。由于绝大部分军官站在叛乱者方面，不久叛乱扩大到全国的军队。但是，西班牙广大人民奋起反对法西斯叛乱，英勇作战，挡住了敌人，粉碎了叛乱分子企求速胜的妄想。

德国和意大利起初只是供给法西斯叛乱者武器（包括坦克、飞机）和金钱，派遣军事顾问和教官。不久，便公开出兵进行武装干涉。在叛军方面作战的意大利军有十五万人，德军有五万人。德、意的军舰进入了西班牙领海，封锁了西班牙海岸，同时也直接威胁英、法在地中海的一系列战略基地。

法、英、美等国所采取的立场是有利于叛乱分子的。法国勃鲁姆政府害怕在西班牙事件的影响下，法国也会被人民阵线运动的深化牵着走，所以决定停止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武器供应。1936年9月，在英、法的倡议下，有二十七个欧洲国家签订了“不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协定，禁止把武器输往西班牙，禁止西班牙购买的武器过境。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来监督协定的执行。美国政府虽未正式参加这项协定，但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禁止向西班牙输出武器。西班牙共和国购买武器受到了阻碍，但是佛朗哥叛军却照旧从德、意等国得到武器和军队的援助。

各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民十分同情西班牙人民保卫民主和自由独立的战争。他们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取消“不干涉”政策，取消禁运，帮助西班牙，制止德、意的武装干涉。五十多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三万五千多人志愿前

去西班牙，组成了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给西班牙人民以极大的鼓舞。一万多名“国际纵队”战士，光荣地牺牲在西班牙。

1936年11月，佛朗哥叛军在占领了西班牙西部和北部广大地区之后，进逼马德里。叛军头子以四个纵队向西班牙首都发起攻势，以市内的第五纵队作为接应，妄图一举占领马德里。西班牙军民誓死保卫首都，在四个多月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进攻。1937年3月，共和国军队在马德里东北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中痛击五万多人的意大利干涉军，解放了大片领土。在以后的两年里，西班牙人民坚守着马德里。

叛军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向共和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发动了新的进攻。共和国军民浴血苦战。由于力量悬殊，1937年10月底，阿斯图里亚斯地区失陷。在东北部地区，共和国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右翼共和党人、右翼社会党人和暗藏的法西斯分子于1937年5月在巴塞罗那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不久被平息。1938年春，叛军攻占特鲁埃尔，进兵阿拉贡地区，窜到地中海，把共和国的领土切成两片。1938年底，佛朗哥叛军和德、意干涉军齐头并进，向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区大举进攻。第二年1月，巴塞罗那失陷。接着，加泰罗尼亚地区全部陷落。

在共和国处境危急的关头，右翼社会党人在马德里发动了政变。1939年3月，他们夺取了政权，向佛朗哥叛军献出了马德里。叛军和干涉军迅速占领了西班牙的全部领土。西班牙人民争取民主和独立的斗争失败了。在西班牙建立了佛朗哥法西斯独裁政权。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以后，接着把侵略矛头伸入华北。为了独占中国，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7月7日，日军突然袭击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开始了对华北的新的侵略，不久把军事行动扩大到长江流域。日本统治集团以为日军可以速胜，两三个月就能结束战争。

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凶狠，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代表人民意志的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7月15日，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两党合作宣言，并派周恩来等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日本的野心和侵略行动直接威胁到蒋介石集团的利益，危害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国民党政府被迫实行对日作战。经国共两党协议，中共领导的西北主力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色游击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国民党被迫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

但是，蒋介石政府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抗战一开始，国民党战场丧师失地，一溃千里。芦沟桥事变不到一个月，北平、天津相继沦陷。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攻占南京。1938年3月，华北几乎全部沦陷。同年10月，华南的门户广州，华中的重镇武汉，先后陷落。国民党政府搬到四川重庆，把军队的主力集中到西南和西北，避免对日作战。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执行全面的民族战争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从1937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创立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一、二年内，在华北各省、长江南北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把利刃插入敌占区。国民党放弃了的大好河山，有一些已被八路军、新四军收复。1938年，八路军、新

四军抗击着日本侵略军四十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半数以上，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主力。当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但是，那时在共产党内，就统一战线中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王明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变为右倾错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把人民武装力量统一到蒋介石的手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

广州、武汉陷落以后，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军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用主要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离开重庆，公开投降，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国民党里亲英美派的蒋介石集团则更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了几次反共高潮，进攻八路军，袭击新四军。由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击退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克服了重重困难，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路。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大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保卫了中国的独立，并支援了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第二节 绥靖政策的破产

法西斯侵略集团的形成 在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勾结日益紧密。在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过程中，德、意两国接近起来。德国支持意大利对非洲的侵略，作为报酬，意大利完全放弃在奥地利、巴尔干和多瑙河流域同德国扩张计划的对抗行动。意大利并吞了埃塞俄比亚后，德、意两国于1936年10月24日签订了协定，德国承认意大利占有埃塞俄比亚，双方共同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并且确定，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两国采取共同的方针。

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正式结成政治同盟，签订了所谓《反共产国际协定》，确定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商讨所谓“防止措施”。这个协定还有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附件，当时秘而未宣。1947年，在东京对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中，该秘密附件首次公布。秘密附件规定，当一国受到“苏联进攻或进攻威胁”时，双方将讨论保护共同利益的措施；缔约国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同苏联缔结政治条约。一年以后，意大利也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于是德、意、日三国的军事政治集团在实际上已经形成，这便是所谓“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这个法西斯侵略集团一方面要反苏反共，另一方面借反苏反共为幌子，同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利益。

德、意、日法西斯集团的形成及其侵略扩张，严重地损害了英、法、美的利益，但是，英、法、美三国不愿坚决反击法西斯的侵略。它们的政策，是使西方免于战争威胁，而把法西斯侵略的矛头引向东方，与苏联发生对抗。它们幻想，让法西斯国家与苏联在战争中杀得两败俱伤，自己出来收拾残局，独霸世界。因此，面对德、意、日的侵略扩张，它们接二连三地让步、退却，实行了所谓“不干涉”政策。这种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德、意、日法西斯主义者利用了英、法、美“绥靖主义者”惧怕社会主义的这种心理，来实现自己的侵略目的，在欧洲、非洲和东亚建立他们的“新秩序”。

德国吞并奥地利 奥地利是法西斯德国侵略中欧的第一个牺牲品。希特勒之渴望并吞奥地利，除了在《我的奋斗》中说过他决心把所有条顿种族纳入帝国这个理由之外，他还有两个理由。如果奥地利归德国所有，就是既打开了捷克的门户，也获得了通往西南欧的宽广道路。

早在1934年7月，希特勒便企图占领奥地利。7月25日，在德国策划下，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了奥首相陶尔斐斯，企图夺取政权，但被奥国政府军击溃。希特勒把德军调到奥地利边境准备采取行动。当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反对德奥合并，派遣四个师，开到意奥边境。希特勒受到牵制，不敢冒险。此后，德国用金钱、阴谋、暴力颠覆奥地利政府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奥地利境内的纳粹运动也日益猖獗。不久，意大利和德国又开始接近起来，奥地利对外依靠意大利的政策逐渐失去意义。1936年7月，希特勒下令德国参谋部制订占领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

英、法、美三国统治集团对德国侵占奥地利领土的计划十分清楚。它们有责任保证奥国的独立，因为凡尔赛和约的第八十条规定：德国应承认并确切尊重奥国的独立。圣·日耳曼条约第八十八条也规定：奥地利的独立如非经国际联盟行政院的许可不得变更。但是，正当奥地利的独立遭到严重威胁时，英、法、美采取了所谓“不干涉”的绥靖政策。

1937年11月，英国首相张伯伦派遣他的亲信哈里法克斯到德国与希特勒会晤。哈里法克斯宣扬英、德合作的意义，建议通过谈判来解决英、德两国间的矛盾，使两国接近起来。他向希特勒暗示，德国如果侵占奥地利和捷克，英法不会出来干涉，说“欧洲秩序变更的问题”迟早总会发生。经过这次会晤，希特勒已经明确肯定，英国为了同德国达成协议，同意把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让给”德国。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在非正式谈判中也向希特勒表示，对德奥合并表示赞同。美国政府在获悉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意向后，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去制止侵略。它们推测，吞并奥地利是德国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之一，因而采取了纵容的政策。

希特勒了解了英法美在奥地利问题上的态度以后，便大胆行动起来。1938年初，德国法西斯加强了德奥合并的宣传。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则叫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作为策应。德国二十五万大军在奥地利边境集结。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奥地利人忧心忡忡。处于地下状态的共产党号召奥地利人民保卫祖国的独立。工人对纳粹分子展开了斗争。奥地利政府重新禁止纳粹党，并逮捕了它的领导人。

2月12日，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自己的官邸召见奥地利总理舒什尼格，向他授予书面的最后通牒。所有的条件是不容讨论的，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内阁保安部长，释放所有在押的奥地利纳粹党人，保证纳粹党的宣传鼓动自由等等。舒什尼格接受了希特勒的全部要求。

奥地利的工人、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抗议的怒潮，许多工厂停止了工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舒什尼格决定于3月13日就奥地利的独立问题进行全民投票。但是在3月11日，当希特勒要求立即取消全民投票，要求舒什尼格辞职并任命以赛斯—英夸特为首的新政府时，奥地利统治集团就慌忙地接受了这些要求。同一天，希特勒下令德国武装部队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德军侵入了奥地利。在奥地利纳粹党人配合下，德军很快实现了占领。13日，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

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侵略激起了全世界劳动者的愤怒。伦敦、巴黎、纽约、布鲁塞尔等城市举行了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对奥地利的占领。3月17日，苏联政府建议举行国际会议商讨反侵略的措施，但是遭到英法政府的拒绝，美国政府也漠然置之。不久，英、法、美实际上承认了奥地利并入德国。德国法西斯分子为顺利占领奥地利而受到鼓舞，立即准备实施下一步的侵略计划。

慕尼黑会议和捷克斯洛伐克灭亡 德国占领奥地利以后，立刻把侵略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德国建立欧洲霸权的重要一环。占有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控制了到多瑙河流域的所有通道；捷克斯洛伐克拥有很发达的工业，又可以充实德国的军事实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创立起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境内，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约有三百二十五万，住在捷、德交界的多山的边境地区。这个地区，形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对德国的天然屏障。希特勒早就企图撤除这道屏障。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党是听命于希特勒的法西斯党，其首领为康拉德·亨莱因。他接受法西斯德国的指示，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各种要求，使真正的协议无法达成，制造紧张局势，以便希特勒乘机干涉。

1938年4月24日，亨莱因在卡罗维发利发表演说，要求所有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完全“自治”，苏台德区的全部官职要由德意志人担任。亨莱因分子还公开提出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废弃同法国和苏联的互助条约，与德国外交“协调一致”。

亨莱因分子的要求遭到了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舆论的谴责。以总统贝奈斯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拒绝了亨莱因分子的要求。于是，亨莱因分子准备于5月间举行暴动。同时，希特勒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军队，发表声明，支持“苏台德自治”的要求。形势危急，捷政府于5月20日发出了局部动员令。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措施受到了举国一致的拥护，也得到了英法公众舆论的同情。

以首相张伯伦（1869—1940年）为首的英国政府执行的是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换取希特勒进行反苏战争的政策。法国政府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法国为了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大国地位，需要加强自己同东欧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法国不仅与捷克斯洛伐克，而且与南斯拉夫、波兰等国都有同盟关系。任凭德军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意味着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三十个师团和军事工业抛给德国，而且意味着抛弃法国在东欧所有的同盟国和保护国。但是另一方面，法国追随英国的挑动希特勒进行反苏战争的政策，这必然要牺牲其同盟国的利益。不过，英法政府对于希特勒能否按照它们设想的轨道行动是没有把握的，因此，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扩张威胁，表现出政策上的摇摆。在“五月危机”时，英法两国政府对德国提出警告：英法对于德国侵捷所引起的冲突不能无动于衷。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估计，德国要击败捷军，必须出动三十五个师的兵力，剩下只有五个正规师和八个后备师可用于守备西线，而法国可能动员一百个师，此外还有苏联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因此，德军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希特勒不得不暂时让步，把德军撤离捷克斯洛伐克边境。

“五月危机”之后，德国法西斯分子一方面加强武装力量，以便能以“闪电战”击溃捷军；另一方面，对英法两国加强军事讹诈。这一政策很快产生了效果。8月初，英国政府派朗西曼勋爵为首的代表团到布拉格，表面上去进行调停，实际上去施加压力。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同亨莱因分子重开谈判，并同意苏台德区实行“自治”。

但是妥协者的脚步落后了。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法西斯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将苏台德区交给德国。次日，亨莱因分子在苏台德区举行叛乱，但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镇压下去。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党被解散，亨莱因逃亡德国。德国宣布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进行威胁。局势再度紧张起来。

9月15日，张伯伦飞往德国与希特勒会晤，建议希特勒由英法出面调停德捷冲突。希特勒提出了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要求，并声称这是他在欧洲最后的领土要求。张伯伦向希特勒声明同意他的要求而返回伦敦。18日，英法两国总理和外长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迫使捷克斯洛伐克立即将苏台德区交给德国。19日，贝奈斯政府接到了英法建议满足希特勒要求的联合照会。

英法帝国主义强迫贝奈斯政府割让苏台德区的消息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极大的愤怒。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不断发表声明，苏联将承担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签订的互助公约规定，只有当法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时，苏联才有援助的义务，如果法国不援助时，苏联也就没

有援助的义务。9月19日，苏联政府再一次通知贝奈斯政府，如果法国忠实于援捷的义务时，苏联立即援捷。苏联看到了法国统治阶级所执行的绥靖政策，为了真能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曾委托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转告贝奈斯说，即使法国不出兵援助，只要捷克斯洛伐克自己坚决抵抗法西斯侵略，并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请求，苏联也准备提供军事援助。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群众的义愤和苏联政府表示支持，贝奈斯政府拒绝了英法的联合照会。

英法统治者进一步对捷政府施加压力，向贝奈斯提出警告说，如果因拒绝英法建议而引起德捷战争，英法政府不提供任何援助；并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苏联援助，则德国与苏捷联盟作战便带有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英法政府将不能不支持德国。在这种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同意将苏台德区割给德国。

根据张伯伦的建议，9月29日到30日，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代表英、法、德、意四国，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会议把已经商妥的宰割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决定确定下来，产生了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必须在10月1日起的十天内，把苏台德区和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其他边境地区交给德国；该地区内的防御工事、工矿企业、铁路及一切建筑一并移交，不得损坏。协定以最后通牒在慕尼黑的张伯伦（左）和希特勒（右）的方式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代表。

10月1日起，德军开进了苏台德区等地。捷克斯洛伐克丧失1938年德军开进苏台德区了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二分之一以上的经济资源，失去了天然防御工事，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意味着法捷、苏捷互助条约的实际废除，为希特勒向东方侵略打开了大门。

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根据张伯伦的建议，德、英共同发表一项宣言，声称两国解决纠纷，永不兵戎相见。张伯伦从慕尼黑回到伦敦时，手中挥舞着一张纸，并宣称“我们这一代的和平已经得到了保证”。此后不久，12月6日法德签订了类似的声明。张伯伦和达拉第以为缔结这个协定，会使英、法避开德国的侵略，而把侵略的矛头引向东方，反对苏联。英法绥靖主义者作了法西斯的帮凶，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

1939年3月14日，希特勒强迫捷克斯洛伐克的新任总统在卖国文件上签字，把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合并于德国。第二天，德军占领了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灭亡了。

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大大加强了它在战略上的和军事政治上的地位，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美国的孤立主义 国际事件的发展，使二次大战前的美国对外政策，基本上操纵在统治阶级的所谓孤立主义分子集团手里。尽管罗斯福政府的对外政策是在全世界保护垄断组织的利益免受德、意、日的侵犯，但是它长期内没有采取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具体措施。孤立主义的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使美国避开欧亚各国的纠纷，实际上却助长了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气焰。孤立主义集团代表了美国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主张：把美国的竞争者拖进战争，并使它们在军事冲突的过程中彼此削弱，然后美国在有利的条件下参战，坐收渔翁之利。

孤立主义集团利用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大量散布和平主义言辞，使国

会于 1935 年 8 月 31 日通过了中立法案，宣布禁止把美国武器输往一切交战国。这个法案立即应用于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从中立法案的文字规定来看，似乎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都同样实行了禁运，但在实际上，这个法案完全有利于侵略者、不利于被侵略者。这是因为侵略者已经武装起来，而被侵略者没有武装；而且中立法案并未禁止输出原料、物资，当时进行侵略的意大利，可以继续从美国输入原料、物资。

1936 年夏，西班牙内战爆发，美国和英、法一样，采取所谓“不干涉”的绥靖政策。罗斯福公开宣布：中立法也适用于发生“内战”的国家。1937 年 5 月 1 日，美国国会依据罗斯福的上述声明，通过了新中立法，规定该法案也适用于发生“内战”国家的双方。同时，新法案还授权总统不仅有权禁止武器输入交战国，而且可以禁止任何货物输入交战国；经总统指定可以出售的某些货物，要遵循“现购自运”（以现金支付和非美国船只运载）的原则。新中立法仍然以中立姿态援助了法西斯的侵略。美国的武器装备通过德、意法西斯干涉者，源源不绝地运送给西班牙佛朗哥叛军。

在亚洲，早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前，美国就以军火、物资大量供应日本。美国政府并未援引中立法案以禁止对日本出售武器及物资。日本进行的全面侵华战争，是对美国在远东利益的严重威胁。可是，这一次美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坚决的步骤制止侵略，它并没有运用中立法于中日战争，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有利的。此外，新中立法确立的“现购自运”原则，中断了美国对中国抗战物资的供应，因为中国既无远洋航行的舰队，又处在日本的海上封锁之中，所以这一原则为日本侵华大开方便之门。1939 年 11 月，美国将“现购自运”原则扩大到军火，进一步牺牲中国来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

美国的进步力量要求与其他国家联合，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但是政府对这些呼吁无意听从。美国政府默认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占，正式承认了佛朗哥政权，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并吞，支持了英、法同德、意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实际援助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在英、法、美的绥靖政策纵容下，德、意、日三国在欧、亚、非三洲的侵略扩展很快，这就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迅速增长起来。美国资产阶级的一些人开始比较坚决地要求放弃中立，主张支持英、法，反对德、意、日。

美国资产阶级阵营内出现了两大集团的斗争。1939 年国会讨论修改中立法提案时，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辩论。6 月 30 日，众议院的孤立主义分子集团以二百票对一百八十八票的多数通过了对交战国维持军火禁运的议案。由此可见，直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政府仍在执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中立”政策。

莫斯科谈判失败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939 年春，在欧洲，战祸已经迫在眉睫。英法政府继续执行纵容纳粹德国进行侵略的政策。但是为了躲避人民群众憎恶法西斯的压力，也为了加强对法西斯德国的压力，英法政府表现出愿与苏联结盟制止侵略的姿态。在英法等国的人民，而且一些资产阶级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如英国的劳合-乔治、邱吉尔，法国的赫里欧都主张同苏联缔结互助条约，以遏制法西斯的侵略。

从 1939 年 4 月中旬到 8 月下旬，英、法、苏三国进行了关于缔结互助条

约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英法要求苏联，当英法两国提供安全保证的国家，即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比利时、荷兰和瑞士遭到侵略的时候，向它们提供军事援助。苏联提出订立苏、英、法三国互助条约，即三国有任何一国遭到德国进攻时，彼此必须立即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同时，三国还承担义务，不仅对英法有义务保护的国家，而且对与苏联毗邻的波罗的海诸国家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各种援助。苏联的建议遭到了英法的拒绝。英法不愿意同苏联一起向毗邻苏联的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实际上是给希特勒指出了一条进攻苏联的道路。英法的缺乏诚意和片面要求，导致了谈判的中断。

7月，苏联建议进行关于缔结军事公约的谈判。英法表示同意，但是，派到莫斯科的代表都是次要人物，无权签订任何协定。谈判中，苏联代表提出，苏德并不毗邻，一旦发生战争，苏军只有借道波兰，才能直接同德国作战，援助英法和波兰。英法不但不要求波兰同意苏军过境，反而支持波兰拒绝苏联的建议。军事代表团的谈判又中断了。

英法根本不想同苏联达成协议。就在英、法、苏三国举行公开谈判的同时，6、7月间，英国与德国在伦敦举行了秘密会谈。英国政府制定了英德协议的具体计划，其内容有：英国放弃集体安全以及同苏联结盟的政策，同德国缔结互不侵略条约；英国答应解除对波兰承担的义务，同意德国在东欧和中南欧自由行动。英国甚至建议希特勒召开英、德、法、意、波五国会议，讨论将但泽（格但斯克）归并德国、满足希特勒要求的问题。英国政府策划新的慕尼黑事件的阴谋，终于使英、法、苏三国的政治、军事谈判归于破裂。

为了打击英法孤立苏联并唆使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苏联接受了德国的建议，于8月23日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互不侵犯，一方同他国交战，另一方保持中立；条约有效期为十年。苏联知道，德国并没有放弃侵略苏联的计划，只是借这个条约避免同英法和苏联两线作战的危险。苏联的目的在于借这个条约提供的一个时期的和平，加强国防，为日后的反侵略战争作更充分的准备。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粉碎了英法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绥靖”希特勒德国，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往后的局面，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

附表一：1770年以来的英国内阁

续表

执政年代	内阁首相及其所属政党
1964 — 1966	威尔逊内阁（工党）。
1966 — 1970	威尔逊内阁（工党）。
1970 — 1974	希思内阁（保守党）。
1974 — 1976	威尔逊内阁（工党）。
1976 — 1979	卡拉汉内阁（工党）。
1979 —	撒切尔夫人内阁（保守党）

附表二：美国历任总统

任序	姓名	党派	任期	备注
1.	华盛顿	联邦党	1789 — 1797	
2.	约翰·亚当斯	联邦党	1797 — 1801	
3.	杰弗逊	共和党人	1801 — 1809	
4.	麦迪逊	共和党人	1809 — 1817	
5.	门罗	共和党人	1817 — 1825	
6.	约翰·昆西·亚当斯	共和党人	1825 — 1829	
7.	安德鲁·杰克逊	民主党	1829 — 1837	
8.	马汀范·布伦		1837 — 1841	
9.	威廉·哈利逊	辉格党	1841 — 1841	1841 年 4月4 日死，由副总统泰勒继任
10.	泰勒	辉格党和民主党	1841 — 1845	
11.	波尔克	民主党	1845 — 1849	
12.	泰洛	辉格党	1849 — 1850	1850 年 死，由副总统菲尔莫尔继任
13.	菲尔莫尔	辉格党	1850 — 1853	

今日民主党

续表				
任序	姓名	党派	任期	备注
32.	富兰克林·罗斯福	民主党	1933 — 1945	1945 年 4 月 12 日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
33.	杜鲁门	民主党	1945 — 1953	
34.	艾森豪威尔	共和党	1953 — 1961	
35.	肯尼迪	民主党	1961 — 1963	11 月 22 日被刺，由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
36.	林登·约翰逊	民主党	1963 — 1969	
37.	尼克松	共和党	1969 — 1974	1974 年因水门事件下台，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由副总统福特继任
38.	福特	共和党	1974 — 1977	
39.	卡特	民主党	1977 — 1981	
40.	里根	共和党	1981 —	

附表三：日本历届内阁总理大臣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战争的初期阶段

德军闪击波兰和波兰的覆亡 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开始制订侵略波兰的作战计划，代号为“白色计划”。柏林深信，德军能以“闪电战”迅速击溃波兰，而英法是不会给其盟国有效援助的。

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5分，德国法西斯军队侵入了波兰，陆军、空军同时出动。波兰政府在德波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满心指望英法的援助，未作认真的战备。德国一开始就投入了五十八个师，其中包括六个坦克师、八个摩托化师（约二千五百辆坦克）和两个航空队（二千架飞机）。而波兰只有三十七个步兵师、十一个骑兵旅、两个摩托化旅和将近四百架飞机。德国陆军全线进犯。它的空军不断空袭华沙，还在华沙附近投下伞兵。波兰政府要求它的盟国英法“采取联合行动来制止战争”。

在无法推脱对波兰承担的义务的条件下，英法开始动员，但是仍然寄希望于同德国谈判。法西斯德国断然拒绝了英法的要求。9月3日，英法先后向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

德国武装部队在七百多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进攻。德军的突然进攻，使波兰军队无法集中起来，波兰大多数的飞机都在地面上被摧毁了。波军被德军分割包围。南线德军进展较快，于9月8日就进抵波兰首都华沙郊区。9日波军在华沙西面的布祖拉河上发动反攻，又遭失败。14日，华沙同全国其他地方的联系已完全断绝。

当装备不良、失去战略指导的波兰军队英勇保卫祖国国土的时候，德国西线的空虚实际上已暴露出来了。法国有一百一十个师，英国派到大陆的有五个师，而德国当时在西线只有二十三个师。英法不难给德国造成压力，从而减轻波兰的困境。但是英法不仅没有使用地面部队作战，它们的空军和海军也都按兵不动。

由于波军在布祖拉河上进行反攻，华沙得到短暂喘息机会，加紧修筑了工事。从9月8日至27日的二十天期间，波兰首都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9月中旬波兰政府撤离华沙。9月27日，华沙陷落。波兰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在10月2日停止了抵抗。

9月17日，苏联军队开进了波兰，占领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等地区。9月28日，德苏签订了“定界”条约，确定了双方各自在波兰的占领地区。

德国法西斯分子立即把他们的种族主义学说付诸实施。数以千计的波兰军官、专业人员、知识分子被驱集在一起，当场处死；更多的人被遣往德国，在工厂做工或服低贱劳役；千千万万波兰人被当做劣等民族被迁往贫困地区，为德国移民者腾出地方。在整个战争期间被法西斯杀害的波兰人达六百万之多。

德国侵占挪威和丹麦 击溃波兰之后，德国法西斯统治者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在西线发动进攻，就故技重演，重申“和平”保证。10月6日，希特勒在国会表示愿意和英法议和。英法提出把恢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独立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谈判没有进行。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他发动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于决定由什么人统治欧洲。在波兰战败后的七个月，英法无论在陆地或在空中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时在形式上保持战争状态，实际

上没有展开军事行动，因此获得“奇怪的战争”这一诨名。希特勒借此良机为西线的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

在“奇怪的战争”时期，除了法国东北边境几次小接触和多次不见敌机踪影的空袭警报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法国军队中，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刻板生活，除了举行一些徒然无用的训练外，一直毫无作为，这种状况渐渐使士气萎靡，人心麻木，政界人士中出现了一股渴望议和的趋向。

希特勒的成功，英法缺乏积极精神所显示的失败，引起了中立国对纳粹德国的恐惧。中立国都感到，只要德、法军队还没有展开搏斗，就谈不上最后的定局。这个时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土耳其、挪威、瑞典、比利时和荷兰都幻想以严守中立而避开战祸，这又造成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形势。

美国开始摆脱对欧洲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迟钝和漠不关心。罗斯福总统清楚地看到了纳粹德国的得势对美国的危险。1939年11月，他劝说国会通过“现款自运”法案。它允许交战国从美国购买军事装备，但必须付现款而且自己负责运输。这有利于英法，因为它们能做到这一点。

在“奇怪的战争”期间，德国制定和通过了侵占丹麦和挪威的计划（名为“威悉河演习”）。丹麦和挪威据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们是德国和英法双方的侧翼，是控制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必争之地；此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铁矿又是德国必须的重要战略物资。

1940年4月9日，德军向丹麦和挪威这两个中立国发动了进攻。占领丹麦的行动于发动进攻后的四小时内全部结束。丹麦政府被迫同意“在德国的保护下维持中立”，并且同意丹麦的工业“间接”为德国生产，进行“友好合作”。

在挪威，德军遇到了挪威军民的英勇抵抗，挪威当局坚持战斗决不投降。希特勒军队对挪威也采用闪电式的袭击，当他们侵入丹麦领土的时候，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和伞兵也开始在挪威各港口奥斯陆、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卑尔根、特隆赫姆以及纳尔维克地区登陆和空降。4月9日傍晚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10日占领了各重要港口和机场。挪威军队不得不撤退到内地。

4月14日支援挪威的英法军队开始在纳尔维克附近登陆。尽管时机有所延误，但是英法军队在一个遥远的战区吸引住了一部分德军。装备较为优良的法国轻步兵于4月底到达纳尔维克，登陆成功。纳尔维克被攻占，德国守军向东撤退。但是那时法国的形势危急，胜利登陆的军队从6月2日至7日撤走。

在挪威中部，英法军队于4月下旬在纳姆索斯和翁达尔斯内斯这两个地区转入进攻。它们的任务是解放特隆赫姆以及同在奥斯陆以北作战的挪威军队会师，但是由于连吃败仗，于5月初撤出了挪威中部。6月10日，德军在粉碎了分散的挪威军队的抵抗之后，占领了挪威。

挪威沦陷，国王哈康七世及其内阁逃亡伦敦继续抗战事业。瑞典名义上保持中立，但被迫同德国合作，对德国供应铁矿和木材。希特勒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纳入他的轨道，欧洲的又一个地区沦于德国的控制之下。

法兰西的溃败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开始执行以侵占法国为目标的“黄色计划”。计划中的军事行动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占领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绕过法国设防坚固的马奇诺防线。第二阶段，迫使法国投降。

1940年5月，德国在从北海海岸到瑞士国境的长达八百公里左右的西部战线上，部署了一百三十六个师，总人数为三百三十万，组成三个集团军群

展开进攻。在战线的北翼，面对荷兰和比利时的北部是博克上将指挥的“B”集团军群；在中部是龙德施泰特上将指挥的“A”集团军群，由它担任主攻；在南翼是勒将军指挥的“C”集团军群。西线大战爆发后，由法、英、比、荷、波等国组成的盟军共一百三十三师，与德军相抗衡。

5月10日，希特勒德国在西线发起总攻，德军首先侵入荷、比、卢。博克的军队冲过了马斯河，占领了比利时列日防区。英法军队大部分集中对付博克军队。博克军队粉碎了荷比军队的抵抗，打退了英法的部队，迅速向前推进。德国法西斯飞机对荷兰城市进行了野蛮的轰炸。13日，荷兰政府迁往伦敦。14日，荷军总司令温克尔曼命令投降。17日夜，德军占领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此时，龙德施泰特军队越过卢森堡，进攻法军在色当的防线。不久，突破了法军在色当至那慕尔之间九十公里的防线。德国坦克师在色当附近强渡马斯河之后，对圣康坦全线展开进攻，矛头西指，直驱海边。盟军全线的战略形势急剧恶化。联系中断，在很大程度上军队失去了指挥。大量的难民，一串串的汽车、马车、自行车、残废人的四轮马车拥塞路上，堵塞了盟军的撤退路线。德国飞机无情地扫射和轰炸他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包括军人接受了法国政府的一种说法，即未来的战争将限于坚守固若金汤的抗德的马奇诺防线。可是谁也想不通，整个战线竟会如此轻易地彻底崩溃。而且一旦前线被突破，法国陆军似乎就象一只戳破的气球那样全部瘫痪了。对盟军来说，更危险的事是：法国政府中投降派逐渐控制了局势。法国资产阶级吸取了战争失败往往导致革命的历史教训，它对战争失败出现巴黎公社的后果记忆犹新。在战争失利的形势下，法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逐渐转向失败主义和亲法西斯的立场。法国政府一再改组。早在1940年3月接替达拉第总理职务的保罗·雷诺不断扩大他的政府，以便尽可能把除共产党以外的各种政治力量罗致进去。在前线危急时刻，雷诺又邀请贝当元帅参加内阁，起用魏刚代替甘茂林出任法军总司令。贝当和魏刚都是显赫一时的名将。前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坚守凡尔登取胜而著名；后者以曾经充任1918年盟军总司令福煦的得力助手而闻名于世。他们都象征着1918年的法国的军事胜利。雷诺请他们出山是一个着眼于心理作用的行动。但是，到头来，他们是投降派，更加速了法国的溃灭。

到5月20日，德国坦克师的主攻方向已经明朗：他们在调头转向西北方的大海。21日，德军进抵英吉利海峡。这样，在沿岸一带形成了德军对英、法、比盟军的马蹄形大包围圈。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下令投降，28日比利时军队放下了武器，德军的包围圈缩小了。盟军只控制着法、比边境的一个港口——敦刻尔克。

5月26日傍晚，英国海军部发出信号：开始执行“发电机作战计划”——即从海上撤退。从5月27日起，德军开始空袭敦刻尔克，英国皇家空军全力以赴保卫海边滩头阵地、登船点以及停泊的船只。边战斗、边撤退的行动继续到6月4日清晨。从敦刻尔克撤退到英国海岸的人数总共达三十三万八千多人，其中英国人约二十万名，法国人约十三万名。最后一条船开走之后，四万法国士兵被俘。英国远征军的大炮、高射炮、反坦克炮、机枪、摩托车等全部重型装备落到了德国人手里。敦刻尔克的撤退是出色的，它使英国远征军避免了毁灭的灾难，但是这次撤退的成功并不是英法的胜利，而是一系列挫败中的一幕。英国虽然保住了一支军队，但它几乎没有什么武器了。自

此以后，法国军队将孤立无援地去对付德国人的优势兵力的进攻。

6月5日，德军开始执行“黄色计划”第二阶段的任务，从马奇诺防线到英吉利海峡之间、沿埃纳河和索姆河一线发动攻势。法军由于最优秀的部队和大部分装甲部队在比利时消耗掉了，现在只能以六十五个第二流的师去抵挡包括十个装甲师在内的总共一百四十三个师的德军的进攻。法军最高统帅部已经浸透了失败主义情绪。这是力量悬殊的战斗，德军像潮水般地涌进法国。10日，法国政府匆忙地离开巴黎，先迁都尔，不久再迁波尔多。

墨索里尼认为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于6月10日向英法宣战。意大利派出三十二个师攻打驻在阿尔卑斯山的六个师的法军。尽管意军在数量上大占优势，它的进攻没有成功，法军守住了战线，但是意大利的参战使法国的境况更加困难了。

6月14日，德军占领了未设防的法兰西伟大城市——巴黎，埃菲尔铁塔上立即高悬起卐字旗。16日，雷诺辞职，卖国贼贝当接任总理。17日，贝当向德国提出停战要求。希特勒没有立即答复。不多几天德国军队深入到法国内地。6月21日，他们抵达卢瓦尔河，占领了南特、图尔、纳韦尔、第戎一线以北的整个地区，坦克兵团从第戎南下深入到里昂地区。

6月21日，德国士兵在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即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的地方，特意从博物馆拖来了被保存的福煦元帅的旧卧车。希特勒选择在这儿向法国提出停战条件。该日下午，希特勒坐在1918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带来了法国代表团。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向法国人宣读了停战条款。22日，法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停战协定规定，法国被分割为两个地区：包括法国北部富庶的工业区在内的一大片土地为德军占领区，占领军的费用由法国负担；法国的其他土地为非占领区，由贝当傀儡政府统治，首府设在维希（所以也称维希政府）。除去在非占领区为维持内部秩序所必需的部队外，法国所有的武装部队必须解除武装并且复员。法国还同意把德国的全部政治流亡者移交给德国，并遣返德国战俘。德国没有立即占领法国全部领土的目的，不仅在于从政治上分裂法国，使法国流亡政府难以成立，而且在于利用法国的傀儡政府来掌握法国的舰队和殖民地，不使它们落入英国人的手中。

法德停战协定确定在法意停战协定签字后生效。法意停战协定于6月24日签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四年之久坚持不败的法兰西，在这次战争中只经过六周战斗就被击溃而退出了战争。

邱吉尔和不列颠之战 希特勒德国在欧洲扩张的得势，盟军的连连挫败，引起英国舆论界的极大愤慨。就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即将陷入德军之手的时候，许多保守党人也开始认识到，张伯伦的慕尼黑政策使政府走向政治破产，使国家走向军事崩溃。保守党要求撤换自己的领袖。经过了1940年5月7日至8日议会激烈辩论之后，内阁首相张伯伦辞职。过了两天，邱吉尔组成了战时内阁。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副首相，内阁成员还包括自由党领袖辛克莱和保守党著名人物艾登。

温斯顿·邱吉尔出身于名门贵族，早年当过记者、军官。他进入政界，一再当选为下议院议员，也一再出任内阁大臣，久已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是英国保守党的典型代表，一心保持英帝国的利益。1919年，他是“防疫圈包围”苏维埃俄国的支持者之一；他任殖民事务大臣时，镇压过民族运

动；1935年，他不赞成对意大利的侵略实行制裁。但他有政治远见，从慕尼黑事件之后，看到了希特勒的危害。从那时起，他决心挫败希特勒。邱吉尔的联合内阁组成时，英国正处于困难境地。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自知前途艰险。5月13日，他在下议院发言时说，在最近几年，“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汗水和眼泪”。但邱吉尔在逆境之中表现得镇定而乐观。在英国遭到德军空袭以后，他曾到伦敦硝烟弥漫的废墟中去踏访，用食指和中指打着“V”字手势来表示胜利。邱吉尔政府逮捕了一批被怀疑同希特勒德国有关的人。新政府的这种决心，得到了广大阶层的支持。

法国沦亡之后，英国面临德军入侵的威胁。海军是英国可靠的防御力量。但是，倘若法国舰队落到德国人手里去的话，德意轴心国就会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大西洋的护航运输——英国的生命线将会受到严重的危险；德军在不列颠群岛的登陆也将成为可能。英国政府决定消除法国舰队这个未知数所造成的危险。7月3日至4日，停泊在英国港口的法国舰艇受到英检查船队的攻击。法国舰队大部分舰艇的停泊地米尔斯克比尔也遭到英国武装部队的袭击，仅一只法国战列舰逃脱，其余的舰艇不是被击沉，便是遭重创，还有一千三百名法国水兵丧命。法舰未落入德国人之手，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卫了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德国长期没有制订以入侵来征服英国的计划。希特勒指望在承认自己领土扩张的基础上与英国政府谋求妥协议和，可是邱吉尔拒绝任何妥协。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终于下令准备入侵不列颠，代号为“海狮作战计划”，他要求8月中旬完成作战准备。由于英国握有制海权，德国的将领不得不向希特勒建议，把这次行动推迟到10月，或第二年。德国统帅部认为以空军压制英国是取胜的先决条件。于是，一场大战纯粹在空中进行，德国的陆海军士兵均未参加，几乎象是旁观者一样。7月10日，德国空军空袭英国的港口和护航船队，开始了不列颠之战。希特勒动用了将近一千二百架轰炸机和同样数目的歼击机。德国空军凭借数量上的优势，从8月8日至18日不分昼夜地轰炸英国的海军基地、雷达站和飞机场。8月15日，德国投入的空军力量达到顶点，一天总共出动一千七百八十六架次，动用的轰炸机达五百多架。德国企图消灭英国空军，但是没有得逞，自己的空军反遭惨重损失。德国这时决定对伦敦进行一次“恐怖攻势”，从而把心理战放在优先于摧毁敌方武装部队的地位。从9月7日起德国空军对伦敦实行集中的袭击。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平均有二百五十架轰炸机飞过来，在伦敦上空倾泻成吨成吨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成百上千处发生了大火，整个整个的街区化为灰烬，伦敦居民挨了整整两个月的狂轰滥炸。但是空袭不仅没能挫败英国人民的斗志，反而使他们团结一致，跟法西斯主义作斗争。

英国的坚决抵抗使德军的入侵难以实现，“海狮作战计划”的执行被无限期地推迟下去。由于希特勒于1940年7月31日下达了关于准备对苏作战的指令，德国武装部队已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苏作战上，空军的主力也已东移。从1940年11月份起，德国空军主要轰炸英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英国航空工业的中心之一——考文垂遭到了最猛烈的轰炸。1941年5月10日伦敦遭到最后一次集中的空袭，大英博物馆和英国议会均遭到破坏。此后，德军对英国的空袭衰弱了。当时，德国的潜水艇还在海上威胁着英国的运输线，但是英国人民在不列颠之战中以显著的毅力和勇气抵住了巨大的破坏。

戴高乐和自由法国 当德军的“闪电战”势如破竹，法国走向溃灭的时

候，在法国资产阶级中只有个别代表人物，主张继续战斗，抗击德军的入侵。当时被任命为国防和陆军次长的戴高乐将军便是抗战派的代表。他反对魏刚将军所宣布的巴黎不设防，主张保卫巴黎，必要时进行巷战。他拟订了一项在北非继续进行抗战的详尽计划；并且企图迫使雷诺政府采取一些有利于在海外继续战斗的措施。当雷诺辞职，贝当元帅组阁时，戴高乐认为这意味着投降，毅然决定离开法国。6月17日，戴高乐飞往英国。

在戴高乐看来，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当务之急是救亡图存。但是，只有少数法国人继续战斗是不够的，应该使法国作为国家重新投入战斗。戴高乐意识到任重而道远。他打算首先宣布奋斗目标，其次取得武器，然后建立起一支队伍。6月18日他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号召在英国的法国全体官兵参加他所建立的“自由法国”组织。他坚决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戴高乐的募兵活动虽非一帆风顺，但到6月底已经初具势头。1940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戴高乐在伦敦公众赞许的目光下，检阅了从白厅前通过的第一批自由法国支队。一周之后，首批自由法国飞行员参加了对鲁尔区的轰炸，并发表了有关这次空袭的消息。到7月底，大约有七千人拿起武器为戴高乐和法国战斗。

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承认戴高乐为自由法国一切武装力量的领袖。8月7日发表了邱吉尔——戴高乐协议。协议再次明确规定，戴高乐为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戴高乐不得不承认指挥任何联合行动的最高权力只能属于英国，但英国人不能使用这支力量去进行他所不同意的战斗。协议还规定自由法国军队的所有费用暂由英国政府垫付，但是单独立帐，以后偿还。

戴高乐得到了英国的支持，摆脱了财政上的紧张状态之后，把注意力转向非洲。从8月到10月，自由法国的部队占领法属赤道非洲（加蓬除外）和喀麦隆。10月27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发布法令，宣告成立帝国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职权。到11月，戴高乐的武装力量扩展到三万多人，自由法国的力量日益壮大。

意大利侵略军在北非和希腊的挫败 意大利参战后，致力于在非洲扩张领土。1940年8月，意军毫无困难地占领了未设防的英属索马里，随后又侵入苏丹和肯尼亚。但是，意大利人在东非的地位是不巩固的。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压迫的游击战逐渐扩展，受歧视的土著部队全部逃跑，加入了“爱国者”的队伍。驻在埃塞俄比亚的意军七万人，与本土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受到一支从苏丹和肯尼亚出动的由英国人、印度人、南非白人和自由法国战士组成的混合部队的包围。北面，混合部队渗入厄立特里亚境内，于1941年3月在克伦击溃意军的抵抗，并占领了阿斯玛拉和马萨瓦，俘虏一万五千人。南面，混合部队攻入意属索马里，向西北斜线推进，于1941年2月突破意军防线，俘虏二万人，4月抵达亚的斯亚贝巴。意军将领先是逃亡，不久投降。

埃及在整个中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提供通往丰富的石油产地的通道。1940年9月中旬，墨索里尼派一支十七万多人的部队从利比亚对埃及发动进攻，同保卫埃及的三万多名英军、新西兰军和印度军对峙。埃及境内的西沙漠成了双方的战线。英军的前哨阵地在马特鲁港。1940年9月，意军从利比亚攻入埃及，占领了塞卢姆和西迪巴腊尼，便停下来筑防御工事，消耗了三个月的时间。倒是英国人于12月发动了进攻。意军混乱地进行撤退。1941

年1月英军占领巴尔迪亚，嗣后攻克托卜鲁克，便停止前进了。

墨索里尼为了最后在分享胜利果实的盛宴上占有一席之地，不通知希特勒，便于1940年10月15日决定进攻希腊。意大利人以优势兵力对付希腊人，从1939年被其占领的阿尔巴尼亚出发，进击希腊。到10月底侵略者赢得了一些初步胜利。11月中，希腊人便发动反攻，迫使意军全线退却。不到十天功夫，侵略者被推回到他们的起点之后。

德国攫取巴尔干 当德军还在西线作战、空军正在进攻英国之时，希特勒的视线已经开始转向东线，盯住东欧和苏联的广大国土和财富了。希特勒认为，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称霸欧洲和世界的决定性步骤之一。他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过是用以麻痹苏联的缓兵之计。等到波兰覆亡、法国投降后，他下令立即制订进攻苏联的秘密军事计划——“巴巴罗萨计划”。1940年12月5日，计划得到批准。为了执行“巴巴罗萨计划”，希特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法西斯侵略集团，并进一步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控制，以保障自己的侧翼和粮食、石油和原料的供应。

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结成三国轴心军事同盟。条约规定，德意和日本互相承认彼此在欧洲及亚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力”，互相进行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的援助。条约第五条还特别声称，条约不影响三国各自与苏联的现存关系。这一条是希特勒准备侵苏的备战活动的烟幕。

同年11月20日，匈牙利霍尔蒂法西斯政权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成为希特勒德国在东南欧的一条走狗。

位于巴尔干半岛北部，盛产石油，并同苏联有几百公里边界接壤的罗马尼亚，是希特勒为发动反苏战争而急于要控制的国家。1940年9月，在希特勒支持下，罗马尼亚法西斯头子安东尼斯库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独裁统治。10月，德军以“教官”名义进驻罗马尼亚。11月23日，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同盟，被拴到法西斯德国的战车上。

保加利亚于1941年3月1日加入了三国同盟，德军进驻保加利亚。

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加入了三国同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反对。27日，在一次政变中亲德政府被推翻。南斯拉夫人民的革命行动和希腊军民对意军的抗击，打乱了法西斯的侵略部署。希特勒不得不把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推迟，先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4月6日，德军以优势兵力进犯这两个国家。希特勒的空军，把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炸成一片瓦砾。轴心国及其卫星国的军队从南斯拉夫的四邻发动进攻。在北方，萨格勒布在德军装甲部队的快速进攻下于10日失陷；卢布尔雅那于11日被意军攻占。德军的主要力量集结于保加利亚西部，突破了尼什、斯科普里和瓦达河河谷的防线，然后分兵南北两路，北上的部队于12日攻陷贝尔格莱德。卫星国部队紧紧跟上：匈牙利军队侵入奥西耶克和诺维萨特，保加利亚军队占领了马其顿的绝大部分。南斯拉夫政府和国王彼得飞往同盟国领土。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于4月17日投降，离入侵不过十一天。德国为了笼络其卫星国，把南斯拉夫的一些领土在意、匈、保等国中进行瓜分，其余的领土不是自己直接占领，便是培植傀儡进行统治。

1941年4月6日，即进攻南斯拉夫的同一天，德军从保加利亚入侵希腊。希腊的精锐部队在东北部被打垮。在阿尔巴尼亚的希腊部队被从南斯拉夫南下的德军包抄，绝了退路。4月27日，雅典被占领。国王乔治同他的政府退

往开罗。在希腊登陆援助其防务的英军于5月初撤退。5月20日，德军使用伞兵和空降部队进攻克里特岛，经过十天激战占领了这个岛屿。6月1日，德军控制了全希腊。

与此同时，希特勒派出两师兵力，组成“非洲军团”，由隆美尔统率，在北非登陆，伙同意大利军队，对利比亚境内的英军发起了反攻，很快就把英军赶到埃及去了。

希特勒完全侵占了巴尔干和控制了北非之后，便决定执行进攻苏联的“巴巴罗沙计划”。入侵南、希的军事行动迫使希特勒把进攻苏联的日期从5月中旬推迟到6月22日。

第二节 战争的扩大

德军入侵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开始 1941年6月22日拂晓，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进攻苏联。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苏联被迫中断了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法西斯侵略军来势凶猛，总共出动一百九十个师，约五百五十万人，三千五百多辆坦克和装甲车辆，五千多架飞机。德军组成三个进攻集团军群，分三路进攻苏联：北路攻打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和列宁格勒；中路的任务是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一线直扑莫斯科；南路则夺取基辅、哈尔科夫和顿巴斯。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

由于进行突然袭击，在战争初期德军颇为得手。在战争的第一天（22日），由于苏联六十六个机场遭到狂轰滥炸和发生激烈空战，苏联空军损失了一千二百架飞机，法西斯空军掌握了制空权。战争初期，苏军被迫自卫、退却。经过三周的残酷战斗，苏军不得不放弃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德军向苏联腹地推进了三百至六百公里。

苏军在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有一些客观原因，那就是战争在大大有利于德国法西斯的情况下爆发的：德国夺取了欧洲的巨大经济和战略资源；德军拥有精良的装备和进行现代战争的经验。但是苏联最高当局对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的时间和规模估计不足，对法西斯的突然袭击缺乏准备，也是重要原因之一。1937—1938年的肃反扩大化，清洗了一些有经验的红军将领，也影响了苏军在战争初期战斗力的发挥。

卫国战争开始以后，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集中了国家的全部权力。7月3日，斯大林向全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

指出这场战争是关系到苏联各族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号召人民起来进行伟大的卫国战争，消除平时期的心理，按战时体制改组党、政工作，迅速地把国民经济转上战时经济的轨道。实行“焦土”战术：撤退时，一切重要物资必须运走；凡不能运走的，一律销毁。号召敌战区的居民展开游击斗争。苏联人民热烈响应号召。青年争先恐后参加红军，党团员起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战争的第一年加入红军的共产党员不下一百万人，共青团员将近二百万人。妇女代替了奔赴前线的男子担负起生产任务。全苏工人掀起了超额完成生产的运动。

7月初整个苏德战线局势非常紧张。被胜利所鼓舞的德国法西斯相信能在短期内结束反苏战争，加紧攻势。德军为了打通通往莫斯科的道路而进行的斯摩棱斯克战役进行了差不多三十天。苏联军民顽强抵抗，英勇反击，歼敌二十五万人，延缓了德军的进攻，从而为保卫首都赢得了所需的时间。

在北方，德军依仗其优势兵力，于8月底进抵通往列宁格勒的最近要冲，并同从北面进攻的芬兰军队一起，于9月8日包围了列宁格勒。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只有经过空中航线和经由拉多加湖。希特勒下令封锁十月革命摇篮的列宁城，以使用饥饿的办法困死守卫部队。德军用远射程炮日夜不断地轰击，飞机狂轰滥炸。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军民英勇不屈，把这座英雄城市变成

了一座攻不破的堡垒。列宁格勒保卫战坚持了九百天(直至1944年1月中旬苏军在列宁格勒战线开始反攻为止)。德军损兵三十万,未能前进一步。

根据希特勒宁可先拿下经济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的战略部署,进攻的重点归于南路德军。德军很快深入乌克兰,布琼尼的部队在乌曼被包围,丢下十五万俘虏;基辅在9月24日陷落。8月至10月,敖德萨保卫战坚持了两个多月。敖德萨守卫力量以寡敌众,一次次打退了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的联合进攻。后来,苏军根据战略需要主动放弃了这座城市。

从北冰洋到黑海一线,到处都在进行激烈的战斗。苏联红军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虽然付出了重大牺牲,但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希特勒以闪电战击溃苏联的计划。

莫斯科保卫战 在北路,尤其是在南路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下,德军于10月开始了夺取莫斯科的战役。德军计划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地区包围和消灭从西面保卫莫斯科的苏军主力,同时出动坦克和装甲兵团,从北面和南面深入包抄莫斯科。为此,希特勒还增派了兵团来加强“中央”集团军群。

10月2日,德军开始了攻势。几天时间,苏军的维亚兹马战线被突破。苏军在莫扎伊斯克建立起新的防线。苏联军民英勇地保卫每一寸土地。德军一次又一次把生力军投入战斗。10月14日,莫斯科北面的加里宁城陷落,但是德军被阻挡未能由此再前进一步。莫斯科南面的图拉始终在苏军的手里,阻止了敌人从南方突进莫斯科。

为了保卫首都,增援部队和军火源源运到莫斯科。莫斯科居民都被动员起来,组成国民警卫营、巷战班、摧毁坦克班。在十月恶劣的天气里,四十五万人参加修筑首都周围的防御工事。10月下旬,许多中央机关、企业、团体从莫斯科疏散出去,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仍然留在首都,斯大林坐镇首都,亲自指挥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在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四周年时,11月7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苏军阅兵式,斯大林发表了历史性演说,鼓舞了苏联军民去建立新的英雄业绩。

德军对苏联首都的十月攻势失败后,于11月15日发动第二次总攻。这一年冬季提早来临了,10月6日就降了初雪,而德军缺乏冬装、燃料甚至粮食。由于苏联空军能够使用靠近莫斯科的飞机场,它就有了与德国空军相匹敌的作战条件。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进到了离莫斯科三十公里的地方。12月6日,红军发起反攻,希特勒被迫下令采取守势。16日,红军解放加里宁城,接着又不断突破德军防线。希特勒为了挽回局势,迫使德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三个集团军司令辞职或离职,他自己亲自兼任陆军总司令,但仍然阻止不了德军的溃退。到1942年1月中,苏军歼灭了莫斯科近郊的德军五十万人,缴获和击毁敌人的坦克一千五百辆。德军向西败退了一百五十公里至三百公里。德军在莫斯科近郊的失败是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大败仗。希特勒吹嘘的德军“天下无敌”和“闪电战”的神话,就这样被苏联红军和英雄的苏联人民粉碎了。

德军不仅在莫斯科附近吃了败仗,同时,在北方的提赫文地区和南方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地区也都遭到了失败。在1941—1942年的冬季战役中,苏军共解放了六十余座城市和一万一千余个居民点。

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太平洋战争爆发 欧洲战场在酣战,日本侵略者既惊叹德军席卷欧洲的威力,同时又感到夺取东南亚的机会已经来到,因为荷兰、法国和英国都没有余力照顾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1940年7月成立的第二次

近卫内阁确定了夺取东南亚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这个“共荣圈”包括了中国、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缅甸、菲律宾等地。日本企图利用这里丰富的原料资源，以便击溃在太平洋的主要对手美国。按照这个方针，日本在国内消灭了资产阶级自由的最后残余，解散了所有政党；在国外，于1940年9月建立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1941年4月，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

美国总统罗斯福看到，日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由于美国陆军的实力还不强大，便尽量延迟这场战争的爆发，仅对日本采取了有限而谨慎的报复措施。1940年6月，日本强迫法国维希政府承认日军进驻河内，7月美国就对日本工业上的重要原料和军需物资实行部分禁运，开始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同时加强了对中国的军援和提供贷款。

1941年6月，德国对苏联进行了突然袭击。日本根据它的同盟义务，应该毫不迟疑地从东方进攻苏联，但是日本政府并不着急。7月2日，在日本统治集团首脑出席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不马上向苏联进攻，而是等待时机，一旦德苏战争出现有利于日本的局面时，再开始对苏战争。日本把关东军的兵力增加一倍，达到七十万人，伺机进攻苏联。由于德国陷入苦战和失败，这种机会终于没有到来。7月2日御前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向南洋国家扩张，以便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不久，日本在维希政府的勉强同意下，接管整个法属印度支那。美国认为这无异于日本的公开宣战，于是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压迫。罗斯福总统宣布“冻结”所有日本资产，接着，英荷两国政府也迅速采取了同样行动。这样，三国就同日本停止贸易，特别是石油贸易。

日本平时消费的石油，百分之八十八是进口的。在禁运开始时，日本石油库存只够维持三年的正常用量或一年半的全面战争消耗。在禁运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要么放弃扩张野心，这样，国内陆军可能发动政变；要么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同美英荷等国开战。日美之间的谈判开始了，双方都想以强硬态度压服对方。日本要求美国取消禁运，并停止向菲律宾输送增援部队。美国断然拒绝，并警告日本不得再行侵略。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决定：如果谈判在10月10日前没有取得成就，则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到了10月，对美要求仍无实现的希望。于是陆相东条英机代表陆军，迫使政府下决心立即对美开战。近卫首相虽然在对美作战的轨道上飞速前进，但是临到关键时刻却害怕起来，主张继续同美国谈判。东条坚决反对，近卫只得向天皇提出辞呈。10月18日，天皇任命主张立即开战的东条英机为首相，东条内阁成立。

11月下旬，日本向美国递交了最后提案，美国也把答复的备忘录交给了日本。双方的要价都高，达不成妥协的意见。

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于12月8日开始对美、英、荷宣战。为了击溃美国的太平洋舰队，日本海军司令山本大将命令对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瓦胡岛的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1941年，夏威夷时间12月7日凌晨（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第一批一百八十三架日本飞机，从停泊在距离珍珠港二百三十海里的六艘航空母舰起飞，对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珍珠港实行猛烈的袭击。一小时以后，第二批日机参加攻击。日本仅以微小的代价消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舰只。港内八艘美国主力舰，四艘被炸沉，四艘被重创；有一百八十八架飞机被击毁。当时航空母舰不在港内，

幸免于难。

这次突然袭击是二次大战中继德军突然进攻苏联之后的又一次举世震惊的进攻，它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府出乎意外的麻痹大意。美国政府以为，日本必然首先进攻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不敢贸然首先进攻美国。由于从1940年夏季起，美国破译了日本的外交（不是海军）密码，美国人已经发现了日本即将发动一场进攻的意图，但他们确信，它一定是进攻菲律宾。

日军偷袭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第二天，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对日宣战。接着，德、意对美国宣战。对此，美国国会又通过决议对德、意宣战。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对“轴心”国家宣战。战争范围扩大了。

1941年12月—1942年6月的太平洋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取得一个接一个的重大胜利。在袭击珍珠港之后不久，12月10日，日本空军击沉了停泊在马来亚沿岸的英国两艘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这样，日本不仅在太平洋西部，而且在印度洋掌握了制海权。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入泰国，没有遭到抵抗，泰国政府接受了日本关于军队过境对马来亚作战的要求，并和日本结成了军事同盟。

12月8日，日军从中国大陆向香港发动进攻，25日占领了香港。

日本向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各岛屿进攻的重点是新加坡和菲律宾。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控制马六甲海峡，是太平洋、印度洋之间的门户。英国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远东殖民统治的堡垒。英国曾耗资六千万英镑，把它建造成为世界著名的军事要塞之一。驻在这里的七万守军有充足的弹药和给养，本来可以很好地抵御日本的进攻，但是驻军指挥部由于失败而沮丧，部队陷于混乱，没能坚决抵抗。日军从马来半岛北部泰国境内宋卡登陆，向新加坡推进。新加坡和大陆之间有一条三公里长的堤道相连。2月8日，日军在新加坡岛的西北岸登陆，他们把堤道维修好以后，就把坦克和大炮从堤道上开来。15日守军投降。新加坡的陷落为日本西进缅甸、印度敞开了大门。3月7日，日军攻入缅甸首都仰光，5月末，进到印度国境。

日军对菲律宾的进攻，是先用空军轰炸。棉兰老岛上的美国飞机，有一半在地面上就被击毁。轰炸之后，日军从台湾出发在吕宋岛等处登陆，菲律宾各岛很快失守。1942年1月2日，日军攻占马尼拉。美菲联军退守八打雁半岛。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从马尼拉逃出后，躲进八打雁半岛要塞，后又逃往澳大利亚。5月7日，日军完全占领了菲律宾群岛。

与此同时，日军在1941年12月相继占领中太平洋的关岛、威克岛，并在加里曼丹登陆。从1942年1月起，日军以加里曼丹为基地，开始侵占印度尼西亚。2月27日至28日，在海战中日本击溃了英荷舰队。2月，日军占领了南苏门答腊、帝汶岛和巴厘岛，收拢了对爪哇的包围圈，3月初，日军登陆爪哇岛，3月5日占领巴达维亚（雅加达），3月9日荷兰军队投降。这样，印度尼西亚群岛及其丰富的石油、橡胶等资源，全部落到了日本手里。

日本占领了新加坡、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后，推进到澳大利亚附近，完成了第一阶段预期的计划。日本只用了不大的代价就获得巨大的成功。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提出了大规模向西进攻印度和锡兰的计划和向南进攻澳大利亚的计划，但在御前会议上遭到拒绝，理由是战线太长，力不从心。

1942年5月5日，日军占领所罗门群岛中的瓜达卡纳尔岛。这是日本向东南推进的极限。5月7日和8日，企图占领新几内亚岛东南端的莫尔斯比港的日本舰队，在珊瑚海和美国海军发生了激战。日本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和一百零五架飞机，美国人也损失了一艘航空母舰和八十九架飞机。在这次激战中，在海战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方舰队互不射击，只是借助于空军进行战斗。无论是日本或是美国，都宣布自己海军的胜利。

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东南部遭到了反击之后，海军统帅部决定把力量转到太平洋中部夺取中途岛，消灭美军的前进基地。日本出动了十一艘主力舰、八艘航空母舰和上百艘各级舰艇组成的强大的联合舰队。日本知道当时美国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有三分之二在珊瑚海，所以认为空中优势在自己方面。但是，美国的无线电截听站准确地判明了对方的意图。美国指挥部冒着巨大的风险，撤除其他地区的设防，集中了三艘航空母舰和七艘重巡洋舰和十七艘驱逐舰到中途岛，在通往中途岛的要冲布置了潜艇的“隐蔽”，并把飞机调到中途岛飞机场。结果是指望收到突然进攻之利的日本人，自己却陷入圈套。在1942年6月4日至6日的中途岛海战中，日本舰队打了败仗。日本四艘巨型航空母舰和一艘巡洋舰被击沉，飞机被打落三百三十架。美国人损失了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各一艘，飞机一百五十架。中途岛之战是一场决定性的海战。美国舰队力量虽然较弱，但是取得了胜利。日本失去了四艘航空母舰和训练有素的空军人员，就失去了海上的制空权。它的主力舰和巡洋舰还具有优势，但是再也无力远离陆上基地去进攻了。

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共产党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这时候，建立统一战线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各国人民反法西斯奴役的斗争蓬勃开展；美英等国与法西斯国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美英统治集团认识到，只有与苏联结盟，共同反对法西斯，才能保持切身的利益。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英国首相邱吉尔声明，英国将站在苏联方面。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宣布，美国将尽力援助苏联。1941年7月12日，英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协定规定，两国在对德战争中互相援助和支持，不单独媾和。这项协定没有确定互助的具体方法和形式。

1941年8月，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大西洋纽芬兰海面一艘军舰上会晤，8月14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对德作战的目的和战后和平的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宣言声称英美两国不承认法西斯国家通过侵略所造成的领土变更，表示了反对“纳粹暴政”的决心。苏联政府于9月24日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大西洋宪章》。这时，签署《大西洋宪章》的共有十五个国家。

罗斯福和邱吉尔在会晤期间，还讨论了给予苏联军事援助的问题。当时苏联与希特勒德国单独作战，蒙受极大牺牲，大力援助苏联是符合反希特勒联盟一切国家的利益的，但是英美在会谈中根本不谈苏联所迫切需要的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只谈军火援助问题。1941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美英苏三国代表会议，签订了三国协定，规定三国在反希特勒法西斯战争采取联合行动，美英向苏联提供武器和物资，而苏联向美英提供原料。1941年11月2日，美国通知苏联，租借法案施行于苏联，并初步给苏联十亿美元的贷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942

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二十六个国家在华盛顿公布了《联合国宣言》，声称各签字国政府保证用自己全部的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来对法西斯国家作战；签字各国相互合作，不与敌人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此宣言的签订，表示了反法西斯联盟的正式建立。

1942年，美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已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1942年5月26日，苏英在伦敦签订了《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与国作战的同盟和战后合作互助条约》。6月11日，苏美在华盛顿签订了《关于在反侵略战争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在苏美和苏英的会谈公报中都提到，准备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联盟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英美统治集团企图在打垮德意日的同时，严重削弱苏联和各国的人民革命力量，他们对苏德战场往往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无论是1942年还是1943年，他们都没有开辟欧洲的第二战场。

第三节 战争的转折

斯大林格勒战役和苏联红军的胜利 1942年，苏联仍然单独抗击着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局势依然紧张。占苏联总人口45%、工业总产量33%、耕地面积47%的西部广大地区，都沦陷到敌人手中；转入战时轨道的国民经济，一时还不能满足卫国战争的需要。

1942年春夏，德国利用美英拒不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搜罗其在欧洲的全力，总共拼凑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发动一次空前规模的夏季攻势。在莫斯科战役时，德国指望用正面进攻一举占领莫斯科；这次，德国企图采用迂回战术，达到其占领莫斯科，迫使苏联红军投降的目的。德军统帅部的计划是：集中兵力于南线，一方面攻占斯大林格勒，然后沿伏尔加河北上，切断莫斯科同乌拉尔后方和伏尔加河的联系；另一方面，进攻苏联的西南战区，夺取高加索油田，并切断苏联经高加索与英美联系的物资供应线。

1942年5月，德军在苏联南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不久占领了克里木半岛大部分地方。接着，德军猛攻半岛上的要塞塞瓦斯托波尔。7月3日，经过了二百五十天英勇保卫战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守军才奉最高统帅部命令撤退。守军击毁了德军几百辆坦克、几百门大炮，歼灭德军三十万人，最后才从这座英雄城市转移。德军尚有一支军队于7月向库班和高加索进攻，企图夺取那里的粮食和石油。到12月，德军对这里的进攻被制止。

从1942年7月起，德军调动主力开始攻打斯大林格勒，于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战役持续了半年之久，其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是空前的。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位于顿河河曲以东，紧靠伏尔加河，是苏联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和南北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的得失关系着苏德双方整个战局的命运。希特勒把欧洲闻名的、由鲍卢斯元帅指挥的德国第六集团军投入了这场战役。苏联红军统帅部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德军依仗其优势兵力，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于1942年8月23日渡过了顿河河曲，开始直接攻打斯大林格勒。德军发动了持续不断的疯狂进攻。德军使用了一千五百多门大炮轰击城市，每天出动上千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并投燃烧弹。德军共投下了一百多万颗总量达十万吨的炸弹，狂妄的希特勒企图把这座城市，从地图上抹掉。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摧毁斯大林格勒保卫者的意志和决心，苏联军民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寸土地。9月中旬，德军窜入城市，激烈的巷战开始了。10月，德军攻入城市的大部分，连接城市与伏尔加河对岸的一切渡口都处于大炮火力轰击之下。希特勒得意忘形，宣布德军攻占了斯大林格勒。事实上，斯大林格勒的每所房屋都变成了战斗的场所，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包围并歼灭德军苏联军民用手榴弹和刺刀在每层楼、每间屋和电梯井里作战。德军在这座被摧毁的城市里，为赢得每一寸土地付出了巨大伤亡。德军十二个师在这场消耗战中已经精疲力竭了，而还有三十个师被迫去掩护它们的侧翼。斯大林格勒保卫者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2年11月19日，红军突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以钳形攻势突破了斯大林格勒外围德军的防线，迅速完成了一个钳形

运动，把斯大林格勒和城郊的三十三万德军全部装入“口袋”。被围德军粮食不足，又受到红军飞机、大炮的严重打击。德军统帅部调来解围的军队又被红军击溃。被围德军陷入绝境。1943年1月10日，红军展开了歼灭被围德军的战斗。2月2日，战斗终止，德军全部被歼。九万多名官兵被俘，其中包括司令鲍卢斯等二十四名将领。斯大林格勒战役以红军的全胜而结束。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联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这次战役以后，红军转入战略反攻，法西斯军队节节败退，转入战略防御。

1943年7月，希特勒利用英美继续拖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机会，孤注一掷，向苏军战线上的库尔斯克突出地带进行疯狂反扑，妄图扭转败局，重新夺取战争的主动权。苏军在这次会战中不论在兵力方面，还是在火炮、坦克和飞机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法西斯德军。在这次会战中，发生了二次大战中最大的坦克战。经过五十天的血战，苏军一举粉碎了德军三十个精锐师，解放了奥廖尔、哈尔科夫等城市，并乘胜前进，在广阔的战线上发动大反攻。到年底，苏军解放了一半以上的国土，其中包括乌克兰首府基辅。

苏军在前线的反攻，得到了沦陷区人民的有力配合。在沦陷区的苏联人民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1942—1943年间，出现了一千多支游击队，有数十万游击战士。他们不断地袭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线，颠覆列车，烧毁仓库，惩办卖国贼。在游击战争中出现了许多英雄。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员组织的“青年近卫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北非战场盟军的胜利 反法西斯盟国胜利的喜讯不仅来自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也来自酷热如焚的北非沙漠。

在大战初期希特勒没有在地中海、北非方面投入多少兵力，后来看到意大利在非洲节节失利之后，才派遣被人称为“非洲之狐”的隆美尔率军于1941年3月在意属的黎波里登陆，支援意军。地中海和中东是英帝国的生命线，邱吉尔派遣大量部队支援北非。英德军队在北非沙漠中展开了拉锯战，但德军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1942年5、6月间，隆美尔率领德军猛冲猛打，大败英国第八军团，俘获英军三万五千人，攻占了托卜鲁克要塞，接着把战争推进到埃及领土上。隆美尔以占领亚历山大港为目标，进而威胁苏伊士运河。6月30日晨，隆美尔的部队离亚历山大只有一百英里，到晚间逼近阿拉曼英军防线，离亚历山大只有六十英里。德国法西斯妄图占领埃及，然后向东，和进犯东南亚的日军在印度会师。由于隆美尔的军队在进攻中消耗极大，补给线又长，德军的增援远远赶不上英军的增援，因此到7月份战线稳定下来。

8月初，邱吉尔亲自飞到开罗检查战局，任命蒙哥马利接任第八军团司令，整顿军务，补充装备。10月23日，英军在亚历山大港西的阿拉曼防线上对德军发动大反攻。双方兵力相当，但英军在坦克方面占压倒优势。十多天的激战，沙漠上到处是打烂的坦克。由于英国海军有效地击沉德国在阿拉曼战役中的英军地中海的货船，德军得不到充足的军火增援。德军遭受重创之后，在隆美尔这只狡猾的狐狸指挥之下，巧妙地溜出了蒙哥马利的围歼，十五天中西撤了一千一百多公里。这次大反攻虽然未能把德军逐出非洲，但是它是英军抗德战争中第一个巨大胜利。1943年2月，英军抵达利比亚和突尼斯国境上。

正当英军从阿拉曼发动反攻并在埃及、利比亚向西挺进的时候，1942年11月8日，一支由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各城市登陆。当时法属北非由法国维希政府管辖。登陆几乎未遇法军的抵

抗。英美联军沿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领土向东推进，势如破竹，到11月底，它已越过阿尔及利亚国境，进抵比塞大城和突尼斯城的远郊。

希特勒为了应付英美军队在法属北非的登陆，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德、意军队占领了维希政府管辖下的地区。德国还企图夺取土伦的法国舰队，但是法国水兵为了不让自己的军舰落到法西斯分子的手里，就把它们沉没在土伦港。希特勒还空运军队抢占了突尼斯的港口和空军基地，并陆续向北非增兵至二十五万人之多。

英美原来预计在1942年年底就结束北非战争，由于希特勒的迅速增兵，双方争夺突尼斯之战就拖了近半年时间。但德军在北非大势已去。艾森豪威尔率领的盟军自西向东，蒙哥马利率领的英军则自东向西，东西夹击，经过半年的苦战，终于在1943年5月，迫使北非的德意军队投降。

北非胜利是美英盟军从防御转入反攻的转折点。

意大利投降 苏军的节节胜利和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使法西斯“轴心”之一的意大利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不能继续作战。在苏德战场上约二十万人的意军精锐部队全军覆没，非洲的殖民地全部丧失，在地中海的舰队遭受巨大损伤。意大利国内原料缺乏，经济瘫痪，出现饥荒。人民群众和广大士兵的反战情绪迅速高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罢工，并且发展为反对法西斯统治的群众运动。

1943年7月10日，英美军队乘胜前进，登上意大利半岛“靴子”的尖端——西西里岛，意大利政局更加混乱。面临着军事、经济的全面崩溃，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一些垄断资本集团企图用牺牲墨索里尼的办法，寻求同英美停战，以挽救自己的统治。墨索里尼请求希特勒给予军火援助，以支持其国内政权，但希特勒无能为力。7月25日，意大利发生宫廷政变，统治意大利二十一年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被迫下台，并被送进了监狱。意军参谋总长巴多里奥上台组织政府。9月2日，英美军队从西西里岛越过墨西拿海峡，开进了意大利半岛南部。第二天，巴多里奥政府同英美签订了停战协定。9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关于意大利投降的正式文告；同时，英美军队在意大利的萨勒诺海湾登陆。

意大利投降的广播文告使德国人大吃一惊，但德军的行动是果断的。它迅速占领了罗马和意大利北部三分之二地区，并劫走了在押的墨索里尼，送到德军占领的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苟延残喘。意大利形成两个政权南北对峙。

10月13日，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宣布对德宣战。轴心国侵略集团开始土崩瓦解了。但是解放意大利的战争仍然远远没有结束。德军直至投降前夕一直保持着对意大利北部的占领。

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 法西斯侵略者的残暴统治激起了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欧洲各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武装力量，开展抵抗运动。他们的英勇斗争，对粉碎德意法西斯起了重要作用。

南斯拉夫于1941年4月被德军占领后，广大人民在以约·布·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纷纷组织游击队，广泛开展了游击战争。1941年6月底，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成立，铁托被任命为总司令。7月4日，南共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定，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很快解放了五分之一以上的国土。1941年年底建立了第一支正规部队。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打了一些大的战役，牵制了六、七十万德、意、保、匈外国侵略

军和伪军。1943年11月底，建立了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1944年10月20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协同作战，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5月全国解放，这时南斯拉夫军队已发展到八十万。战争期间，南斯拉夫人民献出了一百七十万人的生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阿尔巴尼亚于1939年4月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领。工人、农民、学生进行了自发的抵抗斗争。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成立了共产党，人民的自发斗争得到了统一的领导。就在这时，阿尔巴尼亚响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一支游击队袭击法西斯军的司令部。1943年7月党建立了民族解放军，约有一万人的队伍，给意大利占领军以沉重打击。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后，民族解放军同进入国土的德国新占领者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经受住了德军于1944年1月发动的持续三个月的冬季攻势。从这年春天开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转入反攻，到秋天，解放了大部分领土，这时民族解放军发展到七万人。11月17日解放军解放首都地拉那，29日，全国获得解放。

罗马尼亚参与了希特勒德国发动的反苏战争，使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民为推翻安东内斯库军事独裁和反对希特勒德国而斗争。广大人民破坏敌人的武器库、兵工厂，举行罢工，开展游击战争。罗共为了联合各种反法西斯的政治力量，于1944年6月建立了民族民主同盟。这是一个以共产党为核心和领导力量的、包括一切赞同推翻法西斯军事独裁、赞同掉转罗马尼亚的枪口去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政治党派、集团和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同年8月23日，罗共领导罗马尼亚的爱国民族力量，举行全国反法西斯武装起义。安东内斯库政府被推翻，罗马尼亚武装部队掉转枪口反对希特勒德国，同游击队一道，迅速解放了首都和国内其他城市。10月末，罗马尼亚全国获得解放。

法国被德军占领以后，法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游击战争。游击队定名为“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在国内民族抵抗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也迅速发展。戴高乐竭力争夺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派人到法国国内联络，准备成立一个从属于自由法国运动的统一组织。法共放弃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认定戴高乐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唯一领袖”。这样，1943年6月3日就成立了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次年6月，该委员会改称为法国临时政府。同时，戴高乐逐步控制了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内地军。1944年8月，巴黎人民举行武装起义。8月18日，巴黎爆发了总罢工，内地军战士和爱国民警投入了战斗，25日德军举起白旗投降。法国人民用自己的战斗解放了首都。起义人民和内地军乘胜追击溃逃之敌，9月中旬，解放了大部分国土。这时内地军发展到五十万人，其中，法共领导的“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占二分之一。

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于1943年被德国占领后，意大利人民的游击运动广泛开展起来了。1943年10月，意共在北部地区建立了命名为“加里波蒂”的游击队。1944年6月，北部地区所有的游击队统一为“自由义勇军”，共二十五万人，其中意共直接领导的有十五万人。1945年4月，当苏军向柏林展开总攻时，意大利北部爆发了总罢工，并转为武装起义。游击队和起义工人解放了米兰、热那亚、都灵等城市，企图逃跑国外的墨索里尼被游击队俘获处死。

1941年，希腊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 and 人民解放

军，与德国占领者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终于在 1944 年秋赶走了侵略者，解放了希腊的全部领土。

欧洲其他的被侵略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也与法西斯展开了英勇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亚洲各国人民的对日战争 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战胜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国家。在中国战场上，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丧失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在东北的抗日联军，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了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到 1943 年，它抗击了侵华日军的 64% 和伪军的 95%。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使大批日本侵略军陷于中国战场，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朝鲜人民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34 年，金日成把在我国东北中朝边境活动的朝鲜游击队改组为朝鲜人民革命军。1936 年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会长为金日成。祖国光复会制定了《十大纲领》，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37 年 6 月 4 日，朝鲜人民革命军取得了奇袭普天堡的胜利，鼓舞了朝鲜人民的胜利信心。1937—1939 年间，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了三千九百多次大小战斗。从 1942 年起，它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印度支那，自 1940 年 9 月日军侵入北越后，越南人民就开展了抗日斗争。1941 年 5 月，在以胡志明为首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越南独立同盟。在党和越盟的领导下，游击队以北部山区为依托，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越南游击队由小到大，到 1944 年 12 月改编为解放军，解放了一部分国土。

在菲律宾，1942 年 3 月，组成了由共产党、社会党、工会、农会等共同参加的武装力量——人民抗日军，其中有一支由华侨组成的“四八支队”（取名于八路军、新四军）。民抗军在吕宋岛中部及一些岛屿上建立了解放区。1945 年初，配合美军登陆，菲律宾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加强。

在缅甸、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反对日本占领者的人民武装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给法西斯以沉重打击。

开罗会议和开罗宣言 在战争的根本转折时期，中国在西方列强制定的远东战略计划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美国政府为了推行有利于本国垄断资本的远东政策，便大力扶植蒋介石国民党。美国向蒋介石提供贷款和武器装备，还要提高他的政治声誉，藉此加强他的地位。1942 年 9 月，英、美宣布放弃它们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和其他不平等权利，并于第二年 1 月用条约形式确定下来。

1943 年 11 月下半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中国蒋介石在开罗开会，讨论与远东战争有关的问题。军事会谈在表面上议定了一个在缅甸南北夹击日军的作战计划，目的在于把日本驱逐出缅甸和重新开辟长期关闭的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但是由于英美之间的战略利益不同，计划没有付诸实施，因为在邱吉尔看来，东南亚最重要的目标在于重建英国在新加坡和香港的权力，而缅甸不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

会议唯一的政治成果，就是 1943 年 12 月 1 日公布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

言。宣言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例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宣言还指出，三国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此外，宣言又宣布剥夺日本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夺得的一切岛屿。

德黑兰会议 为了讨论加速击溃希特勒德国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1943 年 11 月 28 日到 12 月 1 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亲自率领代表团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

会议的中心问题是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邱吉尔竭力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连罗斯福也不支持他的作法。美国为了阻止苏联红军进入西欧，期望和英国一起通过攻击德国西北部来占领大部分欧洲并第一个占领柏林，因此提出了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远征计划。这计划被称为“霸王”战役。英国为了阻止苏联红军进入奥地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中欧、东欧国家，再次企图坚持“地中海战略”、即主张英美军队从巴尔干攻入德国。英国的计划遭到苏联的坚决反击，斯大林指出，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对加速德国的崩溃没有意义。斯大林同意美国的“霸王”战役计划，并且出于尽快消灭敌人的愿望，希望最好能同时发动两个战役——“霸王”战役和作为这次战役的支援——在法国南部登陆。会议最后决定英美军队不迟于 1944 年 5 月 1 日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会议发表的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指出，三国已经商定了消灭德军的计划。

三国首脑会议对如何处理战后德国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美英两国各有自己分裂德国的计划。美国建议把德国分成五部分；英国建议割取一些德国领土并入所谓“多瑙河联邦”。苏联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出肯定结果。

会议还讨论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苏联抱着巩固反希特勒联盟和消灭亚洲的侵略策源地的愿望，响应英美的多次请求，初步同意于欧战结束半年之后参加对日作战。

第四节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苏联红军的胜利反攻 1943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变的一年，1944 年是苏联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內，苏军对德国法西斯发动连续不断的攻势，收复了全部国土，帮助东欧各国获得解放，并且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境内。

1944 年 1 月，苏军突破了列宁格勒封锁线，开始向围城的德军进攻，迫使德军往西南方向撤退。苏军经过一个半月的紧张战斗，向西推进了二百二十公里到二百八十里，肃清了列宁格勒州全境的占领者。联结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铁路重新通车了。法西斯军队有二十三个师被击溃，三个师被全歼。被包围九百天的英雄城列宁格勒终于解除了敌人的威胁。

2、3 月间，苏军对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发动了进攻。在这里，德国集中的主力共九十六个师，包括它的 70% 的坦克师和 50% 的摩托师。苏军在这儿进攻的规模很大，战线长达一千四百公里，深五百公里。苏军粉碎了六十个师敌军的顽抗，全部解放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4 月初，苏军进入罗马尼亚领土作战。

在南部，苏联红军于 5 月解放了塞瓦斯托波尔，肃清了克里木的德军。

通过 1944 年的春季攻势，苏军解放了被法西斯德国侵占的四分之三的领土，在四百多公里长的地方苏军到达了边境。

到 1944 年夏季，苏联人民面临的任务是解放全部国土，并援助欧洲各族人民从德国法西斯奴役下摆脱出来。苏联人民也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这一崇高的任务。这时苏联红军达到六百四十多万人，加上预备队，总人数达到七百万。在苏联建立的和红军并肩作战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兵团总人数超过十万。

苏军最高统帅部计划在白俄罗斯进行主攻，然后向其他方面扩展。1944 年 6 月下旬，苏联卫国战争中最大的战役之一——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了，战线长一千三百公里，深五百公里。7 月初，红军在明斯克以东围歼了三十个师的敌军。战役的结果，苏军解放了整个白俄罗斯，立陶宛大部分和拉脱维亚一部分领土，并越过边界，解放波兰的一部分领土。

在这时间前后，苏军在其他战线上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在北方，苏军收复维堡和彼得罗扎沃茨克，解放卡累利阿·芬兰的大部分领土，这使芬兰退出战争。以后，苏军又歼灭了芬兰境内的德军，进抵挪威边境城市基尔内斯克。在南方，7、8 月间苏军解放了西乌克兰，强渡维斯拉河，逼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8 月苏军又围歼了基什尼奥夫附近的二十二个德国师和一批罗马尼亚仆从军，进入罗马尼亚。9 月初苏军进抵保加利亚。又一支苏军进入匈牙利境内歼灭了大量德军，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另一支苏军越过罗马尼亚，进入南斯拉夫。东欧各国人民，在苏联红军歼灭大量法西斯军队的情况下，纷纷发动武装起义，争取解放。

第二战场的开辟 德黑兰会议以后，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很快被任命为执行“霸王”计划的盟军总司令，负责开辟第二战场，指挥从西欧反击法西斯德国的大战役。

德军统帅部得到情报，知道英美军要在 1944 年横渡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但因东线处境危急，无法调集大军对付西线。另外，德国不知道盟军登陆的时间和具体地点，因此希特勒把防御的重点放在英吉利海峡的最狭部

分。

为了登陆成功，盟军作了认真的准备。整个英国南部变成了一座大兵营，集中在这里整装待发的军队有二十个美国师、十四个英国师，还有少量加拿大、法国、波兰师。后续部队还有二十个英国师和在美国本土的五十个美国师。用来登陆的运输舰和登陆艇共六千艘，出动掩护的飞机达一万一千多架。为了迷惑敌人，盟军故意在英吉利海峡最狭部分制造佯攻的假象。

1944年6月6日凌晨，盟军登陆部队横渡英吉利海峡向法国北部诺曼底半岛进发。第一天登陆的有五个步兵师和三个空降师。几乎没有遇到德国空军的抵抗，6月6日那一天，德国空军仅出动五十架次。盟军登陆虽然成功，但在滩头阵地上遭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进展很慢。到6月底，滩头阵地才扩大到正面约一百公里，纵深约二十至四十公里，这时在滩头阵地的盟军已增到一百万人。战争在诺曼底沿海地带进行。盟军日益扩大攻势，8月25日进抵塞纳河畔和卢瓦尔河畔。同一天，属于盟国远征军的法国第二坦克师全部开进巴黎，同解放巴黎的地下武装力量一起，接受了巴黎德国卫戍部队的投降。

为了配合在法国西北部进行主攻，盟国在法国南部进行助攻策应。1944年8月15日，以二千架飞机火力进行空中活动之后，美法军队在戛纳市以西的地中海沿岸登陆了。德军统帅部考虑到德军的不利处境，急忙把法国南部的德军向德国西部边境撤退，所以这儿的盟军进展较快。8月28日，美法军队占领了土伦、马赛和蒙太利马尔，8月31日进抵里昂附近，9月2日开进里昂。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对加速法西斯德国的灭亡有巨大的作用。它使德军陷入了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东西夹击的铁钳之中。

处在铁钳中的德军还是力图反扑。德国统帅部决定使用它的新式武器来阻止或推迟盟军的进攻。从6月13日起，它向英国发射V-1飞弹，9月初又向英国发射V-2火箭。几千枚飞弹和火箭落在英国，造成了三、四万人的伤亡，但是没有达到挫败英国人士气的目的。8月26日德军开始从法国东北部撤退，准备退守齐格菲防线。美英盟军跟踪推进，9月中旬到达贝尔福、南锡、麦茨（梅斯）、卢森堡、列日、安特卫普、根特一线。但是他们突破齐格菲防线的企图当时没有成功。

雅尔塔会议 1945年初，德国已经面临最后崩溃的局面。如何最后击溃德国法西斯，如何处理投降后的德国，如何对待解放后的欧洲，这一切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商讨这些问题，1945年2月，以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为首的苏、美、英三国代表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

会议制订了彻底击溃法西斯德国的作战计划，决定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由于苏联在反德战争中起主要作用，攻取柏林的任务交给了苏军。关于战后的德国，会议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德国将由苏、美、英三国军队占领，并邀请法国为第四占领国。三国声明一定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了消灭德国的侵略根源，必须解除德国武装，使德国发展为独立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

会议通过了《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宣言声称用民主方式解决战后欧洲迫切的政治问题 and 经济问题；铲除法西斯主义残余；三国帮助各国人民成立有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以便保证尽早通过自由选举建立对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

会议还通过了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雅尔塔协定）》。苏联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的权利，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享有优先权利，旅顺军港租与苏联；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管，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优先权利；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为了确保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会议决定成立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通过了苏联的建议，决定将联合国最重要的职能交给安全理事会，而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起增加到十个）组成，任何实质性问题（不是程序问题）的决定必须经中、苏、美、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会议又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的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以制订这一组织的宪章。

攻克柏林和德国无条件投降 经过1944年的战斗，法西斯德国被苏联红军和美英军队从东西两面包围。

在比利时和荷兰的盟军进展很慢。希特勒乘此机会在西线反扑，想赢得同美英谈判的有利地位。1944年12月16日，德军在德比边境的阿登地区突破美英盟军防线，迅速推进了一百多公里。他们想冲往安特卫普，把北部英军和南部美军之间的联系切断。德军的进攻被阻止了，但是美英盟军的处境仍然紧张。邱吉尔不得不在1945年1月6日写信向斯大林求援。苏联统帅部决定把原计划于1月20日对德军的全面反攻提前到1月12日进行。这一天，在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长一千二百公里的战线上，苏军一百五十个师发动了闪电式的全线反攻，迅速突破德军防线，希特勒不得不从西线抽调两个坦克军到东线来抵挡苏军。这样，美英军队又站稳脚跟，开始了缓慢的反攻。从3月上旬到下旬，他们分在几处渡过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推进。

在这次苏军全线反击战中，波、捷、保、罗等国的军队也积极参加了作战。短时间内，苏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在中部，苏军于1月17日同波兰军队一起解放了华沙。4月底解放了波兰全境。接着强渡奥得河，在河西岸建立了据点，打开了冲击柏林的道路。在北部，1月13日苏军攻入东普鲁士，两周内完成了迂回运动，包围了固守东普鲁士的四十个精锐师。经过激烈的战斗，4月9日苏军攻占了德军在东普鲁士最强大的要塞——哥尼斯堡，全歼德国守军。在南部，2月13日苏军攻占布达佩斯，4月4日匈牙利全境解放。4月13日苏军攻占维也纳。

1945年4月16日，苏联红军开始了攻克柏林的战役。彻底清算希特勒吃人野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时刻到了。在奥得河与柏林之间，德军建立了绵密的防御工事体系，在柏林郊外筑有三层防御，市内工事坚固，柏林的地下铁道和下水道网使德军也可以有广泛的机动性。但是，这一切都阻挡不了红军战士对法西斯巢穴的最后冲击。苏军万炮齐发，几千架飞机同时出动，几千辆坦克冲入敌人阵地，步兵立即投入战斗。19日苏军强渡了奥得河和尼斯河，进入德国本土。25日，苏军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地区合拢，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同一天，苏军进抵易北河西岸，同美英军队会师于托尔高。27日，苏军打进了柏林市中心，激烈的巷战开始了。天空、地面和地下都在战斗。残暴异常的希特勒下令往地下铁道的隧道里灌水，淹死了几千名妇女、儿童和伤员。30日下午，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柏林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同一天，希特勒在他的地下避弹室内畏罪自杀。5月2日，苏军完

全占领了柏林。

其他各地的德军也纷纷投降，集结在布拉格的德军企图负隅顽抗，被红军坦克部队迅速歼灭。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了。

波茨坦会议和波茨坦公告 反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结束以后，苏、美、英三国首脑为讨论管制德国和加速结束世界大战的问题，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会议。斯大林代表苏联；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副总统杜鲁门根据美国宪法继任总统，代表美国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英国政府首脑在7月25日以前是邱吉尔首相，由于英国议会选举的结果，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礼。

德国问题在会议上占有中心地位。三国就管制德国的政治原则和经济原则达成协议。政治原则规定：德国境内的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占领军总司令遵照本国政府的命令，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执行；他们并以管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共同处置有关全德的事宜；管制委员会占领德国的方针是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之完全非军事化，消灭纳粹党，解散一切纳粹组织，使德国的政治生活民主化，并使德国将来能参与国际和平和合作事业。经济原则规定：禁止德国生产武器、弹药，使德国着重于农业及国内和平工业的发展，消灭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三国也就审判德国战争罪犯的问题达成了协议。

在会议上，关于波兰的边界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如下协议：哥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交给苏联；波兰的西境按奥得河——尼斯河划定，过去的自由港但泽（革但斯克）划归波兰。

在会议上，苏联再次确认参加对日作战，以迅速促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实现世界和平。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继续顽抗将加速它的彻底灭亡，促它投降。公告规定了日本投降以后必须实施的重要政治原则：彻底铲除军国主义；盟国占领日本以实现公告的主旨；实施《开罗宣言》的条文；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严惩战争罪犯；消除一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增长和加强的障碍；等等。公告准许日本保持有支持其经济所必需的和足以支付实物赔偿的工业，但不许保有可供它重新武装作战的工业。公告还规定占领日本直到符合日本人民意愿的和平倾向的政府成立之后。

太平洋战场形势 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自从1942年6月中途岛一战之后，就开始掌握了海上的主动权。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只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同日本周旋，没有积极开展大规模的进攻。罗斯福并不热衷于替欧洲人恢复殖民帝国。美国的战略是小心翼翼地从小太平洋岛屿向日本逼近，尽可能避免在陆上交战。这种“逐岛进逼法”不仅能使美国巩固其在太平洋的地位，使太平洋成为美国的湖泊；而且能使美国避免重大损失，保存实力，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日本的力量，由美国轻取战争胜利的果实。

为了夺回西南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中的一个小岛——瓜达卡纳尔岛，美军同日军就从1942年8月打到1943年2月。日军损失了大量飞机和四十艘军舰，其中包括两艘主力舰。从此，日本军队就开始在太平洋的整个战线上

逐步败退。但是美军打打停停，到 1943 年底，只占领了所罗门群岛及其东北面的吉尔伯特群岛，而太平洋中部的大部分重要的战略岛屿、东南亚各国的广大领土仍然被日军所控制。在中国大陆上还是中国人民孤军奋战。

1944 年的上半年，西南太平洋美军缓慢地攻占新不列颠岛、阿德米勒尔提群岛，控制了新几内亚岛的北部海岸；在中太平洋美军占领了马绍尔群岛。

1944 年 6 月，美军开始进攻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基地——马利亚纳群岛。马利亚纳群岛一攻陷，整个日本国土就陷入美国 B-29 重型轰炸机的轰炸范围之内了，因此日军大力防守。但是力量对比对美国人很有利：美国地面部队两倍于日本，空军将近一倍半，军舰占绝对优势。6 月 19—20 日，在西部马利亚纳群岛的海战中，击沉日本航空母舰三艘，击落日本飞机六百四十架。日军被迫退却。7 月初美军攻占了该群岛的主要岛屿之一塞班岛，8 月初又攻下关岛，8 月中旬控制了整个马利亚纳群岛。

1944 年 10 月，美军开始了攻占菲律宾的战斗。日本倾其全力，进行菲律宾决战，以保卫通向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供应线。这样，在菲律宾的海面上发生了二次大战中最大的海战。美军击沉了日本的四艘航空母舰、三艘主力舰及不少其他舰艇。日本的南方交通线被切断。1945 年 4 月，美军已攻占全部菲律宾。

从 1944 年 11 月起，美国空军以塞班岛为基地，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空袭。1945 年 3 月 10 日夜，东京南部遭受大规模空袭，烧成废墟。从这以后，日本全国的大小城市每夜都无例外地受到轰炸，化为焦土。美国空军对城市的破坏，目的在于摧毁日本人的抵抗意志。据日本官方统计，由于美国轰炸，炸死和平居民二十六万人，伤四十一万人，炸毁民房二百二十万所，使九百二十万人无家可归。

日本帝国战败投降 1945 年初，日本还拥有一支四百多万人的庞大陆军和一支一百二十多万人的海军，从表面上看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已难以支持了。侵略战争已经把日本拖得精疲力竭，经济破产，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日本的海上航运已被摧毁，海外联系被切断，处在盟国的重重封锁之中。这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是个致命威胁。

美军占领菲律宾以后，于 1945 年 4 月开始攻占琉球群岛，首要目标是冲绳岛，以便逼近通向日本的要冲。日军采用绝望的野蛮“战术”，用飞机进行“自杀攻击”。美军苦战三个月，付出了重大牺牲，于 6 月攻占了冲绳岛。

在缅甸战线日本军队也溃灭了。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中国战场依然是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1941 年至 1943 年日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进行了野蛮的“扫荡”，企图把抗日武装分割、包围，加以消灭，但是，进攻和“扫荡”除了暂时使解放区缩小外，没有什么结果。从 1943 年夏天起，解放区又再次迅速扩大和加强。1944 年，解放区军民开始了局部反攻。1945 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发展到二百二十万人，建立了十九个解放区，人口达九千五百多万。

1944 年初，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受到严重破坏，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建立一条完整的从中国东北纵贯大陆直到新加坡的交通线。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日军在长期停顿之后，于 1944 年 3 月在国民党战场上开始进攻。国民党军虽然在人数上超过进攻之敌两、三倍，但士气极为低落，在日军进攻面前，一触即溃，兵败而逃。华中、华南的广大领土，包括郑州、洛阳、长沙、桂林

等战略据点在内，都沦入敌手。到 1945 年初，日军的进攻任务基本完成。由于这时日本军事和政治状况急剧恶化，日军司令部实际上已不能利用大陆交通线了。

到 1945 年春天，日本军队在中国战线上的优势也开始崩溃了。

日本战败的命运，已成定局。1945 年 2 月，近卫文麿等政界元老秘密向天皇提出了意见书，认为日本战败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战败的到来，日本有发生共产革命的危险，而这种危险比战败还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亚洲、太平洋地区

怕。他们还认为，既然败局已定，还是缔结妥协的和约和最大限度地保持国体为好。5 月，德国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后，近卫等人和海军的和平活动更为积极了。7 月，天皇本人也谈到了讲和的问题。

7 月 26 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内部，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的主张和反对的主张尖锐对立。当时日本通过情报部门已经知道苏联即将参战，但不知道就在目前。据当时日本估计，苏军开战最早不会早于 1946 年春，以为还有时间可拖，顽固地拒绝投降。

讨论“降”还是“战”的问题是最上层的极其秘密的活动，国民仍被驱使于“贯彻圣战”之中。在日本国内，不仅不存在像意大利那样全国规模的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就连象德国那样的反对纳粹、反对战争的局部地区的组织也没有形成。所以盟军的进攻经常遇到日本守军异常顽固的抵抗。要彻底打败日本，还得下大力量。据美军参谋部谨慎的估计，如果进攻日本本土，至少要使美国死伤五十万人，而且最早要到 1945 年底美军才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陆，以后在日本本土上还可能要长期作战。所以盟军司令部在制订占领日本本土的作战计划时，就考虑到苏联的对日参战，预定由它来粉碎日本关东军。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实现自己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诺言，宣布对日作战。这时，美国为了贬低苏联参战的政治影响，更重要的是为了在战后进行原子讹诈，急急忙忙于 8 月 6 日和 9 日，把仅有的两枚刚试验成功的原子弹，分别投在日本没有军事意义的广岛和长崎。由于日本毫无防备，造成了这两个城市二十多万日本人民的死亡。

8 月 9—10 日，苏联红军突破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一带的防线，分三路迅速向前推进：一路自东而西，由滨海地区向我国的哈尔滨、吉林和朝鲜北部推进；一路自北向南，由伯力、海兰泡向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一带推进；还有一路自西北从外蒙古越过大兴安岭，向我国东北中部平原推进。当时关东军号称有二十四个师团，七十万人，实际上精锐部队早已抽走，装备不齐，战斗力已大大减弱，很快被苏军击溃。除陆路进攻以外，苏联的太平洋舰队也攻占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朝鲜北部的许多港口。经过二十多天的战斗，苏军歼敌六十七万余人，为打败日本作出了重大贡献。

8 月 10 日，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延安总部发布大反攻命令，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人。各解放区人民军队展开了大反攻，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共歼灭敌伪军二十万人左右，收复城市一百九十七座。

由于苏联参战，那些打算即使日本本土失陷也要在我国东北把战争坚持到底的最顽固的主战派也不得不改变主意。在 8 月 14 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

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投降。8月15日中午，天皇向全体国民和全体军队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8月28日，美军在日本登陆并占领日本。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书的签字仪式。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其次签字的有：代表所有盟国的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以及美、中、英、苏、澳、加、法、荷、新九国代表。

9月9日，日本代表、驻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在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投降，在中国战区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投降书结束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1939年全面爆发，到1945年德、日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历时六年，战火蔓延欧、亚、非三大洲二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地区，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的十七亿人口，即占世界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被拖入战争的漩涡。这次战争造成的破坏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死亡总数达五千万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四倍。苏联损失的人口最多，估计达二千万人。其次是中国，由于缺乏统计，有人估计达一千万人至一千八百万人。损失超过百万的有：波兰人六百万，南斯拉夫人一百七十万，德国人八百万，日本人三百万。战争所消耗的资财以及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达四万亿美元这样大的天文数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化引起的。但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的背景中成熟起来的。而且，在二次大战期间，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还存在着象法西斯国家这一类国家，它们是帝国主义反动性和疯狂的种族主义的突出表现。二次大战就是德、日、意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结成集团发动的。它们的目的，不仅在于争夺殖民地，而且在于取消战败国的独立，使战败国人民沦为替战胜国种族服务的奴隶，以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一次大战时，各参战国并没有把肉体上消灭战败者当作自己的目的。二次大战时，法西斯侵略者力图消灭整个整个的民族和民族集团。德国法西斯分子曾秘密策划从肉体上消灭斯拉夫各民族，先是大批屠杀波兰人，后是苏联人。法西斯分子在集中营里就屠杀了一千二百多万人，其中六百万是犹太人。日本法西斯大批屠杀中国人、朝鲜人和其他国家人民。

二次大战爆发时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但从战争一开始就带有解放的、反法西斯的倾向，因为谋取世界霸权的法西斯主义威胁着各国的独立和各族人民的生命。遭受法西斯国家侵犯的各国人民奋起同侵略者进行斗争，这就增强了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以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同苏联反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汇合在一起，使战争转变为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战争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拯救了各国人民免于法西斯的奴役，世界文明免于毁灭。

二次大战的突出特征，表现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苏联和美国、英国，在法西斯野兽的威胁面前结成了联盟。在战争过程中，另外约有五十个国家加入了联盟。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和巩固，是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二次大战的主要战场在欧洲特别是苏德战场。在东方，中国人民长期的抗日战争对打败日本法西斯起了首要作用。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是各国人民互相配合、共同作战的结果，不是哪一两个国家的功劳。在这个联盟中，各个国家根据各自的条件对赢得

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削弱了帝国主义体系。德、日、意这三个法西斯帝国主义大国被打垮了，英、法帝国主义大国被严重削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人民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民族自觉性大大加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加深了。这次战争的胜利，为亚非欧各国被压迫民族争取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准备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战后，在东欧和亚洲诞生了一系列人民民主政权，在亚洲和非洲有许多过去的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而独立。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一切都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起巨大的作用。

第八章 1917—1945 年的自然科学和文化

自然科学和技术 科学正主宰着二十世纪，它象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人阿特拉斯那样，把整个世界背负在自己的双肩上。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科学技术和普通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千百万人开始感觉到科学革命的冲击，注意到科学技术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改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十九世纪末发明的汽车，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交通工具，而且汽车的速度越来越快，机械性能越来越好。飞机试飞成功不久，就得到不断改进，先用于军事，很快用于民航运输。本世纪初无线电播音获得成功。二十年代无线电收音机在一些国家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娱乐工具，到五十年代，人们开始有兴趣地观赏电视节目。自动烤面包器和旋转式洗衣干燥机之类的家庭用具，有助于减轻日常家务的操劳。科学似乎无所不能，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竞相利用科学方法。1923 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总结他那个时代的观点时说：“说到最后，使我们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有所不同的，就是科学。科学可以把人类带进一个快乐的境地，那是过去的人远难想像得到的。”

同时，许多科学研究工作的性质，距离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越来越远，因而科学家感到，要想把他们的科学学说用容易理解的文字清楚简单地说出来也越来越难。因此，二十世纪流行的一个观念是“世界上只有两、三个人真正懂得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但是却使许多人不懂相对论而心安理得。还有许多人乐意接受披着科学外衣的、用科学术语来讲的稀奇古怪的事物。这就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贩卖假科学理论，欺世惑人。例如德国纳粹党，把早已为人们摒弃的人种起源论重新提出来，用以证实他们的德意志人种优越论的信念。

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

1930 年间，能够实际证明存在的原子成分只有两种，那就是原子核内带阳电荷的质子，和环绕在它周围的带阴电荷的电子。1932 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发现了质量和质子相同，但是没有电荷的粒子，他把这些粒子命名为中子。中子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原子结构的了解，并大大促进了实验物理的发展。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重大的科技成果是发展出粒子加速器。人们研究原子核，最初靠观察天然放射现象，后来用 α 粒子做炮弹去轰击氮原子核。但是天然放射性元素产生的 α 粒子数量少，能量低。科学家知道，把原子核聚结在一起的力量非常之大，打破原子核需要极强的工具。于是制成一种机器，利用一连串电力冲击，加速质子的运行，使它的速度加快以打破原子核。1932 年，科学家运用粒子加速器，把锂原子核击裂为二。1939 年，又击裂铀原子核。科学家发现，铀原子核分裂时，放出的能量很大，而且还会放出其他中子，撞击邻近的原子核，触发迅速而倍增的连锁反应，放出巨大的能量。大战爆发以后，美国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研究新武器。终于利用原子核分裂时发出的巨大能量，制成了毁灭性的新式武器原子弹。

生物学在二十世纪有了长足的进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家已经知道细胞主要是由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组成的。比研究细胞再深入一层，在生物大分子的水平上研究生命运动，这就是分子生物学。二十世纪，有机化学、物理学、实验仪器和实验技术的进步，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准备

了必要条件。科学家们认识到，蛋白质是生物体的基本建筑材料，它参加了生命现象中许多复杂的化学反应。蛋白质成分复杂和品种繁多的特点，是同生命现象的复杂和生物种类繁多的特点相一致的。科学家们发现细胞核由一种叫核酸的物质组成，核酸有两种：核糖核酸（即 RNA）和脱氧核糖核酸（即 DNA）。实验表明，DNA 带有全部遗传信息，是生命活动的中心。RNA 指挥酶的合成。酶是生命体中许多化学反应的特殊催化剂，对酶的研究将有助于揭开光合作用的秘密，为用工业方式生产粮食创造可能性。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将给农业生产、医药卫生、甚至电子计算机等一系列当代最重要的科学技术带来深刻的变革。

早期科学家进行研究的工具，通常是家庭手工自制，技巧比较简单。随着研究工作的日趋复杂，科学仪器的设计和制造也就越来越重要。制造仪器的科技大部分在三十年代发展起来。1931 年电子显微镜制成，开始时只能放大几百倍，经过几年的改良，终于能放大十万多倍。三个世纪以前曾经助长现代科学萌芽的一种仪器——望远镜，在三十年代也有长足的进步和改良。

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和塑料三大合成材料是高分子聚合物的主要代表，是二十世纪化学和化工的骄傲。汽车、拖拉机和飞机的发展，需要大量橡胶做轮胎。1910 年，德、美、俄等国都有合成橡胶制成，但质量远不及天然橡胶。到了三十年代，美国研制成功质量比较好、成本比较低的合成橡胶。1935 年，美国研制尼龙丝成功，不久，开始大量生产尼龙丝袜。1940 年英国人发明涤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塑料投入了工业化生产，它们在工业上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系统地研究维生素。二、三十年代，已能用化学方法制出维生素 B、C、D、A。对抗生素的研究也取得了成就。抗生素是生物（真菌等）正常代谢过程中的自然产物，能够制止细菌等的生长。1928 年，英国的科学家发现抗生素“青霉素”，到 1940 年已能分离出纯正青霉素了。青霉素对于肺炎、猩红热、白喉、脑膜炎等多种疾病都有神奇的疗效。青霉素史无前例的成功，引起世界各地积极寻找别的抗生素。抗生素青霉素开辟了整个世界现代药物治疗的新时期。

苏联的文学和艺术 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者是阿·马·高尔基。他在十月革命前已经开始了杰出的文学创作活动。1892 年，他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不久写出了《鹰之歌》，歌颂觉悟起来奔向斗争的俄国人民的革命激情。1901 年，他在《海燕之歌》中，欢迎日益临近的革命，高呼“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他的长篇小说《母亲》（1906 年）受到列宁的赞扬。十月革命后，高尔基积极参加了建设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的工作。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无产阶级的文学和艺术繁荣发展起来了。共产党批判了“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也批判了对古典文化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列宁宣布：“艺术属于人民”。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苏维埃作家，核心是像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绥拉菲摩维支、杰米扬·别德内依等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和诗人。党帮助一些老作家站到革命人民方面来。如阿历克赛·托尔斯泰，起初敌视革命，逃亡国外，1923 年回国。苏维埃的现实和党的关怀帮助他投入苏维埃作家的行列，创作出一些有广泛影响的好作品。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一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如富尔曼诺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迅速成长起来。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为苏

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国内战争期间最为活跃和最有成就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诗歌创作。马雅可夫斯基在诗篇中号召艺术家投入群众斗争的行列，“把钢琴抬向街头”，抛弃“一切无病呻吟的玩意儿”，“创造出新的艺术，用它来拯救共和国脱离污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马雅可夫斯基写了讽刺诗《开会迷》（1922年），成功地嘲笑了沉湎于会议和文牍主义中的官僚主义者和事务主义者，受到了列宁的赞扬。列宁说：“诗写的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1924年）和《好！》（1927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典范作品。长诗《列宁》生动地体现出列宁和党、列宁和人民的一致性的主题思想。歌颂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诗《好！》，把平静的铺叙和强烈的抒情结合在一起，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达到了十分成熟的阶段。杰米扬·别德内依于1909年开始文学活动，在内战时期他创作的寓言、故事、长诗和歌词热情歌颂革命和无情揭露敌人。他的诗具有丰富多样的题材和体裁、独特的讽刺才能、渊博的语言知识，因此得到群众的赞誉。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有些作家仍以这一时期的战斗生活作为题材，写出了有深远影响的好作品。富尔曼诺夫是著名的恰巴耶夫师团的政委，内战前线的斗争经历，为他创作长篇小说《恰巴耶夫》（1923年）提供了丰富材料。《恰巴耶夫》艺术地揭示了“党指挥枪”的革命原则，成为二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优秀作品之一。绥拉菲摩维支在内战年代，以红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保卫政权的斗争，1926年他的著名中篇小说《铁流》问世。《铁流》描写了一支革命队伍的历史性行军，指出人民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成长。小说鞭笞了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状态，赞美了自觉的组织性。法捷耶夫在内战年代参加了游击队，直接与远东的日本干涉军进行过战斗，1927年他写出了小说《毁灭》。

内战结束以后，苏维埃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工作，接着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围绕着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高尔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问题发表了很多精辟见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反映现实；并要求艺术家自觉地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这个原则在1934年8月召开的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通过，并写进作家协会的章程。

在这一阶段中，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农业建设的巨大成绩，为苏联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层出不穷的英雄业绩成了作家们进行创作的素材，优秀小说大量出现。费·华·革拉特珂夫曾在新罗西斯克参加过修复水泥厂的工作。他的长篇小说《水泥》（1925年）（旧译《土敏土》）是苏联文学中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作品。它通过主人公楚马罗夫从内战前线复员到故乡，领导工人修建水泥厂的故事，赞颂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和首创精神。有些作品一方面勾画了工厂和农村中日新月异的广阔场面；一方面又细致地描写了人们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塑造了新人——苏维埃人的典型形象。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4年）是这一时期文学的杰出成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描写保尔·柯察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子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

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已把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既是全书的中心思想，又是保尔一生恪守的原则。这部小说第一次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成长过程作为中心内容，这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深远意义的。与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同时，安·马卡连科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著作《教育诗》。它的主题是使堕落的流浪儿“改邪归正”，体现出普通群众的历史主人翁感的巨大力量。

在这一阶段，瓦·卡达耶夫的《时间啊，前进！》（1932年）、亚·格·马雷什金的《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1937年）、克雷莫夫的《油船“德宾特”号》等都是工业化为题材的好作品。《时间啊，前进！》巧妙地叙述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建设者同哈尔科夫工人的竞赛。《来自穷乡僻壤的人们》提出了对农民小私有者教育的问题。《油船“德宾特”号》通过一条运油船，排除万难，胜利完成运油的故事，歌颂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运动。米·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费·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等长篇小说，描绘了建设集体农庄生活的画面。费·潘菲洛夫以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集体原则对农民小私有者本能的胜利。

三十年代末，日益逼近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使作家们转向保卫祖国的主题。阿·托尔斯泰的小说《粮食》（1937年），描写1918年国内战争时期英勇保卫察里津的战斗，塑造了英勇无畏、机智果断的布尔什维克的形象。阿·阿·毕尔文采夫的中篇小说《柯楚别依》（1937年），创造了国内战争中杰出英雄的形象。

在卫国战争前的年代里，以苏联人民过去的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出现了许多历史小说体裁的作品，如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华西里·杨的《成吉思汗》、阿·巴·恰培京的《拉辛·斯杰潘》等，都描写了苏维埃祖国的过去。

这些年代也是儿童文学繁荣的时期。瓦·卡达耶夫写了中篇小说《雾海孤帆》（1935年），描写了在1905年革命的环境里一个年轻人性格的成长。阿尔卡吉·盖达尔创作了两部非常卓越的儿童作品《学校》（1930年）和《帖木儿及其伙伴》（1940年）。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后，许多作家奔赴前线，亲身参加战斗。如著名的儿童文学家盖达尔等不少作家，在与德国法西斯的浴血战斗中英勇牺牲。许多作家边战斗边体验生活，写出大量作品。鲍·列·戈尔巴托夫的长篇小说《宁死不屈》（1943年）塑造了一系列苏维埃爱国者的光辉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在这一时期，苏联在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戏剧摆脱了苏维埃政权初期那种宣传画式的状况。弗·比里—别洛策尔柯夫斯基的《大风暴》（1925年），康·特列尼约夫的《柳鲍芙·雅罗瓦娅》（1926年），弗·伊凡诺夫的《14—69铁甲列车》（1927年），鲍·拉甫列涅夫的《决裂》，弗·马雅可夫斯基的《臭虫》和《澡堂》（1928—1929年）等剧的上演，证明了舞台艺术的思想艺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弗·维什涅夫斯基的《乐观的悲剧》、尼·包哥廷的《带枪的人》等话剧的演出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赞扬。

苏联的电影艺术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25年，由谢·爱森斯坦导演，摄制了无声电影《“波将金”战舰》。这部影片在世界上获得很高的评价，

它在 1927 年的巴黎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在 1958 年的布鲁塞尔国际展览会上被定为世界电影最佳作品之一。1926 年，弗·普多夫金把高尔基的著名小说《母亲》搬上银幕，获得好评。三十年代苏联开始摄制有声故事影片。1934 年上演了由格·瓦西里耶夫和谢·瓦西里耶夫导演的《恰巴耶夫》，它至今仍是世界电影杰作之一。列为这一时期苏联优秀影片的，还有《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列宁在十月》、《列宁在 1918 年》、马克辛三部曲、《邵尔斯》、《政府委员》和《伟大的公民》等。

苏联的作曲家为繁荣音乐事业进行了创造性的劳动。莱·格里埃尔所作的第三交响曲《伊里亚·摩罗梅茨》，描写了俄罗斯传说中的勇士。他的重要作品还有芭蕾舞剧《红罂粟花》（1957 年起更名为《红花》）、《青铜骑士》等。尼·米雅斯科夫斯基创作了反映英雄的革命往事的主题的第五和第六交响曲。他一生创作了二十多部交响曲。谢·普罗科菲耶夫写了爱国主义的大合唱赞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童话交响曲《彼得与狼》等。德·萧斯塔科维奇的天才的第一交响曲迅速获得了世界声望。他是苏联音乐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作品很多，除歌剧、舞剧、交响曲等大型体裁外，尚有大量室内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协奏曲和电影、戏剧的配乐等。他的有些作品在构思和内容的深刻性方面都是卓绝的。歌曲创作的优秀作品有亚·亚历山大罗夫的战斗歌曲，依·杜那耶夫斯基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抒情歌曲（如《快乐的人们》等），弗·札哈罗夫反映集体农庄新生活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歌曲（如《沿着村庄》、《有谁知道他》等），马·勃兰切尔（如《卡秋莎》等）、保·莫克罗乌索夫以及索·谢多伊等人的歌曲，这些优秀作品受到了普遍的赞赏和喜爱。

苏联的美术家和雕塑家创作了一批深受人民喜爱的艺术作品。保·弗·约汉逊的风俗画《苏维埃法庭》宣传苏维埃政权是人民利益和幸福的保护者。他的代表作《审讯共产党员》，刻划了千百万以自己的英勇和宝贵生命献给祖国的共产党员的形象，揭露了敌人必然灭亡的虚弱本质。这时期有特色的绘画作品有伊·勃罗德斯基的《列宁在斯莫尔尼》、米·格列柯夫的《加入布琼尼的队伍》和《机枪车》、亚·捷依涅夫的《保卫彼得格勒》、保·叶菲莫夫的政治漫画等。苏联雕刻家们的主要精力，象过去一样用在建造纪念像上，这些纪念像与早期的石膏纪念像不同，是用青铜和花岗石建筑的。其中最优秀的有列宁格勒芬兰车站的列宁纪念像、尼·安德列耶夫的一组列宁像和立在小剧院旁的《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像》、薇·穆希娜的《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庄员》群像和《高尔基纪念像》等。雕塑与建筑相结合的特点创造了许多优秀作品，如阿·舒谢夫创造出苏联建筑术的杰作——列宁墓。莫斯科地下铁道、全苏农业展览会等也都体现了雕塑与建筑相结合的特点。

战前的苏联文学和艺术，忠于党性原则，同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学和艺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作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现实认识不清，只看到一些个别事物和表面现象，看不清本质，搞不清丑恶现象产生的原因，更不用说去纠正它了，因而陷入绝望之中，于是产生了所谓“先锋主义”派。他们认为必须把旧文学和艺术的传统一扫而光，建立完全新的艺术形式。他们采取的是表现主义方法，即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表现力，采用歪曲的形式来描写实在世界，或用幻想式的反常形式，或用怪诞手法处理形象等。表现主义未能上升到具体地表现现实的高

度。但是，也有些艺术家，如德国的布莱希特、法国的阿拉贡、智利的聂鲁达等，克服了“先锋主义”派的左倾幼稚病，变成了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潮流还是有了很大发展，一些负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写出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在现实主义作家中，有一些人摆脱了战争梦魇的纠缠，变成了革命者；但也有一些人，由于害怕新的斗争、牺牲，未能克服内心世界观的冲突。他们以厌恶的眼光看待洋洋得意的资产者，把虚伪和凶狠的资本主义世界看成是不可理解的紊乱，但又不去同它斗争，而是到友谊和爱情中，到普通底层人们的高尚情操和善良性格中寻找世外桃源。这种人被称为“迷惘的一代”。同时在这些年，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学中，也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

在战后，法国文学也象其他许多欧洲国家文学一样，受着“先锋主义”的影响，它的代表作家是安德烈·纪德。他的长篇小说《伪币制造者》（1926年），尽管存在着颓废主义情调，却包含了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尖锐批评。这一时期，罗曼·罗兰逐渐摆脱抽象人道主义思想，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的长篇小说五卷巨著《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是他后期思想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规模之宏，不亚于《约翰·克利斯朵夫》；从思想来说，它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个发展。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个人主义的战士，是作者初期和中期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化身。作者在《母与子》中清算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答复了克利斯朵夫所苦恼的问题：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必须摧毁，而代之以与劳动群众的结合和实践的行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一生著有各种体裁的作品一百多卷，他的优秀长篇小说《蹩蛇》（1932年）反映了资产阶级家庭在金钱的势力下往往会变成多么凄惨的地狱。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共产党周围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进步文学家的阵营，他们为争取和平与民主，反对法西斯威胁而进行斗争。亨利·巴比塞最著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火线》（1917年）和《光明》（1919年）。《火线》的副标题是《一个步兵班的日记》，这部小说虽然没有成套的故事，但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一幅惨绝人寰的战争图景。《光明》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普通的法国小市民觉醒的过程。主人公通过亲身经历思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的根源问题，逐渐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给世界带来光明。巴比塞的小说不仅描写了战争的恐怖，而且描写了战争中的人，描写了人怎样认识战争，并准备公开反对战争。路易·阿拉贡发表了多卷长篇小说《真实的世界》四部曲，反映了二十世纪初的法国社会，描写了资产阶级的腐化和没落，知识分子的彷徨、苦闷和其中一部分人靠拢进步力量的过程。

在英国文学中，“先锋主义”的著名代表是詹姆斯·乔伊斯。他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年）描写了都柏林三个居民一天的生活。乔伊斯断定资产阶级文明已经走到绝境，但同时他却找不到出路。在他的创作中，“意识流”的方法表现得最充分。作者不顾传统的文学叙述原则，不是有逻辑地、有条理地、连贯性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感情，而是把人的思想和感觉的一切偶然转念、瞬间的印象、具体形象和抽象概念的偶然联想，都一一直接速记下来。这时期老一辈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继续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作品。萧伯纳写出了优秀剧作《伤心之家》（1917年），他把这个剧本的副标题定名为《俄国风格英国主题的狂想曲》，意即《伤心之家》是仿效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榜样写成的。萧伯纳指出，《伤心之家》是“大战前夕文明而懒散的整个欧

洲”的写照。剧中的主人公们是英国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足够的聪明，并有余暇从事高等文化，但是却没有力量使生活变样。他们象是一群染上鸦片烟毒的人们，只有使劲摇动他们，才能使他们清醒过来。但是大战的震动并没有使“伤心之家”摆脱昏睡状态。萧伯纳预言：更强烈的爆炸必然发生，最后将使“伤心之家”归于毁灭。1929年，萧伯纳创作了尖锐批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剧本《苹果车》。在萧伯纳的全部创作中，贯穿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精神，但未能指明改造社会制度的真正的道路。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高尔斯华绥最重要的艺术创作乃是描写英国资产阶级家庭——福尔赛的故事。这是一连串的优秀长篇小说，描写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英国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福尔赛世家》三部曲的第一部《有产者》于1906年写成，它是高尔斯华绥全部创作中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写了《福尔赛世家》的后两部，还写了《现代喜剧》三部曲，这些小说是揭露资产阶级堕落和腐朽的杰作，是资产阶级崩溃的哀歌，但是又可以看出，作者对资产者的批判力量已经显著减弱。理查·奥尔丁顿是英国“迷惘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他在长篇小说《英雄之死》（1929年）中，塑造了一个参加世界大战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很快看出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同他生活的社会中其他原则一样的虚伪。他被大战弄得精神颓丧、意志消沉，在灰心之下，迎着敌人的枪口走去。作品的基调是灰暗颓丧的。

十月革命以后，在美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学潮流。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里德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作品描绘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歌颂了新世界的诞生。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了进一步发展。西奥多·德莱塞在1925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作者通过主人公克莱特走上犯罪道路的经过，揭示出美国社会是造成悲剧的根源。辛克莱·刘易士真实地描绘了美国现实的各个方面。他在《大街》（1920年）中揭露了美国的市俗习气，在《巴比特》（1922年）中揭露了商人的愚鲁肤浅。约翰·斯坦培克刻画的大多是美国的下层人物。他在《愤怒的葡萄》（1939年）这部长篇小说中叙述了被从土地上赶走的农民约德一家人的悲惨遭遇，描绘了美国资本主义农村的苦难生活。现实主义作家尤金·奥尼尔，因他的心理剧《安娜·克里斯蒂》（1921年）而获得优等戏剧奖金。他把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到了舞台上。美国“迷惘的一代”文学最著名的代表是海明威。他刻画了大战后迷惘苦闷的青年一群。战争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病暴露无遗，战争使人们丧失了赖以生活的信仰，这种幻灭、空虚、失望深深反映在《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和《永别了，武器》（1929年）这两部作品中。海明威的思想在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同情美国劳动人民的斗争，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战争，写了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剧本《第五纵队》（1938年）和长篇小说《战地钟声》（1940年），使他超越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学水平。“迷惘的一代”文学的著名代表还有福克纳和斯科特·费茨杰拉德。福克纳的《喧嚣和愤怒》（1929年）叙述美国南部一个败落的中产家庭的过去和现在。费茨杰拉德在1925年出版的《伟大的盖茨比》被列为二十世纪深受赞美的小说之一，作者用熟练的技巧、多样的手法描述了一个流氓绅士的成功与失败的过程。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文学的主流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是亨利·曼和托马斯·曼兄弟二人、列昂·弗希特万格等作家。亨利·曼

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流亡到法国，在法国期间发表了历史小说《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代》（1935年）和《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1938年）。小说取材于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作者塑造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领袖形象，与法西斯分子吹捧的“领袖”相对比，从而揭露了希特勒的刽子手面目。这两部小说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托马斯·曼通过《魔山》（1924年），尖锐揭露了资产阶级寄生生活的空虚和腐烂，描绘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堕落。他的短篇小说《玛利欧和魔术师》（1929年），通过对意大利一个海滨浴场政治气氛的描绘，表明了作者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小说告诉我们：人民可以暂时被敌人欺骗，但是当他们一旦觉醒，就要致敌人于死命。弗希特万格创作了著名小说三部曲《候车室》，特别是它的第一部《成功》（1930年）具有重要意义。故事发生在1921—1924年的巴伐利亚，主人公是一个艺术史家、绘画展览馆馆长。他虽然很少过问政治，却被牵连到一个政治阴谋的漩涡中去，莫名其妙地遭了难，成为虚假的法律机器的牺牲品。作品反映了整个魏玛共和国资本主义各种弊病的复杂世界。在创作《候车室》三部曲的同时，弗希特万格还进行了另一个三部曲《约瑟夫斯》（1932—1942年）的创作。雷马克是德国“迷惘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他的《西线无战事》（1929年）是为一次大战的牺牲者写的杰出的作品，被译成几十种文字。这部小说用第一人称描绘了一批年轻士兵在西线战壕里以及在后方所经历的悲惨遭遇。雷马克忠实而激动地讲述了关于无意义的痛苦死亡的真实可怕情景。但是由于他不了解隐藏着的战争的原因，所以也看不到反对战争的真正方法。有些作家，如布莱希特、贝希尔等人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

战后在东欧出现了一些反映时代重要问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迅速博得了世界读者的赞赏。捷克斯洛伐克的讽刺小说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在1923年写出了长篇小说《好兵帅克》。这部小说以一个普通的捷克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情节线索，广泛揭露奥匈帝国统治者的凶恶专横及其军队的腐败堕落。帅克利用民间的谚语、笑话，接过反动上司的口号，不放过一切可乘之机，巧妙地同统治者作斗争，把反动政权的秩序搞得一团糟。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帅克这个绝妙的典型。《好兵帅克》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近三十种文字，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十月革命后，在日本文学史上出现了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有批评家兼第一个苏联文学的翻译家藏原惟人、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三月十五日》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这时期的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经历着危机，作家和诗人们陷入了个人感情、心理分析和自我反省等狭窄的框框之内，或者为了逃避现实而转入历史题材。其中有些人自杀，以了终生。

从1895年发明电影的时候起，电影艺术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是生产电影影片的主要国家。战争开始以后，欧洲国家由于缺少原料，美国成了影片的主要生产国。大战结束的时候，查·卓别林的滑稽片、汤·英斯的草莽骑士、道格拉斯·范朋克主演的惊险片和玛丽·璧克馥的感伤片充塞了世界各国的银幕。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城郊的电影制片厂的集中地——好莱坞成了美国经济和国家出口的重要部门。二十年代是无声电影，三十年代出现了有声电影。最初的有声电影只是把舞台演出机械地搬上银幕，被人们称为“百分之百的对话”影片。无声电影的伟大成就几乎

为人们所遗忘或抛弃。后来由于苏联导演谢·爱森斯坦、弗·普多夫金等人倡导，世界电影界的优秀导演如法国导演勒·克莱尔等人响应，否定了当时在美国和西欧电影界占统治地位的只用语言的表演方法。配合运用画面和声音的有声电影发展起来了，“百分之百的对话”影片的时代结束了。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好莱坞的电影竭力使观众脱离痛苦的现实。它拍摄了一些以场面宏伟、布景豪华并以上百舞女来吸引观众的音乐影片；也拍摄一些描写强盗的影片和恐怖影片。只有少数导演创造了美国电影艺术可以引为自豪的现实主义作品，如查·卓别林的《城市之光》、《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这几部电影充满了对“小人物”的热爱、对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尖锐讽刺。在法国，三十年代的优秀影片如《巴黎屋檐下》、《最后的亿万富翁》、《马赛曲》等是由雷·克莱尔、让·雷诺阿等这样一些现实主义导演摄制的。这些影片通常是悲剧性的题材、宿命论的题材，反映了当时法国面临严重考验而一无准备的社会情绪。在英国的电影艺术中出现了约·格里尔森导演拍摄的许多光辉的纪录影片。在德国，法西斯上台后，电影变成了希特勒法西斯的宣传工具，有名望的电影工作者几乎全都流亡国外。

在音乐和美术领域，资产阶级文化衰退的明显表现，就是表现主义的盛行。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打着达到最大限度表现力的幌子，用歪曲的、变形的形式来描写实在世界。在音乐中，追求夸张地表现感情、以致达到歇斯底里的紧张程度，对一些可怕的、病态的、不正常的东西过分地感兴趣，这在歌剧和声乐中尤为突出。在美术作品中，人被描写得越来越野蛮，精神和肉体越来越衰退。这些作品只能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和消极思想。有的艺术家甚至崇拜精神患者的艺术，鼓吹无意识的即兴创作的原则。

在资本主义各国，也出现过一些进步的艺术团体，它们反对形式主义（表现主义是形式主义流派的一种）流派的颓废势力，反对宣传法西斯思想，发展革命艺术。1937年，西班牙画家帕布洛·毕加索创作了《格尔尼卡》。格尔尼卡是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小镇，在西班牙内战期间遭到纳粹德国飞机的轰炸，在短短的十五分钟内死了几千人。毕加索在听到这场惨剧之后开始创作这幅画。这幅画尽管具有抽象派象征主义的形式，画家没有绘出一枚炸弹，也没有绘出一滴血，但是，整个画面是对于战争和暴行的控诉，是毕加索对于法西斯暴徒一个愤怒的、富有表现力的回答